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五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

目　录

中国共产党反对军阀战争宣言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中国的工农兵士及一切劳动平民！

南京政府和唐生智开战了。又是贫苦的兵士流血，贫苦的人民受痛苦了。他们已经攻城夺地，调兵遣将，拉伕派饷了。这些军阀互相勾结，互相冲突，不论是南京武汉，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都是祸国殃民，剥削和压迫工农贫民的。冯阎和张作霖早已开战，今南京和武汉又打仗了。不久，孙传芳、张宗昌又要打南京和上海。全国大混乱的军阀战争——奸淫掳掠的屠杀战争开始了！就是广东，也在酝酿着李济琛、黄绍雄和张发奎的战争。全中国都是万恶的新旧军阀争权夺地的战争。

工农兵士及一切贫民，以至于小商人，都尝够了军阀战争的痛苦。农民被剥削到一粒米也不剩，被军阀拉伕、派捐、封船、扣车、派粮、派草……兵灾所到，田亩荒芜，整个的村庄〔遭〕到烧杀蹂躏，奸淫掳掠，无所不至。这些新旧军阀拚命压榨贫民的膏血，苛捐杂税无奇不有，——农民一年劳动所得，差不多有四分之三要拿出来付租税。如果农民反抗这种强盗似的禽兽似的蛮横压榨，那么，他们便大施屠杀，几十个村庄一批一批的烧毁，老弱妇女也不能免。这些军阀还要拉伕，——强迫工人苦力到战场上去送死，强迫他们搬运几百斤的重担，牛马似的鞭打他们。被拉去的伕子，不但一个钱也得不着，而且常要打死、饿死、做死。伕子做不动了，军阀便不顾他们死活，把他们丢了，甚至于还要把他们枪毙。军阀封农民的船，抢农民的车，船夫车夫都得替他们当差。战争一起，纸币更加要滥发了，甚么国库券，金库券，二五库券又要大批的发出了。工农小商须得使用这种不值钱的纸币。还要强迫人民担负公债。上海方面已经榨取了四千万元的公债；现在为着战争——又要发行二千四百万元。因战争的关系，米、盐、油等日用必需品，运输都日益停顿，价钱一天天的飞涨。因战争的关系，交通断绝，商业停滞，棉丝等等原料不能运到市场上来，工厂要关门，工人的失业更加一天天的增多。资本家只顾要自己不亏本，成批的开除工人，或者简直关厂，帝国主义遇见中国这种混战，更加可以乘机取利。这些万恶的禽兽似的新旧军阀互相吞噬的时候，帝国主义便可以更加来进攻中国——满蒙协定呀，中日商约展期半年呀，汉口英租界交还英国呀。于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又抢夺几条新的铁路去，又霸占了几个满蒙矿山去，他们还想更多占领中国的领土，侵入内蒙古。英国帝国主义已经利用军阀的互斗和国民党的妥协屈服，又将汉口租界抢去。汉口英租界是工人贫民群众夺回来的呵！如今卖国的国民党却将它让还英国。今年一月间工人贫民赤手空拳将这租界夺了回来。而现在——十月间，还不满一年，国民党的军阀，有着全副武装的军队，却拱手交还英国。

中国一般劳动民众，穷苦得饭也没有吃，受着非常之大的痛苦、压迫、抢掠、奸淫，而这些军阀还要打仗！

谁在这里破坏长江流域，谁在这里延长战祸荼毒民生？

就是国民党。唐生智是国民党。他这个军阀、地主、银行家、荒淫骄奢的重利盘剥者，他在湖北、湖南、安徽成千成万的屠杀工人和农民，屠杀共产党员，摧残两湖的农民运动，残暴到极点的镇压两湖的农民暴动。唐生智说，他不满意南京政府的政策，不承认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这完全是鬼话。他自己的政策和南京政府的完全一样。他为什么打仗？不过为着争地盘，他抢着了安徽，还想抢南京上海，占领整个的长江流域，他要他来杀江苏浙江的工人农民，——南京派的国民党杀了还不算！他是张作霖、张宗昌的同盟者，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现在已经受日本帝国主义军械子弹以及汉阳兵工厂材料的供给。他是杀工人农民的刽子手。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以及一切工农的责任，就是要反对唐生智，推翻唐生智！

现在南京政府打唐生智。难道南京政府比唐生智好些么？南京政府之下的将军也是国民党的军阀，也和唐生智一样，是清党反共的所谓忠实同志。这些军阀和唐生智是一样的，——一样的刽子手！南京派的将军李宗仁、白崇禧、程潜、何应钦，也是地主豪绅重利盘剥者大资产阶级以及买办的代表，和武汉的唐生智、何健、刘兴一样，和冯玉祥、阎锡山一样，和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一样，和汪精卫、张发奎、李济琛也是一样。

何应钦在福建浙江，到处屠杀工农共产党。他现在明的暗的听英国帝国主义的驱策。他是蒋介石的走狗。白崇禧就是四月间屠杀上海工人的刽子手，他最近还在天天杀共产党，天天杀无产阶级勇敢的战士，他逮捕了几千几百的革命党员，关在龙华。李宗仁、程潜等类的东西，也是军阀，也是工农贫民的敌人，革命的敌人。他们打什么仗！为什么打唐生智？他们的目的，也和唐生智一样。他们是想抢地盘，争权利，抢夺剥削工农的权位。这次战争的“意义”，就是——究竟那一个能够有全权搜刮长江流域剥削劳动民众：是唐生智呢，还是南京派的一班狗强盗？

张发奎、汪精卫、陈公博等等，现在正想利用长江流域的混战，从容霸占广东的政权。但是李济琛、黄绍雄又要同他们战争。这些革命叛徒，这些无耻的地主豪绅资本家的走狗，他们帮着杀了成千成万的工农，还在那里说工农政策，实行减租等等……人民被他们欺骗得长久了；他们自己的屠杀政策早已揭穿他们的假面具，现在再骗不了人的了。他们是劳动民众最可恶的仇敌，因为他们用那些欺人的“革命”口号，掩饰他们的真面目，还想用国民党的臭招牌骗人呢。他们和李济琛、黄绍雄的战争，也是军阀的战争，和南京武汉的战争是一样的。

工友们，农友们，城乡的贫民！在这种全国大混战的军阀战争之中，我们拥护谁呢？我们应当使这种战争得甚么样的结局呢？

我们应当反对一切军阀的战争！我们应当推翻一切军阀：北方的，南方的，武汉的，南京的，山西的，河南的，广东的或广西的。我们对于现今互相搏噬的军阀，都要打倒。我们知道：无论那方面战胜，对于劳动民众都是非常之大的祸害。所以我们现在，和欧战时候欧洲俄国的革命工人一样，应当积极的行动，使各派各系的军阀统统都失败。我们应当使这种军阀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一切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战争，变成反对一切压迫剥削以及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要一下子消灭一切军阀的战争。然而要肃清这些新旧军阀，消灭一切战争，只有推翻军阀政权之一法。要消灭军阀的政权，就必

须工农兵士起来反对军阀。应当使军阀的战争变成一切劳动民众反对压迫剥削及帝国主义的伟大的战争。只有这样，我们将地主阶级的土地夺回来给农民，没收一切大工厂大银行大企业，消灭重利盘剥，推翻军阀及帝国主义，彻底的改良工人及一般劳动者生活，统一中国，造成新中国——工农兵劳动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中国。国民党的欺人口号，革命叛徒的反动政策，决不能救中国；只有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反对压迫者剥削者的伟大的武装暴动，才能开始新中国将来的光明之路，肃清中国之内的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几万万工农民众不再受残暴的剥削和压迫。

中国共产党知道：这种反对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要经过极大的阶级战斗，要忍受很大的牺牲。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是一切劳动民众的领袖，我们知道：必须在斗争之中组织群众，走向这个伟大的革命战争。

革命战争是实行着：一年以来光荣的上海工人的暴动，广东农民的暴动，两湖农民的暴动，叶挺贺龙军队的战斗，都只是这一极大的斗争之中的片段。我们应当利用这几次英勇的战斗之中的经验和教训，准备更大更新的爆发。我们应当将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党，组织得更好，扩大到工农群众之中去，吸收一切优秀的革命分子。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应当更加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努力的反对国民党军阀的统治，反对这些民众的和革命的叛贼。我们更加努力的反对一切军阀战争，反对一切军阀及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一切工农兵士贫民实行伟大的武装暴动。

工友农友兵士贫民同志们！准备着作战，经过日常斗争，一直到推翻劳动民众的一切仇敌！

前进！前进！

反对军阀战争——反对一切租税，反对无价值的纸币库券，反对强逼公债！

反对南京的军阀，反对唐生智，反对张作霖，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反对张发奎，反对汪精卫……！

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豪绅、地主、资产阶级！

力争中国的统一解放！

推翻一切寄生虫压迫者的政权！

一切政权归劳动平民！

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青年团中央委员会

（原载《布尔塞维克》1卷上册2期）

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日）

国民党的蒋介石屠杀上海工人，李济琛屠杀广东工农，已经有九个月了；国民党的唐生智屠杀两湖农民（马夜事变），汪精卫屠杀汉口工人（七月三十一日），也已经有半年了。国民党的宁汉两中央“合作”，宁汉两政府合并等类的滑稽戏也不知扮演了几多次了。国民党的“忠实同志”在这期间杀戮各地工农民众，摧残罢工禁止抗租，严禁抵制外货、……凡是一切反革命卖国的勾当早已应有尽有，应做尽做了。广州工农兵群众暴动失败之后，国民党自己宣布已经屠杀广州工人兵士农民到五千七百多人，并且对俄绝交，杀戮驻华的苏联外交人员。蒋介石更进一步的宣布“与列国一致反对第三国际”并“禁止一切民众运动”。国民党的反动事业，到此已经告了大成。

国民党的所谓反共清党，说是可以肃清恶化腐化，完成北伐，解放中国，改善民生等等。如今事实上怎样呢？国民党以国民革命的名义，以“救党护党”的名义，残杀工农民众，使全中国变成白色恐怖的世界，青天白日已经是白色恐怖的象征！这总算是反共清党的成绩！这种“成绩”的表现，不但使全国的经济金融陷于破产崩溃的地位，一般工农民众受着不堪言状的剥削压迫和屠杀，不但新旧南北各省大小军阀的混战破毁全国糜烂全国，甚至于国民党内的纠纷也是闹得乌烟瘴气。国民党已经是死尸，而且是早已烂得发臭的死尸了。

国民党在如此的情形之下，召集他的第四次中央会议，但是他召集了五个月，至今还是开不成。或是说不足法定人数，或是连法定人数也不能确定（究竟是十五人还是二十人）。形式上的理由多得很，但是实际上呢？——是因为国民党根本不是甚么统一的党，他内部的政客派别军阀系统多得很；这些派别和系统之间，正在冲突矛盾战斗，如何能一致的开甚么中央会议呢！

最近伍朝枢孙科辞职，汪精卫被逐，何香凝等所谓粤方委员被人提议通缉，胡汉民李石曾吴稚晖等声言“没有办法”，蒋介石自己说“民众怀疑”，说“党国威信日堕”。国民党自己以及帝国主义的报纸，都说：（一）国民党已经不是统一的党，国民党的统治和北方军阀的统治毫无二致；（二）北伐了两年，结果仍是四分五裂，各派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及军阀的混战不已；（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经都不能发展甚么革命解放中国，而是发展反革命破坏中国。这些情形是全国人民所共见共闻的了。

中国共产党早已向中国一般劳动民众解释：国民党与共产党破裂，国民党与一切工农民众破裂，就是背叛革命，这种结果一定是使国民党变成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走狗，变成新军阀的工具。这已经铁一般的事实了。国民党欺骗民众的政纲口号，已经完全拆穿西洋镜。国民党已经是赤裸裸的军阀官僚豪绅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党了。

中国共产党不但是已命令自己的党员完全退出国民党，并且号召一切革命分子反对

这种背叛革命卖国殃民的国民党；根据下列的罪状：(一)国民党是实行白色恐怖屠杀工农的党；(二)国民党认为“粮从租办，租由佃出，是千古不移之定理”，压迫禁止农民的抗租和没收土地，他是维持地主封建式的剥削的党；(三)国民党禁止罢工，封闭革命工会，他是维持中外资本家剥削的党；(四)国民党认为“必须与列强一致反对第三国际”，他的政府，如蒋介石则与日本勾结，秘密向日本借款卖国，如李济琛则向英国香港政府借款千万，作为他屠杀广州民众五千七百人的尝金，他完全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五)国民党北伐了两年，不仅没有打倒甚么军阀，而且是造成许多新军阀，这些新军阀就是国民党的主人，互相以救党护党的“理由”，实行争权夺利的混战，如今广东福建两湖山东直隶等省，到处都是这些军阀混战，战祸的蔓延，使一般工农失业，兵士牺牲，使一般民众受着苛捐重税。公债省债库券等的压榨或者不兑的纸币军用券剥夺一般贫民的生计；——根据这些罪状，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是国民的公敌！国民党是中国一般工农贫民兵士群众的公敌！国民党和北方军阀已经是同样的反动势力——维持帝国主义统治的力量！

中国革命的工农民众！我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努力继续广州暴动的事业，创立苏维埃的中国——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的政府，中国最大多数民众自己的政府，然后才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然后才能解放中国工农贫民兵士于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压迫之下，才能消灭一切军阀的混战，开始中国和平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原载《布尔塞维克》1卷15期)

中国共产党为国民党军阀攻下京津告全国工农兵及劳苦民众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全中国工人农民兵士及劳苦民众！

国民党军阀的“北伐”已经打下京津了，反革命的青天白日旗遍满了全中国，豪绅地主资产阶级都庆贺他们的胜利，仿佛中国从此可以统一而进于独立自由了。

但是一切革命的工农兵士及一般劳苦民众，应当认清国民党的北伐成功，绝对不是中国革命的进展，只是反革命势力的强大。中国不独没有统一的希望，从此又更加稳固帝国主义利用的军阀割据相互混战的局面了！

以前，有些人希望北伐成功可以解决济案以及五卅以来的惨案，进而达到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民众可以得到自由，生活也可得到改善；现在的事实告诉我们：那都是一些幻想！

最近国民政府的对外对内宣言，显然是一种投降帝国主义欺骗民众的文告，那些“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和“励行法制”“蠲免苛税”“裁减兵额”……与以前段祺瑞及其他军阀登台时的“外崇国信”“裁兵减税”“澄清吏治”一类的宣言，完全没有两样！

国民政府惟恐冒犯了帝国主义的虎威，第二次修改的对外宣言，便连“撤退山东日兵”都不敢提出了，连忙声明以前的宣言是不足为凭的草案，更加上些“共产党亦必不容其存在”，以取得帝国主义“友邦之谅解”，进而搜查天津俄国领事馆以表示他们对于帝国主义比张作霖还要忠实！这不独证明济案将不能得到有利于中国的解决，不平等条约只有层层的加增！更谈不到由国民党来废除了！

本党屡次宣言指出这次国民党军阀的“北伐”完全是各派军阀为扩充自己地盘的混战，丝毫没有革命的意义。现在北伐成功了，国民党的军阀得到奉系军阀关内的地盘了，——民众得到的是甚么？工人得到的是失业恐慌！农民得到的是兵灾匪祸，人亡家散！兵士得到的是数万生命的死伤；生者七八个月得不到薪饷！商人得到的是加重苛捐杂税！一班贫苦民众得到的是兵灾与饥饿！中国得到的是日本占领山东和满洲！

现在国民党的各派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济琛李宗仁白崇禧等，都是各霸一方互相冲突的：蒋介石日在企图如何消灭桂系，冯玉祥企图怎样占有京津地盘。他们之间的每一个都想得到帝国主义的专房之宠，获得卖国的整个的权利，无限制的扩充地盘与军队。将来以“蒋与桂”“冯与阎”为骨干而互相勾结利用的战争，必然会要爆发，造成全国更紊乱更利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局面！这样又如何能统一军政与财政呢？只有增加苛捐杂税加紧对于民众的压迫与剥削，又如何“蠲免苛税”“裁减兵额”“励行自治”

“澄清吏治”“肃清匪盗”呢？更有什么方法统一中国呢？

卖国求荣的国民党，或者还要拿出召集国民会议的招牌来欺骗民众，但是真正的国民会议他们是不敢召集的，若是召集必定是各派军阀御用的代表会议，其内容与从前段祺瑞式的善后会议没有两样，我们必须坚决的反对。除开民众自动起来召集的代表会议是不能有丝毫效果的。

全国工农兵士及贫苦劳动民众！在国民党没有叛变前以工农为主干的革命潮流，何等巨大而有力量，虽强顽的帝国主义亦不敢不让步，武汉九江的英国租界，也是在那一巨潮中由工人直接收回的，工农生活也得到相当的改善。在国民党反叛革命以后是如何的呢！工农所得到的改良条件也被他推翻了！苛捐杂税公债票和纸币无限的增加！与苏俄的邦交也被他断绝了！国民党抛弃反帝国主义口号而实行与英日美帝国主义亲善，以为这样必定可以获得帝国主义的谅解，但是帝国主义更利用国民党投降的机会采取积极侵略中国的政策，日本出兵山东满洲便是国民党投降政策的结果！现在日美帝国主义竞争在中国及整个太平洋势力发展的相互冲突，更加激烈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由国民党无耻的投降政策而更加促成暴发于太平洋了！我们应当认清国民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酝酿中所作的罪恶，同时我们应当防备世界大战的危险！不论国民党如何反动，如何残酷的屠杀革命民众与本党同志，但是革命的工农民众始终是没有停止其争自由的斗争的。从国民党反动以来，全国工农在本党实行土地革命与武装暴动政策之下，曾经做过极英勇的斗争！各省农民尤其是湘鄂赣粤与江苏的农民反抗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与暴动，仍在继续不断的向上发展，而准备着大的进攻；上海广东武汉北方及各铁路工人因不堪生活的苦痛与政治的压迫，亦常暴发大的小的罢工，或是准备大的罢工之暴发；各派军阀下的士兵也渐认识国民党的反动而趋向于革命的工农群众，——他们时常带着枪支离开军队来参加工农暴动；全国中小资产阶级显然是不堪忍受国民党的压迫与剥削而深恶痛疾现时的政府！国民党在清党与登记之后，显然成为纯粹的豪绅地主军阀官僚资本家少数人压迫多数工农贫民的团结！这些事实，只是证明中国革命运动快要走到一个新的高潮！我们应当准备自己的力量，来根本推翻一切反动的统治！

现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紧迫！国民党只是秉承帝国主义意旨而压迫民众的工具，我们再不要希望国民党来收回山东满洲解决济案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更不要希望国民党政府改善民众生活和统一中国，我们要防备国民政府的秘密卖国外交，我们要自动的恢复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民众运动！为要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目的，只有工农兵士及一般劳苦民众联合起来，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军阀统治，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政权！

工人农民兵士及一般劳苦民众！中国革命到了转变的紧急关头！我们只有根据下列的纲领，打破一切白色恐怖的恶魔，起来猛烈的向敌人进攻，组织自己，武装自己，实现自己迫切的要求，坚决的与敌人奋斗，才是出路！

反对帝国主义对华的进攻！

撤退一切帝国主义驻华的海陆军！

收回山东满洲及一切租界与租借地！

收回帝国主义在华的银行和工厂！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恢复与苏俄的邦交！
反对世界第二次大战！
反对新军阀混战！
厉行经济绝交！
彻底抵制日货！
推翻卖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
建立工农兵及城市贫民的苏维埃政权！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抗租绝对自由！
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救济失业工人！
工人监督生产！
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及兵士耕种！
取消苛捐杂税，反对苛派军饷公债票国库券！
解除地主资本家军阀武装，武装工农！
反对公卖鸦片！
没收豪绅反动派财产，开办合作社及农民银行！
发清兵士欠饷，军队财政公开，改良士兵待遇！
废除军队体罚，打倒压迫兵士克扣军饷的官长！
减除学生学费，改良学校设备！
妇女在政治经济与教育上与男子一律平等！
自动恢复民众组织与一切活动！
防止国民党政府的秘密卖国外交！
释放一切争自由而被捕的政治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原载《布尔塞维克》1卷23期）

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

（一九二九年二月）

项　英

反动势力对于工人阶级进攻的形势

国民党自一九二七年反动以后，与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势力联合，积极的向工人阶级进攻。其主要的政策是用极端的白色恐怖来对待工人阶级，不断的屠杀、拘捕工人群众中的革命分子，以消灭肉体来对待工人中的革命领袖。去年(指一九二八年——编者)一月至八月的工农被屠杀者将十万人，内中仅有二万七千六百九十九人是正式宣布"罪状"的，现在关在监狱内的还有一万七千二百人左右。虽然反动势力以这种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工人阶级，仍然不能消灭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反更促进他们的反抗，特别是在'五三'惨案发生后，工人阶级革命情绪的激发，使蒋介石及汪、陈派不得不采用改良主义的欺骗方法来缓和群众的革命行动，麻醉工人群众，来消磨群众的革命性。帝国主义在世界欺骗工人的走狗——国际劳工局长汤麦氏这时也亲身来华，以欺骗世界工人的经验来对付中国工人群众及告诉中国资产阶级一些欺骗方法。这种欺骗方法到现在虽在群众中发生一些影响，但不能消灭群众的革命斗争，最近的工人群众斗争的发展就可证明。

至于革命工会老早封闭殆尽，稍有革命行动的工会亦禁止存在。反动统治者首先以改组工会的名义，建立御用的官僚工贼工会，以箝制工人的行动，可是屡遭工人群众的反抗，已不发生作用；在'五三'惨案前后，又以工会整理委员会的名义重整旗鼓，以改良欺骗方法在群众中发展黄色工会的组织，规定一切工会须在国民党部和政府登记，一切行动都要经党部许可，企图用法律来箝制工人组织工会的自由，以和平的合法的方法来代替工人的直接斗争，以劳资合作代替阶级斗争；委派国民党员改组斗争的工会，派遣秘书，把持工会的会务，如铁路工会；对于稍有革命性的工人群众，仍是以白色恐怖的手段对付（如最近在河南丝厂拘捕四百余人等）。这正是反动统治者目前对付工人阶级的策略。

中外资产阶级运用反动的政治武力，加厉对工人进攻，不仅在"共产时代"工人由斗争中所争得的条件，取消殆尽，工人中的革命分子被大批开除，并且中国资本家更借口整顿生产发展实业，以加重工作，增长时间，减低工资，大批开除男工，代以童工女工，加紧剥削，至于压迫苛待，更是不堪言了。

反动势力进攻下的工人生活状况

目前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一般的来说，是一天比一天的恶化了。为了更能实际了解工人生活状况起见，分述如下：

一　工资减低

工人工资是日渐低落了。一般工资的低落，有两个原因：第一，自国民党反动后，工人在所谓“共产时代”所争得的条件，被资本家利用他们反动的政治势力，完全推翻了，工人的工资，不独没有增高，并因此减少。自“四一二”以后，上海工人的工资，是减低了，特别是过去有很长斗争的纱厂工人的工资。斗争最激烈的广东、武汉，这种现象更加厉害。据报纸所载武汉工人工资，能照所谓“共产时代”维持原状的，只有十分之二，十分之八是减低了，如去实际考查，无论如何，在武汉方面工人的工资总有十分之九是减低了的，只有很少数的维持原有工资（银行行员）。广州建筑工人的工资，由九毛半减至七毛，油业工人工资被厂主减了三次，印务工人反对减少工资曾斗争一次，而且工人的工资，均由资本家自定，定了多少，就是多少，工人不能过问。安源的矿工，只有一角钱一天，云南矿工工资是三元钱一月，天津北方纱厂最高每日四毫二分，最低每日一毫，还有一种学徒（叫里徒）每月只有八毫钱，地毯工人最高的每日五毫，最低的每月二三元，芜湖纱厂工人工资最高每日三毛，最低每日一毛。上海店员手工业者，在斗争中所得的增加工资条件，都没有完全实行。上海纱厂工人，从前做十六支纱的，现在做三十二支，从前一人管理一部或二部机器，现在一人管三四部，实际上是加重了工作，减少了工人，降低了工资。再拿物价来说，是高涨了，工资却无形降低。北方一带工人，从来没有增加过工钱，就是上海有一部分工人稍为增加一些，而物价的高涨，已经超过了增加的数量。北方铁路工人欠薪到几月或十几月不发，都是无形减低工人工资的明证。至于物价的增高，从民国二年到十七年物价的指数看，在广东增加了三分之二，在上海也增加了三分之二，天津增加了一半。我们以工人日常需要品的粮食为例，在北方，拿百分比来说（以一九二三年为一〇〇，下同），在民国二年，米价是百分之六四·八四，现在是百分之一二三·二八，几乎增加了一倍。再就上海看，民国七年，米价是百分之七六，现在是百分之一二三·五八，除主要的粮食外，还有日用品，油盐，小菜，茶，都增加到两倍左右。看下表：

一九二三年以来上海日用品之物价与其指数一斑

类别	品　名	1923年5月		1924年9月		1928年9月		备　注
		物价	指数	物价	指数	物价	指数	
食料	白米(石)	10.63	100.00	12.40	116.98	13.10	123.58	白米以大洋算
	青菜(斤)	33	100.00	55	166.66	80	242.42	青菜以下均以钱文为单位计算
	豆芽菜(斤)	72	100.00	70	97.22	100	138.88	

类别	品　　名	1923年5月		1924年9月		1928年9月		备　　注
		物　价	指　数	物　价	指　数	物　价	指　数	
食料	猪肉(斤)	560	100.00	640	114.28	940	167.85	
	牛肉(斤)	350	100.00	425	121.43	705	201.42	
	鸡蛋(只)	30	100.00	40	133.33	80	266.66	
	盐　(斤)	90	100.00	120	133.33	200	222.22	
	食料总平均				127.71		204.91	白米不在内
燃料	青炭(斤)	60	100.00	80	133.33	150	250.00	
	大反白菜(个)	90	100.00	120	133.33	240	266.66	
	火油(斤)	150	100.00	180	120.00	220	146.66	
	燃料总平均				128.88		221.11	
小食	粥　(碗)	10	100.00	20	200.00	30	300.00	
	馒首(个)	10	100.00	15	150.00	30	300.00	
	大饼(个)	10	100.00	15	150.00	30	300.00	
	油条(根)	10	100.00	20	200.00	30	300.00	
	粽团(个)	10	100.00	20	200.00	40	400.00	
	小食总平均				180.00		320.00	

上海如此，其他各地则更甚，物价增长了一倍，工资就丝毫没有增加。兹将各地工人工资列表如下：

上海纺织业工资统计表

工人种类	最　高	平　均	最　低	赏　工
缫丝业车间工人	五毫至七毫		三毫至四毫	不停工，礼拜赏一毫至三毫
丝间女工	六毫			无礼拜赏
剥茧女工			八分	
棉纺业	六毫	三一四毫	二·五毫	夜工加膳二分
丝织业	一元	五毫		
棉织业	六一七毫	三毫		
针织业	一·五元		三毫	两礼拜不停工赏三毫三礼拜不停工赏五毫
毛织业	三一四毫		每月五元	

上海各业每月平均工资的统计表

业名	平均工资
纱厂	每月十二·八元
布厂	每月十四·五元
丝厂	每月十二·〇元
电车	每月二十·〇元
邮务	每月四十五·〇元（邮务员除外）
印务	每月二十·〇元
店员	每月十二·五元

香港海员工资工时统计表

公司	国别	航线	工资（每月以元计）									工作时间			附记
			尾			面			底						
			管事	厨	名下	头目	舵	水手	头目	烧火	打杂	尾	面	底	
昌兴	英	太平洋	60—70	最高80	25	白人做	白人做	白人做	菲人做	菲人做	菲人做	无定	八时	八时	
大来	美	太平洋	46	48—82.5	25.3							十余时	十余时	十余时	
太古蓝烟筒	英	太平洋及世界													
太古黑烟筒	英	沿岸	45—50	70	24.5							八时	八时		
怡和渣甸	英	沿岸	36	36	12	32.4	29—32.4	25.9	36.9	28.6	28.6	无定	十时半	八时	二三手工金，约在头目与散仔之间
挪威	挪	沿岸	包工			40	36	32	40	35	31	无定	九至十二时	八时	挪船海员工金有相差甚远者
渣华	荷	三孖冷				35	28	23	39.9	27.7					二三手工金，约在头目与散仔之间，打杂少，生火约三元
招商局	中	港沪粤	包工				36	28.8	40	31.2					同上
杂国外船													九时半	八时	同上
杂国中船			40	40	25	40	35	28	40	28					同上
德忌利士	英	港汕厦	包工	24—30		36.4	36.40	28	40	31—33				八时	
省港澳及同安	英及中	省港													
	中	港江													
	中	港梧													

上海海员工人工资及工时统计表

轮船类别	公司	工资（每月元计）			工时	附记
		侍者	水手	生火		
外洋船		20—30	33—43	33—43	8	待遇比其它好一点
长江船	太古、怡和、招商	12	28.8	31.2	10—12	“五卅”后怡和减一成工金
长江船	日清、三北	12	24	26		有更低的
南洋船		12	24	26		
南洋船	政记	12	12	10	12时以上	饭菜船东供给。此公司待遇最坏
北洋船						减工金
小轮船	汇德、丰华	12	24	26		
驳船		头目11	散仔8—14	无定		

广州起义前后广州工人的工资调查表

工人种类	原有工资	起义失败后的工资	增减	备考
轮渡工人	每月二十五元	二十元	减五元	
码头工人	每日一元四毛	六或七毛	减八或七毛	
油业工人	每槽榨三元一毛	一元六毛	减一元五毛	
酒楼茶室工人	每月最高四十元	每月最高三十元	减十元	
印务工人	每月三十元	二十元	减十元	
建筑工人	每日九毛半	七毛	减二毛半	

全国粗工每月工价表（根据《新国民年鉴》上的调查）

工人种类	最高工资	最低工资	平均工资
纺织男工	十二元	六元	九元
纺织女工	十元	五元	七元半
铁工	二十元	十元	十五元
机械工	二十元	十元	十五元
矿工	十八元	九元	十四元
制丝厂男工	十二元	六元	八元半
制丝厂女工	十元	五元	七元半
其他男工	十六元	六元	十一元
其他女工	五元	三元	四元

全国精工每月工资调查表（同上）

工人种类	最高工资	最低工资	平均工资
纺织男工	三十元	十二元	二十六元
纺织女工	二十四元	八元	十二元
机械及铁工	五十元	二十元	二十五元
矿　　工	四十元	十六元	二十二元
制丝厂男工	二十二元	六元	十二元
制丝厂女工	二十二元	六元	九元
其他男工	三十元	九元	十五元
其他女工	二十元	七元半	十二元

我们再就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朱懋澄调查工人生活费列表如下：

上海工人每月生活费表（一九二四年朱懋澄之调查）

家庭类别			食料	被服	房租	柴炭	电车等	杂费	总计
粗工	独身者	费用	5.45元	1.19元	1.78元	0.47元	0.71元	2.25元	11.85元
		百分率	46	10	15	4	6	19	100
	工人家族	费用	11.10	2.13	2.78	1.92	0.85	2.56	21.34
		百分率	52	10	13	9	4	12	100
细工	独身者	费用	7.32	2.31	3.09	0.57	2.12	3.85	19.26
		百分率	38	12	16	3	11	20	100
	工人家族	费用	15.06	3.94	5.02	2.51	2.15	7.17	35.85
		百分率	42	11	14	7	6	20	100

但是现在相隔六年了，物价更增加，生活费当然也要随着增加。目前各业工人工资，除了有技术的熟练工人每月有三十几元或再多一点的工资（但这种工人在中国整个工人中是很少数），普通的不过十三四元左右，还有几元一月的。物价的增高，更无形中将工资减低了。

二　工作时间加长

工人工作时间，就一般说，不但没有减少，并且是无限的加长了。就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的统计，工人在斗争中得来的：国家企业每日工作时间九至八小时，武汉纱厂十小时，店员十二小时，童工九至八小时，自国民党反动以后，除铁路及国家企业，仍保留着九或八小时工作以外，其他各产业工人工作时间，都恢复了十小时以上。如上海纱厂和丝厂，现在六进六出，实际是十二小时的工作，以前所争得的吃饭半小时的休息，现在都没有了，至于星期休息，在工作忙的时候，是没有的。总之，一般工人

工作时间是都加长了，列表如下：

上海社会局发表的纺织业工作时间统计表

业　名	工作时间
缫丝车工人	十一小时
丝间女工	七小时
剥茧间工人	十一小时
抄间女工	十二小时以上
棉纺业工人	日工十一小时，夜工十二小时
丝织业工人	日工十·五小时，夜工十二·五小时
棉织工人	日工十小时，夜工加五小时
针织业工人	十一小时
毛织业工人	日工十一小时，夜工十小时

上海各业工人时间统计表

业　名	类　别	工作时间	星期日
纱　厂		一二小时星期六增加三小时	休息无工资
布　厂	日　厂	十二小时	休息无工资
	中　厂	十四小时	休息无工资
	英　厂	十六小时	
丝　厂		十一小时	不一定
电　车		九小时	无
邮务工人	邮务生	七小时	
	邮　差	八——十一小时	
	苦　力	九——十小时	
印务工人	墨色石印	十小时	每月休息二天无工资
	华洋印务	十小时	休息
	彩印工人	九小时	
	报界工人	八小时	
店　员	普　通	十二——十四小时	无
	最多（如熟货业等）	十七——十八小时	
兵工厂		十二小时——若加夜工三小时则十五小时	
造船厂		九小时	
铁　厂		十二小时	无

三　工作加重

帝国主义以“生产合理化”的方法，逐渐部分采用在中国直接所经营的工厂，使工人阶级的工作加重了。如用蒸气发动的改用电力（如上海纱厂），用煤的改用煤油（如外洋轮船），一般重工业轻工业的机器，都采用最新式、最精良的机器，减少工作人员，加重在业工人的工作。在中国工厂里面，加紧剥削工人，提高生产率，节省生产费，裁减工人，加重其他工人的工作，更普遍造成绝大的失业的恐慌。

四　待遇的恶化

现在工厂中的待遇，是一天恶化一天，工厂中打骂工人、苛罚工资、随意开除工人是极平常的一件事，无足奇怪。以前工厂中的赏工，现在都取消了。在武汉政府反动以前，武汉的女工，争到了产前产后的一月休息，现在是一天也没有了；童工曾争得自由参加童子团，不做过重工作，现在是做成年工人的工作。工厂中的武装压迫，现仍继续存在。工厂工人，实行保结联保。上海巡捕房随便入厂逮捕工人，武汉、河南的工厂驻兵……等，这些武装的监视和屠杀，也是最普遍的。还有包工头的剥削更加厉害，如码头工人卸货系一毛一分钱一吨，而大工头抽去五分，二工头抽去三分，有时还有三工头要抽去二分，工人所得无几。至于因公受伤的抚恤、吃饭前后的休息、工厂卫生、工人教育、养老金……等，都是更谈不上的问题。

五　失业的恐慌

目前失业问题，成为一个极严重的问题。造成失业的原因是：（一）采用最新式的机器，或节制生产费，加重工人工作，大批裁减工人。（二）开除革命的工人，削弱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三）开除成年工人，雇用女工童工。（四）农村经济破产，大批失业农民集中城市，工人后备军增多。（五）因军阀战争和帝国主义商品侵入的影响，工厂停闭，造成大批不能复业的失业工人。就最近报纸上的统计，在汉口有一〇三、〇五九人，在广东八、七八四人，还有在解散工会中，有二三万人没有列入统计的。经常失业的海员，香港上海两地不下二三万人。山东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占据之下，及一些张宗昌属下的残余军阀混战当中，失业的有二三万人。山西受战争的影响，农村购买力的降低，停闭了许多工厂，即兵工厂工人，也减少了三分之一。杭州、湖州绸缎业停厂，失业工人不下六七万人。临城矿山停歇，失业工人二千余人。上海失业工人人数，据社会局调查的一百八十七个工会中，失业人数就有一五五、〇六九人，其他未调查到以及未参加工会的更有很多是失业的。现在仍继续开除工人，每一个工人都在提心吊胆的过他的牛马一般的生活。在这失业恐慌之下，工人生活是痛苦万分。因此失业问题，成为一个极严重的问题。可惜没有精确的材料来统计全国失业工人的数目。

（原编者按：摘自一九二九年项英同志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过去一年来职工运动发展的形势和目前的总任务》。文字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后的农村状况

（资料辑录）

一、田 赋 的 苛 重

1. 正附税的增长

以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全国最好的稻田每亩税不过四角”（陈翰笙：《中国农民负担的赋税》，页一六一）为准，算出增加的指数如下：

省县别	年份	每亩田赋（元）	指数
全国最好的稻田	1902	0.400	100
江西	1929	0.766	192
山东	1925	1.070	268
江苏奉贤	1929	1.100	275
河南	1929	1.196	299
江苏无锡	1931	1.200	300
江苏武进	1928	1.200	300
山西	1929	1.289	322
江苏江宁	1928	1.370	343
江苏	1929	1.637	409
浙江	1929	1.796	449
江苏萧县	1930	1.810	453
山东莱阳	1927	1.900	475
江苏江都	1931	2.220	555
四川成都	1928	2.560	640
山西	1928	3.000	750
河南	1928	3.000	750
辽宁	1928	3.700	925
四川（刘湘四区）	1931	5.000	1,250
浙江湖州	1931	1.200	300
浙江嘉善	1928	1.280	320

（李作周：《中国的田赋与农民》，《新创造》2卷1、2期，1932年7月出版）

自民元以来，特别自十六年以来，……附税随着新政一天一天的加多。例如办党要钱、办自治要钱、修路修衙门要钱、甚至复兴农村也要钱，这些钱只好尽先向农民要。到了民国二十年，厘金税裁撤了，有许多经费向来依靠厘金或厘金附加的，现在也要在田赋附加上面想法，于是从前一部分工商的负担，现在也放在农民的肩上。

（何会源：《论田赋附加》，《独立评论》89号，1934年2月25日出版）

各省田赋附加种类：

省别	田赋附加种数	省别	田赋附加种数	省别	田赋附加种数
黑龙江	15	四川	20	山西	30
辽宁	3	贵州	0	山东	11
察哈尔	8	西康	—	江苏	147
宁夏	4	福建	14	湖北	61
青海	1	蒙古	—	江西	61
陕西	9	吉林	3	云南	17
河北	48	热河	—	广西	15
河南	42	绥远	—	浙江	73
安徽	25	新疆	5	广东	25
湖南	23	甘肃	13	西藏	—
				共计	673

（邹枋《中国田赋附加的种类》，《东方杂志》31卷14号，1934年7月出版）

附加税既名为附加，则顾名思义，当不能超过正税，而各省目前情形几无不超过，如江苏有超过25倍者，湖北甚至有80余倍者，主仆倒置的情形，简直造成租税史中的新纪录。兹将各省最近田赋附加税的比率列表于下：

田赋附税对正税比率　　（正税＝100）

省别	最低比率	最高比率	备考
江苏	119.69	2,603.45	
浙江	134.2	384.9	
安徽	48.1	287.2	大多数在一倍以上
江西	27.0	958.0	大多数在一倍以上
湖南	24.0	1,280.4	一倍以下者仅五县
湖北	9.2	8,600.0	一倍以下者仅六分之一
河南	15.7	1,019.4	一倍以下者仅六分之一

（孙晓村编：《苛捐杂税报告》，《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2号，1934年5月出版）

田赋的附加，往往超过正税好几倍。在湖南、河南、四川、山东，特别显著。

省县名	每两正税（元）	每两附税（元）	附税占正税（%）	备注
湖南永兴	2.40	11.09	462.0	民20年度
祁阳	2.40	10.06	419.0	民20年度
宁远	2.40	10.30	429.0	民20年度
桂东	2.40	11.10	463.0	民19年度
临武	2.60	14.09	542.0	民20年度
四川隆昌	10.50	12.00	114.0	民19年度
奉节	1.60	12.28	768.0	民19年度
山东齐东	2.20	16.21	737.0	民19年度

……二十年三月四日新闻报载〔河南〕各县附加税额：

县名	附加税额（元）	附加税额约占正税%	县名	附加税额（元）	附加税额约占正税%
扶沟	6	280	涉县	5	227
巩县	9	410	商城	10	600

上表举例中，附税超过正税额少的一倍，多的几及八倍。但是据十九年二月十二日湖南民国日报东堡君《田赋附加的话》中说："湖南各县田赋附加，超过正税三十倍者有之，二十倍者有之，十倍则普通皆是。"则以上所举的例，还是最常见的事实。

（李作周：《中国的田赋与农民》，《新创造》2卷1、2期，1932年7月出版）

2. 税额的高度：

拿田赋和地价来比，大多数地方已超过百分之一，多的已达百分之五。江苏武进和无锡，平均每亩地价八十元，田赋占地价约百分之一·三。湖北各县地价，近年来每亩平均不到四十元，蕲春、天门等县，每亩田赋在五角以上，约占地价百分之一·四。据秉山先生估计，在四川成都、山西、河南、辽宁，这些地方，每亩地价平均以六十元至

百元计，田赋就合地价的百分之三至五（河北《民国日报》，一九二九年二月廿五日）。四川的田赋，依我们的估计，至少要在地价百分之六以上。江苏沛县，据立法院的调查，田赋竟在地价百分之十（《统计月报》3卷1期，页82）。

（李作周：《中国的田赋与农民》，《新创造》2卷12期，1932年7月出版）

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天津大公报曾载有灌云通讯，谓："江苏灌云县田地每亩每年收入可得五元二角，此系按习惯每亩分夏秋两季收获计算，夏季约收小麦二斗五升，每斗价一元二角，合计得洋三元，秋季约收豆二斗，每斗价一元一角，合计得洋二元二角。两项收入共计得洋五元二角，而田赋及苛捐之支出，每亩共须纳银四元九角三分六厘。由岁入减去捐税支出，则每亩岁余仅二角六分四厘，而此二角余之收入，当不足以付成本，数亩之家的农民将何以为生？然此尚系以中稔之年为例，若稍遇灾歉，则并此二角余之收入亦无有。"灌云是苏省的边县，或者是一种特殊的情形，然而同年三月十三日中央日报又载："苏省江南一带，苏、锡、武、常、昆等十余县，其田赋自改称地价税以来，名目繁多，省县正税以外，复有附税附加带征亩款等十余种之名目，统扯各县每田一亩，即须纳税一元四角左右，正附税外，复有漕折特征，每石征收二元，过限后，又加滞纳罚金，每田一亩，合计负担赋税，连同滞纳罚金，总在一元七八角左右。大约良田一亩所入，支付成本、利息及贩运耗损等项约占百分之四十五，而偿付赋税则竟占百分之五十，所余者不过收入百分之五而已。可见即使幸而为富庶县分的农民，其所负赋税之重，也足使他们难以维持生活。"

（孙晓村编：《苛捐杂税报告》，《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2号，1934年5月出版）

兹调查〔湖南〕澧县、安乡、汉寿、华容四县，每亩常年赋税，有如次表：

县别	田赋（元）	堤费（元）	垸费（元）	区公所月费（元）	教育附加（元）	义勇捐（元）	团款（元）	合计（元）
澧县	0.32	1.50	0.20	0.45	0.15	0.20	0.20	3.02
安乡	0.32	1.70	0.66	0.20	0.10	0.10	0.20	3.28
汉寿	0.32	1.50	0.10	0.45	0.20	0.10	0.20	2.87
华容	0.32	1.80	0.20	0.40	0.24	0.10	0.20	3.26

此外澧县、安乡两县，尚有所谓戏谷（酬神之用），公路捐；华容方面，有所谓摊款、活泼捐等名目，均属临时性质。但因捐额无定，不便列入。即以表中赋税而论，每

亩已在三元左右。稻田平年每亩约收谷三石五斗，每石以中价一元四角计，仅得八元四角。各项赋税支出，已占收入百分之三五。棉田平年每亩收籽花七十斤，每担以中价十元计仅获七元，则达百分之四十以上。

（孟维宪：《洞庭湖滨之农民生活》，《东方杂志》33卷8号，1936年4月出版）

四川在刘湘的防地内，每种一斗田，除纳正税六元外，另征军费三十元，附加税二十元，临时派款十元，烟亩捐六元二角，团费六元五角，共七十余元左右。而各区乡镇及牌甲，亦从而乘机剥削，挨次附加，有的一斗粮竟缴至九十余元或百余元者。查一斗田，丰年只能收谷二十余石，以市价计，每石售洋六元，除缴捐税外，所得甚少；如遇歉年则不足以供榨取。

（许涤新：《捐税繁重与农村经济之没落》，《中国农村问题》，1935年出版）

〔陕西〕政府因为很多的小地主逃亡，从去年（一九三一）起，在许多地方，已勒令佃户直接完税。汉中的贫农尽管将收获尽数出卖，所得的进款还不够抵作税捐。褒城、南郑、石泉一带的水田，一年虽然可收两熟，收入的总数每亩不过五元。今年新稻每担只值洋七、八角，田赋正税的负担普通每亩倒有二元，杂派和兵差每亩还要摊到四、五元或七、八元不等，一般农民断无力可以长久地支持这亏本的事业。他们最初出售田地，再则变卖什物，继续又典质房屋，无非为应付税捐以苟延残喘。随后田地无人过问，举地赠人且无人敢要，房屋什物又无人肯买，贫农只得弃地不耕，卖儿女以作逃亡的费用。石泉一县人口原有四万三千户，今年春夏两季就减少了五千户。逃户应摊到的税捐还是分配与未逃亡的农民。昔日三人担负的，现在变为两人的负担。因此更加催促了未逃的人家早日出走。

（陈翰笙：《破产中的汉中的贫农》，《东方杂志》30卷1号，1933年1月出版）

在他处之农民，拥地愈多，愈能坐享大利，〔甘肃〕安西则适得其反。譬如种地一户（为六十亩），收粮三十余石，价值三百余元，而每年田赋官款，即达三百余元，罄其地之所出，供应粮款，犹虞不足，况种地尚需资本、人工，不得不鬻卖牲畜器物以应款命，故有“多种多赔本，少种少赔本”之话。因此地价奇跌，上等土地之最高价，每顷只值六十元（约合一元一亩）。其中下等田地，即倒贴耕牛房屋器具等，尚无人承种，甚有倒贴少女，或青年孀妇（马仲英任意抓兵拉夫，故关外三县孀妇甚多），以与承耕人为妻之事。田地累人，竟至如此。

（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上册，1936年出版）

3. 预征制

军阀的搜罗场四川，田赋的征收每年自三、四次至八、九次，田颂尧的防区射洪县，一年竟征十四年粮，以至“老弱转死沟壑，壮者逃之四方”。（重庆《商务日报》，

二〇〔年〕九〔月〕十三〔日〕）。在二十年七月时，邓锡侯的防区里已预征民国五十年的粮。（同上，二〇〔年〕八〔月〕二〔日〕）。现在四川各县的田赋，一般的已征至三十年以上。

四川田赋预征举例：

县　名	征收时间	所征田赋年份	预征年数	资　料　来　源
璧　山	民19，1月	民26	7	重庆商务日报，1930.1.1.
资　中	民19，元旦	民35	16	重庆商务日报，1930.1.10.
合　江	民19，1月	民27	8	重庆商务日报，1930.1.14.
长　寿	民19，元旦	民24	5	重庆商务日报，1930.1.5.
北　江	民19，1月	民27	8	重庆商务日报，1930.1.15.
岳　池	民19，1月	民32	13	重庆商务日报，1930.1.12.
宜　宾	民20，11月	民34	14	重庆商务日报，1931.11.9.
潼　南	民20，9月	民43	23	重庆商务日报，1931.11.8.
隆　昌	民20，11月	民41	21	重庆商务日报，1931.11.9.
南　充	民20，10月	民38 民39	9	重庆商务日报，1931.11.9.
南　充	民20，12月	民40	20	重庆商务日报，1931.12.16.
邻　水	民20，6月	民30	10	重庆商务日报，1931.7.11.
岳　池	民20，7月	民39	19	重庆商务日报，1931.7.13.
资　中	民20，元旦	民38	18	重庆商务日报，1931.1.24.
江　安	民20，1月	民32	12	重庆商务日报，1931.10.25.
荣　昌	民20，1月	民38	18	重庆商务日报，1931.2.9.
巴　县	民20，4月15日	民25	5	重庆商务日报，1931.4.9.
自　贡	民20，6月	民37	17	重庆商务日报，1931.6.20.
顺　庆	民20，7月	民39	19	重庆商务日报，1931.8.1.
温郫九县	民20，7月	民50	30	重庆商务日报，1931.8.2.
泸　县	民20，元旦	民32	12	重庆商务日报，1931.8.4.
资　中	民20，8月1日	民40	20	重庆商务日报，1931.8.7.
遂　宁	民20，8月20日	民39	19	重庆商务日报，1931.8.27.
威　远	民20，8月	民35	15	重庆商务日报，1931.9.4.
隆　昌	民21，元旦	民42.3	22	重庆商务日报，1931.1.6.
资　中	民21，元旦	民42	21	重庆商务日报，1932.2.16.
顺　庆	民21，3月	民42	21	重庆商务日报，1932.3.24.
宣　汉	民21，3月10日	民43	22	重庆商务日报，1932.3.10.

（李作周：《中国的田赋与农民》，《新创造》2卷1、2期，1933年7月出版）

不但割据之下的四川有预征田赋的残暴事实，中央政府直接能号令的各省，也同样地发生这种严重的问题。

各省田赋预征举例：

省县别	征收时期	所征田赋年份	预征年数	资料来源
河北清苑	民18，10月	民19下忙	1	大公报 1929.10.21.
天津	民18，10月	民19下忙	1	大公报 1929.10.30.
山西太原	民18，2月	民19	1	新闻报 1929.2.22.
山东诸城	民18，2月	民19	1	成都白日新闻 1929.2.3.
河北元氏	民18，12月	民19下忙	1	大公报 1929.118(?)
静海	民18，11月	民19下忙	1	大公报 1929.11.6.
博野	民18，10月	民19下忙	1	大公报 1929.10.29.
河北	民19，2月	民20上忙	1	大公报 1930.1.25.
河北	民19，9月	民20下忙	1	大公报 1930.9.29.
福建	民18，12月	民19丁粮	1	福州求是报 1929.12.14.
福建	民19，11月	民20丁粮	1	福建闽报 1930.1.27.
湖南浏阳	民19，12月	民20丁粮	1	湖南民国日报 1930.12.5.
福建闽侯	民19	民20丁粮	1	福州闽报 1931.2.14.
湖北	民20，7月	民21上忙	1	上海民报 1931.6.20.
湖北宁津	民20，6月	民21上忙	1	大公报 1931.6.11.
广东河源	民20，1月	民22浅漕	2	广州江行商报 1931.1.24.
河南	民19	民23	4	新闻报 1931.2.4.
河南	民19，4月	民24	5	贵阳三□报 1930.4.6.
安徽	民19	民25	6	中央日报 1931.4.24.
陕西洒县宁羌	民20，3月	民27	7	新闻报 1931.2.4.

（李作周：《中国的田赋与农民》，《新创造》2卷1、2期，1932年7月出版）

二、地租剥削的加重

1. 租额上涨

江苏宝山较大的地主，近十年来乘机将地租提高了二分之一。近上海市的大场、杨行等乡，甚至有提高一、二倍的。江都一带的永佃田，租额本很轻，近年各田主多主张永佃农与普通佃农一律看待，勒令加租。……河南也有同样的情形，在二十一年的某报上曾载着赤区视察记一文，其中述及该省商城县的租佃制度时，有这样一段记载：

"昔日地主所收之租谷为二分之一，且仅限于水田中所生产之稻，其无水地中之产物及柴草，悉归佃农，押金亦甚微。演至今日，人口日繁，佃农增多，地主乃大事压迫，租期由五年而缩为四年，继复缩为三年。其押金则增加几乎与购买之地价相等，且须于押金之外，缴纳随礼一分。故佃农每三年必罄其积蓄，献之地主，以求保留其佃地之权。同时，地主所收之租稞，亦复加重，稻稞之外，复有所谓麦稞、鱼稞、鸭稞、油稞、棉稞、柴稞、草稞等。总之，凡田中所产，家中所蓄饲无一不按五五均分。"

（田秋烈：《中国地租的形式和性质》。见千家驹：《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1936年出版）

除掉顺德和附近一、二县因为蚕桑失败不得不减租以外，广东的租额在过去五年中显然地增加了。灾歉时候固有些折扣，普通讲来，五年内广东的租额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左右。据民国二十二年台山县政年刊（总务页三三），五年内该县上田每亩租价自二十元增至三十元，加了百分之五十。台山本应能推行冬耕的农作法，农民因恐地主借此加租，都不敢尝试（县政年刊，特载页六）。近来因为华侨失业返乡，许多要抢种太公田；租额上升的趋势就更加急剧。例如番禺鸦湖村的耕地百分之六十是尝田：近三年来因为华侨返自加拿大等地的要佃种尝田，租额就在这时期内加了百分之六十六。三年前每亩普通是十二元，现时非二十元不可。

最近税捐加重，也成了地主加租的一个理由。灵山第六区武利一带，每斗种田早、晚二熟产二十斗谷。因为现时税捐增加到正税只占全部捐税的三分之一，地主将每亩上田的谷租自十二斗改为十五斗，中田的自十斗改为十三斗，下田的也自八斗改为十斗。……

糖厂原是广东建设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可是当禾田改植糖蔗的时候，地主每每借口加租。因此糖厂附近的佃户，往往有收入未增加而租额已被加的。

（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1934年出版）

〔湖北〕最近数年来，工艺作物的生产额日见增高，钱租的行使亦随之日见普遍，不但钱租的行使日见普遍，钱租额的增加亦比谷租的增加为快：

五年来租钱变迁比较表 （元）

年　代	随　县	黄　梅	钟　祥	潜　江	枣　阳
二十二年	6.0	5.0	10.0	5.0	1.3
十 六 年	5.0	2.0	5.0	1.5	1.5

（穆岩：《湖北农村经济概观》，《政治月刊》创刊号，1934年4月出版）

河北天津李家咀村，向有庙产沙田七十余亩，归四十余农人永租分佃，每年纳租一元，此嘉庆十四年事也。嗣因该地农民集资掘井，耕种日佳，田主即令佃农改种蔬菜，随之租金即涨至三元（光绪末年）。民二涨至六元。迨民国十六年，该地田主即用其机巧手段，将菜田每亩分为五十六畦，每畦年纳租金一角三分；合之每亩无形中已由六元涨至七元二角八分。十七年又欲加租，农民拒绝，诉之县府。经刘县长判加四分。该田主心犹未死，甫隔数日，又迫令加租，每畦再加一角二分。至是，每亩缴租金八元九角六分。　　　　（天津《大公报》，十八年十月十三日）

（《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出版）

2．押租加重

下面便是根据二十二年的调查材料来比较该县（江苏宝山）十年来押租的进展。租额调查时是估计，现概取中数。

旧市乡名	押租数量的增减		
	民十二年	民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的指数 十二年＝100
城厢韭菜地	2.5元	15.0元	555(600?)
刘行北乡	——	8.0	——
月浦新兴镇	10.0	30.0	300
盛桥南乡	7.5	25.0	333
罗店马桥乡	2.5	5.0	200
罗店泥墙圈	15.0	25.0	166

（瞿明宙：《中国农田押租的进展》，《中国农村》1卷4期，1935年1月出版）

浙江乐清农民陈克俊佃种倪子梁田六亩，订明押租洋十六元。十九年冬，该田主将田活卖与倪鸣锵，原有押金十六元，即被前业主扣抵欠租，分文无还。陈克俊无已，愿出押租再向新业主承佃，而新业主竟索至四十五元之多。陈克俊仍无奈，只得照缴。讵料二十年夏，陈克俊送交早租与倪鸣锵时，倪称此租须送交原业主收领。陈克俊至是始知去冬原业主之活卖乃属伪卖，目的只在提高押租。请求省令仲裁，仲裁结果，对原业主之假卖，未予深究，并批示："……查押租金原为一种恶习，本应禁止；但为免除纠

纷起见，在未订新租约以前，暂准存在。……”（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浙江省佃业仲裁委员常会决议案）

安徽芜湖独山圩（桐城、贵池均有此种办法），凡佃农无力缴押者，均须多缴银利稻。该地习惯，佃农可先纳押金三分之一，其余欠缴押金之数，可按每元加纳息谷六——七斤计算，缴纳与田主（或永佃主），通称银利稻。（中国华洋义赈会驻皖办事处合作讯，安庆（5）、（6）期）

（《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出版）

近五年来，〔湖北〕农民押租增高趋势之一斑：

押租变迁比较表　　（每亩押租：元）

年　代	南　漳	随　县	枣　阳
1933	14	10	4.0
1927	10	8	0.6

（穆岩：《湖北农村经济概观》，《政治月刊》创刊号，1934年4月出版）

近五年来，〔广东〕灵山的押租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以前取租谷一担的田底批头只是四千文（二千四百文为一元），现时须七千二百文了。

（陈翰笙：《广东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1934年出版）

四川省的押租普遍地提得很高，原因是该省的地主已把押租的征收当作发展利贷资本的惟一出路，如：合江县之“庄田法”即是。因为该县农民已干枯得拿不出现金去佃田，缴纳“稳租银”。凡是佃农无力缴纳“稳租银”的，每百串可加纳一石至四石“稳谷”。表面看来和安徽芜湖独山圩的“银利稻”很相似，但实际上比收取“银利稻”的办法更巧妙而稳固。它的办法是：地方上一般饶于资产的人单独的或联合起来，对于当地缺乏现金以缴纳“稳租银”佃田的农民，加以帮忙。先由他们拿钱出来，充作押金，向地主（他们本身即有许多是地主）大批地佃进耕田，再转佃与各小农，而令各小农先尽其所有略出“稳租银”，其余每百串加纳息谷一石至四石，当地人称此为“轻稳银”、“重稳谷”。自然，凡向庄田转佃所出的押租，更要相当的提高，每亩总在二百串至二百五十串之间（合江道平先生谈话）。合川县内集资作“庄田”营业的更多。近年该地的小有资产者，更想入非非，集合十人左右组一“田园会”，其目的即在集款当作押租，正批佃田以转租与农民，而赚取他们的“稳谷”。“田园会”，之集款每年常达数千两，统统用在押佃庄田以生息，因此田的需要愈多，地主对于押租的欲望愈高，小农越加无力直接去佃田，惟有屈膝于“田园会”之下，求他们的援助。（同上汪先生谈话）

（瞿明宙：《中国农田押租的进展》，《中国农村》1卷4期，1935年1月出版）

3. 预租盛行

预租发展为近代新兴之租佃形式，大都以江（沿？）海一带，商品经济发展之区，

最为迅速。下表所列，可见一般。

〔江苏宝山〕1923——1932年预租田增加之百分率

市乡名	（依旧行政区）	1923年%	1932年%	10年来增加率%
城　市	周家宅	0	10	10
大　场		0	10	10
	盛家角	5	20	15
杨　行		5	10	5
	狮吼乡	10—20	60	40—50
刘　行		20	70	50
	顾　村	0	30	30
广　福		0	30	30
	陈　行	0	20	20
月　浦	潘家桥	0	0	0
	新兴镇	0	极少	—
盛　桥	（南乡）	0	0	0
	（北乡）	0	0	0
罗　店	泥墙圈	0	0	0
	积福桥（近刘行）	0	20 预缴者可较原额略减	20
	马桥乡	0	0	0
	墅沟乡	0	0	0
	潘桥乡	0	0	0

（《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出版）

广东沙田租金普通二十——三十元，均订定在谷将成熟时清缴。如到时不缴，田主即于禾黄时雇人将全部作物割下带回，佃农不能分得丝毫，以示惩戒。但田主亦予以一条生路（？），佃农如到时无力预缴租金，可与田主商法借款。田主即指示其至一银号借款，以田内全部谷物作抵，利率较一般为高。且所借之款，不必经借者（佃农）之手交与佃农，但由田主承认，即可无事。盖此银号即为田主所开，或与田主有密切之关系者。届成熟时，佃农割谷，又必向银号所指定出卖谷物之粮食店出卖，以所收谷价偿还本息。但谷价必较一般粮食店所定者为低。因此种手续，乃当时与田主所协定之办法，无可迁避也。（广西省立专科师范校刊2卷2、3期合刊，1933年）

（《中国经济年鉴》，1934年出版）

三、灾荒的频繁

十七年（一九二八）绥、晋、赣、黔、湘、皖、川、浙、滇大水，皖尤重．就稻

作一项，损失四百余万元。冀、鲁、豫、陕、甘、察、热、黔、闽、鄂、苏、粤、桂遭旱，被灾五三五县，灾民三、三三九万余人。共计是年水旱被灾区达二十一省，共一〇九三县，灾民约计达七千万人以上，被灾县份占全国百分之四十，灾民占百分之八。浙省受虫害最重，约损失一万万元。

十八年（一九二九）陕、甘、豫、晋、察、绥、皖等大旱，灾民三千四百万人，其他各省均有罹及。川、鲁及陕北等省有局部水灾，苏、皖、鲁、赣、豫、晋、鄂、冀受虫害，沿湖一带，损失达二〇、二六五、〇〇〇元。

十九年（一九三〇）陕、晋、察、甘、湘、豫、黔、川、热、苏、赣等均水旱，被灾县份达五一七县，灾民二一、一一三、〇七八人，死亡人数一〇、八六〇人，损失二〇一、八二九、六二八元。陕、甘灾尤重，居民初则吃树皮，继则卖儿鬻女，终则裂啗死尸，易食生人。以上各省罹虫患县份一八八县，灾民八、七二四、七七〇人，死亡人口二一、三九二人，损失一五三、三八七、七〇五元。罹风雹灾民达三百万人，损失三千万余元。

二十年（一九三一）苏、皖、赣、鄂、湘、豫、浙、鲁八省大水。被灾区域达三十二万平方里，灾民一万万人，被淹田亩二万五千五百万亩，被淹人口二六五、一五四人，农产品损失四万五千七百万元，被灾二九〇县。其中以皖省灾情最重，占八省百分之二十二。县份百四十四中间，有百三十一县大地沉没者长达数个月，损失每户平均达四五七元。因江淮水患被灾区域多罹疫病，陕、甘、川、热等亢旱，陕、湘、热虫。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1937年出版）

民国至今二十余年间，历次重大灾荒中，死亡之数，虽有一部分较详细之统计，然就全体而言，仍极不完全。故至今对于历次死亡总数，尚无法确知。惟据各方比较可靠之统计汇集所得，则此二十余年中最主要之数次灾荒，其死亡人口，已有可以大略确定者。兹列表如下：

时　　期	死亡人口估计	时　　期	死亡人口估计
民国9年	500,000	民国20年	3,700,000
民国11年	50,000	民国21年	77,974
民国12年	100,000	民国22年	28,293
民国13年	100,000	民国23年	41,800
民国14年	578,000	民国24年	3,000,000
民国16年	37,136	民国25年	140,000
民国17、18、19年	10,000,000		
合　　计	18,353,203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1937年出版）

四、农作物产销的危机

据许多人调查，在江、浙等地，农民每石米的平均生产费是十三元到十五元，内地

生活程度较低，如安徽、湖南、江西等地，每石米的平均生产费是十元左右。……假若农产品价格是在这生产费以上，那么农民当然不致亏本，然而事实上，去年（一九三二）的米价，在皖、赣、湘等地，每担米价仅五、六元，江、浙等地每担米价是九或十元。……这结果，农民每种一担米总亏本四、五元。……现在假使再假定每户农民种田十亩，平均普通田每亩产米一担五斗，那末这农户就要亏本六十元至七十五元了。

（孙怀仁：《中国农业恐慌之解剖》，《申报月刊》2卷7号，1933年7月出版）

湘省为产谷素丰之区，从前运销沪、汉各埠者，年达数百万石。近年岁收，屡占大有，而长江流域亦值丰收；更有大宗洋米，运华倾销，致湘米顿失市场。囤储既富，价格低贱，不仅农村经济，陷于绝境，市面金融，亦大受打击。据长沙市粮米业报告，自十九年丰收以来，仅长沙市一埠，数年间谷米存储，由陈而新，由新而陈，现逾二百余万石，以本市人口计算，可供二、三年之需，以致现存谷米，有货无市，最好之天字号机器米，每石仅售五元三四角，上谷每石仅售二元一二角。

（《银行周报》18卷9期，1934年3月13日出版）

〔陕西〕西乡县，前数年稻米每石平均七元，去年（一九三二）每石低值一元五角。前后相差如此之巨，推原其故，实因捐款太甚，催收极紧，新收之谷米干，皆争相求售，而无人购买，所以米价下跌，为十余年未有之现象。城固县在民国十七、八年间，稻谷每石可值洋十元以上，中户之家，尚可出售，应付一切费用。前作两岁收成歉薄，不及昔时三分之一，殷实之家，一年收入不足供一次之捐征，中小农民，勤劳终岁，收款不足偿肥料、工资之费。究其谷贱之由，非收成丰足之故，实因捐税逼迫，别无筹款之方，只有粜粮以应急需，故彼此争先粜粮，价谷因之低落，每石跌至二、三元之谱。

（马乘风：《最近中国农村经济诸实相之暴露》，《中国经济》1卷1期，1933年4月出版）

自从丝茧事业的黄金时代过去以后，吴兴的蚕桑事业也开始没落，最近三年来吴兴茧价的惨落，值得我们笔录下来：

	19年		21年		23年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改良种	70	60	60	50	27	20
土种	60	45	50	40	20	14

茧价的跌势既如山崩土裂这般快，吴兴农民，又视蚕丝为生命的源泉，当然感受严重的威胁。我们看了桑树栽培面积及桑园收支亏损表，就可知道事态的重大！

栽培面积	545,569亩
占耕地百分率	36%
总产量	4,364,552担
每亩生产费（收入）	21.5元
每亩经营费	23元
亏损	1.5元

……兹再录吴兴养蚕户数产茧数量以及养蚕收支亏损统计表在下面：

养蚕户数	154,879
占农民百分率	87%
产茧总量	203,400担
鲜茧每担生产费	51.6元
鲜茧每担售价	33元
亏损	18.6元

（吴晓晨：《蚕桑衰落中的吴兴农村》，《东方杂志》32卷8号，1935年4月出版）

〔江苏〕农民植桑者，因连年蚕汛歉劣，平时施肥翻土，耗费资本，吃尽辛苦，非特不能售得善价，反致大受亏耗，以是均大感灰心。去年（一九三一）已多将桑田翻为稻田。以锡邑全境而论，据县农场职员某君之调查，自去秋以迄今春（一九三二），桑田之翻成稻田者，已达三分之一；其尚保存者，田主以桑叶产量大减，均盼本届春蚕时节，可售善价，弥补损失。不意本届蚕汛，蚕户所饲之蚕，既较往年大减，而蚕汛之劣，又突过往年。综计此二月中，桑价最贵时，仅售每担一元（往岁桑价昂贵时，常售十元两担或十元三担），继即跌至一元两担，最近则一元三担，尚无人过问，已无市价可言。于是植桑者亦灰心短气，达于极点，且以经济压迫，不容不速为变计，另图补救。于是相率将田中桑树锄去，作为柴薪，尽数出售；桑田翻锄，以备设植稻禾或菜蔬。闻青城、万安两市，幸存之桑田已不足三分之一。其他各乡及邻近各县，如宜、溧、常、澄，亦大率类是。……邑人某君对三年来桑田之消长，曾与锡、澄两县一度调查，而加以比较统计，其所得结果，约如下表：

县别	时期	桑田约数
无锡	民国19年	251,037亩
	民国20年	150,000亩
	民国21年	84,000亩
江阴	民国19年	124,000亩
	民国20年	82,000亩
	民国21年	54,000亩

（《上海商业月报》12卷7号，1932年7月出版）

五、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

〔江苏无锡〕（一九三一）六月六、七日《人报》《野风日记》：“六月一日礼拜三。我问表兄到底这抢米风潮怎样闹起来的？他说最大的原因只有一个字，饿！那么为什么现在一起饿了起来呢？他说他们住在农村的人早就料到的。第一钱粮税捐一年比一年加重，可是怎样才能保护和指导农民生产增加，没有人管，此其一。洋火、煤油、洋布、肥皂、手巾、洋袜，这些那一样不是外国货，那一样不是叫老百姓出钱的？从前老百姓自己家里制造出来的土咸、土布、豆油没人买了，此其二。那一个村庄都有三、五家田亩比较多的人，他们对于增加钱粮、捐税和洋货充斥是不怕的；第一他收入多；第二

他们都会到城里或上海做些生意，并且认识几个有势力的人，他们不但不吃亏，反可以加紧的催迫他们的佃户、长工交租若干。那些稍许有几亩田的人穷了下来，还不是把田都卖给了他们，自己变了光蛋？所以要一个乡村里都变成了富的越富，穷的越穷，此其三。说到近因，当然是受稻麦虫灾和蚕丝衰落之害了。”

（李衍：《无锡的抢米风潮》，《新创造》2卷1、2期，1932年7月出版）

湖南近年来之天灾人祸，层至迭兴，农民首受其影响。天灾既足以减少收量，地方不靖，产品滞销，价值复因以低落，捐赋繁重，更为剥削之尤。而生活日昂，工价及日用物品继续增涨，收入支出，常苦不得平衡。且农业利益，原甚微薄，加之地方未靖，故农民之困苦日深，大多数已频于破产。

（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中国棉产改进统计会议专刊》1931年出版）

皖北灾祲频仍，地方元气既伤，人民生机几绝。迩值春荒，于是，饿殍遍野，人民无粟可食，乃剥取树皮，磨成粗粉，掺以水藻、草根、树叶各物，蒸而食之，虽难下咽，聊胜枵腹。各河溪沼，凡产生水藻之处，均有主营者昼夜看守，不许他人偷采，水藻上市，每斤售至二百文之多。太和县先遭雹灾，继罹水患，灾情最为惨重。在常年人所不食之物，用以饲畜者，至是灾民均争而食之，食后，面颜多现黄肿。宿县睢溪地方，某家乏食数日，小儿饥甚，啼哭索食，其母被儿迫缠不已，竟以泥做成饼形，持以给儿，冀减其哭，亦云惨矣。灾民忍饿既久，则鸠形骨立，偶一晕倒，口中必流清水而死。灾区既广，死亡相继，尸体横野无人掩埋。

（上海《申报》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马乘风：《最近中国农村经济诸实相之暴露》，《中国经济》1卷1期，1933年4月出版）

宝鸡年来灾患频仍，社会经济完全破产，政权复操之军人，勒派款项，民不堪命，因推举代表呈请省政当局救济灾荒，制止派款。兹录其呈陕省主席杨虎城呈，原文如次：……自十八年以来，四载奇祲，八料未收，迄于今日，元气损伤，生机断绝，赤地千里，哀鸿遍野，饥民流离载道，日见死亡，悲惨之状，目不忍睹。……然当求生不得，救死不暇之际，县府又将去年银行股本、契约登记、库券等各项尾欠，并本年（一九三二）白地烟款，以及重派田赋借款，共总约十余万元，严令各乡各里限期交纳。又以地方灾情过重，各款催收，供不应求，即将总部暨凤翔绥靖部并张古曹各团提款付官、军需、护兵、马弁不下数十人，拨给各区各里，纷纷下乡催收，以致乡民畏威惊忧，迁徙流亡，日益见多，处处门户封锁，村村井灶无烟，凄凉景象，不堪言状。……县府催粮催款之威严，真同人间地狱。每当更深夜静，县府会计老爷暨各付军、军需、法庭会比，兵士法警数行林立，乡民木枷铁链，蜂拥堂下，人人觳觫，面带愁容，怨气所聚，烛焰色缘，竹板皮鞭，任意乱打，泪珠血点，滴地成斑，哀痛之声，可以动天地泣鬼神，恐森罗殿前无此惨凄也。党国训政时期，尊重人道主义，惩治盗匪，尚有宽典，而无辜灾民，罹此毒荼，难邀法外之仁，可为痛哭流涕者矣。况时值隆冬严寒，饥既无食，寒更无衣，无亲可投，无家可归，各项派款又不因灾民而稍宽减，拆房变产、苦无

受主，质儿鬻儿，不值一文，哀我灾黎，不死于饥寒，即死于款项。

（天津《大公报》1932年12月3日出版）

据绥远红十字会副会长周君实地调查结果谓："所有土著灾民，未能远去，不得不茹苦忍痛，卖妻鬻女，以图苟活。综计包头县共卖出三万余口，固阳县共卖出五千余口，萨县共卖出一万余口，武川县共卖出八千余口，归绥县共卖出五千余口，其他各县，均各卖出二千余口不等，约计全省可达十万口之多，为伶为娼者，触目皆是，始以晋北各县正式来娶，尚属正当；嗣后大批为人贩子贩载而去，竟以辗转牟利，甚至有先将己妇卖出，作为资本，携资来贩者。缘内地妇女，年事稍富，即可售得三百元至(?)百元，灾区所买，不过一百余元足矣。加以有所谓人牙子者，从中架空操纵，而卖人之家所得不过数十元。并买得一妇，附带幼儿一、二口，有转卖其女，而白得其妇者；有转卖其妇，而白得其女者。尤可惨叹者，其中十三、四岁之幼女，买到后即行合房，此弱小之女同胞，无辜被摧残污辱，诚天下之最伤心事。现在调查全省人口，男性占十分之九，女性占十分之一，将来人口繁衍上，实受重大之影响也。"

（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11月14日出版）

六、农民离村与土地荒废

1. 农民离村：

河北大名某村人口移动统计

1925——1929

	全村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无业赤贫
人口总数	294	93	24	23	61	84	9
外迁人数	16	—	—	1	6	6	3

（王次凡：《人口与土地》，《农村周刊》20期，天津《益世报》1934年7月14日）

据陕西省政府所编各县灾况调查表，一九二八年陕西省九九、七五八难民。又据甘肃省政府所编各县灾情一览表和旅平甘肃赈灾委员会所编各县灾情调查表，同年甘肃因灾流亡的多至二九四、五七九人。各地因灾流亡的人数占各该地人口的百分数可举例如下：

1927年	山东	平原	13.04%	冠县	20.00%
1928年	陕西	陇县	5.30%	郃阳	5.70%
	河南	项城	6.87%	南召	20.89%
		商城	7.22%	夏邑	24.00%
		扶沟	14.13%		
	甘肃	宁定	19.00%	环县	31.30%

（陈翰笙：《难民的东北流亡》。转见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论》，1934年出版）

1931年江淮流域灾区农民离村统计

5省87——89县调查

省名	每千人中流离之人数	举家流离者所占之百分率*	流离人口（个人与举家合计）占总人口之百分率	流亡地点所占之百分率*		
				本县	外县	未详
湖南	129	14	25	57	36	7
湖北	69	44	48	68	23	9
江西	94	20	28	55	25	20
安徽南部	285	46	61	76	9	15
安徽北部	47	15	19	63	40	27
江苏南部	50	31	34	94	3	3
江苏北部	165	41	47	68	29	3
各县平均	125	31	40	71	19	10

* 此项资料，系由村庄调查表中集得。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中华民国二十年水灾区域之经济调查》1932年出版）

民二十年长江大水灾，人民流动亦剧。据金大农业经济系调查，每千人中平均有一百二十五人流离，流离人口约占灾区总人口百分之四十，其中有百分之三十一系举家而行，百分之九则系单身出走。举家流离之人家中，约有十分之七仍未出本县境界，惟另有五分之一弱则已出县外，余则未详。……

流离在外之人口，约有三分之一以上从事工作，五分之一求乞，余系无职业或职业未详者（但其中亦包括不少儿童在内）。详如下表：

省别	流离男子在流离人口中所占之百分率	流离者在外之职业（百分率）			
		做工	乞丐	无业	未详
湖南	51	12	56	2	30
湖北	62	41	28	10	21
江西	58	21	30	38	11
皖南	61	41	6	14	39
苏南	66	80	6	1	13
皖北	73	43	32	4	21
苏北	62	36	5	43	16
各县平均	60	35	21	16	28

（吴文晖：《灾荒与中国人口问题》，《中国实业》1卷10期，1935年10月出版）

2. 土地荒废：

近代中国农村人口和耕地面积指数

1893——1933　　　　　　1873＝100

省　　别	1893		1913		1933	
	人　口	耕　地	人　口	耕　地	人　口	耕　地
总　　计	108	101	117	101	131	101
察 哈 尔	114	104	144	112	160	104
绥　　远	139	95	172	93	175	88
宁　　夏	143	100	101	102	88	99
青　　海	167	169	161	175	172	203
甘　　肃	115	116	129	117	117	118
陕　　西	94	98	99	95	96	91
山　　西	77	103	82	110	88	110
河　　北	112	98	122	100	140	98
山　　东	119	103	122	105	128	99
河　　南	104	99	110	117	104	115
江　　苏	108	101	128	102	150	110
安　　徽	122	106	146	107	166	107
浙　　江	102	102	107	73	123	78
福　　建	92	96	93	92	88	81
广　　东	123	101	142	101	157	102
江　　西	100	99	100	93	93	91
湖　　北	105	104	116	109	145	128
湖　　南	118	88	129	89	144	88
广　　西	109	105	149	117	164	123
四　　川	118	102	135	104	157	110
云　　南	135	111	179	133	237	331
贵　　州	106	115	118	121	128	130

〔原注〕总计是由各时期之二十二省总数计算而得。

（《农情报告》2卷5、12期）

据天津大公报及西安民意日报二十年调查（陕西）十九县所得之结果，每县被弃不耕之田地，平均占总耕地面积百分之七十，其比率如下：（引自罗克典：《中国农村经济概论》）

县　　名	灾后被弃耕地占总耕地百分比	县　　名	灾后被弃耕地占总耕地百分比
武　功	80	咸　阳	30
兴　平	50	白　水	50
扶　风	80	榆　林	100
岐　山	50	紫　阳	100
大　荔	75	永　寿	100
盩　厔	95	澄　城	70
三　原	40	醴　泉	90
陇　县	100	韩　城	65
临　潼	40	干　县	80
蓝　田	100		

陕灾最重之时期，为十七年至十九年，而直至二十二年，陕西农地仍大量荒芜。渭河两岸素为灌溉便利、物产丰富之区，但自十七年灾荒以后，直至二十二年，尚有十六万亩无人耕种之荒地。（见1933年 3月15日《大公报》）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1937年出版）

裁厘会议与中小商人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典　　琦

国民政府依据财政会议的决议于七月十五日召集裁厘会议，讨论实行裁撤厘金的方法，这是国民党欺骗民众的一幕戏。

厘金是绝对应裁，不仅中小商人手工业者说应裁，即大商资产阶级也说应裁，因为一部分资产阶级正在做他们的国货运动，而厘金阻滞了他们出品或原料的市场。不要说自称为革命的政府，就使是一个仁君的政府，也应当裁厘。所以国民政府为要维持它的颜面计，万不得已而召集裁厘会议。其实国民政府如何肯裁厘？尤其是各省的新军阀如何肯裁厘？全国商会联合会代表苏民生说得好："在军阀时代，厘金虽为国税，而各省自收自用，其他收入无此痛快，此其一。军阀时代，以厘税为优差，用以调剂私人，此其二。"这个时代显然没有过去，只要有眼睛的人都知道的。国民政府固然是中央政府，可以倚赖关余盐余及外债维持财政，但是各帝国主义究竟能不能承认把国民政府不与满洲或广东政府同样看待而以从前帮助袁段政府的方式来帮助国民政府，还是未决定的问题。所以国民政府财政的出路，也还是只有加重对于民众的剥削。

据过去财政机关的估算，每年厘金总收入在四千五百万元以上，这是一笔大的款项。如果要裁厘，必须同时裁兵及实行关税自主；因为裁了兵，才可以不急于增加剥削；关税自主，才可以填补因裁兵而减少的收入。资产阶级知道这些关系，所以大声疾呼要裁兵，要关税自主。国民政府因为要获得资产阶级的拥护，表面上固然也接受了这些主张，但是，要关税自主呢，帝国主义不肯——美国通牒完全是骗人的，请看上期的本刊——要裁兵呢，豪绅军阀不肯，国民党的政府仍然不能不将资产阶级的主张葬送到白纸黑字的垃圾中去。

国民政府的裁厘政策，并不是废除厘金，而是把厘金换成一个或数个新的名目；剥削是仍旧，或者还加多，不过变一变剥削的形式。几天的裁厘会议，讨议的中心便是怎样改办新税以抵补裁厘损失。正如各省商会联合会个电中所说："裁厘拟办新税，闻有营业出产销场消费特种所得遗产使用人使用权田宅市场等十一种税，此外尚有裁厘公债等及各种特税，名目繁多，举不胜举，查裁一厘金反多类似厘金或加甚厘金者数十种，旧苦未除，新苦纷至。"

裁厘会议，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商会有代表参与，这是因为国民政府要获得大资产阶级的谅解，以加重对中小资产阶级及工农的剥削。

在大资产阶级方面，各省商联会个电说：无论何种新税，非经全国商联会各省商会代表协商者，概不发生效力，以符主权在民之义。冯少山等裁厘委员会提出裁厘和实行

过渡税应使负担者共同办理案。这明明是威吓国民政府并对豪绅军阀争取资产阶级的民权。但是上海总商会代表石芝坤及各省商联会代表苏民生王介安却又声明商联会之电，不过措词失检，决无抗税之意见。他们并不坚决反对那新的剥削政策。

至于中小资产阶级,则表示非常愤恨的态度。我们从内地面粉厂反对麦粉特税一事，可以推知。内地面粉厂在内地还是比较大的资本家事业，但已深深感着国民政府与上海大资产阶级的联合压迫，其他等而下之的小资本家更何待言！内地面粉厂的宣言说：

> 查面粉向系免税，屡次有人主办征税，皆以民食攸关，卒未成议，此次突然订定每包征收一角之章税，小麦免厘，出洋面粉减收五分，骤聆之，裁厘加税，原料免厘，奖励输出，何等光明正大！然按之实际……麦厘既免，则上海厂之成本愈轻，无形中内地面粉之售价受其操纵……上海各厂既如上述魄力雄厚……移其担负于顾客，内地则为人民生活及购买力所限……上海面粉出洋，坐收退还五分之利益，内地交通不便，且规模狭隘，无力承受外洋大批订货,此种利益,纯为沪厂所独享……此次特税，外间谣传，系我上海同行主动！……特税当局，始则尚言对于内地可以优待，后忽声称上海各厂不予通融，然则必欲置我内厂于死地而后快乎？究竟国家税则之动议，与减征及许可之大权，是否操诸财政官吏，抑或受命于垄断之商阀？尤可诧者，当局动称曾得厂商之同意，试问除上海厂之外，内地曾否有一厂荷蒙通知垂询？

这是何等露骨地表示中小商人对于大资产阶级的不满呀！又针织工会及丝绸机织联会反对丝织品产销税，其理由是：“裁厘加税之议，系根据壬寅条约，裁撤国货之厘，加重洋货进口之税，凡进口洋货，除正税（值百抽五）外，加完一倍半（值百抽十二、五）之税，以抵补裁厘之损失，非加国货之税。该局（产销税局）之设，不特与条约绝对抵触，且有碍关税自主之实行。”这亦足以代表中小商人对国民党的不满。

裁厘是不能于国民党统治之下彻底实现的。但民众们正因此而应当积极作彻底裁厘运动，要求裁厘与收回关税取消雇佣军队同时实现，反对借裁厘而增加对民众的剥削。

（原载《布尔塞维克》 1卷26期）

新增税下的资产阶级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阿　休

近来有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反对国民政府增加新税的风潮，多而且烈。如芜湖反对糖捐罢市，参加的有糖业酒酱业，罢市至一周之久；丝缎机织业针织业反对产销税，棉纱业反对棉类特税，上海商协请免征国煤特税，都非常激烈，不达到目的不止。江浙丝绸机织联合会呈文说：

"……本年四月间浙省认捐，突增至四倍以上，绸商以北伐紧急，忍痛负担。……今乃厘金未裁，忽增新税，简直摧残国货而已。且公布之征收税率，如各色花缎每匹征税至一元八角之多，较原有税率增至三倍有余，尚曰便益商民，其谁信之？……一旦实行，则必扰乱商业，引起重大纠纷，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穆藕初反对棉类特税写把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的信说：

"……苏省棉纺织工业，日商占有九十四万余锭，英商占有二十万锭，华商不过一百十四万余锭，刻下不平等条约尚未废除，洋商在苏省设厂制造占有极大势力，若置操纵棉业市场之洋商于不同，而独税憔悴可怜之华商，实际上必将苏省仅有之大工业完全断送。此惟在军阀时代始有此竭泽而渔为丛驱雀之自杀政策。……"

商联会电财政部说：

"……大部第谓共和国家人民之负担宜重，搜罗东西各国所谓良税者来令我喘息仅存之商人责以负担。……我党以废除苛捐杂税，解除人民痛苦为口号。今若所为，人民不认为欺骗，亦将谓为不信。……蹈军阀复辙，不容人民置喙……"。

江浙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根据地，是反动的国民党政府主要的筹饷地方。国民党政府是豪绅军阀和资产阶级的政府。其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豪绅军阀的利益不是完全一致的。以前为镇压工农的与北方豪绅买办争卖国和剥削权，资产阶级不得不忍痛牺牲其一部分自工农剥削来的利润，供给豪绅军阀为"北伐"和"剿匪"之用。过去蒋介石白崇禧何应钦等军阀能在江浙发行巨额公债搜括税捐而不遇强烈的反抗，就因这个原故。

现在不行了。现在"北伐"已经成功，即北方买办豪绅的卖国和剥削权已入国民党政府之手，他们心目中也以为工农暴动已为他们的镇压下去，这时仍然要资产阶级掏腰包，资产阶级自然不十分踊跃。现在资产阶级只希望怎样发些大的财，从工农身上剥削更多的利润，完全归入于自己的腰包。

尽量发展实业，至于可同外人抗争；他们在欧战期曾尝过棉纱业煤铁业……骤然繁荣的滋味，希望这黄金时期仍然来到。这在经济会议中表示得充分，裁厘，裁兵，施行保护税，解决劳资纠纷，发展交通，废除苛捐杂税，保护棉铁丝糖煤各业，等议案一

大堆，其意若曰：这是我们（资产阶级）所豢养的政府，除替我们镇压工农革命外（如汉口商联议决不准店员组织工会，经济会议工人不得上级机关许可不准罢工）当一惟我们的利益是视，否则不给他钱用。（如裁兵案，只准留五十师兵五十万人，军费全年至多一万九千二百万元，限九个月裁尽。在会议上，苏民生说："兵九个月裁尽，……每月只发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多一个不行！"张公权说："吾人当以打倒军阀之精神，打倒反对裁兵者。"）资产阶级意气的横厉，可谓无前。一方提议增加本阶级利益的积极要求，一方要削弱豪绅军阀的实力——裁兵。

不料全成幻想：裁兵既无诚意，旧的捐税没废除，反在新的善后建设，准备裁撤厘金的名义下，施行什么特税，产销税，营业税，税率的重，尤非北洋军阀所敢大胆提出的。

资产阶级那得不恨？那得不说是竭泽而渔为丛驱雀的自杀政策？那得不拿出抵抗办法，"引起重大纠纷"？

豪绅军阀方面，也不客气，他们要养庞大的军队，要准备军阀间的混战，非此没有办法。虽然顾着资产阶级的面子，当时不能使糖捐局产销税局武力执行，但是已表示非行不可。张寿镛电复上海商民协会绸缎业公会缎业公所绪纶公所锦纶公所说：

> "……江南素称蚕丝繁盛之区，每年产销之额，何止千万，而公家税收不足二十万。……几经筹议，决定取法欧美各国特种物品消费税之旨，提出数种物品如煤油花纱丝织品等改办产销税以为裁厘抵数。绸缎一类属于奢侈品，理宜增高其税率。……试问欧美关税自主之国，岂皆无国内之税乎？……目前办法，惟一要旨在改恶税为良税。商民方面，应祛相沿之积习，勉尽纳税之义务……。"

固然，豪绅军阀对工农贫苦民众及小资产阶级的搜括，一手执刀，一手要钱，有钱者生，无钱者死，用不着这样通电解释。不幸江浙是资产阶级有势力的地方，国民政府事实上又仅仅能管辖江浙，因此，就不能无所顾忌。

现在除非是豪绅军阀切实裁兵，不然层出不穷的新税捐是不会停止的，更用不着废除已有的苛捐杂税了。今后资产阶级既然不愿象从前那样无限制的承认一切新捐税，那反动统治下的二个主要阶级——资产阶级与豪绅阶级之利益冲突，必然会日加一日的发展去，削弱反动的统治。

但我们还须知道，反动的国民党政府以增设的种种新捐税，其剥削对象并非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不过少得若干利润而已，被剥削者实际是消费者及中小商人，而反抗新税的，也以小商人为最激烈。所以我们应视国民党政府的新增税是对全国被压迫阶级的剥削，而抗税运动，应该是城市一般革命运动中的一部分。

（原载《布尔塞维克》1卷27期）

一九二九—三〇年的中国工业

龚　骏

民国十八年为我国工业史上有重大关系之一年，一方国民政府继续前数年之努力，法规之厘订，展览会之推行，工业之奖励，国货银行商场之设立，已略有端倪。一方关税自主，厘卡裁撤，法规之次第施行，国营工业之兴办，私营工业之整顿，劳资问题之注意，及度量衡之筹备划一，工业注册及统计之举行，开我国工业史上未有之异彩。唯是国内战争，仍未能停止，十八十九两年，风云倥偬，一切进行，均为之停顿。又自民国十八年以来，金价暴涨之高度，开前此未有记录。向之原料凡须仰给于国外之新工业，至是无不蒙极大之影响。而环伺中国之列强，皆欲极力开拓中国市场，以谋救其经济之恐慌。

总之，我国今日新工业之发展，已入最严重之时期。今日之问题，非一国之问题，乃国际之问题。兹就现代全国工业之状况，与今后工业发展之趋势而分别申述之。

第一节　现在全国工业之状况

中国新式工业，自欧战过后，表面上虽继续进展，实际上已入恐慌时期。洎乎晚年，尤为衰落，种种情形，已如前述。民国十八年以来，金价逐渐提高，银价狂跌，于是专靠外国原料品之工业，至是均以缺少流动资本，迫而停业，其情形较之民国十六七年，尤为恶劣，诚我国新工业发展史上最悲惨之一页也。兹将纺纱缫丝丝织棉织针织面粉烟草火柴等业，略述其梗概如次。

（甲）纺纱业　民国十八年中，中国纺纱工业，独呈兴隆之现象，据上海时事新报十九年二月二日载有迪先君之调查：

“自民国十二年以来，国内棉市，恒处于颓败的状况之下，纵有特别原因，稍有起色，但不久即回复原状，几无稳定之希望……。十七年下半年，纱市已与五年来黯淡之环境告别，而趋渐良好，此种趋势，十八年犹在继续进展之中。”

十八年上半年与下半年之纱市趋势不同，在上半年因棉贱纱贵纱销畅达以及拒货运动等等，中纱颇盛。下半年因反日运动停止，日纱形势遂见紧俏，有供不应求之势。申报十九年二月三日去年棉业之经过情形一篇载：

“过去的一年纱市之变迁颇巨，在上半期可谓华纱的黄金时代，迨下半期日纱又居优越之地位，回忆三月间之情形，不禁有沧桑之感。彼既长此猛晋，本纱乃又感追随之不易，而穷于应付。幸原棉市价仍疲，尚能维持。”

日纱虽受排货运动之影响，其在上半期之销路，并不因之减少。同篇载：

“日纱虽以抵货而不能畅行，但中国幅员辽阔，军事略平，需要蜂至，决非华

厂制品及美英印纱输入所能供给，故日纱仍得由种种方法，输入内地。期纱交易，时有所闻。日厂存底，虽在反日热烈之下，亦不过五六万包。售价表面上固有二三十两之巨差，惟以技术优良之故，实际上之采算并无若是之悬殊。试就上半期日厂营业状况观，仍能获厚利，而努力于扩张，不过纱销畅旺后，应享高价之利益，为拒货运动所牺牲耳。”

下半期日纱乃大盛。同篇载：

“旋以抵制声浪稍低，日纱销势大盛。七月后，以青岛日厂劳资纠纷，停工数月，各地交通渐见恢复，华纱实销，尚能保持其盛旺的常态。惟日纱形势更形紧俏，制品不及应销，而中日纱价之巨差，至是又渐轧平而超过之，盖各地拒货运动，已无形消灭矣。”

因棉纱畅销之结果，纱厂异常发达。据华商纱厂联合会报告，统计十八年国内（指已转动者言）纱厂共一百二十四家，比十七年增四家，华厂增五，实际上增六家。因常州之广新厂为苏纶所归并，故总数仅五厂。上海方面增三，一为隆茂纺织公司，系收买日商东华第一厂之旧机一万零八十枚，价二十二万两。东华之出售，并非为营业失败，乃为整顿改良计，将不完美之旧机出售，而另购新机。此乃日本之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举动也。一为宝兴纱厂在闸北泸太路，系购英国旧纺机万二千二百四十枚。一为沪西槟榔路协丰纱厂，原为线厂，自十七年增加纺机五千二百枚后改称纱厂。其余一为常州福大纱厂，即广新出卖后另购内外厂旧机三千二百枚设立。一为山西晋华第二厂，计新机二万枚。一为新疆迪化阜民纺织公司，计纱锭一千二百枚。此外原有纱厂变更情形者，如广新之被并于苏纶，常州大纶换主改名大成纺织公司。太仓纱厂原为利泰公司租办，现已为该公司所收买，改为利泰纱厂。无锡之业勤纱厂停工已数年，由复兴公司租办。河南彰德之广益为豫新纺纱公司租办。尚有上海之经纬（废花厂）则由合记公司租办。

至外商方面，日厂在上海者，东华第一厂售于华商，其原称第一第二者，兹已不复分称，作为一厂。余者增锭添机至伙。其在他埠者为金州内外棉增设第二厂。故表面上减少一厂，实际上仅减一万锭之旧厂而已。英厂无变动。

合中外一百二十四厂计之，其所增之纱锭，较十七年多二十五万零四百七十二枚，布机一千六百三十九台，线机亦有增添。其在筹备中之纱厂，如申新八厂，有纱锭四〇、〇〇〇枚（上海），普益一〇、〇〇〇枚（山西），沙市二〇、〇〇〇枚（沙市），雍裕一〇、〇〇〇枚（山西），辽营一〇、〇〇〇枚（营口），华昌一〇、〇〇〇枚（绍兴），宜昌二〇、〇〇〇枚以及上海之济生，太仓之益丰等等，均未计入。而日商所筹设之纱厂，亦有五家，均在上海，大康上海第五公大第三裕丰第二均有纱锭三万锭，丰田则四万枚。各厂开工时期，即在目前，故我国纱锭总数，行将超过四百万枚矣①。

以上为十八年纱业之梗概，至今后之趋势，或将受金贵银贱外棉无力购买之关系而遭打击。申报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钱承绪陈明全国工业之现状一文载：

“中国产棉数量，约九百万至一千万石，以原料不敷，每年尚须购入印度棉约一百六十至二百万石。平日外汇平稳，尚可购买。民国十八年度，产区缩小，国内原料，即感缺乏，今则金价一高，原料存货至多只敷二个月之用。届时新棉未经登场，外货又无力购买，势必重演民十四五六三年时之景象，纱业无异根本破产。”

（乙）缫丝丝织业　缫丝工业，自十八年六月以后，即日趋不利。钱承绪全国工业现状一篇中载：

“民国十八年度，在六月以后，茧价即渐高涨，其时茧商见有利可图即纷纷脱货，向外洋输出，殆九十月间，市面原料即骤见缺乏，每做生丝一担，须亏本六十两有余，上海丝厂共有一百零六家，在十一十二月两月中闭厂者，已有五十余家，达半数以上。”

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申报亦载：

“上海华租两界，各丝厂共计一百零四家，因原料缺乏，本重价小，备受亏蚀，无法维持，公议宣告停业。兹悉各厂停工者，已达七十余家，尚有未停之三十余厂，亦将预备将期丝缫解清楚后，定于一月二十日左右一律停机。”

广东方面之缫丝工厂，自十七年衰落以后，十八年年初，形势极为恶劣，停工丝厂，占总数百分之四十以上。四月以后，稍稍恢复。下半年因丝价升高，丝厂继续开工者，又有数家。据九月间调查，广东开工之纱厂，达一百七十八家，丝灶在八万以上②，然仍不过回复至十七年度之状态也。

第五十九表　　**民国十八年各季广东丝厂统计**

月份	工厂数	缫丝灶数
一月	七五	
四月	一四七	七二、四六五只
九月	一七八	八三、七四八
附注	本年广东省茧生产额估计一〇五、一〇〇担	

以上为十八年缫丝工业之情况，至十九年丝厂业之命运，要以春茧生产额之多寡为断，据全国工业之现状一文，内有关于我国目下缫丝业预测之记载：

“而今年春茧仍无把握，倘产额减少，则预料结果，必全部崩溃，再无恢复旧状之一日（日本生丝出口已达四十万石，中国不到九万石）。查现在每年丝茧两项输出，关税收入达四百三十万两，余如一朝全部消灭，不特农工生计，受其影响，而国家税收，亦必蒙其绝大损害。”

（按上海七八月份新闻纸迭载美国方面因需要华丝，沪上各厂，已大半开工赶货。）

因生丝缺乏，人造丝亦因金价高涨价格提高之故，丝织业大受影响。银行钱庄，已不肯轻易放款，周转不灵，损失无算。十九年四月十四日，沪商整会乃将详情分呈国府行政院暨财政交通工商各部。呈请救济实业一文内载：

“为周转不灵，银行钱庄，既不于厂家放款，自有工潮以来，更畏缩不前。兼之十七八两年间丝织厂倒闭相仍，是以限制更严，非有切实保单，并将货物抵押，直无通融之余地。而该业出品花样时刻变动，押品日后赎出，花样已属陈旧，价格即不免减少，其损失真不可数计。”

绸缎因税重，外销停滞。越南一处，寸匹未能行销。同文中：

“朝鲜越南外销之货，均因关税繁苛，不能行销。越南一处，法政府置协定于不顾，十六年起，加税数十倍，以致自十八年夏至今，寸匹未能行销。而日本则乘机与之订立绸米互惠条约，营业猛进，一日千里。”

全国工业之现状一文亦有类同之记载：

“绸业：（甲）本机生丝价昂，且缺货不能制造，现在杭州等地机户，已大半停制，（乙）电机，向用生丝与人造丝夹织，今年越南朝鲜及南洋一带，均因各该国政府颁布新税率，课税极重，华绸不能再去。同时生丝人造丝均奇昂，每做绸一尺，须亏本由二分至一角半以上。”

（丙）棉织针织业　上海一处，棉织厂达一百五十余家，民国十八年底，因捐税苛重，工潮时起，以致无力支持，宣告停业者，约占全数十分之三[3]。现因金价飞涨，如丝光棉织业，均以细纱商不能出货而倒闭，形势颇为悲观。全国工业之现状一文中，关于丝光棉织业之记载有云：

“我国无细纱商，所有棉织细纱材料，均来自外邦，现在金价飞涨，细纱业商均以定货到埠不能出货（货均有押汇而来），纷纷倒闭。而同时外国细纱商，因目睹我国棉织工厂行将倒闭，兼以货价过高，无巨大利益可得，遂相率停止办货，而原料恐慌状态毕现。现在各工厂仅制粗料之布及各种杂件，借维现状，形势殊属危殆。”

针织业亦以金价高涨关系，险状百出。同文中：

“针织业以制袜为大宗，工厂均集中于上海，其袜线大半均由日本舶来。最近亦受金价影响，难以维持，该业较大工厂，于去年七八月间，见金价渐涨，稍购存货，故尚可勉强工作，但多亦只能维持至本年（十九年）三月间。其他小厂，则以资本缺少，停厂日有所闻。”

（丁）面粉业　面粉工业，因国内产麦向只敷六个月之用，其余六个月常购坎拿大大麦以济其穷，自十八年下半年金价飞涨以来，除在内地面粉厂因有积存少数原料勉强维持外，其在上海面粉厂，已有三分之二以上停止工作。查小麦登场，约在国历六月左右，在此半载期内，几处无可维持之地位[4]。

（戊）烟草业　烟草工业，近年因外货之排挤，已处于落伍之地位，至民国十八年而尤甚。十九年一月十七日申报载：

“近年来中国卷烟厂，日益加多，美国烟叶进口亦日兴月盛，惟上年（十八年）因税率增加，烟厂营业不振，已形减少，而外溢金钱，仍达八千四百数十万美金。”

中国国货香烟首创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竟于十九年一月宣布停办。同年二月内报[5]：

“南洋公司为国货香烟之首创，且系我国一大实业，近年为环境所迫，先后亏折达数百万元。税率增加，厂费太重为其主因。再以最近金价暴涨，其原料采用于外国者，又约增加本价十分之二三，而纸烟为对外竞争，又不能加价出售，遂不得已将上海工厂暂行停办，总分公司一律缩小范围。”

南洋停业之原因，不止一端，最著者如：（一）金价暴涨，原料昂贵。（二）工人怠工，出品迟缓。（三）外商如英美烟公司极力竞争，垄断市场。（四）工潮迭起，损

失不资。（五）烟税过重，而售价则受限制。以及（六）我国连年内乱，运输不便，营业梗阻，武人勒索等等大小损失，在民国十八年一年度，仅销五万八千箱，亏折至三百二十万元以上，于是不得不宣布停业[6]。

（己）火柴业　现在我国火柴工业不振之原因，一为瑞典火柴商之垄断东亚市场其势力已推及我国东南两部，一为金价暴涨，原料昂贵。据钱承绪陈明全国工业之现状一文所载：

"自瑞典火柴公司与日本磷寸会社合并以后，同时又取得德国全国火柴专利权，势力日以雄厚，冀以屯并货销灭我国火柴全业。但昔时原料价贱，有此便利，尚能存在。今则原料合算以金价关系，已超过一倍有余，而国内并无磷寸及主要原料出品，故瞬息即将复灭。"

（按十九年春季全国火柴业联合会曾向工商财政两部呈请设立公卖局，独占中国火柴销售之权。）

第二节　今后工业发展之趋势

中国工业之现状，已如上述。然则今后之发展，果将何如乎？就目下之状况度之，概不外下列四端之显著趋势。兹分述之：

（甲）关税保护政策之趋势　自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来，对于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进行异常努力，关税一项，尤为全国热望之焦点。关税之影响于我国新工业，民生主义第四讲曾再三提及之：一曰：

"中国要提倡土货，抵制洋货，从前不知道运动了好几次，但是全国运动不能一致，没有成功。就令全国运动能够一致，也不容易成功。这个原因，就是由于国家政治力量太薄弱，自己不能管理海关。"

再曰：

"由此可见我们要发达中国的工业，便应该仿效德国美国的保护政策，来抵制外国的洋货，保护本国的土货。"

所以保护工业，第一须有统治力之政府，而其步骤，又以取消不平等条约如关税自主，使工业可以自由发展。现在国民政府关于关税自主之新约，已先后经各国签字，并于十八年二月一日起先施行七级新税率，又于十九年二月一日改用金本位征税。将来政治日上轨道，保护税率，逐渐修订，则中国新式工业之发展，当不难突飞猛进。

于此不可不补述者，即关税宣布自主以后，裁厘之声，亦随之而紧张是也。裁厘与关税相同，在北京政府时代，均经讨论多次，迄未实行。此次关税已行新则，关税主权，已算收回一部，对于各省厘金，亦应同时撤销，方能符合裁厘加税之本旨。故自十八年五月份起，财政部即从事举办特种消费税，并确全国厘金分期撤销完竣[7]。但因年来战事丛起，至十九年底尚不能实行。

（乙）政治奖励工业或官民合作力求进展之趋势　发展工业，首在提倡。自国民政府增设工商部以来，对于提倡奖励方面，颇多着力。民国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即有特种工业奖励法之公布。计七条，凡（甲）创办基本化学工业纺织工业建筑材料工业制造

机器工业电料工业及其他重要工业者，（乙）制品能大宗行销国外者，（丙）自己发明或输入外国新发明首先在一定区域内制造者，（丁）应用机械或改良手工制造洋货之代用品者，均得呈请奖励。奖励方法有四：（一）准在一定区域内有若干年之专制权，但至多以五年为限。（二）准减若干年国营交通事业运输费，但至多以五年为限。（三）准免或准减若干年材料税。（四）准免或准减若干年出品税[8]。

同年十二月，工商部有工商行政纲要计十六条之订定，其主旨则以全民福利为主，中外合作为归。其次第则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据工商部长孔祥熙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之报告，除增订法规工厂注册筹办工商统计以外，其关于奖励指导维护以及提倡中国新工业者，计分四端，兹摘录之：[9]

一　关于民营工业之奖励：为奖励民营工业起见，已制定特种工业奖励法，发给国货证明书规则及各种奖励法规，组织审查会，二年来共计核准专利案二十五件，发给国货证明书百四十三件，发给褒奖状三十五件。

二　关于工业之改良：指导改进工业，端资试验。现在中央工业试验所，业已成立，章程规划，均已厘订。内分化学机械两处，此外并于各商品检验局附设化验所，业经征集工业原料五百余种，次第试验。并拟改良各种机械，计制成者有和泥造砖机及改良家庭缫丝机烘茧箱等。此外对于各种手工家庭工艺品已分别考查，研究指导改良，并会同卫生部提倡用科学方法，制造药剂，以冀于短期内通行全国。

三　关于旧有工业之维护：旧有工业中间，有规模宏大周转不灵，几难维持者，即呈请中央设法救济。如筹拨官股加入永利制碱公司，整理国民制糖公司，试炼精糖，筹备火柴专卖，以维持各华办火柴公司，并筹划救济丝茶业绸缎业桐油业，会同财部核减工业原料及工业出品减税免税等事项。此外并督促各县市筹办小工业货资所，扶植小工业之发展。

四　关于极力提倡国货：中央提倡国货，三令五申，且列入下层工作七项运动之一，工商部自创办中华国货展览会于上海以后，响应而起者，有武汉展览会西湖博览会，各省亦皆陆续筹办。工商部对于北平国际实业展览会首都建国博览会，亦已着手筹备。又设立首都及北平国货陈列馆，附设国货商场，筹办国货工厂，合作商场，并督促各省市及华侨设立陈列馆。此外社会方面，提倡国货，更风起云涌。最近且有妇女提倡国货会之成立，尤为空前之组织。尚有国际团体及赛会，如十八年日本东京世界动力协会及万国工业会议，美国纽约国际生丝会议，荷兰国际商会，及十九年比国独立百年纪念博览会，与德国柏林会议，美国国家商务会议，皆派代表参加，借以明了世界工商情形，为自图发展之计。

（丙）国家工业资本建设之趋势　民生主义第二讲：

“我们在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想一劳永逸，单靠节制资本的办法，是不够的。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

制造国家资本，不仅限于工业，一切交通矿产森林渔业，均包括在内，惟工业确为最重要之一端。制造国家资本之方法及种类，实业计划言之特详，兹不赘述。现在国民政府关于国营工业之筹办，规定凡需大资本之工业，应由国家经营。预定兴办之基本工商业九种，已经中央核定。并拟定先行举办制酸制碱制糖细纱毛织五工厂，其设计亦已

完竣。并拟具先行发行兴业公债一千五百万元，呈准进行[10]。天津永利，已加入官股。细纱工厂，亦已在筹办中[11]。

（丁）劳资协调政策之趋势　自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以来，我国劳工运动之发展，一日千里。惟近年因共党煽惑，劳资纠纷，亦极蓬勃，国府为提倡劳资合作防患未然起见，已先后由工商部订定工厂法工会法劳资协调处理法等等，呈准公布。工厂法施行条例及工厂检查法规，亦已起草完竣。两年以来，经工商部依劳资协调处理法处理者，已有一百五十余起，劳资新旧合约，经调查所得，计四百八十余件，解决工人工会纠纷案件，一百八十余件[12]。果中国政治日见鲜明，社会日益安宁，则工商企业之发展，必将一日千里。而劳资两方之合作，亦为必然之趋势。

本章结论

（一）自民国十八年以来，中国重要工业，除纺纱业外，其余均有衰落之征象，纺纱业则以日商最占势力。

（二）衰落之原因，一业与一业不同，如烟草业则病于税重，火柴业则困于瑞典商之垄断市场，惟罢工运动之蜂起，以及金价高涨之关系，其害尤为显著。

（三）今后新工业发展之趋势，计有四端。一曰关税保护政策之趋势，二曰政府奖励工业或官民合作力求进展之趋势，三曰国家工业资本建设之趋势，四曰劳资协调政策之趋势。

---

① 以上见十八年国内纺厂之统计工商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一号，按原文所列，十七八两年纱厂统计，诸多差误，未能照录。

② 参考广东蚕丝业之现状，工商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三号，统计见第五十九表。

③ 见沪商整会呈请救济实业文，工商半月刊第二卷第八号。

④ 见钱承诸陈明全国工业之现状一文，申报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载。

⑤ 下文系转录自民国十八年之中国社会，陶希圣著，东方杂志第二十七卷第四号，民国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

⑥ 摘录自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停业之原因，工商半月刊第二卷第八号。

⑦ 见全国厘金调查篇，工商半月刊第一卷第十号，据载财部调查全国最近厘卡数目（东三省甘肃除外）共六百九十处，广东一百十五处最多，山东十四处最少。

⑧ 特种工业奖励法见立法专刊第二辑，立法院秘书处编，十九年一月印行。

⑨ 见二十五年来之中国工商孔祥熙讲，载工商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二号。

⑩ 同上。

⑪ 见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各项革新与建设，民国十八年十二月出版。

⑫ 同注九。

（转自《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

〔附〕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白色恐怖

一九二七年中国被难人数统计表

（因参加革命而牺牲者，被捕者和逃亡者。）

此表仅就报上所记载者，各地济难会所知道的而报告到济总者之材料而制成，其秘密处决或被捕未经报纸揭出者，及在各地暴动后被反动军队杀死或被压迫而逃亡而无从统计者，不在其内。故此表只能算作一个大概记载，不能视为完全统计。

制表者识

省分	被捕者	被处死刑者和被反动军队屠杀者	特别的记载
江苏	五·六五七	一·八三六	重要革命分子之被杀者约八五〇人
浙江	一·八〇五	九三二	
福建	一·三〇五	（四月二三清党事在内）五六九	
广东	七·五六三	七·八九六	革命领袖之被杀者约二〇〇人
广西	四一一	五一一	
湖南	五·五四〇	二一·三五三	
湖北	二·六九〇	一·二七一	现在狱中所拘禁者约二·五〇〇人
江西	四三五	五一三	
安徽	三二五	二〇〇	
四川	二·五〇〇（三三一案在内）	一·二〇〇	禁在狱中之重要人物约三五〇人
云南	三〇〇	一二〇	
贵州	二〇〇	七〇	
山东	五〇〇	三五〇	在暴动后被杀者约三五·〇〇〇人
河南	七二三	四五〇	
山西	五三一	五〇	
甘肃	四二三	六五	
东三省	五一三	一二〇	
陕西	五〇	二〇〇	

（原载《布尔塞维克》1卷26期，1928年8月20日出版）

〔附〕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

（一九二八年二月）

中国民族，为世界民族中文化最古而贡献最大之民族。人口之数量，在前两世纪，占全世界人口之半数以上。此一百年来，因文化落后与经济落后，受欧洲帝国主义东侵之压迫，日趋于衰微；而中国民族独立自强之革命运动，亦即与帝国主义东侵之历史，相因而起。是以此一百年间，在形式上为中国民族势力衰颓之时代；而五千年文化民族生命之复兴的努力，亦即在此衰颓堕落之时代中，不断的继续前进。本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之国民革命，即领导中国民族独立，文化复兴，民生发展之救国运动，而从事于革命建国之伟大的努力也。

此一百年间，中国革命运动，随时代之进展变化，而时有变迁。然而其唯一的精神，绝无二致者，则民族独立，文化复兴，民生发展之要求是也。总理中山先生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实为综合中国民族之历史的文化精神与现世界之科学的学术经验而成之革命的最高指导原则此一原则，不特足以指示中国之国民革命之理论与行动；全世界一切人类，欲求得普遍而永久之和平与进步，其政治的社会的组织，国家与人民之行动，绝不能背离此原则。此实过去与现在世界之一切政治的社会的经验之所能确实证明者也。

过去百余年间，由生产的进步与民族的发展变化流转而成之现代的帝国主义，于不断的战争与压迫之中，终于造成十年前之欧洲大战。死于战场者数百万人，因战争而死于瘟疫饥馑流离，以及宗教的残杀者数千万人。全世界十数万万之民众，无不受此战祸之影响。而最悲惨之共产党的暴力革命，遂发生于战前专制最烈，文化最低，战时受创最大之俄国，而蔓延于中欧南欧。集中于俄国之共产党人，踞民族统治之榻，而耽共产之梦，继帝俄南侵之野心贪欲，而变其策略。于是百年来受压迫于帝国主义之亚洲民族间，亦受此强暴的赤色恐怖影响。各民族之崇高而伟大之革命的民族独立，文化复兴，民生发展的运动，在一时期中，一部分之经过，往往失其正确健全之进展，而变为革命的发狂。土耳其与中国，皆经验最深之国民也。

今日国际之情况，盖合全世界而为一大封建制。帝国主义在今日之世界犹古代战国之群雄，而第三国际所领导之共产革命，亦犹继战国而起之暴秦专制而已。不特同为霸道而已也，赤色的帝国主义之共产党，其专制暴虐乃过于白色帝国主义者百十倍而不止。自一九一九年以来，至今八九年间，俄国共产党之在俄国，已由各种惩创而自知其政略之错误，一再改变其内政外交之策略；而在理论上之文过饰非，则依然如旧。在帝国主义侵略与压迫下之民众，尚未能烛察共产党人所持为辩护之共产主义之非，而一再受其愚弄与蹂躏。一方面既使一切民众自身之组织，不得遂其健全的发育，一方面复使其民族自身之独立复兴的运动，不得遂其健全的进步。由民众自身之猜忌与斗争，而使社会生活，民族生存，国民生计，群众生命，陷于危殆。一切弱小民族仅有之生机，且将

因此而夭折。是第三国际所统治之共产主义的运动之在世界，尤其在东方被压迫民族间，实为民族独立运动之大敌，而不容须臾缓其惩创者也。

吾党在此伟大的怀抱与艰苦的努力之下，而有去年四月之清党工作，而有扑灭共产党的工作，而有反抗俄国一切非法行动与之断绝政治关系之工作。在此工作前后三年之间，吾党同志或以思想，或以行动而与共产党斗争者，不知凡几。虽中经无数之困苦艰辛，分崩离析，而其结果则复归于共同。此更足证明中国之国民革命，其基本之目的，在于民族独立，文化复兴，民生发展，而所取之途径，则舍　总理所指示之三民主义而末由也。

中国之革命，今方由理论宣传与武力征服期，逐渐进于此两种工作与政治的建设经济的建设并行之时期。自此之后，吾党同志与全国国民，当切实承认过去中国革命之一切失败，乃在于不能遵信　总理之三民主义。由此之故，乃生放纵共产党危害中国，及召来一切更重大之国际的国内的纠纷，使国民革命运动，不得遂其健全之进行。今后更始之图，其最重要之基本，则在确实遵守　总理之遗教，以努力于革命的建国事业之完成。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负此重大之革命的任务，以最强毅之决心，督率全党同志，领导全国国民，在此根本的觉悟之下，致力于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之工作。更为集中党内党外之视听与努力，因应国民革命入此阶段后之需要，条举其最重要之方针如次：

第一，内政的建设，一以实行建国大纲以指示之工作为目的，而如何能达到此目的，则第一项决定确立法治主义之原则。过去数年之间，吾党因注全力于军事的发展与民众之宣传，于是一切政治的施设，均为应付各个之事实，不暇及于系统的法令规章之制定。而共产党徒之非国家的煽动宣传，益使国人群趋于社会的争斗，而漠视法治与国家之关系。于是造成法治的国家为革命一重要任务之义，几不复见知于国民。须知一切政治的主张，若不成为具体的法律；政治之组织，若不造成宏远精密之制度；不特一切理论尽属空文，而社会之秩序，人民之生命财产及一切生活关系，均无保障。建国的中国国民党之重要任务，固在唤起民众，而尤在建设国民生活之秩序与保障。此实吾党今后应以全力赴之者也。其次，则为行政之建设。　总理讲民权主义，置重于政权与治权之分别，而最要之目的，在于建设有能力之政府。盖无论何种良好之主义与政策，若不得良好之政府以施行之，皆空言而已矣。吾党今日唯一责任，在为中国国民造成良善之政治，以实际的解除人民之痛苦。此良善之政治，即以良好之行政组织与其运用为基础。曩昔吾党曾以建设廉洁政府为行政之方针，今后之目标，不特在此消极的努力而已也，尤须积极的建设良好之行政制度而使之推行尽利。盖吾党之政治纲领，已具备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而实现此宣言，必须造成能负建设责任之制度与人才也。

第二，关于教育的建设，实为中国国民之生死关键。自欧战以来，中国青年学生对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渐具觉悟；种种不满足于现在境遇之心，与日俱进；而实际之政治组织，教育设施，不足以应时代之要求。于是各地学潮，风起云涌。共产党徒，乘青年智识不充，修养不足，社会无进步之组织，人民无确实之保障，利用社会弱点，世界潮流，煽动青年，用为工具。惑之以利，乱之以色，迷之以虚伪口号，强之作破坏暴举。现在全国青年之误入歧途者，既已陷身魔窟而不自知，知之又苦无自拔之道。即多数赋性和平诚实者，亦均徬徨歧路，正如盲人瞎马，夜半深池，稍一失错，遗恨终身。

各地教育机关，外受战祸与政变之危害，内受学潮之影响及人才缺乏之困苦，几于无一人能安心求学，无一校能安稳维持。重以政治之派别分歧，引诱之法术无穷，学校在学之学生，变为政争之货品，由互争而互斗，由互斗而互杀。如此情形，不从速救济，则历时愈久，流毒愈深，不但教育破产，一切社会机能，皆将陷于绝境。就今日受痛苦最大之点言之，无过于未成年之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社会斗争之一事。夫政治运动及社会运动，乃关系人民实际生活，国家实际利害之问题；参与此种运动者，必须有实际利害之认识与正确智识之判断。未成年之青年男女，身体精神之发育未完全，基本之智识经验未具备，即个人之私生活，尚不能离成年者之保佐而独立；何况国家社会之大事，乃放任于未成年者之自由行动，是不特将民族可爱可宝之未来生命付之无代价之牺牲，亦直是以国家社会全体之生命，作儿戏之试验品也。各国法律，在私法上规定行为能力之年龄，未成年者，一切行为，不认其有法律上之效力，亦不科以法律上之责任；而国民之公权，则更有各种限制。此不特维持社会公共生活之秩序，国家之安全发展，亦所以培养青年保护青年者也。以目前中国之情形论，文化落后，经济落后，国民之身体精神无不衰弱，所仅足属望者，惟后起之青年耳。然当其应受培养与保护之时代，不教之以正当之学问，导之以正当之道途，使其身体精神得遂其自然而健全之发展，乃欲付以成年者所不能胜之重任。及其已陷于错误，而祸害已波及于社会国家，然后不得已而科之以未成年者所不应受之严刑。此岂足以救亡，实所以召灭种之祸而已。救济之道，首在保护教育之独立，充实教育之内容，防止青年之恶化腐化，普及国民教育，提高民众智识，以造成健全之国民者，为建设国家之基础。而对于女子教育，尤须确认培养博大慈祥之健全的母性，实为救国保民之要图，优生强种之基础。凡此诸端，皆须全国人民切实觉悟，而与本党协力图之者也。

第三，国民经济生活之建设，为国民革命最主要之目的。今日中国国民之生活，已陷于破产，欲从帝国主义者经济的压迫之下，而得国民生活之苏生，实以经济的建设为最要之图。过去数年之间，共产党徒，利用人民生活之困苦，专以煽动国民间之经济的阶级斗争，为若辈取得政权之工具。于是最幼稚之新兴工业的生命，及最贫弱之农业生产的基础，益陷于倾复破产，而大多数之工农民众的痛苦，更失其解除之道，同陷于澌灭之深渊。夫吾党唤起民众之努力与乎革命的民众之奋起，其根本的目的，乃在求民族全体之生存，而非自寻生存途径之绝灭；乃在发展中国之产业，而非破坏中国之产业。乃是建设生产之秩序，而非在破坏生产之秩序。吾党今后，必以强毅而坚忍之决心，与不断的努力，以发展中国之农业工业者，裕中国国民之生活，建国家富强之基础，实现总理建国方略宏远之计划，而达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之目的。为维护此目的之遂行，必须提携全国革命的民众，运用强固的政权，与良善之法律，以全力为国民建设工作之后盾。反乎此义者，则是国民之蟊贼，必尽全力以芟除之，决不任其危害社会之生活，民族之生存，国民之生计，群众之生命也。

第四，吾国在国际间之地位，此百年来，日陷于衰颓；而此百年中，国际间一切非人道之争斗，更为人类空前之祸害；吾国民革命之努力，唯一之根本目的，在于民族之平等，与国家之独立；而废除不平等条约，则为达此根本目的之具体的方案。吾国民今日，虽不恃强大之武力与世界帝国主义者相周旋，然而强毅之建设的努力，终必能造成中国达此目的之能力。吾国民须知一切反帝国主义之运动，惟有以实际的建设，为真正

手段者，乃得实际之效果。彼共产党徒所用之手段，足使贫弱之中国，成为白色帝国主义与赤色帝国主义斗争之材料，而自陷于灭亡。生聚教训，为独立自强之始基，独立自强，为平等地位之根本。此之义理，实一切历史所诏示于吾人之原则。盖世界一切民族，无不可为中国之友，亦无不可为中国之敌。取得独立平等地位之实际工作，在理论为正义与人道之宣扬，在实际为国民能力之表现。昧乎此义，则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之愿望，实现为艰，欲人以平等待我，亦无不劳而获之易事。此为吾国民所当卧薪尝胆刻苦自励者也。

而犹有为世界各国政府告者：则中国独立而和平之建设，为世界平和之保障。过去亘五年之世界大战，及战后新发生之一切革命的恐怖，应足为切实深刻之教训而有余。吾党　总理在欧战初终时，所发表于世界之中国建国方略，一方为中国革命建设之规模，而同时即为今日世界如何而后能得平和之唯一方案。苟世界各国而不知赞助此方略之实现，与我信奉三民主义负有实现此方略之政治责任，且握有中国实际政权之中国国民党合作者，是徒耽于自私自利之迷梦，而各以其国民之幸福与世界之平和同为孤注者也。

第五，根据国民革命之特性，及中国民族生存意识之要求，凡一切阻碍本党救国建国的伟大使命之任何势力，其必须扫除，且必能扫除，毫无疑义。是以北伐完成，不过时日问题。但须知革命之行程愈推进，则阻碍革命者之抵抗亦随之而愈顽强；在此时期中，军阀之运命多一日苟延，即统一的大计迟一日实现，而民众实际之痛苦稽一日解除。本党革命之意义，固不仅限于军事之成功，但统一之始基，实有待于军政时期之早结；故加倍努力以促进北伐之完成，实为今日不可稍缓之工作。本党鉴民众之颠连。应时期之需要，特制定更切实有效之军事编制与方策，付托蒋总司令中正及全体将士，以克日完成北伐军事之大任。必北伐成功，而后全体民族之精神与意力得有统一之寄托，亦必建国之工作循程并进，而后无数同志为革命效死之牺牲乃更有积极的意义。本党今日已统治中国五分之四以上之区域，而主义之灌溉，又普及于全国之人心，则于北伐军事加速进行之际，同时依照建国大纲规定之程序，切实努力以训练人民对于政治之运用与认识，俾　总理召集国民会议之主张得如遗言所诏示于最短期间实现之。此又本党所应切实负荷之使命，愿郑重宣示于吾全国国民而悬为标的者也。

第六，关于党之整理与建设，尤有为吾全体党员告者：吾党唯一之生命，唯在于负担中国民族平等，国家独立之任务，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革命之建设。欲达此目的。必须全党同志之思想言行完全遵奉　总理遗教，以主义为精神，纪律为规范，造成一主义绝对共同之合成的人格；必须充实此合成的人格之历史的精神，而后乃能挽回中国民族数百年衰颓之运命，以建设中华民国之永久的基础。吾党所代表之国民的利益，实为吾中国民族独立平等之生存与发展，而绝非部分的阶级利益。近数年来，国人受帝国主义与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生之反动的共产主义之流毒，忘却国民革命之整个的责任，于虚无缥渺之间，假设其代表阶级之观念，左倾右倾之流毒，深中于人心；离间民众与欺骗民众之恶习，亦遍布于各地。吾党此次之更新，实为全国同志根本觉悟之机，大同团结之会，亦彻底锻炼之期。自今以后，不能从心理的建设，一洗前愆，则清党反共之工作，不唯全归无效，而恶化与腐化，仍足以陷吾党于复灭而不自知。自今以往，一切过去之纠纷轧轹，应完全抛弃。全党新旧同志之间，不得再有以派别自居，以派别攻人之谬见。尤不得模效共产党徒暴乱之言行，假借党部之组织与地位，伪托民众团体之名义，

为法外之煽动，以阻挠本党政治之设施，与妨碍人民生活之自由。三民主义为救国之主义，三民主义之信徒，应为全国人民之忠实的革命前驱，更应为社会忠实服务之公仆。苟稍有背于初衷，斯为帝国主义者与共产党所窃笑，而离间挑拨，皆乘之而起矣。是以自今以后，不特从组织理论上绝对肃清共产党与共产主义，尤必须从组织与理论上建设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夫共信不立，则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则团结不固。吾党过去之所以被扰乱离间于共产党徒者，实由吾党同志不能确立共信之际的，陶融互信之情意所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今后党国之生命与革命之工作，其成功之基础，唯在吾全党同志，信仰主义，服从纪律，捍卫国家，爱护民众之坚强的意志，与高尚的情感；而中国民族文化的创造力之自信，更为保障此意志情感之精神。 总理曩昔，时以恢复民族之自信力勉励吾国民，视为中国民族生死存亡之关键。此一基本要义，尤我同志之不可须臾忘者也。

上列各项，皆本党积痛苦之经验，应革命之需要，而确认为今后努力之纲领；亦为达到救国目的，实现本党政纲之必不可少的条件。荦荦大端，特为提示，誓竭全力，导引民众，努力实行。至于其他党纲党章所已列举之事项，义应遵守，无待赘述。夫人群目的，一曰生存，二曰发展。横尽大宇，竖尽古今，心理从同，蕲向无二。徒以觉有先后，识有偏全，取径有正斜。意量有广狭，遂令和平乐利，猝不可期，而错误创残，复演无尽。积本党改组以来之经验，证以世界一切治乱兴亡之陈迹，益令吾人确信三民主义，为综合中国民族数千年历史经验，及全世界最进步之科学的理法而成之人类进化，世界大同之最高指导原则。必须此主义光大发扬于世界，而后世界人类乃可减少无数不必要之牺牲，实现普遍永久的和平与进步。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若能奉此主义，彻底指导其政治的社会的一切施设，则此民族即可发扬无量之活力；而中国之国民革命，则更惟有以坚强的自信，刻苦的努力，勇奋迈进，以实现 总理遗示吾人之主义，乃足以避免一切错误，盲从，迷旧，迷新之失败；竟革命之功，成凝命之德，导国民于正轨，奠国基于永固。自今以往，吾党之全体同志，其痛自彻悟，精诚团结，急起直追，无间生死，以完成三民主义之革命，建设世界最大最善最美之中华民国者，解世界人群之大厄，立世界大同之基础。今日之痛苦牺牲，即他日之庄严灿烂。前进！努力前进！

三民主义万岁！

中国国民党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附〕复驻法总支部函

汪 精 卫

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诸同志均鉴：顷由诸同志转来三月二十日手书，捧诵再三，借悉诸同志艰难奋斗之经过，弥深敬仰。而诸同志对于弟个人责望之殷，尤所感奋。弟抵法后，因肝病未愈，从事疗养，未得与诸同志相见，至以为憾。今读手书，如获面谈。手书所垂询者，及弟所欲言者，猝未易罄。兹寄上最近演说集一册，倘承察阅。可知梗概。至去冬十一二月间在上海所发表之言论，尚未汇刊，惟上海各报皆已登载，想承烛及，亦不多赘，谨撮举大意如下。

（一）本党改组之精神

总理于十三年春间改组本党，容共政策，亦于此时确定，惟容共仅属一时政策，决不能谓容共即为本党改组精神所在。本党改组之精神，在于认定三民主义为救国不二法门。欲求三民主义能实现于中国，则不能不使三民主义普及于民众。欲求三民主义能普及于民众，则不能不使党员真能为主义而奋斗。欲求党员真能为主义而奋斗，则不能不巩固党之组织，森严党之纪律，使党员之行动趋于一鹄。此实为本党改组之精神，有此精神，然后本党乃得一新生命。此与容共无关。谓容共为改组精神所在固谬，因反对容共并改组之精神亦抛弃无恤尤谬。此为弟始终一贯之见解，当先为诸同志告者也。

（二）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奋斗之经过

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注重于组织与纪律，因此惹起跋扈武人及腐化分子之反动。盖彼辈平日所以能寄生于本党，全恃党之组织松泛，纪律懈弛。改组以后，渐觉无所容足，遂不能不出于反动。然反对改组自亦知其不可，遂不能不以反对容共为借口。此等反动，总理在日，固已开始。及总理逝后，其势猖獗愈甚，如冯自由等之卖党，杨希闵等之抗命，以及朱卓文等之谋杀廖仲恺同志，皆其例之最著者。

（三）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后之纠纷

弟等不忍总理逝后，其改本党之精神，亦随以俱逝，故努力与此等反动分子为敌。几次扑灭之结果，广东全省，遂告统一。然反动势力，初不因以少熄。盖上述反动分子，虽敛迹于广州，仍麇聚于上海北京等处，勾结帝国主义与军阀，以谋倾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加以当时弟等方专心致志与此等反动分子为敌，遂使共产分子得以乘间抵隙，渐成坐大。于是又激起一部分忠实同志之不平，渐至对于共产分子为对抗的运动。此等忠实同志之心理，与上述反动分子不同。上述反动分子，反对改组，而以反对容共为借口。此等忠实同志，则皆赞成改组，惟对于容共，则渐由怀疑而至于反对。自此等对抗反动，突起于广东内部，于是广东之革命势力，不免动摇，而反动分子，益张其焰。彼等知广东革命之势力，未易倾复，则务谋离间之以使之分裂。所以“联蒋倒汪”之口号，遂盛行于彼时。第二次代表大会虽已告成，而不久即有广州三月二十日之事。

（四）三月二十日以后

三月二十日以后弟为保存革命势力计，对于蒋介石同志采极端的退让态度，使离间

之徒，技无所施。所以自四月去国，以至去年春间回国以前，弟无论在法在德，皆闭门修学，绝未尝对于党务有所活动。此为消极态度所应尔，非仅原因于疾病也。

（五）去年春间归国以后

弟去年春间归国之动机，因闻党内纠纷日甚，势将决裂，故归而谋有以补救。三月八日由德抵俄，十二日自莫斯科启程，经西伯利亚铁路及航海，以四月一日抵上海。其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已在武汉闭幕矣，宁汉分裂之势已成矣。弟当时主张，在四月七日致李石曾书中，已详言之，既承鉴及，不复多赘。弟至今日，对于当时主张，绝无所悔。盖当时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皆在武汉，弟之不能不赴武汉，实所谓天经地义。弟以四月一日抵沪，六日由沪启程，十日至武汉，十二日而沪宁已举行清党。此在时间上实使弟在武汉了无斡旋之余地，天下后世，必能相谅。惟弟所歉然于中者，则弟赴武汉之结果，使同志间之裂痕更为深切，此则弟所无时无地不举以自责者也。

（六）赴武汉以后

弟以四月十日抵武汉，十七日中央党部议决免蒋介石同志职。十九日誓师北伐，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同志，及第一纵队司令张发奎同志，相继率师沿京汉路入河南，与奉天军阀作殊死战。胜负未决，而杨森自西至，夏斗寅自南犯，东则江西又告急矣。当时武汉实处于四面包围之中，而其内部之纠纷，乃较十四年间广州情形为尤甚。共产分子阴谋宰制本党之面目，日益暴露。一般忠实同志，既不愿背离中央，又不愿坐视共产分子之猖獗而不为之所，皆有徬徨无路之苦。弟于此时与一般忠实同志深相团结，北则抵御奉天之强寇，西南则剪除反侧，东则杜下之游觑觎，军事稍定，遂奋然而起，驱除共产分子。去年四五六七月间之艰难苦斗，实为弟生平动心忍性之尤，自问对于总理，对于党，对于同志，固已“竭其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而济否则未敢，知此于“夹攻中之奋斗”中，固已沈痛言之矣。

（七）武汉分共以后

去年七月十五日，中央党部，决议分共，仅为和平的分离。倘当时共产党人，能不逾越中央所定之范围，则未尝不可在中央权力所及之地，取得在野党之资格。及七月卅一日贺龙叶挺在南昌叛变，中央始不得不由和平的分离而进于严厉的制裁矣。当时武汉已北抑奉天军阀，西逐杨森，南逐夏斗寅，其势可以专心东防。然自驱共以后，武汉同志对于南京同志四月间之非常措置，已能深谅。当时惟一希望，只在能合全国忠实同志一致奋斗，而其方法，则在开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以确定此后之活动方向。

（八）特别委员会之产生

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之被挫，特别委员会之产生，实为宁汉合作以后至可痛心之事，亦本党至可痛心之事也。来书于此事本末，似有未察，然诸同志苟一检十一二月间弟等所发表之言论，及吴稚晖等所发表之言论，当可知其概略。当八月廿三日，孙科谭延闿偕李宗仁由九江至南京，九月四日，弟等继至。李宗仁等以为欲开第四次会议，必须邀请宁方委员胡汉民吴稚晖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共同出席，方足以表示宁汉合作之精神。其议甚正。故弟等于九月八日即相将赴上海，邀请诸人。然胡吴则匿不见面，蔡张李则坚持若开第四次会议，彼等决不至南京。事势至此，已成搁浅。于是西山会议派乘之而起，倡为特别委员会之说，欲以推倒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者，推倒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孙科则以此主张提出于谈话会。弟于此时，只有两途。其一，使谈判决裂。

其二，表示消极，使此谈判无由进行，而徐图挽救之术。当宁汉合作之始，谈判决裂，于意有所未安，遂出于表示消极之途。故九月十五日南京之会，弟与多数中央委员皆未出席，而彼辈则悍然不顾，竟使特别委员会成立。弟等犹不愿与之决裂，而从事于和平补救之进行。此皆当日实在情形，诸同志若以为当日弟之态度过于懦弱，加以责备，此则弟所甘受者也。

（九）宁汉之战

特别委员会之产生，全国同志，一致反对，不独武汉为然。惟武汉政治分会之强硬态度，实足为全国同志之声援，而亦为南京特别委员会所深忌者也。于是南京特别委员会乃不得不处心积虑，以谋攻击武汉。论者不察，乃以为武汉之战，由唐生智同志进兵安庆芜湖压迫南京所激而成。吴稚晖于所作“赘言”中尤快心言之。此实与当时真相，完全相反，宁汉合作以前，宁方军队，标榜西征，汉方军队，标榜东征，皆已见之事实。自八月间，徐州失守，孙传芳军直迫南京，宁方军队，应接不暇，已无复西征之声响。八月廿三日李宗仁至九江，与弟及谭延闿朱培德唐生智程潜诸同志相晤，其所表示，弟希望汉方军队，不复东进，俾宁方军队，得专心应付孙传芳军而已。其时唐程仍主东进，以为宁汉既已合作，则当共同御敌，而朱同志则已虑及，东进结果，必启宁方军队之疑惧。故东进与否，成为弟等当时考虑之问题。遂决议先由谭延闿孙科偕李宗仁东下，示宁方军队以无他。至于东进与否，则视此后情势之需要，以为决定。谭孙抵南京后，孙传芳军队方渡江猛攻南京，其势甚危，谭孙乃连电催兵东进。而朱同志至此，亦不复异议，唐程乃各率所部，依谭孙来电所示，东进赴援。弟行箧中携有当时往来密电原稿，今抄录于下。

九江汪主席并转孟潇益之颂云三兄鉴：此间何李白贺叶均诚意结合一致，顷已商定，请孟潇兄军队，集中芜湖，并希望以一军出含山，向津浦压迫，以一军为南京声援，并以轮运为速，颂兄军队应如何接近南京，亦望酌定，敌人连日偷渡，顷在下游发生战事，白在镇江指挥，并闻延闿科宥午（八月二十六日）。

九江汪主席：昨敌正在包围缴械中，据俘虏云，敌军有六师兵力，张宗昌正南下，日内必全线大举渡河，此间决意反攻，亟望孟潇兄速派兵由芜湖含山定远压迫，望先复电以壮军声，至要。延闿科感午（八月二十七日）。

九江汪主席，并转孟潇颂云益之三兄：连电闻系大通有阻，此后请由无线电电示，现敌人仍在龙潭登岸，激战甚烈，第一军因介石下野，军心懈弛，兼余军疲乏过甚，力量薄弱，惟恃七军撑持，请孟潇兄速派一部至芜湖，向含山和县压迫津浦南段，务须用船运芜，从速运动，即复，延闿科艳申（二十九日）。

九江汪主席，并转孟潇益之颂云三兄鉴：龙潭之役，今日已击溃缴械，然敌谋未已，此间防战，皆恃七军，非我军向江北压迫，不能收功，李何白皆切望，弟意宜与以好感，一切皆易解决，请孟兄电刘何两军注意，陈调元于颂兄极推重，力主第二方面军亦至芜湖，望派人联络，各部队似可皆由船运，不必陆行，并望酌定，谭延闿孙科卅亥。

九江汪主席，并转孟潇颂云益之三兄：艳电奉悉，此间军事甚利，敌前后有二万余渡江，已陆续缴械，现有一小部被包围于江边，本日可告肃清，逆敌全部计划，以孙传芳担任津浦线东面，张宗昌担任津浦线西面，我方兵力在津浦线西面者，稍形薄弱，合肥六安等处，尤为空虚，恳以卅五六两军出合肥，一出含山和县，第二方面军集中芜湖，

则各方各可照愿，出击甚易，同人等互相商酌，意见相同，特电奉商，即祈裁夺施行，见复为荷。谭延闿孙科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卅申。

南京谭主席孙部长：数日未得电报，正切悬念，顷接宥午电，欣慰兼至，已即照来电饬三十五军出含山，向津浦压迫，三十六军集中芜湖，第二方面军集中宣城，为南京声援，如能由宁沪拨招商第轮开来九江，以便运输，更为妥捷，请转告何李白贺叶诸同志，汪兆铭唐生智朱培德程潜艳午。

南京谭主席孙部长，并转德邻敬之健生三兄：今午奉卅午卅亥两电及借敬之德邻健生三兄卅申电，至为佩慰，孟潇颂云两兄所部，因无轮运，陆行迟缓，深以未能夹击渡江之敌为虑，集中芜湖宣城后，当即会同计定全般计划，以施行全线反攻，合肥之敌，已令何部往援，为统一指挥计，皖北部队，拟归芸樵暂行指挥，并闻。兆铭世（卅一）亥。

总观以上往来各电，可知汉方军队东进之原因。孙传芳军之破灭，固由于一七两军之善战，亦由于闻汉方军队迅速东进，势成夹击，故望风丧胆。至于孙传芳军中宣传，谓唐生智已与彼合作云云，此乃敌方反间之常技，据以为信，虽愚者亦不出此，无待辩也。

孙传芳渡江军队，既已扑灭，而唐生智程潜所部，已陆续开至芜湖宣城一带。此在唐程，方以为所部当可俟全般计划订定之后，加入全线反攻。不知在李白视之，则以为前者望其相救，今者转患其相迫也。倘使当时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能在南京开成，则党有中枢，一切权力皆属于党，一切军事行动皆取决于党，此等枝节不成问题。无如当时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被挫，南京为特别委员会所窃据，武汉政治分会方起而矫正，势成对恃。不先解决党的问题，则军事问题无从解决。弟为此事奔走于沪浔汉间，直至十月十日始与南京代表孙科伍朝枢等签定条件于汉口，其全文已在报上发表，想承鉴及，亦不多赘。总其全文之大意，对于党务，只求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能开，执行监察两委员会能恢复，特别委员会不妨听其如政治委员会之存在。对于军事，则在集合汉宁各方军队共同北伐。此条件签定后，孙伍携至南京，得谭程李白何复电之赞同。弟方以为事已大定，党务军事均可转危为安，而不知当时南京对武汉之作战准备既已完全矣。溯其原因，约有数端：（一）李宗仁白崇禧欲以桂系造成最大军阀，前既借武汉之势力以去蒋，今并欲去唐。（二）谭延闿程潜与唐有宿怨，故与李白结合以去唐，其势甚易。（三）唐与诸将多不协，势成孤立。有此三者，特别委员会诸人，遂得以尽其挑拨离间之能事，速成宁汉之战，借以延特别委员会之生命，而阻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之进行。故弟对于宁汉之战，实引为大戚，以为从此党权坠地，武装同志相斫成风，大乱既成，不易挽救。关于此点，弟所为文字，除已发表者外，并录密电数则，以备参考。

九江朱总指挥：昨电计达，昨晨弟与哲生梯云谈话，弟坚持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哲生谓如此则西山会议亦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亦须恢复。弟谓如彼等欲恢复，自然会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开会，我等管不着。我等对于西山会议派只能容纳个人，不能承认党部，更不能为西山会议派而抛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出之中央执监委员。下午复约励斋孟余霁青谈话，弟等一致主张：（一）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二）特别委员会仍然存在，（三）规定常务特别两会之权限，（四）恢复监察委员会。哲生梯云允即夜携此条件赴南京商量。弟今惟一之祈祷，我兄速与组安颂云德邻健生诸兄通电，请其

赞成此四条件，俾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组织之中央党部，不致为一二人所出卖。弟月余以来，悲愤填胸，至此已忍无可忍。弟今力劝孟潇退让，与李白诚意合作。惟中央党部如不恢复，则此等合作，仅能使上下游武装同志不生冲突，于党无关，弟亦不愿与闻矣。总之现在第一要务，在恢复中央，乞兄明鉴，无任祈祷。弟兆铭文(十月十二日)。

广州李主席张总指挥：元电奉悉，月前德邻抵九江时，彼此诚意合作。及弟等到南京后，南京派与西山派结合，极力破坏第四次全体会议，德邻健生无如之何。弟不得已而赴牯岭，及来汉口。前复琪翔电，亦欲来广州，因弟痛心于中央之复没，不忍亡命海外，故于国内求一立足地，以期恢复中央也。为今之计，乞两兄与德邻健生坚决主张，(一)对西山派可容纳其个人，不宜承认其党部，(二)对南京派宜力劝其不可因迁就西山派之故，而反对第四次全体会议。至于恢复中央执行监察两委员会，尤为必要。特别委员会之存在，仅能如政治委员会。如因此为武汉派所主张而决心反对，宁迁就西山派以攻击武汉派，则成为出卖中央矣。中央恢复，目的若能达到，弟当往何处努力，惟两兄所命。惟此时长江上下游军队，不宜构衅，致为敌人所乘，并望两兄思之。兆铭删（十月十五日）。

九江朱总指挥：顷孟潇持示铁夫巧电，称六军以兵力三团突向湾沚驻军攻击等语，弟力劝孟潇忍耐退让，并仍依原定计划，饬芜湖驻军向江北撤退。此时上下游党军内战，徒为反革命者所笑，为军阀所乘，有百害无一利。乞兄力持和平，干旋此局，万不得已保持中立态度，弟可负责保证孟潇不以一兵扰及江西地面也。此时党内，最少宜留三数忠实同志，勿卷入旋涡，以图收拾。尊见如何，乞示。兆铭皓（十月十九日）。

以上三电皆在汉口时所发。

广州李主席张总指挥：弟应召回粤，兹已抵沪，有船即来。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因上下游战事忽起，交通梗阻，恐难齐集，至为痛愤。面详。兆铭敬。(十月念四日)。

广州陈民政厅长：(一)弟马日离汉，今午抵沪，有船即来。(二)武汉铣得南京允开第四次全体会议元电后，孟潇已开始撤退皖南北驻军，马忽得南京对武汉宣战哿电，孟潇允弟仍继续撤兵并听第四次全体会议公判。(三)南京方面借口用兵，以延宕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并延长特委会生命，扩大其威权，且对于反对特委会者示威。粤既反对特委会，则亦为特委会所目为叛逆。粤中武装同志，虽多不慊孟潇，然于此宜注意。兆铭敬（十月二十四日）。

以上两电，皆由汉口至上海时所发。

南昌朱总指挥：顷接上海转来惠电，借悉尊旨，无任欣感。此次南京讨唐，如系特委命令，则凡反对特委者，皆不能认为有效，如系武装同志自动，则必成混战之局，更可寒心。默察情形，若不及早制止，则长江以南各省，必变为四川，各以武方相胜，党亡国亦亡矣。惟兄图之。兆铭东（十一月一日）。

以上一电，由汉口至广州后所发。

关于宁汉之战，其酝酿与爆发之经过，观以上诸电，可得其概。战事既起，凡汉方一切宣传，皆为宁所遏。故海外同志，未易知其底蕴。弟今作此书，于此独详。至于上录密电，原拟俟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开会时，提出报告。乃会议未开，而弟已去国。今借此机会，以贡献于诸同志。

（十）广州事件

广州事件，一切发表之文字及事实，国内各报皆有登载，不如武汉方面，一为宁沪截断交通，即同世外。虽敌方宣传，极其污蔑之能事，然材料俱在，诸同志自能判断，无待多言。撮要言之，李济深黄绍雄之与李宗仁白崇禧，一致行动，人所共知。张发奎在武汉时，虽与唐生智不协，然其反对特别委员会之决心，则正相同。唐既不容于李白则张亦必不容于李黄。此为十一月十七日广州事件之原因。而当张与李黄作战时，共产党人乘间入寇，造成十二月十一日焚杀广州市之惨变，则又至可痛心之事也。张发奎对于此次惨变，事前之疏于防制，固当负其责任，然临事应变之忠勇奋发，不出三日，即已荡平，其心迹固已大白。李济深等乘张发奎与共产党苦战之际，掩击张发奎，以为共产党作驱除，而犹诬蔑张发奎为共产党，与其荡平共产党之事实谓之“花眼法”，谓之“苦肉计”，此真所谓欲以一手掩天下目者，固不值诸同志一笑也。

于此有一二疑问当为诸同志解答者。

其一，李白李黄诸人，与特别委员会之关系，究竟如何。何以九月间赞成特别委员会之发生，何以十月及十一月间又赞成开第四次全体会议取消特别委员会，何以十二月间又极力阻碍中央全体会议之进行，而与特别委员会诸人深相结纳，离奇变幻，几若无可捉摸，则请以一语说明之。凡军阀之特质，既欲割据地方，又欲把持中央，既欲获取实权，又欲盗窃名义，而轻重缓急，则惟视其力所能至。当宁汉合作之始，彼辈势力未成，若即开第四次会议，以解决一切，则党的中枢既已确立，彼辈将不能不受制。故不如赞成特别委员会，以其名不正言不顺，不独不能制彼辈，且乐于受制于彼辈也。观其与唐生智战，直至开战之后，始请求特别委员会之追认，其心目中固未尝知有特别委员会也。及唐生智既败，彼辈自以为势力已成，莫之能抗矣，则又以特别委员会为名不正言不顺，不足以号令天下，故不恤取消之而代以名正言顺之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也。及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不能听其所为，彼辈遂不能不出于反对。向者北洋军阀对于中央即持此态度，今彼辈如此，直抄袭蓝本而已，无足异也。

其二，吴稚晖张静江蒋元培李石曾等，与特别委员会之关系究竟如何。何以九月间极力反对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而赞成特别委员会，何以十月及十一月间又赞成开第四次会议，取消特别委员会，何以十二月又极力阻碍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之进行，何以今年正月间又列席于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其离奇变。幻与李白李黄诸人，如出一辙，则请亦以一语说明之。诸同志当能记忆，十一年五六月间，吴佩孚逐徐世昌迎黎元洪，以恢复国会号召天下之际，蔡元培等曾联名通电请孙先生下野矣。当五月间，陈炯明免职之后，虽怀怨望，犹不敢为乱，及得蔡电，始借辞发难，而有六月十日炮击观音山之变。诸同志尤当能记忆，当十二年间孙先生与陈炯明在东江作战之际，吴稚晖曾以调人自任，倡为“陈炯明没有孙文，便成为军阀，孙文没有陈炯明，便成为草头革命党”之怪论矣。彼辈心目中，知有武人，不知有党，由来已久，至于最近，而态度愈明。试观吴稚晖于十一二月间所发表之文字，随在可得左证，而其“读了汪先生的两件大事”之文中，更畅乎言之，曰“若三揖三让做个形式的开会，止是丑丑的办法，就是武装同志真正服从，忘了他也是委员，委曲听命于七张八嘴，实则长衫同志大半观望，不是瞻徇，就是捣乱。视武装同志不是同志，直是异类，瞻徇者还当他强盗，以能顺从为妙，捣乱者视他为军阀，以能反对即得，这就是对于军人非同志的办法，军人也不曾自己想自己就是党中柱石的办法”。又曰，“若开会开出权来，就是枪毙我，也不承认”。又

曰，“就是把党也交给武装同志，幸而有凯马尔其人，国民党就算成功，不幸而有张作霖其人，就再让第二个国民党来，或竟让共产党来，免得不死不活，无疾而终。”其对于武人，阿谀逢恶，一至于此，宜其谓“党军可爱，党人可杀。”弟尝痛心疾首，谓辛亥革命将告成功之际，章太炎以“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一语了之。去年国民革命将告成功之际，吴稚晖以“党军可爱，党人可杀”一语了之。呜呼，党且不在其心目中，则其视第四次全体会议与特别委员会，毫无所择，又何足异。

（十一）蒋介石同志之复职与弟个人之引退

当去年十二月初间，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上海开预备会议之际，法定人数已足。其不能赴南京开正式会议者，以李白诸人凭借武力，盘据南京，为之障碍也。为排除此等障碍，乃不能不有“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并负责筹备在南京开正式会议”之提议。此提议初非苟且。当预备会议开会之际，蒋同志曾有告同志书，其言曰，“今日非一致促成中央全体会议，速开正式会议不可，有不能牺牲个人之权位，而阻碍此全体会议者，吾人固所反对，即不能捐弃过去私人之情感，而消极抵制全体会议，亦无可谅恕。”又曰，“国民革命之劲敌，决非军阀与共产党，惟武装同志不能确实认识中央威权之必要与最高性，政客从而利用播弄，始为国民革命之致命伤。”又曰，“吾人今日必须尽力促进武装同志之觉悟，防止文人政客之捣乱把持，确定建立党之中央，提高党权，申明党纪，然此皆非从速完成第四次全体会议不可。”其言之深切著明如此，诸同志读之，知蒋同志真能为党尽力。去年四月间之意见冲突，已完全消除，故有上述之提议。至于弟之个人，以主张开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之故，备受反对者之攻击。夫反对者之攻击，初非弟之所畏，然李白李黄诸人暨吴张蔡李诸人，自去年四月以来皆在南京与蒋同志经历患难，今以蒋同志亦主张开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之故，对于开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已不复反对，惟以蒋同志不与弟合作为条件。夫苟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能开，弟死且不恤，何有于引退。故于上述之提议一致通过后，即附带声明，决然引退，俾彼辈无所借口。而蒋同志之负责筹备在南京开正式会议，亦减少困难。弟之引退虽类于消极，然实则积极以助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之进行也。

（十二）弟个人对于党之观察

弟以为本党改组之精神，此时实已岌岌摇动。武人如李白李黄辈，其所为较之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之杨希闵刘震寰等实有过之。在其指挥下之广东省党部竟宣言不认承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矣。广州政治分会竟提议取消宣读总理遗嘱矣。如吴张蔡李辈，则又倡分治合作之说。此与总理所手定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完全相反。彼辈之出此，若谓根据无政府主义，则与共产党之谋篡本党，有何分别。况其所言，纯为迎合李白李黄辈便于把持割据，与无政府主义相去尚千万里乎。彼辈既存此心，宜其疾视本党之组织与纪律如仇仇，务欲破坏之以为快，与李白李黄辈如出一辙。凡党员中之稍欲保存本党改组之精神，注重于组织与纪律者，皆被吴张蔡李目为共产党，准共产党，共产党工具，假手李白李黄辈以捕杀之惟恐不尽。其结果将使一般武人皆努力于跋扈，一般文人皆努力于无耻，以来免于共产嫌疑。于是本党改组之精神消失净尽，而本党亦随以俱亡。此诚吴稚晖所谓“不死不活，无疾而终”者也。犹幸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既已开成，其宣言中于组织与纪律再三注意，全体同志，若于此致力，未始不可转危为安，是在勉之而已。

（十三）弟个人之行止

弟之来欧，与来书所举胡汉民孙科伍朝枢诸人旨趣不同。元年以来，弟来法数次，皆欲求学．而皆以国事中辍归国。病起以后，若能假以岁月，俾得从事研究，或于本党主义政策理论方法之进行，不无少有贡献。望诸同志鉴此微诚。若诸同志不吝教诲，常相切磋实所深愿。此颂学安。

汪兆铭谨启

（转自《汪精卫集》4卷）

〔附〕北伐完成后最紧要的工作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日在中央党部纪念周讲演——

蒋　介　石

各位同志：

兄弟前几个星期，在安徽各地检阅军队，不能同各位同志见面，没有报告现在时局的情形，今天到党部，要对各位同志贡献几句话。

北伐完成以后，我们最要紧的工作是在外交。我们革命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封建的制度，就是国内的军阀，一个就是外交。国内军阀，从北京打下了之后，北伐总算告一段落，军事亦可作一结束，虽不敢说第一个对象的目的，已经完成，但总算已换了一个新局面了。我们最后的革命，能否成功，就全看我们第二个对象如何对付。就是全看外交上的难关能否打破。这个目的能否达到，就在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如果这个目的，不能达到，那末所谓第一个对象打倒军阀的目的虽说已经做到，亦是假的。兄弟常自问从北京打下之后，在革命的过程中间，这个时期叫做什么时期呢？这可分析说：在北伐完成以前，为一个时期；北伐完成以后，又为一个时期；以前的不是正式革命的时期，是革命准备的时期，以后的才是革命开始的时期。正式革命是在北伐完成以后，才可算是开始的，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现在革命还没有走到半途，还在刚刚起头开步的时候，我们革命的努力，还是在将来，并不是在过去的。现在军事，已告一段落，就要拿我们全副精神，来对付最要紧的外交工作。就现在一般形势看起来，我们这次外交为中国自有外交以来未有的最好一个形势。这种外交形势的改善和优好，这是从那里来的呢？全是我们本党同志自己奋斗得来的。如果我们中国不革命，不北伐，决不会有这样好的形势的。不但是外交，凡是我们国家的一切前途，没有一件不是完全由我们本党同志自己努力奋斗，才可以得到的。如果我们中国北伐完成之后，马上对于一切的政治、军政、民政、财政，能够完全统一，我相信外交形势之优胜，尤不止此。我们的外交早已成功了，不平等条约亦已取消了，那里还要象现在这样顾前顾后，仍要被外国人欺

侮，仍不能完全取消不平等条约呢？

我们革命党员，是要立在客观地位，要看国际上整个的形势和我们自己的力量怎样？如果我们中国内部，尤其是我们本党的党员，个个人能够明了主义，共同一致的来拥护中央，服从中央的命令，个个武装同志能牺牲个人的地位权利，奉还中央，完全由中央来统一一切财政、民政、军政，这样，我们的外交自然没有问题，不平等条约还会到今日不能取消吗？现在还不能达到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新定条约还要带许多危险性，又不能不同他们交涉，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力量，地位以及国内的情形还不允许啊。何以呢？回头看看我们外交的后盾怎样，各国的外交后盾，第一个就是国民的实力，再有一个就是军队的实力。有这两个东西为外交后盾，外交方能得到最后胜利。我们外交后面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有很多的国民，四万万同胞，可是这四万万人，是不是能团结一致，受我们党的指挥？我们这四万万同胞中间，是不是可以挑出两万万同胞，来受我们党的训练，听我们政府的命令，守我们政府和党的纪律？要不然，我们再想想，可否抽出此中一万万同胞来，做我们外交后援，能否有这个决心，守国家的秩序，听政府的命令，我们有没有这个力量？我们再退一步，就是今天集合了几千人，我们外交形势险恶的时候，大家表示做政府的后援，痛下决心来牺牲一切的，可有没有？即使有的，可以持久几多时候呢？可以持久到几天？是不是永久的能有这个决心？是不是还会从中被共产党反动派来利用来捣乱，并且借这个机会，来妨害我们国家的秩序，来败坏我们外交的步骤？我们要怎样的仔细想想啊！如同从前那样共产党的外交，只贴几张标语，喊几个口号，找一班民众游行，来做外交的后盾，这个现在绝对不行了。这不但不能表示优点，简直可说是暴露我们国民的弱点。列强现在对我们中国的手段，愈弄愈高妙，愈施愈险狠了，不是贴几张标语，喊几句口号，游一游行，外交就可以得到胜利的，这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对于外交，民众的弱点累次暴露出来了：第一，民众没有纪律，不听党的指挥，不肯守一定的秩序，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而且我们党员也没有指挥民众的力量；第二，民众没有真实的爱国精神，就是没有持久的力量；第三，我们只在消极方面去做，完全不在积极方面注重。这是什么呢？就是自己不努力奋斗，不积极求进步发展，而光是消极的抵抗人家。现在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十九世纪十八世纪的时候，可以关了国门来说话了。现在我们就是要关门，也不由你来关了。试问我们现在不同外国人来往，是否做得到呢？试问现在除了积极的求自强以外，还有什么方法？如果我们以后晓得从前方法是不行的了，以喊口号游行的浮气，改为不出声的沉毅刚讷的勇气；以贴标语的方法，改为百折不回卧薪尝胆的敌忾心；我想三年之后，外交上一定可以达到地位平等的目的。再讲一句，我们中国外交的条约，或者说这条对于我们中国不利，将来他可以派兵来；那条他又可以拿钱来买我们的土地，土地若给他买了，将来内地杂居的时候，外国兵要来保护他们，我们就是不得了；这种心理，就是表示中国人的恐惧性，换句说，就是怕外国人。若然，外国人到了上海，我们就退到南京；外国人到了南京，我们就退到汉口；外国人到了汉口，我们就退到四川；外国人到四川，我们退到西藏新疆；到了西藏新疆之后，外国人由中央亚西亚及印度过来一夹攻，你有什么地方去走？所以这种恐惧性和退后性保守性三个弱点，可以说是亡国的根性。我们现在国家最大弱点，就是以上所说国民的三大弱点：第一不肯守秩序、守法律，而且对内没有服从性，不肯听党的命令；第二光是消极的抵制，无抵抗的能力，不肯积极的进

行；第三就是怕外国人。这个怕字是我们中国人最坏的性质，无论那一国，无论什么人，要是怕他的敌人，那他一定要给敌人消灭的。如果我们自己能够努力，能够奋斗，还怕那一个？无论他怎么大的炮舰，无论他怎么大的陆军，我们怕他做什么？我们惟有自家团结起来，一致奋斗，才可以打破外交险恶的形势，才可以来打破现在不良的环境！我们自己能够团结，能够奋斗，管他什么条约，今天要怎么样定，明天就可怎样改？如果我们天天怕他，天天朝消极方面走，让人家，避人家，我们自己不肯努力做下去，如同从前军阀一样，国家弄得四分五裂，割据地盘，把持财政，不能统一，那就是不平等条约今天完全取消，试问你能保障明天外国不派兵来，不来占领我们的土地吗？如现在我们并没有订过什么条约，可是他派兵船到我们内河，他派兵到我们山东，我们没有许可他，他就自己来了，我们与他究竟有什么条约，那一条中间，允许他们如此呢？所以条约是没有什么价值！任凭怎么好的条约，怎么平等自由的条约，都是假的；如果我们自己不能自由平等，怎么想人家来给我自由平等，这事情绝对做不到的。所以现在的外交，完全是关于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一个很险恶的问题，但是目前这种严重而险恶的环境，我们并不是消极的行动就可以打破的，也不是一两天工夫就可以完结的。我们再讲一句，我们要取消不平等条约，是要自己国里能够团结，努力奋斗，至少要三年工夫，或慢一点，要五年十年工夫也未可知，绝不是一句空话一张纸头马上就可以取消的。各位同志：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我们不再奋斗五年十年，就令不平等条约取消了，还是不平等的。在这五年十年之中，自己只有埋了头，从早到晚，实实在在的准备，要怎么样才可以立国，怎么样才可以强国，怎么样才可以打破现在险恶的环境，我们除掉刻苦忍辱，养精蓄锐，自立自强，用了五年十年的苦工，再没有第二个方法。还有一点，对于外交上取消不平等条约有关系的话，就说我们现在二十世纪的时代，父母生我们下来做现在时代的一个人，我们 总理亦教我们要做一个现在二十世纪时代的人，无论如何，我们所讲的话，就不好讲十九世纪的话，更不好讲十八世纪的话；我们所做的事情，不好拿十九世纪的事情，到现在来讲；更不好拿十九世纪的事情，到现在来做。我们所认识的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都要是现代的，我们既做现时代的人，只可接受现时代的文化、法律、经济、政治来求自强。要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做现时代的人，才可以创造现代的国家，才可以做现时代的国民。那末，现在二十世纪时代各国所应有的国际上的惯例和法律，我们中国人自然不能居于例外，有许多的条约，在事实上对于外国是有利，对于中国是有害的；亦有于中国有益而于外国是不利的，有许多事我们明明白白晓得是有损害的，但是我们要生存在现在二十世纪的时代，要做现在二十世纪的国家与人类，可有什么方法，避免这个损害呢？只有埋了头自己刻苦奋斗，来打破这个险象，就是求我们真正的出路，要这样子，才算是积极的行动，才算是一个革命者，才能够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啊！所以我们对于外交的危险性，既然不能避免，又不能闭关自守，居于例外，一方又要要求平等，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只享平等的权利，而不尽平等的义务，如果我们要取消租界和领事裁判权，而同时又不许外国人到我们法律所及的中国国内来居住，如此，外国人到中国来，内地既然不许他住，是不是他仍旧要一个租界来居住呢？是不是仍旧要一个领事裁判权来保护他们呢？我们再反转来想一想，我们中国人在外国以及南洋已经购买了许多土地，是不是应该同外国人在中国一样的放弃呢？这种事做得到做不到呢？我以为这种条约之利害就是随国家实力和

法律来转移的，如果你国家能自强，果真是有实力和法律来保护，那么这种条约统统是可以受我们国家的制裁，是可以转害为利，转祸为福的；如果外国人能放弃他租借地一切权利，那一国今日先放弃，我们今日就可以允许他内地杂居与土地权，但是要使他遵守我国的法律，乃是真真唯一的条件。所以外交问题，如戴院长所讲的，我们全在自强，就是要自家内部团结，这样才可以来打破外交上险恶的形势，但是这决不是贴几张标语喊几句口号游一游行所可能的。现在这个时候，尤其是我们的党员，应该格外的认识这个形势，我们现在国家快要亡了，民族亦快要灭了，我们自己只有悲痛，只有奋斗，老老实实的认识我们不良的地位，危险的环境，只有忍了声，吞了气，埋了头，一点不作声，用苦工来做事，等到有了时机，有了力量，再来同他们说话。现在我们的力量未曾充足，我们的弱点，更不可暴露出来，这个样子，我们才可养成国家一个实力，来求我们革命真正的完成。诸位要知道，国际上给我们建国的机会很多的，只问我们国民自己能应用不能就是了，如果应用得法，随时可以转弱为强，转祸为福的，只问我们国民有没有这个忍耐性、持久力就是了。

还有一层，我们各同志一定明白，并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我们现在国家社会和民众在没有训练，没有组织健全以前，凡百举动，没有一件事不是暴露我们中国国民和同志的弱点。还有许多没有训练、没有知识学问的人，他到格外要讲话，偏偏要妄动，所以一动作就要乱，一讲话就是错，这么一错之后，我们全国的弱点就一齐的暴露出来，外国人更要放恣无忌，来侵略压迫了。所以我们对于现在外交的形势，固然是很好，我们凡有一分的工作做下去，自然外交上可以多收一分效力，如果我们外交形势不好，我以为完全不能怪外国人，全怪我们自己不能团结，不能统一，不能争气罢了。

其次，再提一回上头已经讲过的话，就是我们如果要建设现代的国家，做现代的人类，就要接受现代的文化，完备现代的知识，这个样子，我们国家和民族，才能不失败。我以为我们要求不平等条约完全取消，如果能团结奋斗，我相信我们预备工夫至少亦要三年，但是最多亦不过十年，然后我们国家一定可以独立自由。但是这句话并不是容易的事，决不是今天明天可了的事，也不是一年两年可了的事，更不是大家维持一两个月可了的事。所以我们国民第一要紧，就是要有组织、要有训练、要有持久性；不是忍痛须臾，更不是泄一朝之愤，所可办到的；我们一定要长久不息，我们一定要经过恶战苦斗，如此革命才有成功希望。无论那一国，他的国家强盛起来，独立起来的时候，除了冒险忍痛，统一奋斗以外，没有第二个方法。从前的日本，现在的土耳其等国，他们就全靠自己能以大无畏的精神，忍辱负重，排难解纷，来冲破这个危险，所以才有今日的地位。我们现在最要紧的，就刚才说的是要自强、要统一、要不怕，无论你怎么多的大炮，怎么大的兵舰，怎么多的军队进来，我们总是不怕。但是不怕，要有不怕的所在，这个不怕，就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准备，没有一个时候不要准备，没有一个时候可以忘记敌人。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无论什么时候，就是做梦还要梦着我们的敌人，做到一切的工作都是对敌的准备，那才能真正不怕敌人。所以不好今天讲过话，明天就忘了；今天游行示威，明天就烟消云散了。外国人常常说我们中国人的热度，不过五分钟，这就是暴露我们中国的弱点。所以对于外交，如果能自强、统一、和持久，还有一个不怕的心理；时时刻刻准备敌人一来，我们就迎头痛击，共同一致来为党为国准备牺牲，如此才能够自强自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民，才可以站脚在二十世纪时代

中间，才不至于灭亡。这个责任完全在我们党部各同志要如何来领导民众指导民众了。这种责任是格外的重大，尤其是要不怕，如若存了一个怕字，那就是亡国奴的恶根性，我们只有一个愤忾，只有忍耐，惟有忍耐才能不怕，如果没有忍耐性的人，只有五分钟热度过了之后，他一定是要怕敌人，一怕敌人，就要被敌人消灭。

还有最近一件事要报告的，我们快要开编遣委员会议了，这一个会，就是我们立国的一个很大关键，也是我们革命成败的生死关头。如果编遣委员会开成功之后，编遣委员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决议，个个军人领袖能够牺牲他自己的权利和个人的地位，服从决议案去实行，使得军队有军额，军饷有饷额，军制有编制，能够做到了这一步，那我们国家一切的问题，统统可以解决了。现在国家许多问题不能够解决，是为什么？第一件是政治社会不能稳定，为什么不能稳定？这是由于我们经济不能稳定。经济不稳定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军队不稳定。军队为什么不能稳定？就是兵饷无着。兵饷为什么无着？就是滥招兵数，兵额太多。如果军费的支出，有一定的数目，军队编制有一定的方式，军费支出有一定的机关，这样定下来了之后，一切的经济基础，就可以稳定，一切政治，就可以上轨道，军费几多，政费几多，建设费几多，都有个规定，除了规定的军费以外，不因军事多费一个钱，不多纳一文税，全国经济稳定，一切的社会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大家还要明白，我们中国现在总收入是四万万五千万，我们现在军费明白可算的，支出要三万万，而实际上各地方军队的抽剥，除了此明白可算者之外，不知还有多少，就说是只有三万万已经了不得了，军费占了全国收入十分之八以上，那国家一定是要破产的。如果到了十分之九，这个国家就象灭亡了一样的了。现在我们国家就是不能建设，经济亦没有一点基础，民生问题无从解决，那国家完全等于亡了一样。目前我们军费的总数，已经占十分之八了，这样下去，国家是一定将要亡了。所以要拿国家支出最多一部份的军费解决下来，国家经济才可以稳定，经济稳定之后，政治和社会才可以上轨道。所以必要开这个编遣委员会，使得各军事领袖明白现在国家的危险情形，大家能够牺牲个人权利地位，来求国家的独立，除此以外，就没有第二个方法。现在政府准备要开编遣委员会了，请各位同志注意，如果开不成功，或开得不好，那我们国家就完全是没有希望了，革命亦将完全失败，这样，如何对得起已死的同志和一般的国民呢？

现在国家唯一的希望就是在编遣委员会快点开成，并且要有很好的结果，能够达到我们中国统一的目的，请各位同志，对于这一点要十分的注意到。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我们牺牲了这许多同志，是为什么呢？我们 总理革命是要求三民主义实现，就是要有一个整个的国家，要一个整个的民族，要一个整个的经济，要一个整个的军队，不能够四分五裂，割据地盘，拥兵自卫，贻害国民。从前的军阀，就因为不能遵守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他们自己要割据地盘，把持财政，弄得人民痛苦流离，弄得国家四分五裂，所以国家要被外国人来压迫，所以我们中国国民党要来革命。我们实现三民主义的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我们 总理一句话要“要求中国统一”，如果中国不统一，现在的革命是假的，革命军亦是假的；假的革命就是反革命。须知中国一天不统一，我们的主义就一天不能够实现。我们从前所以要革军阀的命，就是要求整个的中国实现起来，才可以实现我们 总理所创造的三民主义，那末，现在这种国家，这种军队，我们是不是革命已经成功了呢？兄弟刚才讲了，我们革命还是刚刚起头，这就是说我们国家的

民政、军政、财政还没有统一，因为是不统一，所以随便什么时候仍要给外国人欺侮。所以我们中国一天不能统一，就一天不能脱离列强的压迫和束缚，我们就不能达到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目的，如此怎么能够算是革命？我们要能够达到取消不平等条约，要完成革命，唯一条件在求中国实实在在的统一，在求内部真真实实的团结。如果这样，我们今天订什么条约，明天就可以改什么条约，后天要取消什么条约就取消，这有什么希奇。我们后盾有组织有训练的民众和有组织有训练的军队准备着，还怕那一个外国人？那一个兵船敢驶到长江内河里来？那一国的兵可以派到我们山东东三省来？但是这种工作，是什么人做的，就是我们党员做的工作！我们党员应该担负这种责任，尤其是党部办事的同志要领导民众，要使得一般党员大家明了这种责任之重要；因为非如此不能称为革命党的党员，非如此，就会变成我们 总理的叛徒。我们为什么要一个党，要一个国家？党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领导一般民众，来实现我们党的主义，一方面督促政府实现我们党的主义，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党，所以中国要有一个中国国民党，现在我们各地的党部党员和派出去的指导委员，差不多十个有七个是很幼稚的，对于现在党的政策，对于中国社会的环境，完全不明白，完全落了从前共产党的一个老套儿，亦不想到这件事情是否办得通，做得到，同我们党有没有利益，完全不管；亦不注意做的有没有效，有没有成功，总以为到十年二十年后总有一天见效成功的，殊不想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国家亡了，还要见什么效。我们做一件事情，一天定要有一天的效力，不要闭了眼睛尽管做，今天不行，明天又重新去做，越搅越糟，弄得一般民众不认识党，对主义没有信仰。现在危险的环境已经到这个程度了！我自己是一个党员，不敢毁谤自家的同志，更不敢毁谤自家的党，但是自家的弱点总应该认识的。这些弱点如不痛改，则我们的党，我们的主义，我们的国家，绝对不能有健全和实现的希望。如果现在我们的党组织得好，党员能够听党的命令，晓得党的政策，现在的贪官污吏还能够存在吗？现在的土豪劣绅还能够存在吗？现在我们政治上不能铲除这些贪官污吏，社会上不能铲除这些土豪劣绅，是什么缘故呢？我可以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党和党员造出来的；我们党和党员不能有力量有方法，使得政治方面能够改良，这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

（转自《蒋介石政治建设言论集》）

〔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一九二九年二月）

（一）

人类历史依生存为中心之进化定律而演进。至近代三百余年来，因要求生存方法及生存组织之改造，而起一普遍重大之变革。吾党　总理孙中山先生感受世界此一重大长期变革之潮流独早，而认识其中所生基本问题之意义独深，故于四十余年前发动中国革命于东方；一方面固为领导中国人民力谋改造其己身之生存方法与生存组织；一方面亦为领导中国民族以其历史上所备具之文化能力，与世界各民族共图解决此世界的革命时期中所含之各种基本问题，而致人类生存方法与生存组织于最善之途也。然以西方各民族革命所循之途径，因其历史上地理上各种不同之因缘，一方面固已打破宗教上政治上经济上不适宜之制度；一方面则又产生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之资本主义与海外殖民竞争，造成以特殊阶级为中心之军国主义与虚伪的民主政治，于社会则酿成阶级斗争，于国际则形成海陆争霸；而弱小民族遂备受侵略与压迫，世界人类亦同蒙其祸。本党　总理深知西方各民族此种变革之经过为不合于改善生存方法与生产组织之正当途径，故于努力领导中国革命之始，即标示一精深博大之三民主义以为依，此不独足以实现中国民族生存之愿望与目的，抑且可以矫正三百余年来世界大变革取径之失也。

总理观察过去历史上之一切变革，认为当归纳为三大问题，即：民族问题，民权问题，民生问题是已。此三大问题，必须同时为之确定一连带解决之根本方案，然后可以致人类于生存最大乐利之域；而三民主义实依此旨而创造阐发以及于完成者也。过去史迹所昭示：单纯的民族运动只能产生国家主义与帝国主义；单纯的民权运动只能产生虚伪之民主制度或阶级政治；单纯的经济运动只能产生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总理旷观此等史迹之流弊，乃毅然负起三民主义之使命，以为：唯有实行民权主义的与民生主义的民族主义，始不致变为帝国主义；唯有实行民族主义的与民生主义的民权主义，始不致变为虚伪之民主制度与阶级政治；唯有实行民族主义的与民权主义的民生主义，始不致变为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此一博大精深之主义肇始于同盟会创立之时代，其后屡得世界重大事变之证实而日益彰明；至于今日，则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惟一之准则，盖为举世所公认矣。

（二）

吾党同志追随　总理孙先生之后，以实现三民主义为革命之使命。既于辛亥一役颠复满洲之君政，创立民国，以为三民主义从此可以实现，而不意事实上乃遇两种谬误之心理，遂使革命事业发生挫折：在党员一方面，咸以为清室既覆，即革命已无障碍，可

以不必依　总理预定之革命程序，此其谬误者一；在国人一方面，只存已治已安之幻想，不作求治求安之建设，殊不知专制政体虽去，反革命之传统势力犹存，破坏未竟全功，建设亦无准备，此其谬误者二。袁世凯乘此两种心理之弱点而起，遂使一切传统之反革命势力得以蚁附袁氏一人，徐图毛羽之自丰，十余年来北洋军阀之割据相循，战乱延续，实以此而阶之厉也。

自二次革命以后，本党之努力乃不能不集中革命之势力，以扫除国内军阀，断绝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强固之资援。故过去十七年间实为本党赓续辛亥革命所未完之绪业。努力之结果，袁世凯以次之南北诸军阀莫不先后为本党之革命势力所倾覆。　总理于历年艰苦奋斗之中，常虑战乱之未易戡定，人民之苦痛未易解除，革命大业之未易完成，故于十三年一月召集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以托孤之精神，将革命大任付诸全党之同志；并发布宣言，确定对内对外之政纲，同时复创立黄埔军官学校，造就党的基本武力：使党之宣传组织与武力三者得有充实之基础。是时以弹丸之广州，外与帝国主义相争持，内与跳梁之叛逆相肉搏，北则传檄中原，与曹吴诸军阀作殊死之战。而　总理更于军务政务丛脞之中，制定建国大纲，讲演三民主义，期全国同志及国民，得以了解国民革命之真实目的。迨曹吴既覆，　总理更挺身北上，冀以和平方法统一全国，召集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以绝军阀帝国主义互相勾结之根源。讵意积劳成疾，创业未半，遽尔殂谢；而以托孤之义，付与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者，至是乃简括痛切垂示于最后之遗嘱！　总理生时，终身为全国人民而致力；　总理既逝，则全党同志及全国人民，本　总理生平之期望而奋斗。故　总理之革命主义与其精神，得于其逝世后普遍深入于全国之人心；吾党是时在悲壮沉痛精神之下，接受　总理遗嘱，努力继志，肃清两广，成立国民政府。盖必两广统一，全国统一之基础乃为确立；必全国统一，革命之建设乃能真实开始也。本党既已巩固此革命之策源地，乃于十五年一月召集第二次代表大会，再布宣言完全接受　总理遗教；对于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政纲，亦无所增修，唯期见诸施行。同时更加紧努力，决定北伐大计，裁制阴谋篡窃党权之共产分子，使后方赖以巩固，而国民革命军乃在党与政府监督指挥之下而出师北伐矣。

本党以此次之北伐乃为继承　总理之遗志扫除军阀余孽，统一全国之时期。故于出师之始，由国民政府特任蒋中正同志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专命北征。誓师之日，于中央党部授以军旗，使之统一军权，严整纪律，集中党力，以制残余军阀最后之死命。大兵既出，不两越月而收合湘鄂，更四越月而赣闽俱下，江浙皖诸省次第克复。至十六年三月，大江南北完全奠定。惟此战之胜利，实由国民革命军忠勇将士之戮力，与全党忠实同志及全国革命民众之奋斗，始克获取。乃共产党徒甘受第三国际所掩护之赤色帝国主义之指挥，羼入本党，阴谋操纵，始则反对北伐，阻挠出师；继则混迹于本党之军事政治机关，乘国民革命军之胜利，而散布党羽，夺取民众，麇集武汉，逞其捣乱后方破坏革命之企图；终则压迫党军，残杀人民，排除异己，使甫由国民革命解放而出之湘鄂赣诸省人民，复陷于恐怖流血之境。是时本党鉴于彼辈之猖獗残暴，不忍以凭绝大牺牲所获得之国民的胜利任其宰割，故于四月奠都南京，举行清党。当时孙传芳张宗昌之残余势力，仍负固于山东，北方军阀，犹保持其北京政府，以抗革命势力之进展；若使共产党徒得以逞其异志，则革命大业，其不为此两种反革命势力夹攻而中坠者，几希？是故清党一举，在党为恢复固有之重心，在革命为巩固北伐之基础。此后国民革命之势力

得以群策群力直捣幽燕者，实皆以此为枢纽也。

清党以后，本党之努力；完全集中于北伐之完成。蒋中正同志再总师干继续迈进，向残余军阀猛击，斯时日本帝国主义者见其所恃以为侵略之最后工具消灭即在目前，图穷匕见，出兵山东，屠杀我军民，轰毁我城堞，致演成五月三日国际空前未有之惨案。幸蒋中正同志持之以忍辱负重之精神，北伐将士处之以严肃悲壮之步骤，全国人民复出之以卧薪尝胆之决心，遂使日本帝国主义阻碍国民革命之阴谋不得卒逞。吾人痛念此役之经过，益信　总理生平所言“吾人必须团结四万万人民为一大国族，建设三民主义的强固充实之国家，始足以生存于今日世界”之遗训至是益验。而北伐伟业，卒在此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示威之下克告完成。

北伐完成而后，本党以全国军事急待整理，遂由蒋中正同志召集各总司令于北平，商决全国军队缩编之纲要。又以军政告终，训政伊始，建设问题，不独限于军事整理一端，而国家制度，训政规模，俱当为根本之筹谋，乃于去年八月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建立五院组织之国民政府；本年一月更召集全国军事编遣会议，决议整理国军之进行程序；凡此皆本党力求依照　总理所制之革命程序与全国人民共谋和平建设之基本工作，为我国人所共见者也。

（三）

本党过去之一切奋斗经验所积之教训足以使吾人信仰益坚，用力益专者，即：三民主义之建设，至今日已不容再缓是已。今就已往之事实与现在之情势以证此一教训之真实意义，而分释之如下：

一、自党之本身言之：过去十余年间，因军阀官僚之占据地盘，操持国柄，使本党之努力事实上不能不集中于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然而以军阀官僚恶势力之雄厚，而革命之斗争延长以迄于今，吾党同志即不为生命财产之牺牲者，亦受聪明才力上之损失，致令党之人才断绝学问技能上之进展，而无由遂其为三民主义贡献确实能力之心，党之思想与意志之纷歧庞杂，实缘于此。简括言之：过去之斗争，只增高党员之政治欲望，而消磨其真实之学问与能力。此种大病，唯有以实际之具体建设可以救济。盖党之理论，本以　总理之遗教为理论；党之意志，亦以　总理之遗教为意志，不容丝毫假借。而今日党员之所以思想纷歧，意志摇惑者，乃因其个人昧于党之理论而为曲解，离于党之意志而存奢望，党固不任其咎也。然本党对于此种现象仍不能辞其匡救之责；匡救之方，唯有以具体之建设示人以三民主义之实际，则党内一切见解不纯之现象；自可归于统一矣。

二、自政治方面言之：三民主义之建设，乃国家新生命之所在。建设延缓，国家即受其病，无可疑者。吾人虽已扫除十余年来展转割据之军阀，然而国中养成军阀之环境，则犹如故也。此种环境，足使中国形成省自为政之局，战乱扰攘，必无宁日。欲打破此造成分割之环境，惟有实际的三民主义之建设，乃为不可抵抗之利器。今日好为不负责任之批评者，往往以其十余年来指摘军阀官僚政治之旧观念旧心理忖测本党之政府；殊不知今日政治设施之困难，即由此历史遗留之特殊环境，为之障碍。本党目前之任务，唯在黾勉坚忍，以求打破此环境之障碍，而非可仓卒以图功。欲使本党得以打破

此种环境之障碍，则必予本党以实施三民主义的建设之机会与时日，而尤当予本党以建设上所不可缺之一切精神物质之赞助；诚以本党革命之使命与国家生存之要求实相一致。若人民昧于此义，徒以旁观指摘之态度牵掣本党，而使不得尽力于建设，坐令过去造成分割混乱之环境继续存在，本党固不能免于疚戾，而国家前途岂有生机回复之望耶？

三、自人民现有之苦痛言之：十余年来之内战，早已陷人民于水深火热。过去之以主张立宪主张联省自治主张阶级斗争为解救人民痛苦者，其结果不特无以解救，而国家之危亡，人民之痛苦，且更加甚焉。是故证以事实，人民之要求者，不在空泛偏颇抽象之议论，而在社会秩序之安定，土匪盗贼之铲除，农工商业生产之发达，与食衣住行四大需要之得有解决而已。欲适合人民此种实际之需求，唯一途径，更舍实施三民主义之建设无由也。

（四）

如上所述，则知全国人民乃至本党自身之一切苦痛经验，皆可归纳一点，即：已往之苦痛，乃在不能确信三民主义，努力实际建设之过。今后之生路，亦即在于努力实施三民主义之建设。能如此，则一切目前所遇之阻力皆可摧毁。吾人确信建设之先决条件，必须全国人民有救国自救之能力，与暂行革命主义之决心。对于民众之宣传组织与训练，自当继续为加倍之努力。而在建设实施之先，则首当保持革命势力之统一，巩固革命所得之政权，齐一国民政府之政令，绥靖各地之土匪，以安社会之人心，裁减全国淆杂之军队，以苏军民之喘息；其有悍将暴民不从此旨者，本党当督责政府执法制裁，无令为梗于革命建设之前途，以延长全国人民亟待解救之痛苦也。

本届大会举行于党国统一训政开始之时，亦适当革命元气渐次恢复之后。就本党内部以言：三年以来艰难痛苦之经过，非一致集合于　总理遗教之下为解除人民实际痛苦而努力，无以对过去牺牲之先烈。就国家环境以言：非急起直追以实现三民主义之建设，亦无以绝帝国主义之觊觎，遏封建势力之再炽，而达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之目的，在此继往开来之大会中，全国同志，懔使命之重大，瞻前途而知奋，是用兢兢业业，秉承总理遗教，博采众议，加以审慎之讨论考虑，制定关于党务政治军事教育训政实施纲领等决议案，宣示本党今后努力之方向，以服役于全国国民。愿全国国民于此训政开始时期，依照　总理所著之建国大纲，与本党以效忠宣力之赞助，课本党以效忠宣力之责任，举国一致，勇往直前，以努力于国民革命之完成！谨此宣言。

〔附〕国民党政府的反苏反共和投降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

——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外交报告——

（一九二九年二月）

（上略）

第四章　国民政府统一外交事权

民国以来。因军阀割据。政权破裂。列强往往利用吾国分裂局势。乘瑕抵隙。避免中枢。而直接与各省交涉。以便操纵。各省交涉员偶一不慎。便受其绐。迨及中央补救即已噬脐无及。此军阀专政时代。中国外交上一大复辙可引为殷鉴者也。自国民革命军军兴以来。收复各省。戎马仓皇。政治系统尚未大定之际。军民财政机关间有便宜行事直接就地与外人交涉者。及北伐胜利。民气激昂。收回海关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事。亟待进行。外交事权尤宜统一。故国民政府于民国十六年八月四日明令统一外交职责。兹录令文如下。

国民政府训令　天字第廿二号　十六年八月四日　令外交部

为令遵事。查应付外交。宜一事权。庶能统筹兼顾。以收折冲樽俎之效。自军兴以来。统系不明。对外事件往往率由军民财政机关。权宜处理。情形既属隔阂。举措易失机宜。时与外人发生意外纠纷。以致交涉人员办理愈形困难。益使帝国主义有所借口。实于外交进行诸多障碍。现在北伐胜利。民气激昂。所有对外国际交涉。以及收回海关废除不平等条约诸端。在在均须着手急进。若于此时关于交涉事宜。不即明示限制。以专责成。势必毫厘千里。易滋贻误。殊非所以慎重外交之道。兹经第一百十六次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嗣后凡军民财政各机关如有与外人发生关系之行动。应先向外交主管机关商酌。然营办理。使外交职责。得以统一。案经议决。亟应通饬切实遵行。除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并转饬所属一体遵照。勿违。此令。

此国民政府统一外交之政策。军事期间。外交主管机关职权既经明定。办理国际交涉益手矣。

第五章　国民政府废约政策之重提

十六年三月廿四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四月十六日。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遵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建都于南京。对外政策前已一再宣言。以取消不平等条约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约为主旨。昭告中外。是年八月十三日。外交部伍部长代表国民政府又郑

重宣言。凡从前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现今无存在之理由。当由国民政府以正当手续概予废除。至此等条约中规定修改期限而期限已满者。更应即予修正。由国民政府与关系各国分别改订新约。嗣后任何条约协定非经国民政府缔结概不发生效力。是为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废约及改约之正式表示。其宣言如下。

一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关于满期条约之宣言（八月十三日）

国民政府秉承孙总理遗训。以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约为职责。此项宗旨迭经宣示中外。现在各方请求废约之函电频来。具征我国民回复国权之热望。本部长兹代表国民政府郑重宣言。凡经前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现今再无存在之理由。当由国民政府以正当之手续概予废除。至此等条约中规定修改期限而现已期满者更应即予终止。由国民政府与关系各国。分别改订新约。嗣后任何条约协定非经国民政府缔结。概不发生效力。特此宣言。

是年十一月二日外交部又有关于条约之宣言。其文如下。

一　国民政府外交部关于条约之宣言（十一月二日）

国民政府以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约为职责。迭经宣示中外。本部长兹代表国民政府特再郑重宣言。一、凡从前北京政府与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现今再无存在之理由。当由国民政府以正当之手续概予废除。此等条约中规定修改期限而现已期满者。更应即予终止。由国民政府与关系各国分别改订新约。二、各种条约协定非经国民政府缔结概不发生效力。特此宣言。

此次宣言由部备照会分致驻北平英和德比丹日美法日（即西班牙）挪葡义瑞典巴西瑞士墨秘古巴智利苏联芬兰等国公使或代使。凡此种种皆对于取销不平等条约应有之步骤也。

十七年二月十日国民政府任黄郛为外交部长。于二十一日就职。宣布外交方针。其中有关于条约事项者摘录之如次。

现经公认为不平等之中外各约。国民政府为欲促其早日废除起见。当并力准备。切盼最短期内得与各友邦开始商订新约。以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为基础。

四月二十八日为中葡友好通商条约（光绪十三年十月十七日即西历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一日订立）第四个十年有效期间期满之日。黄部长据上述宣言第一项所称中外条约规定修改期限。而现已期满者。应即修正另订新约之办法。于十七年四月十六日照会驻华葡使。声明废止。由中葡各派代表以平等互尊领土主权之原则为基础。另订新约。并由吾国驻葡京公使致同样照会于葡国外交部。葡外部曾有复文赞同订约。七月中旬王部长重提另订新约之交涉。至十二月十九日遂签订新约焉。

第六章　撤消俄领承认案

一　广东事变之发生

广州事变发生于民国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经三日而乱平。其经过情形。张发奎等元日报告靖乱通电言之甚详。节录其文如下。

本月十一日上午三时共产党徒探悉我粤护党军队出防各属。乘广州市内部空虚机会。纠集赤化的农工。勾结一部分不肖的军队。突起窃踞省垣。霸占财政民政机关。围困河北各军部各警区。即日设立苏维埃共党政府。派出共产暴徒。焚杀抢掠。先由长堤中央银行起火。幸行库坚固。银毫纸币毫无损失。惟火势蔓延两日夜。民居商店被毁害者。不知其数。民众稍与抗阻。即被枪杀。俯首侧目。任令焚劫。莫敢谁何。全市骚然。独河南一隅。未被殃及。发奎等以变起仓卒。十一日即督率海军各舰巡逻海面。制止共贼渡河。一面飞调市外各军旋师靖乱。第五军陆团于十二日夜沿粤汉铁路由韶回省。先行占领观音山。同时第五军周团又回师占领黄沙车站一带。十三日晨第五军驻河南部队联同第四军回省各部及新编第二师第三旅等部渡河猛攻。战仅移时。共产党徒知势难支持。遂即分途窜匿。现已严密搜索。跟踪追剿。务期灭绝根株。并将当场拿获指挥作战之俄人十名枪决示众。一面召集各机关职员协同安抚人民。回复地方秩序。（下略）

此广东事变之经过情形也。

一　国民政府明令撤消俄领承认

此次事变。究其原因。实由于共产党徒借在粤苏俄领馆。及其国营商业机关。为发令指挥之地。其在国民政府统治下各省之俄领馆及国营商业机关。亦恒为宣传赤化藏匿共党之所。若不严加取缔。何以杜绝乱源。故国民政府于十二月十四日照令将驻在各省之苏维埃社会联邦共和国领事。一律撤消承认。所有各省之苏俄国营商业机关。一并勒令停止营业。着由外交部督率所属。并会同主管机关。妥慎办理。兹照录令文如下。

查国民政府统治下各省之苏俄领事馆及其国营商业机关。恒为宣传赤化藏匿共党之所。本政府迭据报告。早有所闻。徒以顾念邦交。未即深究。本月十一日广东事变骤起。共党占领省垣。断绝交通。焚毁全市。肆行杀戮。究厥原因。皆由共产党借苏俄领事馆。及其国营商业机关。为发令指示之地。遂致酿成剧变。势若燎原。即其他各省地方。亦不无暴发之虑。本政府为维持治安。预防蔓延起见。势难再事姑容。以遗党国无穷之祸。应即将驻在各省之苏维埃社会联邦共和国领事一律撤消承认。所有各省之苏俄国营商业机关应一件勒令停止营业。以杜乱源。而便彻究。着由外交部督率所属。并会同主管机关。妥慎办理。具报。此令。

一　外交部遵办此案之经过

外交部伍部长遵即令行特派湖北江苏广东交涉员遵录命令照会苏俄领事。并由部拟具办四条。

一、由各交涉员向苏俄领事声明。自即日起对于该领事撤消承认。并备具护。照酌定最短期间。嘱该领及领馆人员离境。

二、所有苏俄国营商业机关。如银行及轮船公司等应一律勒令即日停止营业。并派警严密监视。其停止营业后之详细办法。俟本部会同各主管机关商定。再行令知。

三、详查辖境内俄籍侨民确数。其并无正当营业而形迹可疑者。应随时侦查拘禁或驱逐出境。

四、凡俄籍侨民均应领取外侨执照。

令饰各该交涉员迅即遵照会同地方官妥慎办理。并咨请各省政府查照。惟上项办法与财政交通司法俱有关系。故由外交部咨请财政交通司法各部派员会商办理。苏俄商业以沪汉为机枢。而在上海者尤为重要。遂由外财交三部商定设立处理苏俄在沪商业临时委员会。各派委员一人组织之。以特派江苏交涉员为主席。该会所办各案。当于下文另叙之。请先言苏鄂交涉员遵办此案之经过。

一　江苏交涉员遵办此案之经过

特派江苏交涉员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呈报称奉令遵即函致驻沪俄总领事查照。并备具护照限十日有效。请其率同馆员离境，函请上海临时法院将苏联国营商业饬捕查明。一律勒令停止营业。并派警监视。此外则登报布告苏联侨民限一星期内来署领取执照。如愿离境。亦应于限期内来署领取护照。以便出境。至于详查辖境内俄侨确数分别侦查拘禁或驱逐一节。则函市政府及临时法院分别照办。外县则函江宁镇江苏州三交涉员就近核办云。

一　湖北交涉员遵办此案之经过

特派湖北交涉员于十二月二十四日呈报称。程主席寒日饬卫戍司令部于本月十六日上午七时。由卫戍司令部派兵。将第一二两特别区及苏俄领事馆包围。令俄领即时离馆。以便搜查。该领事要求携带馆员等到交涉署暂驻。经甘交涉员许可。随由司令部来函限该领事等于二十四小时内离境。由交涉署备具护明代购船票。即晚离汉赴沪回国。先是十六日晨甘交涉员会同卫戍司令胡。率军队搜查俄领事署。惟该署于一星期前已得撤消承认之消息。谋乱人证一无所获。惟在他处查获本国及俄籍嫌疑犯多人云。此苏鄂交涉员办理此案之经过情形也。其关于俄侨领取执照之办法。原为俄侨有正当职业居留中国者而设。江西厦门江苏汉口各交涉署办理发给执照情形。俱有报告。俄侨已领执照而欲往他埠者。且至交涉署领取护照焉。此江苏交涉署之办法也。

一　德领代管俄领署及俄侨事务

苏俄领馆经撤消承认后。俄政府请求德国政府令饬驻华德领署代管苏俄领署。及保护俄侨事务。驻沪德领于十二月二十三日至江苏交涉公署声称奉其本国政府电令办理上项事务惟不含有外交及政治上之任务等语。经郭交涉员表示同意。并声明在德领办理上项事务。对于我国处理苏俄事务之一切法令。不得有所违背。并经外交部指令准予备案。驻汉德总领事。亦致函甘交涉员。称奉本国政府训令。因苏维埃政府向其本国政府请求保护其在中国国民政府区域内之苏维埃人民及苏维埃利益。及保管在汉俄领馆。令饬该总领事受此项任务。但声明不干预内政。甘交涉员请示办法。亦经外交部指令准予备案。

以上为外交部办理对俄撤消承认案经过情形之大概。自拟定四项办法以后。各主管机关办理此案时皆奉为标准焉。

一　处理上海苏俄商业临时委员会办案情形

处理苏俄在沪商业临时委员会遵部令于民国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成立。外财交三部各派委员一人。上海特别市市政府亦由外部函请派员参加。该会所办案件如下。

一　监理清理远东银行　远东银行以接济共产党款项之嫌疑。曾于是年七月中旬（十六日）经政府封查。外交部伍部长遵令派委员三人密查多日。此次国府明令取缔苏俄国营商业机关。处理委员会即委派哈士根会计师等自十二月二十五日起着手清理。嗣后该银行呈请复业。中国茶商亦为之声辩。外交部以其关于中国商业至巨。经该委员会查明核准在监视之下继续营业。由会呈请外交部备案。

一　监视清理俄国协助会洋行　是为俄人在中国采办茶叶之机关。苏俄采办茶叶原设有全俄茶叶托拉斯。十六年二月即归并于协助会。沪汉两埠均有行栈。每年运销华茶不下千余万两。自十二月二十三日加以监视后。上海茶业会馆为之声辩云。该行系在英政府注册之俄商公司。非苏俄国营商业机关。呈请准予复业。该行亦有同样请求。上海方面之俄国协助洋行即由委员会查明。经部核准。派员监视。任其继续营业。汉口方面之分行亦准其仿上海办法复业。

一　其他案件　苏俄纺织公司。经查明为苏俄国营商业机关。则勒令停闭。苏俄驻华商务处。经查明其营业已结束。其人员亦已离沪。中东铁路经理处以其为中俄会办事业。则派员监视。准其继续营业云。

国民政府素重邦交。为铲除乱源起见。不得已而撤消苏俄领事承认。停止其在华国营商业。盖亦忍无可忍。最后始采断然之措置也。

第七章　宁案解决之经过

一　宁案之发生

民国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之际。共产党煽动少数军队。对于在宁英美日本等国领馆及英美法日意等国侨民。加以侵害。美英停泊南京江面之炮舰。向城内萨家湾开火。对吾国人民生命物质上加以损害。此即宁案之大概也。

一　美英法意日五国代表提出条件及声明书

宁案发生之后。汉口美英法意日五国领事于四月十一日向武汉外交部长陈友仁及蒋总司令提出条件及声明。要求三点。一、惩办此案之负责者。二、书面道歉。三、赔偿。陈部长于四月十四日分致五国照会送汉口五国领事分别驳复。

一　宁案交涉及解决之经过

此案牵涉有五国之多迁延不决者经年。至黄部长任内始著手正式交涉。民国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黄部长首先与美公使谈判此案。议定大纲。三月三十日外交部致美马公使照会声明国民政府愿据上述大纲。准备立即解决中美间宁案。并声明此案之发生。实由于共产党之煽动。但中政府仍负其责。肇事人业已惩办。对于美国政府代表等有不敬之处。领馆暨侨民受有生命财产上之损失。深示歉意。并担负继续切实保护之责。并依照

国际公法通行原则。担任赔偿损失。提议组织中美调查委员会。以证实美人从有关系之华人方面所确受之损失。并估计每案中所应赔偿之数目。美公使接此照会后，即复黄部长照会。要求从速履行惩办林祖涵并承受黄部长去文内所开各节。认为因南京事件而发生各问题确切解决。

其美国停泊南京江面之诺亚及泼利司登两军舰向南京城内开火一节。黄部长要求美国政府对于此举表示歉意。美马使接此照会后。即复照会。声明当日炮火为保护炮。实为不得已采取之手段。美国政府。深为抱憾云云。此中美宁案交涉及解决之经过也。

中英间宁案至民国十七年八月内开始谈判。八月九日王部长致照会于英蓝公使。其措辞与黄部长致美马公使照会相同。惟调查损失委员会。则由中英合组。蓝公使接此照会后。即复照会。代表其本国政府承受上述之照会。认为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致前外交部长公文中所列之要求。业已解决。

其英国停泊南京江面之爱末拉尔持军舰向南京城内萨家湾开火一节。王部长于八月九日致照会于蓝公使。代表国民政府要求英国政府对于此举表示歉意。蓝公使复外交部照会声称。当日所开炮火实为保护炮。处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南京情形之下。不得已采取此种手段。英政府深为抱憾云云。此中英关于南京事件交涉及解决之经过情形也。

中意宁案于去岁十月内王部长致意国华公使照会。关于意人生命之丧失一节。表示歉意。并提议组织中意联合委员会。以估计该项损失。华公使复本部照会。称代表意大利政府承受本部照会。认为南京事件业已解决。

中法宁案亦同时解决。王部长致法国高代办照会。除道歉外。声明赔偿法侨所受身体上之伤害。及财产上之损失。提议组织中法调查委员会。以证实上述两项及每条中所应赔偿之数目。高代办复照会承认此案解决。此中意中法宁案交涉及解决之经过也。

吾国与美英意法四国间关于南京事件业已完全解决。惟中日间宁案虽经双方交换意见。现仍悬而未决也。

第八章　济案交涉之经过

一　日本出兵山东案

国民革命军克复南京后。渡江北伐。逼近鲁境之时。日本政府突有出兵山东之举。此民国十六年五月间事也。国民政府外交部。以日本此种举动。实属侵害我国领土主权。曾提出抗议。未久而撤兵。迨国民革命军再度北伐。日本又有出兵山东之议。黄部长立即提出抗议。请日本政府迅将所拟派赴山东之军队一律停止出发。而日本政府竟置若罔闻。借口于自卫措置。从本国派出兵士约五千名之一部队。分驻青岛。以及胶济铁路沿线。于该部队未经到达以前。暂将驻屯华北军中之三个中队派往济南。迨及日本侨民保护上。实认为无派遣军队之必要时。派遣军应行从速撤退。此驻沪日本总领事转达之日本政府出兵山东声明书之主旨也。外交部接此项声明书后。认为日本此举明犯我主权。于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再度严重抗议。仍未发生效力。而济南遂有日本军队驻扎矣。

甲　济案之发生

国民革命军于五月一日克复济南。三日上午在济日兵无理启衅。对我驻军及民众肆意射击。当由蒋总司令严令我军离开日军所占区域附近。并令高级军官驰往日军司令部。磋商防止冲突办法。乃迭遭侮辱。迄无效果。日军并以机关枪四出扫射。又屡屡开炮轰击公署民房。派队侵入交涉公署。将特派山东交涉员蔡公时与在署职员十余人一同枪杀。黄部长办公处亦遭有组织的射击与搜索。中国兵士人民死者不计其数。并侵入我军驻地。勒逼缴械。我军隐忍不与抵抗。三日晚十一时当我高级军官与日本黑田参谋长商议善后办法之时。日军竟放大炮五次。并派兵毁我无线电。四日日军所占区域附近。无一华兵。尤复不断射击。交通阻隔。全城辍业。比当时日本在济南肇事情形也。

乙　我国之抗议及日本第三次出兵

济案发生后。黄部长即根据事实。照会日本田中外务大臣向日本政府抗议。请即电令在济日兵先行停止枪炮射击之暴行。并立即撤退蹂躏公法破坏条约之驻兵。一切问题概由正当手续解决。并声明保留所有应行提出之要求。而日本政府毫不悔祸。日军则占据济南虐待我国人民如故。

五月十日驻宁日本领事送交外交部日本政府第三次出兵山东之声明书。称济南不详之事发生。为保护山东日本侨民及确保胶济路之交通。故增派第三师团前往山东。同时拟由日本派遣五个中队赴津。以抵补驻华军队之调赴济南者。并拟派海军至长江及华南一带以保护日本侨民之生命财产。于必要消灭时。随时可以撤退。日政府借故增兵。其心叵测。威吓手段。充量施用。当时国民政府因欲迅速完成北伐。统一内部。再谋对外。故暂时隐忍。日兵强占济南。横断津浦路线。阻隔交通。使国民革命军不能照原定进兵计划进行。北方军阀得苟延残喘。然国民革命军仍猛进不已。卒将直鲁军扫除。完成北伐。此则非日人作梗所能阻止者也。

一　日本政府之觉书

日本政府见国民革命军北伐进行着胜利。京津行将克复。又借口于维持东三省秩序。于五月十八日送致觉书于外交部。声称"目下战乱情形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方面亦将有蒙其影响之虞。缘以治安之维持。在我国最为重要。如淆乱该地方治安。或有造成淆乱原因之事情发生。我国政府应须极力阻止。故战争进展至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满洲之时。我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有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置。惟对于交战者自当力持严正中立之态度云云。"日本政府侵犯我国权可谓不一而足。

外交部接此觉书。即行驳复。谓希冀实现我国永久和平与统一之军事行动。已发展至最后阶段。国民政府对于军事区域事前之布置。与临时之保护。自当为周密之注意与部署。东三省方面商务繁盛。外侨众多。国民政府对该地治安问题。将以妥善之方法。使各国人士咸得安全之保护。日本政府觉书中所称为维持东三省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置。干涉中国内政。且与国际公法上列国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之原则显相违背。国民政府万难承认云云。此北伐期间中日济案交涉之经过情形也。

一　济案最近交涉之经过

此案迄今悬而未决。自去年五月三日后日军盘据胶济一带扣留津浦车辆。阻挠交

通。强占胶济路二十里内行政机关。干涉我内政。蹂躏鲁省同胞。蔑视我国主权。日本帝国主义横暴之真相毕露于世。国人茹痛至今。此真我国外交史上一大问题而亟待解决者也。王部长自去年六月八日奉命长外交以来。此案未尝一日忘怀。就职未久。即与日方非正式交换关于济案之意见。十月内驻沪日本矢田总领事奉其本国政府命令来京会谈济案。前后凡三次。我方均提出先撤退驻鲁兵。再讨论其他问题。矢田以是终于废然而返。最后我方与之提出撤退日兵。津浦通车。交还胶济路二十里内行政机关。悬青白旗。胶济路一带土匪由中国方面负责肃清。保护日侨等办法。矢田曾将此项办法请示本国政府。一月十八日得训令表示赞同。嗣后推翻原议。最近日本芳泽公使来京。此案之会谈重开。讨论业经六次。第五次会谈在二月四日下午开始。至五日晨止。我方提出日本政府须先确定正式撤兵日期再谈其他问题之条件。日方表示日政府有撤兵之诚意。惟撤兵后山东治安问题。及如何保护日侨均应提出讨论。我方以此为中国之内政。日方无权过问。拒绝讨论。后日方允俟第五次会议事毕。即将详细情形报告日政府。并请示撤兵日期。日方并提出赔偿惩处等问题。亦经我方拒绝。嗣将解决济案细目大体谈定。一、日本无条件撤兵。二、济案责任问题及赔偿问题。组织中日联合委员会。赴济实地调查。再定办法。赔偿以对等为原则。三、蔡公时被杀事。日方另行道歉。此第五次会谈之经过情形也。

八日王部长复与日使芳泽会谈将双方派定之委员整理之具体办法。作一度之审议。据日使称奉本国政府命令。对于前定具体办法。将有所更改。致将已谈定之草案全部推翻。我方提出严重抗议。日使则意殊坚决。会谈遂告停止。此第六次谈话之经过也。

日本方面对于济案交涉之成议任意推翻。可见其对于解决济案。目下似欠诚意。此次会谈几濒于破裂。其责任完全在日本。我方惟有仍坚持原议。俟其觉悟再与交涉耳。

（转自《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

〔附〕国民会议开会词

（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

蒋中正

兹值全国统一训政建设开始之时期，恭逢国民会议之盛典，聚举国之彦英，汇全民之公意，协力同心，共定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民族进取图存之长策，中正怀欣忭之忱，仅代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敬向国民会议致庄重之敬意！

中国国民党总理　孙中山先生手创民国，身殉革命，定三民主义为救国惟一之原则，而以国民革命为其实现之途径，整个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民族复兴运动也。其所负之责

任，断非仅做到消除军阀及帝国主义之障碍，而必须确定民族自存自立之基础。凡国家之自由平等，断非衰弱颓废，散漫怠荒之民族可以求得者，必须重振生力，发为自信，集其谋勇，持以恒毅，善择固执，历折不挠，此正 总理人格之伟大，足为民族复兴楷模者。昔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本党同志本其初步之自信力，以为必能扫除军阀，底定中原，虽历艰挫，终成事实。今本党愿与全国同胞，更进一步确定建设之自信力，深信中国民族有建设能力，政府与人民有建设诚意，同心合作，尽全力以赴之，建设事业，自无不成，民族地位，自得平等，世无能自强自立而不受人尊重者。否则虽能发扬蹈厉于一时，终属外强中干，不能持久，此我全国同胞所以应转移心理另从历史新页上着眼者也。

总理倡导革命，四十余年，民国之缔造与保全无一事不瘁我 总理之心，无一处不洒我先烈之血，丰功伟迹，自在史篇，追念前修，能无肃起！犹忆 总理为全国之和平统一，力疾北上，待弥留之时，尚以“和平统一救中国”为念，而以速开国民会议，载在遗嘱。国民会议之使命，在于本和平统一以救中国，此 总理之苦心，为天下所共见者。当时北京执政府违背 总理主张，不肯召集，本党烛见军阀故智，知中国之和平统一非可偷安而得者，国民政府乃秉 总理遗教，受本党重付，于民国十四年七月一日，成立于广州，十五年四月，复有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之通电，竟至毫无反响，六月六日，授中正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命，七月九日誓师北伐，自此武装同志，秉其笃信主义之精诚，虽膏肝脑于原野，暴白骨于榛莽而不惜；此长期之奋斗，正昭示吾人以统一之艰难，约计时期，可分以下数个阶段：自广州誓师，以至击溃吴佩孚于武汉，消灭孙传芳于东南，尊重 总理遗志，奠都南京，毅然清共，以正国民对于 总理主义之认识，对于本党政策之了解，复继续北伐，底定徐淮，此第一阶段也。此阶段为期至短，中原犹未统一，中正复因武汉业经清共，为顾全革命力量之团结，以对抗北洋军阀计，遂决心下野；不意虽有所谓宁汉合作之通称，而党统竟以中断，在此阶段诸事停顿，惟龙潭一役，足以昭示国民革命军见危受命之精神，而巩固定都南京之信念，此中正深以为慰者，此第二阶段也。此阶段去统一之局尚远，十七年一月，中正奉命复职后，即积极进行北伐军事，四月底肃清徐兖，五月一日克复济南，而三日竟遭日军之横阻，致有济南巨创深痛之国耻纪念，六月收复平津，东北服膺主义，全国统一，此第三阶段也。乃统一未久，而变乱旋生，十八年桂系叛变于前，张冯称乱于后，几经讨伐，粗告平定。于是阎逆锡山复挟冯逆玉祥以自重，表里为奸，取求无已，招集流亡，聚谋反动，于是有十九年五月之大叛变，亦系军阀集团之最后挣扎，赖将士用命，人心所归，东北军奉命入关讨逆，剧战六个月，战线数千里，中央与逆军相持于前方之兵力，合计过于百万，溽暑遄征，卒平大难，而寄生于军阀庇护下之扩大会议亦随之崩溃，国家遂得重告统一。中央乃克谨遵遗嘱，召集国民会议，以奠永久统一和平之基础。自国民革命军北伐迄于讨伐冯阎军事告终，我革命将士之死亡者已达三十余万人，伤者且倍于此，民众生命财产直接间接由战争而受之损失，何可胜计！国家财富之耗丧更无论矣；迭次中央非至万不得已决不用兵，毒蛇螫手，壮士断臂，苟非危害生命之安全，孰愿忍受体肤之支解，每一念及战时将士之牺牲，民众之痛苦，五内辄为之摧折！孰不厌乱？谁无父母？凡此空前重大之牺牲，悉为此次统一和平之代价，此我全国同胞于痛定思痛之余所应深刻认识，一致爱护而尽全力以保障者也。

欲求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以达于宪政时期，须首经训政时期，此 总理政治主张之独到处，亦系中国现实环境之所必需者，今统一告成，训政得以实际开始，故国人对于训政之理论应有正确之了解，方不诱于浮言，惑于煽动，昔 总理曾于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详细分析立宪派，和平会议派，联省自治派，商人政府派诸说之谬误，果也，日月既出，爝火尽销，时势已更，他说迭起，综察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虽形式互殊，而其理论之立场，大要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而主党者主其二，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识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国家主权，既为神圣纵横发展，遑恤其他，国际上之影响，是否合于大同原则，不待智者而知。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以唯物史观为立场，依定命主义作推论，识国家及统治权系与阶级合为一体，以为昔者由资产阶级，据为己有，今则无产阶级亦当据为己有，以消灭其他阶级，待其他阶级消灭尽净，乃可同跻于共产社会，国家亦即从此消灭，故以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消灭反对者之过程，虽列宁亦难为之预期，但断其必久，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本以个人名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英美民治，本其长期演进之历史，人民习于民权之运用，虽有时不免生效能迟钝之感，然亦可进行，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党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他邦议会政治之弱点已充分暴露，而予论者以疑难，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否则发言盈庭，谁执其咎，此事之最可痛心者。总之，每国各有其客观的环境，世间决无可以完全移殖之政治，此 总理之必须融汇中外学说，研究国内实况，而后可以定医国之不易良剂也。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系 总理所亲定，最后之目的，在于民治，而所以致民治之道，则必经过训政之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政治经验之民族，是非借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况既明定为过渡之阶段，自与法西斯蒂理论有别。至民族主义必与民权民生相提互证则绝无流于国际侵略之危险，而以大同为鹄的可知矣。 总理首创民生主义，以谋全民族之生计与生存，绝对无需于阶级斗争之手段，国内乃有倡英美十九世纪初叶自由民治之说以相炫者，其说至无足奇，其具体表现亦不过议会政治，不知 总理在民国十三年以前，不但为力事赞助国会之人，而且迭兴护法之役，播迁流离，集非常国会于粤于川，可谓劳矣，然第一届国会之经过，无一不与人以惨痛的失望。以后自安福国会，以至曹锟贿选国会，亦无一不启人鄙视厌恶之心理。以言宪法，则自天坛宪法以至曹锟宪法，果何如者？此种经验，国人当不能尽忘。若谓得此即可以致郅治，是何异挟此以自欺，筑室道谋，将何补于紧急之时艰？况帝国主义之侵略，军阀之叛变，共产党挟其国际背景之军事行动，决非可以犹豫之心理，无谓之辩论所得而却之者，即使主张民治，高唱自由者，各据议席，任其论安言计，动引西人，亦不过非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共产党军阀坐大于中原也。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而中国伟大且有光荣历史之革命集团厥惟中国国民党，本党缺点自不能免，然本党既为公开之革命集团，完成中国统一，担负建设使命，

国民自不能外之而稍存歧视之心；本党为中国国民党，国民外之，即所以自外，若存歧视之心，是无合作以从事于建设之诚意，首蒙其害者，厥为全体民族，并由全体以及于本身。本党为抱三民主义救国者，人人所得而参加之党，训政亦正赖人人之协力，乃克有成，本党立救国之决心，政府持坚强之意志，努力从好处做去，此中正所以不惜瘏口哓音，希望全国同胞对于此点有深刻之认识与觉悟也。

欲求此后政治之有成效，当认清过去之事实，并析其客观的环境，而承认过去政治的失败与错误，尤为从事政治者应有之道德。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中央固属确立，但国家仍常陷于军事时期，两次北伐，再度西征，张桂叛变，继以唐冯，至十九年虽系训政开始年度，而该年军事较任何往年为激烈，地方受军事之影响，政令受军事之影响，财政交通无一不受军事之影响，检点过去政治情形，每多增人愧愤者！以言物质建设，则因军兴无款，复因战事而无法吸收外资，虽举办甚多，然成效少见。如兴办公路一项，民国十五年全国仅二千公里，至十九年增至五万一千二百公里，为足差强人意。然以中国幅员计之，亦已仅矣。至筹办建设，不能集中财力，举其扼要者，致呈支离割裂之现象，亦此后所当引以为戒者也。以言铲共剿匪，因前方大规模作战之时，无兵可调，致星星之火，逐渐燎原。以言禁烟，则政府虽有禁绝之决心，但在军事期间，各处庇种之情形，无从制止，而租界未能收回，遂成烟土盗匪荟萃之渊薮，即无中国产土，外国产土亦能作充分之供给，此决非认中国产烟为当，乃事实如此，为政府禁烟决心之大障碍，而系必须认明之事实也。以言银价低落，则事关国际市场，竟无有效救济之方法，因战事而国民生产减落，更鲜向世界市场易取现金之货品。以言外交，则不平等条约之缚束，迄未能完全解除，各国每存观望之心，以静俟中国全国之统一，大局之稳定，每逢国内战争发动之日，即外交机关，清净无为之时。以言吏治，则贪污之风，迄未扫清，政府固不能卸责，于监察制度之未及早实行，而一般风气之坏，亦大半由于战争频仍，社会无固定秩序，与正当轨道以范围之。以言赈灾，则如西北灾区之扩大，死伤之枕借，而政府竟无法可以施赈，即艰难筹发之赈款，亦完全化为冯阎谋变时之饷糈。每念内战所遗害于国家者，不禁太息痛恨于军阀叛乱者之毫无心肝也，自十九年十月军事粗定以后，国民政府乃有大规模着手施政之可能，故亦决不负此时机而约略有所建树，特举二事，以告国人：

（一）裁撤厘金及与厘金类似之苛捐杂税，实为扫除半世纪以上重大弊政之设施，为三十年来人民迫切要求，而历来政府虚声号召，终归不忍裁撤者，今一旦扫尽，其于国货国产将来发展流通上之影响可知，但此事之彻底完成，尚须赖政府与国民之共同监察，所惜裁厘之利，适为银价惨落之损失掩去一部分，不知如厘金不裁，而银价惨落，国民在经济上更无法忍受也。

（二）关税自主，为中国经济生存之所关，国货之不振兴，工商业之无法保护，胥由于关税自主权之丧失，历来国人抗争，他国一意以延宕为能事，乃于今年由国民政府收回自主权，此事对于国民生计关键之大，惟将来之事实可以证之。

他如收回法权问题，多数国家，均已承认，惟有三国尚在观望，但不久必可达到政府完全之目的。江西湖南剿共军事，有显著的进展，其主力即将击破。导淮筑路工程，顺序进行。中央银行之信用日增，资产加至二万万元国币。凡此诸端，政府决不敢引以为满足，特别关于外交方面，非努力进行达到完全取消不平等条约不止。然此等昭苏景

况，未始非七个月来统一和平大局之所施，此我同胞对于统一和平价值之应有认识也。

欲充分了解统一和平之可贵，及其对于将来民族生存问题之影响，应更进一步，分析国际的与国内的实际环境，知他人之虚实，为本身之检点，乃谋国所必要者，请先察国际的趋势，而尤重其经济发展之方面。

（一）目前国际间普通之危机，厥为经济恐慌，失业人数有增无已，生产过剩，为一般人所抱之隐忧。大战后欧美日本各国生产量之增加，自系显著之事实，但生产而至于过剩，则各国工人农民又何曾皆能享受相当标准以上之生活？专门理由，自多聚讼，要其主要症结所在，仍系分配之不平均，苟此种制度不变，则欧美日本各国之货宁视其国内一部分人缺乏享受，然为经济利益计，必须移之于他国，此种分配制度一时既难变更，则帝国主义之经济侵略亦决难中止，此产业落后而经济抵抗力薄弱如中国者之所可虑也。

（二）以上就资本主义之国家而言，即就以共产主义号召之苏俄论，当其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亦系世界商场上竞争之新势力，以一万三千余万人口之总动员，运用八万兆卢布之资本，将全俄农场工厂作集产的科学生产化，其规模自有可观，设其成功，生产力亦自未易侮。今苏俄更缩短五年期为四年期，以求从速完成，即就其在中央亚细亚所经营之产棉事业而论，其突飞猛进之数量，势将以中国为尾闾。况其一四四五公里环绕新疆边境以联接西伯利亚干线之新路，已于去年竣工，与深入我国东北之中东铁路左提右挈，势成常山之蛇，疆域衔错，绵亘万里，无论军事经济宣传各方面，国人皆应严重注意者也。

至欧美日本各国政治军事之大势，自不必一一列举，至少近五年内，欧美国际间之政治军事问题，尚在经济支配问题之下，如缩减军备之能否成功，尤其海军分配问题之能否圆满解决，以及法国之边防，意国之海外发展，皆关系国际和平之大势，世界武装和平之局面，已成无可讳言之事实。我国家本其酷爱和平之心理，极力希望世界和平，但万一不幸国际间有战争暴发，我国至低限度亦当有充分自卫的准备，且进而谋国际地位之进展，处于今日之世界，我同胞对于国际环境，尤当不断注意，以谋深刻之认识，而图国家之适应。

回顾国内的实际环境，不能不令人惭愤悲伤者；但疾者不能讳医，科学研究，当先以事实为对象。中国积贫积弱，百孔千疮，尤以失业与生产落后，为最大病根；如人民教育之不普及，政治经验之缺乏，与自治习惯之从未养成，亦为民族进展途中之重要障碍。目前中国社会演化，尚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初期，而他人进展已超过一世纪以上。替代中国手工业者，最大部分非国内之机器工业，而系他国之机器工业。与中国劳力相争持者，最大部分非中国之资本而系他国之资本。中国统计事业发达较迟，复因军事频仍，致失业调查迄未举办，要其总数当可驾世界任何国家而数倍之。仅就各处所见，则土匪流氓，何莫非因受工业革命排斥而失业者？他国工厂夺其手工生计，本国复无工厂以事容纳，加以水旱灾馑战事，使失业者愈加增多，而社会安定亦因之摇动，每一念及中国生产落后之情形，苟非事实俱在，几有不能自信者。以中国四万万以上之人口，一〇七三五四五四公方里以上之疆域，而全国铁路仅一二三三五公里，公路近年方才发达，亦不过五一二一〇公里，尚多系土路，航线包括沿海内河，不过一二九八八公里，商轮总数仅四三九六一七吨，其中英日外商经营者为三二六一三七吨，尚有挪威等国外商不定

期船只二三六〇〇〇吨，未曾列入，国外航业更无可言矣！至于全国造船能力，每年不过一万吨，有线电线长不过九一一三〇公里，电局不过一一〇五所，平均两县方得一电局，无线电机除军用外，不过一百十余架，商用飞机虽最近有沪宜平京两航线，而飞机不过二十架，全国矿工连盐类矿业工人在内，约计一百万人，至他种真能有相当规模，利用机器以生产之工厂内所雇工人，为数尚不及此。就国内之工厂资本而论，则外资数倍于华资，自今年关税自主以后，外商复转移其投资方法，来华添设工厂，自二月至今，由外商增设者多至六百所左右，亦为经济侵略之新趋势，如烟草纱布等业，华商日见失败，则外资愈见振兴，中国自命地大物博，而国人开发之能力与企业之技能，均表现不可讳言之薄弱；货弃于地，而供仰于人，如十九年进口之煤为二·四六七·〇四二吨，价值关平银二四·九一九·四七五两，钢铁为八·八四六·七六担，价值五六·五六四·九〇三两，煤油类总数为一·八五·六〇八·五九六加伦，共值五四·八六四·五四六两，此皆必须之天然产物。其余若棉织品毛织品等之为进口大宗，更不待言。以自命本农业立国之国家，而十八年五谷进口价值关银一万四千三百余万两；洋糖进口价值九千一百余万两，十九年五谷进口价值一万三千四百余万两；洋糖进口价值八千六百余万两，每年进口税平均在二万万两以上，产业落后至此，自非政府国民一致奋发积极造产，不足图存。以言教育，则据十七年统计，全国大学及专门学校学生为一九·四五三人，中学学生为二三四·八一一人，即就中学生而论，平均尚须一千七百人中方能有一人，小学生为七百余万人，但学龄儿童失学者尚在三千五百万人以上，全国文盲，据约计为百分之八十。以如此交通梗塞，如此生产落后，如此教育不普及之情形，苟不借相当期间，从根本着手，虽有圣智，亦难谋国。中正列举此项事实，非敢使同胞闻而丧气，惟勇者能承认事实之真相，惟智者能从事实中求出路，目前客观环境困难之情形，与前数年相等，所不同者，厥为统一和平之局面。统一与和平，二者绝对不能分立，苟能将国家全局通盘打算，而有相当时期，供其按步沉着之进行，不特政府可以表示建设上之成就，即私人经营之事业，所投之资本，亦将风起云涌，协力并进，利用外资，更不待言。国民望秩序之安定久矣，今我国民革命军以伟大之牺牲，长期之奋斗，求得统一和平，以献于国民之前；国民应若何珍重爱护，于统一和平中求中国之出路！于统一和平中求中国之建设！于统一和平中求民族与个人之生存！抱坚决之志愿，奋其全力，凡拥护统一和平者认为国民公友！破坏统一和平者，认为国民公敌！贯以精诚，持以恒毅，则目前事实的环境必受征服，国家之兴盛，民众之幸福，必指日可期矣！

今国民会议代表诸君子，受国民之推选，来谋国家民族之生存大计于首都；诸君子同系各界英彦，然诸君子所当打量者，系整个民族的问题，而非某界问题；诸君子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然诸君子所计议者，为整个国家的问题，而非某区问题。谋国之方，应重扼要，目光所集，当在大者，以诸君子之贤能，当能高瞻远瞩，无待中正刍荛之献。然国家秩序之安定，国民共信之确立，国计民生之发展，建设方案之进行，胥特诸君子之计议，并赖诸君子以身作则，为全体同胞之表率，转风尚，正人心，敢望诸君子对于约法及实业建设程序诸大端，尤三致意焉，约法所以立共守之信条，安定人心，以树立政治社会进行之常轨，推纳全国于轨物，而后轨外之祸乱可以消除。中正认此事为国民会议之重要使命，历次坚持，致不谅于平日敬爱之友，言之实心有余痛！约法含义既属重要逾常，故其条文亦宜简约而易实行，不恃鸣高，但求切当，不应立异，但求

可行。俟确立以后，尤须政府国民同立山岳不摇之心，秉化日光天之态度，一致遵守，以致中国于治平。至于实业建设程序，亦属目前所必需，就中国现在实业情形而论，无一事不需建设；就中国之人材经济而论，则事之兼顾，必致一事无成，认定其后先缓急，而立为程序，不必铺张，但就其可以定期办到者为限，而竭政府与国民之全力以赴之。至于如何确定鼓励生产，而同时能顾全劳工福利，不背民生主义之经济政策；如何能促进教育事业，使其能顾及国生民计情形。类此问题，皆国家要求诸君子之深思熟虑，以为历史上树立民族复兴之新基础者也。

欲求国家之治，必须有确定之信仰，扼要之计划，同一之步趋， 总理倡知难行易之学说，实为挽救中国传统颓废心理之唯一针砭，恢复民族进取生力之唯一方案。今日吾人所能托以集会之议场，亦仅系根据一种工程师之设计，而由无数荷砖伐木之劳工，日夜不息，依照预定图样设置，乃能按期完成。世间决无工程师相聚而斗，工人袖手而观，可以有完成任何建筑之理。建国之道，亦与此同。建设中国唯一之原则，厥惟 总理之主义， 总理之方略，及全部 总理之遗教，吾人试详察周思之，孰有主义伟大精深，而且能适合于中国，如三民主义者？孰有方略，广博周详，崇高切实，如 总理所手定之建国方略与建国大纲等遗著者？苟非出自千古不朽之民族领袖，秉其天下为公之精神，历劫不变之意志，则岂有任何主张足以生全民族之信仰，起全世界之敬意，使数十百万先烈断颅决腹赴之而不悔者？故接受 总理遗教，并忠实努力以行，实为我中国民族自救之道也。今国内重睹统一之盛，和平之光，遗大投艰，自多重负，然苟能循序而进，亦自可按日计程，跻于建设美备，训政开始宪政完成之域。国人孰不欲长治久安，进取图存；然长治必基于久安，图存端赖乎进取，政治现象，亦常足以表现物理心理之精义，安定如久，乱自不生，人且忘乱，须知好乱成性，好治亦成性，国人当转移好乱之心理为求治之毅力。徒知望治而不求治，治至无日。虽然国家之治乱兴衰，常系于少数能转移风尚者之心理，何况济济群彦，为全国国民所推选者，国家民族之前途，系于国民会议代表诸君子之身，惟代表诸君子共图之！

（转自《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

〔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一九三一年五月）

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既由军政时期入于训政时期，允宜公布约法，共同遵守，以期促成宪政，授政于民选之政府。兹谨遵创立中华民国之中国国民党 总理遗嘱，召集国民会议于首都，由国民会议制定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如左：

第一章 总 纲

第 一 条 中华民国领土为各省及蒙古西藏。

第 二 条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凡依法律享有中华民国国籍者为中华民国国民。

第 三 条 中华民国永为统一共和国。

第 四 条 中华民国国旗定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

第 五 条 中华民国国都定于南京。

第二章 人民之权利义务

第 六 条 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第 七 条 中华民国国民依建国大纲第八条之规定，在完全自治之县，享有建国大纲第九条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

第 八 条 人民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审问；本人或他人并得依法请求于二十四小时内提审。

第 九 条 人民除现役军人外，非依法律不受军事审判。

第 十 条 人民之住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锢。

第十一条 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第十二条 人民有迁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

第十三条 人民有通信通电秘密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

第十四条 人民有结社集会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

第十五条 人民有发表言论为刊行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

第十六条 人民之财产非依法律不得查封或没收。

第十七条 人民财产所有权之行使，在不妨害公共利益之范围内，受法律之保障。

第十八条 人民财产因公共利益之必要，得依法律征用或征收之。

第十九条 人民依法律得享有财产继承权。

第二十条 人民有请愿之权。

第二十一条 人民依法律有诉讼于法院之权。

第二十二条 人民依法律有提起诉愿及行政诉讼之权。

第二十三条 人民依法律有应考试之权。

第二十四条 人民依法律有服公务之权。

第二十五条 人民依法律有纳税之义务。

第二十六条 人民依法律有服兵役及工役之义务。

第二十七条 人民对于公署依法执行职权之行为，有服从之义务。

第三章 训 政 纲 领

第二十八条 训政时期之政治纲领及其设施，依建国大纲之规定。

第二十九条 地方自治依建国大纲及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之规定推行之。

第 三 十 条　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

第三十一条　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

第三十二条　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之。

第四章　国民生计

第三十三条　为发展国民生计，国家对于人民生产事业应予以奖励及保护。

第三十四条　为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增进佃农福利，国家应积极实施左列事项：

一、垦殖全国荒地，开发农田水利。

二、设立农业金融机关，奖励农村合作事业。

三、实施仓储制度，预防灾荒，充裕民食。

四、发展农业教育，注重科学实验，厉行农业推广，增加农业生产。

五、奖励地方兴筑农村道路，便利物产运输。

第三十五条　国家应兴办油煤金铁矿业，并对于民营矿业予以奖励及保护。

第三十六条　国家应创办国营航业，并对于民营航业予以奖励及保护。

第三十七条　人民得自由选择职业及营业，但有妨害公共利益者，国家得依法律限制或禁止之。

第三十八条　人民有缔结契约之自由。在不妨害公共利益及善良风化范围内，受法律之保障。

第三十九条　人民为改良经济生活及促进劳资互助，得依法组织职业团体。

第 四 十 条　劳资双方应本协调互利原则，发展生产事业。

第四十一条　为改良劳工生活状况，国家应实施保护劳工法规；妇女儿童从事劳动者，应按其年龄及身体状态，施以特别之保护。

第四十二条　为预防及救济因伤病废老而不能劳动之农民工人等，国家应施行劳动保险制度。

第四十三条　为谋国民经济之发展，国家应提倡各种合作事业。

第四十四条　人民生活必需品之产销及价格，国家得调正或限制之。

第四十五条　借贷之重利及不动产使用之重租，应以法律禁止之。

第四十六条　现役军人因服务而致残废者，国家应施以相当之救济。

第五章　国民教育

第四十七条　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教育之根本原则。

第四十八条　男女教育之机会一律平等。

第四十九条　全国公私立之教育机关一律受国家之监督，并负推行国家所定教育政策之义务。

第 五 十 条　已达学龄之儿童应一律受义务教育，其详以法律定之。

第五十一条　未受义务教育之人民，应一律受成年补习教育，其详以法律定之。

第五十二条　中央及地方应宽筹教育上必需之经费，其依法独立之经费并予以保障。

第五十三条　私立学校成绩优良者，国家应予以奖励或补助。

第五十四条　华侨教育应予以奖励及补助。
第五十五条　学校教职员成绩优良久于其职者，国家应予以奖励及保障。
第五十六条　全国公私立学校应设置免费及奖金学额，以奖进品学俱优无力升学之学生。
第五十七条　学术及技术之研究与发明，国家应予以奖励及保护。
第五十八条　有关历史文化及艺术之古迹古物，国家应予以保护或保存。

第六章　中央与地方之权限

第五十九条　中央与地方之权限，依建国大纲第十七条之规定，采均权制度。
第 六 十 条　各地方于其事权范围内，得制定地方法规，但与中央法规抵触者无效。
第六十一条　中央与地方课税之划分，以法律定之。
第六十二条　中央对于各地方之课税，为免除左列各款之弊害，以法律限制之。
(一)妨害社会公共利益。
(二)妨害中央收入之来源。
(三)复税。
(四)妨害交通。
(五)为一地方之利益对于他地方货物之输入为不公平之课税。
(六)各地方之物品通过税。
第六十三条　工商业之专利专卖特许权属于中央。
第六十四条　凡一省达到宪政开始时期，中央及地方权限应依建国大纲以法律详细规定之。

第七章　政府之组织

第一节　中央制度

第六十五条　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
第六十六条　国民政府统率陆海空军。
第六十七条　国民政府行使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之权。
第六十八条　国民政府行大赦特赦及减刑复权。
第六十九条　国民政府授与荣典。
第 七 十 条　国家之岁入岁出由国民政府编定预算决算公布之。
第七十一条　国民政府设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及各部会。
第七十二条　国民政府设主席一人，委员若干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委员名额以法律定之。
第七十三条　国民政府主席对内对外代表国民政府。
第七十四条　各院院长及各部会长以国民政府主席之提请，由国民政府依法任免之。
第七十五条　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由国民政府主席依法署名行之。
第七十六条　各院部会得依法发布命令。
第七十七条　国民政府及各院部会之组织以法律定之。

第二节　地方制度

第七十八条　省置省政府，受中央之指挥，综理全省政务，其组织以法律定之。

第七十九条　凡一省依建国大纲第十六条之规定，达到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

第 八 十 条　蒙古西藏之地方制度，得就地方情形另以法律定之。

第八十一条　县置县政府，受省政府之指挥，综理全县政务，其组织以法律定之。

第八十二条　各县组织县自治筹备事项，县自治筹备会之组织以法律定之。

第八十三条　工商系盛人口集中或有其他特殊情形之地方，得设各种市区，其组织以法律定之。

第八章　附　　则

第八十四条　凡法律与本约法抵触者均无效。

第八十五条　本约法之解释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

第八十六条　宪法草案当本于建国大纲及训政与宪政两时期之成绩，由立法院议订．随时宣传于民众，以备到时采择施行。

第八十七条　全国过半数省分达到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国民政府应即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

第八十八条　本约法由国民会议制定，交由国民政府公布之。

第八十九条　本约法自公布之日施行。

〔附〕十 年 观 潮 记

王　芸　生

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
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

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吐霓；
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

——右苏东坡看潮两绝　代序。

天然的潮汐，是以时而作的，其来其去，均可预知；惟有人事的潮汐，起落无常，是难测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人事又是那么繁复，真是波谲云诡，莫可究诘。但是，天然的潮汐有干流分流，人事的潮汐也有主从之别，假使我们能够握住一个主流，将它的波动的方向与经过，作一个简单而客观的记录，至少对于过去的浪花潮头可以描画出一个轮廓了吧！

中国现在是被国民党治理着，这个党拥有悠久而光荣的历史，而现在治理着中国的系统，是自民国十三年元旦改组成立时开始的。从那年（十三年）元旦到今年（二十三年）元旦，整整的十年。这十年，对于一个古老的国家真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正在这

时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却是了不得的光阴。人生百年耳，能见几个十年？我是生在这时的中国人民之一，对于这十个年头，是清清楚楚的耳闻目接和身历的。看这个治国的党的潮汐起落，自然也便形成了我的生活主要一部分。这是一件看也要看，不看也得看的无可如何的事。我现在想把这十年观潮的断片记忆联缀起来，作一个简单而客观的纪录，使我们同活在这个时候的人们看看这十年来的水迹沙痕。至于这些水迹沙痕曾经留给我们什么幸福或苦痛，那是不在笔下的。

× × ×

民国十三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将他的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并与苏俄联合，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有一次孙先生在大会上演说：

现在党内似隐有暗潮，近来有一派旧同志对新同志讲共产主义者，甚为怀疑。实则近来新青年对于三民主义研究已有了解，皆服从三民主义者。现须说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关系，民生主义可以包括一切社会主义，而共产主义复为社会主义之一部分，故实包含于民生主义以内。

这时陈炯明尚在抗乱，粤桂之间不久也发生了战事，孙大元帅出师北伐未成功，十一月间道北上，谋与段张会商政治问题，使胡汉民留守于广州。十四年三月孙先生逝世于北京，陈炯明正据惠汕攻粤，陈乱甫平，杨（希闵）刘（震寰）踵起，杨刘借口反对共产，胡汉民虽宣言否认，杨刘仍不服，六月六日在广州开火。

杨刘平后，取消大本营，七月一日改组国民政府，行委员制，委员十六人，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蒋介石，许崇智，谭延闿，朱培德，戴季陶，徐谦，于右任，张继，孙科，伍朝枢，古应芬，程潜，林森；汪胡谭许林为常委，廖任财长。

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二十四日蒋介石就任卫戍司令，二十五日蒋率学生军围省署，胡汉民逃出，为许崇智拘于黄埔，旋押虎门，经释出，遂游莫斯科。胡走后，汪精卫任国府主席。胡系军队均被缴械，改组各军，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李济深李福林分任一二三四五军军长，蒋为总司令。

九月二十日蒋率军围许崇智司令部，许走沪，军队被缴械改编。十月三日蒋又派兵围川军司令部，拘熊克武，击川军于阳川。

十二月，林森邹鲁十余人开中全会于北京西山，议决取消共产党党员党籍，是即西山会议。

十五年元旦，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于广州，议决予邹鲁等以开除党籍等处分有差，先是汪精卫谭延闿于十二月二十七日电责西山派，邹等一月二日复电，谓“共产派……公然役于强俄，乘机谋我，蟠踞中枢，结托恶少，放逐展堂，迫走慧生，中央干部失去自由。”汪蒋先后演说痛责之。一月十日，蒋在黄埔军校演说，谓：“我们联俄，实在是联合世界革命党，打倒世界的帝国主义，完成世界革命。”又谓：“再在事实上说，共产分子是本校本军为最多，可是他们在本党是实行三民主义的。”

三月二十日，中山舰未奉命而开黄埔，蒋围海军局，捕李之龙，令共产分子退出军队，汪精卫离职赴沪，旋出国，蒋电胡汉民归国，四月十九日胡汉民偕鲍罗廷自俄归。

五月十五日，广州开第二次中全会，蒋提整理党务案，规定国共两党合作办法，限制共党在国民党内之活动，通过。

七月九日誓师北伐，八月杪攻下武汉。

十六年一月国民政府迁鄂，设中央联席会议于汉口，四日蒋在南昌召开军政联席会议，决将国府暂设南昌，张人杰吴敬恒等附蒋议，汉口反对之。二十四日汉口方面开武阳夏党员大会，徐谦邓演达等演说，倡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昏庸老朽分子，提高党权等口号。三月一日，蒋在南昌胜利纪念会演说，指责汉口联席会议徐谦及共产党。三月十日汉口开中全会，蒋等未往，议决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等，以限制蒋之职权。

南京事件发生后，蒋于三月二十六日至上海，四月二日汪回国抵沪，与蒋晤面，三日蒋发拥汪通电，谓："汪主席在党为最忠贞之同志，亦为中正生平最敬爱之师友……此后党务政治既已负责有人，后顾无虑，中正唯当专心军旅……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务仰各军官长遵照此意，对于汪主席完全服从，竭诚拥护。"

五日，汪精卫与陈独秀发表联名宣言，申国共两党合作之旨。同日汪蒋会议，吴敬恒蔡元培李石曾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古应芬等在场，议决由汪通知陈独秀停止共党活动，取缔工人纠察队，暂时否认武汉命令。蒋封闭上海总政治部，宣言邓演达等破坏国民革命。九日监委吴蔡李张等八人通电责武汉措置不当。十日汪抵汉口。十二日上海发生清党运动，白崇禧封闭工会，解除纠察队武装，国共冲突开始流血。此时蒋等在南京开中全会，人数执委不足，监委有余。十八日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对峙。二十二日汪通电否认南京会议。武汉议决开除蒋党籍，下令免蒋本兼各职并拿办。上海大杀共产党人。胡汉民至南京主持党务。

武汉方面，因受经济封锁及军心动摇，逐渐表示右倾，五月二十一日长沙军队与党部工人冲突，杀伤颇众，何键揭明反共态度，是为"马日事变"。

蒋介石唐生智分道由津浦京汉两路北伐，冯玉祥再起于西北，自潼关入豫，宁汉两方争拉拢之。六月初汪与冯会于郑州，冯无鲜明表示。

六月六日阎锡山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

十九日蒋冯晤于徐州，二十一日发联名通电，谓："中正玉祥与数十万将士为三民主义信徒，谨偕全国革命军誓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凡百诱惑，在所不顾，凡百艰险，在所不避，凡百牺牲，在所不惮，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而后已。"同日冯电汉口汪谭(延闿)劝诫改正左倾行为，速鲍罗廷归国，主汉合于宁。局势一转。唐生智军队占领汉口总工会，纠察队缴械，谭平山张国焘等重要共产党员相率辞职。

七月十三日共产党发表宣言，攻击武汉政府之右倾，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十五日武汉议决与共党分家。十六日何键军占汉阳，十七日占汉口。武汉分共之后，宣言讨蒋，冯玉祥派孙连仲屯兵武胜关，以威胁武汉，并发告国民书，声明其立场，劝国共宁汉息争。

八月一日叶挺贺龙在南昌暴动，组革命行动委员会，共党要人多列名，声讨武汉。八日张发奎攻入南昌，贺叶南走，张发奎率部回粤。汉口下令，开除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等党籍并拿办。

冯玉祥在洛阳调停宁汉，七月十八日汪复电，谓对蒋只有公愤，但国民政府法统当以死争。二十四日又电，声明反共，对迁都无异议。八月二日宁由胡汉民钮永建等电冯，愿开诚相商，并望武汉重要分子至宁柄政。三日汉电，主开执监大会，俾进行讨共

对北，四日冯将此电转宁，八日李宗仁蒋等十一人电谢洛冯，宁汉妥协成立。同日蒋发表告国人书，宣言下野（此书系十三日发表），即返奉化原籍。九日唐生智通电讨蒋。十四日胡汉民张人杰蔡元培李煜瀛吴敬恒电冯，亦表示下野而赴沪。十九日武汉政府布告于二十五日迁都南京。二十一日汪精卫唐生智谭延闿孙科等由汉到浔，会议于庐山，二十三日孙科 谭 延 闿 等随李宗仁登轮下驶，翌日抵宁。九月五日汪精卫徐谦等抵宁，八日南京特别会议，推汪赴沪劝胡汉民等出席南京会议，汪八日行，九日抵沪，汪认过错，谓此来一问何应钦疾，二挽留宁方各委员，三留蒋。十日在法租界中山故宅开会，宁汉及西山派均有参与。汪三次访胡，皆不见。十二日午后宁汉两方商定办法，汪即避不出面，发表两电，自承防共过迟，愿退休，呈请中央，听候处分。

十五日南京开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临时大会，产生一特别委员会，蒋汪胡皆有名，党政军三方面皆另作组织。二十日南京政府宣言成立。二十八日蒋由沪赴日本。

三十日阎锡山讨张作霖电到宁。

唐生智不从南京之议，拒绝取消武汉分会，汪精卫到汉调解无效，并驱军入皖，十月二十日宁府紧急会议，下令讨唐，程潜为总指挥。

二十八日汪精卫抵粤，谓唐不叛党，劝粤桂勿与讨唐军事。三十日汪与陈公博何香凝等通电，主在广州开第四次中央执监会议。十一月一日汪等会议恢复广东国民政府，中常会在粤执行任务，为党的最高机关。宁亦通电促各委至宁开会，以抵制之。十日蒋自日本抵上海，十二日唐生智败，自汉出走，汪蒋合作之酝酿开始。

十七日汪精卫李济深自粤抵沪，与蒋等商开四全会及取消特委会事。同日广州张发奎军黄琪翔部包围黄绍雄及陈济棠宅，缴卫队械，贴拥护汪李打倒黄绍雄等之标语，黄及戴季陶逃香港，省城桂军全被缴械，粤桂之战乃作。

粤事群疑汪有关，汪抵沪后，多劝蒋勿与汪合作，汪访胡被挡驾。

二十二日南京开讨唐祝捷会，有人演说打倒西山会议派，游 行 至 复 成桥，枪声陡作，会众死伤二十余人。

二十九日共党陷陆丰。

二日宁府下令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并有密令捕汪。九日监委检举汪等，谓汪“捣乱把持行同翻戏”。

十一日共党占领广州，组苏维埃政府，大焚戮，十三日李福林自河南克复广州。

十六日宁府下令查办汪精卫等，汪受各方责难，秘密离沪出国，十五日在沪发表一文，有“由汉口一跳跳至上海，再由上海一跳跳至广州……不提防我们一跳又跳至上海”等句。

十七年一月四日蒋复到南京，翌日电各中委至宁开会，九日通电复职，谓自八月退职后，纠纷益甚，为本人旷职之咎，故不计私人得失，继续旧职，专司军政。

二十五日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相偕出洋。

二月二日四中全会开幕于南京，推定党政军国府等委员。四日共党再陷海陆丰。九日蒋由宁赴徐，与冯再晤，北伐军事加紧。

五月三日日军占济南。

十八日武汉政治分会成立，二十二日程潜在汉被李宗仁看管，二十三日中政会议决程潜免职查办。

六月初奉军出关，二十日中政会议决北京改称北平，定南京为首都。七月六日蒋冯

阎李四总司令会于北平，同至西山祭告孙灵，即晚会商善后，以协力同心相于矢勉。

五日冯发通电倡统一军权，裁兵等六项主张，裁兵声浪大起。十一日国府会议通过裁兵善后委员会组织法。十三日蒋冯阎李在西山商定军事整理案，决组编遣委员会。

八月八日五中全会开幕于南京，冯出席，阎未往，十日张人杰李煜瀛因取消政分会问题对大会不满而赴沪，十二日蒋到沪劝张李回京。

九月三日胡汉民归国抵沪，与蒋商党政问题，十五日胡发表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即“训政保姆论”，主提高中政会职权，为党国连锁及训政之发动机关。十八日蒋胡等自沪入京。十月三日中常会公布训政纲领六条。十日新国委蒋胡等宣誓就职，蒋为国府主席。二十六日国府发表宣言，开始训政。

十二月十二日阎锡山抵南京，十三日宣誓就国府委员职。二十九日东北易帜。

十八年元旦编遣会议开幕，蒋冯阎李皆与会，国府定此日为开国纪念日。蒋发表“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一文，以日本讨幕废藩为喻。六日编遣会议发表宣言，标揭不偏私不欺饰不假借不中辍四义。十四日编遣会议议决全国兵额至多不得过六十师，十七日通过编遣程序。

二月十九日武汉政治分会免湘主席鲁涤平职，以何键继任，叶琪夏威率兵入长沙。二十一日李宗仁离京。三月十一日中政会议决免胡宗铎张知本张华辅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并撤销各地政治分会。

十五日三全代会开幕，冯以病不入京，汉口市党部河南省党部反对大会用指派代表方法。汪精卫等十三人亦在沪发宣言，反对三全代会。二十日三全代会讨论处分汪精卫案，决对汪以书面警告，陈公博甘乃光永久除籍，顾孟余停籍三年。

二十一日编遣常会议决免叶琪夏威职，同日蒋传见李济深，即被拘。二十五日三全代会通过讨伐武汉令，翌日国府下讨伐令，谓“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过去之骄恣跋扈，挑拨军队，占据地方，诬藐中央，反抗政令，背叛主义，破坏统一，迹其种种反革命罪恶，证据确凿，该逆等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二十九日蒋赴九江督师，长江战作。四月四日武汉总退却，胡宗铎陶钧通电下野。九日蒋发自劾宣言。

十三日冯发表辟谣通电，有“好事者流，造作种种谣言，以淆惑视听，不曰蒋阎联合倒冯，则曰冯李联合倒蒋，不曰冯阎联合倒蒋，则曰蒋李联合倒冯”等句。

十九日三全会嘉慰蒋电，有“以武定乱，以劳安邦”之句。蒋令讨逆军继续攻桂。

二十七日鲁主席孙良诚辞职，离泰安赴豫。五月一日蒋由长沙驰抵南京，七日蒋发表“和平统一为国民政府惟一之政策”一文，谓“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

时蒋冯仳离之谣日甚，十日冯电蒋责一二集团发饷不公，拒赴京之请，十三日蒋电复冯解释，谓“弟虽无似，自入党革命以来，未曾卖友，亦未曾杀戮革命同志一人，平素行为，可以复按，……如兄言公为革命元勋，于私交则誓同生死，弟如有不利于兄，则人格破产，且何以再见革命同志。”十六日孙良诚韩复榘有通电。同日蒋电冯，质问武胜关炸桥毁路事。十七日国府命令，着冯查办其部下自由移动事。二十三日中常会议决冯永远开除党籍，革去党国各职。二十四日国府下对冯拿办令云：“冯玉祥背叛党国，逆迹已著，无可再予宽容，应即褫去本兼各职，着京内外文武机关，一体协缉拿办，以安党国，而正法纪。”二十二日韩复榘石友三等自洛阳通电，拥护中央，是谓

“甘棠誓师”。二十三日阎电冯，约“解除兵柄，同适异国。”二十五日冯电阎，谓“极愿即日下野，或息影山中，或遨游海外。”二十七日冯通电入山，谓“谨洁身引退，以谢国人，自五月二十七日起，所有各处文电，一概谢绝，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服，但得为太平之民，于愿足矣。”

六月一日孙灵奉安南京紫金山。

三日二中全会开幕，追认冯除籍革职等处分。中央望冯出洋，阎请其赴晋，冯自华山东行。二十四日与阎会于介休，二十五日抵晋祠长住。二十六日国府命令任阎为西北宣慰使，兼办西北善后。二十五日蒋到北平，三十日阎到平晤蒋，坚欲偕冯出洋，各方盛加挽留。七月二日阎病入德国医院谢客养病。五日国府取消缉冯令。

七日张学良到平谒蒋，决定武力收回中东路。

八月一日南京开实施编遣会议。

九月二十日国府令免张发奎职，命刘峙追击，因其不奉调遣。二十一日令准方振武辞皖主席职，因其不稳。二十三日蒋演说，谓“反动派暴露，为革命成功预兆。”十月三日，中常会以改组派诱惑张发奎，决议“陈公博，王法勤，柏文蔚，朱霁青，白云梯，王乐平，顾孟余，陈树人，潘云超，郭春涛等，勾结军阀余孽，假窃名义，肆行煽惑，阴图破坏编遣，颠复党国，甘心为赤色帝国主义者之工具，其种种密谋，业经查明确凿，应即交国民政府缉拿。”

十月十日西北将领宋哲元刘郁芬孙良诚等二十七人通电，推戴阎冯为总副司令，谓“蒋氏不去，中国必亡，……谨率四十万武装同志，即日出发，为国杀贼。”十一日国府下令免鹿钟麟刘骥职拿办，又令讨伐宋哲元石敬亭等，罪状为“破坏编遣，背叛中央，称兵谋乱，罪迹昭著。”十四日蒋发告全国将士书，谓“汉贼不两立，革命反革命不共存，我不消灭逆军，即为逆军所消灭。”唐生智助蒋至豫讨西北。二十七日蒋发表告国民书，二十八日蒋于孙象前宣读讨冯誓师辞，同日通电赴汉督师，谓“中正谨于今日赴汉督师，奉党国之威灵，为主义而奋斗，讨贼戡乱，安内攘外，皆系于今日之役。”同日府令，任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豫战大作。

张发奎之变，引起粤桂之战，数月不已，豫战尤烈。

十二月一日唐生智宋哲元徐源泉等七十余人通电，主张立息内争，一致对外（指中俄冲突而言）。二日电蒋劝罢兵。三日通电拥汪联张（发奎）。二日石友三部在浦口一带哗变，同日石发表通电，反对中央对桂豫用兵，三日石通电谓：“兹奉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令开，特任石友三为护党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谨率十万健卒，直取南京，还我国都。”五日唐生智通电云：“奉汪精卫先生转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特任唐生智为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遵于本日在郑州行营就职。”五日韩复榘马鸿逵等响应石友三电。七日孙魁元通电反蒋就职。许崇智亦电蒋，请下野，七日府令唐生智免职拿办。八日蒋发表谈话，决不消极，谓“余为国民革命努力，早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决心，即仅余一兵一卒，犹当为党国扫除叛逆。”蒋十七日通电，谓“共党军阀改组派，互相勾结，图谋倡乱，已非一日。本年十月，冯逆所部宋哲元石敬亭孙良诚变乱于西北，张逆发奎同时叛变于鄂西，桂系余孽又起于粤西，以与张逆相应……近虽有石友三及唐生智公然叛乱，然彼进退失据，势力无多，扑灭在即。”十八日中常会通过汪精卫永远开除党籍，谓“缘汪兆铭自前年嗾使张发奎称

兵广州，酿成焚杀惨剧，……乃不自惜，竟勾结陈公博顾孟余等，设立小组织，欺骗无智青年，日以反对中央为能事，近以中央议决实施编遣以来，各地反动，遂有桂系及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相继叛变，其目的不外欲割据自私，阻挠编遣，遂利用汪为傀儡，汪自甘暴弃，竟于此时应各叛将之请，回香港主持逆谋，联合冯系桂系张发奎唐生智及其他北方军阀余孽齐燮元等，希图破坏中央，颠覆党国。”十九日蒋电令讨逆各军概归阎节制指挥。二十日阎锡山张学良刘镇华等十人通电，“毅然决然，拥护中央统一，共同奋斗。”阎电发表后，韩复榘石友三孙魁元等均请追加列名。晋军出动，参加讨唐，口号为“主张公道”。

十九年元旦，阎在太原举行讨唐誓师典礼，当晚离并南下督师。同日中央下令慰劳蒋讨逆有功，谓“海陆空军总司令蒋中正同志，宵旰忧勤，指挥若定，鞭镫所至，典刑以彰，斩当涂之荆棘，置训政于康庄。”三日阎抵郑州。五日王金钰韩复榘等电唐生智，促反省。六日唐复电，愿出洋，唐军复败，石友三自行卸掉护党救国军旗号。阎凯旋后，二十二日在并补行副司令宣誓礼，演说“整个的党，统一的国”。

二月十日阎电蒋，请共同下野，谓“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丧亡者皆我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况军心不安，武力将何所恃？党已破碎，国将何以全？锡山以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原为先总理在天之灵所殷望，亦即钧座与锡山拳拳服膺所不敢失者。……不幸粤沪分裂，三全异议，理论各执一端，祸变相寻不已，言之慨然。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由，锡山窃愿追随钧座，共息仔肩。”十二日蒋复阎电，谓下野绝非其时，劝勿消极，同竟救国之功。十三日阎又电蒋，谓“治国之道，重在止乱，不重在戡乱，且能止乱，戡乱始有结果，不能止乱而一味戡乱，乱终无戡了之一日。”仍请共同下野。蒋置未复，十八日阎再电蒋曰：“盛传钧座接电后赫然震怒，以为锡山受人挑拨，背叛钧座，将大张挞伐，已下令动员，肃清平豫，问罪冀晋。”十九日蒋复阎电，有“悬崖勒马，正未为晚，尤不必多所渎陈……必欲中立即放弃党国贼与之重任，以证实外间所传兄因利用他人失败不得不亲出倒蒋之谣言”等句。自此京并间之电报战乃无虚日，二十二日蒋电阎，谓“扼要两点，一兄自行取消礼让引退之议，一兄实践请焕章出洋之约，复其自由，实施编遣。”二十一日李宗仁黄绍雄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通电，拥戴阎冯张（学良）。二十三日阎冯李等四十五人通电，主张党员全体投票，以实现整个的党统一的国。二十四日汪复电赞成总投票。三月一日三中全会开幕，议决：“阎锡山受党国重任，并为中央执委，乃于最近联合武人，倡为谬说，违反党纪，动摇人心，并有调遣军队，破坏交通情事，应即设法制裁。本会特派李煜瀛张继赵戴文切实查明真相。”九日冯自晋返陕抵潼关。十四日二三四集团将领五十七人发通电，劝蒋引退，十五日又发通电推戴阎冯张（学良）李（宗仁）为总副司令。军事开始。二十日太原党部通电迎汪。四月一日阎宣告就总司令职，冯李亦就副司令职。阎电谓：“谨于中华民国十九年四月一日宣誓就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职，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以作威福者，全国人亦当起而讨伐之。”四日国府免阎职并通缉，七日中常会议决开除阎之党籍。八日蒋发南京，九日到徐州观察。五月一日冯阎会于彰德。河南大战开始。粤桂陈济棠与张发奎之战停止。粤桂罢战之后，张桂军节节北上，六月四日何键放弃长沙，八日张桂军占岳州，粤军传复动，张桂军于十

五日退出长沙。二十一日国府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二十五日晋军入济南，石友三任鲁主席。七月十三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成立于北平居仁堂，宣言有“务以整个的党还之同志，统一的国还之国民”之句。二十三日汪精卫到北平。

二十八日共党陷长沙，三十日迫南昌，三十一日占孝感，湘赣鄂共势大张。八月五日长沙克复。

八月四日汪阎晤于石庄。七日扩大会议开第一次正式会议，发表宣言，决定起草约法。津浦陇海大战。十五日晋军退出济南。九月一日扩大会议委员汪等举行宣誓。七日阎到平，发表八字政策，日“公平内政，均善外交”。九日北平国民政府成立，汪阎谢持宣誓于集灵囿，就府委职，阎锡山任国府主席。十八日张学良巧电，主张罢兵，一切“静候中央措置”。同日阎发表寒（十四）电，愿“退避三舍”。十九日东北军入关，二十日扩会委员汪等离平赴晋。二十四日东北军接防天津。十月三日蒋电国府请召开国民会议及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七日蒋通电布捷，大战告终。九日蒋飞回南京。同日张学良在沈就副司令职。扩大会议移太原后，即继续起草约法，二十七日扩会通过约法草案，宣言公布，扩会即告停会。二十八日汪离并。十一月四日阎冯电张学良，表示“释权归田”。此战经时七月，死壮丁三十万，伤不计，财产损失称是。

十二月十二日四中全会开幕，是日张学良赶至南京参加，决议二十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会议，扩大会议分子永远开除党籍，十六日讨论约法问题，有激辩，决交国民会议讨论、十八日宣言闭幕。

三十日阎微服抵津，准备出洋。十二月四日张学良离京，五日蒋赴赣剿共。二十四日阎抵大连。

二十年元旦，授勋大赦。关于国民会议之议题，胡汉民不主张议及约法，谓总理全部遗教即是约法，与蒋意见相左。二月二十八日晚蒋在宅邀宴全体在京中委，蒋胡对约法问题发生争论，胡愤欲辞职，是夜即留蒋寓未出，三月一日由戴传贤孙科陪胡至汤山休息。二日国府纪念周，蒋报告，谓：“今汉民同志不顾本党与国民全体之公意，徒凭个人私见，坚不欲有约法，且预制国民会议之提议，是否欲以立法院院长总揽大法，以启任意毁法造法之端。是不但丧失我总理召集国民会议之精神，且将引起以后有约法无约法之纠纷，重贻党国无穷之祸患。胡汉民同志身负党国重任，不应如此越位失言，淆惑人心。今其既知引咎辞职，中央当念追随总理曾著劳绩，固本爱护同志之志，虽勿忍坐视姑息，但亦勿忍其毁弃既往革命之历史。凡我同志其当共体此意，须知保全本党之耆宿，即所以保全本党之历史也。”纪念周后，中常会开临时会议，蒋戴于丁叶孙朱蔡叶张吴李十二人提议，由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通过，又准胡辞职。八日胡下山返双龙巷邸养疴。

四月三十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四人自广州通电，胪列蒋“违法叛党罪状”六端，提出弹劾，谓“蒋氏与胡同志为同列，究以何职权而得逮捕监禁中央重要人员”。蒋呈中央自请议处，中监会复文慰之。五月三日陈济棠响应邓林萧古之弹蒋电。五日国民会议开幕。十一日蒋在纪念周报告陈济棠图叛中央，谓“现陈铭枢已离省，陈济棠正勾结张桂及改组派，图叛中央，作陈炯明第二”。同日何应钦何成濬何键鲁涤平四将领通电警告陈济棠。十二日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十四日国民会议议决警告陈

济棠，十六日发告广东全体将士电，十七日闭幕。孙科陈友仁许崇智二十四日抵香港访汪，即日偕汪赴广州，二十七日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非常会议，推唐绍仪汪兆铭林森等十六人为国民政府委员，组织国民政府，二十八日发表宣言。六月一日公布“训政时期约法”。二日何应钦等九将领通电骂孙科。

十三日五中全会开幕，十四日议决恢复李济深党籍，十五日选任蒋为国府主席，全会闭幕，发表告国人书，以扑灭赤匪相期望。二十一日蒋赴赣剿共。

七月二十日（时在万宝山事件发生后）石友三刘桂堂张学成等二十八人通电，并调军北侵，与东北军接触。二十三日张学良通电讨石。二十四日府令将石免职拿办。三十一日商震率晋军出石家庄夹击，石军溃败。

八月五日阎锡山自大连乘飞机归晋。十二日石友三由青岛乘日轮赴大连。

十八日邓演达在沪被捕，旋在京枪决。

九月初，粤桂联合出师，分袭赣湘，三日张学良通电，呼吁和平。十四日蒋在纪念周报告，谓“两广叛军与赣南赤匪是完全有联络……我们可以简单的告诉他们，中央的背后有五千万以上的灾民（指江淮大水灾），就是有五千万杆枪来，也可以将其消灭。”

十八日东北日祸爆发。十九日李煜瀛张继吴铁城电粤汪等，请停战议和共赴困难。二十一日粤府通电，提出取消粤府条件，请释胡再起。二十二日吴敬恒戴传贤至双龙巷，请胡销假。二十九日陈铭枢张继蔡元培抵粤谋和。三十日中政会议决取消对阎之通缉令。十月十三日蒋胡晤于中山陵园。十四日胡自京赴沪，十五日胡电粤方唐（绍仪）汪等，促彼此改过团结。是日粤方决派汪孙邓古李（宗仁）为议和代表，十八日由粤北上。十九日中常会议决“凡本党同志，自第二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因政治关系而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二十日汪等抵沪。二十二日蒋飞沪晤汪等，上海会议开始。十一月七日沪会结束，京粤代表发表联名通电。九日中央临时全会开幕，十一日闭幕，发表团结通电，谓“自兹一德一心，矢忠矢勇，外御强暴，内苏民困，此本党之所以自效于国人，愿全国同胞全党同志，共察此意，而相与僇力者也”。十二日四全代会开幕。十四日孙科陈友仁等自沪抵广州。十八日粤非常会议通电，“结束以前分崩离析之残局，共谋今后国难之解救”。同日粤中召开之四全代会开幕。二十二日京四全代会议决召集国难会议，二十三日闭幕。同日粤四全代会讨论沪和会决议案，拟予推翻。各派互相争持，一部分代表声明退出。二十五日胡汉民自沪赴港。同日汪自沪电粤，对退会代表表欣慰，谓“接电知诸同志因不愿推翻和会议决案，一致退席，痛苦之余，犹得欣慰”。二十九日蒋电汪请入京。十二月三日粤演武剧，殴伤代表，四日粤四全代会选白崇禧等为中央委员，七日成立中央党部。五日粤四全代会闭幕，胡致词，主张推倒独裁，同日胡等通电，促蒋下野。十日孙科陈友仁等二十余人自粤抵沪，同日汪通电主开救国会议。十五日蒋呈请辞国府主席及兼职，中央临时常会议决照准，以林森代国府主席，陈铭枢代行政院长。十六日粤中委会议决愿北上者签名，推唐绍仪主持粤府，俟统一告成取消。十七日在沪粤委全体入京。十八日粤委首途北上。二十一日宋子文辞财长职。二十二日一中全会开幕，二十八日选任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副，蒋汪胡为中政会常委，二十九日闭幕，冯抵京，亦与会。

二十一年元旦，成立统一政府，林森孙科等宣誓就职。五日粤府宣告取消，成立西

南执行部。请蒋汪胡入京之呼声大起。十六日蒋汪会晤于杭州之澄庐，十七日联名电胡，请入京。胡谢而不往。二十一日蒋汪相偕抵京。二十五日孙科辞行政院长。二十八日中政会临时会议决以汪继孙之任。二十八日上海抗日战爆发。三十日国府宣言迁洛。三月一日二中全会在洛阳开幕。三日孙科陈友仁等自沪电汪蒋，责其不接济十九路军之抗日。六日二中全会闭幕。同日中政会任蒋为军委会长。五月九日萧佛成等自粤通电，反对上海停战协定。六月十七日粤陈济棠因改组海军与陈策开战。

八月五日汪辞职赴沪，促张学良同下野，十月二十二日自沪赴欧。

十月十五日陈独秀在沪被捕。

十一月十七日，中央国府宣布迁回南京。十二月十五日三中全会开幕，十九日议决召集国民参政会，二十二日闭幕。

二十二年一月十一日孙科就任立法院长。长城抗日战中，三月十二日张学良免职，十七日汪归国抵沪，十九日至京，二十七日销假，三十日中常会议决于七月一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拟改召五全代会）西南执行部反对，谓将为野心者利用。五月三十一日塘沽协定签字。先是，二十五日蒋光鼐蔡廷锴通电反对对日停战，二十六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宣布就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在张恒组织政府，其主要军队为方振武吉鸿昌等部。与中央军几濒破裂，经调停结果，八月六日冯通电，表示交还政权，十四日冯离张恒，十七日至泰安息影。方吉不服，乃武力相见。九月三日陈济棠李宗仁蔡廷锴电汪蒋，主张停止召开四全代表等四事，九月杪，方吉败后，忽又结合侵入塘沽协定停战线内之怀柔一带，战事再起。二十八日中常会决议五全代会展期至二十三年十一月召集。十月十六日方吉因日本警告而离开军队。

二十九日宋子文辞行政院副院长及财长职，以孔祥熙继任。

十一月二十日，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徐谦陈友仁等，在福州召开“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组织人民革命政府，取消党治，脱离国民党籍，卸除中山遗象，取消青天白日旗，换红蓝二色夹黄星之国旗，改元为“中华共和国”元年。

× × ×

这便是我的“十年观潮记”，由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观到国破党毁的闽变。在这十年的光阴中，因观潮而起的情绪，恰恰是由希望，而欢欣，鼓舞，惊愕，震骇，失望，以至于莫名其妙。人原是感情的动物，一刹那间的情感，怎能算得标准？至于今后的潮头浪花更将怎样掀荡，我的观潮情绪又将怎样感应，那是将来的事，一些儿作不得预言。

呜呼！东北四省既沦异族，河北一带逼成边域，外贼内奸，炯炯窥伺，而国内风涛仍自汹涌不已，读赵子昂“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之句，不禁潸然泣下！

廿二年岁末于天津

（转自《芸生文存》1集）

〔附〕盛衰阅尽话沧桑

周　佛　海

只要把从古到今的历史，翻阅一遍，任何人都会感觉世事无常，人生靡定，而有盛衰兴亡之感。不过在纸面上阅读所生的感觉，决没有由实际经历而发生的那样痛切，那样深刻。“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这类的沧桑之感，不是亲身经历，决不会体念出其中所含的无限变幻莫测的凄凉酸辛的味道。

我年龄不过四十余岁，参加政治生活，也不过十六七年，所亲自经历的事情，较之几朝遗老，革命先辈，当然要少得多，配不上说阅尽兴亡，历尽盛衰。不过自从中华民国成立，至今三十一年，在这个短短的时期之中所发生的盛衰升沉的事实，实在比升平时代一百年中所发生的要多得多！所以浮沉于这个三十一年中的人们，其所遭遇的变化，其所感觉的沧桑，一定比升平时代的三十一年，要丰富而深刻得多。就我个人说，国民革命时代以前的变化，例如民初的雨后春笋般的政党潮流的涨落，洪宪的兴亡，以及以后北洋各系军阀的走马灯式的离合盛衰，虽然只在报纸上阅读，已经令人感觉得白云苍狗，变幻无穷了。自从国民革命以后，虽然只有十九年，却亲自经历过许多突起突灭，时分时合，忽盛忽衰的悲剧和喜剧，令人啼笑皆非，悲喜莫是。在这样起落不定的澎湃潮流中沉浮了十几年，焉得不令人感觉得个人的事，无一不是空的，而发生消极之思呢？成固不足喜，败亦何必忧。得固不足乐，失又何必悲。荣华富贵，权位利禄，转眼皆空，何必劳形苦心于这些身外之物的追求和争夺呢！

我是民国十三年五月由日本京都到广州的。当时国父任大元帅，正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共开始正式合作的时候。当时革命基础，真是风雨飘摇，谈不到稳固。我们且不说广东省以外的各省，都为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等大军阀，以及其他许多小军阀所盘踞；就是广东省以内，陈炯明割据于东江，邓本殷虎踞于南路，革命根据地，不过是广州府属及北江、西江的二十余县；我们且不说革命根据地以外的军阀，就是革命根据地以内，那里能够统一指挥。当时有粤军、湘军、滇军、桂军。而最强有力的滇军，却跋扈异常，桂军力量虽不大，而作恶却是一样。干涉行政，把持税收，包庇烟赌，竟是无恶不作。粤军湘军，为自存计，当然程度稍有差别，办法也是一样。而且在广州，肘腋之下，还有和英国勾结的商团。在这种革命环境之中，当时谁也做梦都想不到四年之后，革命军可以直捣幽燕，完成北伐，使国民党统一中国。从十三年下半年到十四年年底一年半的时间内，咆哮的商团解决了，跋扈的滇桂军消灭了。负嵎的陈邓驱除了。当时气焰熏天，炙手可热的反革命和假革命的军政巨头，一个个抱头鼠窜的亡命去了。革命政府，改为国民政府，于七月一日成立了。在国民革命，固然是初步成功，在他们个人，何尝不是从极得意的地位，变成极失意的情形？何尝不是从有权力地位，变成了黄粱一梦！这些经过，我都亲自经历，有些而且参加的。在我们成功者欢欣鼓舞的一方面，正反映着别方面失败者的垂头丧气。

正在这个时候的前后，本党的领袖之间，因为廖仲凯先生被暗杀一案为发端，发生

了极遽急，极激烈的分离和排斥的运动。外患甫平，内忧突起。十四年下半年至十五年上半年之交，党内各领袖间关系变化之剧烈，真令人目眩神迷。其中经过，不必详叙，但是当时却不能不令我发生世变莫测的深刻的感慨。

十五年七月北伐了。当时对北伐的前途，谁也没有丝毫把握。北伐军队，不过是七凑八凑而成的七八万人。无论在数量方面或质量方面，都赶不及盘踞长江上下游的吴佩孚及盘踞长江中下游的孙传芳的军队。（张作霖的军队，还不在内。当时的策略，是攻吴联孙不理张）。但是精神的力量，竟克服了物质的缺憾，经过汀泗桥贺胜桥两役，革命军竟如摧枯拉朽的占据了汉阳和汉口。武昌围攻了一月，在十五年双十节那天进了城。当时总政治部在汉口的小同志，精神奋发，分乘着汽车赴汉口市各地去发传单。我也很高兴的坐着一辆汽车伴着他们去宣传。城破之后，总司令行营，便搬进了武昌的“督署”。我奉命为行营秘书，襄助行营主任邓演达。叱咤风云，睥睨一世的吴大帅，竟这样轻易的打倒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武汉陡然产生了许多新贵，同时另一面，当然又产生了大批失意的政客和官僚。不久，九江南昌，相继占领了。武汉形势，越加巩固，而孙传芳却败走南京城。从十五年秋，到十六年秋，不仅长江方面，革命势力日益发展，因为冯玉祥师出潼关，革命军攻出武胜关，以及奉军南下与革命军对垒，整个北方的局势，也发生极大的动摇和变化；就是本党的内部也发生了极大的分化。随着革命势力的发展，国共的磨擦，党内的纠纷，也同时激荡的发展而尖锐化。

当时我奉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校长是蒋先生。邓演达代理校长，张文白（治中）为教育长。邓的兼职很多，张也兼学兵团团长，另外在南湖训练三四千人。所以学校的事，大半由我主持。当时最痛苦的，就是应付国共的磨擦。我已于十三年冬在广州脱离了共产党，所以共产党对我，自然是对立的。同时国民党的右派，却认我仍然带有红色，时加以监视和牵制。当时工兵队和炮兵队的学生，是从黄埔调来的，步兵学生二千余人，则是在武汉新招的。我是学生招齐了之后，才被调到学校，所以新招的学生，三分之二是共产份子。十六年一月蒋先生由南昌到汉口，有一晚我深夜去看他，把学生份子复杂的情形报告他，他要我切实的监视。记得当晚去访的，还有当时被共产党压得气都透不出来的叶楚伧。他也是秘密的去谈国共的问题的。

革命势力既已发展，国民政府当然不能蹩居广州一隅，而要迁移了。当时本决定迁移武汉，而蒋先生因为武汉几全为共产党所支配，而且唐生智也另有打算，所以主张暂迁南昌。为了这个问题，不单是国共之间，争斗激烈，党的内部，也非常纠纷。结果，还是迁到武汉。蒋在武汉不过几天，就回南昌，准备攻略南京。当时共党对我和文白，更加严密监视。蒋于南昌出发之前，曾三电文白，叫他带着学兵团赴安庆待命，作为总预备队。三电没有得复，遂打电来问我。我去询文白，才知道当时文白的往来电报都被扣留了。我遂回了一电，究竟接得与否，以后也没有去查。但是因此共党对我监视越加厉害，请邓演达派了有名的共党恽代英来做总政治教官，实际上执行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文白随着被迫辞去学兵团长及分校教育长的职务了。那时我们都有离开武汉的决心了。有一晚在汉口的一个小旅馆和文白密谈，他决定先去，并送我三百元，作为紧急时的旅费，当时的三百元，值得现在的三万。所以他的盛情，我至今不忘，文白去后，我时时准备逃走，但是因为妻儿都在武汉，而轮船码头上共产党的工人纠察队，稽查更加严密，我如被发现逃走，不待说是处死刑。因为当时的纠察队，是可以随便杀人的。

在这个时候，革命军占据了上海、南京，不仅孙传芳打得弃甲曳兵而走，张宗昌的援军，也如秋风扫落叶似的，赶回山东去了。于是国民革命军遂奠定了长江流域。

南京克复之后不久，就是十六年四月，南京又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和武汉的国民政府，遥相对峙。

我那时在武汉脱身不得，正在百计图逃的时候，四月下旬，忽然夏斗寅的军队，举起反共的旗帜，由宜昌东下，直迫武昌。那时第四第八等主要的军队，已开往河南，武昌没有有力的军队，足以抵抗夏军，于是把我们学校几千学生，编为一个独立师，开出去打仗。当时如果要我一同出发，那就会永久不能脱身。侥幸他们不要我去，恽代英以代理政治部主任的名义，随军出发，我仍留校留守。那时因夏军逼近，共产党也深为恐慌，以全力集中去应付，稽查得没有那种严密了。我想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于是在汉口法租界开一个小旅馆，妻儿以看戏洗澡为名，住在旅馆，好在没有甚么贵重物品，不过几件随身衣服，也很容易陆续运过江，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老友陶希圣忽来谈；我便告他我要走了，并劝他也走。他说随身只是军装，没有便服，不易逃脱。我太太淑慧，就把我的长衫短袄送了他一套。谁知以后他竟没有走，竟做了学生改编而成的独立师的军法处长，被逼杀了不少的国民党同志。以后武汉分共的时候，还随着这个队伍跑到南昌。一直到叶挺贺龙等共产党在南昌暴动的时候，才能脱身。可见遇紧急关头，如果不当机立断，没有不贻误的。不过他没有把我要走的话去告密，这还算是够朋友的。这些闲话，不必多提。

那时我岳父也在汉口，他认识太古洋行黄浦轮船的买办，和这位买办商量好，在清晨六时左右，由他接我上船，住在买办房中，以后妻儿陆续也上了船。一上了船，我便安心了。因为那时汉口英租界虽然收回，英帝国主义，仍有余威，共产党无论如何猖獗，还不致上船搜查。于是就如此这般的于五月初间离开了汉口。以后听见说，他们发现我逃脱，立即电九江军警截留。幸而这只船在九江没有靠岸，就此脱出虎口了。

谁知跳出了天罗，却跌入了地网！世事固然变化莫测，但也不是无缘无故而发生的。

前面曾略提过，党内的右派，还以为我带有红色，所以我也特别小心，打算先到上海。到上海后，电蒋先生及张文白戴季陶等朋友，然后再到南京，所以船经南京，并未上岸。以后船到镇江略停即开。船开后，买办神色仓皇到房里来说，南京派了四个侦探坐火车到镇江，上了这只船，说明我在这船上，到了上海，便要逮捕。我深觉事情离奇，百思不得其解，以后才知道我偶尔到甲板散步，被几个同样由武汉逃出的政治工作同志看见了。他们认为我是共产党，在南京上岸，立即去报告当时总政治训练部副主任陈真如（铭枢）。（主任是吴稚晖，不管事的。）陈便派人跟踪，并电上海逮捕。这些话都是以后他自己告诉我的。当时便同岳父和淑慧还有几个同行朋友商量，决定到沪我先上岸，立即分电各方，他们随后搬运行李。到了杨树浦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岳父送我上岸，叫了一部汽车，看着开车了，他以为无事，便回船去带领我的妻儿上岸。谁知车开不到三分钟，忽来了大批巡捕，把车阻住。有人拿电筒把我一照，就叫我下车，一付手镣，立即铐上了我的双手。我心里想："真的被捕了。"

世界上的事情，真是离奇滑稽。奉命来捕我的，便是现任内政部长陈人鹤（群）同志。我在人群中看见了他，便很高兴的高呼："人鹤！我来了。"他那时也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或者以为我真是共产党，所以便假装没有听见走开了。他当时的地位，

除此别无他法，也难怪他。我当时便想如何能通一个消息与淑慧；恰巧同行的一个留日同学经过身傍，我便用日语告诉他，我被捕了，要他通知淑慧，不久我便和其他五人一并带到巡捕房。后来听说当时立即要把我引渡到丰林桥的特务处去，却因为那时已是星期六晚上，第二天又是星期，所以我便在巡捕房关了四天。侥幸有这四天的余裕，淑慧才能向各方奔走营救。如果早一两天引渡过去，那真是“吾命休矣”。因为那时杀个把人那里算一回事。

当晚五个人被送进一间牢狱去，中间已睡了十二三个人，都是蓬头垢面的，一个个象是恶魔。我当时疲倦万分，在人缝中择一个隙地，纳头便睡。次晨星期日，把我们数人带到另一空房。这一天昏沉沉的过去了，颗粒未曾入口。在那种情形之下，就是甚么珍馐美味也都不能吃下去，何况是不能下咽的牢饭！星期一中午时分，有人在门外叫我的名字，我从铁门上小小的洞口看出去，原来淑慧站在门口。这个时候，我不禁潸然泪下。原来淑慧接得消息后，急得要死，半晌不省人事。后来精神略定，便去找文白，凑巧他赴杭，遂托其家电杭报告，再去找季陶，而季陶又在南京。当时上海传说共产党捉到就杀，淑慧不知我当晚究竟在那里，一定要查明我的所在地。亏她忽然想起老友郭复初（泰祺）。他那时做着上海特派交涉员。她于是到他原寓去找，却已迁居。深夜一时许坐车到丰林桥交涉使署，才探到新的地址。再找到新的寓址，复初夫妇，刚刚跳舞回家，适王雪艇（世杰）亦在座。于是他们立即电话吴稚晖先生，请他即械杨啸天（虎）——时做特务处长——营救。但是我究竟在那里，当晚终未能查出。星期日费了一天的工夫，才查出我关在杨树浦巡捕房。所以星期一特来探监，送一些吃的东西。她告诉我报上已登出我被捕的消息，各方面都已打电报去了，劝我放心。我也安慰了她几句，断肠人慰断肠人，谈话不到十五分钟，便被无情的牢子硬叫她出去了。但是我却因为她的一次探监，精神上得到了无限的安慰，也就安心静候了。星期二上午坐着囚犯的车子，被带到第一特区法院出堂，法官倒也客气，问了几句，便令回押。淑慧运动就在法院保释，当时院长是广东大学同事卢兴原，也很帮忙。但是终于星期四被引渡到丰林桥特务处了。

特务处借着一间洋房做临时牢狱，我进去时中间已有十余人。这里的牢饭，比巡捕房的好得多。不过在巡捕房不要铐手镣，此地却要铐。而且大概因为手镣不够的原故，两个人铐一付。大小便时，固然极不方便，因为一个人大解的时候，一个不要大解的人，硬逼得要立在傍边等，就是吃饭睡觉的时候，也极不方便。大约两天之后，文白跑来看我，看见铁索琅珰的情形，便上楼和杨啸天大吵一顿，于是我的手镣，便因此除下了。双手自由之后，多了一件差使，就是吃饭的时候，为被铐手不自由的同伴盛饭。坐在内里的心理，有时希望外面叫我出去，有时却又怕被叫。因为同房被叫出去的人，有些虽然仍旧回来，背上却被打得皮破血流。有些一出去就不回来了。这些人中，有些是被释回家，有些却被送到老家。所以又想被叫，又怕被叫。大约三天之后，门外真的叫出我的名字了。祸福不可知，吉凶难预料，只得硬着头皮出去。却原来是审问。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做法官坐在上面，我因为眼镜被取去，近视眼看不清楚，面孔好象认得。他开口便说：“在广州我常听你讲演，现在你却要受我审问了。”我听见了这样揶揄的腔调，真是无名火高三千丈，几乎要骂出来。立即便想到好汉不吃眼前亏，他虽然是毛头小子，我现在却是阶下囚。于是便“他问一句来我答一声”。约莫二十分钟左右，忽然

有人送一个条子给法官看。他看了便说："现在不审了，你太太来看你，你去会她罢！"原来淑慧正在这个时候，要郭复初陪着她见杨啸天，要求见我。啸天无法，遂下条停止审问，并要我上楼和淑慧见面。淑慧告诉我当晚赴南京托季陶，因为当时蒋赴徐州作战，南京上海主张杀我的人都很多，陈真如不敢负责释放。当时是没有钱买卧铺的，可怜淑慧晚上坐着三等车来往了几次，而且有时没有坐位，竟站立几个钟头。

这样糊糊涂涂，在牢里再住了大约两个星期。同住十余人，也不知谁是真的共产党，谁是假的。因为同住一起，也不管并不问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闲着无事，跟同关着的一个人学唱二本虹霓关"见此情不由人心中暗想"那段二六。有一天下午六时左右，外面又叫起我的名字来了。我想一定是前回审我那个小家伙，闲着无事，又要拿我寻开心。谁知外面叫了我的名字之后，接着说："把你的衣服带出来！"我听了这句话，知道是释放了。对同住的人，拱手说一声："告辞了！"便拿着包裹出来了。出来之后，看见一个副官模样的军官，带着四个带驳壳枪的兵士，把我的双手，又镣铐起来。带我出了大门，门前早有一部汽车等着。上了汽车，往乡间直开。越走越荒凉，而且又已夕阳西下。我想来想去，不知到那里去。释放吗？何以不叫我家里人领去？何以又要铐手？枪毙吗？何以叫把衣服带出来？难道真的因为"黄泉无客店"，怕我受寒冷吗？问那位副官，只回答说："等歇你会晓得。"后来到了南站，才知道是押解我赴南京。次晨到了南京，径送我到户部街当时的总政治部。当时时间还早，陈真如没有来，便押在门房候着。不久来了一位副官，叫把手镣开了，带我上楼。真如一见，便笑容满面握手说："对不起，开了你一个玩笑。"谈了半天，便说："今天还在我这里住一天，休息一下，明天再出去看朋友罢。"于是便叫副官送我到一间房间。当时蒋先生尚在徐州，大约是打电去请示。第二天便把我送到铁汤池丁公馆，交给季陶，铁汤池丁公馆，便是现在的财政部。这也是当时梦想不到的事。和季陶共进了午饭之后，便去旅馆访文白。适淑慧也赶到。夫妻重圆，不禁悲喜交集。这是我生死关头，所以这一段特别写得详细。

蒋先生回京的时候，我去见他。他辟头便问我为甚么不在南京上岸，惹出这些麻烦。当时南京筹办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文白被派为政治部主任，我又被派为政治总教官。这个时候稍闲，便开始著述"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

十六年六七月以后，武汉的国民政府，发生了变化，南京国民政府，也发生了暗潮。就是武汉也开始反共，把持一切的鲍罗庭，被送回俄了。这样的剧变，决不是两三个月以前所能梦想的。南京则蒋与桂系之间也发生了极激烈的暗潮。当时广西第七军，好象是驻在蚌埠一带。蒋因为环境所逼，遂不得不于八月下野了。这样突如其来，天翻地复的激变，真令人震动异常。一个连战连捷的革命军主帅，在余敌尚图挣扎，内部阢陧不宁的时候，忽然弃职下野，革命军的前途，真要发生整个的动摇。

在这个惊涛骇浪之中，我当然也跟着到了上海。这一次不能不说是一幕政治上极急激，极剧烈的变动。

当时季陶已在广州任中山大学校长，电我赴粤襄助，我于是又到了广州。这时正是叶挺率着共产军在南昌暴动后，率部直趋广州。我到粤不到两月，看见形势岌岌可危，便和季陶回沪过阴历年。我们离粤不久，共产军便攻入广州，焚烧屠杀了一场。

回沪之后，知道蒋先生要在上海办一个刊物，指定季陶、力子、果夫、布雷和我五

人为委员，并指定我负总责。我们决定名“新生命月刊”。于是风靡一时的新生命月刊，便于十七年一月产生了。（新生命月刊发刊辞系季陶所写。）

在我在上海办理新生命月刊的时候，南京的局面，是白崇禧和何应钦支持的。桂系和唐生智之间，此时发生了磨擦，桂军西征，把唐赶走了。唐生智崩溃得这样快，真出人意料之外。因为何键当时做安徽主席，安徽也是唐的地盘。兵败如山倒，这句话真有道理。于是武汉便成为桂系的地盘。因此十六年九月，武汉的国民政府搬到南京，和南京的国民政府合并统一了。

蒋先生由日本返国，于十七年一月东山再起，复任总司令，削了何敬之的兵权，调为总参谋长，把国民革命军，编为四个集团，自任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而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这样重整阵容，继续北伐，李白占据武汉的地盘，另组武汉政治分会，而以程潜为主席。但是不久程又被李白软禁去职了。这是后话。

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又奉派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复理旧业。当时新生命月刊，发展极快，极受各方的欢迎，和当时公博所办的“革命评论”，并驾齐驱。虽然我们只谈理论，“革命评论”兼谈实际问题，但是都可以支配并指导当时青年的思想。同时顾孟余也在上海办了一种杂志，名“前进”，却是无声无息，毫无影响。当时我又办了一个新生命书店，出版许多丛书。我的“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三个月之中，销售了四万余册。在上海正干得起劲，真想不到南京去重弹旧调。以后因为命令既不可违，友朋又复相劝，所以把新生命月刊，带到南京来编，重复穿起军服，挂起皮带，去过半军人半文人的生活。

我因为在学校工作，所以没有随军出发。国民革命军四个集团，同时并进，孙传芳张宗昌的残部不必说，奉军的主力也击退了，张作霖出关回奉而被炸了。于是各军的革命军，就会师于北京，而北伐因以告成。

七月份蒋先生要到北京去，文人之中指定力子、布雷、立夫和我随行，在身边帮忙。另外张岳军（群）和杨畅卿（永泰）先往，暗中策划。一行浩浩荡荡，受着沿途迎送，先到保定，和白崇禧等前方各路总指挥先行见面，再到北京。我们都随节驻西山碧云寺。当时 国父灵寝，仍在西山，遂举行祭灵大典，报告北伐完成。记得读祭文的，是当时第三集团军之下的总指挥商震，一口北京口音，声调抑扬，很能动人。当时不仅四个集团军总司令，就是各路总指挥，也都齐集北京。济济一堂，真是极一时之盛。大家兴致之高，意气之豪，真是不可一世。当时东北易帜，接洽将成，从此化干戈为玉帛，易割据为统一，中国前途，真有无穷的希望和光明。我当时虽然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但是亲历其境，这个盛况，毕生不忘。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万感交集！

当时集议之下，定了编遣计划，接着召集编遣委员会，谁知以后的反复内战，却由这个编遣计划而种下了恶因。这是后话，不必去说。

随节回京以后，因为种种关系，仍想去上海专办宣传文化工作，托果夫屡为婉言，好容易得了许可。于是于十月辞去军校职务，回到上海。在这个时期之内，武汉和南京的关系，日渐恶化，暗潮渐渐高涨，终于澎湃为不可遏止的战潮了。

仿佛是十八年的二月间，蒋先生到了上海，我去看他。他说：“你还是到南京去帮忙，就去。”到了南京，要我搬进总司令部，于是就住在力子隔壁的房间，就是现在三

元巷警官学校的前楼。前年兼任警政部长，到警官学校去视察的时候，在这个房中徘徊许久，感慨横生。这时正在召集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滑稽得很，我被指派为菲律滨的党员代表。那时也不知道是因为甚么原因，大部青年同志，对胡汉民先生感情都不甚好。在开会的时候，大闹一场，我和段锡朋、洪陆东、萧铮、何思源等十余人，当场退席，再不出席了。以后才知道这次我若不退席，可以当选为中委，因为名单早已秘密拟好了。当时胡先生还疑心是蒋先生，至少，是果夫叫我们干的，和他为难。其实这是冤枉，完全是我们十几个青年同志自动干的。因为当时蒋先生对武汉将有所举动，要运用代表大会授权给他，处理紧急事变。

有天晚上，蒋先生亲自打电话给我说："请你马上到公馆来一下。"那时他的公馆就在总司令部之后，内里是可通的。他叫我草拟一篇讨伐李白的宣言，并口授李白种种背信和不法的事实和要加以讨伐的理由。我心里暗想，真的要干起来了。

前方已接触起来了，约是十八年三月，我奉命随同出发，随节坐着楚有军舰上驶。当时有两个幕后人物，文的仍是杨畅卿，武的便是广西军人前辈俞作柏。他们另外坐一只被征发的招商局的船随后跟上。因为运用俞作柏的关系，桂军里面最有力的两个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早已和中央发生了关系。等到中央军进了湖北境，桂军这两部有力部队，忽然宣布拥护中央，李白自然不能不退出武汉了。仿佛我们出发以后不到一个月，桂系在武汉的势力便崩溃了。楚有军舰停泊在汉口下游五十余里的江中，看见上面驶来一只小火轮，原来是民众团体的代表来欢迎。我代表接见，并发表简单的谈话。于是楚有军舰，便径驶到汉口。这次桂系崩溃得这样快，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就解决了武汉问题，也是出人意料之外。

到汉口不久，便奉命为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兼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于是又穿起军衣，挂起皮带了。

旧地重游，回想十六年脱出武汉的情形，真有隔世之感。自从我离开武汉之后，武汉的局面，经过了好几次的大变化。由共产党猖獗，演变成武汉清共，由清共而变成唐生智独裁。唐生智崩溃，继之以桂系当权。现在又变一个局面了。在这短短的两年之中，在这小小的区域之内，就发生这许多次人事升沉，派系盛衰的现象。政潮的起伏，个人的得失，那里能够预料，那里可以认真！

两湖奠定之后，便随节回了南京。正在这时前后，第二幕的活剧，又将酝酿成功了。

蒋冯之间，隔膜日甚一日，暗潮也一天一天的高涨起来。五月以后，愈加决裂。看见两人来往电报，打笔墨官司，就知道不久也要兵戎相见了。双方都调兵遣将，剑拔弩张，准备大战。但是冯以退为进，表面上，于五月底通电下野，以阎之邀约，赴山西晋祠；阎同时也请陪冯出洋。这不知玩的是甚么把戏，大约是消极抵制。因此蒋于八月再到北京一次，这次我也同行，同住北京饭店。阎来北京会谈，蒋劝阎不必出洋，但冯则必须出洋。阎因之称病入德国医院，谢绝见客。我们住一个多礼拜，便回南京。

蒋先生手法真巧妙，早已和冯有力部队韩复渠、石友三有了接洽，韩石忽于此时通电拥护中央。同时起用了唐生智，叫他到天津集合因北伐留在京津一带的湘军，进驻郑州。十月十日，西北将领通电讨蒋，第一次蒋冯战争从此开幕了。

在武人磨枪擦刀的时候，我们拿笔杆的同志，就忙着草拟通电、宣言和宣传大纲。

唐生智以前敌总指挥的名义，指挥队伍，在黑石关和登封、临汝一带和冯军开火之后，我于十一月初又奉命随节出发了。先坐船到汉口，再乘车到许昌。总司令部，即设在火车上。唐生智当然到许昌来了。两年多不见，他已是升而沉，由沉复升，翻了几个斤斗了。当时韩复渠，石友三、何雪竹（成浚）等，都集合许昌。会商后，唐便出发到黑石关去督师了。经过了几次激战，冯军节节败退，战局已具有了决定性，不难结束。而其他方面的复杂变化，却非到南京去处理和应付不可，所以唐生智便奉命代行总司令职权，全权处理前方事务，于是我们又随节返京。这次到许昌，不过一月，前后计算，军事行动，也不过约略两个月，这场纠纷，就告结束，不能不说解决得快了。

不图霹雳一声，由天外飞来，于我们回京后不久。代行总司令职权的唐生智，在郑州宣布脱离中央而独立了。当时我们实在奇怪。唐要这样干，为甚么不在冯军未败之前和冯军联络起来干呢？何以在冯军既败之后，中央应付裕如的时候，有此异动呢？何不再等适当时机才干呢？大约他因为武汉空虚，所以想领兵直窥武汉，恢复他民国十六年武汉的局面。那知道被阻于漯河，于大雪之下，几日激战，他仍不能不离开军队，再去作寓公了。于是突然而起的高潮，又突然消灭下去。变幻莫测，何胜感慨。

当唐在郑州异动的时候，在郑州的中央机关和要人还很多，事前一无所闻。每晚和唐一起打麻将的朋友，也一些不知。当时经理署长俞樵峰（飞鹏）也在郑州，唐看着打麻将的情分，没有绑财神，请他安全的离开。铁甲车司令蒋素心（锄欧）因为是湖南人，被唐硬扣留帮忙。以后素心告诉我，当漯河战败之后，唐进退两难。有天无聊，和素心等拆字，以决吉凶。当时择了一个“道”字，于是唐决心逃走。因为“道”字，暗示“首领要走了”，这也是政局动荡中的一个逸话。

同样的时候——恕我记忆力不佳，时间不能正确记忆——两广的形势很不稳，陈真如的军队，不够镇压。因此派和陈很要好的朱一民（绍良）统率湘军毛炳文部和石友三的一大部，由海道赴粤增援。石部集中浦口待船。有晚深夜，我接着宪兵司令谷纪常（正伦）的电话，说石部在浦口叛变了。（好象这个时候，唐生智还没逃走，河南正在打仗。）大家都以为石部一定渡江，占据南京。因为一方面以为唐石已有联络，一方面那时南京只有一团多宪兵和军校几千学生，空虚极了。当晚南京大为震动。谁知石唐竟没有具体的联络和计划，石部竟不渡江，呼啸北去了。当唐生智异动的时候，每次给蒋的电报，自己都还称“职”。因此，胡展堂先生有“造反犹称职，退兵不渡江”的两句打油诗。

到了民国十九年，蒋阎之间的关系，又渐渐恶化起来。联冯的时候，用了冯系的薛笃弼做内政部长。打冯联阎的时候，就任命阎系的赵戴文为监察院副院长，又给赵丕廉做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但是阎系的要人，虽在中央任了要职，以任蒋阎间的意志疏通和感情联络，但是关系的恶劣，终难免趋于白热化。

十九年二月初，一电飞来，阎以礼让为国的理由，约蒋一齐下野。于是双方一面打笔墨官司，一面调兵遣将。消息一天紧一天，冯也离开晋祠，回到潼关去了，冯阎联合起来倒蒋了。当时由津浦线南下的，完全是阎军，阎亲自指挥。沿平汉线南下的是冯军，沿陇海线东进的，阎军冯军都有，而以阎军为主体，冯则驻郑州指挥。我又奉命随同出发，大约是十九年五月，先到济南布置津浦线方面的战略，再到陇海线。总司令部当然就在车上。当时阎冯军已趋过归德，似乎在马牧集，所以我们总部的专车，就停在

砀山。开火以后，冯阎军节节败退，由归德西撤。总部专车进至归德，旋复进驻柳河。阎冯军厄守兰封，于是变成了阵地战，绵延了好几个月，使我们不能不在柳河车站烈日炎炎之下的钢车中消夏了。平汉线由何雪竹指挥，双方旋进旋退，无大激战。陇海方面，好几次由正面举行中央突破，但因为阎冯军的壕沟，又宽又深，损失很大，死伤很多，终不能进展寸步。同时济南被阎军占领了。如果乘胜直下，占领徐州，陇海线后路截断，我们就要回军都不可能，所以当时情形，颇为严重。我们在柳河，也很耽心。不过阎为人持重，不敢冒险，兵力大约也不够分配，所以没有推进。正在这个时候，蒋光鼐、蔡廷锴的军队，由广州调到津浦路反攻。李韫珩带着一万左右的湖南军队，由海道至青岛登陆，沿胶济路向济南反攻。我记得李韫珩到柳河请训的时候，愁眉苦脸的到我车厢中说："湖南兵士都没有坐过海船，山东地形又不熟，此行真是没有把握。"李虽是行伍出身，却是一员勇将，以后也建了不少战功。

津浦线反攻，节节胜利，不久，济南又收复了。但是陇海线仍是旷日持久，我们总部的车子，只是停留于柳河或归德之间。有时虽也开到野鸡岗和民权县的最前线去督战，但是不过几个钟头，仍开回原地。

我和力子随节住在车上，陈雪暄（调元）和顾墨三（祝同）两个人的司令部，都在柳河车站附近的小村庄。车上热得不可耐的时候，便去他们的村庄"避暑"。每天晚上，必定去的。我不会打麻将，便和不打牌的将领，上下古今的谈个不休。照这样，一个暑天也就混过去了。这个时候，有一段事情，不能不写。当我们住在归德的时候，有天晚上，我从梦中被枪声和很大的轰炸声所惊醒。只听见侍卫长王世和大呼道："火车头呢！"因为不预备开动，所以火车头离开了列车，当时火车欲开不得。枪声响了半小时始息。后悉是冯的骑兵，就是现任陆军部次长郑大章同志所指挥的，来袭飞机场，他们的任务，烧了飞机就回。谁知那时我们车上只有两百多卫兵，车站上又没有其他军队。如果骑兵达到车站，主帅以下都要被俘。那末，那个时候以后的历史，又是另外一个写法。真是气数。不过那个时候，我们都学空城计的孔明，齐说一声："好险哪！"

在停顿在柳河的几个月内，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积极进行着很大的计划。政治方面，就是张岳军和吴铁城奉命到奉天，劝张汉卿领兵进关。阎老西的代表，当然也在沈阳。但是老阎舍不得用钱，而这边却是挥金如土。以后小张果然领兵进关了。虽然不完全是化钱的结果，但是钱用得多，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军事方面，因为正面攻击，中央突破，既不能成功，就不能不采取迂回战略。这次迂回分几路，而且规模很大。远的一路竟迂回到平汉路以西，去截断郑州以西的陇海路。军事上各路迂回部队开始动作，且顺利进行；政治上张汉卿于九月二十左右，发表通电，主张罢兵，一切静候中央置措，同时部队也向关内移动。因此，陇海正面的冯阎军很快的撤退了。我听见了这个消息，兴奋得很，等不及随总部列车前进，先和陈雪暄坐汽车进了兰封城。沿途时常听见对方所埋地雷的爆炸声，侥幸我们的汽车，没有碰着。在兰封县公署住了一晚，第二天总部列车到了。我回到列车，随节进驻开封。到了开封，洗澡吃馆子，高兴极了。兵败如山倒，我们于十月初旬，到达郑州。冯部梁冠英等亲来郑州，归顺中央。中原大战，于此告终。

当时贺贵严（耀组）做徐州行营主任。他由京坐一列专车来郑。他的太太和淑慧，坐着他的专车来郑游玩。此时蒋先生已飞回南京参加双十节。我便搬到贵严的专车上，

四个人一路欢天喜地的谈笑到京，久戍回家，倒也开心。

在我们停滞于柳河的时期内，有两事须要记述。第一就是共产党乘着后方空虚，攻入长沙，裹胁而去，到赣南设立了根据地。以后倾全国之师，费时三四年，还不能完全消灭，只是驱逐到西北，演成现在这样的蔓延和猖獗，都是那次中原大战造成的。第二就是蒋胡之间，又发生了磨擦和冲突。原来蒋主张战事结束，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胡则反对。南京与柳河之间，电报往还，早已辩论好几次。而蒋仍于十月初电请国民政府，召开国民会议，颁布训政时期约法。

返京之后，又因为张学良任副司令及张系人员来中央任职的问题，蒋胡意见，更形决裂。大约十二月初旬，蒋赴庐山，我也随去。蒋在庐山对人发牢骚："不愿回南京，离南京越远越好，想到西北去。"在这几句简单的话语之中，可见得蒋胡感情之恶劣了。但他在庐山考虑的结果，决定了去胡的大计，所以不到三个星期，便仍回京，我们当时，是一点都不知道他下了决心的。

到了民国二十年了。仿佛是二月底。我因事赴上海。时张岳军任上海市长，约我和力子到一家酒馆吃饭。他问我们道："南京昨天晚上的事情，你们知道了吗？"我们都很吃惊的齐声答道："不知道，甚么事？"他说："我也是刚才晓得，胡先生被扣留了。"我和力子都吃一惊。这也不是一件小事。胡先生性躁，我们怕他自杀。至于西南，因为这个问题，必有所举动，乃是我们意料中之事。西北的活剧，方才演完，西南的舞台又要开幕了。果然在五月间南京召开国民会议的时候，广州召开了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对蒋声罪致讨了。

国民会议散会后，因为江西的共匪猖獗，所以不能不先行剿匪，至对西南问题，则明弛暗张。此次我仍奉命出发。熊天翼（式辉）做行营参谋长。在南京开了几次幕僚会议，筹备一切，好象在五月底就出发赴南昌。从此由国民党内部的战争，变成国共之间的战争了。回想起来，真是伤心。假使十七年七月西山祭灵之后，大家都一心一德，埋头于善后和建设，那里会有十八年春的武汉和十八年冬的河南之役？那里更会有十九年大规模的中原会战。这次会战，损失的物力和人力之多，实在可惊！没有迭次内战，共党怎样会猖獗，而发生连年剿匪的军事行动？没有由长江流域剿匪，发展成西北剿匪，那里会有西安事变？没有西安事变，国家焉能到今日这样支离破碎的局面？乃竟阴错阳差的一幕一幕演变起来！气数耶？国运耶？人为之不臧耶？呜呼！

南昌行营，设在百花洲的省立图书馆。我便在百花洲畔，找一个临湖的平房寓居起来，并约以后曾经煊赫一时的杨畅卿住在我寓。虽然说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但是军事仍是主要力量。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布置完毕，开始包围的同时，一面仍策划对西南的问题。七月间畅卿奉命赴香港秘密工作，对西南加以分化运动。不单派了畅卿，同时四面八方进行对西南的分化。以后毕竟运用上官云相和余汉谋的郎舅关系，把余汉谋拉了过来。陈济棠失去了这一部主力，也就不能不崩溃了。这是后话。

九月初蒋先生赴武汉。两三天之后，电令我即行前往。长江好大的水！汉口全市，都变成了泽国。那时三雪——是就陈雪暄（调元）刘雪亚（镇华）何雪竹（成浚）——都在汉口，我当时只三十四五岁，他们都和我很要好，把我叫老弟，招待我在大水泛滥的汉口，痛快的玩了几天。现在海角天涯，鱼雁不通，怎么能令人不怀旧雨而感伤呢！

我到汉口的任务，就是要我草拟讨伐陈济棠的通电和告将士书及告民众书。我心中

又暗想，对西南的军事要发动了。

在汉口不过四五天，一直回到南京。在南京一个多礼拜，又乘军舰赴南昌，军舰到了湖口，蒋改乘水上飞机先行。我们仍乘原舰，到第二天清晨才到南昌。总部的副官来接，说："总司令上午就坐飞机回南京，请主任今天下午，至迟明天动身回去。"我真莫名其妙了！发生了甚么变故吗？何以这样急呢？跑到总部一问，却原来是沈阳事变发生！我因为杂务待理，等第三天才和何敬之（应钦）陈真如（铭枢）——陈是来奔走宁粤和平的——同乘飞机返京。

以后接着发生的，就是胡先生恢复自由，宁粤在沪开和平谈判，京沪粤三地同时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蒋先生二次下野，孙哲生陈真如主持南京军政等极繁重、极复杂、极变幻的各幕。

关于第四次代表大会一问题，京、粤、沪各有主张，意见纠纷复杂，议论了许久，没有很好的办法。结果乃是旧中委连任，增加中委名额，京、粤、沪同时分别选举。我在京得票最多，占出席代表百分之九十，当选为第一名中央执行委员。如果旧中委不连任，也要重新选举，我绝对不会当选第一的。当时朋侪戏呼我为状元中委。第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时候，因为京、沪、粤三方都要把落选的人加进几位做中委，于是以全体会议的决议，把三方落选而票数较多的，各补了几名做候补中委。王陆一时作监察院简任待遇秘书，也因此做了候补中委。因自撰一联云："岂有秘书称笋任，居然中委出恩科。"时称为"恩科中委"。

第四次代表大会闭会后，蒋先生于十二月第二次下野了。下野之前，都有布置，发表几个省政府主席，顾墨三任江苏，我以后也被派为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了，这乃是徇墨三的请求。蒋先生原意，仍要我在身边帮忙，因为墨三以军人而任封疆，没有把握，要我帮忙，所以蒋先生也只得徇其请求了。

二十一年一月，上海事件发生以后，蒋先生又出山了。这次新设了军事委员会，自任委员长。接着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在洛阳召开了国难会议。在寒风凛冽之中，乘着专车赴洛阳出席会议。洛阳是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地方，我还是初次瞻仰，但是黄沙白草，满目荒凉，怀古之情不禁悠然而生。

汪先生已于此时出任行政院院长了。此后数年之间，我因为出任地方行政工作，除出席中常会及中政会外，不多预闻中枢的事情，以后虽兼任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乃是局部事务。除参加秘密组织之外，对于党国大计，没有预闻，所亲身经历的事不多，不过耳闻目睹罢了。其实这几年内，除剿匪外，没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人民政府的喜剧，短时期内便解决了；广西问题，时张时弛，但终未以兵戎相见，所以也没可以述的。

我要特别详述的，就是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汪先生在中央党部被刺时，我所经历的情形。

在大礼堂举行了全会开幕典礼之后，便齐集到中央会议厅大门前去拍照。我站在汪先生左侧后面第二或第三排。当时新闻记者非常之多，秩序混乱极了。记得照相的说："各位预备，要照了。"这时不知道是谁说："蒋先生还没有来。"随着吴铁城大声道："蒋先生不来照。"照毕之后，大家转身拾级而上。我行了两三步后，忽闻背后枪声一响。声音甚小，以为是放爆竹庆祝。但是接着枪声又起，形势大乱。我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穿灰色大衣的人，拿着枪向人群中轰击。于是大家向铁栅门内急跑。我看见朱骝先（家骅）在我面前向地伏下。我也随着他伏身而卧。刹那间，忽想这不是办法，仍立起奔进铁栅门，站在门内墙角隐身。这个时候，人声嘈杂，枪声大起，说时迟，那时快，忽见一人倒在我的面前，满脸是血。当时惊魂未定，也没有去细看是谁。后来铁栅关了，枪声止了。忽听见有人说，汪先生受伤了。我仔细一看，原来倒在地下的，乃是 汪先生，已经身中数枪了。事起仓卒，变生肘腋，所以那时震动、惊惶、怀疑等情绪，不仅充满了我的心中，且支配了全场的空气。同时一面接医生，一面查缉凶手的余党，混乱、忙迫，而且紧张万分。好容易医生来了，把 汪先生护送到医院，这才开会。这一幕惊心动魄的情形，我毕生不能忘记。

现在再一述在南京所经历西安事变所反映的情形。我当时仍兼民众训练部长，那天，在中央大学指导一个民众集会。下午七时方回家。淑慧告诉说："各方面打来了十几个电话找你，蒋先生在华清池被张学良的乱兵包围了。"这个消息真是青天霹雳，使我震动。当天晚上，中央党部召集紧急会议。第一个问题，就是要赶快查明下落。究竟是生是死，毫无正确的消息。第二是如何处置。关于这个问题，分为两种意见。戴季陶何敬之等主张采取严正的态度，要为国家立纪纲。孔祥熙等则遵从宋美龄的意见，主张缓和。关于办法，有主张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一幕是共产党主使的，不便去对共产党说话，但是要去找苏联。意见纷纭，议论复杂。直至夜深，没有办法。但是对于缓和论者的主张，大家都不便反对。我回家之后，心想中国真是多灾多难。共产党流窜西北，正要消灭的时候，忽然发生这样的变故。此次一定是凶多吉少。小张既然下了这个决心，必定有个远大计划。即使不立即加以杀害，至少决不会马上恢复自由。所以国家的前途，悲观极了。

世界上的事，本来不能预知，这件事尤其使人莫明其妙。张竟亲自送蒋到洛阳了。以儿戏始，以儿戏终，固然是一件荒谬绝伦的事，但是这一幕儿戏，却是中国历史的转捩点，没有这一幕，那时以后的中国历史，当然又是另外一种写法。至今思之，犹有余痛。

汪先生闻西安之变而回国，廿六年一月抵香港。我和力子，奉命赴香港欢迎。不久召开中委全体会议，我奉命把民众训练部长让出，仍请公博担任。不数月而芦沟桥之变起。事变以后的经历，等到十年以后再述，现在就在此截止了。

把过去经历的事，一一回想起来，好象白发宫人，谈开元天宝遗事，只落得徒增感慨，更觉悲伤。悲欢离合成败与亡的场面，一幕一幕的表演过去了。是真是假，亦色亦空，把跑龙套的演员，头也跑昏了，眼也跑花了，神也跑迷了，深深的感觉浮沉于茫茫人海之中，和起落不定的政潮之内，得失升沉，都不过是昙花一现！所以夜深人静的时候，幽居独念，真欲跳出十丈红尘，避世唯恐不远，入山唯恐不深！

但是身世之感，虽常令人发生出世之想，而家国之忧，却不能不令人鼓舞余勇，坚定贯彻初衷的决心。尤其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正是周公恐惧流言，王莽谦恭下士的时候，是非未定，功罪难分。如果半途而废，虽存周公之心，终成王莽之果，上何以对祖先，下何以对子孙！后世的批评，我们可以不必去管，流芳百世也好，遗臭万年也好，无声无息，与草木同朽更好，"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但是个人的是非固然不必计较，国家的利害，却不能不加考虑。自古孤臣孽子的用心，不在求谅于

当时及后世，乃在使个人的苦心、努力和牺牲，实际有益于君父。所以现在距我们企求的目的，虽然道路崎岖，关山险阻，但是救倾扶危的目的一日不达到，就是我们的责任一日未解除。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那里能够因为人事沧桑之感，而改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呢！

（附记）以上所述事实，全凭记忆所及，时间容有前后倒置之处，读者谅之。

〔附〕中央特别委员会

邹　鲁

本党同志因为对于清党的意见纷歧，曾一度形成鼎足而三的中央党部；后来因清党意见一致，遂产生了统一本党党务的特别委员会。这在前章已经叙述过了。但是产生特别委员会的经过情形，相当复杂，而前章只涉及其大概；所以现在再详细说明一下。

我们上海中央党部的成立，其主要目的全为清党，曾迭向粤方中央（宁、汉中央党部的前身）各同志表示：共产党脱离本党之日，即党务归于统一之日。所以当北伐军底定苏、浙，传说宁方将要清党的时候，就决定党务统一办法四点。跟着宁方实行清党，同时下令查封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沪方的中央党部；但是沪方同志的主张没有得到可靠的保障以前，沪方中央党部，当不会被一纸公文，便告结束。旋宁方中央党部成立；而各方同志，以宁、沪均一致清党，党务应该统一，于是提议宁、沪合作，宁方中央执监委员，如胡汉民、吴敬恒、李石曾、蔡元培、萧佛成、古应芬、邓泽如、丁惟汾、叶楚伧诸先生，连名函约沪方同志往宁，以瞻望总理墓地为名，实则谋党务的统一。我们亦以非正式手续，提出前章所叙述的(一)(二)(三)三种办法，和宁方相商。这时张继先生由日返国，前往南京；在他返沪的时候，带来了胡、吴、李、蔡、萧、古、邓、丁、叶诸先生的复函。以上诸先生在函中虽没有完全署名，但是函末声明，某某因某事未到，故未署名，而对于函中所说的一切，悉表同意。他们主张以最无痕迹的办法，来实现党务的统一。这就是采取我们第三项的办法，由宁、沪中央党部各举出相等的人数，筹备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函末并说，若沪方同意请即派人赴宁，协商进行。沪方即派覃振、刘积学诸先生为代表，偕同张继先生往宁。到后宁方胡、吴诸先生对于统一办法，意见仍属于一致；惟云俟蒋先生回宁参与，即可见诸实行。乃蒋先生自前方还京，遽行宣告下野。宁、沪合作的协商，因此中断。但是宁、汉、沪的合作，已经在酝酿之中。

当汉方准备清党的时候，沪方同志即由许崇智先生派人遄赴汉口，催促实行，并商量党务统一的办法。旋得汉方复函，主张汉、沪合作，并提出意见两点：(一)汉、沪同志开预备会，充分交换意见；(二)汉方开第四次执行委员会，请“西山会议”诸同志加入工作，声明除中央党部须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外，其余各机关，一律均可参加。

沪方立即答复，对于第一点开预备会的意见，完全赞同，并要求宁、汉、沪三方合作，以谋本党同志的大团结；但对于第二点，认为不当，所以复函中并没有提及，而另外提出前与宁方协商的三种办法。嗣蒋先生下野，宁、汉合作之议亦起。谭延闿、孙科两先生代表汉方同志，由浔而宁而沪，进行汉、宁、沪的合作。在沪商谈多次后，大家都主张集合汉、宁、沪三方同志，彻底研究大团结的办法。谭、孙两先生返宁后，即偕同李宗仁、朱培德、李烈钧诸先生及汪兆铭再来沪；跟着于右任、程潜两先生也来了。这时汉、宁、沪三方代表，便开始共同协商。最初是分头接洽；到了各方意见一致，就于九月十日下午在武定路鸿庆里张人杰先生的公馆里，决定于次日开正式谈话会，由汉、宁、沪三方中央党部各推负责代表若干人出席，地点是戈登路伍朝枢先生的公馆。

九月十一日上午，三方代表到齐后，公推谭延闿先生为主席；以庄严的仪式，宣布开会，恭读　总理遗嘱，再举行讨论。这次议决的各案如左：

（甲）关于党务的：

（一）组织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

（二）特别委员会由宁、汉、沪三方共同推定若干人组织之；

（三）宁、汉、沪三方中央党部将其职权委托与特别委员会；

（四）特别委员会除施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职权外，应负统一地方的中国国民党党部，并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最迟于十七年一月一日开会；

（五）特别委员会委员三十二人，候补委员九人，三方共同提出；全体人名，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发表之；

（六）中央各部长人选，由特别委员会决定之。

（乙）关于政府的：

（一）政府委员；

（二）各部部长；

（三）军事委员会委员；

（四）宁汉两方政府合并改组方法并人选，由特别委员会决定之。

（丙）统一宣言：推谭延闿、蔡元培、谢持三先生及汪兆铭起草。

这正式谈话会共连续举行三天。第一日除决议上列各项外，还有三点，应加以注意：（一）决定方式，不采用表决手续，以全体一致为原则；避免多数压制少数的嫌疑。凡是对于任何案件，如若有人提出异议，即使已有决定，还须再行讨论，直到没有一个人提出修改或异议，才作定案。这种方式，不但这次正式谈话会始终采用，就是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决议程序，也是如此。（二）讨论（甲）的（五）项时，原草案系“宁、汉两方将全体人名，由第四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之”。但宁方不承认汉方第三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因此不能用第四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于是主张宁、汉分别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来发表。双方相持至烈，后来决定删去第四次字样，改为临时会议。这样之后，李石曾先生仍请保留，要求等待到次日再作最后的决定，以便回去后再和未出席的宁方同志商量。十二日继续开会时，李石曾先生报告宁方一致同意后，才决定用临时会议等字样。（三）宣言起草委员四人，又互推汪兆铭主持初步的起草。

九月十二日举行第二次正式谈话会，最重要的会务是推定特别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汉方的特别委员是谭延闿、孙科、何香凝、于右任、朱培德、程潜诸先生；候补特

别委员是顾孟余、甘乃光两先生和陈公博。宁方的特别委员是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王伯群、伍朝枢、李烈钧诸先生；候补特别委员是叶楚伧先生和褚民谊、缪斌。沪方的特别委员是林先生、许崇智、居正、谢持、覃振诸先生和我；候补特别委员是茅祖权、刘积学、傅汝霖三先生。宁、汉、沪三方公推的特别委员是蒋先生、胡汉民、张继、吴敬恒、戴传贤、张人杰、唐生智、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李济琛、何应钦、白崇禧诸先生和汪兆铭。以上特别委员共三十二人，候补特别委员共九人，均一致通过。此外这天正式谈话会应注意的事项，共有三点：(一)汉方所推特别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系汪兆铭亲自写就后提出；(二)谈话会后，汪兆铭特向蔡元培、谢持两先生说明所拟宣言中的大意；(三)特别委员三十二人中，和“西山会议”有关系的只有林先生、谢持、居正、覃振、许崇智、张继、吴敬恒诸先生和我共八人，占总数四分之一。

九月十三日举行第三次正式谈话会，决议案如下：(一)在特别委员中，公推五人，代行监察委员会职权。关于人选，由谈话会商定；发表手续，依照（甲）的（五）项办理。(二)公推特别委员张继、于右任、何香凝、李石曾、蔡元培五先生代行监察委员会的职权。(三)抽签决定特别委员和候补委员的次序。

在上列三次的谈话会中，出席者有谭延闿、孙科、伍朝枢、程潜、叶楚伧、李烈钧、王伯群、谢持、杨树庄、许崇智、张继、覃振、于右任、居正、茅祖权、刘积学、甘乃光、傅汝霖、李宗仁、张人杰、蔡元培、李石曾、朱培德诸先生和我，还有汪兆铭、陈公博、褚民谊及缪斌。正式谈话会圆满结束，就于九月十四日，出席人员和其他有关的，共乘专车赴宁。

九月十五日，汉、宁两方在成贤街中央党部举行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沪方在紫金山　总理陵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别把三次正式谈话会的结果，决议通过，同时发表。于是特别委员会便产生了。产生后所发表的宣言如左：

“我　总理孙先生致力国民革命，组织革命团体，自兴中会始，其后有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之组织；至中华民国九年，而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十三年有收容中国共产党员之政策；在　总理之意，以中国共产党党员震于德国马克斯之学说，苏联列宁之政策，以为新奇可喜，欲举而移殖之于中国，是为误解，深不忍其误入歧途，故欲一体罗致，使知三民主义实较马克斯阶级斗争之主张为善，行之中国且较列宁之集产制与新经济政策为适当，使努力于中国国民党主义之实现，故毅然决定容共政策。其实非无表示怀疑之党员，终信以　总理之魄力与度量，必足以移化此等中国共产党而有余。且　总理与苏联代表越飞氏共同宣言中，已声明苏联协助中国打倒帝国主义，完成中国在东亚之国民革命，并不要求宣传共产。中国共产党员加入本党时，亦曾郑重声明，只以各个人之资格，服从国民党之主张，故皆信之而不疑。不意　总理竟于十四年之三月，弃我等全体党员而溘逝；中国共产党党员遂乘此机会，渐试其篡党之手腕。是时，有一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已窥破彼等之伎俩，谋加以制裁。爰于是年十一月在北京西山　总理殡舍前，为清党之会议。而留粤诸同志，以笃信　总理容共政策之故，对于提议制裁之同志，不能采用其意见。于是此一派反共之同志，不得已而在上海召集代表大会，别举执监委员，组织中央党部；此粤沪两党部对立之原因，全起于容共反共之不同者也。既而北伐进展，粤方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随北伐军之胜利而次第北迁：先抵南昌，次莅武汉。当是时也，共产党阴谋利用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之掩护，包办民众运动，勾结地痞流

氓，激起各地方之骚扰。多数监察委员，认为党国危机，间不容发，警告各地忠实之执行委员，请以非常手段制止共派与附共者之破坏国民革命行动。于是粤、闽、江、浙诸省同时清党，本　总理遗志，建立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于南京；此宁汉两方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对立之原因，亦全起于容共反共意见上之不同者也。未几，武汉诸忠实同志，发见共派消灭本党之阴谋，认为与　总理容共政策根本上不能相容，遂于七月十五日在湘、鄂、赣三省，厉行清党。于是吾中国国民党一致取反共政策，别无何等不同之意见，当然无复有同等机关对立之必要。于是约集三方同志，推诚协商，而有组织特别委员会之建议，并定于南京各开中央执监委员会临时会议以决定之。今临时会议业已可决，推出委员，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职权，改组国民政府，并于三个月内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从前峙立之三党部，均不复行使职权；从前三方面互相攻击之言论，皆成陈迹，不得复引为口实。本会受任以后，誓恪遵　总理遗训，服从全党公意，一方面继续清党，不使全党中有一不忠实之党员，得厕身其间；一方面继续北伐，期于最短期间完成中国之统一，以图三民主义之实现，拯全国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全吾党之大责。谨此宣言，尚希公鉴！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

当特别委员会成立之前，沪方同志曾发表宣言，表明只办党而不问政治的态度；所以国民政府改组成立之初，沪方同志都不愿加入。后来程潜先生不赞同这种狭义的主张，并且说：“若不参加政府而只参加党务，还不能表示吾党的大团结”。同时大家也劝沪方同志加入国民政府。沪方同志觉得再坚持下去，反留痕迹，所以居正、覃振、许崇智诸先生和我四人，便被推为国府委员。至于政府各部会和机关，沪方的同志还是一律没有参加。国民政府组成后，又产生军事委员会。至是政治军事，也随党务的统一而统一。

直到这时，清党工作和党务统一，可说一帆风顺。然而在特别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在南京看到汪兆铭一电，大意是说：“破碎之党，归于完整，他引退了”。当时我还觉得平平的。忽而听见汪到了庐山；忽而听见陈公博到了广东；忽而听见武汉突然成立政治分会；忽而听见武汉反对特别委员会；忽而听见汪到了武汉，解释特别委员会是有先例的；忽而听见汪提出开所谓第四次全体执行委员会，来追认特别委员会；忽而听见广州拥护特别委员会的民众大会，奉令从缓举行；忽而听见广州盛唱打倒特别委员会；忽而听见汪由武汉到了上海；忽而听见汪由上海到了广州，主张开所谓第四次全体执行委员会，取消特别委员会；忽而听见汪又到了上海；忽而听见广州为共产军占领，宣布共产；忽而听见广州已被克服。事实离奇，就是电影里的变化，看来也不会这样快。综算起来，这种把戏，自然以汪兆铭为主脚。他对于特别委员会，初说“完整党务”，继说“从前有先例”，三说“要开所谓第四次全体会议来追认”，四说“要开所谓第四次全体会议，取消特别委员会”。于是攻击特别委员会的呼声四起。

反对特别委员会的，自然以汪兆铭首屈一指。因此他的言论，可以作为代表。他说：“见了孙科同志提出特别委员会的主张，我气极了，我便退席，我便离开上海”。但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查特别委员会的名称，最初的确是孙科先生所提出，但因汪兆铭的竭力主张，才决定采用。记得那时李宗仁先生曾发表谈话，说：“当时我对于特别委员会的产生，非常怀疑，因恐以后党中，以此为借口，乘机加以攻击。我在伍宅谈话会，我问汪氏，假使有人反对特委会，我们如何对付。汪氏即为我解释：‘现在特别

环境之下，可少顾法律，促进事实；现在宁、汉由破裂而合作，同时‘西山会议’诸同志反共最先，宁次之，武汉同志检出共产党阴谋证据后，始行清党，三方目的可谓一致；现既联合，可用特别委员会办法以联结之。……特别委员会之产生，有前例可据；廖仲恺被难时，亦组特委会，以行使中央职权，有三阅月之久。现既在特殊环境之下，特委会之产生，当然可无疑义，”。由此可知产生特别委员会事实和法律的根据；也可见汪所说“气极”、“退席”、“离开上海”等语，完全是后来造出来的。

他又诋诬特别委员会的产生，因为没有经过第四次全体大会决议，所以法律手续不合。但是关于不用第四次全体大会而用临时会议名义的经过情形，上面已经详细说过，何况正式谈话会结束后，各方到了南京举行临时执行委员会，来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更不是党员或委员的个人运动，完全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尤不是忽略了所谓的第四次全体会议。法律手续，并没有丝毫不合的地方。汪兆铭翻手云，复手雨，说了的话不算，做了的事不算；所以也把自己所主张和赞成的特别委员会，硬要取消了。

但是这些理由，虽三尺童子，也知道不能成立的。而要取消特别委员会，又非造些必须要取消的罪状不可。于是便转到“西山会议派”身上，说是“西山会议”把持特别委员会，“西山会议”腐化特别委员会；因此已结束的“西山会议”，又被拿出来做广告，更说得“西山会议”简直万恶似的。欲加人罪，何患无辞，但是这个方法可算是巧妙的了。

“西山会议派”真的把持特别委员会吗？这可说绝对不是事实。“西山会议”的各同志，完全由于清党的意见相同而结合。本党实行清党后，“西山会议派”的目的已达，“西山会议”的名称便立刻取消。所以在特别委员会成立的时候，不但“西山会议”的名称已不存在，就是“西山会议”的同志也没有任何特殊的组织。在这种情形下，怎样把持？即使退一步说，就算“西山会议”的同志在党务方面仍保持着一致的主张，因此表面上看来好象另成一派，但是特别委员会委员三十二人中，和“西山会议”有关的，只有林先生，谢持、张继、居正、许崇智、覃振、吴敬恒诸先生和我八人，恰好占总数四分之一。有何把持可言？何况特别委员会的决议程序，前面已经说过，是采用全体一致通过的方式。既然如此，“西山会议派”更有什么方法来把持？所谓把持的攻击，这样看来，显然是无的之矢。

“西山会议派”真的腐化特别委员会吗？老实说一句，参加特别委员会而与“西山会议”有关系的八个人，都追随 总理革命奋斗，有二十年以上的历史。革命的 总理会在这样长的时期里，对于这种容易腐化的人，竟一句暗示的批评都没有，而反认为信徒吗？纵令“西山会议”的同志真已腐化，但是他们在特别委员会中只占四分之一的绝对少数，也绝没有腐化到整个特别委员会的道理。再以特别委员会的成绩而论，在他成立三阅月的期间中，曾北讨北方的军阀，西征本党的叛徒，南平共产党的暴动，更裁去十余万的兵，月减国库支出千余万元。腐化的特别委员会能有这种成就吗？若说“西山会议”主张清党，调整对俄政策，开除汪兆铭党籍，解顾鲍罗廷等等，都是腐化的行为；那末为什么全党都先后一致地跟着做，却不易了解了。岂曲突徙薪的是腐化，焦头烂额的才算不腐化吗？所以从各方面说来腐化两个字真不知道怎样解释。

攻击无效，当然会再进一步的办法。十一月二十二日，首都民众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便给与攻击者一个绝好的机会。正在开会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穿西

装的人，开放冷枪。于是在场军警，向空放枪弹压；结果演成惨剧，民众官兵死伤了十余人，惨剧发生后，就有人造谣言，说是谢持、居正、覃振三先生和我主持的。其实我们手里都没有一兵一卒，无从指使；又不想夺取政权，何必要利用这种手段呢？尤其是居正先生，为了要到日本去，早已离开南京以便准备行装，也被列入，更属可笑。这可见被攻击的人，只要和“西山会议”有关系，就可以加上罪名，至于证据的有无，却是无关重要的。我和谢持先生等为使这事的真相彻底明了起见，曾一再连名提请国民政府迅速查办；仍不放弃已往屡次使我失望的主张，一切可以由法律解决。某一次国民政府开会，谭延闿先生适由沪返宁，担任主席；我再提出拿办主使及前后在会场高呼打倒特别委员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打毁市党部的行为犯。谭先生说：“假使是单纯的共产党暴动，悉行拿捕，自属易办；实则此事发动，上海有人在主持。党内之争，愈□□□□愈多”。因而□起，我也就明白了。

那时我和“西山会议”有关的同志，早已自动离开南京，表示我们的立场是完全为党，而不是为个人，只要党国有利，我们少数人就做牺牲，亦无不可。

接着汪兆铭开第四次全体会议的主张，居然成为事实，定期在上海举行预备会议，高谈法统，如若不谈法统，马马虎虎，还没有什么重大的关系，但是拿法统来做幌子，造法毁法，自欺欺人，影响却很大的。中华民国的国会，就因为这点终至于毁灭。因此我就做了一篇“为特别委员会事宣言”，①由谢持、张继、居正、许崇智、傅汝霖诸先生同署名，公开发表，说明开所谓的第四次全体会议来取消特别委员会的不当，并叙述特别委员会法律和事实的根据，最后表示我们只求全党的团结，毫无个人权力和地位的观念，并且随时都可以引退。嗣后复撰一篇“为特别委员会事再宣言”，仍有谢、张、居、许、傅诸先生同署，公开发表，说明特别委员会成立的经过，以明了特别委员会的真相。

后来我觉得“宣言”和“再宣言”两篇文章，意有未尽，所以发表了一篇“西山会议”专文，把“西山会议”到特别委员会的经过情形，很坦白地叙述。“西山会议”真情的宣布，这可说是第一次。

“西山会议”，我是主持人之一；而在特别委员会组织的时候，我又代表“西山会议”的主张发言。因此“西山会议”□特别委员会，不但和我有特殊的关系，就是他们所有的举动和决议，我都完全赞成和拥护的。所以在“西山会议”和特别委员会的叙述里，不以我个人为主体，就是这个缘故。

（转自邹鲁《回顾录》）

---

① 为特别委员会事宣言：“同志公鉴：自本年九月十五日，宁、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于南京成贤街中央党部，上海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于南京紫金山 总理墓地，分头一致决议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完全付以统一党务及办理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权。自是汉、宁、沪分立之党归于统一，因而由中央特别委员会产生国民政府，由国民政府产生军事委员会，政事、军事亦由党之统一而统一。凡此事实，非特同志所共见，亦中外所共闻，而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时宣言及国民政府成立时宣言，可复按也。乃近来竟有取消特别委员会，停止特别委员会之议。查其借口之武器，则高谈法统，主张一方之所谓第四次全体执行委员会，以处理党务。慨自本党遭共产党阴谋破坏以来，同志之间，互相猜疑，激成水火，及至今年，汉、宁两方同志，先后觉悟，从事清党，与沪方同志主张成为一致，斯诚党事之转机，故于九月中央统一时。各方同志皆主张党内分子熔为一炉，悉出任事，而尤再

三致意于胡、吴、汪、蒋四君。盖本党同志不能大团结，则虽一致清党，党之前途，犹难乐观也。孰知事与愿违，多数人苦心团结之而不足，少数人播弄破坏之而有余，相激相荡，至成崢然不可终日之局，可胜浩叹。夫事穷则变，古有明训，党事至此，凡可以谋党之团结与发展，苟出诚意，在可能范围内，何事不可以协商而谋变通；若别有用心，高唱不健全之法统，而欲以一方之第四次全体执行委员会处分中央特别委员会，则有不能已于言者。

本党自宁、汉、沪三方中央党部分立而后，已早无法统之可言，只能就事实以谋党之统一。今既有为法统之说者，则姑就法统言之。

十四年冬，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一部分执行委员林森、邹鲁、覃振、居正、石青阳、叶楚伧、戴季陶、邵元冲、茅祖权、沈定一、傅汝霖、监察委员谢持、张继等，开会于北京西山　总理灵前，决议肃清共产党，并以广州中央党部为共产党把持，不能行使职权，乃决议移中央党部于上海，复于上海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在粤之一部分执行委员汪精卫、谭延闿、丁惟汾、王法勤、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等，不予赞同，则仍在粤行使职权，及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粤、沪对峙。此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党统分裂，不能讳言也。北伐至鄂，广州中央党部移于南昌，再移于汉口，及底定苏、浙，南京清党，汉口中央党部犹持异议，因而南京成立中央党部。于是汉、宁对峙，此广州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党统分裂，亦不能讳言也。自南京清党，而有沪、宁两方合作之进行。宁、沪固互认其法统也。自武汉清党，而有宁、汉、沪三方合作之进行，汉、宁、沪亦互认其法统也。各方已互认其法统，更加以痛定思痛之余，互相退让，互谋补救，所以九月在上海集汉、宁、沪三方党部代表协商统一之事。其时列席者汪精卫、于右任、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谭延闿、朱培德、程潜、李烈钧、李宗仁、孙科、伍朝枢、叶楚伧、王伯群、甘乃光、缪斌、覃振、刘积学、茅祖权、许崇智、谢持、居正、张继、邹鲁、傅汝霖等二十余人，聚于一堂，讨论数日，一致决定，合三方中央党部成立特别委员会，并推定汪精卫、蔡元培、谭延闿、谢持起草宣言，遂于九月十五日三方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开会，正式决议，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员会职权。是中央特别委员会之产生，由于汉、宁、沪三方中央党部之正式决议，法统至明显也。故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外，中央特别委员会断不能以一方之意思变动之。亦不能以多方之意思变动之，更不能以任何方面之个人意思变动之。其于事理亦至明也。

乃当党务与政事、军事进展时，而开一方第四次全体执行委员会之说突起。初以其为一方内部之手续问题，为之容忍；今忽愈唱愈奇，进而高谈法统，为取消中央特别委员会等之说。是乌乎可？且就一方之第四次执行委员会而论，须根据于第三次执行委员会而发生。查南京方面固无所谓第三次之执行委员会之开会，查汉口所开之第三次执行委员会，又完全为共产党所操纵，为南京方面所承认者。是一方之第四次全体执行委员会，本身法统已乏健全。若以一方不健全之法统而欲凌驾三方成立之中央特别委员会，岂有一毫容许之理由？况中央特别委员会，本系统一党务之临时过渡机关，党之根本大计，胥待决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故其行使职权，为时至暂。且自成立以迄今日，虽不敢言有若何成绩，而事事公开，人所共见。本党负救国责任，一切行动须示国人以大信。况关党之根本问题，尤不能轻易从事，若为少数人之意见，将党之根本问题，数月一易，不特国人无所适从，即党员亦只觉其治丝愈棼。

抑有进者。本党为整个之党，万不容党内有派。前之右派左派中派，为共产党分化本党之名词，今已彰明较著，人知其非。某等在西山　总理灵前开会，决议肃清共产党，只有主张，并无派别。自宁、汉先后清党，主张早已完成；自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党权统一，党部完整，更无派别存于其间。况清共为党员应尽之责，既已一致，即无彼此。不图今日吾党同志竟仍有以西山派为攻击之资，于以叹共产党所施毒计入人之深；否则必犹有共产党作祟于吾党之中，而同志未及察也。

吾党同志诚爱党者，不宜妄指中央特别委员会为罪过，亦不宜横以莫须有之事丑诋吾人。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如果有不称职者，尽可更易，如谓委员人数未能充分容纳各方，则委员尽可增加人数。或言西山会议派对于党务包办把持，尤乖事实。查特别委员会系委员制，与西山会议有关系而为委员

者，不及三分之一；中央常务委员会各部委员，与西山会议有关系者，充其量亦不过三分之一。事实具在，莫能掩盖，若摭拾此说为攻击之媒，直属不堪一笑。

总之，当此革命进程中，内有残余军阀，外有环伺列强，而共产党为害心腹，尤岌岌不可终日。本党负此救国重责，整个团结，犹恐力微；再行相煎，何以自存？至若知共产党之祸而清党，复用其余孽以祸党，甚至惟我可以联共，惟我可以清党，他人反共而清党者，则非打倒不可，此皆本党不祥之现象。

故某等区区愚诚，只知有党，不知有派，无意气杂于其间，更非讳言西山会议。宁汉清党，何一非西山会议数年来之主张行动？所谓求仁得仁，仁已得矣，惟有进而求党之统一。故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时，即将上海中央党部结束，移交于中央特别委员会，尚何有西山会议之存在？某等服务中央特别委员会，亦只有个人党员资格，并无西山会议派之意义。兹之列名，亦本个人资格发言，一陈过去之事实而已。若夫某等个人之进退，早有声明，只求党之团结，无个人权利地位之成见，时时皆可引退，惟中央特别委员会有正当之历史，则不能不恳切明白以告同志，以告国人，无使为一部分人一手掩尽天下耳目，此则某等今日不得已于言者也。特此陈词，诸维亮鉴。中华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附〕汪精卫与扩大会议

李　俊　龙

一九三〇年，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等在北平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是当时国民党内部各反蒋派系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种政治联合。我当时是以改组派的关系由汪精卫提出担任扩大会议常务委员会三个秘书中之一个（其他两个秘书，一为阎锡山派提出的马小进，广东人，曾参加过同盟会；一为西山会议派提出的唐昭明，四川人，与谢持接近）。因为派系和职务的关系，我参与过一些会议和活动，接触过一些人，经手过一些文件，对于当时党政方面的情况有粗略的了解。但因我当时年轻幼稚，所知不深，而事隔三十年，又多遗忘。加以政治水平所限，不能深入分析，知其事未必能究其原。姑凭记忆所及，举当时目见耳闻之事，写此点滴材料，聊供参阅。谬误疏漏，势所难免，幸知者指正。

一　扩大会议的成立经过、组织机构及其政治纲领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孙中山在一九二四年改组国民党时所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蒋、汪所毁弃，国民党遂成为帝国主义和买办、封建势力的工具。由于各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彼此斗争，国民党内各派军阀遂各依附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势力为其靠山，因而形成各派军阀间的不断混战。一九二八年初，蒋介石得英、美、日帝国主义势力的帮助，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一九二八年二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正式开会，以蒋介石、谭延闿、于右任为主席团，蒋提党务案，陈果夫提党务整理计划，此为蒋介石企图摧毁国民党内反对派、创立蒋家私

党的阴谋之开始①。蒋介石在北伐军事告一段落后，为实现其个人独裁，首先想假借编遣会议来消灭桂系、冯玉祥、阎锡山等异己的军事势力，因而从一九二九年起，蒋介石和国民党内各军事集团间遂接连发生混战。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爆发了战争；桂系失败后，张发奎又反蒋拥汪；张失败，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又发生战争；冯失败后，唐生智又在郑州通电反蒋，不旋踵唐亦失败；接着便是蒋和阎、冯之间中原大混战的开始。为了在政治上能与蒋介石南京政权相对抗，阎、冯、桂均有请出汪精卫做招牌的需要。而汪、阎、冯、桂反蒋联合之所以能够形成，是由于当时的形势使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汪精卫自一九二八年被当时桂系和西山派所把持的南京特别委员会排斥出国，鉴于蒋介石个人独裁之逐渐形成，曾以“于党恢复民主集权，于国实现民主政治”为号召迭次策动反蒋，均归失败，因想借阎、冯军事势力推倒蒋介石，以恢复他自己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阎锡山鉴于桂、张、冯、唐均被蒋各个击破，自己已成蒋的最后目标，如不联合汪、冯反蒋，就会被蒋吃掉。因为汪、阎、冯同受蒋的压迫，处境相似，他们虽然各有打算，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彼此合作。至于桂系和西山派，一则穷促于广西一隅，随时有被蒋吃掉的危险；一则穷途潦倒，毫无出路，所以也愿意捐弃前嫌，与汪、阎、冯合作倒蒋。

汪精卫自一九二八年出国后，当时国民党内所谓粤方委员陈公博、顾孟余等曾以拥汪为旗帜，在上海搞国民党改组运动。陈公博曾办有《革命评论》，鼓吹恢复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精神，恢复民众组织和民众运动，反对南京的贪污腐化，也反对共产党的武装暴动，并鼓吹以所谓“农工小市民”同盟为国民党阶级基础。顾孟余曾办有《前进》，主张拥汪，但不赞成“阶级基础论”，提倡所谓“超阶级论”。两派虽有“理论”之争，但在拥汪名义下统一起来，于一九二八年春夏间正式形成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政治派别，即一般所称的“改组派”，在国民党的海外和各省市组织中拥有不少党员。汪精卫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号召，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期间，曾先后发表过《怎样扶植民主势力》、《怎样树立民主政治》、《论约法》、《论以党治军》、《怎样做文人》、《二十年民权运动之回顾》、《两种模型心理之瓦解》等一系列的文章，内容都是讲的“于党恢复民主集权，于国扶植民主势力”这一套漂亮话。由于蒋介石政权日益不得人心，当时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一部分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国民党员，把汪精卫看成是一个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个人独裁的首领。阎、冯发动反蒋之时，汪已回到香港，他一面支持南方张发奎、李宗仁等的反蒋军事行动，一面又与阎、冯信使往还，随时准备北来，以促成南北反蒋势力的大联合。当时改组派内对汪北来看法不一，中下层骨干多数反对，认为阎、冯与蒋同是军阀，汪不应作此军事投机，幸胜不过以暴易暴，失败则不可收拾。汪本人及顾孟余等认为政治是现实的，蒋不倒则一切无从谈起，故倾向于北来。一九三〇年三月，陈公博、王法勤先汪北来与各方接洽，察看虚实。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等也在平津一带活动。阎锡山最初忙于部署军事，三月二十八日，才要赵丕廉陪同陈公博、王法勤、邹鲁、谢持等一同赴太原相晤，初步交换了关于党务和政府组织等方面的意见。阎并请陈、王等电促汪精卫北来，他自己与冯玉祥也先后发电敦促，并派代表速驾（河北老国民党员李锡九曾代表阎、冯到港迎汪）。陈公博回平后，还在北戴河看过一次张学良，探询张对政局态度。张那时只愿多听各方意见，不肯贸然表示明白的态度。

随着阎、冯倒蒋军事局面的逐渐展开，当时平津一带的政治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在由谁来召集扩大会议的法统问题上发生争吵。改组派认为既然反对蒋介石的三全大会，则国民党二届中央就是合法的领导，扩大会议应由二届中央召集。西山会议派认为他们曾因反对容共而被第二次代表大会开除党籍，他们自己在上海产生了二届中央，如今合作反蒋，就应由两个二届中央联合召集。改组派对此激烈反对，认为西山会议派的二届中央是非法的，如果搞什么合并召集，就是自坏党统，徒授蒋介石以口实，且不能说服改组派的各省市和海外组织，政治上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时，改组派控制的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及其机关报《民主日报》，与当时以国民党另一个小组织“大同盟”为基础的各省市党务联合会及其机关报《联合日报》常常针锋相对，互相攻讦。阎、冯认为大敌当前，不可自相争吵，因而更有促汪北来亲自主持之必要。汪精卫鉴于南方张、桂反蒋军事失利，也觉得非北上不能打开局面，乃于四月十三日复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办事处一电，表示“即当摒挡就道，共策进行”。这时，南京已正式下讨伐阎、冯之令，并有长令历数阎罪。蒋介石亲赴徐州督师，阎、冯也均赶往前线，大战展开。汪精卫于七月二十三日自日本门司乘日本长城丸抵津，旋转平。八月四日，汪、阎会晤于石家庄，商谈党政大计，随汪前去之各派人物，在汪、阎主持下开全体会议六次，对汪起草之党务宣言、扩大会议七个基础条件、组织大纲、常务委员人选以及组织政府等重大问题，均取得同意。八月七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通过宣言草稿，并决定以汪精卫、赵戴文（代表阎）、许崇智、王法勤、谢持、柏文蔚、茅祖权等七人为扩大会议常务委员，负责领导扩大会议一切工作。

扩大会议除了公布七个基础条件，发表党务宣言外，并按照组织大纲，决定在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组织、宣传两部及民众运动训练委员会，均采委员制。各部、会互推秘书主任一人，执行决议及整理部务、会务。组织部因须负整理党籍、建立各省市机构及筹备召开三全大会之责，各方均注目，最后始决定由汪精卫自兼秘书主任，委员为汪精卫、邹鲁（西山派）、陈公博（改组派）、赵丕廉（代表阎）、朱霁青（改组派，东北人）五人。宣传部由顾孟余兼秘书主任，委员为顾孟余（改组派）、张知本（西山派）、薛笃弼（代表冯）、潘云超（改组派，河北人）、傅汝霖（西山派，东北人）。民众运动训练委员会由覃振兼秘书主任，委员为覃振（西山派）、白云梯（改组派，蒙古族）、陈嘉祐（湘籍军人，也算改组派）、陈树人（改组派）、商震（代表阎）。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当时改组派的分量是比较重的。因为，一则阎、冯声明党务推重汪；二则改组派在各省市和海外皆设有组织，拥有一些国民党员；三则参加扩大会议的国民党二届中委几乎都是改组派。而西山派只有几个上层，中下层人数很少。至于以大同盟为基础的国民党各省市党务联合会，除了阎锡山军政势力所及的省市略有临时组织外，其他无甚影响。冯玉祥当时的注意力集中于前方军事，而他的重要党政干部如郭春涛、黄少谷、邓飞黄等均参加了改组派。阎锡山左右也有改组派分子。扩大会议各机构的名单公布后，曾引起西山派和大同盟一部分人的不满，他们搞了一个小规模的请愿游行，把“反对改组派把持扩大会议”的大字标语张贴到扩大会议的外门墙上，这就使得汪精卫很生气。后来好象是由覃振、赵丕廉出来疏解，其事始寝。为了网罗各方人物，以壮反蒋声势，汪与阎、冯商定国民政府于主席下设国府委员七至十一人，最初推定阎锡山、唐绍

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未同意）、谢持等七人为府委，以阎为主席，后又加推石友三、刘文辉为府委。国府组织原定为十部一院，后改定为十六个部、院、会。唐绍仪最初由阎提出，汪恐唐不同意，电询阎是否征得唐意见后再发表，阎复电仍照原议，遂一并发表。后来唐虽未来参加，也未表示反对。至于把张学良安排在内，是因为当时蒋介石正派遣张群、吴铁城等向张游说，并以陆、海、空军副司令为饵，争取张从蒋，汪、阎、冯为免后顾之忧，所以对张学良不得不尽力争取。由于种种原因，张学良最后还是进兵平津，促使扩大会议垮台，此中关键，下节还要详细说到。石友三、刘文辉曾通电拥汪、阎反蒋，且各有军队，故亦被加推为国府委员。

扩大会议常委名单及各机构组织人选确定后，国民政府委员及主席人选亦经商定产生。由于当时反蒋运动在军事、政治和外交各方面的迫切需要，阎锡山、汪精卫、谢持三人于一九三〇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在怀仁堂宣誓就职，扩大会议派王法勤常委代表监誓。宣誓就职典礼完毕，即招待来宾及中外记者，宣布国民政府正式成立。阎锡山于就职之前，曾出席八日晨扩大会议的第八次“总理纪念周”作报告，分析蒋方与反蒋方面的兵力比较为二与三之比，并谓蒋介石“与党为敌，与国为敌，与民为敌，与公理为敌”，最后必归失败。他谈到以后的施政方针，说“要做到社会安宁，政治廉洁，取民有制，财政公开四项训政前提，才可以实行训政”。这当然只是一套骗人的口号。阎、汪、谢就职典礼匆匆完成后，即将汪所起草之通电签署拍发，分请唐、冯、张、李各于所在地先行就职，“并望全国民众及各军政机关职员，同德一心，共负艰巨，以奠安党国”。阎、汪并于就职后对平津记者团先后发表谈话：阎谈尊重言论自由，但希望新闻界对蒋方散布之谣言慎重考虑，不予发表。汪谈“待唐、冯、张、李各委员中再有几人就职后，依照国民政府组织大纲第五条之规定，议决各部部长，提请中央党部同意，而政府正式成立，则在部长发表及各部组织就绪以后……。”阎、汪就职通电发表后，冯、李、刘、石均先后各在所在地就职，唐无表示，张则始终未同意。但扩大会议组织政府的工作既已揭开，南北对峙之局，究竟谁胜谁负，一方面决定于前线的军事，尤其重要的，即东北张学良的态度究将倒向何方。此在下节将详细说到，于此先说一个故事。阎锡山选定九月九日就任国府主席，据说他认为以后定为“九九”纪念，谐音“久久”，寓长治久安之意。当时有好事者打趣说：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时，合为“四九三十六”，俗话说“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扩大会议其不能久乎？其后因东北军进关，扩大会议于九月十九日撤离平津，距阎等就职开府之时仅十天，真可谓“短命政府”矣。

二 张学良的沉机观变与武装干涉

扩大会议反蒋之时，东北的张学良成为双方激烈争取的对象。因中原大战持久不决，张学良的地位更有举足轻重之势。如张从阎、冯反蒋，则政治上军事上对蒋打击更大，蒋倒更易。张如从蒋袭阎、冯之后，则东北军一进平津，扩大会议便失其凭依。张学良深知自己地位重要，但外有日本强敌，内则父丧未久，内部尚未完全巩固，不敢贸然有所行动，故初期采沉机观变态度。三月一日，张学良曾发“东电”，指陈兵凶战危，内外环伺，恳劝双方息争，各退一步，和平解决。其后，张借葫芦岛开港典礼避居北戴河，各方代表云集，张均接见，但不表示明确态度。八月二十二日，覃振、陈公

博、郭泰祺相偕去北戴河，二十三日见张。二十四日晚张在顾维钧别墅与三人长谈，表示四点：（一）东北行动，只求有利于国，决不谋私利；(二)内外交迫，国危民困，希双方各退一步；（三）须回沈阳召开会议商决；(四)目前一切尚在研究中。时阎锡山代表温寿泉、贾景德、孔繁蔚等，蒋介石代表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冯玉祥代表门致中、薛笃弼等先后访张，张对各方均无具体表示。正当冯玉祥在平汉、陇海两线上的军事频传捷报的时候，阎锡山的晋军在山东济南弃守，遂引起津浦线战局的变化。这时，张学良避居之北戴河海滨，宛成时局中心。蒋方代表张群死守不去，阎、冯代表贾景德、薛笃弼因孙传芳之介访张，但均未谈出具体办法。张学良在北戴河表面上游泳打球，看似闲适，实际上他正根据各方情况，深沉考虑东北方面的行动方针。中原军事局势愈形胶着，双方对张争取愈力。蒋介石一方面以陆海空军副司令饵张，并发表东北方面的胡若愚为青岛市长，王家桢为外交次长，以示拉拢；一方面加派南京国民党中以亲法而又以阴谋著称的李石曾于八月二十七日由营口到北戴河访法国驻华公使有所接洽。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于二十六日访张学良，二十七日下午张又赴蓝使别墅打网球。这可以看出南京政府正勾结英法帝国主义者通过其驻华使节对张施加影响。张学良在蒋介石的多方推动下，态度乃转向蒋方，并于八月三十日黎明前离海滨回沈阳，召集东北高级干部会议。李石曾立即追去。阎、冯代表贾景德、薛笃弼分别到郑州、石家庄谒阎、冯请示后，深夜回平谒汪。时汪已入睡，特从床上起来与薛、贾密谈甚久。薛等见汪传达阎、冯意见后，即匆匆衔命出关再访张学良。同时，阎、冯所属高级将领徐永昌、鹿锺麟等复通电请张学良合作，“早安大局”。这种密锣紧鼓的形势，识者固早已料及东北态度即将揭开矣。然而，“当局者迷”。八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对天津《大公报》驻平记者谈话，还说：“张汉卿（学良字)对北方表示好感,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郭复初(泰祺)并携张致余亲笔信归来，本人对张感想极佳……。”实际上张学良这时的态度，已经不是“对北方表示好感”了。九月十七日上午，张学良召见所部四个旅长指示机宜，下午接见贾景德、薛笃弼、孙传芳，明示东北方面态度。九月十八日张学良发表“巧电”，根据三月“东电”，呼吁和平，希望息争，“静待中枢解决”。张并对天津《大公报》当时驻沈阳特派记者胡政之发表谈话：“余两星期来静候阎公利用我，使任缓冲之地，负调停之责，乃迄今未有所表示，而惟以添推东北方面之国府委员与部长等事相商，实非余所愿闻……。今日兵连祸结，徒苦吾民，而双方绝对的胜负，似均无大希望，……故余不得已而被迫出兵干涉……。”张并对记者明言他的政治立场系在南京国民政府之下，但“亦不尽与宁府期望吻合，”系“站在中间而偏向南方”云云。张学良的态度既明，而汪、阎等又应付失机，阎遂于十八日拍发倒填日期之寒电（十四日），表示退避三舍。扩会汪以次诸人莫明所以，托冀贡泉、丁春膏电阎、冯询问。十八日深夜得张电全文，又忽视其中“静候中央措置”的严重意义，还幻想张不致出兵。故汪精卫于十九日还致张学良皓电（十九日），提出国民会议、三全大会、约法和对湘赣“共祸”忧虑等党政重要问题与张商量，直至十九日傍晚，汪等知东北军已经动员，始觉事态严重，临时在怀仁堂集会，商量撤移石家庄转太原的办法。这个会我曾参加，当时谣言颇多，会上情形显得慌乱。会议首先就张电及东北军态度交换看法，考虑汪等重要人物必须立即离平，以防不测；其次则高级干部及眷属等之安置亦费周章，而最重要的必须筹到一笔款项，调拨一批交通工具。当时除商定由赵丕廉负责筹款并与有关方面商洽交通运输

事宜外，并决定：(一)扩大会议及国民政府撤移太原；(二)汪等先行南下与阎、冯晤商善后；(三)高级干部次日转石家庄入太原，一般工作人员听便。事变之来既是如此突然，而我当时年纪尚轻，政治生活经验太少，看到怀仁堂顿时人影憧憧、一片倾箱倒箧撤取文件和器物的慌乱情形，颇感到有点象看《红楼梦》里宁国府被查抄时的味道。汪精卫等于九月二十日晨四时四十分由平出发，车行至琉璃河，晤冯派来之代表邓哲熙等，据谓前方军事情况甚好，后方不可轻自动摇，意欲劝汪等折回北平再看。经汪等在车上临时会商，决定汪精卫、谢持等六人仍南下，须与阎、冯晤商下一步办法，而赵戴文等十余人则偕邓哲熙等折回，并宣称阎、汪即将回平组织政府。及至二十一日晨四时四十分，贾、薛自东北归来，知北平不可久留，即于八时乘车赴石家庄。据说当时阎左右如赵戴文等还认为张学良"巧电"仅主和平，并无他意，尚可与之接洽转圜办法，真所谓"见了棺材还不下泪"了。

三 撤退到太原以后

阎锡山原本是山西的土皇帝，遭逢时会，得以盘踞华北六个省市，这回为了抵抗蒋介石的压迫，不得不联合汪、冯、桂各派，搞起一个扩大会议，公然组织政府，意欲问鼎中原。张学良进兵平津，扩大会议被迫撤移太原，一时正太道上，军旅辐辏，太原城中，居民拥挤。阎既失去平、津、冀地盘，财政税收大减，商业贸易不振，又加以数十万军队的饷糈供应，各方大小人物的接待，以及政治、军事、经济的善后办法，在在使这个作了二十年土皇帝的不倒翁，捉襟见肘，伤透了脑筋。我于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一日随扩大会议撤出北平，在石家庄正太饭店住一宿，二十二日到太原。初时扩大会议人员未到齐，一切活动几乎停顿。山西朋友好客，我们吃了不少的"全羊席"，喝了不少汾酒。晚间唯一的娱乐，就是到山西大戏院听梆子戏。有次，一个丑角讽刺阎老西引进大批外来人把山西吃穷了，连醋也喝光了，出语幽默，观众鼓掌，弄得我们啼笑皆非。我曾到太原图书馆和什么"宣讲团"等机关去看过，想要找份外省的报刊，是极困难的。阎锡山用封锁政策对待一切省外的书报刊物，使老百姓耳聋眼瞎，只知道阎锡山，不知其他。这也是"模范省"的治绩之一。

蒋介石为了要迫使汪、阎、冯下野，天天派飞机轰炸太原，扰乱市廛，摇动人心。太原的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扩大会议这帮人，初时尚未感觉威胁，不久，秋风萧瑟，衣服单薄，许多人拖儿带女，就不免有"九月寒衣待剪裁"之感。汪精卫看到这种情形，曾送给每人五十元，钱虽不多，雪里送炭，大家还很感激他的"关切"呢！飞机轰炸的恶果，使太原市面更加萧条，金融更加混乱，白天城内沉寂无人，掌灯以后，始见市场活动。"山西票骤跌至每一百元换三百二十元，开未有之纪录"[1]。阎锡山把扩大会议拖到太原，在政治上是个累赘，经济上是个包袱，大家都已意识到"终非长策"。

由于政治前途的暗淡，改组派内部当时极为动荡。有些人原本不赞成汪北来搞扩大会议，至此更加消极。有些人从这一幕政治剧中得出初步教训，认为汪精卫和改组派已没有任何政治前途，不投降蒋介石，就只有当共产党去，后来也有人走上了这条革命道

① 见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一日天津《大公报》太原通讯。

路。所以扩大会议的失败，便是改组派的终结，从组织上讲，以后已经没有什么改组派的活动，而只剩下改组派分子的个人活动了。

改组派的二号首领陈公博，在上海办《革命评论》和大陆大学时，由于高唱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和主张恢复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精神等欺骗性言论，对于当时一些认识不清、徬徨歧路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起了一些迷惑作用。受他欺骗的人不在少数，我也算是其中之一个。当陈公博先汪精卫北来时，我们不少人对他整天周旋于军阀政客之间很不满意，或写信骂他，或当面责问他，而他则愁眉苦脸，似有难言之隐。我们要他转信给汪精卫，请不要北来与阎锡山合作，他表示汪的态度取决于北来对倒蒋是否有利，能倒蒋，则一切待蒋倒后再说，那时会比较好办。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但也说不出更多的理由。在扩大会议期间，陈公博的处境是比较困难的，汪精卫受了顾孟余"超阶级论"的影响，对陈的"农工小市民同盟"说不很支持，改组派内部对陈的言论和他北来后的行动不一致表示不满，而其他派系则又把陈看成可怕人物，集中目标攻击他。所以陈公博当时的情绪一直不高，意态消沉。撤退到太原以后，他更无聊已极，借酒消愁。当时太原有个女伶叫粉菊花，略有姿色，唱腔也还清脆，一时"趋之若鹜"。陈公博也常去看戏捧场。扩大会议秘书马小进是广东人，和陈混得较熟，便冒陈之名写了一首打油诗，描写陈的苦闷心情，诗曰："国事真成'丢那妈'(广东骂人土话)，党员心思乱如麻，从来不喝山西醋，今日喜看粉菊花。"亦可见当时这班人的无聊了。扩大会议在太原期间，陈树人、经亨颐等喜作诗画，当时陈曾为经写晋祠周柏一幅，柏枝倾斜，晋水流其下，题诗者甚众。冯玉祥曾题一绝云："大树苍翠数千载，虽然倾斜诚大观，饱经世间冷暖事，能耐风霜不畏寒。"颇有不怕失败的气概。汪精卫离太原时，经曾持此画请题诗，汪即席挥毫题一绝云："枕流端为听寒泉，别有虬枝接上天，此树得毋同卧佛，沉沉一睡二千年。"旧中国的士大夫，搞政治失败后，每喜作诗弄画，名为排遣，实亦遮羞耳。

四　汪精卫的最后一着棋

汪精卫以国民党内民主派首领自居，在扩大会议以前，他发表过一系列的有关民主政治、约法、民权等一类的文章②。他在扩大会议提出的两个基本口号，一为召集国民会议，一为制定基本大法，是针对当时蒋介石"假党治之名，行个人独裁之实"做文章的，也是想迎合当时一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结束党治、实现民治"的愿望的。汪精卫看到蒋介石抓住了军队做个人独裁的本钱，认为要打倒蒋介石，必须祭起"民主政治"这块灵牌。不过，汪精卫的"悲剧"，在于他的实际政治行动，否定了他自己的政治主张。比如他到北平来和阎锡山等军阀搞什么扩大会议，就连跟随他的改组派一帮人，也认为他的行动和他的主张不一致，没有什么前途。汪精卫在扩大会议撤退到太原以后，知道大势已去，但他仍坚持要由扩大会议通过约法草案，宣布于全国。他自己亲自主持约法起草委员会，在太原傅公祠与当时扩会礼聘的几位法学专家吕复等共同草拟约法草案。草案全文共八章，计二百一十条，以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为第一章，第二章为人民之自由权利义务，第三章国权，第四章中央制度，第五章地方制

② 见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大公报》。

度，第六章教育，第七章生计，第八章附则。经过一月余的努力，汪精卫几乎每天必到，亲自督率，终于完成了一部约法草案。汪并漏夜自拟约法宣言，说明约法旨趣着重人民之权利义务，并根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及孙文学说，说明“训政时期，须颁布约法，以之规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当此时期，苟无根本大法以规定政府当局与人民之关系，则政府必流于专制，而民主政治终末由养成……”。宣言特别指责蒋介石歪曲孙中山先生以党治国之义，假党治以行个人独裁，“遂至训政其名，个人独裁其实，人民呻吟憔悴于虐政之下，而国家分崩离析之祸，遂再见于今”。汪在为召集扩大会议时所起草的宣言中曾强调指出，国民会议的最大作用，是要使封建势力的环境，变成民主势力的环境。他还曾在另一论文中指出：“欲养成民主势力，须自实行地方自治始；欲实行地方自治，须自组织民众始”[1]。这个约法草案宣言，基本精神与扩大会议宣言一致。汪精卫懂得，只有抓住所谓“民主政治”这个幌子，才能使倒蒋运动变成一个表面看来似乎不是个人权利之争的政治运动。这些漂亮的口号和词句，原是汪精卫惯有的骗人本领，也是一切资产阶级伪善者玩弄政治花招的手法，我们当时是受其迷惑，信以为真的。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七日，汪精卫在太原扩大会议举行最后一次纪念周，说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空话。接着便召开约法会议，逐条宣读约法草案，于下午五时草案全部通过，并由汪当场宣读所起草之宣言，仅修改数字，全文通过。是夜汪亲自督率秘书人员整理完毕，于二十八日用扩大会议名义公布[2]。汪精卫在扩大会议面临崩溃时，还要出此最后一着棋，搞出这样一个约法草案，其目的不仅在为这次倒蒋运动收尾，为以后的倒蒋运动创造政治条件，而最重要的，则是拿这个约法草案作为政治上失败的一块遮羞布。

（原载《文史资料》16辑）

---

① 一九三〇年四月四日天津《大公报》，汪精卫：《欲行地方自治，须自组织民众始》。

② 见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九、三十、三十一日及十一月一日天津《大公报》：《太原扩会的约法草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

自七月初旬武汉国民党中央公开的反动以来，本党中央政治局已因转入秘密状态而组织上有所改变，即派定五人为常务委员会，代表中央政治局职权，并决定派独秀同志赴莫斯科决定此后之总政策。当时即先接受国际电令，宣言本党党员退出国民政府，号召国民党党员群众及一般民众起来反对背叛革命的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即七月十三日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这一关键已是本党改变政策之开始。不久，国际方面又有电令来召集全党紧急的正式会议，以审查旧政策及旧指导机关，而决定新的政策。但是，那时正是七月底的时候，时局紧急，因此先由常委发出七月二十九日的中国共产党告国民党同志书；同时，设法召集附近各省代表准备开会。可是也因为时局紧张，交通异常不便，不但北方、上海、广东等地代表来不及召集，就是江西代表虽经召集也不能到会，直到八月七日，各地到会的只有湖南代表及尚未赴上海之新书记中夏同志，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这一会议，到者有中央委员十二人，候补委员三人，青年团中央委员五人，地方代表二人。国际新代表出席报告召集这次会议之意义，——虽因人数不足不能作为全党正式的紧急会议，但是这八七会议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议事日程如下：

（1）国际代表报告。

（2）紧急会议告全党同志书。

（3）党的新任务报告——分为四项：一、建设告国民党革命同志书中的左派国民党政纲。二、最近农民争斗决议案。三、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四、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

（4）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

会议结果，通过上述各议案，兹印布如下，并选举临时政治局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

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鉴：

一　绪　　言

同志们！

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现在致书于全体同志的时候，正是很困难危险的时期——伟大的中国革命遇到了极艰巨的磨折。今年四月间蒋介石在上海发端的反革命政策，如今在武汉政府领域之内继续发展而完成。三个月以前，武汉政府曾经宣布，蒋介石是革命叛徒，现在呢？它自己学了蒋介石的榜样反革命，如今冒国民党之名，甚至冒“左派”国民党之名，来摧残工农运动，在武汉领域之内与蒋介石之治下是一样的；他们所用的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农民协会被解散、被禁止，几百几千的工农运动的指导同志被武汉政府的将领所残杀，农民运动所及的区域，无不受反革命的清乡所蹂躏；工人亦是到处受摧残，他们的武装被解除，他们的工会日益受着压迫或占领，他们的指导者亦被残杀，工会机关之中到处遇见军阀豪绅指派来的走狗。压迫得尤其严重的，便是我们的党。一切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从反动军阀一直到被革命所吓慌的小资产阶级。然而现在他们不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蒋介石所领导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为人民之敌，却称共产党为人民之公敌。国民党现在的领袖汪精卫等，卑劣无耻的背叛了国民党的主义及传统，接受军阀的命令而与共产党破裂。国民党驱逐军队中的共产党党员，我们的党不得不秘密起来；因为反动派要想完全消灭我们。反革命暂时的得着了胜利，正拿着武装来对付劳动阶级。如果现在所有的工会还没有捣毁净尽，如果工农运动的指导者还没有完全被杀，如果政府还在宣言保全工农团体，那末，这不过是因为反革命的军阀和国民党的领袖还没有完全集中团聚自己的力量。

我们要知道，如果群众运动不能够起来坚决的反抗，最近期间白色恐怖决不会减弱，只有越发厉害。我们对于国民政府的“尊重”工农，没有丝毫的幻想！这所谓国民政府是什么？它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之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了军阀的工具。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汪精卫之类，见着革命发展便吓慌了，宁可背叛国民党的主义，完全走进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对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派，现时还有些用处；因为革命运动的力量没有完全镇压下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用国民党的这些叛徒，好暂时冒着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招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其实已经背叛了，出卖了革命的国民党之光荣的旗帜。

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汪精卫、孙科等大多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既已走到

反动方面去，自然不是国民党的代表和领袖。所以一切工人农民都应当知道，最近期间的白色恐怖，要在汪精卫叛徒的旗帜之下而实行，而且要一天天的厉害起来，只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积极起来反抗，实行革命的斗争，才能夺去篡窃国民党旗帜以实行白色恐怖的叛徒之武器，而扑灭反革命。

现在的形势是反革命派屠杀工农群众，压迫群众运动，捣乱工农团体；所以中央委员会首先要告诉你们的，便是你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中国共产党从群众运动里发展成了伟大的力量，在革命斗争的时期，它的作用是绝对的伟大的，现在我们党的作用更加要大了。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中国问题的历次决议，都说党的政策及党的指导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过去中国革命的进程，大半与本党政策有关系的。将来革命的命运在形势变更之后，更加要靠我们党的政策正确，要看我们党对于形势变更之后的职务之履行如何而定。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最近决议指出，我们党的指挥犯了极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全党积极的自己批评这些错误而纠正它们。这些错误并不是指各个的偶然的错误而说的，而是说党的指导执行了很深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如果不抛弃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纠正过去的错误，那就不能正确的规定将来的工作，自然更不能进行革命的斗争，以适应当前的艰巨职任。要纠正错误的方针，必须指明是怎样错误的，应当要使每个党员都得着过去的教训；我们党如果不纠正指导机关的错误，那就一步也不能向革命的道路前进。工人阶级的革命党，要纠正自己的错误，只有公开的批评这些错误，而且要使全党党员都参加这种批评。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无所忌讳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么，共产主义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深信本党的生命与力量决不致于怕披露和批评我们的疏忽和缺点，甚至于披露之于我们阶级仇敌之前也无所怕。等共产党的敌人幸灾乐祸好了！让他们去乱叫共产党崩坏好了！这种攻击，是吓不了我们的，我们胜过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错误经验里学习出来，绝无畏惧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

我们党有这种伟大的力量，不但因为我们党的阶级性使然，而且因为有群众的奋斗，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群众之奋斗做保证——这些群众是我们党的基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上说："中国共产党英勇的奋斗，中国共产党广大的党员群众，艰苦牺牲的在社会下层工农城市贫民之中，实行真正革命的奋斗"。我们党的指导机关却有机会主义的错误，经常的动摇和犹豫，在紧急关头总是没有坚决行动的决心，指导机关的非共产主义的不革命的理论以及不革命的行为，不但绝对的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相矛盾，并且和我们党员群众工作相反。

譬如说：上海、广东、湖南本党普通党员群众都有过伟大的奋斗，屡次光荣的总同盟罢工，上海三次工人暴动——最后今年三月的一次得着了胜利，这些都是光荣的历史，不但在中国史上有无上的光荣，而且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也是如此。这一页光荣的历史，是上海共产党——无产阶级所写的。

上海无产阶级在共产党指导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性、革命性、阶级意识的坚决和

政治意识的高度，甚至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所不能超越的——那些国里的工人革命运动，差不多都有了几十百年的历史呢。中国共产党可以以上海的共产党群众自豪了；上海工人在蒋介石屠杀之后，虽然受着闻所未闻的压迫，许多最好的指导者（如陈延年、赵世炎及其他同志）被杀，一切运动都压迫到非常秘密的地位，然而仍旧继续着斗争，表现不可摧残的伟大力量。广东的共产党员，领导了铁路工人的暴动以反抗李济琛，领导农民运动的武装暴动能够在各地方继续抗争至两月之久，真正像勇敢坚决牺牲的革命党人，奋斗到最后一滴一点的可能，这些共产党员真正可以做革命形势中工人阶级的先锋的榜样。湖南同志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亦是这样光荣的中国历史里的一页，农民协会的实际的政权，是共产党员领导而农民群众所创造的；自动没收大地主土地，分配土地于乡村农民，解除豪绅团防的武装，创立武装的农民军，严厉的镇压封建的反动分子，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规模，而且会和国民党下级群众结合革命的联盟——而不是机会主义的联盟——最后组织农民暴动，以反抗长沙的反动政权（这次暴动如果不是中央党部机关在紧急关头采取可耻的退让政策，无疑的是胜利的。）——这都是湖南共产党员努力的成绩。这是解决土地问题最好的方法。其他各省的共产党员群众，亦是如此。党员群众的行动，真正是英勇彻底的革命斗争，这种斗争要忍受很大的牺牲，但是我们党的群众没有怕牺牲的。中国革命之中，他们的奋斗，使得我们的党取得伟大的光荣和信用。党的群众是我们力量之源泉，有他们的帮助，党的指导机关之错误，无论如何大，都是容易纠正的。固然，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动摇犹豫，没有坚决实行的能力，这对于中国民众的革命斗争和共产主义的运动大有损失；然而本党有上海、广东、湖南的经验，决不会因指导机关之错误而陷于败亡。本党一定有这个力量，保证今后有正确的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指导。

二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党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基础在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了解各种阶级在每一革命阶段里的作用，以及共产党的作用。正确些说：是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布尔塞维克的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党的指导每当解决这些革命之根本问题的时候，时常在理论上实践上违背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及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些根本问题上陷于最庸俗的机会主义。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而有生长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它反对帝国主义之压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阶级要求解除闻所未闻的压迫制度与奴隶制度之斗争；这种奴隶制度，正是帝国主义依据中国封建关系以建立其统治之基础。

如果以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相对立，那末，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简直不是布尔塞维克的。共产国际向来反对这一般的观点，认为是最坏的一种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反对以国民革命的职任与阶级斗争的职任相对立的观点，这一类的观点在西欧各国的极左

派与社会民主派之中都有的，其实这是抛弃中国民权革命中无产阶级之领导权，抛弃领导权而争所谓‘劳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之一种，实际上便使无产阶级变成‘民主营垒’的尾巴。”中国革命中各种社会阶级的作用是怎样的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极大部份是依据中国经济的落后，依据于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遗毒，是外国资本无限制剥削中国民众之最好的依据。帝国主义维持着地主豪绅及封建式的行政机关。封建阶级维持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所以非常之明显的是：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时就在以全力反对地主豪绅的政权。封建制度的破坏，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上严重的致命的打击。而要破坏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剧烈的土地革命，愈坚决愈剧烈，农民群众加入斗争的愈多，歼灭地主豪绅的统治愈厉害——则国民运动的规模愈广大，国民运动的胜利愈巩固。

从另一方面观察，外国资本在经济上勾结一部份城市资产阶级（买办），这一部份资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保存而扩大。

至于所谓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呢？那末，他们是受外国资本的竞争而又受其排挤的一部份中国资本。因此，他们被逼而不得不对于帝国主义实行经济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曾经参加中国的革命，甚至有一时期曾经做这一运动的领袖；然而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运动，提出革命的阶级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大大的发展，这些情形，使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变节，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今年四月间，饱受革命运动伟大的规模之恐吓，就要去和帝国主义妥协，他如今和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的大地主相像，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正因为这种情形，更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力争自己真正的阶级要求的斗争，变成民族解放革命所必须的条件。

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免的使它与帝国主义接触而引起最坚决的冲突，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足于掘断帝国主义力量之根源。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之低，真是闻所未闻，这种情形，保证了外国资本在中国取得了最高的利润，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掘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中国工人阶级则因客观状况的关系，是力争中国民族解放最坚决、最彻底、最不妥协的阶级，此种情形，使中国无产阶级应得民族解放运动中之领导权。可是中国无产阶级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国民族的使命，只有随着力争自己的阶级要求的斗争的发展，就是反对外国资本及中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而日益实现这个使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承认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完了’，仿佛在上海屠杀之后，已经开始了别一种工农的阶级革命——这是不对的”。中国革命现时的危机及各种社会阶级力量离合现势，表明并且证明，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彻底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不会和工农群众的斗争开展或土地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且能直接发展广大的下层民众的群众运动。

谁要民众解放革命得到胜利，谁要中国完全脱离外国的压迫，他便应当促进、扩大

并激励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他便应当赞助社会斗争，使之进于全体平民革命之新方式。

至于小资产阶级，则除去少数的反动的成分，与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相勾结的成分，其余一般手工业者、商人、学生、店员及城市贫民，亦因自己客观状况的关系都利于革命的阶级运动之胜利。然而小资产阶级必然是动摇、犹豫徘徊于互相斗争的阶级及革命反革命之间。这种犹豫与动摇，往往对于革命斗争的出路，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但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犹豫的态度，大部分由于革命阶级运动的力量决定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愈坚决愈剧烈，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愈深入，则小资产阶级愈能转向左倾，愈能站到革命的战线上来；反之，如革命的阶级及共产党自己也表现动摇，不彻底、不坚定，则小资产阶级愈加倾向资产阶级的营垒，反革命的营垒。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除自己的坚定与果决外，没有更真实的领导小资产阶级的方法。

列宁屡次的说过："谁要帮助动摇犹豫的人，必先自己开始便应当不动摇不犹豫"。我们是应当记着，社会之中既然发生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便无论如何不能有自己独立的策略；他或者和资产阶级同道，或者和无产阶级同道，无产阶级应当明了小资产阶级之动摇是不可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自己应当有坚决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决目前的问题。

凡此一切，都是对于中国革命中各种动力的估量，足以决定共产党的革命策略的。然而我们党的指导，在理论上，尤其是在实际上，刚刚对于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力量的估量，有一个相反的观点。这就预定党的指导之机会主义动摇犹豫政策。中央完全是孟塞维克派似的，将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相对立，仿佛认为阶级斗争的开展，足以破坏国民革命，而要想叫全党及工人阶级农民都自己来限制阶级的要求，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地主不用革命的斗争方法。中央在六月十九日所发给上海的信，对于上海斗争的指令说："中国革命主要特性之一，是反帝国主义……现在几乎忽略反帝工作"，仿佛专注意于进攻封建制度，而得到不好的结果。中央骂共产党员走得太远了，更叫本党所领导的革命的农民往后退，这一指令里又说："一方面反帝国主义运动消沉下去，别方面工农运动发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资产阶级看来是如此。单调的去武装工农没收土地，高叫非资本主义前途等口号，使小资产阶级怀疑共产党快要革国民党的命，要进行阶级革命而不是国民革命"。这样中央那时认为阶级斗争是一事，国民革命又是一事。这一信里又说："小资产阶级看不见没收土地是国民革命的必要前提，以为只有共产党要没收土地，实行十月革命似的革命，以增加工农的力量，因此小资产阶级不能不提出这种问题，不能不要求限制工农运动，甚至于与共产党破裂。在这种情形之下，能不能完全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呢？如果这样，那就是取消我们的力量，抛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投降蒋介石，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前途。然而能否硬要没收土地武装工农呢？这个结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灭革命的根据地。如果我们不能用相当的方法过渡这种难关，那就是资产阶级胜利。我们应不应当抛弃没收土地武装工农的政策呢？这当然不好。譬如湖南反许的问题，我们已经决定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武装起来，这是独立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末，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将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应当找新的道路。经过新的道路来渡过现在所遇的危机与困难，使革命深入广出，而得到最后的胜利"。这

指令的结论是：中央叫上海的党部“不要看着国民革命运动是工人问题”，而要到各阶级中去宣传反帝国主义，这是说去宣传上海资产阶级。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不革命的非共产主义的方针，足见中央指导机关对于革命的根本问题，对于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性质问题的见解都是错误的。

中央在这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者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整个儿的革命策略，都是本末倒置，中央的这种方针，完全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决议不符，完全与党员群众工人阶级及革命的农民之斗争不符。

谁要替这个机会主义者辩论，或者主张继续这种机会主义，他便永久和共产主义离别了。

三　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就是无产阶级最先进、最革命、阶级觉悟最高的一部分。共产党的工作应当永久从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出发，要求以革命的方法，变更全社会的组织。共产党既然以工人阶级利益为最重要的前提，同时，再要提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时期中客观上可以解决的要求，在这一革命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的时期中，都是如此。共产党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组织工人群众而指导他们的斗争，坚决的力争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争得绝无束缚的工人组织及阶级的工会之完全自由，争得无所限制的罢工权，努力反抗以及消灭工人无权无利的奴隶状况。

这种要求，工人都可以在民权革命中提出，但是必须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独立斗争。共产党应当发展、扩大并激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应当领导工人每次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国际屡次命令中国共产党，要我们尽力量增进工人阶级群众的物质生活，坚决的要求改良工厂生活，提高工人的社会生活，激急的取消一切压迫工人的法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认识自己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同时共产国际指示必须迅速勇敢坚决的实行武装工人和农民，尤其是其中最觉悟最有组织的分子。这一政策国际是认为万分必要的，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和各地工业区工人群众自己斗争是相符的，和本党党员群众的行动亦是相符合的。然而本党指导机关却是走的别条路，它只在阻止缓和阶级斗争和工人的革命行动，中央不去开展推动罢工运动，却同着国民党领袖规定强制的仲裁办法，而且最终决定主权属于政府。在各阶级联盟的政府之下，其先一时期，这一政府而且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却定出如此的策略，这在客观上是有种种的利益，实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实在大大的阻碍工人运动；那时国民党中央有不得政府同意，不能有企业中之罢工之决议，又有要工会不为工人要求而斗争，须要守劳动纪律的决议，我们中央并没有反对。中央以为限制些工人运动，可以保存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没有懂得我们不坚决的拥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只有使资产阶级更加右倾。中央想尽方法限制工人的经济斗争，不使他们为自己阶级直接的利益而斗争，其实这种要求不能实现，便永世也说不到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中央当时规定这种策略，实是因为对于小资产阶级联盟的观察是错误的。对于国民革命之利益的观念也是错误的。

自然爆发而发展的工人运动，自下而上建立了强大的工会，完全在共产党员影响之

下，并且发生了武装的工人纠察队及广大的劳动童子团等等。工人阶级自己觉得有些力量，便直接起来反抗资本家，而资本家早已反革命，对于生产则怠工，故意造成工业的危机，金融的紊乱。只要工会逮捕几个厂主店东，一般资产阶级便大叫其“过火”，如是不仅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跟着乱叫，而且那时本党中央也跟着这样承认，中央有些文件之中坚决说“过火”怎样不好，中央竭力的解说给工人听，说不应占领工厂，即使工厂主的故意闭厂，也不应当，说不可以封店，即使店东故意抬高物价，也不可以，又说决不该自由逮捕，即使那些人显然是反革命党，也是不该。

潮流似的工人阶级向着真正工农民权独裁进行，中央却尽力阻止工人运动走上这条革命的道路。

中央不但没有设法武装工人，它反一遇见资产阶级方面的不满意，立刻便自动的解除武装，解散汉口工人纠察队。为保存与小资产阶级联盟起见，中央便下命令解散劳动童子团。

国民党中央下命令叫工人严守革命纪律，还要工会去执行，违法者交政府管理，工会只准处罚工人。我们中央对于这个命令，一句话也没有提出抗议，湖北省总工会接受这等命令，中央亦加以默认。中央对于工人阶级表现的独立性，每次都说是“过火”或“幼稚”，没有注意自己所说的话，实在是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的话。

党的指导机关的错误策略，不但在工人的经济斗争上是如此，而且关于工人的政治行动，也是如此；武汉工人夺回英租界，是有很大的历史意义的，但是这不但不是经过党的指导机关而实行的，并且中央在事后还说这是不对的。最近中央曾倾向于自动取消上海的秘密工会，而使它们加入蒋介石的黄色工会。对于群众的惧怕，不信任群众的力量——在党内问题里也是如此。党的指导机关里占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要求之后，方才将几个工人加入指导机关。许多工会之中指导者的党员也不是工人，而是学生、知识分子。当要办党校的时候，中央非常坚决的要使工人分子减少些，说工人文化太低，政治意识不发达、不觉悟；然而事实上，譬如上海的工人，其政治意识比党的指导机关高的多。我们党和这种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透彻的机会主义，必须断绝关系，永不沾染。

四　中国共产党与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共产国际特别说明这一问题不止一次了。这许多时候，共产国际曾经给我们中国党明显清楚的指示，指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亦就是继续以前的指示。这一决议说：“要引群众来斗争，只有在农村中依据土地革命，在城市中依据工人阶级需要之满足及其政治权利的保障；坚决取消富豪的田租，分配土地，没收地主、寺院、官僚等一切土地；取消贫农所欠重利盘剥者的债务，禁止苛约，坚决的要求减税，而使富人多负税捐的责任，这些要求应当实行之于全国，首先是武汉政府领域之内。这些要求应当可以引起群众反对地主及背叛革命的资产阶级，并反抗北方军阀。”土地革命，其中包含没收土地及土地国有——这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之内容。现时主要的是要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几千百万农民自己自下而上的解

决土地问题，而共产党则应当做这一运动的领袖，而领导这一运动，并且共产党应当在政府中实行一种政策，使政府自己赞助土地革命之发展的政策。只有如此，方能将现时的政府变成工农运动的组织上、政治上的中心，变成工农独裁的机关。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工作，恰好和这种革命方针绝对相反；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豪绅地主，然而这都不能算是中央所指示指令的，乃是违背它的指示指令而做出来的。总之，只有自下而上的运动，各地农民运动只有下级党部及党员群众领导着，中央只是时时阻滞革命的农民运动，甚至于拉它向后转。党的指导机关，一直没有注意中国革命中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第五次大会以前，党的指导机关对于土地问题，只有绝少的注意。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在汉口开的中央特别会议，提都没有提到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态度，虽然这一会议是北伐胜利后决定党的任务的重要会议。各省历次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时，本党亦没有规定自己对于土地的政策（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及一九二七年一月江西省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直到今年三月湖北的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方才提出这一问题。

在第五次大会时，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通过了，但是党的领袖陈独秀、谭平山同志，却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

国民党中央的土地委员会开了三个礼拜，以谭平山为领袖的共产党员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两次都是看着国民党代表是否接受而改变的；最后拟出了一个草案，只在原则上定出解决土地问题，而不求立即解决，当到国民党中央决定不公布这一议决案，共产党党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抗议的。

共产党湖南省（第七次）省委扩大会议，甚至决定凡田租超过收入百分之五十者，始行要求减租——这个时候是湖南农民协会开始积极的斗争，甚至于已经实行分配土地的时候了，我党指导机关口头上承认某几种错误，然而始终继续阻滞土地革命的方针到底。我们党实际上跟着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领袖，尽力在那里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

党的指导机关的方针，客观上反对土地革命的方针，六月一日中央宣传部通告说：“我们应当记着，我们党对于农民的政策，是坚决的实行制止反对小地主、革命军人、小资产阶级的过火行动”，六月十四日的通告又说：“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甚至于有一种论调，说武汉境内的过火行动是蒋介石奸细所做的——这简直是跟着武汉将军们说话，因为他们也说这些过火行动是蒋介石的奸细做的，共产党的指导者也居然这样替压迫农民运动的人辩护。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说：“蒋介石及土豪劣绅，利用少数农民，侵犯军人家属的事，专门从事挑拨离间，他们为左倾之宣传，然后再从而压迫农民运动”。中国共产党负责指导者之一曾经说：“自由逮捕，使小资产阶级发颤不安，他们觉得仿佛国民政府做了共产党的俘虏了，他们这种感想必使之消灭”。

如此说来，伟大的湖南农民暴动，不但惊吓了资产阶级的地主军阀，甚至于惊吓了共产党的指挥者；那时正是各地共产党群众力争这个运动的发展，勇敢的牺牲的精神非常之可贵，然而中央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对于农民政权问题，也是非常之机会主义的，不去考察农民群众革命斗争的

经验而引出相当的结论来，却想只靠着死板组织乡村自治的系统表——说不合实际生活，又有害于革命，其实自然的潮流已经将革命的政权交付于农民协会，发动了没收大地主土地及减租的运动，解除了民团豪绅的武装，惩治乡村中的反革命派。

党的中央不去赞助并发展这一革命政权的方式，反而同意国民党中央提出死板的组织农村自治。这乡村自治的意义是怎样呢？只要看全国农民协会的训令是怎样的就可以知道了。这一训令上说："建立乡村自治以巩固农民之胜利，而消灭乡村中之无政府状态。"

党的中央坚决反对均分财产、自由罚款及逮捕土豪，正月二十五日中央便说："贫农的幼稚行为，使小资产阶级离开我们……。"中央虽不敢公开的反对没收土地，然而实际上却是取消这一口号。正月二十五日的决议上说："关于土地问题，我们固然不能放弃第五次大会所议决的政纲，但我们须知道中国土地问题尚须经过一相当的宣传时期，并且必须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因此，我们即须：（一）扩大土地问题在各方面之宣传，尤其在军队中；（二）着手建立乡村自治政权及县自治政权。"如果将这一决议和中央没有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并将坚决反对分地之事实并在一块儿看，那末，中央反对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方针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一种策略，对于湖南政变中本党的行动，有异常之恶劣的影响。长沙事变之后，因湖南共产党员的建议，征调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如果农民的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指导机关之懦弱的犹豫的阻滞，那末，一个长沙城被十万农军所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最后的几分钟，正当进攻长沙的前夜，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湖南党部的指导者下了一个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说武装进攻长沙可以引起整个政局之纠纷，应当等一等中央的训令。隔了一天，中央的信到了，也说应当等一等进攻，先团结些力量，等国民政府来解决。停止进攻的命令送到了各地农军，大多数农军因此而退却，只有两大队偶然没有接到命令，居然冲城攻打反革命派，经过坚决的奋斗，方始因为众寡不敌而败退。这一总败退的结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凯歌，后来弄到几日全省的大反动。中央在农民暴动的关头，表现这样没有斗争的决心，简直等于出卖革命，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辩护的，的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中央何以决定停止暴动呢？只有看看二十六日的议决案："现在本党的职任，既不是推翻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路；要找这中间的路，现在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深厚自己的力量，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中央表现如此可耻的无决心，实际上不是帮助农民运动等候时机，乃是帮助反革命的长沙叛徒等候时机。长沙事变时，中央的投降政策到了如何地步，只要看当时决定赞助唐生智专电的主张。中央总说唐生智的好话，引起许多幻想，仿佛长沙事变是违反唐生智的志愿似的；中央虽然有时在口头上提出对于长沙摧残工农团体的抗议，并要求惩办反革命的叛徒，然而中央在实际上的动摇犹豫，完全帮忙了湖南事变的反革命派巩固政权。

这种败亡的失策，应当给我们以严重的教训，中央于农民问题上的机会主义竟如此之深远，甚至于弄到所有紧急关头与指示，都带着有背叛群众运动的性质。

共产党在国民政府中的代表谭平山的行为，亦是如此之可耻，农政部坚决的拒绝赞助土地革命，想使农民运动就范，走上资产阶级式改良主义的道路。农政部五月里出了

一个布告说："必须纠正农民幼稚行为，尤其不能不惩办其出轨范而侵害无数农民之分子；至于与反革命奋斗，惩办土豪劣绅，则须以合法的手续进行，遵照党及政府之训令规章，即须交付正式官厅，不得自由行动！"这一布告及一切农政部的行为，最足以表现本党当时对于土地问题之反革命的妥协的方针。如果全党都照着这种方针的精神去行动，那末，我们的党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也不是革命的了。幸而党员群众下级党部的实际工作，完全和中央这种方针相反，所以虽然上面竭力在那里阻滞这些工作，我们党始终能保证对于农民群众有正确的指导。

五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指导政策，亦是遭了同样的妥协主义错误的铁链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此问题的理论与实际，决不与共产国际之指示及党下层机关之活动相似。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应持的态度，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议决案上有特别详细的规定，但在此决议中的那些指令，早已在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前给过中国共产党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之观点，曾经向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有过完善的通知，但我们中央在实际上的动作，恰与国际的方针相违背，这是证明党的指导如何深远的在那里执行自己的妥协路线。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有下面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的先锋，保有自己的政治面貌，与最左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的政治面貌要有区别。

"共产党在任何环境中，不能与其他任何政治组织相混合，它应有独立的力量；它是一国之内的特别阶级，即无产阶级最彻底、最革命的阶级组织。因此，共产党对于宣传自己的观点，在自己旗帜之下动员群众的工作，决不能自己束缚起来；它不应当放弃批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之民权派的动摇不定的权利，只有这种批评，才能推动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左倾，并巩固工人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之领导权。

"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由勇敢的坚决的发展群众运动的任务，中国共产党应当勇敢的坚决的去变国民党为真正包含城市与农村劳动民众的群众组织。

"共产国际指示中央对国民党当前任务，须要有适合它们的组织形式；必须要向多与群众接近的路线上去，尽可能的赶快改组，使广大工农手工业者到国民党的队伍中来；工农兵士与手工业者的组织，实行团体的加入（工会、工厂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手工业者的储蓄组织、兵士的组织、农军、红枪会——除去反革命成分——工人纠察队等），国民党地方与中央机关应完全实行选举制等等。

"只有此等坚决的去发展国民党，使它们成为真正广大的、真正选举的、真正群众的、真正德谟克拉西的组织，才能创造发展中国民权革命之巩固与胜利的前途，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对抗国民党右派一部分动摇分子之不可免的可能的退出（譬如广东的事情），才能最大限度的反对那些背叛的军官。共产党应即时的暴露与蒋介石或帝国

主义妥协的种种动摇政策，并且定出适当的宣传煽动及组织的具体办法。

"中国共产党应保持与发展自己党的组织，增加对于国民党的工作的影响，它要担负起此等任务，则必须完全认识自己的无产阶级的立场，自己政治思想之固定，自己组织之努力与巩固，并吸收工人党员参加党的指导，提高党在广大工农群众中的影响，并发展党在群众中的威权"。

在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所有的活动，简直与国际决议案上所明明白白指出来的路线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对于那些革命的主要问题，如工人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对小资产阶级关系问题，及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问题，所依据的立场，实际上既与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的领袖一样，则它当然不能保障共产党自己独立的政治面貌之任务。中国共产党的中央亦与国民党的指导犯了同样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以致于不是共产党指导国民党，而是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完全在政治上俘虏了共产党的指导者；假使说共产党还没有完全失掉自己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则是因它的下层组织与党的群众的功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方面、可算尽可能的做到了与国民党"右派"指导完全同化的工作。

在大多数省份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革命工作真正在国民党中达到领导的影响，而中央却反对这些组织。在中央五月通过的关于国民党联席会议的议决案（国民党工作大纲）上说："共产党员在联席会议应讨论各种主要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这些具体的建议不应根据我们党的最大要求，而应注意到民族革命发展的利益与团结国民党的左派"。从这个中央决议中，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一，"共产党的最大要求"与民众运动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不相容，互相冲突的两方面；二，共产党的"具体建议"不应当建筑在党的"最大要求"，就是说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不适用共产党的政纲、策略与一般的政治路线；三，民族革命运动与国民党"左派"，只有在共产党放弃自己"最大要求"的条件下才能发展。共产党对于国民党运动的正确策略之失败，恐莫此为甚吧！

再此决议上又说："在国民党报馆服务的党员，不当使此等报纸变为共产党的报纸，而照国民党决议的精神去工作"。这岂不是放弃共产党独立政策与政治路线之表示?!岂不是完全服从国民党之指导?!

共产党的这种"服从作用"，它的领袖还正式承认，还以为这是很正确、很适合革命利益的呢！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党团作用（如联席会议之上），实际上已经被党的指导者所完全取消。在某一次国共中央联席会议上，汪精卫说：只有国民党中央有认可与公布通过的决议之权，而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的回答，竟同意于这种办法。共产党领袖也有这样说的：一方面自然共产党员不应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但在别一方面则又不能保持百分之一的独立，因为我们现在还须与国民党联合。有了这种根本修改革命的多数主义策略基础的妥协办法，还要装出庄严的样子说，这是实际的"共产主义的策略"。共产党领袖简直没有想过政治上的独立，那末，对于国民党的动摇、不彻底的骑墙政策，实际上当然不会有什么批评，共产国际所要求的彻底激烈的公开的批评，当然更不用说了。关于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中央在党整个公开的时期中，都没有打算出版一份党的日报（虽然国际之多次催促），中央关心的不是这些事，而是怎样使共产党员不在国民党报上发表共产主义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中央不看见国民党群众，永远没有打算

过与他们接近，而只看见领袖。

对于领袖作用的估计过分，而估计群众作用太低的流弊，可以从党对于许多主要问题的估量看得出来。党总是想着应当看某某领袖对此的态度如何，应当使其中立；但不是说工人农民群众对此的态度如何。譬如为要使李济琛在广东中立，所以把改选国民党省党部的口号取消；为要使汪精卫中立，所以把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四月）对于土地问题的建议取消；为要使唐生智中立，所以不提出免他的职的口号；所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由“左派”的领袖之愿欲来确定，而“左派”领袖之愿欲，就是武汉军阀的要求。因为“左派”要求共产党人到东联去工作，而中央要停开第五次大会，或如中央一向赞成北伐，但当“左派”决定东征，则中央也马上通过那样的议决；虽然中央以前很坚决的反对国际代表不主张向北去的建议。在其他许多重要问题，都是如此。

这个空前的妥协的机会主义的路线，是系于一个总的理论。最近几月来中央行动的总出发点（特别是自夏斗寅叛变起），就是所谓现时必须退让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确信，并且还要使全党及我党所指导的群众确信下列的理论：共产党及跟它革命的工人与农民已经走得“太远”了，现在必须退让，以挽救与国民党的联合；当土地革命刚刚开始发展，当工农的群众运动刚刚走入大道，并且群众自已想到武装自卫的组织，正需要共产党的积极参加，使革命发展并巩固与国民党群众之实际联合，筑下巩固的革命基础的时期，而共产党的指导者却说“要退步，要退步”，以为这样就可以营救自己在国民党的状况，创造了整个退让的理论。但可惜这不仅是一个理论，而且还要步步实现于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中，拒绝土地革命，为着所谓“过火”，赞成成批的解散工农的组织，以同样的口号去解散劳动童子团。在湖南问题的胆怯政策与最后所干的自动解除武装的纠察队，所有这些都是最近几月内中央所指导的整个的退让投降的政策之一部分。

这条退让投降的道路，集大成于六月卅号中央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十一条国共两党关系的议决案，现在指几条出来看看：

“（四）中国国民党既然是反帝国主义之工农及小资产阶级所联盟的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

（五）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分子，虽然参加政府（中央及地方）工作，而只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不是以共产党员资格参加；两党联席会议，是协商决定共同负责，而不是两党公开执行形式，这件事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现在参加政府工作之共产党分子，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

（六）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等民众运动之要求，应依照国民党大会与中央会议之议决案及政府公布之法令；但国民党员亦应该依据党的议决案及政府之法令，保护工农群众之组织自由及利益。

（七）依照国民党主义，须武装农民，但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为因避免政局之纠纷或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

（八）工会及工人纠察队不得党部或政府之许可，不得执行司法行政权，如捕人、审判及巡逻街市等事。

（九）店员工会应即由党部会同省总工会派员组织，店员的经济要求不得超过

店东的经济能力以上，工会不得干涉店东的用人权、管理权、更不能侮辱店东，如逮捕、罚款、戴高帽子等事。

（十）童子团执行警察职务，如捕人、干涉行人等事，应严行禁止。”

这不仅是机会主义与妥协了，这简直客观上是十足的取消派，不仅完全放弃共产党的独立，并且取消了一般革命群众运动之存在！把所有的群众运动完全交给国民党资产阶级的领袖去监督，并且是自动的交出来，还要说是“照例”。——这不是客观上对于群众运动出卖，对于革命变节是什么呢？

共产党领袖所认识的国民党联合的方法是这样的！这些认识是毫无半点共产主义政策的意味。列宁认为共产党的党员可与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联合、协商，但是在保持共产党的宣传、煽动与政治活动之完全自由必要条件之下才可以的，列宁说，没有这种条件，自然不能与之联合，否则便是叛变。客观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的政策是对共产主义的变节。列宁对于与小资产阶级联合时常说：“要注意”‘友军’如同注意敌人一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则认为应当把中国革命的命运，分给工农运动很明显的敌人。

党应当在过去指导的错误中学习。党应当明了它的力量与它的将来，是建筑在工农群众的身上，在他们的力量与他们的组织上面。党应当要明白以后还是要与国民党联合，但是要与国民党的左派联合；与他们的下层群众，与他们劳动群众的党员，与他们的下层组织联合。那种与武汉国民党中央领袖联合的路已经走不通了，谁能公开的反对国民党中央是国民革命的叛徒，这些叛徒之中，谁配称国民党的左派！最后与我们联盟的左派国民党及其领袖之执行革命政策的程度如何，要看我们党依据于武装工农组织等的实现力量如何，并且要我们党的政策停止动摇，而引群众去督促其领袖，方能决定。所谓左派联盟，实是与革命小资产阶级联盟，我们党应当首先注目于下层群众，如知识分子、手工工人、店员等，赞助他们的政治经济要求；而时时记着一切和小资产阶级上层领袖的联络，大都是靠不住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

六　共产党员之参加国民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对于国民党政策之不正确与违背共产主义，在其参加政府委员的同志的行动上，与党对参加国民政府的整个方针中充分的表现出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对此问题的立场，亦与其他许多主要革命问题一样的，和国际的方针及初步的共产主义政策都发生冲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共产党员参加武汉政府的决议是这样说的：“共产国际执委认为共产党，应当很坚决的在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机关中工作，同时要批评自己同盟者之不坚决，就是最接近的同盟者也要批评，并且要保证政府政策之正确。”

共产国际执委特别叫中国共产党注意：现时革命政府与民众之密切的联系是十二分的必要。只有在这种密切联系的基础上，才能经过国民党而实行这一政策，只有建筑在群众上的方针，才能够渐渐的巩固革命政府的政权，及其为革命之组织中心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巩固武汉政府的这种影响。不能实现这种任务，不能发展群众运动，没有土地革命及坚决改善工人阶级的要求，没有使国民党变为真正的劳动群众的

广大组织，没有继续的巩固工会及发展共产党，武汉政府没有与群众发生密切关系，那就不能使中国革命得到胜利的实现。

共产国际中央认为只有这种政策，才能证实共产党员之参加政府的必要。若无此条件而参加，就带有上层的勾结与政客的结交性质，而他们必须为实际的生活与伟大的阶级斗争进展所摈弃；更要时常使政府工作与群众工作相联系，实是中国共产党必要的任务。

这就是共产国际对于参加政府问题向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但是中国共产党中央与共产党员的部长做了些什么？看事实：

共产党员在得到委令后两月，才开始组织自己的部务。农政部长谭平山（共产党员）就职典礼时的演说，除批评他是可耻之外，没有别的话说。他对于土地革命，没收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政权，都默默无言，他却说了一些自由主义的“改良农民的状况”，反对“过火”的话。谭平山就职后，马上就发表对农民的训令，禁止农民反对豪绅的“妄动”，违反则“严罚”。

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的官僚机关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此数月内，它们没有公布一个减轻工农痛苦状况的法律，没有一个改变城市与乡村中剥削的法律及改良经济关系的法案（劳动法案、减租等，农村自治法等），有些并没有预备向政府提出。这些部长的共产党员的工作，照国际的议决案是聚集自己的力量来与群众联系，来维持群众运动，但实际上则成了最腐烂的资产阶级官僚统治，只是在群众面前消去共产党的面貌；我们没有一个革命的建议，对于武汉政府包蔽反革命之种种错误，也没有一点批评，特别是农政部长的政策，除了说他是反对农民的政策，孟塞维克的政策，简直没有别的适合名称。土地问题应是农政部顶主要的问题，但是完全被它忘却，甚至农政部发到各省调查表，竟无一关于土地关系问题。谭平山同志上任第一件事实，就要打算“镇压”湖南农民运动，中央对此是赞成的，并且还要他到湖南去做出征的领袖，实行恢复“秩序”的任务；这一次出征已经成行，但走到了目的地，而长沙已发生反革命的叛变，这次叛变很敏捷的很彻底的实现了谭平山同志所领导的出征之任务。

当谭平山同志结束他那不光荣的总长之地位时，还是借口长期请假退出的。当反革命渐渐在武汉境域内巩固，当国民党正在酝酿不要共产党参加政府的趋向，以便可以完全的自由压迫工农运动，而与蒋介石及反革命军官妥协时，谭平山同志却很愿去迎合反动军官与多情的国民党领袖之希望。他的胜利的办法，是借口于理想的病症，来实现他的部长假。并且他的请假，是事先与汪精卫商量，然后再与中央讨论的；但中央不仅不反对这种行动，反而完全同意这种计划。因为七月三号中央会议上通过的十一条中有说：“避免纠纷”，同意于临时退出，这是所谓“革命”的政策。

谭平山既因病而请了长假还不够，还要说：“因政局困难不能纳农运于正轨”。共产党部长在最负责任的时期中，由战场上脱逃还不够，而且重新要向农民进攻一次。每个人都应当问一问，从这几句话里得到的什么结论？即：一，农民运动走上不正的道路；二，只有武力能纠正它，因为共产党员的部长，有了共产党与群众组织的完全威权，尚还不能“纳入正轨”呢！这是直接承认许克祥之在湖南，夏斗寅之在湖北的动作是对的，这简直是直接号召反革命们的代表进攻革命。共产党员的部长在政府内做了这些玩意，还不是共产党的最大耻辱吗？但是中央对于谭平山的声明，不仅没有处罚，并

且没有发表一句话。本来中央亦无从反对起，因为这是它自己的政府。

共产国际主张中国共产党参加武汉政府，是为的要更左的去推动此政府到革命的路上去，是为的要消灭所有的反革命成分，并经过坚决的实际的革命斗争去得到广大群众的赞助，变武汉政府为工农民权独裁。中央对此问题的革命提案，完全不了解，它变共产党参加政府为资产阶级改良的部长主义。这与多数派主张共产党员参加“临时革命政府”（一九〇五年）的见解相差不知有多远。当一九〇五年俄国亦是同样的民权革命的任务，亦有无产阶级政党参加革命政府之要求——亦是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的问题，列宁对此，在其“两个策略”的小册子中说：

“我们还应当为临时革命政府，指出一个合于目前历史客观条件，且合于社会民主派目前责任之行动与无产阶级之德谟克拉西的政纲。这个政纲，就是本党的全部的最低限度的政纲，是在现有的社会的经济之关系的基础上，最近尽可实行的政治经济改造的政纲，亦即本党最近将来全能见诸实行的政治要求与经济要求，这是一方面根据社会经济关系的必要；别方面就是为今后斗争起见，为实现社会主义……。

“可是有人反对说：临时政府既为临时的，便不能执行尚未得到全体人民同意的积极的政纲；这种反驳，反只是反动派的一种诡辩法。所谓不执行什么积极的政纲，就是说要忍耐这种专制下的农奴制度，能够忍耐这种制度的，只有背叛革命事业的叛徒政府，而不是为民众暴动机关的政府……无产阶级为要实行自下而上的来威逼政府，就应该武装起来……武装威逼的目的——是为‘保持、巩固并发展革命的胜利’，从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上看来，这些胜利，应为本党全部最低限度党纲之实现……。

“临时革命政府是为革命赶快得到胜利且即时压迫反革命的斗争机关，而决不是求实现一般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之机关……。

“且这种胜利定将成为一种专政，就是它必须要依靠武力，依靠武装的群众和暴动，而不是依靠什么别的机关——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而造成的机关。因为要实现为无产阶级及农民一些急不容缓的要求，必定引起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专制政府之残酷的反抗；只有用专政来对付……没有专政便不能压倒此种反抗与打破反革命之企图……。”

武汉政府现在亦变为专政的机关，但不是工农的专政，而是地主资本家的专政，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之机会主义的政策，即是客观上帮助这种专政的实现的！

七　武装问题与军队之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于武汉政府军队及武装工农的问题之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些错误足以证明我们党对于革命之中这种非常主要的问题，亦有在原则上极不正确之观点。

人人都知道武汉政府之中极大多数（除少数共产党员领导的部队及党所号召进攻的工农）都是雇佣军队，和中国其他军阀的军队是一样的；人人都知道这些军队的将领，大多数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的，能暂时与革命相伴，都是望借此升官发财。对付这种军队的方针，自然应当是“完全注意兵士群众而不是要注重那些反动的将领，要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实行广大的工作，但军阀之中亦有反抗反革命的支柱”。

然而党的指导机关的观念及行动恰恰与此相反，一切政策及工作都只是和将领办外

交，只注重种种方式的军事结合，实际上在兵士之中没有任何作用，并且也并没有丝毫尝试。虽然军事问题很重要，然而第五次大会没有时间去讨论。而中央军委讨论了四月的军队中工作的问题，仍旧是没有决定。

可是和将领谈话办外交却有许多的时间，对于唐生智、朱培德等类的反动派，中央那时的政策都是非常机会主义的，湖南政变反共后大规模的屠杀工农，都是唐生智部下干的，唐生智当然是与谋的，他到后来正式与以合法的承认。然而中央所决定湘赣事件宣传大纲之上说："湖南政变是背叛唐生智的，因唐赞成湖南民权运动，并表示好意于被压迫的农民"（八月十四日）。那时湖南的情形已是很明显的了。

湖南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农民，每一个共产党员听见了这种宣传，岂不要冷笑？然而中央还不限于此种口头上的话，甚至于组织总示威反抗长沙的事件的时候，同时还在欢迎北伐凯旋的北伐将领。这样奇怪的事，居然是事实，居然在武汉实现——难怪汪精卫说共产党勾结军人。

关于朱培德的事亦是如此，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左派国民党员出江西，我们自然要反对这种策略和他们的主谋，然而中央始则等待犹豫，继则决定开始总的反对江西之变动，不提朱培德的姓名，仿佛是说，朱培德总算为人好些，如果他也离开我们，反动更要厉害。这样说来，朱培德还不是江西反革命领袖，而是我们的保标的，所以应当对他要包涵些。党的指导机关机会主义，竟陷落到如此之深。

这种对于军队的态度，也就使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有系统的集聚那零碎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使后者一有组织的坚固力量时，便做发展革命的真实的拥护者；没有想尽方法取得武器以武装工农。中央那时认为武装工农难以实现的，甚至于以为是有害于与国民党军队领袖联合的。经过如此之久的时候，中央忽然"积极"起来，不过恰好是相反的积极，决定叫汉口工人纠察队"为避免挑拨离间的冲突起见"，自动的解除武装，这不是公开的取消主义是什么？

八　党的问题与对国际问题

中央所以陷于机会主义如此之深而能绝不受警戒的去执行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其原因之一，便是党内情形的不好。中央以前受不着群众的监督，不向群众报告，不提出党的政策交一般党员讨论。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的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而"首领"的意见不但应当认为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是无置议的可能，无论如何都是对的。这种执行之下，党的民权主义完全变成空话。甚至于党有极大的公开作用的地方，所谓党的民权主义完全是形式上的，没有党内生活，没有党内的舆论，没有对于指导者的监督，没有党员群众对于指导者的督促；在这种党内情形之下，自然中央只有用命令方法去实行自己的指令，所以它自己也不求真正实行党内的民权主义。

党对于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是完全不合组织的，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无一次遇见这种情形，在如此危机严重的时候，居然坚决的拒绝对共产国际指导机关的命令和决议，这已经不单是简单的破坏纪律问题，而是直接对于中国的及国际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罪恶。

要知道中国革命不但是全国的意义，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主要部分，中国革命的命运，大部分足以决定世界革命的命运呢。中国共产党不但执行极不正确的政策，使革命陷于失败的政策，自动的取消革命而投降；并且很坚决的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服从国际的指导。不但如此，还要故意破坏国际的责任与纪律，甚至认为可以不把国际决议通知全党，使党员得以研究而说出自己的意见。

因此，共产国际最近不得不公开的批评我们中央的政策，而且告诉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以及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

九　结　　论

共产国际严厉的批评我们的中央客观上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的政策。我们承认这一批评完全是应该的，并且承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政策是对的。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最近的指示，给我们以发现这种过去指导错误之可能，救了我们的党，是非常之好的。我们是很坚决的承认过去中央指导有机会主义的不革命的政策，必须根据这种过去的教训根本改变方针。在这一封信里，我们已经在正确的共产主义的观点上，分析过去的错误，我们是坚决的站在列宁主义及共产国际的理论上来分析的，应当要使全党及每一个党员，极注意研究这些问题。应当使全党党员详细的讨论过去党的政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一九二七年七月的）以及这封信便是讨论的根据。党员不能接受过去的教训，他便不能向前进行，不能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

讨论之中应当求得相当的结论。应当不但批评过去党的指导，而除去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的成分，而且必须将全党工作都依照共产主义的革命的审查过，审查事实上转移群众工作的方向；应当在事实上证明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中国劳动阶级的先锋，能够做他们的领袖，而引导他们取得胜利。

必须与工会农会建立密切关系，指导他们，使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这方面去。应当与青年团建立密切的关系，更加多的帮助它的工作，青年团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比党的中央还高些，青年团中央这次完全赞成无产阶级的政策，而要党的中央委员会实行，但是党的中央指导者真是觉得这是有害于那种机会主义政策的，所以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青年团始终站在共产国际政策之上。党应当承认青年团的工作有政治的地位，应当知道同它有密切的关系。最后，虽然政治的压迫非常之严重，也必须实际实行党的民主主义，使党的政策直到党群众之中讨论；在下级党部建立各级党部集体的工作，以促成集体的指导。并且必须尽量设法保持党的组织，勿使为反动派所破获，要建立壁垒森严的秘密组织，但是同时要是能斗争的秘密的党的机关。

在严重的环境之下，不是革命危机的时候，我们要整顿设备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但是我们深信我们的党必定有很充足的力量，以坚决的革命性改进这个变革的关键。我们必须召集全体党员，积极的来帮助党的这件事，我们深信同志们奋斗的坚决性及其对于革命的忠心，实必能使我们战胜一切困难，而坚决的使党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的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必定得到最后的胜利。

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

农民的革命运动在国民政府的境域内有了广大的发展（主要的在湖南），现在却遇见暂时的失败。地主、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成分，依据军队的武力与国民政府的机关联合着进攻，给农民运动以很大的打击。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应当认为是共产党方面对于农民的群众暴动没有坚决的革命指导，这是由于党的指导对于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带有机会主义的犹豫及摇动政策。

共产党对于农民运动指导的摇动不定（由地方机关直至党的中央），是反映小资产阶级之摇动，客观上弄到破坏农民暴动。共产党应当转变过去的方向，坚决的发展与提高农民革命。如果对此问题还要继续的动摇，就有使共产党由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变为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的危险。

虽农民革命运动有暂时的失败与紊乱，但在最近期间不仅客观上有新的提高的可能，而且这种重新高涨是不可免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组织之捣毁，农村中的白色恐怖之盛行，随之而经济压迫之增加等等，都只是加紧农村中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必然准备着新的革命爆发，比前次的规模和力量更要超越。

农民运动不得无产阶级政党有系统的革命指导，很容易无组织的、凌乱的、自然的爆发，反动军阀可以不费力量把他镇压下去，因之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分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在最近的期间，农民暴动的口号应当是：

一、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

二、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

三、没收重利盘剥者财产，用以改良农村中贫民的生活。

四、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

五、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

六、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之。

七、由农民协会取消重利盘剥者的债务、苛刻的租约与苛约。

八、解除民团团防等类的武装与其他地主的军队，而武装农民。

九、改良雇农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工资待遇等等）。

十、对于乡村一般失业贫民，革命政权当尽可能的筹措基金救济之，并与以工作（如协作社等类办法）。

十一、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抗纳，并实行抗租。

国民政府所下的减租二五的命令，很明显的是现在国民党领袖之一种欺骗手段，因之，我们党对于国民政府之决议，应揭破他的阴谋虚伪。因为这种减租不能实现，所以必须提出实行完全抗租的口号，以答复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这一骗人的决议案和命令。对于武汉国民政府，现在已和对于新旧军阀的政府一样，本党必须引导农民反对他。对于每次摧残农民都要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尤其要经常的反对一切豪绅军阀御用的假农民协会。

最近开始暴动的口号之中，本党不提出没收小田主土地的口号，是为着要使城乡间广大的小私有财产者之分子中立，但是，并不是说，当农民运动不免要起而反对出租田地的小田主的时候，共产党可以认为这种事情是过火的，是反革命的。共产党应当力求农民运动之中能有最大的组织性，但是共产党决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咒骂“无政府行为”所吓退——不论自然爆发的农民运动走的如何远，都应当如此。因为本党之农民革命问题上的行动政纲，在这一整个的时期中本是“耕者有其田”这一极通俗的口号，足以引起农民革命运动，一直发展到土地国有及完全重新分配土地。

再则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应当是农民协会的中心，农民暴动之中应当以贫农为主力，联合一般失业的贫民会党等势力——应当明显的定出收取富豪财产以救济贫民之政策。

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

我们革命已经到了最严重而向新的方向进展的时期，必须有新的策略去领导劳动群众起来，发展伟大的组织，猛往直前的奋斗，方能使无产阶级真正获得领导权，而求达工农民权独裁之实现，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联合并领导小资阶级的群众，完成民权革命，而进于社会革命。

此种总的任务之下，职工运动目前的重要点，就是真工会与假工会之战。现在南京武汉政府，已经都是代表封建资产阶级的政权，成为反革命的工具。可是他们仍旧打着国民党是革命的假招牌，还要说保护工农、维持工农等的欺人的空话。因此，他们尽量想法把持伪工会机关——其实这种骗术，多已暴露无遗。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决的领导工人群众反对这些政府，反对北方军阀的政府，对于他们摧残工会或所谓改组工会，都应当立刻坚决的号召群众起来反对。

职工运动中之现时所应特别注意的便是：

（一）工会应当是真正工人阶级的组织，群众的组织，从一般工会机关直到全国总工会，都是在本党指导之下，由群众所选举出来的。现在各地如上海、南京、广东、福建、浙江、安徽等省，以及最近湖北省总工会机关，都被反革命派所占领或改组，全国总工会也遭同样的摧残。蒋介石、李济琛、唐生智、汪精卫、陈公博等，派出御用走狗，把各地工会机关占领。这种冒牌的假工会，工贼工会，我们要尽力去反对他，各工会都要发宣言、示威、罢工及经常的扩大宣传，否认这些假工会，使个个工人都了解真假，并来拥护共产党所领导的原有的真正工会。

（二）工会须由工人做领袖，反对一切反革命御用走狗侵入我们真正工会。因为这些走狗受了帝国主义资本家直接间接的指使，正在用各种方法来欺骗压迫工人：法西斯蒂改良主义同时并进。我们应当派少数得力同志参入假工会之中，做破坏的工作，拆散他们的团体，打倒他们的一切信用，遇有假工会到群众之中活动的时候，便对他们提出工人的要求，以揭露其真相。

（三）本党应当领导群众力争真正工会之公开，实行工人结社集会言论罢工的自由之政治斗争。再则工人阶级目前最急切的要求，便是经济问题，因为不但工人受着一般的经济金融恐慌及资本家的加紧剥削，而且反动潮流之下资本家必定向工人店员进攻，悔弃旧约，取消工人已得之胜利。本党应当领导工人努力于反抗这种反攻及一切剥削的经济斗争。这种经济斗争，不但以改良工人生活为目的，而且可以增进工人的革命化，并强固其战斗力，决用不着怕工人只顾经济斗争而忘却政治，将来成为经济主义。现在中国情况之下，每次经济斗争，只要有共产党的指导，必然增进政治斗争的剧烈，经济斗争是政治胜利的必要条件。

（四）经济斗争之目前要求是：

一、八小时工作制，手工业及店员至多不得超过十小时，童工女工至多不得超过八小时，并不做夜工。

二、失业的救济，应由国家及资产阶级担负（须将失业工人组织成为有力量的团体）。

三、妇女产前产后应有八个星期（五十六天）的休息，照发工资。

四、同样工作，须有同样工资。

五、劳动保险及工厂工人住宅之卫生设备。

六、增加工资，并按照物质高涨照加工资。

七、工资须发现金，不得以信用低落的钞票或国库券等代替。

（五）现在职工运动在严重的压迫之中，各工会应有秘密的组织，以防反革命的摧残，而保存我们的实力；各地工运同志，党团支部，更须加以严密的防护，并绝对服从党的指挥，不能有丝毫疏忽。

（六）现时的严重压迫之下，工人更应当有自卫的秘密组织，然不要重视个人的暗杀政策，当注意组织群众的斗争。

（七）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

（八）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如果反革命的资本家闭厂怠工实行经济封锁，则工会应领导工人实行占领某工厂交与当地革命政府管理。

（九）应选有觉悟的工人到农村间去做农民运动，并可轮流派工人到乡间工作，使工农关系在实际上密切起来。

（十）职工运动中手工工人店员的斗争占极重要的位置——中国大多数小城市中，甚至只有手工工人及店员。本党必须坚决的领导他们斗争，组织他们的职业工会，力争改良他们的生活及政治社会地位。

（十一）职工运动中以后要更加多注意产业工人，特别是铁路、海员、电报、水电、电话、邮政、运输、兵工厂等工人……他们不仅是我们的主要基础，并且在土地革命的阶段中他们是打破封建势力及在城市中的大本营之伟大力量。

（十二）职工运动是本党的基本工作，应改正以前把他看做部分工作之错误，应以整个的党来指导他。所以各级党部之工人部应即取消，另设职工运动委员会，经过党部委员会直接指导职工运动中的党团。

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

（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之临时政治局以正式委员九人候补委员七人组织之。

（二）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之一切职权。

（三）中央所在地最近数月内仍在武汉。同时须组织南方局于广东，至少须有政治局委员或候补委员三人加入。

（四）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按期出版秘密的党的政治机关报，而传播之于全国。机关报之党报委员会，由政治局委任之。政治局之下应设一特别的出版委员会，专掌传播党的机关报及中央一切宣传品的责任。北方顺直省委（或北方局）、南方局以及上海省委之下，亦应设立出版机关及传播秘密宣传品传单等工作。

（五）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与出版委员会的散布宣传品的工作相联络，担任传达通告指令输送宣传品等等的职任；并兼办探听反革命线索及其他各种消息各地环境的特务工作。各省亦应有此等机关之组织，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

（六）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各级党部委员会、省委、市委、县委、区委都应当在最近期间改造成下列的方式：每一党部委员会之中，分出三人至八人之常务委员会——为指导机关，由其上级党部机关批准；此等常务委员会即应执行各该党部委员会之一切职权。每一党部都应严格的与其上级及下级党部建立极密切的极秘密的联系。极严格的秘密规律，是秘密状态中党的工作之基本条件。虽极小的破坏秘密规律，都应与以严厉的处分（一直到开除）。各级党部都应利用一切公开的可能，以扩大党的影响（如组织各式各种的学生团体、小商人团体、妇女团体、俱乐部等类之组织，利用尚未被封之工会等等，在这些组织之中组织党团，受党的严密的指导，各种伪国民党的下级党部之下，也是如此）。但是即使在最公开的条件之下亦应有秘密组织及工作，这是现时环境中最主要的职任。

（七）秘密状态之中，保存工会的组织亦是最重要的职任之一。一切工会中应当速建立起党团来，人数不要超过五人至七人，须完全服从相当的党的委员会之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工会机关的指导，应由各级党部从速审查，换有经验的工人（农民）同志担任这种指导。

（八）严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党之必要条件。党部机关之一切决议及决定、调遣等等，应当绝对的服从，一切党员，不论其地位如何都应如此。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

严惩办（停止职务，开除党籍等等）。

（九）一切支部应当立刻进行秘密工作，并即按照此种目的而改造。每一支部应当分成五人至八人的若干小组，每组有一组长（并应有候补者），以与支部干事会联络（如支部之下尚有按生产部门的“分部”，则与“分部”干事会或书记联络）。各小组尽可能的每星期集会一次，进行一切党的基本工作，经过这些小组进行各该企业中（工厂等）的工作。

（十）每一支部之中，须挑出最可靠的同志——负责同志；支部干事会与负责同志应有特别的联络——应按期召集负责同志开会，或全部的集会，或代表的集会。

（十一）每一区的党部亦是如此，在小城市或村镇，则可由全体党部之中挑选负责同志，直接与市委或县委联络，经过这些负责同志，党部委员会即易指导该地全体的党部。

（十二）每一党部委员会之下，现时须即组织审查委员会（各省委就是监查委员会），以审查各该党部之党员有否不可靠的分子。这种审查不应带有清党的性质，而只是去掉对于党部不可靠的分子，以及可疑的分子。我们党应当在此过渡于秘密状态之际，极力保存多量的党员，要使每个党员都不与党部脱离关系。

（十三）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武汉党部转入秘密状态的关键，因为此处有好几千党员，而大半都是没有经过秘密状态的。中央应当帮助湖北省委进行这种改组的工作，而且直接的督促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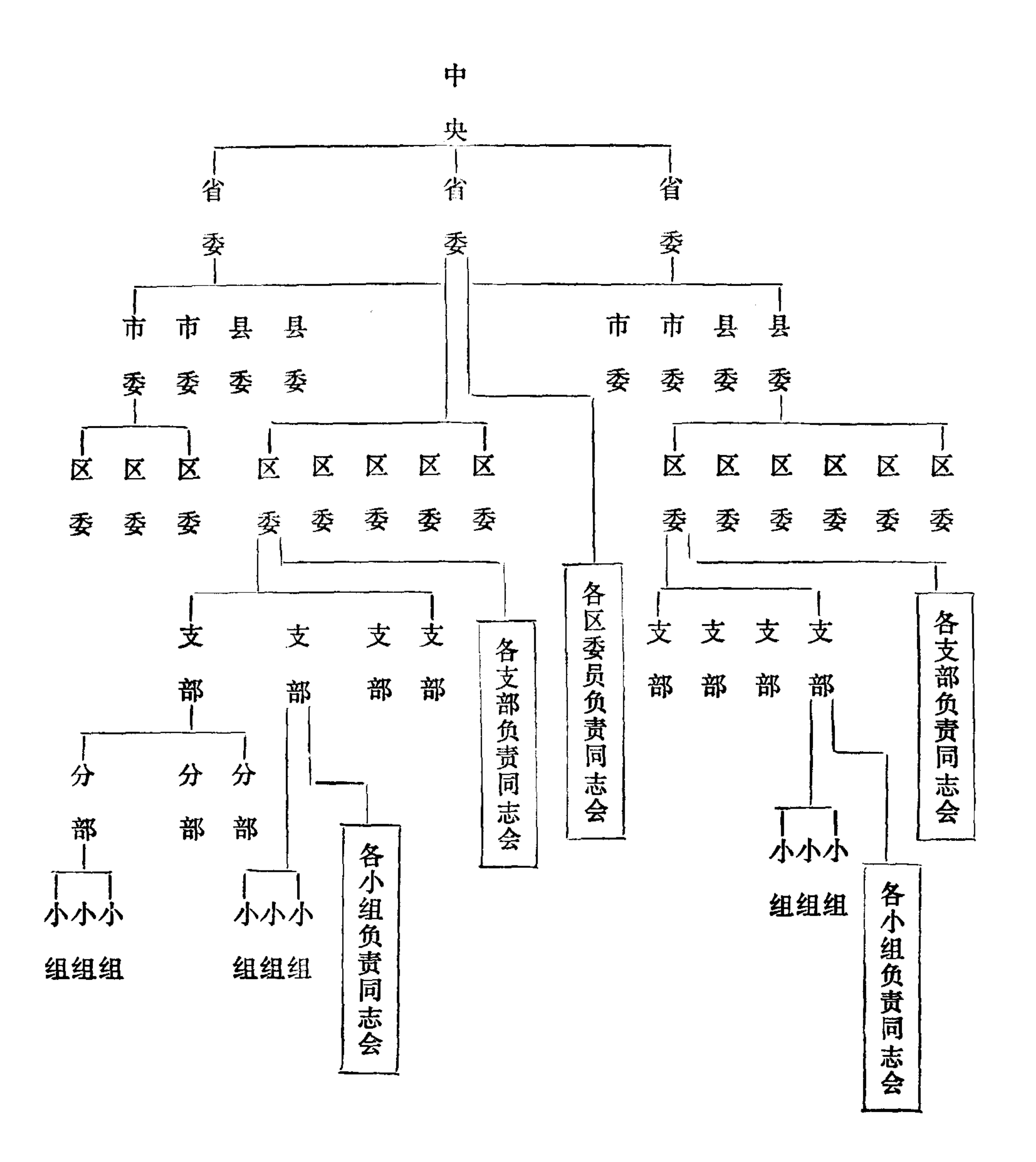
（十四）自省委以下各级党部委员会之成分，都应经过上级机关重新审查，使能更新而巩固。应当注意提拔工人同志到党部委员会里负重大责任，而肃清其中曾经在最近几日①表现机会主义的分子。

（十五）现时秘密状态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但是集权制度不应当变成消灭党内的民权主义。最近党所做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需要彻底的讨论，付在群众之中加以审查，并根据之以审查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因此，不论如何严重的压迫，必须在本次会议后，设法极慎密的进行党内的讨论：先由支部讨论，然后在各省之区、县、市、省开秘密会议，详细讨论党的政策问题，而根据这种讨论，改造各级党部的机关。

（十六）党对于青年团的关系，须有极严格的变更。须切实实现各级党部与团互派代表的原则，——团部代表有表决权，并引青年团的团员群众参加党的政策问题之讨论。

①可能是“最近几月”——编者

附 表



中央
省委
省委
省委
市委
市委
县委
县委
市委
市委
县委
县委
区委
区委
区委
区委
区委
区委
区委
区委
区委
区委
区委
区委
区委
区委
支部
支部
支部
支部
支部
支部
支部
支部
分部
分部
分部
小小小组组组
小小小组组组
小小小组组组
各小组负责同志会
各支部负责同志会
各区委员负责同志会
各支部负责同志会
各小组负责同志会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八月）

一

中国革命，现时正在自己发展之中，经过极危急极剧烈的转变关键。这一转变关键，即是各种阶级力量剧烈的变更其结合之形势；各阶级力量之变更其结合形势，实在早已开始，而以四月十二的上海屠杀至七月十五的武汉政变为其结局。所谓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初期，即已完结了他们的革命作用。现在呢，这一阶级的各种成分，甚至其中最急进的分子，都已完全走入了反革命的营垒，而成为反革命之最积极的动力之一。革命营垒中，阶级分化已经表演完结。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与国际帝国主义勾结，并已与反动的封建军阀联盟。蒋介石的四月十二屠杀以前，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营垒之中，有两个倾向并存着：一是民族改良主义的倾向；一是急进的革命主义的倾向。这两个倾向一直互斗到现在。现在呢，已经是两个完全独立互相仇视而不可调和的营垒相抗衡：一是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营垒；一是工农的革命营垒。完成中国的民族解放及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任务，现在已经完全放到工农运动身上，只有工农的民权独裁才能履行这一任务；只有工农的民权独裁与国际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以及一切资产阶级直接斗争，——“民族”资产阶级亦在其中——如此，方能履行这一任务。

民族资产阶级与工农运动之间的联盟随着工农运动的发展，固然日益趋于不可避免的破裂，然而并不一定要象现在这样的破裂形势。工农民权独裁的胜利，亦是各种阶级力量之急剧的变更其结合形式，可是这种胜利，只能在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去达到。各阶级力量之急剧的变更其结合形式，如果要达到工农运动方面的胜利，那就必须是民权革命的急剧的前进与高涨。然而实际上现在是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着了胜利，这当然是中国革命的极大的严重的失败。这一失败的责任，大部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指导之机会主义政策，阻碍了群众的革命斗争，而放任资产阶级的行动，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居然能吸引几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到自己方面去（尤其是知识分子及与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的一部分反动分子）。这种反动的胜利，其规模很大；如果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前，尤其是四月以后，不执行那种屈服的取消群众运动的方针，而能切切实实行①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策略，那末反动的胜利，不能如此之大的规模。现在中国革命经过极厉害的危机，其原因便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之失败——以前中国共产党指导群众运动的方向，完全是错误的、不革命的。战胜这一危机的基本条件之一，便是中国共产党之正确的革命的策略，要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而力解决②革命斗争中每一阶段中客观上可以解决的一切任务。

①、②此处文字有遗漏。

二

中国革命还没有能解决其许多任务之中的任何一个任务，而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先变成了反动的力量。中国革命在现时这一阶段之中，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不但反对封建制度的余孽，并且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而且革命已经造成一种力量，足以来解决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在这两年来，已经发展得非常之伟大。然而正因为这种力量之发展，便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到反动的营垒之中，而革命却还没有能使中国之国际地位、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得有任何重要的变更呢。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着了暂时的胜利，这种情形使中国革命之两个前途的问题变成目前紧迫的问题——已经是中国平民的一般斗争的中心问题了。

如果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和国际帝国主义妥协成功（而民族资产阶级正在力求这种协定的成立），如果他竟能在全国范围的实现与封建势力的反动联盟，如果封建资产阶级的联盟能够完全镇压工农的群众运动，最后，如果国际资本政治上经济上确有充分的力量，足以帮助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巩固起来，——那末在这些条件之下，中国的发展就会走上长期的、迁延的、使几千百万工农受着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灾祸的道路，——以资本主义来排斥资本主义前期的封建式的社会经济关系。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如果得有巩固的胜利，并有外国的赞助，则中国将要进于"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之发展，不过比较前一世纪的普鲁士更加要受阻碍，更加要多受痛苦，因为中国的半殖民地位及中国资产阶级的落后性与野蛮性，实在是一切进步中之巨大阻碍。即使对于向着资本主义前途之发展，亦是极大的阻碍，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必然的不可免的与世界帝国主义加重其对于中国之殖民地政策的剥削互相联结。

至于别一种的发展道路，则必须革命能够战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而建立工农的民权独裁制，方才得有保证。革命在这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阶段上，其客观的内容是：一、完全解放中国于外国资本压迫之下（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帝国主义的特权，取消外债，关税自主，外国人所占有的生产资料交通机关收归国有等等）；二、建立全国的国外市场，——没有在政治上统一中国，没有消灭军阀的割据，没有集权的中央政府，这是不可能的；三、肃清一切阻碍中国发展的封建遗毒（取消地主豪绅的私有田地，土地国有，重新分配土地，自上而下坚决的摧毁一切国家机关，而代之以革命的民权的新政府，歼灭土豪乡绅官僚军阀等）；四、急剧的改良工人阶级之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地位，坚决的取消工人之无权无利穷困不堪的现状——这是外国资本在中国之经济力量之主要根源之一。

这些任务，只有工农的革命民权独裁制，才能够实行。然而中国现状的特性，更在于这种自无产阶级农民来实行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反抗中外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能够而且应当直接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无产阶级及农民，为着完成民权主义的革命及中国之民族解放，也不能不进而没收一切外国工业及一般反革命党财产，这就要超过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如果无产阶级及农民，怕超过资本主义式的关系，怕进于社会主义式的道路，那末，就是民权革命也不能得到胜利的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将以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与力量之程度如何而定，并且要靠革命

的国际无产阶级方面的帮助。然而这一转变始终将要是一个无间断的过程。中国革命的这种特性，以及无产阶级独裁胜利之存在，就是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之客观的保证，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所认清的主要的目的。

至于这两种前途中，究竟那一种前途得以实现，那就只有斗争可以决定。为要有正确的指导起见，必须要很清楚的分析一般的客观形势的及每一时期各种力量之相对关系。

三

据一般的客观形势看来，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及其胜利，是极不巩固的，而革命之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张发奎军队之中共产党员在南昌起义，提出土地革命的口号。就可以算得这种革命的重新高涨之先声。如果革命之重新高涨客观上的前提不具备，则南昌起义的暴动也就不可能的了。这些主要的客观前提是：

（一）中国现在任何稳定都不能有——因为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政变，其社会经济政治的基础本是如此，中国的革命，本来是由于这封建制度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内，因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集聚了许多种的国际国内的矛盾，日益增长激厉所致。革命还没有能解决其中任何一个矛盾；反而使这些矛盾格外剧烈起来。弄到无以复加地步。这就可见，为什么现在发展全国的大危机，这种危机的急遽，正在资产阶级军阀反动之后。极紧迫的经济危机（财政、商业、工业都是如此）和政治军事的危机互相联结着（国民革命军的崩坏，军阀的分裂和互斗，蒋介石下野，武汉政府内不可免的纠纷分裂割据的大扰乱，表面上虽然南京和武汉政府要统一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最后，国民党也在崩坏），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不能够继续力争中国的民族利益，不能够保障中国儿家的统一①，不能够解决工人问题土地问题，不能够预防经济的大崩坏，资产阶级军阀自已的营垒里，土崩瓦解的倾向非常利害。这种全国的大危机的出路，只有民权革命彻底的胜利，否则，便要使民众受着无限的痛苦，中国的政治经济经过极大的崩坏，中国因此而大大的退步，由此而准备“普鲁士”式的发展道路。

（二）工农之革命的群众运动，虽然受着失败，然而还有大破坏②，还没有因为受了镇压简直不能够重新高涨。共产党员的积极，工人区域中秘密工会的奋斗，就足以证明；虽然白色恐怖非常利害，然而群众的积极仍在日益增长。广东、湖南、湖北、陕西、河南等省，虽然有极残酷的反革命的压迫，然而农民运动的革命基础仍旧存在，革命已经引进极广大的工农群众，他们的生活状况，在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简直是日益恶化而没有出路，所以这种群众独立的自然爆发的斗争，不能为任何恐怖政策所完全镇服。

（三）中国的国际状况没有经过任何的变更，使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得以巩固③，

---

①可能是“国家的统一”。

②可能是“然而还没有大破坏”。

③可能是“难以巩固”。

民族资产阶级力求与外国资本妥协，然而同时，他至少在口头上不得不代表中国的民族利益而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面面政策①，自然又使企图完全统治中国的外国资本离开他，使外国资本和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发生困难。别方面呢？帝国主义列强自己之间有冲突，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联盟之内，亦有冲突，——互相争权夺利的抢地盘主义是他们的天性。这种情形，也是中国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妥协的阻碍。最后苏联及国际的革命运动，不是加强②中国群众革命斗争的绝有力的动力。

有了这些客观条件之后，无产阶级的先锋——共产党之组织和正确的政策，便是革命的重新高涨之坚定胜负③的动力。中国共产党保存了自己的战斗队伍，不怕反动的缉捕压迫，而且能够改正过去指导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凡此一切，总合起来，便使中国共产党负着极大的任务，就要在一切客观上有可能的地方，都立刻准备组织革命的暴动，认清自己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军阀的政权，而建立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权制裁④。

四

因为中国各省的情形大不相同，因为没有集权的政府，所以中国共产党不能预定一个时期举行全国的暴动，以推翻中央政府来决定暴动的胜负。现在本党总方针应当是：准备并组织那些已成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之武装暴动，现时便趁秋收时期而实行抗租抗税，在这一样的时期之中，各省暴动的时日，只能看当地情形及一般情形去决定。中国共产党应当认真明了并且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暴动学说，——暴动是一种艺术，不是可以要着玩的，要极精细的在技术上组织上政治上准备好，既然决定暴动，便决不可以中途抛弃这一种计划，一定要引导暴动到底，应当坚决的绝不回头的勇猛的行动，永久要由自己方面发动，而立刻采取进攻的形势。应当记着：在紧急关头采取防御的战略和动摇犹豫的态度，必然陷暴动于败亡等等，尤其重要的，是要破坏动摇我们阶级之武装力量。因此，本党应当极快的征调最大限度的力量，到新旧军阀的军队中去工作，组织并发展我们的支部。这一任务，是现时非常紧迫刻不容缓的任务，本党以前差不多完全没有注意到。

民众工农暴动的胜利，势必引起帝国主义新旧军阀及一切反动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残酷的反攻，从经济怠工，直到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应当坚决的准备镇压一切反革命的企图，实行猛烈的革命战争。必须准备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企业工厂，采用极严厉的镇压政策，——实行革命的独裁。

五 暴动之方式

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这有以下的几个理由：

一、国民党是各种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之特殊的形式，这种形式是中国历史上所

①可能是“两面政策”。

②可能是“是加强”。

③可能是“决定胜负”。

④可能是“民权独裁”或“民权制度”。

集累生长出来的，国民党的领袖已经被资产阶级军阀的联盟所利用，以为反动政策之工具，不但背叛了国民党党纲主义中的一切革命的进步的成分，而且葬送了国民党，使他要丧失政党的资格，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不能使国民党形成资产阶级的领导政党，这种政党必定要在与现时国民党不同的社会政治基础上方能发生。要恢复国民党，便只能恢复革命的国民党，或是简直不能恢复。汪精卫、唐生智的所谓党权三民主义等等，完全是冒充国民党的假招牌，以掩饰其反动的政变，——这次政变其实是国民党亡党的政变。

二、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形成了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本党过去指导的机会主义，固然把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变成了无产阶级对于小资产阶级投降的政策。但是在下级党部之中，党员群众的行动，是以① 纠正这一机会主义的方针。共产党下级党部群众的行动与宣传，使中国国民党在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以至一部分工业群众之中，已经很有革命的威信。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而做军阀及反动资产阶级掌握里的玩物。

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组织暴动，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这些分子，本是左派国民党的主要群众。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胜利，使小资产阶级更加动摇分崩。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被反革命派所吸引去了，他们的群众政治上是崩坏了，无所适从了，中有一小部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还留在革命的道路上。本党现在和他们合作而组织秘密的革命的国民党。但是革命斗争之不可免的重新高涨，又要吸引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到工农的群众运动方面来，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本党应当做恢复左派革命的国民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不但应当加入秘密的国民党党部，而且要保证自己的指导作用。同时共产党应当极谨慎的避免过去指导之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保障本党的自己的完全的政治独立，保持本党批评小资产阶级的同盟者之动摇犹豫之无限制自由（参看中央紧急会议告全党同志书）。

尤其重要的，是使革命的国民党民权主义化，凡是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暴动而胜利的地方，工农群众团体，应当用团体加入的方法，加入这种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群众团体联合的党，使反动分子不能假借国民党党部名义，来实际上做阻滞革命的工作。革命的国民党的这种结构，可以使将来革命发展到更高涨的阶段时，政权形式将要进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那时过渡更容易些，更没有流弊些。

六 政 权

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一种革命的政权形式，即是保证工农民权独裁制直接进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独裁制；这种形式之下，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且是保证中国之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唯一方式。本党认为照现在的形势，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为两段的界线，而且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完全只要看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之程度如何而定，所

---

①可能是“足以”。

以我们现在就应当在党的机关报与劳动群众之中，开始宣传苏维埃的意义，以便到了必要的时期，立刻可以开始组织苏维埃。

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只有到了组织革命的国民党之计划完全失败，同时，革命又确不高涨之中，那时本党才应当实行建立苏维埃。现时，本党既组织革命的工农暴动于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自然还只限于宣传苏维埃的意义。然而这种宣传现在就应当开始，而且要做得非常得当，非常广泛。如果组织革命的国民党的计划能够成功（如果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还来不及完全消灭国民党），那末，本党就应当在革命超越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范围时，使苏维埃制度得以从新的革命政权之中生长出来，——这种新的革命政权，现在就要着手组织，依照最广泛的各种革命阶级选举的最民权主义的代表制度。

七 政 权①

为指导各地暴动起见，应当在各地建立革命委员会。暴动成功之后，这些革命委员会之中加入左派国民党人（但必须保持共产党在革命委员会之中的指导权），革命委员会就变成临时的革命政府之性质，全省范围之内，应当称为某省临时革命政府。乡村中之暴动成功之后，革命委员会立刻应当组织农民协会而以一切政权交给他。农民协会秘密存在的地方，必须在准备暴动的时候，就使农民协会的指导者加入革命委员会。

城市之中的革命委员会或则某省的临时革命政府，在暴动胜利之后，就要着手组织新的政权，应用下列的形式：平民代表会议，由各工厂工人、各职业工会的手工业工人或店员、学生会学生、小商人团体的小商人、军队的兵士等，以职业选举团体选举的方法（不以区域为选举原则），以人数为标准，公选代表组织之。由选举平民代表会议，选出某县某市的革命执行委员会，城市之中的政权便完全交给他。全省的政权应当由各县平民代表大会选出。各县革命委员会及各省临时革命政府，应当定出召集这种城市平民代表会议或全省平民代表大会的日期，这种日期依暴动之后的形势如何而定，如果组织新政权尚须很大的政治上的准备，则召集代表会议的日期，可以略为迁延。

资产阶级及封建军阀等类的阶级，不应当叫他们参加革命的政治机关。

本党现在提出下列口号——乡村之中是“政权归农民协会”，城市之中是“革命的民选的政权万岁！”（民选革命政府）。

八 军 队

除去彻底的反对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之阶级斗争以外，民权革命是决不能胜利的。这种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雇佣军队决不是革命的靠得住的工具。军阀如今很容易的利用雇佣军队来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这就是证据。因此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而要开始于志愿兵的征调，渐进于义务的征兵制，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

①该题与六重复，可能有误。

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本这个目的，本党应当努力的改组现时参加革命的雇佣军队。同时应当想种种方法武装工农（如某市工军、某县农军的地方性质的武装，不用旧的纠察自卫的名称），无论如何不能解散他们。从这些工农武装，是造成新的革命军队之中心势力。

九 对帝国主义的策略

民众暴动胜利的地方，如果可以遇见与资本主义列强直接的接触（例如广东以及其他有海口的地方），那末，本党应当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有应付的策略，使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冲突不至于过早的发动。本党应当继续不断的增加反帝国主义的政治宣传，有必要的时候，可以领导经济的斗争（如抵制外货等），同时如果与帝国主义的直接冲突可以根本牺牲新兴的尚未巩固的革命政权，——当这种工农阶级民权独裁制还只有很小的地盘的时候，——那么本党应当暂时避免与帝国主义直接冲突（夺回租界、没收外国工业使为国有等等）。应当记着，——帝国主义在中国各种反动势力的赞助之下（从张作霖一直到汪精卫），必定时时刻刻来挑衅，想借口来屠杀、来镇压真正革命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平民政权。本党应当预先看见这种危险，在不利于新的革命政权之时机，不要接受帝国主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革命的无产阶级赞助之下，等到对于革命最有利的时机，然后要领导中国工农民众去直接的与帝国主义斗争。

十

最近期间本党对于农民运动、工会运动，以及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已经有八七紧急会议各个议决案，并且有中央紧急会议的告全国同志书，这里不再复述。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

（一九二七年八月）

国民党革命同志鉴：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你们这封信，是在国民党最严重的生死存亡的危急时期，革命同志领袖对于革命的主义政策实行叛变，居然压迫工农运动，与共产党分裂，这种叛变可以使国民党变成反动派工具，和反革命军队的傀儡。四个月以前国民党的中央指导机关，还有勇气力量和蒋介石破裂，不使其反动的军事独裁得以摧残党权，那时，国民党中央还想和革命的工农共同前进。现在呢，背叛国民党的领袖，已经对于摧残工农运动，压迫共产党，投降封建势力，取消民众革命胜利等类行动，公开的颂扬和赞助了。

武汉政府本来是反对蒋介石之反动的革命斗争的中心，如今却是在反动军人及其政治领袖的淫威之下，变成军阀政府；中国之内，这种军阀结合的地域本有许多，现在的武汉也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武汉政府现和蒋介石等类革命之公敌，实际上毫无差异，每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首先便是工农兵士以及一般忠实党员，凡愿努力继续孙中山先生四十年来伟大的奋斗事业，立志为国家民族谋解放而牺牲的战士，都应当详细的明白：几千几万的中国同胞已经在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之中，英勇的牺牲了，他们誓死而争斗的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却发生如此现象？为什么领袖之中发生叛变的行动？以后革命的党员对于国民党的新任务是什么？

现在的领袖对于国民党的革命政策，实行怪异的篡改，却想借口于六月间发现的所谓“共产党阴谋破坏国民党”之秘密文件，来解释他们自己篡改孙中山先生政策的理由。但是谁亦不能欺骗的，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可以知道这是企图懦怯无耻的巧自文饰，国民党指导机关对于国民党主义政策之叛变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很远的，决不是单单因为那所谓秘密文件而发生的，国民党现时领袖之叛变，实际是因为他们甘心代表封建资产阶级，以及市侩的小资产阶级，这些市侩豪绅的代表，遇见革命的决死争斗正是开始的时候，革命的劳动民众，正在奋起与封建势力搏战——他们却怕丧失了自己的政权，对于民众运动的广大发展异常惊惶，因此宁可背叛革命而与封建势力妥协，这和四个月前蒋介石之背叛革命是一样的；如今武汉的领袖实际上是投降了蒋介石！

国民党现时领袖的叛变，断非是偶然的，和出人意外的事变。这种叛变实在反映中国革命中间有许多种资产阶级成分的骑墙派，而实际上终竟是反动的态度——这些资产阶级经过买办阶级而与帝国主义连络，经过地产制度而与封建势力勾结，经过军官领袖而与军阀制度相勾连。因为他们剥削工农，所以必须反对工农运动，因此种种，他们不

能执行真正的民众革命，此等社会阶级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伪国民党领袖，和民众是相隔离的。所以只想用民众运动以满足国内几部分资产阶级的私利，而使各种劳动阶级仍旧处于无权利穷困不堪的地位，他们只想利用群众做自己的工具，想踏着革命的民众兵士和党员的尸骨，去造成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不愿意劳动民众得有真正的解放，和真正的民权，他们宁可重新和世界帝国主义妥协，和封建豪绅结合，只要能镇压中国被压迫的各阶级之争斗，而使之俯首贴耳的服从自己，他们甚至于已经不能够继续单纯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因为要有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非有广大的群众不可，而他们——例如蒋介石、唐生智，宁可去请日本顾问，却不肯依靠工农运动的力量，以实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这些情形，就足以解释国民党领袖以前动摇犹豫及现在决然叛变。

三月二十日事变是国民运动中封建资产阶级派第一次攫取国民党党权的尝试，那时伪左派的领袖就不能组织革命分子及一切力量以抗御此种反动，却任令反动势力笼罩广东，这种左派遁逃国外，不战而走。其意若曰："民众自己将会对付新军阀，我辈但须坐待成功，归来即可高居领袖地位。"三月二十日之后八个月到今年一月间，蒋介石又想用迁都南昌的手段实行政变，那时的伪左派领袖又不能立刻勇敢地决定号召民众起来和他奋斗，他们动摇犹豫迟徊不决者整整的两个月，蒋介石却正好利用这两个月的工夫，组织团结反动的势力，一直弄到屠杀上海工人而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伪左派的领袖，不肯决然的根据工农群众运动的力量和蒋介石奋斗，他们是在研究军事投机的方法，直到看见可以依赖唐生智、谭延闿等新军阀的偶然结合之势力，方才与蒋介石破裂，同时这种依赖唐生智、谭延闿的计划对于伪左派是可以预藏着一种反对工农民众的武器以备工农民众真正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而积极奋斗之时，他们可以有恃而无恐，可以转过来便压迫民众。因汪精卫等之动摇犹豫，而蒋介石得以镇压东南各省的工农运动，与李济琛等相勾结，以实行白色恐怖政策。汪精卫等类的伪左派领袖到现在已经暴露自己的真面目了，然他们时常以空口应承，说要民众，说为民众而奋斗以及其他种种革命的空谈，巧自文饰，以掩藏其骑墙政策及其与蒋介石奋斗之不彻底。今年三月间国民党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面上的决议案是很革命的，但是伪左派的革命领袖不肯实行这些决议案，明明规定要实行土地改革、劳动立法、平民自治等等，然而等到群众真正起来跟着第三次全体会议所提出来的口号而勇敢奋斗的时候，这些所谓左派领袖却不仅不肯起来为民众运动之领袖连同自己所有的政治法律的权力，以助工农运动，铲除封建余孽，反而仇视并破坏这些民众运动。今年四月间国民党中央已经拒绝实行土地革命，等到湖南被压迫的农民与封建势力决死抗争之时，伪左派领袖便动辄以"过火"咒骂农民运动，说农民协会尽属流氓土匪，不但不协助农民之艰苦的争斗，并且奖励反动军官压迫农民。城市中工人店员斗争，也遇到他们的仇视。他们不但不惩罚阴谋破坏金融经济实行反革命的买办奸商以及蒋介石的奸细，反而在工人店员努力赞助革命而与这些反动买办奋斗的时候，迭次的对于工友店员施以抑制，放纵反革命的买办豪绅。劳动法的命运，也和乡村自治条例及土地法令一样，始终不得公布；即许有所谓保护工农的命令，也始终不能见诸实行。任令贪官污吏军事长官摧残民众，买办奸商进攻工人。总之国民党中央第三次会议虽有许多的革命的决议案，而事实上国民党领袖并未施行分毫政治法律的权力而解决工农小商人的痛苦，一面反而只以国民政府的政治法律的权力压迫工农。当这个时候，有些所谓左派领袖如顾孟余等，已经和反动的领袖（刘佐龙）阴

谋举行反革命的暴乱，准备驱杀共产党员及国民党的革命分子，密藏军火于汉口日租界并在军官中实行反革命的宣传。后来杨森叛乱，于学忠等扰乱湖北的西北境，夏斗寅进逼武昌城，许克祥屠杀湖南工农，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阴谋推翻国民政府，朱培德驱逐共产党员及国民党革命同志出江西——此等反革命举动，陆续继起，不可胜数，而国民党中央不但不征调一切力量以裁制反革命军人，却迭发反对工农运动的训令、命令、宣言、文告以助长新军阀的反动，文饰他们的反革命。这种政策一直继续到现在——七月中旬。实际上这些伪左派领袖，放任夏斗寅的叛军，使能巩固其势力而摧残十余县的工农团体，他们承认朱培德"停止"江西的工农运动，他们自己默认许克祥的长沙政变，便能畅心如意的屠杀湖南人民，摧残工农运动，他们自己下令解散湖北好多县的农民协会。这些伪左派领袖不但不要民众，并且不要一切革命党部及党员，不论其为共产党与否，反动军人当然不但反对工农，并且反对民权主义的国民党的各级党部，江西各县党部曾被迫而停止工作，湖南省党部县党部都被解散。国民党中央对于这种事件，不但不反对，而且自己也帮着实行（如解散黄冈等县党部），这些领袖既摧残工农，又摧残自己的党部及党员群众，岂非背叛国民党及孙中山先生。六月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徐州会议的时候，冯玉祥公开的站到蒋介石方面去了，等到这个时候，国民党领袖必须决定选择一条道路！或者同着革命的民众前进，或者同着反革命的军人反动。这时候，冯玉祥对国民政府提出反动要求，唐生智赴湘后，亦来两电，要求"改组"工农运动，实际上便是要求镇压工农运动，并且要求排斥共产党（如何键对于军队的排共令）。

这些领袖，在群众运动有力量的时候，放纵反动军人去压迫它，到了群众运动已受历次的摧残削弱之后，当然更加要站到反动军人方面去，因此，这些国民党的领袖，完全接受反动军人之排斥共产党镇压工农运动等新要求。

这些情形本是最近六月底至七月半武汉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篡改国民党的革命政策的真相，而决非借口于所谓共产党的秘密决议案所能掩饰的。最近国民党领袖在冯玉祥、唐生智系的反动军官淫威之下最后的决定压迫工农运动，本此目的而与共产党破裂。现在他们要掩饰这种反动政策，反而归罪于共产党对国民党之不忠实。然而，譬如孙科，他在五月间对美国新闻记者谈话，就说：国民党要共产党员当国民政府的部长，完全是为着容易对付工农运动起见，汪精卫等亦是如此见解，这算是对于共产党的忠实态度吗？这实在是要利用共产党做压迫工农运动的工具，共产党决不肯被人如此利用，国民党的这些领袖，都正因为共产党不肯帮助他们压迫工农运动，而宁可与共产党破裂，共产党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工农运动政策是不肯背叛的。国民党领袖既得政权，实际上早已有了实行这种政策的可能，应当尽力进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标语及其他革命的口号。事实上，弄成了国民党领袖不肯自上而下进行这些政策和口号，却任令民众是孙中山先生主义之最好的实行家，比实际上背叛孙中山先生政策之领袖高明万倍，国民党领袖既有政权，他们早有实行改组军队的可能，使军队真能拥护民众利益。然而他们不但不进行这种"使军队成为民众武力"的政策，不但不遵循孙中山先生向来认为军阀并非革命可靠的同盟之遗训；反而痛骂共产党要增加工农分子于军队之中．并肃清背叛革命的军官，为一种罪恶。国民党的这些领袖们，既然不能了解这种革命的根本职任，既然不能代表国民群众的这种迫切的希望和要求，他们就不配僭称国民党的领袖。他们是篡窃权位，是镇压国民党革命意志的政客罢了。现在的时候，既然国民党的领袖

将国民党拱手让之于反动将领专恣的掌握之中，那末要求国民党组织的民权化，使其多数党员推举革命的领袖，——实在是最近理最切要的要求。

国民党指导机关之现状是如此，国民党中央已成反动军官掌股上之玩物。犹豫徘徊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政策，其结果必然使国民党的指导机关变成反动的实行者，参与反动的行为。武汉领域之内，如今也和蒋介石的领域一样，工农运动都受很大的压迫。无论国民党中央发表许多虚假的欺人的空论，决不能掩盖许多铁一般的事实，武汉已有二十五个工会被封，湖北许多县的农民协会已经捣毁，湖南的工农运动已经被摧残，江西也曾被暂时“停止”，国民党中央已经允许唐生智及其他将领任意驱逐共产党，国民党中央现时的政策显然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不进行工农政策而实行压迫工农运动，不联合共产党而与共产党破裂，不联俄而在机关报上宣传反俄，汪精卫所领导的一切领袖也放弃了污秽了国民党的旗帜，背叛中山先生的遗训。

即使现在为满足唐生智蒋介石的私战，对于民众这种战争丝毫都没有益处，武汉的国民党中央现在已经变成了政客的俱乐部。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自称国民党领袖的资格，他们已是革命的国民党的叛徒，如果国民党不能脱离这种指导机关，这是国民党的亡党。国民党的一切同志都应当和孙夫人、邓演达及其他革命领袖一样的明白！

如今只有决然的完全和背叛革命与党的少数领袖决裂，而团结广大国民党员群众于革命的政纲之下才能救党，使国民党的旗帜不要变成反动的旗帜。革命的国民党的政纲是什么呢？

（一）首先便要进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政纲，以其三大政策为方法，反对所谓一民主义二民主义的叛徒，反对实际上抛弃三大政策而空言三民主义的政客，实行扶助工农、联共、联俄政策。

（二）反对背叛革命的汪精卫一派的人——他们是甘心做反动将领的工具了。

努力建立国民党的新中心，使能担当得起国民党的光荣的旗帜——孙中山先生的旗帜。

（三）决然的推翻封建制度的壁垒及其一切余孽。最主要的封建壁垒就是现在的土地制度——地主豪绅军阀贪官污吏重利盘剥者对于农民的剥削掠夺制度，只有实行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才能肃清封建制度的关系，要实行这种口号只有农民自己起来力争土地，从豪绅手中夺回政权。

（四）消灭城市工人、手工工人、店员的牛马奴隶的劳动条件。只有满足他们要求方能造成解放劳动民众的前提，要工农组织之完全自由，对于工农运动予以切实赞助。

（五）力争真正民主政权的建立，便能代表中国广大的群众及劳动群众。推翻压迫剥削民众背叛革命之官僚军阀的政权。

（六）取消一切军阀性的军队，造成真正人民的军队，由革命的将校指挥而不用封建性的军阀。实行武装工农。

（七）无妥协的实行反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与苏联亲密的联盟，与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及工人阶级结合巩固的联合战线。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统治，力争中国的解放与统一，反对买办阶级的影响及与帝国主义妥协的政策。

（八）改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力争八小时工作制的实行及工资的增加，实行救济失业工人，要恢复一切工农组织及工会的权利——这是几年来革命运动胜利的成绩。

（九）力争一般革命群众工农团体的一切政治自由，拥护真正革命的民权的国民党，反对背叛革命的篡窃国民党旗帜的假国民党。

国民革命的胜利，真正民众的胜利，推翻军阀统治，打倒帝国主义，消灭封建制度，都只有站在这种纯粹的遵照中山先生学说的政纲之上方有可能，只有实行这种政纲方能开辟发展革命的道路，使大多数中国人民得到利益而不仅为各种封建资产阶级中少数高等华人博取权利。孙中山先生的真正信徒,真正革命的党人,应当团结起来开始为这个政纲而奋斗。

我们共产党员决心和这种中山先生的真正忠实的信徒，共同工作，同生同死决一死战。我们决不服从现在这种伪国民党中央之开除共产党分子的决议，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权僭称国民党的指导机关，他们已经违背国民党的主义政纲及中山先生的遗训。

一切国民党的革命同志，都应当团结起来，努力救党，自然不要放弃任何公开的可能，但是要准备着这些伪国民党领袖会竭力迫逐国民党的革命同志使丧失一切自由，而处于秘密地位。所以要准备着在无论何等环境无论何等条件之下，我们大家都应当继续孙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伟业，努力为解放中国广大的劳动民众而奋斗，而牺牲，力求革命之最后胜利，毋使国民党竟亡于封建资产阶级反动联盟之手！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 央 通 告（第一号）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二日）

（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后，中央通告重新编号，且以后各部通告统由中央常委发出，特此附白）

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是国际代表根据国际电令所召集的，这次会议并且改选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纠正党内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倾向，给全党以新的精神，并且定出新的政策。各地党部务必要将这次会议的决议案（告全党同志书、最近农民斗争的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的决议案以及组织问题的决议案），给一般党员详细讨论，使得切实的了解并切实的去实行。八七会议的意义大要如下：

（一）过去党的领导机关（自中央到地方）确有一种机会主义倾向。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前由于不能了解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已经做了些错讹，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后，又因为不能了解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策略，而更加错讹。总以为既要联合国民党，便必须要一种让步政策，于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不免泯灭了。其实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策略，在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中，是要领导无产阶级勇猛的进攻封建势力军阀及帝国主义以至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必须有这一种独立革命斗争，然后方能取得革命之领导权，然后方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及农民。固然让步退却有时是必须的，但是以前的中央的政策客观上不仅是让步，却是放弃领导权——因为客观上是处处等待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去“独立”斗争，于是他们动摇犹豫之时，中央自己也不免将动摇而犹豫了。过去党的指导机关还有一种倾向，便是注重于领袖的接洽——国民党军队甚至于红枪会土匪等工作，都是如此。而对于群众的斗争不能加之充分的领导，客观上往往反而加以阻滞，没有“平民式”的精神，而偏于上层领袖的结合联络。这种不依据群众斗争的力量方法及精神，而注目于上层领袖的政策——自然处处要迁就那些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领袖，而专采用让步政策，自己认错承认幼稚等等，各省党部的政策亦多有采用这条路线，最明显的例子如陕西河南当冯玉祥反动时，极力退缩以图换得冯之中立，顺直省委迭次政治通告都主张向武汉左派让步，以免促其右倾，并主张有决心实行保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发布对中等阶级的政纲等。

（二）客观上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了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时期。土地革命就是土地所有制的剧烈的改革，彻底的铲除封建制度，这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表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决不能领导这种革命，他已掉过枪来反对这一革命。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上层与买办豪绅相联系的反动成分也决不能和这种土地革命的发展同道，何况当时武汉政府及军队中，尚有直接代表地主豪绅的分子。如果土地革命已经由群众剧烈的发展，则组织这些群众的力量而独立领导工农城市贫民的联盟进攻，便是当然的结论。但是，当时中央机关及指导同志对于土地革命问题有许多歧见，结果是一个总退却的指

示。工会（店员等）的斗争之中亦是如此。这样客观上便是党与正在奋斗的群众脱离了。

（三）再则，以前对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职任，始终没有明了的概念。无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之中是唯一能领导民权革命到底的阶级。现在农民的土地革命及农会的政权革命，既是民权革命最高形式的表演，无产阶级自然应当和农民群众建立真正的斗争同盟，领导他去打倒土地革命之一切障碍，新旧军阀和豪绅地主，反动的资产阶级以及虚伪的左派。谁不赞成土地革命及真正的民权革命（农会政权）谁便是假左派，谁便不是左派。因此早应有建立纯左派政府决心，亦建立共产党所领导的真左派的国民政府的决心。——否则永无所谓工农民权独裁制。但是事实上当时对于武汉政府的观察，确有偏重于承认他们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独裁的意思，因为当时并没有力求刷除，其中豪绅资产阶级的分子却在保存这一联盟政府。

因此种种，当时中央政策之客观上的理论：是缓和些阶级斗争，以保存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第五次大会之政策和方针，并没有实行，却是抛弃了。如今中央紧急会议接受国际的批评，必须使党员群众完全了解这种批评的意义，造成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指导。因此，必须将这些紧急会议的决议，极普遍地发到各支部之中去，使党员群众都能够研究并实行。使党员群众的意见得以督促各级党部机关。党的政策问题都要使党员群众与青年团团员参加讨论，以实现真正革命意义的党内民权主义，党的群众正在努力斗争，依据他们的力量，是纠正机会主义错误最主要的方法。

各地党部接此通告及“八七”紧急会议决议案后，务必迅速翻印，传达下级党部，开始讨论并立即遵照这些决议案改正或实行党的组织、工会运动、农民运动、国民党运动之新方针。附上“八七”紧急会议决议案一册，项目如下：

一、告全党党员书；二、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三、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四、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五、告国民党革命同志书。

吴　世　荣

中央通告（第二号）

（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九日）

（一）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所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其主要点有七：

一、各级党部要根据紧急会议的精神，进行党内的讨论，根据此讨论改组各级机关；

二、现时组织上主要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从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

三、支部的组织要合于秘密奋斗的需要，并且要尽可能的每星期集会一次，进行一切党的基本工作；

四、各级党部要多召集负责同志会议，以密切党的指导；

五、从速组织并强健各种党外团体中的党团组织，特别在秘密状态中的工农会，需要党团的组织以保障其存在和发展；

六、工会机关的指导要注意选换有经验的工农同志担任；

七、严格党的纪律，党部机关一切决定，无论任何党员，应绝对服从，自县委以下之机关，应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党员之忠实与否。

这一个“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再总括的说，又有两点：就是改正党的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和建立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各级党部接到这个决议后，应当专门提出讨论，经过这一专门的讨论，定出实行计划，报告上级党部批准，省、市、县党部须将实行计划和执行情形，在十月十日以前报告中央组织部，不得延误。

（二）党的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倾向，虽则是不自觉的，却经过至少一年以上的历史的酝酿。这种历史上的机会主义的酝酿，必然的影响到党的组织，使党的组织也带有不少的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特别在党的各级指导机关之农会指导机关的成分上，表现得很明白。在党的各级指导机关中，工农分子向来是占绝对少数，几乎不能成比例，广东、湖南、上海、顺直、湖北这些地方的党部，有了四五年的历史和成万的党员群众，工会运动农民运动也都有较好的基础，可是一检查指导机关中工农的成分，则非常之少甚至等于零。这样如何能保障党部机关之不发生机会主义的倾向呢？工农的机关，也犯着同样的毛病，例如两湖，成千万的工农会机关的领导者，最大部分是由知识分子充当。屠杀一来，尽先跑掉的多是这些分子，然而这些分子跑了之后，却有许多工农分子起来代替了他们（湖南的报告），这种经验，是值得我们深省的。党对于流氓性的工农分子或会党分子入党，每每取的怀疑或拒绝的态度，也是受了这一原因的暗示，还有其他的毛病，此地不能详叙，这种毛病，在组织上颇有了根基。

紧急会议已将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改正了，但这一改正的实现，必然要有组织上同样的改正，否则政治的改正将成为抽象的白纸黑字的，因此各级党部经过“党内讨论”以

改组党的机关，审查党员资格，是实现这次紧急会议所指出的政治路线的最主要的关键，各级党部应当极端忠实的去执行。

（三）自从三月三十一日四川的屠杀、四月十二日上海的屠杀以至长沙的马夜事变、汉口的七月三十日，我们的重要党部如上海、湖南、广东、北京、四川、武汉、南京、江西、浙江——统在新军阀的极残暴的白色恐怖之下继续奋斗。以至于今在这白色恐怖的过程中同志被牺牲者约三四千人，被监禁者至少等于此数，因为这个原故，大部分组织被破坏，需要重新建设。经过了这样大的悲惨的牺牲，党在组织上应当得着一种可宝贵的教训，为以后改进组织的帮助，这无论如何是可能的事情。可是上述这些，党部对于中央不仅没有把这样的材料寄来，反而在当地事变以后，连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告也没有，从五次大会后至今，中央对于各地党员数目和组织状况一点也不知道，虽然这里也有许多困难，然终久这样下去成何事体呢？兹特相约二事：

（甲）直接于中央的各党部，无论如何，每月月底须将该党部所属组织，做一详细报告寄来，报告中包含：

一、所属各级党部机关之增减（支部则须分别性质统计）和增减变动的概况；

二、党员的数量和成分（以县、市、特支为单位）的统计；

三、从省委至支部，各级党部机关负责人数和成分以县市特支为单位的统计；

四、工、农、国民党等民众团体的数量以县、市为单位的分类统计，在各类团体中党团数量上的统计及党团负责人成分之统计；

五、各种工作人员的统计（如系可以在党部机关工作的人员则须分三等统计，例如宣传人材，可以做县委市委宣传的若干，可以做区委或支部的宣传的若干）；

六、省委本身组织的状况；

七、收月费的情形；

八、执行纪律的情形；

九、被牺牲或被监禁的同志的履历的报告；

十、省委对各级组织的批评的概要；

十一、下个月组织计划。

接此通告后第一次报告须尽速寄来。

（乙）江苏、广东、湖南、湖北、顺直、江西、浙江、山东、安徽、四川等省省委或临委，须指派专人在省委或临委组织部指导之下做成“白色恐怖时期中组织变动的经过和教训”及“白色恐怖时期中被难同志（死伤、在狱）的履历和统计”两个报告，至迟于十月十五以前寄来中央。

各级党部的负责同志们！盼望你们接到这个通告后，战胜一切困难，一一立即执行！

吴　世　荣

中央委员宣言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

同人等受全国同志之重托，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任为中央委员以来，根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为国民革命前途奋斗，赖全国同志之协同努力，虽历经党国危急时期，幸能无大陨越。今者党国危机，更等于昔日，故同人等不得不将最近事态之真相，与全国同志惟一之奋斗途径，掬诚敬告我全国同志。溯自去年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以来，具见革命进程中仍不免有少数拥有武力之野心家，企图勾结反革命势力，以逞其借党自重之私意。当其时也，同人等顾念革命大局之利益，冀能促成北伐发展广大民众势力，则必能裁制野心家之阴谋于一日，故一年之间不惜降志辱身以与蒋中正等相周旋，未敢稍自离弃全国同志，置革命前途于不顾，一走了事自鸣清高。迄至今年春间，蒋逆中正始则欲移党部政府于南昌以遂其反动独裁之私；即〔继〕则公然叛变，割据东南，勾结军阀买办，残害同志，屠杀民众。如是全国同志为党国存亡计，始发动恢复党权之运动，而第三次全体中央会议，亦于是举行，通过各项巩固革命势力之决议，本党主义政策与总理遗教危而复安者，间不容发。惟此恢复党权运动，全赖全国同志之一致努力，始能与蒋逆中正以重大之打击，重振革命之前途。但唐生智等武人亦起而投机，借口拥护此种运动，以遂其倒蒋而自增势力之私，同人等明知此等武人对于革命毫无诚意，将来难免不危害党国。然亦只有根据总理遗训，使本党获得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始能巩固革命之基础。故对于两湖广大农民运动之发展，以及农民群众进入为解决土地问题及建立乡村自治之革命行动，认为不但不应加以压抑，而且认为系本党“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渐得广大农民之认识。广大农民有此认识与运动，方能摧毁封建之残余势力，以为本党革命势力及民治民有民享之新中国取得切实之保障。不图第二次北伐出师以后，唐生智部将何健即开始谋叛。嗾使夏斗寅等潜袭武昌，暗令许克祥等发难长沙。当此危急时机，武人之与勾结者拥兵坐视，不肯协力剿办。中央党部少数软弱领袖，震于反动之声势，不免动摇软化，对叛逆武人不敢毅然加以相当之惩治。同时，江西朱培德因谋于蒋氏妥协，有驱除革命分子停止工农运动之事。此少数领袖，亦曲予优容，视为当然。冯玉祥入豫以后，更公然赴徐州与蒋逆会议，致电威胁中央罢免军队中一切政治工作人员。此少数领袖亦无〔制〕裁能力，且不能不虚与委蛇决定，以自乱其步趋。中央党部在此少数软弱领袖指导之下，威信完全坠失，但知仰武人鼻息，以中央神圣之决议，徇其私利。于是武人之气焰大涨，党与政府完全成为武人之一种工具，唐生智回湘，更任意改组省政府省党部，并将屠杀政策推行不已，全湘忠实能奋斗之党员与农民断腰折躯者数以万计，全鄂以五千计，而武汉中央对此数万同志之被害，一则曰此多共产分子，再则曰彼辈不服从中央命令，自由行动，三则曰“耕者有其田”“应以政治与法律来解决”。今则事实显然，无可掩。饰两湖之被害者，其一部分为加入本党忠实革命之共产党员外，未加入他党之

本党党员数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此万数党员，均系根据本党农工决议总理遗训，在农工群众中艰苦工作，今为反动武人如此残杀。武汉中央则加以违背中央命令之罪，其卖党卖同志，一致于此！总理遗训谓不以政治和法律来解决"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今武汉中央则以政治法律保障唐生智等屠杀党员及工农，亦即以政治和法律来解决屠杀农民问题。此是总理之本意！唐生智何健等复在武汉首都横行无忌，包围中央党部，占据民众团体，劫掠中央银行，逮捕中央委员，搜查总理夫人宋庆龄同志外交部长陈友仁同志住宅。中央党部复在此种反动武人威胁之下提出分共之议，欲借此排斥一切忠实党员，以便于武人反革命之企图，卖党无耻，如斯其极！分共之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未能通过。彼等仍欲号召八月十五日之中央全体会议。同时在武汉及一切在彼等权力以下之各机关，已开始捏造曲解种种事实，大为反共之宣传，企图强迫中央委员通过彼等所提出之议案，以掩饰其非法谋叛之逆迹。同人等目睹此等情形，知武汉少数领袖已甘心受武人挟持，卖党卖身。若犹隐忍不与奋斗，助成其叛逆之计划，将何以对全国同志托付之重，何以对总理与本党先烈；是以决意先后离汉，为革命与本党前途，将尽力所能及，以领导全国同志为保持本党革命的正统而奋斗。尤可痛者，汪精卫同志向居本党领袖地位，此次竟以模棱两可致受群小包围，终屈服于军阀武力之下；屈服以后，犹复巧鼓簧舌，淆乱听闻，言辞矛盾，举止反常。凡其所为，与其回国之初，迥若两人。总理临逝世时，虑党中领袖或不免受敌人软化。总理逝世不及三年，党中旧的领袖竟大半为敌人软化以去。言念及此，痛心何极！同人等顾念总理四十年造党之艰难，与全国百万革命同志期望之远大，不能坐视本党荣誉之历史为此等少数旧领袖所断送，兹特郑重申明，近日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名义所发布之一切训令决议，同人等概未同意，不能负责，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与陈炯明、杨希闵、冯自由、谢持、邹鲁之辈实殊途而同归。北伐之牺牲，必须能达本党总理之遗志，拯救民众疾苦，解放工农，以发展革命势力，倘如今日新旧军阀相缘为奸，以屠杀工农，压迫民众，则不仅北伐之牺牲为无代价，其结果必仍旧造成军阀割据之局，使中国战乱循环起伏，永无止境。同人等自今以后，惟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决不敢有所瞻徇，以贻误革命大局。全国同志在此时间，均应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坚决奋斗，尤望在本党指导之下的忠实将士，能一本总理百折不回之勇气，使一兵一卒皆能不受假冒本党革命名义者之所利用，为本党真正之革命主张奋斗到底。凡我同志，丁此时艰，务宜团结一致，以为下列之主张奋斗：

（一）反对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假借中央党部所发布之训令决议。

（二）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

（三）共同努力为革命获一新根据地以便在新旧军阀势力之外，召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集中革命势力继续革命工作问题。

（四）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由各省党部代表，推举全党信任之领袖组织临时的革命领导机关。

（五）继续为反帝国主义与实行解决土地问题奋斗，一洗武汉少数中央委员妥协迁就之怯弱态度，须正确而勇猛的以此种革命主张□号天下，唤起民众。

（六）尽力可能，以废除苛捐杂税，革去一切秕政弊端，以实现本党代表平民利益之主张。

（七）积极预备实力以扫除蒋冯唐等新式军阀为国内□切帝国主义北洋军阀与封建社会之势力。

以上种种，同人等以为当目前急务，唯有全党一致坚决为此等主张奋斗，然后中国革命运动才有成功之望，凡我同志，希鉴察之！

孙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
林祖涵、吴玉章、于树德、恽代英、
恩克巴图、杨匏安、柳亚子、高语罕、
谢　晋、白云梯、毛泽东、董用威、
江　浩、韩麟符、夏　曦、许甦魂、
邓颖超、屈　武。

（原载1927年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

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

（一九二七年八月）

本方面军全体官兵同志：

八一南昌举义，本方面军多数同志都能鼓其勇气，对于革命的行动及意义，深深谅解，不过经过这十几天的行军，依我的观察和闻见，还有一些同志，不甚明了，为此兄弟不惮烦劳特为我全体同志一略言之：

一、这次南昌举义，实在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是真正拥护总理的主义和政策的革命行动。因为我们国民革命军第一次北伐，变成了蒋介石个人的胜利。今年三月间的党权运动，又被唐生智利用，第二次北伐，也变成冯玉祥唐生智的胜利。南京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政府，是蒋介石个人的工具，而吴稚晖蔡孑民一辈人，做了他的装饰品；所谓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原来还有三分人气，大家所公认的领袖汪精卫，初回国时，志气甚豪，劈头告诉我们道："中国不解决土地问题国民革命绝无成功希望"，他又起草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肥田五十亩瘠田百亩以上一律没收"，但是他听见唐生智何键那些野蛮的武人哼了一声，便骇得魂不附体，把他所起草的决议案，藏在荷包里，不敢发表。许克祥以一个团长，在长沙等处，杀了一万数千工农群众及各级党部服务同志，汪精卫所领导的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竟以记过了之，不久许克祥却又升了师长，这不是明明白白奖励军阀做反革命，反农工叛党叛国的勾当吗？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这样的领袖，要他何用！所以我们为保持孙总理的主义政策，拥护革命的胜利，不能不毅然决然地服从多数在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各省党部负责同志所组织的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在南昌举义以为吾党革命同志及全国有志之士倡。这种行动，完全是站在党的观点上的行动，绝不是我贺龙和叶挺军长想谋叛长官，希图权位。这是各位同志应该明白的第一件事。

二、有人怀疑道："我们现在离开了党离开了政府又离开了政治领袖——汪精卫——离开了军事领袖张发奎我们将何所依据？"象这样小孩子离了娘似的可怜状态怯懦心理，我们每一个同志，尤其是武装同志是万不应该有的。我们自然要个革命的党，革命的政府，革命的领袖来领导我们，但是所谓武汉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所谓汪精卫，已经成了失灵之木偶，已经变成了唐生智何键一班新军阀的工具。我们要他作甚！革命委员会的组织，是孙总理在日应付商团事变非常组织；此次在南昌各中央执监委员及各省党部负责同志秉承总理遗教，恢复此种制度，以救党国的危机。汇集党务政治军事各大端于一处，以应非常之变。只有革命委员会才是我们革命党的指导机关，只有革命委员会，才是我们革命政权所寄托的地方，只有革命委员会的各委员、各主席，才是

我们革命同志的领袖。这是各位同志应该明白的第二件事。

三、中国的国民革命，第一个使命就是要实行土地革命。所谓武汉中央党部，既然欺骗民众，违背中央委员第三次全体会议决议案，献媚军阀，我们革命委员会却下了决心首先实现第三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完成土地革命。我们的下级官长尤其是士兵同志，十有八九都是贫苦的农民出身。我们此次革命的行动，既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自然就是为解决我们自身问题而奋斗。既是为解决自身问题而奋斗，那末我们吃苦，我们牺牲，我们忍饥受暑，都是应该的。这是各位同志应该明白的第三件事。

四、在这个炎天烈日之下做长途的行军，各位同志一定会有些病的，甚至于因病而死的，我和叶军长自然抱着不安，但是这种痛苦，都是谁给我们的呢？第一就是唐生智何键。因为他们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党，抢劫中央银行现金，使中央纸币一落千丈；第二就是朱培德。他把江西银行现金二百万强行提出，饱其私囊，致江西纸币价格陡跌，民间至拒绝使用。我们第二方面军得不着现金，所领饷银全系纸币，不能采办粮秣，致使我辛苦百战之武装同志，当疲惫之余，无以疗饥过活，而汪精卫还在那儿天天要蛊惑张发奎拆散我们第二方面军整个的革命军队，以快唐生智之心，而苟延其无耻的政治生命，致使我第二方面军分崩离析，颠沛流离，我们感受着痛苦，便要想到使我们痛苦〔之〕敌人唐生智，何键，朱培德，汪精卫，我们便要鼓起勇气杀到广东去。到了广东，方可以保存我们真正革命的力量，发展我们真正革命的力量，建设革命的新根据地。我们到广东，不是消极的，是积极的；不是送广东同志回家乡，是集中各省革命同志，准备第三次北伐，实现总理的三大政策，实行总理的三民主义，打倒一切新旧军阀及卖党苟活的汪精卫等等。这是各位同志应该知道的第四件事。

五、我们既然明白我们是为自己革命，为自己牺牲，我们对于民众尤其是对于一般贫苦工农大众，应加以保护，反对拉夫，对于商民也应该切实保护，不应该强行买卖。不然，我们便不是革命党，我们乃是和新旧军阀一样的战争，乃是同蒋介石唐生智以至其他攘夺地盘的战争，其事是反革命的行动，其结果是违反人民的利益。这是同志应该明白的第五件事。

本总指挥治军素来不喜多言，但是说了，必定要做，彼此同受党纪军纪的约束。以上五事，我们革命同志必须遵照执行，革命成功，定在不远，愿与诸同志共勉之。

兼代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贺　龙

中央政府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一日）

八月一日是全世界反帝国主义战争纪念日，同时是中国南昌暴动纪念日，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渐在斗争中生长起来。今年的"八一"，正是帝国主义新的强盗战争及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极度紧张的时候，正是日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中国国民党公开出卖东三省热河与华北的时候，同时是全国反帝反国民党运动极大的高涨，苏维埃运动与革命战争得到空前伟大胜利的时候，因此今年的"八一"有着非常伟大的革命斗争的意义，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及奖励与优待红军战士起见，特为决议如下：

（一）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今年"八一"纪念节授与战旗于红军的各团，同时授与奖章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二）责成内务部人民委员部制定红军家属优待证，发给一切红军战士的家属收执。

（三）在区苏土地部与乡苏之下，组织红军公田管理委员会，管理红军公田的生产收获，及收获品保管等事宜。在区苏土地部与内务部的共同管辖下及在乡苏下组织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管理优待红军家属的一切事宜。

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项　英

张国焘

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大纲

（一九二七年八月三日）

（一）根据中央最近农民斗争之决议案，决定这个行动大纲，准备在湘粤鄂赣四省实现。

（二）中国革命正转向一个新的前途——工农德莫克拉西独裁，土地革命将占最主要的过程，在这里党的政策需要新的变更，革命的社会势力需要新的聚集和训练。现实反动的统治始终没有稳定，农民群众满心期望秋收胜利，因为新遭了挫折，正在寻找他们新的奋斗的方略，“秋收暴动”是对于这个客观情势的适当的答案。这次暴动的意义虽然不能认为就是土地革命之成功，但至少是土地革命的发动。暴动在经济上难有更大的胜利，但必然的可以使农村革命的势力得到新的集聚和训练，可以促进农民夺取武装和政权的决心，发达其根本消灭土地私有制的意识，同时党内对于土地革命的认识，亦将得到进一步的明确，这是今年秋收暴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这次抗租抗税的暴动是土地革命急剧发展之新阶段，他至少要动摇反动的新旧军阀的政权，在湘粤则有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的可能的前途。

（三）党过去对农民革命有一错误政策，就是抑制农民保护小地主利益的政策；具体的表现便是强农民建设与小地主联盟的乡村自治，及五次大会后，对于国民党种种限制农民革命的训令不加反抗，反在实际上指令下级党部执行国民党之反动训令。这个错误是由党对小资产阶级的整个政策来的，现在国际第八次扩大会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工农德莫克拉西独裁联合小资产阶级，这一个新的指示证明过去湖南农民实行农会专政反对乡村自治是对的，对小地主不可免的打击所谓“幼稚”“过火”的现象不是害怕而应当积极的去领导的。明白了这个才能不自陷于矛盾的狭巷中，而可以勇往直前的领导秋收的暴动。

（四）暴动的战略：

1． 以农会为中心，号召一切接近农民的社会力量（如土匪会党等）于其周围，实行暴动，宣布农会为当地的政府。

期除夺取乡村政权之外，于可能的范围应夺取县政权，联合城市工人农民（小商人）组织革命委员会，使成为当地的革命中心，对各地的暴动及革命政权尽可能的联络，向反革命势力进攻。

2． 由农会通告，对祠堂、庙宇一切公地及五十亩以上之大地主一律抗租不缴，对五十亩以下之地主实行一律减税，其租率有农民协会规定，以佃七东三为大致的标准。

3． 夺取一切政权于农民协会，歼灭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派，并没收其财产。

4． 实行对反动政府拒绝交纳任何税捐，并实行对于反革命势力的经济封锁，如阻禁拒卖军米等。

5． 自耕农土地不没收，自耕农及已取得大地主田地之佃农，应对其革命政权（农会）缴纳田税，税额由农民协会决定之。

6． 农民协会组织土地委员会，决定土地之分配。

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

彭 公 达

秋 收 暴 动 的 经 过

一、省委改组之经过：

中央紧急会议完毕，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的时候，关于各地工作，曾有一个大略的讨论。对湖南省委因有下列两个原则：

（一）国际对中国党过去机会主义的批评没有勇敢的接受。辩护中国党错误虽然有，但国际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二）对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书记易（礼容）同志，曾不主张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只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甚至还只是政治的没收。

新的中央政治局认为以上两个主张，根本与中央的政策相冲突。于是坚决改组湖南省委。重要的意义是要争取一些群众斗争中出来的人，领导湖南的党，坚决地执行党的中央的新政策。改组的办法有三条：

（一）指定彭公达同志为书记。

（二）新省委九人，三人是工农分子，三人是工农的领袖，三人要是真能争斗的人。

（三）派毛泽东和彭公达召集旧省委及各负责人，宣传中央新政策的精神及改组省委。

公达十一日回湖南，泽东十二日在汉动身，约定十三日到长沙，十五日召集会议。后因泽东同志十三日没有到长沙，会议的时期改为十六日。到了十六日，到会的人都齐全，唯泽东一人未到。当天本想停止开会，俟泽东到再开，因时局紧张召集一次会十分困难，到会的人均主张即日开会。改选的结果报告泽东，征求他的同意之后，再报告中央，当日除报告中央紧急会议之决议即讨论后，遂改组省委，省委的人选：（略）。

这是省委改组后，新省委的名单。在十八日召集第一次省委会议，选举常委，及讨论秋收暴动问题，详细情形下节再述。

二、省委委员中几个不同的意见：

（一）农民问题（土地问题）

甲、泽东意见：（1）没收土地必有没收的对象，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则没有好多被没收者，被没收的土地即少，贫农要求的土地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住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2）没收土地的办法，要由革命委员会（我们的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将全部办法，要农协或革命委员会执行。（3）这个没收土地的政纲，如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必须有一个妥善方法安插。因此主张在不能工作或工作能力不足及老弱的地主，应由农协在农业税之内征收若干农产物平均分配给此等分子。（4）宣布废除对农民的各种苛税；征收农业税。

乙、礼容的意见：（1）中国小地主占中国土地的多数。在此时没收小地主，小地主必定与大地主团结，站在反革命方面去，并且小地主在此时似不应该没收。（2）对土地问题，此时还只能取政治的没收，如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交给农民。（3）要有一个适合农民的政纲，宣布给农民，使农民在此政纲之下一齐行动，这样才能安人心，否则引起农村的大纷扰。（4）农民分了土地之后，农民是否怠耕，使农产物减少，倒也是一个问题。

丙、明翰的意见：（1）中国革命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全部没收土地、土地归国有的时期，现在我们必须全部没收土地，确定土地国有原则。（2）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不没收自耕的土地，农民将不满足，在革命的发展，实际还要没收到自耕农身上来，所以主张全部没收。（3）没收的方法由农协宣布。

丁、贺尔康、毛复宣等的意见，与泽东意见相同。

（二）暴动问题

甲、泽东和礼容的意见：（1）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二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2）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乙、明翰的意见：（1）湖南的暴动可以起来，但成功必须看在是否有军事力量上面，农民做暴动的附和者，因为农民斗争的勇气和工人不同。他们只是希望一个好政府，或军事力量来帮助，很少自己想建立政府。（2）湖南此次暴动的力量，应有两个，一个是军事的，一个是农民的，军事和农民的工作须同时并进。

在以上对土地问题和暴动问题的几个不同意见之下，可得一个简单结论。

（一）土地问题，不是在鼓动农民起来，做夺取土地的暴动，要农民取得土地。而是要农民起来暴动，在暴动胜利之后，由农民宣布没收土地。这可说是革命的法律没收的方法，不是革命的方法。

（二）在讨论土地问题的时候，都拟出怎样地安插地主中的老弱及工作能力不足的分子，以安人心，以取得群众。

（三）农村暴动不相信农民群众的力量。农民暴动起来至少有1000枝枪，要发动此次暴动，农民力量与军事力量要占一个同样的地位。

上面的三条，根本精神是一个革命的和平主义。一方面要革命；一方面只恐惧革命

发动之后，破坏太大，人心不安，所以要安人心。其方法是从上至下。从军事到群众，不是从下至上，不是从工农中建设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

三、省委和中央不同的意见：

甲、国民党问题——湖南省委根据以下几个理由认为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并且不要国民党了。

（一）湖南5月21日事变，武汉国民党中央没有能力去镇压许克祥的暴行，国民党的权力不得出武汉一步，甚至不能出中央党部，纯以几个投机的军阀的意见为国民党的意见，国民党自己的立场已失。这时国民党已经死了，到7月15日，汪精卫等伪革命派的叛变，国民党死了，并且臭了，不但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利抢地盘的工具，从唐生智、蒋介石、汪精卫，甚至到张作霖都可以拿了这块招牌来作他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国民党变成军阀党了。

（二）国民党的死的臭，不单死在唐、汪之手，是死在民众之手，国民党从前法律上承认民众很多利益，但是民众要他实现，则转眼相向来压迫民众，民众均认识国民党是骗人的党，现在不要受骗了，这（是）一般民众唾弃国民党的普遍心理，他们不要国民党了。

（三）或者国民党虽死，但还有一部分左派，可以继承国民党的工作，所谓左派是什么？大抵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对于革命只是同情，决不会自己开步走，且他们的行动是要看风转舵。无产阶级领导力量大，他可以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来附和革命，在资产阶级方面也是一样。取消国民党只要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左派小资产阶级仍然可以来革命。取消国民党并不成什么问题，因此湖南对此次暴动，是主张用CP名义来号召，国民党不过站CP的后而（面）摇旗呐喊，将来听其自消。

乙、政权问题：

根据以上不要国民党的一般原则。对政权有下列意见：

（一）中国的革命现在已经到俄国的1917年10月，但在这中间重要的过程是土地革命，其政权是工农的，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现在应扩大宣传苏维埃政权。

（二）在我们暴动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应即刻建设苏维埃式的政府。

（三）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也已臭了（吴佩孚、赵恒惕都说是民选），所以现在不能用这个口号，现在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

丙、农民问题——扩大会议对农民的决议，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在革命势力发展的地方，农民有自动没收小地主的土地，我们可以不干涉。湖南省委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整个推翻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对地主阶级不是在没收他们的土地的时候让步，应在土地没收之后去救济土地已经被没收的普通平民，并且只要他们能耕种，仍须拿与农民同等之土地给他们耕种，以消灭地主阶级。

四、湖南暴动计划：

（一）暴动的区域——湖南的秋收暴动计划，在开始是想鼓动全省农民起来暴动，暴动势力的发展，实行党的土地政策及夺取政权。暴动区域的划分为：一、湘中以长沙

为中心；二、湘南以衡阳为中心；三、湘西以常德为中心；四、在西南之间的要冲是宝庆。宝庆也是中心地点。

四个区域虽然已经划分，但是要实行发动便（很）困难，如人力财力等。以后经过几次讨论，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县。

附注：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礼容、明翰等均赞同其说。其时仅公达一人主张湖南全省暴动，并要泽东即去湘南，当时因想在长沙即刻举行一个暴动，于是没有坚持下去。

（二）暴动的日期——在决定第一次长沙暴动经中央批准之后，随即准备湘中的暴动。湘中暴动在原则是要与鄂南暴动同时发动。当在决定湘中暴动的区域的时候是八月三十日，常委委员决定公达到中央报告计划，泽东到浏、平的农民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资深到岳州指挥湘北工作，同时与鄂南指挥委员会接商鄂南与岳州间的农民暴动工作。公达一日动身到汉，五日回长沙，立即召集了一次常委会议，各部部长均参加讨论暴动的日期问题，当日泽东从安源来一封信——（安行伟（委）有封同样的信），约定十一日安源发动，十八日进攻长沙。来信说要长沙的暴动，要与前方的军队□□，否则□□，公达在常委的提议是九日破坏铁路，十日各县暴动，十三日长沙暴动，理由是一个暴动的发展不能等待，而各处暴动时间太长，则敌人可以有机会准备来消灭暴动的力量，这个提议经过约一小时的讨论，各部（都）不赞同，遂作如下之决定。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暴动十五日长沙暴动，此议决定之后，随即通告各地执行。

（三）暴动中所必须做的各事件

省委认为在关（开）始暴动之前，及暴动发展之后，我们必须鼓动农民一致下决心——作下列的各事件及诸工作：

1. 平分土地；
2. 恢复农民协会，乡村政权归农协；
3. 杀土豪劣绅反动派；
4. 没收土豪劣绅反动派及大地主的财产；
5. 烧毁土豪劣绅大地主的村庄；
6. 抗租及不缴租，已缴者收回来公分之；
7. 抗税捣毁政府的各种征税机关；
8. 组织革命委员会；
9. 毁坏交通机关。

（四）暴动的口号

1. 暴动打倒唐生智、汪精卫！
2. 暴动打倒省政府！
3. 暴动打倒国民政府！
4. 暴动杀尽土豪劣绅！
5. 暴动农民夺取土地！
6. 暴动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

7. 暴动实行农协专权！

8. 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

9. 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

10. 暴动胜利万岁等等口号。

（五）暴动中的宣传

暴动中准备的宣传，有对农民宣传大纲，主要的是说明过去农协的行动是对的，现在土豪劣绅所作的都是不对，及现在暴动的意义，共产党的主张等，并由宣传部出每日煽动的小传单及歌谣等。

五、湖南暴动的经过

（一）湖南的暴动，在九日开始破坏铁路，九日破坏铁路的共十余人，分途从长岳、长株路线发动，原则是要尽量破坏，达到长期间的不能行车，因为技术没有作好，九日出发的六十人，仅破坏几个小地方随即为其修复。到十一日才在捞力河地方陷车一次。倒箱火车头仍折回长沙，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日均继续破坏的工作，用炸药炸桥执行三次均无效。到十五日长岳通车。十二日下午长株路的车已通矣。

（二）安源十日发动，发动之后，工农军即开始向萍乡县城攻击。五时许到萍乡，萍城已有准备，遂折回安源。十二日又往攻，工人炸弹队已攻入，后往往军队去得过迟，敌人得乘暇准备，工农到县城后又不能径入。于是放弃萍乡攻老关缴枪十余支。十二日下午到醴陵，折回浏阳。十五日夺浏阳城，十七日失败。工农军有七百上下，此次损失约有百余。仅留王兴定(亚)部二百余支（枪），往铜鼓集合。安源军到醴陵时仅出了几张布告，宣布没收土地，及恢复农民协会等事，农民群众并没有起来响应。此次的行动，所以不能在醴陵站住。到浏阳，浏阳农民将起来旋失败。没收土地的事，在此一种广大的力量之下，都没有做过，这是须特别注意的。

（三）住在铜鼓修水一带之浏阳及平江农民军，于十一日分三路进攻平江的长寿街，予计有得胜之可能。后因收骗的邱团反戈，腹背受敌，遂遭失败。计损失快枪百余支，死百余人，余贲民部几不能成军，退往湘赣边界，准备反攻。据说此项军队于14日反攻浏阳之东门市一次，又遭失败。现在仍屯留在湘赣边境界，积极立图反攻。省委并已去信指导，该项工农军势力范围之内，积极作民众运动，没收土地交给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政策，在我们势力所在的地方，必须坚决执行，不得有误，想该处领导者当能遵照省委政策实行。

（四）长沙乡村的农民暴动于十一日暴动，分河东河西两方进行。关于河东方面，由长沙县委书记殷××同志指挥，共解散团防局五处，杀土豪劣绅二、三人。但杀土豪劣绅平分地主的土地的革命等事，殷同志不敢坚决的执行。河西方面为长（沙）县农民部长余××同志领导，解散团防局二处，没收厘金局一处，杀土豪劣绅五人。长沙河东河西两方面共解散了七个团防局，但是农民并没有起来，其原因并不是农民不需要革命，不要土地，实际是领导的人没有决心，没有坚决的在党的政策之下拚命去干。结果只作得片面的解散团防局的军事行动，军事势力一消失，农民政治上影响简直没有，党的组织亦随之消灭了。

（五）省会近郊农民的组织的基础，比各县均好，近郊农民在去年作了一次减租的

斗争。他们大部分都认识农协是为他们谋利益的机关，对农协十分的信仰，次此长沙的暴动开始，近郊农民被鼓动能来参加暴动者有万人上下，长沙暴动这是一支主力军，后因图解决九峰的团防失败，农民斗争的勇气几乎消灭，号称近郊农民领袖的滕××同志，在农民中亦拒绝其居住，长沙暴动的力量去了五分之三，工人的力量虽然没有消灭，因反动政府严厉执行屠杀工农镇压的政策之故，大部分工人领袖，均在要捕之列，工人运动亦因之受许多摧折，暴动的勇气也消灭了许多。铁路工作的失败，致暴动的发展以巨大的打击，长沙暴动不得不停止了。

（六）长沙的暴动十三日确是一个很好的时期，十三日反动政府方面及社会方面，起了绝大的恐慌，浏平亦在发展很广大的斗争中，长沙在此起来一个暴动，长沙虽然不敢说可以拿下，亦可以与浏平及鄂南一个帮助。浏平鄂南的暴动不致于失败。到十六日反动政府方面及社会方面的恐慌，已经很少了。并且反动的军事布置亦趋完备。要起来暴动一下是可以。但结果是一个完全的血海运动。省委因此将其停止了。

六、结论——暴动失败的批评

我认为省委停止长沙十六日的暴动，不是绝大的错误，省委绝大的错误的根本原素（因）是下面几个：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是要发动农民的土地革命。暴动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党去制造和鼓动重要的工作，是在全党动员到农民中去，湖南党在领导此次暴动中，对于农民的力量没有充分准备，党根本没有注重农民运动，因此各地的暴动起来，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动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这是此次暴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秋收暴动的真实意义及其目的，党的领导机关——省委及县委——没有充分了解，就是说对党的政策没有了解，暴动的意识没有在普遍到党员群众中去。党的指导机关及党员全体，对暴动缺少一个坚决的心理，没有很坚决的到农民中去执行暴动政策。这里充分表现了党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集团，不是一个无产阶级争斗的党。

（三）湖南暴动在客观环境上，本可以全省起来，但是党的主观见解只重湘中数县，在湘中数县暴动。湘南比湘北少去注意。因此，湘中暴动的发展成为孤立的形势，湘南湘西不能与敌人以重大的牵制和攻击，这也是失败的一个原因。

七、今后工作的意见——湖南暴动草案

（一）湖南秋收暴动，虽然已经因党的领导不力而失败，但是湖南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热潮还是继续在高涨和奋发，湖南革命经过了这次秋收暴动的失败，更激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的具体意义是完成土地革命，建设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二）在湖南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热潮高涨的环境之中，我们须很好地运用此时机，鼓动第二次暴动，在这次暴动我们必须记取秋收暴动宝贵经验，偏于军事，忽略了农民力量的宝贵的经验，作这次争斗的方剂。湖南第二次暴动必须以农民为中心。全党动员到农民中去，鼓动农民自动起来作夺取土地的斗争，以实现土地革命。

（三）在秋收暴动的经过中，湖南的无产阶级——安源工人、铁路工人等——的奋斗精神，特别表现得十分坚固和勇敢，确是革命的先锋队。第二次暴动，湖南的无产阶

级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力量，因此，安源、水口山、锡矿山等矿山工人，粤汉株萍两路的铁路工人，以及长沙的人力车夫、码头工人、电车工人、铁工厂工人、纱厂工人、衡阳兵工厂工人，须特别加紧工作，鼓动其暴动。

（四）在准备暴动及暴动开始的地方，必须用种种方法，宣传暴动的意义及暴动的目的，以激起广大的工农群众，对暴动的决心。

（五）暴动时间的军事工作，我们不要依靠它是暴动的主要力量，只是暴动中的一个力量。军事工作主要的意义是破坏敌人的军事组织，因此，我们对敌人军队中的士兵运动须特别加紧，在此敌人军队中发展党的支部，组织士兵支部，拿了这个组织，从中破坏敌人的军队，以前接头还犯旧式的军事工作的毛病，须彻底改正。

（六）暴动的区域为：（1）长沙、湘潭、湘乡、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州、湘阴、安源，以长沙为中心。（2）衡州、耒阳、衡山、郴州、宜章、常宁、水口山、汝城、资兴等处，以衡州为中心。(3)常德、桃源、慈利、石门、醴梁（澧县？）、临澧、汉寿、源陵，以常德为中心。（4）宝庆、武岗、新宁、城步、新化、镇北山，以宝庆为中心。

在以上四个区域各设特别委员会指挥之，唯长沙区归省委直接指挥。

（七）暴动发展之前及发展之后，须鼓动农民自动召集大会，自动地起来执行下列诸工作：（1）分土地；（2）没收土豪劣绅反动派大地主的财产；（3）杀土豪劣绅地主及城市富豪；（4）夺取团防枪支，组织工农革命军；（5）烧土豪劣绅及大地主的村庄；（6）抗税抗租，捣毁反动政府的各种征收机关；（7）尽量破坏反动政府的交通机关；（8）恢复农民协会，农协专政；（9）组织革命委员会。

（八）暴动的口号：

（1）暴动打倒湖南省政府！（2）暴动打倒唐生智！（3）暴动打倒国民政府！（4）暴动杀土豪劣绅及反动派！（5）暴动没收土地！（6）暴动实行农民协会专政！（7）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8）暴动没收资本家及银行的财产！（9）暴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10）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11）暴动组织工农革命军！(12)暴动胜利万岁！（13）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万岁！

湖南暴动中所得的经验及对于党的几个意见

湖南暴动，我是实际参加其工作的一个，湖南暴动的失败，我负有严重的责任，我不能不把我在湖南暴动中所做出来的错误向党内公开，取得党及党员群众对我的评判。我认为将湖南工作的错误赤裸裸地公开，引起党内及党员群众严格的批评，纠正其错误，这倒是于革命的党的前途一件很有益的事。

湖南暴动失败，是不是停止长沙十六日的暴动有个很大的关键，我觉得十分地觉得停止长沙十六日暴动不过是表示党懦弱的心理的一个，根本的错误确还是不在此呢？

（一）中国革命的环境，现在已经是经过了剧烈变化而迅速发展的问题，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公开背叛革命，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反对工农民主解放的要求，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与其政治的代表者转而屠杀和压迫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战争，企图保障其统治的寿命。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在革命中作为叛变，并没有损失革命的丝毫，不过

在革命的队伍中，洗去了一些糟粕，反促成中国革命进到了一个新的途径。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宣布不能完成其责任。只有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亲密起来的联盟，来推翻反动的统治，完成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并发展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在这个革命的阶段中，土地革命占了一个重要的过程，党在此时的战略，是确定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封建的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实现此斗争，此方针的战术，是暴发农村暴动，农民暴动起来夺取地主的土地——小地主至大地主——夺取乡村政权，建立农民政权，乡村由农协专政。城市工人的暴动与乡村农民暴动势力的汇合，夺取城市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政权，工农专政的政府，因此，城市工人的暴动和乡村农民的暴动，不过是一个争斗的两方面，并不是离开两个单独的争斗。湖南暴动的失败的第一教训是工人暴动起来得太快，农民运动起来较迟，两种暴动势力没有很好地很巧妙地汇合起来，结成一种伟大的力量。敌人利用这个弱点，分别向暴动势力进攻，于是两种暴动力量渐次失败。

（二）湖南秋收暴动是发展并实现土地革命，是无产阶级拉拢全体农民，作全体农民的利益。推翻地主阶级，整个地取消地租制度的土地革命，在此种取消地租制度，农民起来夺取地主土地的暴动斗争中，农民已是一个唯一主要的力量。暴动的胜利和失败，是看无产阶级的党——共产党——对于农民力量的估量及其争取农民程度的高低而决定。相信并估量农民力量在暴动中是个主要的力量，其余军事不过是一个暴动的发动次要力（量），争取鼓动广大的农民起来参加此暴动，这样的群众暴动必能够达到胜利。至少也不致于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暴动的意义，必能在群众（中）发酵和留着思念第二次暴动，这样的暴动失败，终要算是成功，湖南此次农民暴动，恰正相反，对于农民运动鼓动农民暴动的工作做得很少，结果是军事的行动。不是一个群众的暴动，至少可以是这样说——这是失败的第二个原因。

（三）湖南暴动失败的第三个原因，是暴动意识的浅入，关于此点可以分两方面来说。

（1）党及党员群众对于中央暴动的政策没有深切的了解，不懂暴动到底是为的一回什么事？这又表现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希望不经激烈的暴动，可以解决土地问题，夺取政权。——长沙县委书记怕暴动得太厉害扰乱了乡村，得罪了自己乡里的人——暴动的意识没有在此革命阶级中成为党的中心意识。

（2）为什么要爆发此次暴动？暴动到底是做什么？暴动到底为什么？这样几个意识没有普遍到工农群众宣传，工农群众不明了暴动的真意识，暴动没有在工农群众成一个兴趣，加以党没有决心，领导的能力薄弱，不能坚决的取得农民群众起来暴动，这是失败的第三个原因。

（四）湖南暴动在客观环境上，本是全省可以起来，然而党自己划了一个圈，只决定集中精力注意湘中的暴动，放弃湘南、湘西的暴动，暴动没有开始，自己就划了一个圈以自限，决定暴动虽有湘中能够起来，并没有想到湘西、湘南暴动是湘中胜利的一个主要条件，因此暴动开始，全省除湘中外，均在稳定的状态中。敌人得以全力注意湘中的暴动，湘中暴动孤立，遂归于失败。

（五）暴动是个艺术，是说每个暴动的制造者，对于暴动必须如艺术家对于艺术一样，要很细心的赏鉴，去组织，去发挥，然后才能做出一付很好的艺术作品。湖南

党领导的此暴动，在暴动是艺术的一语上说，可说是暴动没有开始，就违背了暴动的条件。湖南暴动中的组织，单就交通一事来说，是够（？）失败暴动，其余如农民工人种种方面是一样，这是失败的第五个原因。

（六）选择暴动的时间和地点，必须在反动统治及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恐慌和摇动之中爆发暴动，暴动才能取得胜利。湖南此次暴动的时间和选择相距太远，在敌人十分恐慌之中，党没有提早暴动的日期，这是失败的第六个原因。

（七）在暴动中宣布退守，或者停止暴动，这是自杀暴动，湖南党在环境困难的中间，到最后五分钟，正犯了此种错误，断送了暴动，最后五分钟的宝贵经验，我们须绝对记取。

上面七件是湖南党在此次秋收暴动中的错误，党及党员群众能自已取此次的错误的经验改正过来，坚决地去奋斗，党的前途还是很可乐观的呢！但是我们细心考查致此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一个党的发育未完成的具体的表现，现在我们的党缺点是：

一、组织上的缺点：我们党——无产阶级的政党——在中国已有五年余的历史，斗争的经验亦复不少，尤其是经过上海工人的暴动，湖南农民的暴动，记取这些暴动的经验，应当创造出一个很健全而能争斗的党，然而在事实上则证明党的组织十分懦弱，不能经受激烈的斗争。到了争斗的临头或在斗争中小资产阶级的各种丑态，表现在无产阶级政党中十分充足，失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这样的丑态的病根是党的组织建立在各个私人感情的结合上面，不是建立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结合上面，党员在党的工作中只有私人的感情，没有阶级的感情，党的感情，争斗的感情，所以到了一个争斗的发生，或发现党员可以离开党的立场、阶级的立场，抛弃党所决定的战略战术，无意地走到反革命路上去。我们应当洗刷这种耻辱，坚决地改组各级党部，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二、思想上的缺点：我们的党在组织上表现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集团。就是在党及每个党员的思想，都充分表现出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而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左翼的思想，党内思想没有统一。因此对于一个革命的阶级所决定的战略及在此阶级（段）中，战略而决定战术，因党的思想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样主要的战略和战术，不能正确的确定，这是我们党的第二个基本缺点。

现在中国革命已进到了一个新的环境，要适应此环境，党在此新的环境能够造出新的很正确的革命战略与战术。制定出来的战略与战术能够很畅快的坚决执行，就是要把这个没有发育完成的党，根本打毁一下，从新改造，造成能斗争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毁党造党的基本理由是：打毁只有私人感情，没有党的感情，阶级感情，争斗感情的小资产阶级化的党，创造以无产阶级为基础，能坚决争斗的党。

洗刷腐化消极的党员，征取吸收无产阶级、农民中新的勇敢争斗分子，充实党的下层组织，建立党的下层中坚领导。

改造党及党员的思想，党的思想无产阶级化，训练党的意识成为整个无产阶级的意识，争斗意识，暴动的意识。

一九二七·十·八　于武汉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号召暴动宣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工人农民兵士同志们！

我们对于广东目前政局，郑重发表宣言，因为这次事变于全中国的政局是有很重大的关系，现在的事实已经一一摆在我们面前了。

十一月十七日张发奎在广州的军事行动，开始了全广东的流血战争，新的反革命政权又向工人阶级进攻。同时，我们海陆丰的农民同志已经得到一个伟大的胜利，他们打倒一切反动势力，没收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现在正向普宁紫金惠州等处发展。

工友们！张发奎军事行动的真意义是什么？南京政府已经完全破坏与瓦解，在这个时候，革命叛徒汪精卫重新与实行白色恐怖及新从日本回国的蒋介石勾结起来，想造成别一派军阀，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都是他们的爪牙。

蒋介石确是十一月十七日军事行动主谋者，蒋介石是四月十三日上海屠杀的刽子手，他是以屠杀工人为职业的。

张发奎及其将士都是一些傀儡，他们是在反革命蒋介石的掌握指挥中。

同志们！

十一月十七日的军事行动，是反对反革命的革命暴动吗？

我们的答复是：不是，完全不是。

这个军事行动，不是为民众利益的民众暴动，但这仅仅是一派军阀攻击别一派军阀——蒋介石张发奎黄琪翔一派白色军阀攻击一派敌对的军阀李济琛黄绍雄及南京军阀——是大广东主义攻击大广西主义。

工友们！农友们！

在这个军阀阴谋战争中，你们得到了什么？

没有，一点都没有。你们仅仅得到了新的锁链，压迫和屠杀。

李济琛在四月十五日以后，枪杀万千的工人农民和兵士，捕囚四千余人，霸占工会会所，组织改组委员会，制造并保护那些白色走狗，指挥警察摧残示威大会，解散省港罢工，屠杀和破坏革命的群众运动。

国民党“新左派”要做些什么？这些可怜的英雄：张发奎汪精卫朱晖日陈公博黄琪翔及其党徒要做些什么？

张发奎的新政府是：枪杀徒手工人，逮捕我们的代表，制造新的工会改组委员会，霸占更多的工会，制造并保护同样新的白色走狗——革命工人联合会，指挥从前李济琛的警察摧残示威运动，驱逐省港罢工工人出宿舍饭堂，给他们几十元恶浊的津贴还要搭发四成不值钱的金库券……。

就是有人用显微镜来看，也不会看出汪精卫张发奎与李济琛黄绍雄有什么差别，因

为汪精卫张发奎都是他们屠杀工农的刽子手太师蒋介石高足门生。

工人兵士同志们！

几天来，在前敌上张发奎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所有李黄军队都集中起来从东西北江各方面向他反攻，而主要的战争将在西江爆发。同时主谋的蒋介石又将欺卖张发奎而预备同李济琛和南京军阀妥协，所以蒋介石已命令陈铭枢军队向东江前进包抄张发奎的后路。

在这个困难中间，张发奎不知怎样办法，一方面他向有钱的商人磕头，表示只要商人给他钱，他就去杀尽共产党；另一方面，他叠次派代表秘密的来找我们共产党，要求同他们协商怎样共同保护广州反对李济琛黄绍雄。

我们是中国工农群众的政党。因此，我们在工农群众面前是没有一点秘密的。我们对于张发奎陈公博这个秘密的要求，我们公开的明白的，当一切工农群众面前，答复他们如下：

共产党同任何军阀没有一点共同的利益，我们要的是民众起来打倒和消灭一切军阀的统治，你们，张发奎黄琪翔及其他的先生们，是同一样的军阀，同一样的反革命。你们逮捕工人，枪杀工人，解散省港罢工，解散工人纠察队……等等的行动完全证明了你们与李济琛黄绍雄一样。因此，你们是我们的敌人，工农的敌人和国民的敌人。

现在，你们怕你们在前敌失败，你们更怕广州工人阶级的报仇，所以你们要求我们同你们协商。

我们共产党不反对协商，就是同敌协商亦可。但我们进行协商，要当一切工人农民兵士面前预先提出我们的先决条件。

我们共产党明白宣言：我们决定奋斗到底，反对强盗李济琛回来广州。我们保卫广州，用我们最后的力量去攻打李黄的军队。

同时，我们宣言：张发奎及其将领绝对不能从李济琛手里夺回广州的自由。

只有工农无情的革命斗争——工农政权方能抵抗广西军阀的回来。

张发奎当他一方面实行压迫工人的白色恐怖政策之时，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力量太小，因此要同我们协商。为此我们提出底下条件：

（一）即刻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

（二）即刻交还现被走狗改组委员会所强占的革命工会会所；

（三）完全保留并保护省港罢工工人原有一切权利；

（四）完全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罢工及工人阶级组织的自由权。共产党，革命工会及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完全享有公开活动的自由；

（五）逮捕处罚一切惯于以恐怖手段对付工人阶级的份子；

（六）即刻武装广州工人，在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指挥之下。

在这六个条件实行之后，我们才能预备协商怎样组织广州工农革命的保障，以抵抗李济琛黄绍雄。

工人同志们！

我们知道张发奎黄琪翔等绝对不会接受我们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是军阀。我们应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广州，反对李济琛同时也反对张发奎。

我们知道在张发奎军队中有许多革命的兵士和下级军官，他们自愿意帮助我们一致

反对反革命。

我们随时都准备着与一切反对李济琛的人们结立联合战线，可是要在我们上述条件之下。

工人兵士同志们！

广州的问题现在是：究竟让李济琛的白色恐怖政权存在呢？还是建设我们工农兵自己的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政权呢？

你们应该选择：

为苏维埃政权奋斗的是共产党和广大的工人群众。

为苏维埃政权奋斗的是三千万广大的农民群众。

为苏维埃政权奋斗的是在海陆丰的工农革命的力量。他们打倒了一切敌人的军队，他们现在有成千的枪和机关枪，他们占据了海丰陆丰紫金汕尾碣石诸地，到处铲除豪绅地主军阀，建立苏维埃的政权。

为苏维埃政权奋斗的是一切革命兵士和下级军官，他们不愿意接受反革命命令反对工农群众；他们愿意来在人民方面和共产党方面共同努力国民革命。

广州工人农民兵士同志们！

广州的战争要有以一当万破釜沉舟的勇气与决心。

全中国的眼光，而至全世界的眼光都注射着你们！决战的时间快到了！

工友们，农友们，兵士们，下级军官们，学生们，及一切贫民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为拥护省港罢工工人原有权利而斗争！

为提高一切工人的工钱而斗争！

为恢复广州各工会而斗争！

为复用旧有被驱逐的铁路工人而斗争！

用强力夺回你们自己的工会！

杀尽工贼走狗改组委员！

杀死李济琛一切走狗和侦探！

实行示威和群众大会的自由！

兵士与下级军官到处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违抗所有反对共产党的命令，逮捕一切反对共产党的人，预备工农兵的专政！

农民开始全广东的农民革命，普遍到各乡村，照海陆丰农民的办法，夺取一切土地归自己，杀尽绅富地主和民团！

工友们！

在广州各区组织工人赤卫队，反对白色的警察和反革命派！

工友们！

尽你们的力量，夺取一切武装！

有系统的预备广州的总罢工，反对军队！

打倒刽子手李济琛！

打倒凶手蒋介石张发奎！

宣布黄琪翔朱晖日的死刑！

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
工友们农友们兵士们！
保卫广州，反对李济琛黄绍雄，夺取政权在我们自己手里！
准备为广州苏维埃而战争！
变军阀的战争为工农兵革命胜利的战争！
用群众革命及苏维埃政权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及资本家！
第三国际万岁！
苏维埃的革命万岁！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

（原载《布尔塞维克》1卷9期）

苏维埃政府告民众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工人农民兵士及一切贫苦民众们：

十二月十一日晨四点半钟，有一大部分雄壮的农民革命军武装入城，反革命军队开始有些反抗，随即缴械投降。有许多反革命的军官和警长都已枪毙。张发奎逃往香港，陈公博已被扣留。

广州政权已经被我们无产阶级夺取过来了，广州一切军队都在苏维埃指导之下了，中国被剥削阶级自己起来夺取了政权，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仅见的。我们誓死保护我们的政权，我们要打倒一切反动和一切反革命！

今天，广州市的工人阶级应该起来作政治总罢工，一切革命的工人应该在广州苏维埃指导之下武装起来！

今天，下午两点钟有一个群众大会在东较场举行，一切苏维埃委员将在那儿同革命的群众们讲话！

苏维埃宣布一切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和一切张发奎省政府委员都是革命的叛徒，工农兵的仇敌，计：

（一）李济深（二）张发奎（三）黄绍雄（四）黄琪翔（五）朱晖日（六）蒋介石（七）汪精卫（八）李宗仁

有能割取上述每一要犯头颅者赏五万元。

苏维埃要求一切工人和革命兵士军官逮捕上述要犯，不管他生的或死的，都解送到革命裁判所来。

一切工人农民兵士应该选举出席苏维埃大会的代表，以便参加选举苏维埃政府委员。

广州苏维埃以满腔革命热情向海陆丰农民致革命的敬礼，并要求他们派出代表来广州，以便一致行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

广州苏维埃要求全广东农民即刻暴动起来，没收一切土地，杀尽地主富农，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烧尽一切田契和债约，组织乡村苏维埃政府，广州苏维埃政府一定派红军去帮助你们。

广州苏维埃要求一切兵士和革命的军官即刻带领武装到红军方面来，逮捕并枪毙一切反革命军官，组织革命兵士委员会。每月十二元军饷的兵士应该每月发给二十元的军饷。

为发动广州工人阶级，广州苏维埃公布下列法规：

一、在一切工厂作坊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二、增加一切工人的工钱！

三、用政府的经济维持失业工人的生活！

四、维持并增加省港罢工工人原有的利益和特权！

五、没收阔老的公馆给工人居住！

六、银行铁路矿山大工厂大轮船收归国有！

七、没收大资本家和地主的一切财产！

苏维埃为帮助城市贫苦人民，决定消灭一切债务！禁止偿还并取消贫苦人民的房租捐款！

广州苏维埃要求全中国工农兵□□暴动起来，保护广州反对反革命，打倒一切军阀！

广州苏维埃向全欧洲帝国主义铁蹄下的无产阶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致兄弟的敬礼！

广州苏维埃向苏维埃俄罗斯的工农致革命的敬礼，他们是创造苏维埃的先进者！

广州苏维埃向第三国际致革命的敬礼，他是世界上一切被压迫阶级的解放者和世界革命的领导者！

红色广东胜利万岁！

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

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派！

广州苏维埃

广东暴动所提出的基本纲领

（大意，摘自华岗著：《中国大革命史》）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对于工人阶级：公布命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对于手工业、小企业的工人也规定工作时间，恢复并扩大省港罢工工人的权利，由国家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资。

对于农民：公布命令，宣布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完全归农民耕种，杀尽一切地主豪绅，销毁一切田契租约债券，消灭一切田界，各村各区即日成立苏维埃政权。同时通电全广东及全中国，说广州苏维埃政府当以全力保障海陆丰的革命胜利，批准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委员名单，并选任海陆丰暴动领袖澎湃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之农业委员长；号召一般农民以海陆丰为模范，武装起来，组织准备自己的力量以发动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及工农革命军。

对一般劳动民众及小资产阶级城市贫民：公布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贫民住，没收他们的财产救济贫民，对于贫民取消一切捐税，取消一切债务，尤其是年关的债务；对于贫民则更取消一切房租——全市房屋归公有，没收一切当铺，将贫民的质物无价发还。

对兵士：宣布国有的土地分给兵士失业人民自由耕种，各军部队之中组织兵士委员会，组织工农革命军。

苏维埃政府宣布承认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之下的工会为唯一工会组织，一切种种反动工会完全解散，它们的会员应当加入革命的赤色工会。资本家的走狗工贼组织（国民党工会等等）——白色工会的教导者和委员，应加通缉就地正法。广州苏维埃政府对于一般民众说明：白色工会中的真正工人会员也是被剥削者，我们应当亲密的提携他们，团结全体无产阶级来拥护苏维埃政府。

广州暴动前的准备

（广东通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五日）

罗　浮

统治阶级统治势力的动摇崩溃，工农民众革命情绪极端的高涨，这是客观上造成了民众暴动的条件。只要领导工农民众的革命的党——共产党，在主观上有领导暴动的力量，这种暴动一定是很伟大而普遍的，足以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夺取统治阶级的政权，而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苏维埃。

广东自张黄回粤后，统治阶级内部的倾轧冲突，使统治势力不能在整个的统一的权力支配之下，而发生时时爆裂崩败的危机。这就是说，自张黄回粤后，粤中的政权，即发生张李争夺的暗礁。因张李攘夺统治势力的冲突，使统治阶级的势力，日趋于根本动摇崩溃的危途。同时，张李因政权的冲突，双方更都很积极的扩张实力，因扩张实力的欲求，于是更加紧的去剥削工农民众的血汗，以充扩张实力的饷需。于是各项的税捐，各色的纸币，便风起云涌的增加起来了。

当然，工农劳苦民众受到这种极端的剥削，虽然统治阶级用政治极大的压力，但是反抗的斗争，终是接连不断的兴起。何况广东的工农民众，是有长久历史的斗争，何况工农民众，是一致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而坚决斗争。

广东统治阶级的力量之动摇崩溃，工农民众革命情绪之极端高涨，如是广东已具备有客观的暴动条件了；共产党，在张李十一月十七日战争爆发以前，即决定以暴动手段，破坏广州敌人的武装势力，更以全省农民整个的暴动解决全省的敌军，而建立广东工农兵的政权。即不然，至少亦须藉此扫除广州的反动势力，并获得多少武装，以进行广州附近的农村革命。

张李的冲突竟于十一月十七日爆发了。统治阶级的力量，更因此而陷于混乱的局面之下。城市工人群众，对于经济斗争恢复阶级工会打工贼等的行动，也更剧急的作英勇的斗争。十八日即举行一盛大的示威运动，大会上通过下列八个决议：

一、国民党现在是军阀屠杀工农的工具，李济琛黄绍雄张发奎黄琪翔，是在广东执行屠杀工农的刽子手。现在张发奎黄琪翔的所谓护党战争，即是与李济琛黄绍雄争地盘的战争。我们必须打倒李济琛黄绍雄张发奎黄琪翔的军阀政权，工农兵暴动起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革命政府。

二、为要建立工农兵的革命的领导由大会正式产生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

三、恢复广州工人代表大会领导，打倒工贼改组委员会，夺回各工会，直接行动

争回各工会原有的利益条件。

四、拥护省港罢工，反抗国民党政府勾结省港帝国主义解散罢工，维持饭堂宿舍，切实保障工友职业，津贴一律发现金。

五、释放四月十五日后一切政治犯。

六、实行八小时劳动，提高工人工资，工人参加工厂管理。

七、武装工农，恢复工人自卫队。

八、实力援助市郊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土地，铲除封建反革命基础。

大会以后继之以游行，警察慑于群众的威武，丝毫不敢加以干涉，至中途适遇黄琪翔的一连炮队，工人大呼："打倒李济琛""打倒摧残工农的新军阀""工农兵代表会万岁"等等口号；该队士兵不特不与工人为难，反深表同情于工人代表会，群众自动的开枪击毙改组会内反动份子一人，伤一人，军警始终未敢至会干涉。这个示威运动，群众之勇敢与群众之力量，一方引起广大民众的奋起，一方给张黄一个巨大的威吓与打击。

在这示威运动中，我们很明显的看出：革命民众革命情绪的高涨，与统治阶级势力的动摇和软弱，于是更证明在十七日事变前共产党决议之精确：认为广州目前固然是不能立即夺取政权，但积极准备及骚动以发动广大群众是必要的。因此共产党决定根据下列条件（自然不是要这些条件完全具备然后动作）实行广州暴动夺取政权：

一、积极发展群众的经济斗争，以至杀工贼改组委员，夺取工会一直达到最高点——工人自己起来暴动。

二、敌人的统治摇动，社会秩序，敌人已无力维持。

三、张李战争，到最利害的时候。

四、各地农民暴动起来与广州一致。

五、一般市民开始厌恶军阀战争，最低限度，不表示积极反对我们。

现在再述及张李战争爆发后之广东政治局面：

（甲）李（济琛）黄（绍雄）之积极准备反攻。黄绍雄军队已集中西江，十三师陈章甫在江门已宣布讨伐黄琪翔，江门新会一带，计有三十七团云瀛桥，三十八团李务滋，三十九团陈章甫，及补充团一团共四团，肇庆则有严博球韩汉英王友仁等三团；北江则桂军又想折路回桂，加厚西江兵力。其积极反攻之准备，无非想夺回广州，以建立更反动之政权。张（发奎）黄（琪翔）已拚命派军赴西江御战，广州已非常空虚，只剩保安队千人教导团一团警卫团一团而已；张黄目前正在积极招募新兵，以图维持市面之治安。

（乙）陈济棠之反张黄。陈济棠在东江已独立，宣布讨伐张黄，谓其勾结共党。现陈部已调往潮梅，汕头非常空虚。

（丙）伍廷飏之宣布独立。俞作柏招抚北江桂军，只招得一个团长与营长，士卒则已逃散。伍廷飏等已宣布独立。

（丁）金融之紊乱。中行纸币在中山汕头等处，已被陈章甫陈济棠调空。广州纸币则日趋低落，商店不愿找钱，甚至一元纸币亦不肯找出。张发奎虽苦苦声明自己不是CP，并且三磕头向商人求在经济上帮助，但商人始终无圆满之表示，因此金融之紊乱，竟至不堪言状。

（戊）各方革命势力之浩大。海陆丰土地革命运动之日益扩大，更使紫金五华普宁各处有盛大之发展，农民革命运动之高涨，更增加城市工人斗争之剧急。故广州工人之抛掷炸弹，袭击工贼，示威游行（廿三廿四日罢工工友大会运动维持罢工），散发传单等行动，无日不在扩大与发展之中。

在这种政治局面之下，很显然的，统治阶级已不能维持他的统治力量，同时工农革命的情绪，已至高度的狂热，即市民亦感到军阀混战之可厌。客观的情势，已指示暴动的必要。所以共产党即决定立即暴动。广州工人起来保卫广州，以抗李黄军队之重入广州，同时推倒张黄之反动统治，坚决的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权。

在未实行暴动以前，暴动的准备是必要而严重的工作。共产党是工农兵士群众的先锋军，自然不客气的担负起领导并准备暴动的重大责任了；这时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的暴动战略，大约有底下几点：

（一）发展更广大的群众，由经济斗争示威游行以至于暴动。

（二）组织赤卫队，以作暴动的准备。

（三）加紧张发奎军队内部的工作，使敌人一部份的武装加入革命方面来。

（四）市郊农民暴动。

（五）海陆丰暴动，即向惠州方面移动，宝安东莞亦同时动作。

共产党于此局面之下，发表宣言，号召工农兵一致的起来为苏维埃而奋斗。

为扩大宣传，为发动群众起见，共产党并发出下列主要的口号：（一）武装工人抵抗李黄，（二）组织赤卫军，（三）建立工农兵政权，（四）打倒李黄汪张，（五）宣布黄琪翔朱晖日死刑，（六）恢复广州工人代表会，（七）为拥护省港罢工工人权利而奋斗，（八）保护广州等。

以上所述的很足证明客观上已备有暴动的条件，以下再述主观上的力量。

“变军阀的战争为民众反军阀的战争”，这是共产党目前决定的策略与口号，而准备工农贫民兵士的武装暴动，打倒叛徒新军阀，尤为共产党领导群众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的唯一出路。所以广东的共产党人，对于反军阀的战争与领导群众起来暴动的工作，是非常加紧而积极进行的。此时广东各地革命势力的状况，可简叙如下：

一、海陆丰因李汉魂与陈济棠之相持，对于民众的政权，简直无遑过问，同时工农群众亦极力推翻他们的统治。因此海陆丰的政权，落在工农的手中已逾一月。最近得海陆丰方面传来消息，工农民众的力量，更扩大而发展，捷胜城则于十八日被工农攻下，大杀豪绅地主，十九日回师，汕尾农民群众之表示热烈欢迎，为空前之热烈。

廿一日所开武装群众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示威大会，到者十万人，更为空前之盛会。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十八日开盛大的代表大会，在大会中决定：第一、决定分配土地标准，第二、选出苏维埃政府委员，第三、通过各种通电宣言，第四、通过尽力肃清反动势力，以及其他重要议决案。群众高呼拥护中国共产党。

二、琼崖方面，在乡村里，有极伟大的革命势力。琼崖的农民，多系佃农，对于没收土地是极端的接受与欢迎的，农民的武装，常备军则有千余人，而预备队则有数千人。敌人方面之武装势力，只黄寰球一千二百人，及民团三百余人而已。

三、普宁的农民，极为英勇，农民武装，计有四五千，能立即集中者有千余人，最近又获有叶贺遗下之水机关枪及其他精利之快枪极多。群众的势力正准备着扩大运动以

与海陆丰连贯起来，并向邻县发展，以直趋潮汕。

四、西江方面，工农群众的兴起，亦在一天扩大一天，现正在发展革命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使工农群众更加紧的发动，以与肇庆方面发生一贯的动作。并乘李张战争紧急时，与肇庆共起夺取他们的武装。

总上的略述，广东在最近政治局面之下，在客观上统治阶级之混战崩溃，工农劳苦民众革命情绪之最高度的飞涨，以及城市商人之厌恶军阀战争与剥削，都造成了暴动条件之客观性，同时在工农及共产党，主观上有此相当之准备，伟大的暴动将很急的爆发，领导工农兵共同起来推翻反动统治势力，而坚决的英勇的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政府。

〔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林　　匹

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的投降主义分子，放弃了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了失败。“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开始创造完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使历史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当然，这些起义也曾经碰了很多暗礁，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如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没有与江西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而南下向广东进发，结果，失去农民群众的支援，走到广东东部，与敌人作战失利，大部分都散失了；参加广州起义的部队，在革命低潮、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企图长期占领象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结果也很快地遭到了失败；秋收起义，在开始时以进攻城市为主，同样受了很大的挫折。但这些遭受了挫折或失败的部队的余部，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他们从城市转入农村，展开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发动了农民的土地革命，创造了武装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结果，他们成为当时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力量，成为敌人的最大威胁和人民的最大希望。

下面，我们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文献中，摘编了一部分关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的资料，供读者参考。这些资料的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如关于南昌起义的资料，不深刻地检讨军队没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错误，相反地却过分责备江西、福建、广东一带工农运动的“落后”就是一例。但尽管如此，我们从这些资料中，大体上还可以看到上述三次起义的概况。

一　南昌起义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公开反革命以后，在武汉政府统治下的各省的军事政治状况，变得非常险恶。从军事上说，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已被调到九江和南昌一带；国民党反动派朱培德的第三军、第九军移驻樟树、临川，程潜的第六军向南昌集中，有包围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的形势。从政治上说，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汪精卫、唐生智等正在疯狂地屠杀我党和镇压工农运动；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张发奎虽仍表示反唐，但已深受汪的影响，对我表示不满，要“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之ＣＰ分子如叶挺等退出军队或脱离ＣＰ”。但反革命派的所有这一切罪恶行动，并没有把革命镇压下去。湘鄂等省的农民和工人，仍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继续不断地进行斗争，直至局部地发动武装斗争。根据当时的形势，党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周恩来、恽代英、彭湃、吴玉章、林伯渠、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等同志先后到九江、南昌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叶挺同志影响下的第四军、第十一军的一部和贺龙同志领导的第二十军也向南昌集中，准备解除在南昌的第三、第六、第九军的武装。七月二十七日，根据中央的命令，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在南昌正式组成，并定于三十日晚举行起义。但二十九日早晨和中午，张特立（按即后来成为叛徒的张国焘。——编者）突然自九江发密电两通致前委，谓起义宜慎重，无论如何须等他到再决定。当时前委认为：起义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准备工作。三十日晨，张特立到南昌，当开前委会。张特立谓：起义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否则不可动，在军队中的同志可退出，到各地农民中去工作。张又说，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起义须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亦不可动。当时，周恩来、恽代英、彭湃、李立三等同志都一致反对此项意见，谓起义断不能推迟，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精卫的影响决不会同意我党的计划；我党应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争论数小时未决。到三十一日晨再开前委会，又辩论数小时之久，张特立不得已，最后表示服从多数。于是前委即决定于八月一日上午四时起义。起义命令由叶挺同志起草，用贺龙同志（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发布。不料二十军第一团的一个姓赵的军官泄漏秘密，将起义的计划告诉了朱培德的部下。朱培德马上准备抗拒。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委决定提早两小时起义，但终因敌人已有准备，起义军已增加了很多困难，直到早晨六点钟始将三、六、九军在南昌的部队完全缴械。

起义胜利后，即成立了中央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在革命委员会下面，分设党务委员会、参谋团、农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秘书厅、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等机关。军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贺龙同志为第二十军军长，辖第一、第二、第三师；叶挺同志为第十一军军长，辖第十、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但其中的第二十五师拨归朱德同志指挥。当时朱德同志任第九军军长。

起义胜利以后，军事行动的策划，政权的组织，土地政纲的制订，财政政策劳动政策的决定，宣传工作的开展，对反革命的镇压，党组织的加强，等等，都是迫切地需要进行的工作。兹将这些工作进行的情况分述如后。

一　军事计划和回粤的经过

（一）关于回粤路线的讨论

关于回粤路线的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由樟树、赣州、取道韶关，沿粤汉路直取广州；另一意见主张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认为走此路线可以避免敌人之攻击，并且可以很快的与东江农民起义联络。当时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第二种意见，只有很少军事工作同志及一部分非军事工作同志主张第一种意见，结果遂决定经赣东取东江。

（二）由南昌至瑞金

八日三日至五日，军队先后离开南昌，向临川前进。时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因无民工）。沿途全无农民支援，加以反动派宣传的影响（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公妻共产），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组织，病者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起义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数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几乎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

以蔡廷锴为师长的第十师于到达进贤时，将我们在该师的主力范进团（三十团）解决，开到福建去了。原来参谋团决定第十师走极左翼，与中路相距近百里，因此无法监视。

各部经三天到五天的行军，到达临川。在临川驻了三天，对外及对军队的宣传工作方才开始（前委才决定许多宣传工作的计划），在军队的党的组织和军队本身也有相当的整理，所以从临川出发以后的二十日中情形比较好，行军亦较缓(每日平均约五十里)，兵士可稍休息，天气亦较凉快。但是沿途农民因受AB团的宣传，多惧怕我们，数日不见一人。譬如宜黄县城原有近二万人口，等我们到时，全城仅留有四十八个六十岁左右的男女（在我们未到前曾经土匪骚扰）。过石城后才比较好些。

到临川时，因为二十军、十一军的参谋都跳跑了，原定军事计划，有完全泄漏的危险，所以决定经广昌到瑞金后，改道经汀杭（汀州、上杭的简称。——编者）取东江。

我军由广昌出发，分两路前进。十一军为右纵队，二十军为左纵队，约定八月十八日在壬田市会合入瑞金。适钱大钧部的五十、六十两团在壬田市的前方布防，意欲堵截我军入粤。十八日上午，贺龙同志率一、二两师全部及第三师教导团一、二总队攻击前进；同时命令教导团第三总队及六团全部掩护。十八日下午与敌接触。敌兵力虽仅两团，但训练颇好，故能顽强抵抗，至次晨始退却。是役十一军到得太迟，二十军几为敌军击破。我军第三团团长阵亡，第四团团长受伤（到上杭才死），其余连排长伤亡十余人，士兵百余人。十九日革命委员会及后卫全部到达瑞金城。当时敌向会昌方向退却，教导团一、二总队追击，至距瑞金五十里的谢坊为止。

在瑞金得到敌人许多文件，方知敌人攻击我军的计划，并得悉敌人在会昌有钱大钧、黄绍雄两部，约计十八团。遂改变计划，决定先攻破会昌之敌，然后折回瑞金，再转道汀杭取潮汕（潮州、汕头的合称。——编者），因恐会昌之敌不破，敌人可以随时袭击我军后方；同时过会昌经寻邬取东江山路很多，给养极为困难（据以后调查并不如是），故不得不先攻会昌再折回闽南而取东江。

敌钱大钧部一面败退会昌，一面将后方部队集中会昌城。当时我方有两个意见：一、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等同志主张攻击会昌之敌，并图歼灭之。二、俄顾问纪功主张避战，速到汀州上杭入粤。争论结果，多数决定叶部即日向洛口前进。第二十四、二十五两师为主力军，攻击会昌之敌；另由教导团第六团及第二师的第五团为佯攻部队。决定八月二十四日拂晓同时向该敌进行总攻击。敌军主力约六千人，约等于我方攻击部队的兵力。上午六时我佯攻部队先与敌接触，七时许叶部与敌接触。但敌人顽强抵抗，直至下午四时叶部始入会昌城，缴敌械千余，俘虏九百余人，得敌人遗弃辎重甚多，我军亦伤亡八百多人。敌人向寻邬退却，我军仅追出三十里而回。二十六日敌人不知在会昌已失败，又由洛口开到二千余人，被十一军击溃。二十七日我军全部折回瑞金。旋由瑞金进军汀州。

（三）由汀州至汕头

在汀州时，关于取东江的计划有详细的讨论。当时有两方面的意见：一、主张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盖料敌人恐慌已极，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取；并且经潮汕再取兴宁、五华攻惠州，过于迂缓，敌人有集中兵力攻击我军的可能。二、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坝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盖恐敌人死守，潮汕不得，便难取得外面的接济。恩来、希夷（即叶挺同志——编者）均主前说，俄顾问与贺龙、伯承等均主后说，同时一般军官长期行军之后，均欲得地休息，多赞成后说，遂照后说决定。自汀杭至潮汕，沿途毫无战事，到汕头时敌人已退二日。

（四）汤坑之战与潮汕失守

原定到潮汕的第二日即向揭阳出发，但因筹取开拔费的关系，在潮汕停留三日始出发。当时二十五师留在三河坝，二十军第三师留守潮汕，因此出发前方者仅二十四师及二十军的第一第二两师，共计不够六千战斗兵。

九月二十七日，总指挥部在揭阳接到汤坑谍报，谓敌人王俊、黄绍雄部实力约千余人，已集中汤坑，准备向揭阳前进攻击我军。当晚总指挥即决计以全力用很迅速的手段扑灭该敌，故次晨即将驻揭阳的十一军二十四师及二十军的第一师扫数调向汤坑方面进发，第二师亦促令赶速由潮州开来。不料行至距汤坑约三十里之地，即发现敌人先头部队，遂与接触。敌被我军节节击退，我军获少数俘虏及枪械。是晚双方在距汤坑约二十里之地相对警戒，备极森严。次晨拂晓又开始战斗，我方仍有相当进展。至上午十时，敌军仍扼守高山，用极猛烈的火力阻我军前进。我军勇猛与之搏斗，大部兵力已至山腰，时值由揭阳开来的二十军的第二师四、五两团赶到，顿增生力，敌复稍退，我军于是得完全占领前面高山。不料当我军占领该高山后，敌军又进至另一高山相与抗衡。自

正午十二时起，至晚九时止我军虽以极猛烈的火力扫射，该敌犹顽强不肯退，彼此冲锋各十数次，亦均坚守固有阵地，不为变动。此时我军始知敌人之兵力较多而火器亦极精税（实际上敌人兵力约一万五千人，三倍于我），不易击溃，遂决计举行夜袭，一面令二十四师的七十一、七十二两团兵士，齐上刺刀，乘间企图冲入敌阵，一面令一、二两师兵力在高山用极密烈的火力为之掩护。袭击部队，以火焰为号，以图围缴敌械。不料冲去二小时，不特未见火焰，且见我方冲去官兵纷纷逃回，问之，则谓敌军已有准备，当我军冲去时，彼甚为镇静，将我冲去的兵士，围住缴械。以此不愿缴械之兵士，既冲锋进，复冲锋出，一往一返，损失非常巨大。此时，能集合再行前进之兵力，只有二师之第四团，为数已有限矣。战至此，总指挥见我方一则兵力损失过多，二则全军弹药将罄，已无法再与支持，于是下令引退。待退却令下，各师点查人数，已减损一半。遂由第一师担任掩护，全部向揭阳退却。

与汤坑战役同时，敌人以一部兵力攻潮州，以海军攻汕头。攻汕头之敌虽被击退，但潮州竟失守，于是汕头亦不得不放弃。

九月二十九日我军自汤坑败退后，知揭阳不可守，遂决占据潮州。待部队将近潮州时，又改变计划向海陆丰方面前进，企图速取惠州。故至十月一日，我军大队，复行至距揭阳约四十里的炮台渡河。待渡河完毕，即已天晚，故是日仅在距炮台约十五里的地方宿营。次日（二日）行六十里，在贵屿宿营，竟日无事。三日复由贵屿出发，第一师为前卫，第二师次之，总指挥部又次之，十一军二十四师为后卫。是日已得牒报知普宁方面已有敌人企图包围我军，故命令为上午三时出发。但第一师部队至六时尚未开拔完毕，以致是日上半天行军路线，非常拥挤，费时半日，亦不过行二十余里。至午后三时，当我二十军部队已过流沙附近的乌石，总指挥部及二十四师尚在乌石时，在乌石前方山地，突然发现敌人，向我军射击。时总指挥以二十军部队均已通过，只有二十四师及总指挥部为敌兵隔断，殊为不利，遂决令二十四师七十团七十一团七十二团分前左右三方面占领阵地，掩护总指挥部通过。不料甫将兵力分配，敌人枪声即大作。途中零碎部队及大小行李见势均纷纷退走，一时途中人马，极为混杂，统率既不一贯，号令自难执行。总指挥虽猛力阻止退走，终无法使其服从命令，于是只好集合所有弁兵，扼守要路，其余闲杂人等，任其逃走，惟有枪兵士尚令其与弁兵会合，以图作最后的抵抗。战斗结束，第二十四师仅余数百人，退往海陆丰。第二十军余部则在将到陆丰时被敌人缴械。

与汤坑、乌石战役同时，敌人派三个师进攻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第二十五师在朱德同志领导下，与敌军激战三天三夜，敌军溃退，但第二十五师本身的伤亡也很大，全师只剩下二千人左右，一千多枝枪。朱德同志即领导这一部分留下来的部队，退出广东，经过江西，转入湖南南部，进行游击战争。后来，又在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部队会合。

二　政权的组织

在起义之前，党决定在原则上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政权，实际上是组织一以共产党员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的政权，名义上则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继承国民党正统”反对宁汉政府相号召。起义后即以中国国民

党各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的名义，产生革命委员会。

关于革命委员会的人选，有过争论。主要的争点，便是关于张发奎的问题。在起义之初，对张发奎的态度已有不同的意见，就是起义的决定不必问张的态度，和必须争取张始能起义。最后的决定虽然是不管张的态度如何，由我们直接来干，但是在许多事实上，还是表现许多妥协敷衍张的政策。如起义的第二日由贺叶分电告张，表示欢迎他来南昌，同时并用民众团体名义电张欢迎（这些都未经前委会正式决定，在当时也没有同志正式提出反对的意见）。到讨论革命委员会人选时，张特立、谭平山极力主张须加入张；周恩来、李立三同志主张张不应加入，但没有力争；恽代英、彭湃无甚可否。所以结果张竟为主席团成员之一，而黄琪翔、朱晖日亦列名革命委员会之中。

到瑞金后得到上海报纸，方知不但张发奎等已经举起鲜明的旗帜反共，即所谓各省左派分子，亦完全投降于武汉政府，而武汉政府又实际上投降了蒋介石，同时各省军阀都用国民党名义封闭工会农会，残杀工农群众。因此前委会议决定，国民党名义已为工农群众所唾弃，对于政权的性质，须根本改变，应该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不过在工农政权之下须有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便是工农分子占多数和共产党员占多数的政府。同时决定乡村政权应完全归农民，并须以贫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的多数；县政权，工农分子应占绝对的多数。到汀州后，又决定政府仍沿用“国民政府”的名义，以应付外交，避免帝国主义过分的干涉。同时并决定以谭平山为委员长，把陈友仁等都加入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之中。政府委员中虽然加入了许多工农分子，然实际上这几乎是对原定政策的敷衍办法，因为除苏兆征同志外都仅是空衔的政府委员。

三　土地革命的政纲

在九江时，大家对土地革命的政纲已有不同的意见。李立三、恽代英同志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因为南昌起义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谭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谓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会惹起反动势力的更加联合和军队内部的分化。争论极烈，无从决定，只好报告中央征可否。后来周恩来同志到浔，传达中央的意见，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方得最后的决定。

关于土地政纲的第二次讨论，是在南昌起义以后。当时农工委员会提出的农民解放条例中有“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土地”一条。讨论时大家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或以为二百亩的限制还是太低，主张没收三百亩到五百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或主张实行武汉议决后搁置之土地政纲，没收“肥田五十亩，瘠田一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甚至还有主张全不提出者。最后代英同志说：“我们这次八一革命，就是要实现土地革命，所以我们决定了土地政纲，在沿途就要开始实行。只要真能实行，就是没收两百亩以上的大地主都是好的。”因此农工委员会原案遂通过了。

此项政纲决定后许多同志都很怀疑，沿途找到在军队中的广东农民讨论。有一个农民很痛快的答覆说：“如果是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耕者无其田。”因为在广东两百亩以上的大地主很少，除掉许多公田以外。这一句话把许多同志的脑筋都惊醒了，因此，到瑞金后前委会议遂决定改“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为“没收土地”，不加亩数的限制，并废弃原有农民解放条例，另提出一修正条例。

第三次的讨论，系在上杭讨论国民政府的政纲时。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都是主张全部没收，因为觉得农民起来了，不但二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会实行没收，就是二十亩以内的自耕农的土地都会没收，甚至平均地权，湖南许多地方的农民对土地的处置便是前例，我们的政府当然不能因为他们超过了土地政纲限制和侵犯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便压抑他们，所以应根本提出“没收土地”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至于争取小地主的方法，可用其他的政策，如小地主的土地没收后由国家发给一种有息不还本的债券等。张特立的意见，对小地主仍应有相当的保护，所以主张改为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因为多数的意见都是主张全部没收，所以当时的决定还是“没收土地，耕者有其田”。到第二日，广东省委送来了一份详细的政纲，对土地问题，是没收三十亩至五十亩以上的地主的土地，对于依靠田租为生活者不没收，并已经在各地宣传。因此，张特立再召集会议，遂照张特立的意见“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通过了。

四　劳动保护政策

在起义前后，很少注意到工人问题。直到瑞金以后，前委会才讨论一次关于劳动保护的政纲。结果，由农工委员会提出一劳动保护暂行条例，共十九条，内容有产业工人八小时工作制，手工业工人每日十小时工作制，因公伤亡的赔偿，疾病死亡的抚恤，失业保险及童工女工的保护，产前产后的八星期休息等。条文很简略，也未经过严重的讨论便通过了。

五　财政政策

南昌起义后，革命委员会成立，曾讨论到财政政策问题。当时意见在原则上几乎一致，就是要根本改变以前军阀的财政政策，将财政的负担从贫苦的工农身上转移到富有阶级，并决定即时废除厘金及其他苛捐杂税（这一点当时已有反对的意见）。到了临川以后，军饷一天天困难起来（因纸币不能用），急需设法筹办现金，因此引起关于财政政策的大的讨论。讨论中，总括起来有两种意见：一、主张沿用旧的政策，就是每到一城，即行提款、派款、借款等，实际上就是利用一般劣绅土豪来筹款。这种政策的结果，自然是把负担加到一般贫苦的工农小商人身上，大商劣绅反可从中渔利；二、主张应完全抛弃旧的方法，目前的政策，应该是征发（如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没收劣绅反动派等的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的罚款等。谭平山等主张前一个意见，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等同志都主张后一个意见。这两个意见究竟那一个正确，当然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采用前一个财政政策，不单和军阀筹饷无异，并且要动摇我们的根本政策（如建立工农政权，镇压土豪劣绅等）。所以在会议上大家虽然有争论，因前一说的理由不充足，自然是决定采用新的财政政策。但是到了实行的时候，却又发生了问题。在赣东一带因为得不到农民的支援，谁是大地主和土豪劣绅很难于调查，而旧的方法确可以筹到少数的现金。因此从临川至瑞金筹款方法极为混乱。谭平山并得出一个“原则”：“只要有钱，不问政策。”到汀州时，因为商会承认筹款，谭平山对于惩办土豪劣绅的政策都主张放弃了，但是结果上了一个很大的当。原来汀州商会承认三天内缴款六万元。谭平山遂让商会在城乡大派款，连十亩以内的自耕农及很小的杂货居都派他们十元八元不等，倒是十万元以上家产的仅出三五百元。这样搜索的结果，三日仅得二万余元，并且闹得满

城风雨。因此革命委员会又讨论一次，大家极力批评这种政策的不当，遂又决定完全取消旧的方法，采用新的政策，在汀州大捉豪绅，实行没收与罚款，并发还许多贫苦工农的已出的派款，仅二日，即得四万余元。同时决定到广东后全用新的政策，并组织一战时经济委员会来管理一切。但是到了潮汕，新政策竟又完全放弃了。当时谭平山提出两个理由：第一、大规模的征发没收恐惹起帝国主义的借口干涉；第二、潮汕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大规模的征发没收的结果，将是商业全停，秩序混乱，使反动派得以扩大宣传。如是财政政策一仍旧例，战时经济委员会便从此夭殇了。

六　镇压反动派

在革命委员会之下设立的政治保卫处，专为镇压反动派的机关，并决定对于土豪劣绅等反动派采用严厉镇压的政策。这一政策，开始在赣东一带因得不到农民运动的支援，几乎无法进行，仅在驿前、广昌、平山市、瑞金、会昌等处杀了三十几个土豪劣绅和几个ＡＢ团分子，到汀州杀了四个劣绅。在当时，政治保卫处准备到广东后大规模的镇压反动派，但是结果仅在潮州杀了三人，大埔四人，汕头十二人，原定的政策竟未能实现。主要的原因是：第一、重要的反动分子已闻风先逃无法搜捕。第二、潮汕一带农民运动极弱，主持同志的观念极为糊涂。如在大埔要当地同志开一反动派的名单，以便按名拘捕，他们却在名单上注记：某人应处以徒刑五月，三月，或无期徒刑等。其他如三河坝等地完全没有农民协会的组织，更无法拘捕。第三、主观上放弃镇压反动派的政策，如在汀州、潮州、汕头，谭平山屡次要求缓办反动派，徐光英就任汕头公安局长，反动派还没有开始惩办，反先捉乘乱抢劫的贫民三人枪毙了。有一个海员工友看见了，马上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到潮汕失守时，牢内还关有几十个反动派（多半是工会送来的），竟无法杀他们（晚上不能放枪，又没有刀子）。反动军队一到，他们自然马上出来，更厉害的反动了。

七　宣传工作

在革命委员会之下，设立一宣传委员会，专管宣传工作，同时又设立了总政治部，管军队内部的宣传工作。然而此次的宣传工作，却做得很坏。宣传口号和政策的错误，这是由于总的政策的错误，当然不能归罪于宣传工作。但是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的士兵亦不明白；十一军的兵士直到失败后还说："四军十一军本是合一的，就是叶挺弄坏的。"这都是因为宣传工作没有深入兵士的缘故。

八　进军途中的工农运动状况

赣东除在临川、宁都找到党的特支组织外，其余所经各地，都没有找到当地党的组织，我军完全得不到农民的帮助。但反动的ＡＢ团的势力在赣东一带却很大，所以我军在这一带不单是不能得到农民的帮助，并且受了很多的阻碍。

政治工作人员沿途向兵士宣传广东农民运动极好，只要到了广东，各县的农民，一定可以马上起来支援，民工粮食等当然毫无困难。当时不但是一般兵士都很相信这样的宣传，所有的同志也都是这样想。但是一进广东界，却使人大失所望。农民对军队的情形还不如福建。如大埔已经有工农讨逆军的组织，并且准备起义已经两三月之久，

但是只有很弱的极幼稚的军事技术的布置，全未注意发动群众的工作，更未注意群众的组织，以至我们军队到了，连拘捕反动派的工作他们都不敢做。军队开拔时，要他们召集一百农民组织农民军，保卫县政权，结果仅得五十余人。

三河坝在军事上极为重要，但是当地全无农会的组织。松口为工农讨逆军第八团团部所在地，仅有七十几个农军，农民群众亦未起来。我军交了一百五十枝枪给他们，结果找不着农民来拿。

大家想象中的汕头的工人运动一定很发展，因为在省港罢工时经过很长期的斗争。但是到了汕头，预备将以前的警察完全撤换，组织五百工人义勇队来代替，经过三天的号召仅得七十余人，并且都不甚愿意，因为饷项睡食等等都不如意。

汕头也经过数月的起义准备，但是也因为只是注意军事技术的准备，不知道对群众政治的鼓动，所以结果群众不能起来。

潮汕以东一带农民运动较好，农民群众经过长期的斗争，起义的军事准备亦较完善（仍是缺乏对群众政治的鼓动和组织），群众亦自动起来参加，所以在我们军队来到以前，农军已将海陆丰两城占领了。我军到时，潮阳、揭阳的农军也占了县城，普宁四乡的农民都起来将县城围住了。反动派死守县城，有枪八百余枝，机关枪大炮都有，农民围攻不下，派人要军队援助。当时派了十一军一营人去助攻，只数小时便攻破。本可将普宁的反革命分子聚而诛尽，但是这一营长（同志）在攻破城时，不让农军进城（因恐农军杀戮太多），同时并宣布："革命军是不扰民的军队，决不会随便屠杀的。"到军队撤退时，农军也不敢杀了。因农军这样想："军队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不于破城时大杀反动派，或者是团体预定的政策。"

只有潮阳农军于破城之后曾大杀反动派，农民异常欢迎。浮洋农民与地主激战数日，后经军队的帮助将民团缴械后，农民将地主大烧杀了一次。但这些地方的反动派尚未完全肃清，而军事上已完全失败了。于是各地的农军都只好仍旧上山去。

九　党的组织

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共产党员的个人指导。

中央的七八紧急会议，对于八一革命以后的政策，如国民党问题，政权问题，财政与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均未有明确的决定。前委的同志，直到了汕头后，才知道有八七紧急会议这回事。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不单是不知道党的情形，并且连全国大的政治状况都不知道。蒋介石下野，到汀州看见"申报"才知道。

前委的委员，原照中央命令，没有谭平山，但是当时谭平山在政治上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所以前委商量的结果，只好要谭平山参加前委会议。南昌起义前，前委组织比较完善，后来革委成立，前委委员都加入到革委去了，并且都担负很繁重的工作，各项技术工作也取消了。于是前委变成了革委的党团。同时负责的几个人，都是前后左右分途而走，很难集合一块开会。因此除掉几个重大根本政策以外，许多重要的问题都由负责同志随意办理，甚至违反已定的政策，也不能纠正或制裁。譬如在汕头再与张发奎联络和滥委陈炯明部为师旅长等事，有几个参加前委的同志当时全不知道，直到香港才听见说。

在革委内工作的约二百六十余人，内有一百八十余同志，但是到汀州才组织起来，开过两次大会和几次支部会。至于他们的工作，前委全未能加以管理和指导。

军部方面党的组织比较好，各种会议也比较多，不过与前委的关系不密切，因为军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对军队的一切政治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但军部的党委在政治上亦很弱，所以党的政治方针很难深入到军队中的同志去。

沿途所经过的各地党的组织，都异常幼稚。在赣东一带不必说，就是在粤东一带所有各地的党组织，也全不是群众的斗争的组织。有些地方曾极力做起义的准备，但只注意军事技术，全不深入到群众中去。（以上根据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中央通讯”第七期、第十三期上的资料编辑，同时也参考了其他的一些文献）

二 秋收起义

从武汉政府反动后，各地的地主豪绅便用力进攻农民，农民非常愤恨。武汉政府完全变了，从前允许农民的事情，如组织农民协会的自由、反对土豪劣绅等一概禁止。农民协会不许自由组织，要由反动的国民党员来包办。不许反对土豪劣绅，说他们都是乡下有面子的人，不可以反对的。口头上答应农民减租二成五（百分之二十五），事实上完全禁止农民减租。豪绅地主说，在农民协会强大的时候，他们吃了多少亏了，现在不但不能减租，并且要将从前未缴的追回来。国民党、“国民政府”便帮着地主豪绅，派军队下乡逼迫农民缴清田租，农民稍有不愿，便拿来枪毙。农民受了压迫，便起来反抗。中国共产党就指导这些农民做抗租的运动，组织农民游击队，与压迫农民的军队打仗。秋天是农民收获的时候，也是地主豪绅催租的时候，共产党便领导农民在这个时候起来起义，镇压地主豪绅，一粒米都不缴给地主豪绅——这个运动叫做秋收起义。（以上摘自瞿秋白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对秋收起义作了如下的决定：“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在最近的期间，农民暴动的口号应当是：一、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二、肃清土豪劣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三、没收重利盘剥者财产，用以改良农村贫民的生活。四、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五、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六、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之。七、由农民协会取消重利盘剥者的债务，苛刻的租约与苛约。八、解除民团团防等类的武装与其他地主的军队，而武装农民。九、改良雇农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工资待遇等等）。十、对于乡村一般失业贫民，革命政权当尽可能的筹措基金救济之，并与以工作（如协作社等类办法）。十一、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抗纳，并实行抗租。”

在八七会议的号召下，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都发生了秋收起义。现在先叙述湖南（包括江西西部）的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完毕，临时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会议，对各地工作，曾有一个大略的讨论。临时中央政治局认为：湖南省委没有勇敢地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对土地问题又只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甚至还只是政治的没收。这是根本与中央的政策相冲突的。因此，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改组湖南省委，吸收从群众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人参加省委，以便领导湖南的党，坚决地执行中央的新政策；同时派毛泽东同志等二人至湖南，负责改组省委和传达中央的新政策。

八月十六日，湖南省委改组。十八日，省委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常委，讨论秋收起义问题。

关于起义中的农民土地问题，湖南省委委员在讨论中有如下的几种不同的意见。

甲、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没收土地必有没收的对象，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贫农要求土地的又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二、没收土地，要由革命委员会（我们的党）制定一个土地政纲，没收土地的全部办法要农民协会或革命委员会执行。三、对被没收土地的地主，须有适当的安插。四、宣布废除对农民的各种苛税；征收农业税。

乙、易礼容的意见：一、中国小地主占中国土地的多数。在此时没收小地主，小地主必定与大地主团结，站在反革命方面去，因此小地主在此时似不应该没收。二、对土地问题，此时还只能取政治的没收，如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交给农民。三、要有一个适合农民的政纲，宣布给农民，使农民在此政纲之下一齐行动，这样才能安人心，否则会引起农村的大纷扰。四、农民分了土地之后，农民是否怠耕，使农产物减少，也是一个问题。

丙、夏明翰的意见：一、中国革命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全部没收土地、土地归国有的时期。现在我们必须全部没收土地，确定土地国有原则。二、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不没收自耕农的土地，农民将不满足革命的发展，实际还要没收到自耕农身上来，所以主张全部没收。三、没收的方法由农民协会宣布。

丁、贺尔康等同志的意见，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相同。

关于起义中是否用国民党的名义问题，湖南省委根据以下几个理由认为国民党这块招牌已经无用：

一、湖南五月二十一日事变，武汉国民党中央没有去镇压许克祥的暴行。国民党中央纯以几个投机的军阀的意见为国民党的意见，国民党自己的立场已失，这时国民党已经死了。到七月十五日汪精卫等伪革命派叛变，国民党就不但是死了，并且臭了，不但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利抢地盘的工具。从唐生智、蒋介石、汪精卫，甚至到张作霖都可以拿了这块招牌来作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国民党变成军阀党了。

二、国民党从前在法律上承认民众很多利益，但是民众要他实现，则转眼相向来压迫民众。民众现在认识国民党是骗人的党，现在不受骗了，他们不要国民党了。

三、有人说国民党虽死，但还有一部分左派，可以继承国民党的工作。所谓左派是什么？大抵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他们对于革命只是同情，决不会自己开步走，且他们的行动是要看风转舵的，无产阶级领导力量大，他们才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来附和革

命。取消国民党，只要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小资产阶级仍然可以来革命。因此，湖南此次起义，应当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不应当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

关于起义中的政权问题，湖南省委认为：

一、中国革命的重要过程是土地革命，其政权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应扩大宣传工农民主政权。

二、在我们起义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应即刻建立工农民主政府。

三、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也已臭了（吴佩孚、赵恒惕都说要民选），所以现在不能用这个口号，现在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

关于起义中的军事问题，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湖南的秋收起义，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是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起义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起义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就一定要有兵力，没有兵力的护卫就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夏明翰则认为：一、湖南的起义可以起来，但成功必须看在是否有军事力量上面。农民只能做起义的附和者，因为农民斗争的勇气和工人不同。他们只是希望一个好政府，只是希望军事力量帮助，很少自己想建立政府。二、湖南此次起义的力量，应有两个，一个是军事的，一个是农民的，军事和农民的工作须同时并进。

关于起义的区域，湖南省委在开始是想鼓动全省农民起义。起义区域的划分为：一、湘东以长沙为中心；二、湘南以衡阳为中心；三、湘西以常德为中心；四、在西南之间的要冲是宝庆。宝庆也是中心地点。四个区域虽然已经划分，但是要实行发动，人力财力都有困难。以后经过几次讨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湖南省委决定只发动湘东各县的起义，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东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起义的是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七处。

关于起义的日期，湖南省委决定：九月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起义，十五日长沙起义。

关于起义中的宣传问题，湖南省委准备了对农民的宣传大纲，着重地说明过去农民协会的行动是对的，当时土豪劣绅所做的都不对，以及起义的意义、共产党的主张等。起义的口号如下：“一、暴动打倒唐生智、汪精卫！二、暴动打倒省政府！三、暴动打倒‘国民政府’！四、暴动杀土豪劣绅！五、暴动农民夺取土地！六、暴动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七、暴动实行农民协会专权！八、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九、农民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十、暴动胜利万岁！”另外，省委宣传部并准备每日编印鼓动性的小传单、标语、歌谣等。

起义的领导机关，在行政上是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在党组织方面是湖南省委决定组织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

参加起义的军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辖四个团。第一团以原来的武昌警卫团为主，吸收平江农民武装一部组成；第二团由安源的工人和萍乡、醴陵的农民武装组成；第三团以原来浏阳的农民武装为主，并吸收平江农民武装一部组成；第四团由收编原来的国民党军阀的溃兵一部组成。各团进攻的计划大概如下：第一团和第四团为

右路，自驻地修水一带出发，经长寿街，进攻平江；第二团为左路，自安源一带出发，进攻萍乡、醴陵，并向浏阳前进；第三团自驻地铜鼓一带出发，经东门市，会合第二团共同进攻浏阳。在各地都获得胜利以后，在长沙工人的响应下，三路会攻长沙。

准备工作初步完成以后，湖南的秋收起义开始了。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起义者开始破坏粤汉铁路和株（州）萍（乡）铁路，切断敌人的交通运输。一直到十五日，敌人的火车始终不能顺利地通车。

九月十日，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在安源起义。十日、十一日两次进攻萍乡不下（仅先头的工人炸弹队一度攻入），于是放弃萍乡，西进攻取老关，缴枪十余枝。十二日，又攻克醴陵，缴枪七八十枝。在醴陵，起义者组织了革命委员会分会，宣布没收土地，恢复了被国民党反动派解散的工会和农民协会。敌人调遣优势兵力前来围攻。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因敌强我弱，决定退出醴陵，经老关北上，十五日攻克浏阳。十七日，第二团在浏阳被敌军包围，在突围中兵力损失三分之二以上。

继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在安源起义之后，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团也按原订计划，分别向平江、浏阳前进。不料在九月十一日第一团进攻长寿街时，第四团突然叛变，勾结敌人，从后面袭击第一团。第一团腹背受敌，牺牲战士一百多人，损失步枪一百多枝，并有两个营被打散。第三团在向浏阳前进时，曾打败敌军，占领东门市，但不久也被敌军打败，受了部分损失。

工农革命军在各地遭受挫折以后，三路进攻长沙的计划也只好放弃。

在工农革命军起义的同时，湘东各县的劳动人民曾纷纷响应。如九月十一日，长沙郊外农民起义，捣毁反动的团防局，缴枪八十多枝；同日，醴陵四乡农民起义，烧杀反革命的土豪劣绅，夺取反动军队的枪枝；九月十二日，粤汉铁路和株萍铁路上的重镇株州发生武装起义，起义者曾缴了敌人的十二枝枪；平江农民也曾经举行起义，镇压反革命分子，并一度进攻平江。但在工农革命军的主力遭受挫败以后，各地群众的起义，也被反动派镇压下去。

工农革命军的主力和各地群众的起义遭受挫折以后，毛泽东同志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认为当时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革命已处于低潮时期，在城市里暂时已经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于是毛泽东同志即主张将革命工作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条件又较好的农村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一方针之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前敌委员会即指示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和第三团的余部由城市向农村退却。九月十九日，两团的余部在浏阳的文家市会合，接着，冲破了千千万万的敌军的围追堵截，经萍乡、莲花等地，到达三湾。在三湾，毛泽东同志扭转了部队中的失败情绪，稳定了大家的革命意志，将两团的余部编为一个团。十月，这个团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建立史无前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以上根据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二期的资料编辑，同时也参考了其他的一些文献）

* * *

与湖南秋收起义并称的是湖北秋收起义。

湖北的秋收起义，按党中央原定计划，分下列七个地区：（一）鄂南区，即武长铁路区，辖通山、崇阳、通城、蒲圻、嘉鱼、咸宁、武昌（武昌本镇及其四郊不在内）等县；（二）鄂中区，辖沔阳、潜江、汉川、天门、京山、应城、监利等县；（三）鄂西

区，辖江陵、公安、石首、荆门、当阳、宜昌、宜都、松滋等县；（四）襄枣区，辖襄阳、枣阳、宜城、光化、谷城等县；（五）京汉铁路区，辖黄陂、孝感、应山、应城等县；（六）鄂东区，辖黄冈、鄂城、大冶、蕲春、黄梅、广济、阳新等县；（七）武汉区，辖武汉三镇与四郊。但后来实际上发动了较大规模的起义的是鄂南区和鄂东的黄安、麻城等地。

关于鄂南区秋收起义的经过，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十一期有如下的记载：

"一、中伙铺劫车　　鄂南正式暴动，是自九月八号晚之中伙铺劫车始。暴动日期原定是在九月十号，鄂南特委因是晚得到一个报告，听说火车运有现洋数万到湖南作军饷，以为可劫之以资我们的军费，未顾及整个暴动日期，遂于将睡时，决定劫车。当集中二三百农民，伏于铁路之两旁，以颈上缠红带为号，由黄赤光任总指挥，率八九人武装上车，假十三军查车为名，做缴械工作，再由两旁农民拥起以壮声威。但此上车之八九人，只二人能打枪，车到时即上车，赤光上前先开一枪，大声叫缴械，护车兵士惊惶不知所措，皆不敢动……。两旁农民亦畏惧不敢动，再呼始上车。计缴得快枪十六枝，子弹五箱，及收得三万四千纸票，八十六块现洋。……特委因次日为鄂南原定正式暴动日期，知是车为由武昌到长沙最后之车，其中恐有我们寄信之同志，恐将车扣留，贻误两湖暴动，遂让车仍放到长沙，而铁路电线均未毁断，结果又无异与敌人通了暴动消息。

"二、变更攻城之计划　　鄂南农民暴动计划，原定暴动开始之第一日，即须攻破蒲、咸二城，以便在政治上号召鄂南的农民，创成鄂南整个的暴动局面。……劫车之次日，九号晚四时（即十日上午四时。——编者），遂开始尽量毁铁路，割电线，破坏一切交通，同时集中农军，由市农协到区农协来，而咸宁、通山两县则以尽量集中为原则。是时蒲圻县城驻军，约二百余枝枪，内中还有数十枝枪为同志所带领……。后来敌人力量增加了，有枪三百余枝，及二十多枝盒子，机关枪二架。没有把握，特委遂变更省委攻城计划，决定不去攻城，只在各乡村去干，抛弃县城。在蒲、通交界之山地，距城东三十里之西坑地方，于十二号另组织西坑革命政府以号召。同时，将特委迁至新店，要同人民自卫军合攻嘉鱼，再转回汀泗桥同咸宁农军攻咸宁。攻下咸宁，再回攻蒲圻。若攻而不下，则和咸宁农军集中通山，解决崇阳，过通城，联络羊楼洞及羊楼司之同志所带领的军队，去攻岳州，完成湖南之暴动。但特委到新店，即有人民自卫军之叛变，而有新店事变之发生。

"三、新店事变　　（1）和人民自卫军接洽经过：人民自卫军原为土匪，团长刘步一，有三十八快枪。先只有一个队长为同志，兵士同志有十三四人。后决定要干这个团长，乃将三个队长均换成同志。继以蒲圻县委以同志漆昌元与刘团长私人感情，谓刘能受其指挥，漆为蒲圻县党部常委、省党部鄂南巡视员，其时在省党部，遂电昌元回蒲圻。昌元归，刘步一即示以十三军一百十五团贺团长令其密杀昌元之信，表示诚意，并商进攻蒲圻之计划。中伙铺劫车事，彼曾派一班长参加，因此特委对之不疑。（2）被人民自卫军缴械情形：特委于决定不攻城之后，即将所有精华，往新店与人民自卫军集合，图合攻嘉鱼。先派鄂南第一路指挥兼蒲圻农军总指挥王锺同志，带领十六枝快枪，九枝盒子前去，不意刘步一被收买叛变，出其不意，……将所带去枪枝完全缴械。漆昌

元及王锺二同志亦牺牲。特委会次日去，因不见昌元面，疑有变故。因将来人皆住在山上，只留谢一寰及苻向一二人去接洽。他们坚执要见漆昌元，刘步一伪以漆同志宴后酒醉未醒对。并说：‘你们来了，很好！我们即刻出来欢迎。’遂派了一个队伍，‘笛达笛达’地吹着欢迎号而来。一寰忽见其前面不远有一个兵士，来即跪下，作射击状，并回头口呼‘班长！班长’似要射击命令的样子。遂告向一，立刻逃走。立时枪声齐发，被捕卫队、交通、挑夫各一人，而特委则被打得四散。……

“新店事变后，蒲圻农民群众参加暴动的，还是一天一天地多，约在二万以上，遍杀土劣和一切反动分子，所以军队仍困守孤城，不敢下乡。故此事变对于群众方面的影响，可说很少或至无有。惟其影响于群众的指导机关者则极大。因为新店事变一来，整个特委瓦解，皆丢掉群众跑回省委来。……省委均令他们马上回鄂南领导暴动，但先后由阳新、大冶、九江三处走了三次，均未能到鄂南，而大冶一次，苻向一、黄赤光等四人还遇险，几完全牺牲。因此鄂南暴动失了指导机关，一般同志及群众均不知所措，大军一去，遂归失败。

“四、取汀泗桥　　汀泗桥有驻军一营，地位异常重要，得之可以威吓咸宁。九月十号晚，由吴光皓率领三百人，快枪四十余枝，余为土枪，五时吃饭，六时向汀泗桥出发。并先告该地负责同志，放炮放火，烧毁铁路以助声威。故到时间即将汀泗桥包围，缴得械二十余枝，杀营长一人、兵士二十余人。……在此地烧了一间最大的土劣张姓的房子，弄了千余纸洋、六七百块现洋。于十二号向咸宁布防，并派交通与中伙铺取联络。

“五、占马桥　　马桥有驻军一连，非常恐惧，内中也有我们的同志。有一次加派一连人来，仅住一夜就走，所以要缴械是可能的。后县农协给他一个哀的美敦书，提出四个条件，他们即刻派一排人来愿听指挥，惟无伙食费开拔。当给以三百元作了个情面，农军遂于十三日进驻马桥。

“六、攻咸宁　　咸宁有驻军二连，官埠桥亦有驻军二连。决定在十五号晚一时攻咸宁，六时出发，由二路进攻。马桥有五六百人为一路，汀泗桥有二三百人又为一路。一人扎五个火把，七八尺高，负于背上，将火把遍插于城附近之各山，人即立于无火把之处。……另派百余枝土枪携带火把到官埠桥，会同当地农军，以牵制官埠桥之二连驻军。下午七时，……听说小龙潭有一连敌兵开来。……到小龙潭，……见无军队，直至咸宁。遇一步哨，见面即跑。即至山上散开，枪声一响，马桥及汀泗桥开来之队伍均响应。先是派有五人各带二十元到城内买洋油起火以作内应。后回一人，说被打不能前去。由十二时攻起，至三四时，还未见城内起火，天又将雨。其时火车忽开，闻敌人援兵已到，……知已不能攻下咸宁，遂下令先叫土枪队退。退了十余里，天渐雨，快枪队亦退。至马埠桥，天已明，大雨即来，整整下了一天。是役，快枪队很勇敢，惟土枪队一气跑回柏墩。在马埠桥伤农军三，死一人。咸宁虽未攻下，但……各机关及县公署人员，一闻攻城枪声激烈，都已在那里准备退却官埠桥了。

“七、失马桥　　攻城后三日失马桥。是日先将……土枪队带至汀泗桥布防。……至距城七里之地，忽闻枪声，土枪队即四散，仅存十枝快枪。是时所遇敌人约一连，系分三路来攻，……散开御敌，且战且退，敌人则冲锋前进。退至马桥时，仅余……一人。马桥已于是时失去。占马桥之部队系官埠桥之十三军，有土豪劣绅为其向导。失马

桥时，未牺牲人，仅土枪被夺。……因恐马桥之敌将攻柏墩，乃……开军事会议，分五路布防。……

“八、失柏墩及白沙桥　　阴历八月二十八日，敌人分两路来攻。一路由濯港进攻白沙桥，兵力约一连。一路由汀泗桥进攻柏墩，兵力约一营。当由吴光皓率枪五十枝拒敌，战五六时，不支退却。军需处及各办事人员则由白沙桥退。由咸宁退通山者共百余人，由白沙桥退通山者共土枪百余枝。柏墩有二十余枝枪上山去了，死者三人。当即开咸、通负责同志会议，计划守通山要道，弃城退于通山县东之二十里之九宫山。敌人当日未至通山，二三日后亦未攻通山，遂复由九宫山返县城，进行工作。……组织咸通农军军事委员会，负责指挥分五路布防，设总指挥一，集中粮食到九宫山，预备敌人来时退守山。又派代表到通城、修水等处接洽，因为失了上级机关的指导，不能不与各方面联络。

“九、通山工作经过　　通山于八月尾由县委……将县长幽禁，以县长名义向土豪劣绅募捐以稍安其心，同时将交通断绝，并派农军严守四境。至九日即将该县长及各官吏枪毙，同时派农军二十队分赴各乡杀戮土豪劣绅，并没收其财产，计杀土豪劣绅一百余人。第二日即派农军帮助咸宁。

“此后敌人对于鄂南，完全采用封锁政策，使省委派去之同志无法入境或不能停留，因此省委对于该区消息完全隔绝……。据大冶之同志报告则通山失守后鄂南农军曾有一部入阳新。因阳新方面之农民不知此部军队之目的，再土豪劣绅之造谣鼓动，遂至双方冲突，共死一二十人，鄂南农军退去。”

继鄂南起义之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一月间，鄂东的黄安、麻城地区的农民自卫军，在党的领导下，配合武装群众数万人，举行了大规模的秋收起义。起义者占领了黄安城，建立了革命政权，组织了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并宣布实行土地革命，起义者占领黄安二十一天之后，敌人派大军前来围攻。起义军遭受重大损失，退出黄安，到农村去发展游击战争，为后来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打下了最初的基础。（以上湖北秋收起义的经过，系根据一九二七年出版的“中央通讯”第十一期上的资料编辑，同时也参考了其他的一些文献）

*　　　*　　　*

以上所讲的两湖秋收起义，是一九二七年全国秋收起义的中心。其他各地的秋收起义，则以广东最著名。“广东是中国农民运动开始最早的省份，特别是东江海陆丰等地有比较长的农民斗争的历史。海陆丰农民，并不因在反动势力严重压迫之下，而停止其斗争，尤其是自四月十五日以后，更无日不在积极反抗之中，如杀戮豪绅地主，破坏反动势力之一切交通行政，以至抗捐抗税等等……。农民革命情绪的高涨，反动统治势力的动摇与豪绅地主阶级之危惧，竟使暴动急遽的爆发。农民暴动开始于十月三十日。十一月一日农军即占领海丰，接着陆丰、碣石、捷胜亦入农民之手。农民暴动胜利之后，即实行分配地主土地，焚毁一切契约债务关系，组织各乡赤卫军，编练工农革命军，建立工农兵政权。

“此外广东琼崖也有农民斗争发生，江西鄱阳星子等处随着也有农民斗争的爆发。这一秋收农民暴动的浪潮，传播到十月中直隶的玉田暴动，……十一月初江苏的宜兴、

无锡、江阴以至崇明的农民斗争和暴动。十一月一日宜兴的农民暴动，且曾占领县城两天。河南四方山等处也有农民的暴动。这些暴动大半是共产党参加领导，也有许多是零星的自发的”。（以上摘自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中国大革命史”）

三　广州起义

一　起义的酝酿

（一）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反革命的政变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早晨，天色还很朦胧的时候，李济深就进行了反革命的政变。他开始大批的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的积极分子，解除黄埔学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检查了一切革命的职工会和农民、学生、妇女及其他社会组织，并且用武装的力量驱逐了二千铁路工人，以其机器工会的走狗来代替。在广州就逮捕了两千人以上，秘密枪杀的约一百人。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和铁路工人，当他们还未被打破和解除武装的时候，曾强烈的反对，而且和政府的军队作几小时猛烈的斗争。李济深并没有正式的封闭一切革命的职工会，但是他指定自己亲信的人员，工人阶级公开的叛徒及黄色首领，用各工会“改组委员”的名义，没收了工会的金钱和房屋，占据工会的会址。

和李济深军事行动同时并进的，就是雇主也开始了对于工人的广大的经济进攻。以前工人和雇主所定的条约和协定，以及过去猛烈斗争所争得的结果，到现在都作无效了。一切积极的工人都被开除。谁要是反抗，就被提交“改组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就加以共产党员的“罪名”，马上就逮捕这个人。

这种相同的事实，在广东各城市也有。在乡村呢，因为农民和地主都有武装的力量，所以有更多流血的冲突。

虽然李济深布置了无情恐怖的压迫，虽然很多工人革命的组织消灭了，他们的工作停顿了，然而广州的工人还是能够以他们以前的革命斗争的坚忍性在四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爆发了总同盟罢工。其罢工的口号是：“打倒蒋介石、李济深和一切新军阀！”“释放一切政治犯！”“反对雇主的进攻！”

反李济深的斗争同样在广东各地爆发了。离广州北部八小时火车的韶关附近聚集了两千武装的农民。他们因为不能和新军阀的军事力量正式的战斗，不得已而退守湖南。海南岛的工人和农民对政府及地主的军队继续了几个月之久的斗争。他们得到了很多胜利，夺取敌人一千多枪械，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占据海南岛之大半。

特别要指出海丰、陆丰及东江各区的农民的斗争，这些地方是最近几年来农民运动的故乡。他们和政府军队不断的继续了六个月的游击战争，他们占据了海丰的县城，建立了海陆丰工农民主政府。这个组织的影响，其土地政纲及实际的分配土地，并不仅只限于广东一省，甚至蔓延到中国辽远的区域。

东西江和广东南部也有个别的农民暴动，但相互中间没有联系，因此也没有大的胜利。

张

经过上述的斗争，广东的工农更深刻的觉悟到推翻封建军阀、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府的必需。在武汉国民党叛变以前，广东工农根本的希望就是武汉政府革命的军队回广东。武汉国民党叛变和南昌起义以后的希望，就是贺龙和叶挺革命军队的南征。最后等这次南征又失败之后，于是停止了一切对于外来帮助的希望，对于“慈善的军阀”的幻想也消灭了，在工人和农民面前所剩下的只有广州和海陆丰起义这条道路。

（二）赤卫队的组织

广东赤卫队的组织曾经有三次变更。在第一个时期，在李济深刚政变以后，职工会的纠察队转入秘密状态，采取了各种不同的、表明其愤怒和斗争决心的名称，例如“剑仔队”、“工人自救队”、“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等等。这些组织是属于各个职工会的，相互之间只有非正式的关系，没有中央组织。

到第二个时期就准备按区来组织赤卫队集中的系统，不属于个别职工会，因为按区来组织的赤卫队，在军事行动上比较以前那种按职工会组织的方便些。每个赤卫队依照它的工作或居宿地点而编成队伍，直接隶属于赤卫队的区委员会之下，区委员会隶属于赤卫队委员会之下，共有十一个赤卫队的区委员会。

在第三个时期，广州起义前二十天，才知道了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大批按职工会组织的纠察队，不能在一个月之中改组，困难就是在于在秘密条件之下各个职工会的赤卫队，不能这样快的相互认识，而区委员会又不能在这样短的时候秘密的组织自己的队伍。离赤卫队委员会所决定的起义时间日益逼近了，所以他们取消按区组织的计划，把各工会的赤卫队员分为六个连队，每个连队由地域上比较相近些的队伍组成。

在省港罢工工人、广州市的工人和农民的赤卫队中，省港罢工工人是最有力量的成份。其原因如下：（1）这二万罢工工人以往和帝国主义作了两年多斗争，集中在城外的宿舍，因此无论何时都易于动员他们；（2）其中有五千人以往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纠察队中受过军事训练；（3）其中有两千人是在李济深政变以后已经组织在赤卫队中了的。广州工人中的赤卫队队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每种职业的工人没有集中，而分散于全城市。在另一方面，他们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是在业的工人。这样工人中的赤卫队队员的数量也有两千。赤卫队中的农民约四百人，他们的优越处就是他们有斗争的经验。

赤卫队队员有各种不同的专业，例如五金工人、洋车夫、汽车夫、建筑工人、海员、运输工人、菜商、市政工人、铁匠、面粉工人、制蒲团的工人、印刷工人、火柴工人、店员、缝衣匠，此外，还有被李济深开除的铁路和工厂工人。

赤卫队委员会由五个人组成，其中有参谋长、政治工作人员。每个队伍的组织如下：每小队十个人，三个小队成为一中队，三中队成为一大队。一大队分为六个联队。每队都有一个队长和副队长，每个大队都有党代表，每个联队有具有军事知识的参谋长。除参谋长以外，一切长官都是工人。

在赤卫队委员会指挥之下的，除上述者外，还有三个特别队和消息局。这里有：汽车队，其中约有六十个汽车夫；破坏交通队，其中大部是铁路和市政工人，人数约五十；此外还有红色恐怖队，人数约三十。消息局的同志，大部分是在军事和政治机关里工作的和省港罢工工人。

赤卫队队员都是有阶级觉悟和政治认识的，但是除那些在纠察队里受过军事训练和当过兵的人外，几乎没有军事经验，甚至连最粗浅的巷战知识和障碍物设置等等都没有教过他们的。在起义的时候就强烈的感觉到了这些缺点的结果。另外一个困难，就是军器过于缺乏，因为纠察队在四月十五日就被李济深解除武装了。因此组织特别的工厂制造五百个手榴弹和炸弹。兵工厂的工人在这点上是很有利的，还准备了一千枝标枪。

（三）从四月十五日到起义时候广州的工人组织

广东工人代表大会，在李济深政变以前有两百个工会与二十一万八千工人。现在是在一个秘密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之下，这委员会中有旧执行委员会委员和职工会秘密选举的新委员。

秘密委员会中共分六区：交通工人、印刷工人、店员、缝衣匠、粮食工人、建筑工人等。每区有区委员会，六区的主任组成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

上面已经说过，秘密委员会在四月二十四日组织了反抗政府的总罢工。海员、汽车夫、洋车夫、印刷工人、店员、银行职员、码头工人等等都参加了这个罢工。在这一天中间，共产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省农会的宣言散满了全街。散发宣言的有六个被捕和枪杀了，其中有一个十五岁的劳动童子团员和两个十九和二十岁的女子。工人们见了，都忍不住流泪。这六个人都是枪毙的，他们都沿街高呼："打倒蒋介石、李济深和军阀！革命万岁！工农万岁！共产党万岁！"等等。有一个女子在枪毙之前高叫："工人兄弟们！我们去休息去了，当反革命的国民党推倒以前你们必需继续我们的工作！共产党万岁！"因为这几句话，所以她在枪毙以前又受了各种凌辱。但是这几句话是永远忘不了的。

六月十九日，省港罢工二周年纪念，罢工委员会召集了两万罢工工人开群众大会。其口号是：

"保持罢工工人一切权利！（维持罢工工人的宿舍和饭堂，发给每个罢工工人九十元大洋等）"

"释放一切政治犯！"

"打倒委派的改组委员！"

"保持四月十五日以前工人和资本家所定的协约！"

"打倒帝国主义的下流走狗——蒋介石、李济深和国民党！"

这是当时李济深企图把他们驱出广州流放到黄埔孤岛的时候罢工工人的主要要求。

六月二十三日，沙基事件的二周年纪念，秘密的罢工委员会就和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秘密委员会召集了群众大会。参加的有三万工人，虽然在警察和保安队的包围之下，然而所提口号也和六月十九日一样。李济深的改组委员会也派了自己的代表参加这个群众大会，他们想证明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但是群众一知道是他们的时候，就赶开了他们，虽然他们有护兵（改组委员会重要委员时常是有卫兵跟随的）。

李济深感觉到了省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工人积极性增长的危险。虽然他以前曾想藉口黄埔设港强逼将省港罢工工人赶出广州市，但是在日益增长的危险之前，他的发抖使他到六月下半月的时候就开始袭击罢工工人的宿舍，且逮捕两百多人，这些都是改组委员会的委员告发的。

罢工工人和广州工人很愤怒的决定了，首先就要把改组委员会的委员从自己的宿舍和工会中赶出去，免得他们有识破秘密和把秘密转给于警察的可能，于是加强红色恐怖对付改组委员会。在海员工会改组委员会抛过两次炸弹，中央银行一次。车夫工会改组委员会委员、海员改组委员会中的四个侦探都杀死了。当李济深由广州到河南去的时候，准备暗杀他，但是水雷爆发太迟。在工人中最普通而且有成绩的是用刀，因为用它常常可以得到好结果，而且毫无声息，可能避免警察的即时追究。广泛的红色恐怖和群众愤怒，使改组委员会委员不敢出来，出来时必有卫兵保护。在这个时期中的经济斗争也较前加多了。

国民党和武汉政府之反动和叛卖革命给广东革命群众一个大的打击。对于贺龙叶挺革命军的胜利的希望也没有结果。

然而这些还是没有减弱他们的斗争。贺龙叶挺军队失败后两个星期，十月十四日那天，广州到香港的航路、广州到澳门、澳门到香港、香港到江门的轮船都罢工了，大众一心来反对轮船公司的决议——开除参加省港罢工的海员、以工贼来代替之决议。十月十四日十二点钟，五千广州罢工的海员在太平戏院前坪召集了群众的露天大会。所有革命的职工会和香港罢工工人都派了代表参加这个群众大会，此外还有这些工会的五千会员参加大会表示对于海员的同情，他们感觉到这个斗争和自己的斗争是有联系的。群众露天大会决定了：改组委员会勾结轮船公司，现在为要反对轮船公司，就必需工人自己来办工会。因此从海员选出了二十五个人组织一个维持委员会，决议把改组委员会从工会赶出去。露天大会以后，将近两点钟的时候，几万的群众就开始沿街示威游行。红色旗帜骄傲的在空中飘荡。驱逐改组委员会的口号，叫得特别多，很自然的，因为这是从工人的心的深处迸出的呼声。经过全广州主要街道以后，到四点钟的时候走到海员工会。改组委员会的委员早已逃跑了，但时有四个他们的走狗被捉着了，用石块打死。

这个示威的影响普及于各业工人中。广州的革命工人大多数都在作驱逐改组委员会的斗争。每天都有各种工会的工人去杀害或驱逐改组委员会的委员。这些现象曾经发现于运输工人中，洋务工人中，以及煤油工人、五金工人中等等。

张发奎在广州夺取政权后，对于革命的工人运动曾频送秋波，并且想得到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帮助。这时候秘密的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和秘密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就利用此机会由秘密的环境进到公开的行动。

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召集了代表会议，到会者有百数工会的代表。会议决定了：

1. 释放一切政治犯；
2. 保证工会与农会的自由；
3. 驱逐一切改组委员会；
4. 四月十四日前工人与厂主所定的协约一概保持有效；
5. 保持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

为实现以上的要求，代表会议决定十月二十三日举行总罢工，并且从改组委员会手中夺取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办事处。此办事处是应该交给秘密委员会的。

秘密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也召集了代表会议，通过了一些决议：十月二十三日省港罢工的工人应该和广州的工人一起出发示威；示威大会选举新的罢工委员会，共三十五人，这个新委员会应该把改组委员会的一切文件都接收过来。

全城反动派都在谈论共产主义的“危险”。自四月十四日之后红旗第二次又飘荡于工会的房子之上；露天大会相继不绝；对厂主的经济斗争是日渐扩张；所有的印刷工人，无一例外，罢了一天工，开了群众大会，从工会的会址中驱逐了改组委员会；汽车夫用怠工的方法反对了汽车公司变更他们工作条件的企图；邮务工人重新开始斗争，提出他们两年来斗争而未得到结果的条件；海员要求轮船公司恢复一切已被开除的工人的工作并增加工资；煤油业工人袭击了改组委员会，以备从他们的手中把工会夺回来。广州又变成红色的了！全城反动派都在喧嚷着“赤祸”。

张发奎开始还预备在完全战胜李济深以前，暂缓对革命工人的斗争，并且对他们还表示好感；但经过一时的动摇之后，他的真面貌也呈露出来了。十月十九日，他拘捕了海员工会会员四十五人、罢工委员会会员三十人。在李济深袭击罢工工人宿舍及饭堂之后，被改组委员会所保留的四百省港罢工纠察队，到现在也被解散了。在搜查的时候李济深的侦探枪杀了两个海员。警察和宪兵昼夜巡游街市，白昼搜查行人。城市的重要地点都加岗保守。每天在城市中散发并张贴禁止工人总罢工，违者严格处罚的传单，报纸上每天登载恫吓工人罢工的宣言。

因为上述的情形，所以总罢工未能举行。十月二十三日，代替总示威的是：一百小组工人，每组十人布满了全城；到晚上两点钟，警察都以为示威是没有了，这些工人小组骤然之间，呈现于街市上，拿着红旗，散发传单。警察吃了一惊。这种形式的示威在广州算是第一次，并且对于一般人都起了一种惊惶的印念。

正当此时，“左”派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来到了广州，其目的是帮助张发奎,用“左”派的高调装饰其政府。但十二月一日，被李济深在四月十五日所裁撤的一千多铁路工人和五百火柴工人，在汪精卫的住所前面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复工。汪精卫拒绝不见，廖仲恺夫人出来与他们谈判。她用了自己死去的丈夫的名义，眼里含着泪去激动工人，要工人服从政府。她并且说：“政府必然能找出满足你们要求的办法的。”工人则要求具体的答复。以后汪精卫就下命令拘捕三十余工人，警察解散了游行。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秘密委员会主席，示威的领导者亦遭拘捕。

十一月三日省港工人也组织了示威游行，这是对于汪精卫企图消减罢工工人组织的反抗。

依照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政府与罢工委员会所定的条件，在省港罢工正式宣布停止以前，每个罢工工人应由政府发给一百元，以后再寻找工作。在领得补助金六个月后，如尚未找得工作时，工人有权利回到罢工工人的宿舍和饭堂去度活；宿舍与饭堂在有工人尚未找到工作时，还须继续保存。汪精卫知道罢工工人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并且对于军阀是一种危险，于是就热烈筹款，想每人发给九十元（在李济深叛变前每人已领了十元），这样一次算完事，宿舍和饭堂便马上关闭了。

十一月三日罢工工人在一个公园前召集了一个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但是被军队用枪械冲散了，而且逮捕了许多人。

十一月七日虽然有严厉的压迫，省港罢工工人、广州工人还是在太平戏院前召集了群众露天大会纪念伟大的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红色旗帜和口号在争取解放的群众中间愤怒的飘扬、招展。

十一月中旬汪精卫从海关处得到了大批款子。每个罢工工人得到九十元大洋之后，

被驱出宿舍。工人们对于被驱出宿舍是极力反抗的，所以当他们被驱到街上以前曾烧毁了好几个宿舍。

省港罢工工人之被驱散是广东革命力量所遭受的一个很严重的打击。赤卫队总委员会之下特别组织的破坏交通的队伍和通信部，后者大部分都是罢工工人，几乎全部瓦解了。这时候罢工工人都离开广州找工作去了，或准备到农村中去。五千罢工工人都是在工人纠察队中受过军事训练的，其中的两千人就是赤卫队队员，也完全离散了。只有五百个纠察队员一直到起义的时候还在赤卫队里。这个损失，在起义的时候就感觉得特别深刻。

共产党、职工会和农民组织都忙于动员群众的政治工作、出刊物等；“红旗”、“广州工人”和“人民周刊”，是工人们欢迎的报刊，对于其他组织的报章，工人们都是抱着批评的态度。

（四）起义以前的广州

十一月中旬张发奎把南昌起义时被解除武装的教导团又重新武装起来了。张发奎虽然不信任这个教导团；然而需要它和李济深作战。教导团由一千三百个下级军官组成，其中有两百多共产党员，教导团百分之九十九是革命的，而且完全同情于工人阶级和土地革命。在教导团中担任营长职务的三个营长中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其他担任教导团下级军官的大部分也都是共产党员。这个教导团驻广州，它在张发奎军队的兵士中颇有荣誉。由此可见这教导团的特别意义。对张发奎的不满迅速的增长了，和压迫工人运动恰好成为正比例。“红旗”是每个工人都愿以任何价格去购买的报纸。秘密书报散发得很多，秘密会议也是无日不有。整个的教导团都准备着起义。

张发奎为要增加自己的军队，组织一个警卫团，但是无意的又指定了共产党员作此团的团长。团中仅有两百兵士，团长又得到了命令重新招兵，于是三百个省港罢工纠察队中的工人也加入了警卫团。

张发奎从广州派一个团长，带了五百兵士到海南岛去，谁知这一团团长也是共产党员。在北江方面有贺龙叶挺的军队的一部差不多有一千五百支枪，党的广东委员会也通知他们开到北江，与广州起义并发。

所有这些军事力量，就是广州工农可靠的同盟者，广东的农民也迅速的集合力量，准备起义。

花县离广州有一天的路程，那里的农民四个月前曾退藏到山谷里，现在已经准备反攻了。海陆丰与海南岛上工农民主政权的影响日渐增长，这变成了工农群众以及他们的敌人日常谈话的东西。

被汪精卫抛到街上的两万省港罢工工人，或者流离于广州，或者跑到别的城市与乡村去找工做了。这时候失业工人正多到极点，得到工作的希望完全没有，因此，他们是推翻现存政权的起义的顶好的鼓动者。四月十五日被裁撤的铁路工人也是如此。海员也在继续他们对轮船公司的斗争。邮务工人也更坚决的提出了他们的要求。汽车夫也在举行罢工与怠工去反对工资的减低和工作条件的变坏。洋车夫也在准备夺回自己的工会以与联合的洋车公司斗争，因为这些公司拒绝把洋车租给他们，并且企图提高租金。制油工人在广州及其近郊，约有一万人，在他们准备夺回自己的工会时，被警察驱散了，并

且许多人被捕。但他们第二次又在准备夺取自己的工会，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工会在他们手里时，他们才可以和厂主谈判。许多工会的人利用了军阀的冲突，不断作了许多经济的斗争。张发奎、汪精卫和蒋介石联合起来在十一月十七日把李济深驱出了广州，张发奎的军队和李济深的军队，在广州、白沙、江门、西江、汕头和广西时时都有开战的可能。全中国的情形都非常不靖，没有一个政府是稳固的。两个大的军事营垒，蒋介石派与广西派很快便要开始火并了。

广州在经济方面，情形还依然如旧，谁也不知道明天的情形是怎么样。国民党中央银行的纸币还是继续低落，纸票兑现处都关了门，也不兑现了。张发奎没有丝毫改善现状的力量了。他作到唯一的事——就是下令枪毙一切极小的盗贼。

起义前，十二月初，广州的情形简单说来就是如此。欲消灭军阀间的流血战争，维持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利，并且夺取政权以创造新的生活，群众都在企图起义了。这种紧张的情形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广东省委决定领导群众去起义。

这时候张发奎竟遣派自己的代表来疏通共产党去帮他攻打李济深。广东省委的回答，就是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公开宣言。此宣言向工农及兵士解释这不过是张发奎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工人的一种新的阴谋，并且号召群众准备起义去推翻军阀、资本家及地主的政权。

（五）起义的组织

十二月四日教导团的两百个积极分子，在广州的郊外开了一个秘密会议，并且在两点钟之内，听了共产党代表的报告。他们大家一致主张起义。此后他们就天天问，什么时候起义呀？

十二月七日，八十个工会的代表召集了一个秘密会议，这会议是由赤卫队守卫的。他们通过了马上武装起义的决议，十个工人被选为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的代表。农民和兵士各选三人，所以这样就成立了十六人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工农兵代表会议在夺取政权之后，马上就要增加到三百人。

这是非常困难的时候，党的支部、职工会、赤卫队都每天不断的开会，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秘密的委员会每天清早八时至十时开会，赤卫队的委员会从五时开到七时；开会时审查它们所附属机关的组织，并且决定明天的工作。赤卫队及其各队的领导者的会议更是非常之多。积极的在准备炸弹与枪。“红旗”与“广州工人”的销路日增。

在总罢工之后才起义呢？或是直接武装起义呢？这问题曾经提出了两次。开始说起义前的罢工是必需的。在第二次讨论时，有赤卫队、职工会的负责人员、兵士、农民及党部委员参加，他们一致决定了直接举行武装起义；决定了十二月十三日起义，因为那时候，我们的一切准备都可完成，并且那时张发奎和李济深的战争就可开始。起义的计划通过了并且批准了，成立了指导起义的军事委员会，制定了起义的行动大纲。

但是已经到了上海的汪精卫得到了准备起义的消息。他就电告张发奎，教他解除教导团武装，驱逐赤卫队，搜查职工会，逮捕苏联领事，好象后者对于起义有些关系似的。张发奎又电令前敌指挥黄琪翔回广州执行此计划。这位军官十二月十日清早到了广州。

整个的起义计划很有不能实现的危险。革命军事委员会估计了这一层，便赶快决定

把起义的日子由十三日移到十一日，马上就往一切党部机关、工会、赤卫队及教导团部下了准备斗争的命令。（以上摘自黄平作“广州暴动及其准备”，原载一九三〇年出版的“广州公社”一书）

二　起义的经过

（一）起义之第一日

1．一声霹雳惊破敌人胆

教导团全团士兵，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起义的组织者张太雷同志及其他工农兵代表会议代表赤卫队代表的热烈的讲演以后，当场枪杀反动军官十五人，竭诚宣誓推翻国民党政府和服从广东工农民主政府的命令。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展开锤头镰刀大红旗，按照预定计划走向各连分配的作战地点。同时，几千工人赤卫队，撑起红旗，围着红领带，戴着红领章，持步枪手榴弹者当前，持刀斧徒手者随后，一队队地，向着预定地点进发，枪弹声大作，呼喊震天，“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变”——工农兵起义正式开始。

星稀月朗，市寂人稀，十二月十一日夜间的三点三十分钟——丝毫不差，恰是革命委员会所指定的时候！

这时的枪声、弹声、呐喊声，对于统治阶级的老爷们（自张发奎至陈公博）简直是晴空霹雳。因为对于广州将要爆发起义这件事，虽然汪精卫有青（九日）电到粤，虽然陈公博曾得有上海密报（谓广东起义日期在十二月十五日）事前的确知道，并且连日秘议对付办法（见广州“民国日报”载陈公博自述脱险之经过），但从陈公博十日下午七时与谢婴白同赴海员工会改组之欢宴，八时参与黄琪翔为方鼎英部唐星副师长饯行（见同上材料）的事实，以及起义开始时由广州及香港传出之消息都是黄琪翔围缴莫雄械、黄琪翔与朱晖日冲突（英文“香港日报”及中国各报均然），公安局职员还以为是囚犯越狱（见“民国日报”公安局职员谈话）等等事实看来，广东统治阶级对于十一日上午三时三十分爆发起义这件事，实在是事前一点一滴也未曾知道。

正因为统治阶级已经知道广州城内将要爆发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兵联合大起义，同时又不知道这一起义的确定日期；所以当起义开始时，不仅统治阶级走狗御用人的警察、军队，都望风而逃，就是统治阶级的首领也都闻风鼠窜（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朱晖日均当夜逃走）。

2．两点钟内“赤化”广州城

三点三十分同时发动的教导团士兵与工人赤卫队，遵照原定下列计划实行作战：

A、赤卫队分为七个联队，担任攻打七个区域，“第一联队车夫工人攻打公安局；第二联队邮务五金工人攻打七、六、二警区署；第三联队粮食工人攻打太平戏院保安队；第四联队建筑工人攻打大佛寺保安队及四区署；其余三联队攻击各区署……”（见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对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召集之全国工会代表特别会议之报告）“同时，也有特别队伍之组织，如破坏交通队，破坏电线、电灯队……”又有“汽车交通队，则准备载队伍及运物等……”（见同上特委报告之补充）。

B、教导团的三营士兵的分配是：“第一营担任解除邻近教导团的步兵团之武装；第

二营担任解除驻在沙河之炮兵团及步兵营之武装；第三营开赴公安局……。”（见A君报告）

工人群众鼓起无限的勇气与热情，抛掷手榴弹，开射步枪，狂风扫败叶似的占了各机关，缴获许多警察的枪支；虽然公安局有铁甲车及机关枪的掩护，但也未受大的牺牲，便能立刻攻下。

第一、二两营教导团士兵“黑夜突击步兵团与炮兵团，很得心应手的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夺获大炮约三十门，缴得步枪一五〇〇支”（见A君报告）。

我们的革命士兵及赤卫队能够这样迅速的占领各机关，与运输工人准备好了几百辆汽车、公共汽车、运货车、小摩托车的帮助有极大的关系。

“工人的队伍占领了邮政局、电报局、无线电局、军营、全城各区的警察署、国民党省党部及其余全城军事要点……。”（见M君“广东暴动的意义与教训”一文——载一九二八年三月莫斯科“真理报”）

赤卫队打开各囚狱，释放一切政治犯，“计公安局未决男女犯八百名、司法厅监狱女犯六百名、分监七百名、广东监狱七百名、其他各处羁押犯人四百名、军事委员会军事犯二百名……”（见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晨报”）“……其中的共产党员及黄埔学生都马上武装起来，并自愿加入红军。”（见M君论文）

“约莫经过二点钟的时光，全城都落到暴动者掌握中了。只在城市中心还有几处未能拿到：炮台式的李济深住宅，二、四及十二军的司令部……。”（见A君的报告）但据特委报告则谓：“还有三个军事机关未攻下；一个是第四军司令部（八旗会馆），一个是二十四师司令部（在仰中街），一个是观音山”；据特委报告补充则谓：“……其未攻下者还有：（1）第四军部，（2）第二师部，（3）军械处（4）军事厅”；据叶挺报告则谓：“惟广九车站、第四军部、观音山未下。”不过，总而言之，整个的广州城在起义两点钟之后除了很少数的地方外，完全落在胜利的起义者的掌握之中了，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全城已经落在共产党手中，以公安局为大本营，各马路均悬有红布横额，书：“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打倒反革命的张发奎、黄琪翔”，“劳动政府给工人衣食”，“八小时工作”，“工人监督生产”等字样，并有汽车多辆，巡行各马路，散发各种传单，其中有一张传单略谓：工农兵联合的革命势力，经过一次英勇的斗争，夺取了广东的政权。大部分留守广州的兵士都在红军指导之下，造成了这次起义。十二月十一日晨四时，五千工人赤卫队，占据了公安局，缴了公安局保卫队的械，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随即由一队队的士兵，一营营的赤卫队，用手枪长枪等，占据了一切反动政府的机关；许多革命队，占据了广州一切军事要隘；现在他们已占据了第四军部、广州卫戍司令部、公安局、电灯局、邮政局、中央银行、粤汉、广三、广九车站，其他次要机关，尚在肃清中……。（见十二月二十三日“晨报”）

“广州工人代表会立即建立在学宫街涓宾书院处，而红军总指挥部则在公安局，赤卫队指挥处则设在旧省公署内，共产党部设在明星戏院内，工农民主政府也设在公安局内……。”（见特委报告）转瞬之间，白色恐怖的广州变成红色的广州了。

3．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及其活动

广州工人根据国际和本国阶级斗争的经验，知道工人阶级不能利用旧有的政权机

关，来达到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目的。他们必须破坏旧有的政权机关，同时，他们知道不仅破坏旧有政权机关，还要建设新的适合于被压迫阶级实行统治的政权机关；所以当他们一占领和破坏广州市一切旧的政权机关时，立刻（五、六点钟时。见特委报告补充）便成立新的政权机关——工农民主政府，以实行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

工农民主政府的委员是十六人，都是在起义前秘密状况下由工农兵团体选举出来的，“十个工人代表是由广州工人代表大会选出来的，革命的兵士派来三个兵士作代表、广州近郊农民协会派来三个农民代表（但有一个人早点到了，并且积极参加活动）”（见M君论文）。

工农民主政府职员如下：

主　席	苏兆征（未到时张太雷代）
人民内务委员	黄　平（兼外交）
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	杨　殷
人民劳动委员	周文雍
人民土地委员	彭　湃
人民司法委员	陈　郁
人民经济委员	何　来
人民海陆军委员	张太雷
秘书长	恽代英
工农红军总司令	叶　挺
工农红军总参谋	徐光英

大家知道苏兆征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国职工运动著名的领袖；何来是省港罢工时港政府坚决的对抗者；彭湃是海陆丰农民领袖，其他职员也都是著名的为工农群众热烈爱护的革命领袖，所以即就政府职员成份一项看来，也可证实这一政府是工农阶级利益的忠实拥护者。因此，反动的广州“民国日报”也不自觉的喊出：早晨八点钟时，整个广州的反革命力量已经被肃清，广东工农兵代表会议宣布成立，成为广州的最高政治机关，因此就建设了一个代表工农兵利益的政权。广州居民都拥护这个与广东一切反动力量斗争的新政府。

工农民主政府一经成立，便立即发表告全中国工人农民和兵士们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宣言，宣布了整个对内对外的政纲（政纲见后），以昭示自己的阶级面目和满足劳苦群众的需要。

工农民主政府在军事倥偬和大局粗定的局面之下，直接或间接的引导群众，进行扩大起义和巩固胜利的工作：

宣传方面：

新闻工人，即行罢工，一切反动的消息机关，完全停止工作，使反革命失去宣传之工具，同时，立即出版工农民主政府机关报——“红旗”。

“市中贴有各种宣传标语，其所标为：‘打倒农民工人的仇敌李济深蒋介石汪精卫张发奎’、‘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农人耕有田，工人食有米’……。”（见十二月十三日“晨报”）

“……印务总工会亦发出传单……。”（见十二月二十三日“晨报”）

“七时已组织宣传队……。”（见特委报告补充）

组织方面：

“七时天明，全市工人参加已达二万余人，于是将各队伍重新编过……。”（见特委报告）

“七时已组织宣传队、没收粮食队、交通队。”（见特委报告补充）

检查邮电——“谁没有入门证，便不能进邮政局和电报局……。”（见广州“民国日报”）

防守各街巷要隘——“迨晨六七时之间，则闻枪声四起，密如串炮……已知事起非常，乃即派干员入城侦探，探见各街口各路口已满布军队及工人男女学生，荷枪实弹，禁止行人通过，严阵以待，颈绕红巾，又喝口令……。”（见广州“民国日报”载：莫雄部军官口述“剿共”之经过）

十二时在第一公园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但因是日群众多愿去攻打敌人，以致参加人数甚少）。（见工代特委报告）

武装方面：

“在占领城市以后，立即组织工人队，所有在沙河军营内夺得之武器与大炮，均集中在革命委员会的司令部之内。”（见A君报告。此处所说的司令部，即旧公安局。——作者附注）

“如果共产党员在街上遇见从囚牢出来的犯人，以及工人、苦力等，便给他们武器和红色徽章……。”（见十二月广州“民国日报”）

“许多无武器的工人，跑往公安局领枪……。”（中共中央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八日告广东同志书）

“广州工人在革命的军官与兵士同志的指导之下……不仅学习应用手枪、长枪，并且学习应用很新式的战争武器——机关枪、速射炮、铁甲车……。”（见M君论文）

“……同样，在军事俘虏和国民党政府被解除武装的兵士间，作鼓动工作，结果数百的俘虏兵士和军官宣布愿意加入红军……。”（见M君论文）

经济方面：

“……派队没收粮食……”（见工代特委报告）。通告商民售卖生活必需品——因此，“所有商店的营业都停止了，但可以买到肉、鱼以及其他必需的食品……”（见广州“民国日报”）。

不顾长堤一带猛烈炮火的攻击，尽力企图占领中央银行。

对待反革命：

“……工人相率往各反共工会复仇，如机器总工会所属各分会，广东总工会等，悉被捣毁……。”（见十二月二十八日“晨报”）

“又检查市内之反动派，女子共产党员亦参预其事。”（见十二月二十一日“顺天时报”）

搜查东山及葵园——广州“民国日报”载陈公博自述脱险之经过中说：“十一日余离葵园约半小时（大约上午七时左右，因据陈公博自述，他是六时三十分离开葵园的。——作者附注），有便衣束红带者五人，带同教导团三十余人围缴葵园军械，驻园宪兵一小排，不能抵抗，枪械全被缴去。其时余妻仍寓葵园，但共匪以余尚居东山而非寓葵

园，只向东山私宅搜索……。”

“……革命政权之下，设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铲除境内反革命及其侦探。奋斗的工人表现一种很大的猛烈和雄勇，以真正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拘捕和枪杀了许多有名的剥削者、反动者、警察、叛徒、侦探……和反革命的国民党的军官……。”（见M君论文）

只有由劳动群众自己的力量诞生出来的工农民主政府，在它存在的第一日之中，在劳动群众自发的伟大创造力的活动下，才能执行上述各种工作！

4. 起义中的农民、妇女与青年

许多人以为在广东起义中，农民、妇女与青年未曾起来参加。不过参加人数的多少，固然是一重要的问题；但农民、妇女与青年曾经参加这次的英勇斗争，并且参加人的行动都很英勇而积极，这也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关于妇女与青年：

十二月十四日“大公报”说：“中大学生小部加入，共党妇女持红旗沿途高呼解放口号。”

十二月二十八日“晨报”载：“市内青年团男女学生，亦提新式驳壳枪加入作战。”

十二月二十一日“顺天时报”载：“……时有二八妙龄女郎拦阻欲行避难之伟丈夫，而检查其家财。”

M君论文中说：“……特别要指出的，就是无论在暴动前和暴动后，无产阶级之青年（在中国少共指导之下的）和无产阶级的妇女非常积极的参加革命。”

“在红军队伍中，拿着武器斗争的女共产党员和女工，在码头上英国海军的眼前拘捕了白军的逃兵，指导了供给……军队饮食的需要、对军事委员会和军事参谋部的技术上的帮助，做了红旗子和运输，参加了政治宣传工作和作了红色的看护妇……。”

关于农民：

十二月十四日北京“益世报”载：“……同时东西南三方农军蜂拥入市。”

十二月十三日“晨报”载：“……现市内商店一律闭门，市中除腕缠红布之武装工人农民，及手持锄锹……之农民外，绝无行人……。”

广州“民国日报”载：“……三大铁路中以广三铁路损失为最烈。查十一日十二时，客车抵石围塘，车载有‘农匪’，即持械向车头轰击……石围塘上街山村小蛇围各处‘匪’闻声疾至，猛力向车头轰击……。”

又该报载：“……横泽集合大帮农团，在该处誓师……。”

特委报告补充说：“农民起来的已有芳村，花地、西村等处，亦次第占领乡村。”

叶挺报告中说：“广三铁路车站已于十一日为数百农民占领，但因海军阻隔，很难与广州之我军联络。”

此外，在广州起义时，东江海陆丰工农民主政权正在向外发展；东江革命委员会决定以红军第二师及农军一部向惠州移动，准备与广州取得联络。（见王君谈话记录）

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及劳动的青年妇女，当无产阶级起来武装夺取政权时，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5. 帝国主义与各种反革命力量之动作

A、英日帝国主义在广东起义的第一日之工作中心是：把一切反革命的中心人物，

都由广州救济到香港或河南去，以便组织反革命的进攻（由公安局逃出之朱晖日，便是由英军舰渡走的，见王君谈话记录）；同时，准备着公开干涉和帮助反动的国民党军阀镇压起义。

十二月十三日“大公报”载：“……因恐惧敌，水手均谢绝驾驶开往香港之船，有英国军舰保护船只靠近码头。”

又十四日该报载——东方社香港十二日电：“……海员工会……即下令罢工，搭乘各轮船之海员，一律下船而去，与香港之联络船全部停开，但因避难拥挤之故，由停泊沙面之英舰水兵运转一只华船，昨夜（十一日夜。——作者）更深始到香港……。”

同日该报载：“……沙面将与一切外部之交通禁绝，宣布临时戒严，前面有日英军舰担任警备……。”

北京“益世报”十二月十五日载：十一日夜日本陆战队入广州城。

B、广东反动的军政领袖在起义第一日的中心工作是：会议，拍电，遣兵调将，希望立刻消灭工农民主政府。

据广州“民国日报”载国民党第五军陈副官长口述之护党军回师灭共情形说：“……方证实系共产党肇变，即再由电话报告军长。同时张总指挥发奎、黄军长琪翔、邹厅长敏初等，由河北渡河往大塘与军长会面。军长即由大塘赶回海幢寺军部，共商讨共办法，是时已天亮。陈委员公博亦继到军部会商。后各下令调军，李军长即拍电往韶关，调陆周两团、江门潘团、佛山林营李营等回省，黄军长调肇庆部队旋师。此电幸早发出一小时，过一小时后，电报局已为‘共匪”占领矣……。”

又该报载陈公博自述脱险经过说：“……李福林同志在大塘用电话通知第五军部专船往江门催取援兵。至十时余，李福林、张发奎、黄琪翔、邹敏初各同志皆由大塘来，海军处处长冯肇铭同志亦自宝璧舰来会。当时所感困苦者，则李济深以攻湘之故，将第五军全调乐、韶，以致河南无兵可调。其时长堤中央银行之火已发，余等目睹惨状，手无援兵，至为焦灼。不得已与张发奎、黄琪翔、冯肇铭诸同志至士敏土厂，登宝璧舰。张发奎与余居留宝璧，黄琪翔则乘江大舰沿河西下，炮轰长堤之敌。余等在宝璧舰发命令二道，一由小舰传达肇庆，催调二十六师，一以电船催黄埔之新编第三师部队回省……。”

“十一日粤汉铁路车站被工人赤卫队占领，搜获李福林于是日早拍至韶关调兵一团回江村车站（距广州四五十里）进攻广州的电报。”（见叶挺报告）

C、机器工会的工作是：组织敢死队，准备为反革命效死。

广州“国民新闻”载机器工会“协剿共匪”之经过说：“本月十日晚十一时许，广州公安局长朱晖日，电知本会，闻共逆密谋作乱……四时许，广州市面已发现枪声，知共产党起事……即于十一日早晨速函召各支分会会员到会……立刻宣誓讨共。并由干部挑选精诚勇敢者为头队敢死队。……头队敢死队每队五十人，共有五队，专任冲锋渡河；后队预备队每队五十人，共有十队，专任保护本会及掩护头队敢死队渡河之责……。”十二日的广州激战与十三日起义的惨败，已潜伏在十一日各个反革命活动之中了。

6．红白激战

十一日下午及夜间，还有好几处继续或开始着红色工人兵士和臂缠白袖章的国民党

官兵的激战：

第一，据黄平说：观音山及中央银行本日均为红军占领。未攻下的四军军部（有二百个拚死的兵士以机关枪掩护作战）、李济深住宅、广九车站等处，均继续着激烈的战争。长堤一带时遭江大舰的炮火轰击。

第二，赤卫队为占领电灯局，与普渡码头附近电轮及天台三队二楼上之机器工会会员激战。（见广州“国民新闻”）

第三，河南李福林两团士兵，在炮舰掩护下，于十一日晚开始沿广九路线进攻；但几次进攻，都被红军击退，因而转回河南原防。（见广州“民国日报”及叶挺报告）

由此可见十一日夜晚之广州局面是：工农民主政府尽力企图肃清广州市内之残敌；反革命势力开始企图夺回广州市面之反攻。

7．起义前力量之对比

被压迫阶级之群众，无论在何时何地，在起义开始之前，其武装上之数量与质量，总是不如统治阶级的。所以，仅以武装力量之相差为广东起义失败主要原因的意见，是不正确的；然而如果与中外资产阶级各报同一见解，即以为：“共产军所以成功如此易易者，因广州军队几已全部开至西江，广州市中兵力单弱……”（见十二月十三日之“晨报”），则又抹杀了统治阶级武装之易于崩溃及革命的工农兵士的英勇致胜的事实。据我们手头现有的材料，可以证明当起义开始时，统治阶级在广州城内之武装力量是要超过起义者五——六倍以上。

（一）据叶挺报告

我们的武力：

教导团一团，约一千二百人；

军械局守备兵一连（未参加起义）；

黄埔特务营两连（未参加起义）；

宪兵一连（因通知不周到，被教导团缴械）；

工人赤卫队组织约三千人，但枪械仅五十枝上下。

敌人的武力：

第四军警卫团两营；

兵工厂守兵一营；

新编第二师有兵一团，约八百人；

新编第三师有兵一团，约六百余人；

炮兵团，约五百余人；

步兵团，约六百人；

警察武装有枪约一千枝；

机器工会有枪约一百枝；

另外，河南李福林军有两团，黄埔军校有学生千余。

附注：据广州“国民新闻”载机器工会“协剿共匪”之经过，证明机器工会会员有二千余人（据可靠材料，事实上只有一千余人。——作者注），参加镇压起义的行动，其中有七百五十人组织在敢死队内。

（二）据A君的报告

广州敌我力量对比如下：

红色方面：

教导团约一千二百人；

由各工会会员组织成的赤卫队约二千人；武器——二十九枝盒子枪，二百个炸弹。

白色方面：

广州城城内剩下的有新兵四千人；

警察约一千五百人。

（三）据特委报告

第一日参加起义者：工人二万余人，军队一千六百余人，农民二千人。

武器：工人有炸弹二十个，手枪十五枝及一切刀、棍、剑、铁尺等。军队步枪完全，机关枪无，农民不知。

据叶挺报告：革命方面参加作战人数约为四千二百人（三千赤卫队加一千二百教导团兵士），枪枝一千二百五十枝（一千二百枝教导团的，加五十枝工人的）。反革命方面参加作战的人数约为七千（步、炮兵警察五千人加机器工会一千余人），武装有步枪约四千六百枝（步兵约三千五百枝，警察约一千枝，机器工会约一百枝），炮至少约三十余门（据以后教导团缴得炮的数目）。

据A君报告：革命方面参加作战人数为三千二百，工人有盒子枪二十九枝，炸弹二百个。反革命方面人数为五千——六千，枪枝约四千——五千。

据特委报告：参加起义人数为二万三千六百，武器为炸弹二十个，手枪十五枝，刀、棍、剑、铁尺等，步枪一千六百余枝（军队一千六百枝，加农民的）。

总而言之，革命方面的武器是：手枪与盒子枪至多不过三十枝，炸弹至多不过二百个，工人步枪至多不过五十枝，兵士枪枝至多不过一千六百枝；反革命方面的武器则至少有四千六百——五千以上的步枪，还加上至少三十尊以上的大炮。

至于使用武器的技能，敌军虽有一部分新兵，但比较从来无机会学习使用武器的中国工人群众总多少要高明一点吧。

然而为什么广州城在两点钟以内成为起义工人的广州呢？这是统治阶级的军队在起义者热烈情绪和英勇争斗之下易于动摇和崩溃的缘故，而广州城决不是广州革命工人兵士垂手而得的！

（二）起义之第二日

1． 反革命合力攻广州

反革命之各种力量（帝国主义，原来互相仇视之各军阀——张发奎、李福林、薛岳、许之锐等，海军反赤两舰〔江大、宝璧〕，警察、民团、机器工会下之一部分反动会员），因工农兵起义胜利的威吓，立即团结起来，拚命的向革命的广州市进攻。十二日早晨，河南李福林军分兵两路渡河：一路由总指挥李芳率部队四营会同四军及新编第二三两师一部分渡河向东门进攻；一路由河南戏院码头，林营长小亚率领全营部队，首先由正面渡河……新编第二师部队则继续渡河（见广州“民国日报”载——第五军陈副官长口述护党军四师灭共情形）。此外“某要人赴沙面，从那里通知在某外国军船上之新调来的军队到河南”（见广州“民国日报”。此处调来军队为黄埔黄慕松团、虎门许

之锐团、江门潘枝团。——作者注）。“午刻应李福林昨日电调之韶关周定宽陆满两团、佛山林营李营均已开拔回省。”（见同上陈某口述）“驻留瘦狗岭之莫雄团第一、二两营向西门进攻，第三营向观音山进攻。”（见“国民新闻”：莫雄部军官口述“剿共”经过）“中国炮舰游弋于江中，向江滩开炮射击。”（见十二月十四日北京“益世报”）“日本炮舰亦向我们猛烈射击。”（见叶挺报告）“驻粤领事团于十二日情形紧急之际，曾举行会议，议决实行自卫（？）。英兵二千名，法水兵四百名，日本水兵三百余名，因日法英领事之调令，现已分守沙面，向华界为严重之戒备（？）……。”（见十二月十五日北京“益世报”）败逃的警察集中在九个区域内与赤卫队激战（见广州“民国日报”）。民团从北部来攻（见A君报告）。机器工会的反动会员与赤卫队互相射击，时起时止（见广州“国民新闻”）。

几千的武装革命工人和士兵，一方面继续作肃清残敌的战争，进攻四军军部二十四师师部等未攻下的敌军据点（据工代特委报告）；他方面抵抗四面包围之三团七营及新编两师之一部分军队之进攻，同时又受帝国主义军舰及中国海军炮火之轰击；更加上受警察民团武装机器工会会员的扰乱；以致在军事上形成反攻为守的形势了。然而以炮舰掩护着进攻的李福林军的四次冲锋，均被红军击退，未能登岸（见十二月二十八日“晨报”）。敌人所有的进攻在下午六点钟时完全被击退（见A君报告）。革命工人和兵士杀贼的奋勇，真非意想所及的！

2． 红白军激战要塞

观音山地势居高临下，俯瞰广州全市。公安局是起义前反革命的中心政治机关之一，起义后变为高悬工农兵联合办事处匾额之工农民主政府。在军事政治上，这两个地方的得失，有极大的影响和意义。所以陆满团午刻由韶关赶到时，即猛扑观音山；约下午一、二时左右，莫雄团第三营又进占观音山。莫雄部虽获暂时胜利，终被红军工人兵士赶下山头去。陆团则“血战数小时，冲锋十余次”，仅能“占领附近该山之红墩”。观音山正中的炮台，始终在红军手里。时已入暮，是夜两方遥击，彻夜不绝（见广州“民国日报”）。朱晖日曾三次企图占领公安局，次次均失利（见十二月十四日“大公报”）。由韶关调来之周定宽团在攻占黄沙车站之后，即乘势猛扑公安局，虽已达到距公安局二百步之处（见A君报告），但终被由南边调来之教导团一营兵士击退（见叶挺报告）。

3． 工农民主政府之活动

工农民主政府，虽然处在这样戎马仓皇的情形之下，却依然从容的积极的领导群众活动着。据我们手头现有材料，看出工农民主政府本日曾领导群众进行下列工作：

A、召集工农兵大会

十一日上午十二时，在第一公园召集第一次群众大会，因是日群众都愿去攻打敌人而到会者甚少。广州工人代表会于十一日夜晚曾召集全体职员会议，讨论和决定了召集群众大会之方法。十二日上午十二时在西瓜园举行工农兵大会，到会者约万人。在这大会上宣布工农民主政府之成立及政纲（见工代特委报告）。到会群众，对于工农兵团体在秘密时期中选出之工农兵代表名单，表示热烈的拥护；对于工农民主政府颁发的宣言政纲，表示热烈的欢迎。

B、改编警卫团成为五连（见叶挺报告），分配各联队驻防地点（见工代特委报告）。

C、没收粮食（见工代特委报告）。

D、捉拿反动派，各工会恢复办公，接收广东总工会及革命工人联合会会址（见同上报告）。

E、训练俘虏之敌人，准备给械编伍（见工代特委报告补充）。

F、颁布如下的纪念死难烈士的宣言：

本工农民主政府代表广州全体的工人农民兵士，极诚恳的致哀于昨日为夺取政权而死难的烈士们。他们都是工人农民兵士革命的先锋。他们的牺牲是革命的巨大损失。广州全体的工人农民兵士，只有以极大的努力，继续死难烈士的志愿，为保护广州工农民主政府，扫荡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势力而奋斗，以补救这样的损失。

现在，广州的工人农民兵士已经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些烈士。一切的成就，都是他们努力与流血的结果。永远要纪念这些烈士的奋斗精神，永远要保持这些烈士所成就的事业。

要用全力来拥护工农民主政府。要实行工农民主政府已经宣布的纲领。没收银行钱庄，没收大商店、没收阔佬房屋给工人居住，当铺物件无条件发还贫民。这些烈士是为这奋斗而死的，我们一定要继续着奋斗。

本工农民主政府是工人农民兵士自己的政权机关，本工农民主政府要不顾一切的为工农兵的利益而奋斗。死难烈士的志愿便是本工农民主政府的志愿。他们的精神永久使工农民主政权保障着工人农民兵士，而且要领导他们继续向前。

死难烈士的精神不朽！他们是广州工农民主政府的创造者！他们是工人、农民、兵士革命的先锋！继续为完成他们的事业而奋斗！

打倒一切军阀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势力！

实现工农民主政府的政纲！

工人农民兵士解放万岁！

4．张太雷之死与军事危机

张太雷不仅是广州起义政治上、组织上的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同时还是起义军事上主要的指挥者。他是广州工农民主政府的代理主席和人民海陆军委员，他的一呼一吸都与广州工农民主政府息息相关。不幸他在西瓜园群众大会的归途中，在惠爱街上遇见了由大北门来的敌兵一队，以致死在汽车上（见叶挺报告），于是全盘军事指挥便失去了头绪，红军总司令叶挺于起义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对于军事计划不甚熟悉。所以太雷死后，红军与赤卫队便失去了统一的、实际的领导和指挥。此时战争最烈者为观音山、长堤及西关（见王君谈话记录）。本日虽将教导团改编成五连，宪兵一连也加入作战（见叶挺报告）以及释放的政治犯一部约六百人武装应援观音山及长堤，但其余各处无生力军增加（见王君谈话记录）。教导团两日伤亡约三百余名，天将黑时，该团团长与伤败之很多学生，拥回公安局来，表示无法再战。“工人赤卫队组织松懈”，又因“军事人材太缺乏，始终未能充实下级干部人材，使成为战斗组织”（见叶挺报告）。虽然有些“赤卫队从新编配，并派军事人材当队长及指挥，因为工人对军事方面不懂，同时因语言不通的关系，作战时亦各自为战”（见工代特委报告补充）。“……二千余的俘虏，也因无下级干部不能改编；大炮二十余门，亦大都不会使用；机关枪二十余枝，使用的也很少。教导团及赤卫队均不习于巷战，致不设防御工事。令工会负责同志

组织三百名工人，作各处防御工作，但毫无成绩……工人军事知识甚浅，多不会射击……。”（均见叶挺报告）敌军方面虽屡战皆北，但各地援兵纷纷应调而来，有加无已。

十二日下午，工农民主政府在军事上已陷于四面楚歌的重围之中了。

5. 工农民主政府之政纲

工农民主政府的政纲，是在它存立之始所发布的告中国工农群众及全世界无产阶级宣言当中，及工农民主政府平民行政委员会的命令中零碎发表的。根据我们现有的材料（中国共产党中央印发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的议案大纲”、M君论文及中外报纸等），可以看出工农民主政府对工、农、兵一般劳苦贫民有如下政纲：

广州工农民主政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广州革命工人用自己的血肉生命领导兵士农民创造出来的，工农民主政府当然首先就要满足工人阶级的需要。政府的工人政纲是：

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规定手工业工人的工作时间；

一切工人都增加工资；

由国家照原薪津贴失业工人；

工人监督生产；

国家保证工资；

大工业、运输业、银行均收归国有；

承认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全国工会唯一的最高组织；

解散一切法西斯蒂的职工会组织；

立即恢复和扩大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

同时承认现在白色职工会下的工人为被压迫阶级的同志。号召他们为全无产阶级利益而帮助工农民主政权。

工人阶级懂得：不把整个社会从剥削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工人阶级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工农民主政府对农民、兵士及一般劳苦贫民都有鲜明的政纲。

对农民的政纲是：

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完全归农民耕种；

镇压地主豪绅；

销毁一切田契租约债券；

消灭一切山边田界；

各村各区即成立工农民主政权。

同时，即通电全广东及全中国说：广东工农民主政府当以全力保障海陆丰的革命胜利，批准海丰的工农民主政府委员名单，并选任海陆丰起义领袖彭湃为广东工农民主政府之农民委员长。号召一般农民以海陆丰为模范，武装起来，组织准备自己的力量，发动起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及工农革命军。

对兵士的政纲是：

国有土地分给兵士及失业人民耕种；

各军队部应组织兵士委员会；

组织工农红军；

改良兵士生活；

增加兵饷到二十元现洋。

对一般劳苦贫民的政纲是：

劳动群众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

没收资产阶级的房屋给劳动民众住；

没收大资本家的财产救济贫民；

取消劳动者的一切捐税、债务和息金；取消中国年底的还账；没收当铺，将物品无报酬的转给劳动群众。

工农民主政府的这些政纲，是中国工农兵及一般劳苦贫民永远不能忘怀的。

此外，工农民主政府有一条鲜明的对外政纲，就是："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这句简单的条文，其意义是值得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欢呼，以及全世界压迫阶级与剥削阶级发抖的。

（三）起 义 之 第 三 日

太雷死后，军事失却领导中心。赤卫队、红军及一切革命工人拚死力与四面包围之各种强敌竟夜（十二日）激战。约十二日夜间，起义的指导者因误听敌人已至小北和十五分钟便到的报告，下令退却。于是教导团、炮兵连之一部分及赤卫队之一部分，便应令向东江退却。赤卫队大部分因为各地正在打得难解难分之际，同时又因为它还不是一个坚强灵便的军事组织，编制既临时变更，指挥又不集中，巷战的情形无人周知，不能像教导团一样的全部安全退出。留在城内之赤卫队与革命工人，单独的抵抗各方面之枪林弹雨。

本日上午四时，河南李福林军与昨夜由公益江门开到省河的潘枝团与薛岳部（潘、薛约三千人），以及驻黄埔之黄慕松部，大举反攻。据十二月二十九日"晨报"载："其作战计划，系仿照年前平杨希闵刘震寰时办法，共分四路：第一路由金花庙附近渡河，进攻西濠口。第二路由广三驳轮运兵至黄沙登陆，以接应由北路南下之周陆两部，此两路均由第五军担任。第三路由士敏土厂渡河，进攻东堤，由薛岳部担任。第四路由腊德渡河，沿广九路进攻，向东堤夹击，由驻黄埔之新编第三师黄慕松部担任。"同时自江西撤退之缪培南、吴奇伟师约四五千人，向北江制造局、西村一带猛攻（见十二月十五日北京"益世报"）。此外，每路"以两炮舰掩护，由张、黄、朱、李四人亲在舰上指挥"（见十二月二十八日"晨报"）。机器工会的反革命会员所组织之头队敢死队与后队敢死队，分三大队渡河来攻："第一大队部队向海幢寺冲锋过河北后，即从靖海路进攻。第二大队绕黄沙，……由沙基直冲西濠口……。第三大队由五仙门渡河，驾电轮及普渡电船乘载队员冲锋……。"（见广州"国民新闻"）帝国主义方面，英国副领事郝尔，藉救济侨民为名，带同队伍，武装攻入广州市（见十二月十五日"晨报"）。

由此可见未曾退出之一部分赤卫队与革命工人群众，在十三日早晨与大约二师（本日到省的十五师李群——见广州"国民新闻"载机器工会"协剿共匪"经过——加吴奇伟师）五团七营及新编第二师之一部军队，至少中外八只军舰（河南各军每路以两炮舰掩护进攻。据报纸所载，当时在广州的中国军舰有"江大"与"宝璧"，其他数舰大概是乘火打劫的外国军舰），一千多反动的机器工会的武装会员以及民团警察等作战。工

人的武装还有许多是竹刀木枪。

上午八时，河南白军，四路同时冲锋（见十二月二十八日“晨报”）。“步枪与水旱机关枪齐发，炮声隆隆，硝烟触鼻，流弹横飞，纷如雨下。所有附近各处，完全断绝交通，路上绝无人行，即居于屋内者，亦因火线太密，屏息不敢稍动。”（见十二月二十九日“晨报”——广州特约通讯员执中的通讯）赤卫军“据长堤河畔，堆沙包为垒抵拒，互战至十时许，市内有机器工人千余名，齐出响应省军，向长堤一带共军攻击，共军前后受敌，遂不能支。省军分途登岸，共军仍与巷战，直至二时许，始向小北及东郊退走”（见十二月二十八日“晨报”）。

观音山方面陆团于十三日早“再行冲锋，肉搏逼进，各路军队，同时并进”。莫雄团自拂晓增援后，以第三营附机关枪十排，向观音山反攻，而以第一营于大小北江一带包围，第二营则由上西门惠爱路进攻，三路齐集，势如排山。革命工人虽殊死战，但卒于本日（十三日）早八时被该团完全占领观音山（见广州“民国日报”）。

观音山既失，反革命力量乃群扑公安局，莫雄团由观音山向德宣路、吉祥路、惠爱路、四牌楼一带冲入，赤卫队“藉所设之机关枪阵地，死力抵抗”，“战争最为剧烈，该团用五次冲锋”（见广州“民国日报”），革命工人方始退却。此时黄沙已为周团占领，黄沙方面的赤卫队，因前后受敌，退入西门（见十二月二十九日“晨报”）。占领西濠口之第五军之一部，虽然遭受退入嘉南堂的赤卫队仍由楼上开枪扫下，但终因众寡不敌，以致该部得由维新路向公安局进逼。保守公安局之赤卫队和革命工人们，奋勇御敌，用机关枪横射，刚打退敌兵时，机器工会第二队敢死队，又接连着第二次冲锋。反动军队蜂蚁般的包围着工农民主政府，但大家都颤抖着不敢进去，因为房顶上还随风招展着一面锤头镰刀大红旗，他们不知道这一面大红旗下还掩护着好些劳苦群众。他们情急智生，架炮来打这面大红旗，直到这旗被炮火打倒了，他们中有些人才敢向里面去伸头探脑，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才被白军占领，时约上午十二时左右。直到下午五时许，始不见便衣红带之赤色军人与手缠徽章之国民党的军队巷战。所有未能或不愿即时逃避之参加起义者——武装的徒手的革命工人，一小部分兵士悉数被枪杀。广州的革命战士的英勇牺牲精神，可以比之巴黎公社社员而无愧！张发奎、李福林辈之残酷凶狠手段，比之刽子手梯亥尔（Thiers）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了。（以上摘自韶玉作“广东暴动纪实”，原载一九三〇年出版的“广州公社”一书）

中国第一个苏维埃

（广东通信）

——海陆丰工农兵的大暴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罗　浮

自国民党公开的背叛革命以来，到处屠杀成千累万的工农劳动民众，而一切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亦更穷凶极恶的加紧其削剥压迫，使中国所有劳苦民众，完全的处在惨淡哀号的痛苦之中。但是这种屠杀剥削的结果，并不能丝毫的镇压工农劳动民众革命情绪的高潮，反而使一切工农劳苦民众更明确的彻底的认识国民党是屠杀工农贫民的刽子手，豪绅地主资产阶级是工农贫民的唯一的大敌。工农劳苦民众彻底的觉悟，尤其是广东的贫苦的民众，知道只有工农民众团结自己的力量，自动手的杀尽豪绅地主，推翻反革命的国民党，彻底的解决土地，组织自己的武装势力，建设自己的政权——苏维埃，尤其是共同团结在共产党旗帜指导之下，才有解放的可能，才能获得工农民众的真正利益。

广东工农贫苦民众，经过长久的斗争，尤其久在代表工农民众的真正利益的共产党指导之下，对于中国工农革命的前途，有极明确的认识，彻底的了解，所以当国民党开始叛变之时，即首先喊出"青天白日是白色恐怖的旗帜，我们的革命旗帜是工农的镰刀斧头红色旗"的口号，而继续不断的作极英勇之斗争。

广东的海陆丰，此次的伟大而普遍的农民暴动，英勇斗争，推翻了反动势力下的统治，杀尽了豪绅地主阶级，没收了一切豪绅地主的土地财产，建设了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实开中国革命史上光荣纪载的伟大革命前途的新纪元。兹将海陆丰农民之英勇斗争与暴动之经过．简述如次。

（一）暴　动　的　准　备

海陆丰农民，并不因在反动势力严重压迫之下，而停止其斗争，尤其自四月十五以后，更无日不在积极反抗之中，如杀戳豪绅地主，破坏反动势力之一切交通行政，以至抗捐抗税等等的经常的斗争。固然这样使豪绅地主阶级更加加重了剥削和压迫，但是同时也使豪绅地主恐慌危惧。

一个重要的时机到来，真正革命者，是不肯放他空空的过去的。所谓抱住时机，是

革命者极宝贵的信条。伟大的十月革命纪念到了，尤其适在这时广东张（发奎）李（济琛）的冲突，已由暗斗而开始明争了。海陆丰的农民一面为纪念这伟大的革命纪念，同时为利用军阀冲突，亦即统治阶级崩溃的时机，遂准备和开始有计划的暴动。因为这时适当张发奎解决惠州胡谦的事件发生，很显明的是与李济琛翻脸的第一幕，驻防在海陆丰的李部陈学顺，决不能留在海陆丰以自取灭亡，同时农民的收获时期已到，豪绅地主无理性的剥削，当然引起农民的反抗，于是遂有由经常的斗争，而变为伟大的暴动之准备。当时的暴动的准备是：

一、全海陆丰所有武装农民都起来攻打反动的武力（民团保安队等）及占据城区。同时屠杀豪绅地主，并事前分别在各要道上分别截击搜捕。

二、作战步骤先区乡，后县城。海丰方面，以梅陇赤石农军占领梅陇，公平农军进据公平圩，东南五区联合大队占据青坑区进迫汕尾；陆丰方面则以西北部农军据河口及大安，东南各区农军占据金厢，围攻碣石。

三、武装军队（第四团）除留守部队外，均出而帮助农军作战，以缴反动武力的枪械，并歼灭其实力。

（二）反动军队闻风先逃

农民暴动的准备正在计划，而反动军队已闻风立即逃遁。驻海陆丰的防军陈学顺部急于十月二十九三十日两日内调集陆丰公平汕尾部队到海丰，很显然的预备退避，当时一班豪绅地主及商人见此情状恐惧万分，极力的挽留并电请李济琛下令勿予调动，同时用种种谣言以冀反动军队之停止开动以作为保护身家的工具；但是陈部终因恐惧自己的覆灭，终于不敢一息的停留，于十一月一日抱头鼠窜的由县城退梅陇而赤石而吉隆逃去，农军因特别关系，未曾将其截击缴械，实在是可惜的一回事。自陈部逃遁后，当地的保安队四百名，更形吓得屁尿直流，纷纷的乘间逃跑，其未逃跑，一部往海丰，一部往捷胜退避，以图保存实力。于此我们可以知道反动的武力之怯懦恐惧，与民众力量之足以屈服一切反动的势力了。

（三）暴 动 的 爆 发

农民革命情绪的高涨，反动统治势力的动摇和崩溃，与豪绅地主阶级之危惧，都使暴动急遽的爆发。海陆丰广大的农民贫苦群众，即于十月三十日开始英勇的斗争，而形成空前的伟大的暴动。为便于叙述起见，特分别的记述如次：

一、占领海丰之经过　　自逆军陈部于二十九日调集部队逃避，公平农军急联合第四团之一营即围攻最反动之乡广村，捕杀豪绅地主数十人，焚去逆产房屋十余间，并占领公平圩，于十一月一日长驱直进占领县城，捕杀反动派多人。同时梅陇农军亦即时分头围捕豪绅地主三四十人，当即就地枪决，大快人心。海丰东南五区联合大队于三十日晚上占领汕尾，反动派因得信较早，故多早已避去，只捕杀少数反动派。此外除捷胜外，其余海丰各处都给农军占领，并捕杀一切豪绅地主。农民贫苦群众，无不踊跃争先恐后的参加。

二、占领陆丰之经过　　陆丰方面，西北部农军三百余人，于逆军陈团未退出海丰以前，已占据了大安及河口之一部。当时河口有百余名保安队，陆丰县城亦有二百余名，与第四团之一营交战，一时未能击退，后农军冲入县城，保安队遂向碣石城溃退，于是陆丰县城遂入农军之手。

三、围攻碣石的经过　　在未占领陆丰县城以前，即决定东南各区农军集中起来占据金厢进攻甲子。所以第四团到时，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通通都到阵地上来，由领袖激昂的说了一番此次暴动的意义后，所有的农民更奋臂兴起，大声叫道“很好！”“很对！”杀气腾腾的奔向阵地，与反动势力作战，反动势力亦极力顽抗，经几次的肉搏，终将碣石占领了。

四、攻打捷城的经过　　捷城的农民于这次暴动，可以说通通的起来了。他们高呼杀尽豪绅地主，为平民复仇的口号。但因保安队的死守（因为他们无逃生的出路，所以不得不拚命的死战），所以双方支持了好久，一直至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开幕时，始决定由第四团派兵一营前往助战，决定十九日攻下捷城。当该军出发时，全体代表，军乐队及工农群众，均欢跃高呼欢送，兵士受工农之激昂慷慨的奖励欢送，竟连夜开到捷城，会同农军共同作战。十九日上午八时，遂分三面攻城，第四团派去的一营担负北门，公平梅陇捷胜的农军担负西门，东南各区农军负担东门，仅二小时，北门部队遂先登城，西门也同时爬城，捷城遂被攻下，入城后即缴械数十支，大捕豪绅以及反动派，处以死刑。同时农军即将捷城掘平。捷城既下，于是海丰全县，可说完全到农民手中，没有一个反动派了。

五、其余河口碣石各处的反动武力以及豪绅地主，亦均先后由工农贫苦民众铲除搜捕殆尽。农民伟大的暴动，虽然似乎告一段落，但是农民的英勇斗争，将更加高涨发展而未有艾的。

此次伟大的暴动，杀人更攻城，完全由工农自己为主力的斗争，第四团的武装，完全仅在协助之列，完全系工农民众自动手的斗争，而毫无军事投机的倾向，这是值得注意的。

（四）暴动后之种种

（甲）搜杀豪绅地主及肃清一切反动势力

有阶级觉悟的海陆丰的农民，有阶级斗争的经验和教训的海陆丰农民，对于豪绅地主及一切反动势力之尽性搜捕杀戮，在此次暴动中及暴动后，更加显明的表演出他们彻底的阶级性了。自海陆丰先后克复后，工人农民及一切贫苦民众，第一视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自动手的铲除一切剥削阶级的势力。他们毫无顾惜的搜捕各处的豪绅地主以及重利盘剥者。他们完全站在阶级观点上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以为好恶生杀的标准。这种情景在海丰方面，尤为加倍的彻底。所以在海陆丰境内，可以说差不多没有一个豪绅地主的踪影了。

（乙）土地农有的分配

没收豪绅地主的一切财产，没收豪绅地主的一切土地，土地给耕种的农民等等，在

八月间海陆丰第二次暴动时，已宣布得很普遍了。此次伟大而普遍的暴动，对于没收土地财产的工作，更进一步的解决。这次的没收土地，不仅仅是大中地主加以没收，即小地主甚至自耕农的土地也加以没收。没收之后完全分配给原佃农及自耕农。

当然这样的办法，对于佃农是很圆满的得到十二分的利益，同时自耕农也没有若何的损失。至对于从前依靠田租为活的寄生虫，自然不客气的叫他滚蛋了。至土地的分配，则县苏维埃政府发出土地使用证给一切得地的农民。土地使用证的内容如下：

第一注明某区某乡某人所佃耕或自耕之土地经由本政府没收，兹特给与该农耕种。

第二注明有土地使用证，才能享受土地使用权，此证不得自由买卖及抵押，如该证遗失，即须报明县政府补发。

现在海陆丰土地，都是这样的由县苏维埃政府发给农民，并极力打破农民从前以为土地是应归地主所有的错误见解，而宣传："土地是天生成的，并不是地主造出来的。地主之占有土地，完全由强夺掠占而来的。农民应坚决的以自己的力量无条件的向地主夺回土地，土地一切之使用权，收获权，享受权，均应全部归耕者的完全享受。"因此海陆丰的农民，深信阶级的彻底争斗，只有根本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

（丙）焚毁一切契约债务关系

封建社会的契约关系，是豪绅地主阶级，借此以强迫农民自己出卖自己，同时重利盘剥者的债务关系，亦同样的是豪绅地主加紧剥削一切劳苦贫民群众血汗的保障和工具。要彻底的推翻豪绅地主的凭籍，就是要根本毁灭一切契约债务关系的遗毒。海陆丰农民在这次暴动的运动中，除了尽性的杀戮豪绅地主与没收其土地财产外，其次就是很彻底的勒令交出一切田地契约债务文契，并限令于三日内送至县苏维埃政府汇齐登记当众焚毁，否则一经发觉，杀无赦，于是所有田主除已逃跑者外，莫不战战兢兢的将数百年的契约送到苏维埃政府，以求免罪。对于一切债务关系亦均消灭无遗，尤其关于所有当铺，更尽量没收，所有一切金器财物，都令持票认回，免于赎取，贫苦民众，闻之狂喜，凡当铺中所有当入的衣服器具，均于数日内认回。数千年封建社会里之剥削阶级所藉作剥削的唯一利器，此次海陆丰可谓摧毁无遗，真是快事！

（丁）组织各乡赤卫军，编练工农革命军

固然，海陆丰的伟大暴动，摧毁了海陆丰一股地主豪绅统治势力。但是豪绅地主，时时有乘机反攻的可能，尤其在整个的反动势力没有完全推倒之前，地主豪绅无时不有报复的机会和可能。所以海陆丰一克复后，东江革命委员会，为镇压反动势力之复活与巩固苏维埃政权起见，即开始招募志愿兵；先在海丰招足千名，入伍期为一年，农民可以携枪入伍，退伍后仍准带回。布告一出，应募者接踵而来，可见农民对革命委员会拥护和服从之热情。革命委员会以应募者之过多，于是遂决定各乡则组织赤卫军，为乡政府政治警戒之用，所有各乡武装农民，均编入赤卫军，轮流向乡政府服务。同时并由农军中挑选千余人，编成工农革命军，以作镇压一切反动势力及巩固政权之武力。

在叶贺溃退时，所有枪械子弹，多分散在乡村中，为防反动派收买计，所以现在分向各乡村收买，一以裕军实，一以防落入反动派的手中。迄今收集者极多。

（戊）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之成立

为求革命永久之胜利，为求工农贫苦民众政权之巩固，非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是不可能的。所以苏维埃政权之建立，是海陆丰农民暴动后最重要的职务之一。苏维埃政府之组织，全县代表人数定三百余人，农民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工人代表占百分之三十，兵士占百分之十（但汕尾市苏维埃政府则工人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农民占百分之三十，兵士占百分之十。）代表产生之方法，是由农会按照各区人数之多寡分配代表数额，由各区农民代表大会互选出来。工人则以职业种类及人数多寡分配代表数额，由会员直接选举出来。兵士是由集中驻防的农军和第四团分配代表人数，直接选举出来。海丰代表会于十八日开幕，陆丰代表会于十三日开幕，各开会三天，海丰各处农民工人以及贫苦民众在代表会开幕以前数天，都热闹异常，兴高采烈，如舞狮，歌唱，鼓乐……无处无鼓乐喧天，较之旧历新年的快乐，当更快乐得数百倍，人人喜形于色，欢呼欲狂。很明显的表现出他们以为既得土地耕种，又解脱一切债务契约的锁链，好象已至无上极乐之国一般。到开代表会的那一天，更有一番特别的情景，自会场以至各马路以及各机关，都是红灯红旗红彩照耀满目，而各马路上的清洁齐整，均由民众自动的扫除得一尘不染，诚有天下升平万民乐业的景象。会场的布置，尤为庄严，中悬马克思列宁的遗像，两旁则设军乐队及参观台，草地上铺满了席和松针，各处结满了红布的花结，到处都感觉到焕然一新的意义。

这个代表大会的意义，第一，使工农兵及一切贫苦的民众与各代表更明白的了解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意义。第二，使一切代表可以尽量的发表土地革命的意见；所以代表所说的话，就是只一句，也都把他记录下来，以作参考的材料。第三，使一切民众及代表明白此次没收土地，夺取政权，现在还不能说是胜利和永久的巩固，只有更积极的前进，更坚决的斗争，促各地农民的暴动一直到全广东全中国的工农兵起来没收土地，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才有胜利的保障，才有巩固的基础。即使反动势力的反攻，我们绝不因之而恐惧而灰心，只有英勇的斗争，只有坚固的团结，只有死命的作战，终能得到最后的胜利。第四，使民众和代表更明白只有共产党才是彻头彻尾为工农贫苦而奋斗，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领导工农民众作英勇的斗争，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工农贫苦民众的利益，一切工农贫苦民众只有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之下，才能得到永久的胜利和解除一切的锁链。

这次代表大会，除第四团兵士全体参加外，此从紫金惠来惠阳及陆丰农民，莫不踊跃来参加和庆祝，同时各地农民更能尽量的前来参与，并作热烈的庆祝。这个代表会确是中国空前的工农兵代表会，尤其空前的得到民众热烈的拥护，这是在中国革命史上，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值得纪念的光荣历史！

在代表会的次日，并召集了全县工农兵大会，是日男女老幼，空巷而来，来拥护这真正工农民众苏维埃政权，到会者达数万余人，诚空前之盛会也！

（己）工农劳苦民众拥护革命委员会之热烈

农民此次暴动，受东江革命委员之指挥，得有空前的成功，工农贫苦民众，对于东江革命委员会拥护之热烈，真不可以言语形容。在海陆丰克复后，为拥护革命委员会热

情所激动，都自动的努力筹款，不到十余日，海丰已解了二万元，陆丰亦达万元到东委去。同时为拥护工农革命的伙食起见，更成立了征收粮食委员会，每乡平均不过一担或二担，如数极微，农民在没收土地以后，对于此种征收办法，表示十二分的赞成和愿意，纷纷的争先恐后的输将，足见工农民众拥护之热烈了。

（庚）工农贫苦民众的口号

工农贫苦民众，为促起更广大民众之争斗起见，对于宣传的工作，更努力的以求普遍。宣传口号大致如下：

“杀尽土豪劣绅地主”；“没收土地”；“一切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焚烧田契”；“拥护苏维埃政权”；“扩大工农革命的组织”；“一切武装农民加入工农革命军”；“一切工农加入共产党”；“打倒残害工农的国民党”；“拥护东江革命委员会征收粮食办法”；“拥护中国共产党。”

（辛）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的社会状况

苏维埃政府成立，确定了工农民众的自己政权，一切的剥削和压迫，都已解除无余，社会状况，自然进于较良好的现象，兹将民众各方情形，述之如左：

一、工农方面：工农因得到土地取消债务，当然解除了他们铁的锁链，所以他们都是喜气洋洋的舞狮唱曲演剧以表示快乐和胜利，对于一切的工作，都很热烈的参加和拥护。

二、商人方面：除了大商人的财产为工农没收不见踪迹外，其余中小商人的营业，反更兴盛起来，这是因为农民解除了一切困苦和剥削，购买力当然的强大起来，自然很多很多的到市场来买东西了。

三、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阶级斗争的剧烈高涨，一般知识分子如教员学生等，都感觉只有彻底革命和反革命两条路可走。这次海陆丰的斗争，一方因受事实上的教训，一方因受环境的支配，一般青年知识分子，都跑到工农革命的营垒内来了。有的请求加入共产党，有的要求到农会工会中工作，他们看见这种阶级剧烈的斗争，和对豪绅地主无情的杀戮，并不见以为骇怪，反而很表同情的说：“这是应该的”。

海陆丰工农贫苦民众的斗争，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新生命，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尤其保障工农政权之永久胜利。这种阶级斗争的剧急爆发，工农贫苦民众之英勇奋发，证明了中国革命潮流之高涨。同时这种工农革命之高涨，残酷的杀戮豪绅地主，没收土地财产等，也就是红色恐怖对白色恐怖的酬答；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也就是工农政权，很快的消灭背叛革命的国民党的开始。从此青天白日旗是古董或是反革命的帜旗，而镰刀斧头红色旗帜将照耀于全球之上了。

这次东江农民大暴动后创立的苏维埃，算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的苏维埃，新的革命政权正由东江扩大至全广东，乃至全中国！

（原载《布尔塞维克》1卷8期）

一九二七年海陆丰的革命运动

（原编者按：本文原来是一本题为《海陆丰苏维埃》的小册子，出版于一九二八年三月。这次在本刊刊载时，编者在文字上作了若干删改。本文对一九二七年海陆丰的革命运动，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缺点是对当时的“左”倾机会主义，缺少应有的批判。）

（上略）

第 一 次 起 义

广州汕头的屠杀开始了，在事前固然已准备斗争，但没有料到来得那么快，因为我们简直没有接到上级的“政治通讯”，更没有接到动员或者准备动员的命令。我们接到国民党广东特别委员会的电报才知道有这一回事。因为他们还当海陆丰的农军是防军，故也有电来要农军在海陆丰“清党”。那时已经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日了。当时区委的情形，我们不知道，各县市的状况也不知道。原来区委（后改为省委）只知道蒋介石和一班反动的军事领袖在上海开秘密会议，准备对C.P.和民众施行高压政策，但也料不到如此之快与如此之残酷。区委下令各路准备起义，并指定专员到北江、西江、琼崖、潮梅和惠州去指挥，中路则由区委直接指挥。全省总起义的日期定于五月初，并派专差送信去海陆丰地委。不料国民党在十四日晚即发动大屠杀，区委一时陷于秘密状态，各路的专员除北江外，还留省没有出发。一切交通断绝，检查又极严，故此海陆丰一时得不到区委的消息，虽然区委当时已下全体紧急动员的命令。后来五华、普宁、紫金及惠州都发生了关系，区委也已找到。区委当时说是要取得东江和北江，因此要我们计划攻打惠州。各县呢，普宁已经起来，但同志却逃到海丰（并未失败），后再鼓励他们回去继续起义。五华在四月十五日以前已开始斗争，那时已经渐次失败，也嘱尽力坚持，并调驻老隆的一营军队前往援助，结果该营没有走已给人解决了。紫金决定立即动作。惠州当时只知道在平山有一营军队是同志统率的，决定即帮助平山农民（是比较好的）起来与海丰连成一片，以控制惠州。在找到区委前，因各县与区委都断绝了关系，我们自己成立了东江特别委员会以指挥各县的斗争。

四月十五日屠杀消息传到之后，因全不知道区委的政策及计划，又未明了各县的状况，更以准备还不算充分，故有缓兵之计，曾由农军大队长电广州国民党反动派拥护“清党”。这种举动自然对群众有不好影响，但确有缓兵的效力。当时我们一面和缓敌兵，同时又派队伍去攻打豪绅地主，国民党以为是彭湃同志回来做的，竟打电报给农军大队长要他“剿办”，大队长也回电说即可拿解惠州。国民党原要于四月二十三日派大兵到海陆丰的，后来竟到五月五日，听到海丰农民起事之后才派兵。

海陆丰已在积极准备了，现在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斗争？我们认定这是国民党左右派的斗争，是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的大决战。因此当时的口号是拥护武

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肃清反革命等，切合农民需要的口号可说很少，只有成立县民政府，减租、废除苛捐杂税等类比较有关系。但在海丰还不算顶需要，因苛税可自己抗纳，土地农有的口号简直是陪衬的，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实现国民党中央联席会决议案，在海丰简直是等于闹笑话，已经不是需要的了。起义是为革命，然而起义后可得到什么呢？当时就没有很清楚的回答。

现在要讲到各种准备。共产党以前差不多是公开的，此时先把党秘密起来。组织好秘密交通，另组织特委以主持此次斗争。一般的党务仍由原来的地委指挥。决定组织救党（指国民党，因为当时蒋介石等已经叛变，国民党的政治生命已经危殆，亟需挽救——编者）委员会，作为公开的指挥机关，以指挥党务、政治及军事，农军改称为工农救党军，除常备部队以外，各乡村另成立四十余名的救党军。工农救党军中四百名是可以冲锋的叫做敢死队，千余名是有枪枝可以调动作战的，其余是持粉枪或铁器（尖串梭枪）的，可以保卫乡村镇压反革命。工人方面也成立了一些武装，曾积极找寻武器，买过几千块钱子弹。原要在某地购买枪支子弹，但“交通”给该地反动政府拘捕，以后也就失败了。因为海丰农民力量是可靠的，故大家都以为即使不能向外发展帮助各地农民，也可以保守一二月，故积极准备粮食，并决定没收地主或商人的米谷，必要时更没收银号或大商店现金。发动前准备了许多传单、标语及种种色色的布告；组织宣传队；并预定告敌军兵士的小传单标语，等敌人到来时分发。起义的组织如侦察工作则完全由共产党员组织，破坏也是由特委具体的命令各处党部去做，如果各处党部健全，此种办法还比较好；运动则完全归工农救党军管理。其他如攻守问题，扰乱敌人后方及宿营地等皆曾计及，起义后的工作也有了相当办法。

各事都大致准备了，同志和群众都是很积极的，他们都很轻视反革命军队的力量（但不一定是十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如果敌人只有一二千，那是不够我们吃的”。

现在只听候发动了。当时派去找区委的同志还没有回来，各县都已接头，但除普宁之外，都未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特别是惠阳（惠州）难于动作。但是事情是不能再延迟的，不然各处的起义必定孤立而逐个为反革命镇压下去，同时可能让敌人获得时机聚集更大的力量来进攻，使起义不能发动。更加各项税收钱粮都是每月底或下月初解送省政府的，我们要取得大批款项，也须在四月底各机关把一切款项解省前动作。再，在一个月前海陆丰就准备“五一”节举行热烈的庆祝大会，公开的宣传共产主义，介绍党员，广州汕头屠杀消息传到之后，我们还是准备进行，于是就决定五一节（即四月三十日夜间）发动。准备动员的命令早已下了（准备动员令只是说即须发动），动员命令则计算在发动前极短时间才发，县城有在发动前二小时才给命令的。这是为秘密起见，同时，如果发动命令下得太早，那么他们有时间去商量考虑，一定会感觉到有许多困难，生出许多问题，结果会有若干临阵退缩的，对起义的群众会发生不好的影响。

第二天——五一节——早上群众持着武器，络绎不绝的赶赴庆祝大会。群众都非常高兴，海丰县城到会人数是历次大会所仅见的，因为海丰已是工农群众的了。原来我们早上两点钟的时候（四月三十日夜）已把所有的游击队、警察、盐警队等枪枝缴清了，所有的官吏都扣留了。其实当时没有许多反动武装，故没有什么战斗。

斗争已经开始，更激烈的斗争即将到来，当时的任务是在起义的继续和扩大。具体来说是建立并巩固革命的政权，并且准备更大的实力联合各县向外发展或抵抗反革命军

队。具体的问题是：

政权问题 我们的口号是建立县人民政府。当时由民众及国民党党部先成立救党委员会，以指挥一切。国民党党部则取消国民党反动派圈定的名单，恢复以前的执行委员会。县政府则由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接收，并即筹备县民大会。各区则成立区自治委员会。自然这些政府都是农民工人组织的。政府的责任是肃清反革命，并切实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一切的苛捐杂税都取消了，我们取消苛捐杂税是不经详细讨论，不管于收入有无妨碍的。

对反革命问题 被扣留的反革命的官吏大部分都枪决了，在乡村所捉到的重要的反革命分子，都由农民立刻枪决。救党委员会成立革命裁判委员会以镇压反革命，但因允许各处自己处决反革命分子的缘故，未曾裁判过一个反革命分子。继续派农军去帮助惠来的农民并攻打葵潭的豪绅地主和陆丰黄塘等反动乡村。

对东江潮梅各县工作 东江潮梅各县的农民还是不断的起义，但没有统一的指挥。我们自己成立的东江特委，也不敢如何行使职权。公开指挥的名义和机关，党也未曾顾及。于是由海陆丰国民党县党部发起，在海丰召集东江潮梅各县市国民党党部联席会议，要产生东江潮梅的救党委员会指挥起义，并且成立东江潮梅救党军总指挥部，当时计算可派代表的县市有惠阳、紫金、海丰、陆丰、五华、普宁、潮阳、惠来、汕头等。后来汕头、惠阳、紫金、潮阳等县的代表到了，但敌军已来，普宁又已失败，会议未能举行。

向外发展问题 我们进行统一东江潮梅各县起义的指挥，也就是要使海陆丰的起义能够发展。向外发展，是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当时普宁还在继续起义；潮阳也有斗争；汕头非常空虚，潮汕同志天天盼望海丰农军前往帮助，以为有海丰农军一面旗帜，潮汕各县农民即可全部起来斗争；紫金四日（五月）已占据了县城；惠阳我们也予以物质上很大的帮助。从这种情况看起来，起义的胜利是有把握的，但必须向潮汕去，因为汕头是潮梅的政治中心，影响较大，各县农民力量也好，惠州是个险要的军事中心，农民力量又小，难得手。然而区委的命令到了，区委说我党要取得东江和北江……要海陆丰计划取得惠州。当时区委以为：坐镇韶州的陈嘉佑还有一师人；北江农民自卫军又已集中了二千人，而且枪械犀利，颇有作战能力；粤汉铁路工人仍然有一部分力量。惠州方面农民因为淡水、三多祝各次惨案，国民党反动派均袒护民团，如火的情绪随时都可爆发，而且胡谦部下有三个营长是同志。同时广州反动的军阀尚竭力自保，不敢向外发展，广州市工人又正待时而动，黄埔学生和入伍生尚未完全解除武装。如果北江东江得手，广州革命的工人和黄埔学生马上可以内应，恢复整个的广东，并非不可能。所以有这个命令。可是北江的陈嘉佑接到谭延闿的电，着退守彬州，这部分遂于五月三日不战而退湖南，农军也跟着退去。惠州农民虽可用，而去指导的同志不负责任，误事不少。在军队内做工作的同志，也因为交通断绝，不知消息，或因畏怯，弃职跑了，或者莫明其妙的顺从着他们的叛逆的长官。广州军事上的助力——黄埔学生又被敌人以全力解决了。海丰的同志以为惠州农民总有相当力量，农民能够起来，海陆丰加以多少帮助，得到惠州自然不是空想的（自然当时的军官都说做不到），所以我们的面孔天天向着惠州，天天的想着如何解决胡谦的军队（一师，共四团）。当我们调查平山确有我们同志的一营人驻扎，决定了要他们立即发动帮助平山各处农民起义，如有可能再计划攻打惠州，或

向普宁进展。另外，命令驻老隆的同志率领的一营往五华帮助该处农民起义，使潮汕敌军不能向海陆丰压迫，更不能与惠州胡谦联络。但平山老隆的营长都是不争气的。老隆的，我们找不着（后来知道被人解决了），平山的因为胡谦要调该营回惠州，就惊怕而只身逃到海丰。我们此时已会着几个惠州工作的同志，知道平山各处的农民起义是无把握的，于是决计放弃惠州，甚至于放弃海陆丰，把海陆丰完全交给农民，而将重要武装调到普宁去发展。可是六日决定这个新计划，限七日出发普宁，而七日已得报告胡谦的大军到了。计划又要重新审定了。

这是起义后的情形。

起义后工作很明显的有以下的缺点：第一，是对土地问题观念太模糊，没有领导农民起来分配土地。说建设县人民政府呢，海陆丰政权早已是农会支配的；消灭右派救国民党呢，简直不关农民的事；废除苛捐杂税、减租……都已不是需要的了。虽然农民很激烈的起来斗争，但不知起义后可得到什么，故未完全起来，或坚决的继续下去。第二，是对反革命镇压得不够。第三，财政也未能积极地去筹措，农军失败退出的时候，钱也就完了，党也没有准备若干费用。

第 一 次 挫 折

五月七日得到惠州军队来攻的报告。到潮汕去的计划不得不改变，因为敌军已经到来了，放弃海陆丰（虽然只把一些武装调走）而任逆军摧残的计划，农民及农军都是反对的，于是决守海陆丰。在分水凹（惠州到海陆丰要道）已设备防御工事。该地形势非常险要，我们有三百的常备队伍（内有百五十人是经过三个月训练的干部学生），有许多各处临时组织的农民，且有一尊大炮。我们以为准备充分，可以守此险要了。敌人的军队来了，惠州来的是胡谦最得力的一团（孙文主义学会的），后来汕头又派了两团人来夹攻。五月九日早上敌人开始向农军攻击，然分水凹形势险要，敌军完全不能展开，几次冲锋，都给我方大炮轰退。敌人都说农民不怕死，城乡的农民及同志都以为可以缴敌人的枪了，当时的形势是胜利的。可是，命令农军早上七时去包抄敌人，他们到十二时才到，而大炮后来又打不响了（原来我们是得不到好的大炮呀），农军子弹又少，结果给敌军攻下了。分水凹离海丰县城仅三十里，下午三时敌军已入城了。

敌军入城之后，十分惊慌。先锋下午入城，是晚大队到了只在城外驻札。农民方面，参加战斗的一部分比较恐慌，而大部分农民及乡村农军仍然是非常骄傲，说农军不中用，千余敌军都不能抵抗，而愿与敌拚一死活。敌人进海丰数天，只占据县城及汕尾市，农军则退乡村。敌人对付农民的办法，是以大军集中海丰县城，另别出大队到一个区乡去，农民如不能守或因战术上退出某乡村，那么，敌人便随便焚烧几所房子，随便捉拿十个或二三十个农民，并随便枪决几个。敌军到那一个乡区是没有一定的，他们不一定“肃清”（实际是没法“肃清”的）一个乡村之后才到别的乡村，因而有武装的农民常无法很快的集中去援助被敌军扰乱的乡村。我们看到这种情形——敌军恐慌，反动政权未曾建立；农民大部分是坚强的，一部分将因敌军残酷的“肃清”而畏缩，更促成围攻县城的决心（因乡村都是我们的）。此外，因海丰的乡村反动势力是很少的，当然更使农民群众向着县城的敌人。

事前我们曾经计划如何去骚扰敌人的军队。我们要在晚上——特别是敌军初到的一晚，各处放火（不管是何人的房子或草堆）、鸣锣、击鼓、吹角、呐喊、放冷枪、烧地炮，使敌人惊乱而起来缴枪。在敌人经过的地方，四围埋伏截击。派农民去当敌人挑夫，中途或一听见枪声便即行逃走，使敌人行军不得自由如意。但未曾经大斗争的党部及同志是不很可靠的，一切的骚扰破坏工作，多未能切实执行，经过很久准备组织好了的交通及侦察，一时会接不着头，所以敌军攻进海丰的第一天不能反攻。十号敌人追击退公平的常备农军及梅陇（农民发动得顶好的一区）农军，县城很是空虚，决即以其他各区农军（不管是有枪或持铁器的农民）攻城，结果因准备不及，没有发动。敌军则日间进攻各乡区的农军，晚间又回城集中以防农军黑夜袭营。于是再决定十三日（都是早上两，三点钟）进攻，重新定了口令符号，并在附近高山及城内放火为号，使各处一齐进攻。但是因主力部队退到河田，未能赶回，到时虽有一千余农民参加，也不敢进攻，因为他们太过重视常备的农军，同时也是实力太少——没有好枪，子弹很少，大部分是粉枪和铁器。可是敌人还是非常恐慌的，几天来进攻各处都未得手，海丰反动派又很小心未敢出来活动。农民呢，虽然说我们不中用，然而革命情绪还是非常之好；不久常备农军转回新田了，于是又决定于十六号（十五号晚）第三次反攻。敌人到海丰已一星期，但对各乡区仍然全没有得手。当晚农民非常踊跃，各区乡到的武装农民有三四千人。晚上二时山上火起了，枪声响了，各处农民皆知道主力军到了（原指定主力军应先开枪），高呼着冲锋前进（农民多持铁器或有枪而子弹很少，故常常一接触即要冲锋），可是不一刻而枪声忽止，农民又犹豫不前，退到原来阵地，直到天明一部分收队回去，一些给敌军赶散。原来常备农军固然与我们联络得很好，准备十六日早（即十五日下半夜）一同反攻海丰县城，但十五日听说海丰敌人兵力不弱，忽然不依计划派队攻城，是晚才送信来请改变计划，同时又派小队——二十人去放枪，弄得农民个个以为主力军来了。这次没有冒险进攻是可惜的，因为敌人来了一星期全无办法，农民还占据了所有的乡区，扬言反攻，他们都准备走了，长官预备了便装，准备于失败时逃走。十三日的事情他们是料到的，故他们那几天特别的恐慌，假如我们冒险进攻，这次攻打县城不能说是投机的。

三次反攻不成，于党及民众都有很坏的影响。敌人也知道了武装农民之散漫，实力之弱薄。自从积极准备起义以至现在二十五天中，党是勇往直前、全无畏缩或有失败的观念，到了此时党需要慎重考虑：现在怎样消灭敌人呢？当时的情形，只能在乡村做工作。要反攻而至消灭敌人必须农民力量增加并整理武装，或有外面力量的帮助及敌人方面暴露弱点使我们有机可乘。我们再看各县的情形。五华还是停顿着没有发展；潮阳、普宁已经失败；紫金也不能保守县城及重要的区乡，退到炮仔圩；惠阳平山只有一时很小的骚动。那时知道惠州军队里面有三个营长七个连长是同志，我们无法知道他们是怎样的党员，且不知道是何部属。除开两个营长离部队之外，另一个营长李某已经公开压迫农民，去信不生效力。这些武装都未利用以帮助起义，惠州已经没有希望了。

“现在怎样消灭敌人呢？”这是我们时刻想着的问题。潮阳、普宁失败了，二百潮阳农军到了陆丰，明知其是败兵，但我们以为总可壮壮农民的胆子更勇敢来参加攻城，于是又想作一举而消灭敌人之计。但是二百的潮阳农军沿途已经散了一半有余，海陆丰的农军更是败兵不能再战，攻城已经完全不可能的了。各处的乡村还是农民占有的，但汕头国民党已增加两团兵到海陆丰，要积极扑灭海陆丰及潮阳农军。五华当时虽然失败

了，但实力仍存，敌军只有宋世科的两连人。于是决定五月二十一日把农军拖到五华去发展，然而因大队敌军尾追及沿途反动武装的截击，无法在五华活动而退到江西湖南去。军事上我们是暂时失败了。

失败以后，跟着就是严重的摧残。海陆丰的反动派渐渐的回来了，从前不敢活动的现在也渐渐出来了。工农会改组委员也出现了。保安队民团也渐渐成立了。逆军当时唯一的事情就是"清乡"，所有的乡村都经过搜查，所有的农会工作的人都要拘捕或枪决。我们对敌斗争已经完全是采取守势。当时的工作是：

斗争问题 农军在仍能够保守的乡村中，公开的筹饷并镇压反革命，敌军来则与抵抗，败则退守或暂时解散。将常备农军退出海陆丰的时候留下的几个军官加派到乡间组织训练农军，除开能公开的以外，各处也秘密组织和训练，这对以后的起义作了很好的准备。救党会、救党军、工农会更发出紧急宣言，号召人民不要替反动军政、税收机关官员、税捐承商、敌军的团丁队兵、宣传员、侦探以及反动机关团体做任何工作。违抗者一经查出，一律严惩。此外，破坏交通的工作是经常的做，电报几个月来是没有通过的。此时的任务是使反革命政权不能巩固。

关于党 党内不坚决的分子，此时就开始表现出动摇态度，有些是逃走了(少数)，有些是走了又回来，没有走的而党的工作也做得很少。当时党的重要的工作是维持党员斗争的决心和勇气。为此，发出了宣传大纲，说明此次斗争的意义，说明现在并没有失败，并指示如何继续争斗。重新审查各级党部负责人，整顿秘密机关及交通等。所有重要的负责同志都特别找到谈话，告以当时的工作。

工农会 海陆丰的工人和农民是没有人能领导的，除了他是勇敢忠实的共产党员。反动派虽有改组委员，但并未做一点工作。他们的宣传员到乡村宣传，对农民说：从前农民要缴会费给共产党吃，又要开会。现在呢，不要缴会费也不要开会，农会还能存在，也还能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农民的回答说：从前要缴会费，现在就要缴民团保安队费。开会，这是我们愿意的。宣传员觉得不行了，到了第二个乡村，就改了口气说：农民兄弟真是辛苦……。农民反回答说："是呀！你们地主资本家才安逸呀！"（以上是梅陇农民的话）工会、农会仍秘密存在，特别指定了负责人，六月初海丰还开过一次全县各工会代表会。对改组委员开始就打算以激烈手段对付，但各乡区他们都不敢去，县里也全没有活动。原来也决定派人参加反动的改组委员会，因为同志及工农群众都不愿意，同时改组会又没有活动，这个决定就没有实行。工人农民对自己的工会、农会是很拥护的。这时，工农会也时常发布命令、布告、宣言，以指挥群众。这比专门由党员个人去活动好。

抗 租 运 动

经过敌军严重摧残之后，表面上似乎农民已经给反革命镇压下去。其实不然。乡村中或者完全是农民的(如赤石区)，或者农民占大部分的势力（陆丰之新田区，海丰之公平梅陇等区）。农军出没无常，敌军无法应付。敌人无法征收捐税。敌军也用些欺骗手段以抗捐诱农民群众，每次"清乡"都有农旗在前，假冒农军或者表示拥护农民利益。他们很注意宣传国民党中央联席会议的减租案，然而农民不但不欢迎，反而害怕这个决

议案之实行，因为实行减租百分之二十五的决议，结果就是要海陆丰农民加租。而且有些地方的国民党还要农民出钱去领减租证，有些地方宣布农民所减的租百分之二十五要以若干归民团及保安队，若干归政府。农民因切身利害的关系又起来了。

我们很坚决的进行抗租运动，同时宣传（只是宣传）土地农有。在五月底到六月中旬海陆丰民众是完全取守势的，敌人兵力最初有三团人，并且成立了六七百人的保安队及民团，农民一时无法起来，我们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发动群众。现在全海陆丰敌人的军队及团队不过千二三百人，又有了抗租运动做号召，发动群众比较容易。此时更感觉到以前的斗争，意义总不很明了，农民也不知道起义后可得到什么，于是土地就是要解决的问题了。当时区委土地农有的口号也寄到了，于是就觉得抗租虽然无法全部实现，也可以极力宣传土地问题，土地农有的口号能喊得普遍，就是抗租的胜利。

部分党员以及农民群众最初是不同意抗租的：一种以为现在的情形，减租尚且无法做到，何况不交租，而且如果如此做法，将引起更大的屠杀。据他们的意见，是以为必须有外力帮助，消灭敌人才能讲到别的问题。另一种意见以为不应抗租，而要立刻大起义——攻县城，赶走敌人，那么，什么事都可以办。要冒险拚个死活，胜呢，似乎可以保持永久的胜利，败呢，也好另寻出路。当然这两种意见都是不对的，我们还是坚决抗租，我们要引起斗争，但不希望很快的得到县城；我们要宣传土地农有，不希望能够完全做到不交租。

抗租的办法，在可能时公开的不交租，采取强硬或柔软手段以对收租人或地主，狙击收租人使不敢向农民要租，武装没收输送之租谷，暗中割地主的田禾，并枪杀恶劣地主。各区乡农会都开会动员群众，农会发表宣言及布告，并由农会自己决定教育不坚决抗租农民的办法，对帮助抗租的农军，抽收所没收的租谷以作粮食。结果，海丰之梅陇、赤石、公平之大部分及陆丰新田之一部，完全没有交租；农民对帮助抗租之农军（如公平）争先挑新谷送他们作食粮；对不坚决抗租的农民进行了必要的工作。在那些地方，地主简直不敢动。梅陇自六月中旬决定抗租之后，即筹足了粮食，准备长期斗争。七月十号一次大战之后，农军与豪绅地主即不断的争斗。自七月到九月的两个月中，敌军几次给埋伏各乡村山间的农军农民打得落花流水，兵士以至军官皆觉得无法，无心再战。到九月初第二次克复海陆丰，敌军即狼狈退出。公平农民在七月抗租期间，经过杨梅、水岩石（皆惠阳属，但农民运动及党皆是海丰领导的）的斗争，占据了高潭（惠阳属），恢复农会及农军，打败了黄虎（距公平区圩场二十余里）的民团，也曾恢复农会。农民帮助农军作战，输送粮食非常踊跃。陆丰西北之大安及东南湖东金厢等区，七月中（二十一、二十三等日）农军攻打警察民团，缴得枪枝十余杆，杀反动派数人。海丰之汕尾等区都开过各区乡农会会议报告抗租运动，虽没有做到抗租或武装斗争，但农民受了很大的影响，敌人也更在恐慌之中。第一、第九区农民更自动集合，有枪农民去袭击九区警署。这是抗租运动中的剧烈斗争。

形势完全不同了，完全退守的形势，一变而为完全进攻的形势。起义是可以继续、可以扩大的。于此可以得个结论：民众的起义不是一个命令可以起来，“肃清反革命”之类纯粹政治的口号也是不能鼓起群众来的，只有群众切身的需要、经济的要求可以发动群众斗争。再则，农村的斗争，不能即刻希望夺取县城。夺取县城的失败，将引起群众更大的灰心与失望。只有把乡村的群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才可以牵制敌人，战胜敌人，

并最后夺取县城。抗租运动的时候，攻打县城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领导农民在乡村进行武装斗争。这个斗争延长到两个多月之久，卒至完全恢复海陆丰两县。最后就是党的领导必须是十分坚决。抗租命令初下的时候，大部分负责同志都十分怀疑，以为是空想，不合实际，然而结果呢，可以说完全胜利。只有坚决的党可以领导群众，党的坚决的领导是起义胜利的保障。

第 二 次 起 义

抗租运动以后，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而且日益扩大。四月事变之后，我们推想武汉必先出兵讨伐蒋介石，因为这在政治上比北伐有更大的影响。而且广东民众有伟大的力量，有一师兵力即可以给群众很大的帮助。克复河南之后，复以为所谓南北革命势力联合后，更可专力对付南京、广东的反革命分子。后来听到湖南的消息，加以东征南讨全无踪影，我们已知道有问题了(党的情形，乡村里一点不知道，都是推测幻想)。八月中旬得到南昌起义军回师广东的消息，我们不相信有多少兵力能到广东，但却以为叶、贺残部能够到广东来，也增加农民的力量。秋收起义计划也收到了，省委改组和执行秋收起义计划也来了，海陆丰各县的党和党员都兴奋起来。几个月来最苦的就是党没有整个的计划，党员群众只知道要破坏反革命政府的稳定，要打倒什么，要继续起义，而不知道是以暴动手段达到没收分配土地与推翻整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以为我们只是零碎的斗争和牺牲——没有正确的出路。因此，党部及党员群众，一部分是消极而不斗争，一部分因为不知道党整个的政策，不明白正确的出路，斗争也是乱动。海陆丰有这种情形，接近海陆丰的各县尤其是如此。接到秋收起义和省委的起义大纲之后，因党有坚决的政策及全盘的计划，党员也仍然勇敢坚决去领导斗争。我们万分相信海陆丰民众是能以自己的力量收复海陆丰，不过怕各县不能一齐动作，使敌人能以全力来压迫。但这也不过是暂时的，海陆丰党及农民的力量是消灭不了的。

梅陇、公平及新田各处农民仍然继续斗争，其他乡区农民也渐渐起来了。敌军还在不断的进攻乡村，但全未得手，而且处处都遭受打击，兵士都不愿再战，加以积欠军饷四个月，军心更是动摇。团丁队兵因各处农民纷纷起义，都个个准备逃走。敌人武装约千二百至千五百人，农民武装则不及此数，枪枝很坏，子弹因经过数月的斗争没法补充，至多不过十颗。但敌人是非常恐慌的，敌人在七、八月间几无日不向广州汕头各处告急，但全无援兵开来，故无日不恐慌。这是九月初了，我们决定以全力驱逐或者歼灭海陆丰的反革命武装。集数月的经验，深知不是一发动就可以驱逐或消灭敌人的，占据所有的城市和乡村，而是要各处一齐发动，使不愿作战的敌人的军队及恐慌的民团保安队应付不来，分散兵力，以至军心动摇，然后再集合我们力量来消灭他们。我们决定：还在斗争的乡村继续并且扩大斗争，未起来的不计力量的大小，不计牺牲或胜利（局部的）一齐起来，进一步则进攻势力比较弱的陆丰敌人，同时在青坑各处发动起义以牵制汕尾敌军并使不能救援陆丰，至最后才进攻重要的地方——汕尾及海丰县城。计划决定了，各处都很积极的进行准备。叶、贺的消息呢，本来应该可以到东江了的，但此时反全无消息，但对群众及党的方面，并没有什么大影响。敌人听到农军攻城的消息更加恐慌，派人到广州请求增兵；一些反动派雇定了船只准备逃走，军队则看见山上采薪的农民就要

集中准备，城里搜查非常之严。梅陇公平各处的农民都获得一些胜利，陆丰西北部也起来了。七日陆丰农民攻克大安，缴了敌人十多根枪，八日更乘胜直取陆丰县城，虽然没有缴到枪械，但敌人却认识了农民的力量，而群众的勇气也提高了。海丰的青坑也在八日克复了，梅陇又于九日把敌军团队驱逐。公平驻兵（一连）投降了，汕尾也于同时入农军及工人纠察队之手。此时海陆丰除开海丰城以外皆克复了。敌人武装约千二百人皆集中海丰县城，固守待援（因计算日期他们的援兵就可到达），但恐慌的状况比前更甚百倍。晚上城内及山顶到处火起，炸炮及冷枪时有所闻，敌军连夜都不敢睡觉，疲劳万分。我们断绝敌人一切粮食，准备集合所有的力量以攻海丰城。十日梅陇农军乘胜迫近县城，因各处不能齐集，未能进攻。十三日因梅陇农军未及赶到，致公平农民到来，集合附城工人及农民进攻又未成。然而敌人经这几次的骚扰，早已决定逃走了。我们又决定于十六日晨（十五号晚）再次攻城，各处武装骚扰工作，截杀反革命的布置皆妥当了。是日梅陇赤石的农军曾两次冲入城内，毙敌军二人，缴枪两枝，但因子弹已经用尽（没有一颗）各路不能一致而退出。公平的农军也冲入城内，毙敌一人，因梅赤农军已退，其余又未到来，而不敢深入退回原防。陆丰农军虽也占据了附近要地，但为时已晚，各路皆已收队了。经过这一次的进攻，农民没有一弹而能冲锋作战不怕死的精神，使敌人谈虎色变。第二晚（十六晚）敌军竟全部逃走了。路上农民进行截击，但未得到枪械，这是收复海陆丰的经过。

海陆丰又克复了，叶、贺还是没有消息，各县又没有起来，海陆丰是非常孤立的。克复海陆丰城的第二天，就搜到广州反动派增援的信，说是决派一团人到海陆丰（比前增加两营），计算日期十八、九日就可到达。因为这种关系，党的政策就是积极筹备增加武装等工作，土地问题因没有方法，结果只空有其名。这时的重大问题，再分述如次：

政权问题 政权的性质已比前次进步了。前次是所谓县人民政府，这一回是工农的独裁。各区乡农会宣布接收区乡政权，两县则由各团体产生临时政府。本来计划即召集大规模的代表大会，因时间过促没有实现。政府唯一的任务是肃清反革命，县革命政府成立了革命裁判委员会，区乡政府委员会，差不多全付精神去对付反革命。

对付反革命问题 历次斗争的经验使党及群众深切知道，对反革命不能有丝毫姑息。很多反革命分子被处决了，反动派的巢穴全都焚烧了，因为这是群众要求的。焚烧反革命分子的屋宇的时候，农民特别踊跃，数千群众争先恐后的前往，而且把墙基都掘去了。

土地问题 我们主观上是很坚决的，要马上没收土地并马上分配起来，并将没收分配的情形时时宣传，以引起农民群众的注意——发动群众；故临时县革命政府一成立即宣布没收土地，交县农会去分配给无地农民。可是没有一点切实的办法，农民虽然听到了，仍然得不到土地。同志呢，有些人以为这是困难的问题，要研究清楚才能分配土地，有些人以为怕分配土地时发生纠纷，因而反对即时没收土地，自然这是更错误了。

财政问题 对财政问题，也有了一个经验，就是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我们除开没收反革命财产之外，对所有的商人或富户都酌派军饷，因此，财政是筹得很充裕的。反动派的织布厂也没收了，布匹则运到农村里去。后来因要筹备自己的并断绝敌人再次到海陆丰的粮食起见，把地主的谷米都没收了，再，我们为要使敌人再进来的时候“秩序纷乱”，而利于我们的进攻起见，控制了商人的火水（洋油），火水商人也暂时扣留（自

然是优待）要他们暂时不做生意。

扩充武装问题 这是当时很注意的问题。原来预备扩充武装，但没有想到办法。要从现有乡村武装农民中挑选数百名训练作为常备军，也没有做得好。想利用些土匪，结果花了一些钱，没有得到一点好处（人还看不见）。

宣传问题 我们公开作一切的宣传，开过了好些武装大会，要学生c.p.全体动员宣传。但因当时国民党的政权比较稳固，叶、贺全无消息，各县也无动静，海陆丰实力又不充足，同志还有不少害怕的心理。有些人看见我们严厉地对付反革命，生怕将来反革命这样去对付他，因而不敢积极工作。故宣传除开几个重要地方以外，很不普遍。

关于党的方面 决定改组各级党部，吸收一切勇敢坚决的农民入党。但因斗争的紧张时期，同志都喜欢去打仗、捉人，内部工作终不免忽略，党的工作还是做得很少的。

这时期最重要的缺点就是对土地问题无切实办法，因此，关于切实的工作及继续斗争的准备，只限于镇压反革命分子和筹钱及整理武装，未能发动广大的群众起来争夺土地。不过镇压反革命分子方面还有相当成绩，好些地方（如公平、梅陇的反革命分子）差不多已肃清了。

第二次挫折

克复海丰之第二天就搜查到反革命的信，知道反革命的大军即将到来。我们早决定如敌军再来，必定增加兵力，农军大部分没有一颗子弹，对仗是不可能的，因此决定退出海丰县城，把所有武装调到乡村去肃清反革命，主要部队则调公平出河田，陆丰县城的部队则去肃清东南部的反革命。在敌人重新进来的第一晚则必须乘其不备反攻一次。九月二十五日敌军到了海丰，我们依所定计划进行。但农民及农军是只能前进不可退却的，经此一退却，群众及农军的勇气自然有多少影响，所定计划大部分不能实现。当时的情形，是要过一相当时期使农民勇气恢复之后，或有外力相助——叶、贺军队到来之时，才可以大举向敌人进攻。至于在乡村里面，因没有土地革命的切实办法，工作也不外比从前更严厉地对付反革命分子、对农军加以训练等类罢了。

敌军来了之后，不敢向我们进攻一次。因我们把反动派的巢穴都烧了，米谷及火水也没收了，敌人的粮食及住宿都成问题(梅陇是一例)，自然又增加不少的恐慌。他们的地盘只有两县城及汕尾市，各区乡完全是我们的或者大部分是我们的势力。当时只差新败的农民（实际不是败，不过一退就不易收拾），一时不能鼓其勇气反攻，不然虽敌方增加许多兵力（陈学顺全团，另保安队等约六百人），也即时可以解决的。敌方以几个月的经验也知道进攻乡村是没有效果的，故此来大施其欺骗手段，如假造农旗及农团制服，大喊拥护工农利益，不摧残农民只杀共产党首要等等。可是群众早已认识敌人了，群众是没有受到什么坏的影响的。

这时候我们虽然不能立刻向敌人反攻，敌人也不敢向农民进攻。我们占据所有的乡村，时常派农军去骚扰敌人阵地，故农民勇气还是十分好。叶、贺入潮汕的消息到了，对海陆丰自然又有多少影响，农民又跃跃欲动了。

叶、贺军队入粤与失败

最先我们不依靠叶、贺军队，以自己的力量收复了海陆丰。第二次挫折之后，同志及农民群众不免有叶、贺军队来时，我们必能重整旗鼓的想法。自然这也不是完全坏的。海丰（以至陆丰）的党员及群众是知道自己的力量了，他们都相信他们自己能够解决海陆丰的问题，但叶、贺军队能给反革命一个打击，影响各县农民起来斗争，于海陆丰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是我们对叶、贺军队的最大希望。叶、贺军队入潮汕之后，即集中全力于揭阳进攻兴宁。我们知道了叶、贺的实力，知道敌方的情形，又知道各县农民的状况（普宁事件等）。我们相信无论如何困难总不至于完全失败。这是一个机会，必须我们各地努力，才能打破困难，胜利才有保障。因此我们决定，无论力量之大小，无论将会牺牲到怎样的程度，都要全部起来，给海陆丰敌人以重大打击，以响应前方战事。于是又有十月五日进攻陆丰城之举（陆丰当时只一县城是敌人的）。

叶、贺军队曾派员到海陆丰招兵，我们知道这是于胜败有很大的关系，于是全力帮助，决招足三千人（他们原定二千人）。因他们没有带招兵的款项，也筹备一万元借给他们作招兵之用。招兵专员二日下午到海丰，四日早上一天之内已招到新兵七百人之多，于此可见农民群众的情绪热烈和同志工作的积极。可是这批农民群众出发的时候，前方已经失败了，他们除领几元安家费之外，只领到路上每天四角钱的伙食，途中的困难是不待说了。

我们还是继续招兵，同时坚决的指挥各处一齐向敌人进攻。可是原定五日进攻陆丰县的计划未能实现，而二十军已失败退到陆丰。流沙之役失败后，叶、贺部队及革命委员会的军官职员，同志或非同志纷纷逃到海陆丰。在二十军里面工作同志也大部分离开大队，计划如何去找省委，原来二十军第一师的叛徒到陆丰之后已向海陆丰敌军团长接洽投降，故许多同志都离开此叛军，另找出路。

在叶、贺军队克复潮汕消息传到之后，我们（东江特委）即已计划各县如何动作，特别在海陆丰要各处截击败敌毋使漏网。二十军到后，群众皆十分高兴的起来到处截拿败军。结果有百余人在青坑捷胜等处被捕获，一切衣物金银通通给农民缴了，而且给农民很厉害的打了一场。他们被打不过，乃直认是叶、贺部属，或认是共产党。农民愕然说："呵！原来是同志！"于是他们又受到很好的招待。

据二十军脱离出来的同志说，二十军的叛徒很久以来就阴谋叛变，汤坑之役就开始显露其反动原形，常常发出反动言论。到陆丰之后即借口伙食无着，总指挥不知下落为词而投降。接洽投降之时，很公开的说要捉些农会代表和共产党员来枪决。我们初决定以革命空气去包围该师，发动民众开大会欢迎，或派代表去接头，负担他们伙食等。知道这种情形之后，没有进行。这时我们决定解决二十军的办法：用二十军出来的同志分头活动，联络可以指挥的部队即日发动；如不能指挥的部队则运动士兵逃跑；农军亦向该军攻击；钱是有的，人也分配好，依当时的情形是很有把握的。农民对叛军非常仇视，叛军百余兵到汕尾接洽投降，经青坑时曾给农军截击一场。但是计划正在进行时，二十军给敌军陈济棠、徐景唐、黄旭初等部赶来先解决了。

二十军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汕头失败消息和退守海陆丰的计划，此时又知道流沙

之役失败的情况，于是派人分六路去找革命委员会，并请他们依原定计划到海陆丰来。这时二十四师的残部也已到了。叶、贺部队已完全失败了。

次日二十四师残部到了陆丰东南部。那时后有追兵（离二十里）前有叛军（在陆丰城），河田一带（陆丰西北部）有黄绍雄部二千余人，海丰县城有陈学顺的一团人。民众及同志方面因二十军的叛变，对叶、贺革命军完全失望了，以为二十四师也是反革命的，故他们到来之后，力量素来薄弱之陆丰东南部农民更加一个都看不见。后来与党接到了头，知道是可靠的残部，方把该部千三四百人经陆丰附城大安新田，越过敌人几处防地而到农军的防地赤石溪。当时我们即发紧急命令，要各处立即扩大起义，并赶紧招兵补充兵额。二十四师战士们的军衣已破烂了，军毡、雨笠、草鞋几乎全部没有，天复下雨而且冷若严冬，加以战败之兵睡眠不足，给养缺乏，致精神异常疲乏。当时的情形重要的是维持军心，暂时避免作战。农民对他们仍然是很好。他们到来之第二天，附近各乡农民纷纷派出代表来慰劳，并挑许多花生、萝卜、猪……去慰劳他们，一天之内集中五百担谷（没收的及农民抽出来的）以作粮食。我们立即筹款替他们发饷、发雨笠、草鞋、面巾等，将以前没收的布匹给他们做军服。他们病的伤的数百人，我们也给他们请了医生和准备了药品。这样一来，军心也渐渐安定了。我们以东江革命委员会去指挥他们。我们明白的对他们说：东江革命委员会是东江的工农组织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他们对东江革命委员会有了不少的信仰。我们唯一的责任就是维持并整顿这一部分的武装，我们尽力替他们解释，并告诉我们的出路。农村中增加了这一大批的武装，在我们看来是了不起的。党员及群众都以为海陆丰农民能够以自己的力量两次夺取了海陆丰，现在当然更可以扩大起义。我们不应当希望马上得到惠州和广州，我们可到乡村间去肃清豪绅地主。经过几天的休息整理，经过了一番的宣传，军中的党部也成立起来了，一切的怨恨怀疑和幻想也减少了。我们为铲除豪绅地主，为要建立一个形势险要的根据地，为要解决目前的粮食，于十日（十月）进攻南岭（紫金的大乡村）。南岭与海陆丰相连，海陆丰，紫金、惠阳那一带的田地都是南岭的地主的。该处交通不便，谷米不易销售，故有五十年的陈谷。该处形势非常险要，地主都有坚固的炮楼，有许多枪枝。我们部队（二十四师及农军）到了之后，该地农民也起来了，地主据楼抵抗，激战一日未能得手，但兵士的勇气是很好的，对此豪绅地主都有灭此朝食之概，这部武装在农村中是有作用的。

南岭没有打下，正在计划到紫金的龙窝区或者到紫金城。适海陆丰敌人因农民骚扰他们，又因移防恐农军乘机重占县城，要向农民先示威，于二十一日进攻农军防地黄羌（公平区离敌人防地有二十余里），农军及二十四师之一排皆非常勇敢应战，毙伤敌军二十余人，军心更壮。此时省委的计划一部分已经收到了，海陆丰农民在白军再占海丰至叶、贺军队失败，本没有停止向敌人进攻（至少小的骚扰）。现在勇气又添百倍，准备迎接大的斗争。当时我们已进行第三次收复全海陆丰的准备工作。如能完全胜利了，土地革命切实地进行了，农民得到了土地，党在海陆丰的胜利是有保障的。叶、贺残部（已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与海陆丰农军同样是海陆丰以至东江土地革命有用的力量。

第三次起义

伟大的十月革命纪念日到了。这时广东张（发奎）李（济深）的冲突，已由暗斗而开始明争了。海陆丰的农民一面为纪念这伟大的革命节日，同时为利用军阀冲突，遂准备和开始有计划的起义。因为这时适当张发奎解决惠州胡谦的事件发生，很显明的是与李济深反脸的第一幕。驻防在海陆丰的李部陈学顺，决不能留在海陆丰以自取灭亡，同时农民的收割时期已到，豪绅地主无理性的剥削，当然引起农民的反抗，于是遂有由经常的斗争，而变为伟大的起义的形势。当时的起义的准备是：

一、全海陆丰所有武装农民都起来攻打反动的武力（民团保安队等）并占据城区；同时镇压豪绅地主，并事前分别在各要道上截击搜捕。

二、作战步骤先区乡，后县城。海丰方面，以梅陇赤石农军占领梅陇，公平农军进据公平圩，东南五区联合大队占据青坑区进迫汕尾；陆丰方面则以西北部农军据河口及大安，东南各区农军占据金厢，围攻碣石。

三、武装军队（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二团）除留守部队外，均出动帮助农军作战，以缴反动军队的枪械。

农民起义的准备正在计划，而反动军队已闻风准备逃遁。驻海陆丰的防军陈学顺部急于十月二十九、三十日两日内调集陆丰、公平、汕尾部队到海丰，很显然的预备逃跑。当时一班豪绅地主及商人见此情状恐惧万分，极力的挽留并电请李济深下令勿予调动，同时用种种谣言以冀反动军队停止开动来保护他们。但是陈部因恐惧自己的复灭，终于不敢一息的停留，于十一月一日由县城退梅陇而赤石而吉隆，抱头鼠窜而去，农军未曾将其截击缴械，实在是可惜的一回事。自陈部逃遁后，当地的保安队四百名，更形吓得尿屎直流，纷纷的乘间逃跑，一部往海丰，一部往捷胜退避，以图保存实力。

农民革命情绪的高涨，反动统治势力的动摇和崩溃与豪绅地主阶级之恐惧，都使起义急剧的爆发。海陆丰广大的农民贫苦群众，即于十月三十日开始英勇的斗争，而形成空前的伟大的起义。为便于叙述起见，特分别记述如次：

占领海丰之经过 自敌军陈部于二十九日调集部队逃跑，公平农军就紧急联合第四团之一营围攻最反动之乡广村，捕杀反革命的豪绅地主数十人，焚去逆产房屋十余间，并占领公平圩。十一月一日，长驱直进占领海丰县城，捕杀反动派多人。同时梅陇农军亦即时分头围捕反革命的豪绅地主三四十人，当即就地枪决，大快人心。海丰东南五区联合大队于三十日晚上占领汕尾，反动派因得信较早，故多早已避去，只捕杀少数反动派。除捷胜外，海丰其余各处都给农军占领。农民贫苦群众，无不踊跃争先恐后的参加起义。

占领陆丰之经过 陆丰方面，西北部农军三百余人，于敌军陈团退出海丰以前，已占据了大安及河口之一部。当时河口有百余名保安队，陆丰县城亦有二百余名。第四团之一营与之交战，一时未能击退，后农军冲入县城，保安队遂向碣石溃退，于是陆丰县城遂入农军之手。

围攻碣石的经过 在占领陆丰县城以前，即决定东南各区农军集中起来占据金厢进攻甲子。所以第四团到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到阵地上来，由领袖激昂的说了一番此

次起义的意义后，所有的农民更奋臂兴起，大声叫道“很好！”“很对！”立即奔向阵地，与反动势力作战，反动势力亦极力顽抗。经几次的肉搏，终将碣石占领了。

攻打捷城的经过 这次起义，捷城的农民可以说通通的起来了。他们高呼捕杀反革命的豪绅地主，为平民复仇的口号。但因保安队的死守（因为他们无逃生的出路，所以不得不拚命的死战），所以双方相持了好久，一直至海丰县工农兵代表小会开幕时，第四团始决定派兵一营前往助战，决定十九日攻下捷城。当该军出发时，全体代表，军乐队及工农群众，均欢跃高呼欢送。兵士受工农之激昂慷慨的欢送，连夜开到捷城，会同农军作战。十九日上午八时，遂分三面攻城：第四团派去的一营担负北门，公平梅陇捷胜的农军担负西门，东南各区农军担负东门。仅二小时，北门部队遂先登城，西门也同时爬城，捷城遂被攻下。入城后缴枪数十枝，捕反革命的豪绅，处以死刑。同时农军即将捷城掘平。捷城既下，海丰全县可说完全掌握在农民手中了。

胜 利 之 后

一 肃清反革命势力

自海陆丰先后克复后，工人农民及一切贫苦民众，视为第一重要的工作，就是自己动手铲除反革命的势力。他们搜捕各处的豪绅地主以及重利盘剥者。毫不客气地捕杀反革命分子。这种工作在海丰方面，做得尤为彻底。所以在海陆丰境内，可以说差不多没有反革命势力的踪影了。

二 土地的分配

没收豪绅地主的一切财产，没收豪绅地主的一切土地，土地给耕种的农民等等，在八月间海陆丰第二次起义时，已宣传得很普遍了。此次伟大的起义，对于没收土地财产的工作，更进一步的解决。没收之后完全分配给原佃农及自耕农。当然这样的办法，佃农是很满意的，同时自耕农也没有若何的损失。至对于从前依靠田租为活的寄生虫，自然不客气的叫他滚蛋了。土地分配后，由县工农民主政府发出土地使用证给一切得地的农民。土地使用证的内容如下：

第一注明某区某乡某人所佃耕或自耕之土地经由本政府没收，兹特给与该农民耕种。

第二注明有土地使用证，才能享受土地使用权。此证不得自由买卖及抵押，如该证遗失，即须报明县政府补发。

现在海陆丰土地，都是这样的由县工农民主政府发给农民，并极力打破农民从前以为土地是应归地主所有的错误见解，而宣传：“土地是天生成的，并不是地主造出来的。地主占有土地，完全是强占掠夺而来的。农民应坚决的以自己的力量无条件的向地主夺回土地，土地使用权应全部归耕者享受。”海陆丰的农民，深信要解放自己，只有根本彻底的解决土地问题。

三 焚毁一切契约债券

封建社会的契约和债券，是豪绅地主阶级借以强迫农民出卖自己，加紧剥削其一切

劳苦贫民群众血汗的保障和工具。要彻底的推翻豪绅地主的凭借，就是要根本毁灭一切契约债券。海陆丰农民在这次起义中，除了没收地主土地财产外，其次就是很彻底的勒令豪绅地主交出一切田地契约债务文契，并限令于三日内送至县工作民主政府汇齐登记当众焚毁，否则一经发觉，杀无赦。于是所有田主除已逃跑者外，莫不战战兢兢的将数百年的契约送到政府，以求免罪。对于一切债券亦均毁灭无遗。同时没收所有当铺的一切金银财物，令原典当人持票无代价取回。贫苦民众，闻之狂喜，凡当铺中所有当入的衣服器具，均于数日内认回。数千年封建社会里之剥削阶级所借作剥削的一切工具，此次海陆丰可谓摧毁无遗，真是快事！

四　组织各乡赤卫军，编练工农革命军

固然，海陆丰的伟大起义，摧毁了海陆丰一般地主豪绅统治势力。但是豪绅地主，时时有乘机反攻的可能，尤其在整个的反动势力没有完全推倒之前，地主豪绅无时不有报复的机会和可能。所以海陆丰一克复后，东江革命委员会，为镇压反动势力之复活与巩固工农民主政权起见，即开始招募志愿兵；先在海陆丰招足千名，入伍期为一年，农民可以携枪入伍，退伍后仍准带回。布告一出，应募者接踵而来，可见农民对革命委员会拥护和服从之热情。革命委员会以应募者过多，于是遂决定各乡村组织赤卫军，为乡政府警戒之用，所有各乡武装农民，均编入赤卫军，轮流为乡政府服务。同时并由农军中挑选千余人，编成工农革命军，以作镇压一切反动势力及巩固政权之武力。

叶、贺军队溃退时，枪械子弹，多分散在乡村中；现在分向各乡村收买，一以裕军实，一以防落入反动派的手中。迄今收集到的极多。

五　工农劳苦民众拥护革命委员会之热烈

在此次起义中，东江革命委员会之指挥，获得空前的成功，因此工农贫苦民众，对于东江革命委员会拥护之热烈，真非言语所能形容。海陆丰克复后，为拥护革命委员会，工农贫苦民众都自动的努力筹款给东江革命委员会，不到十余日，海丰已筹了二万元，陆丰亦达万元。同时为拥护工农革命军，积极为工农革命军筹积粮食，成立了征收粮食委员会，每乡平均不过一担或二担，为数极微。农民在没收土地以后，对于此种征收办法，表示十二分的赞成和拥护，纷纷的争先恐后的输缴。

六　工农贫苦民众的口号

工农贫苦民众，为促起更广大民众斗争起见，对于宣传的工作，更努力的以求普遍。宣传口号大致如下：

"没收土地"，"一切土地归农民"，"焚烧田契"，"拥护工农民主政权"，"扩大工农革命的组织"，"武装农民加入工农革命军"，"工农加入共产党"，"打倒残害工农的国民党"，"拥护东江革命委员会征收粮食办法"，"拥护中国共产党"。

七　十月革命纪念大会情况

海丰县十月革命纪念日大会颇为热烈。会场一切装饰都用红色，会场挂满国际旗，

并有第四团之军乐队参加。赴会民众约有六千余人。是日在开会前枪决八九个反革命分子并在会场焚毁许多田契，民众欢呼不已。陆丰同日亦集会纪念。海陆丰纪念大会并有电致中国共产党、中华革命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电云：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华革命委员会、中国各报馆转全国工农群众钧鉴：自国民党背叛革命以来，极力压迫摧残工农群众，然而我们革命热情，绝不因此而低落，反而增高万丈！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向着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目标奋斗。半年以来，我们海陆丰工农群众，与土豪劣绅地主及大资产阶级的武装斗争，绝未有一日之停止。现在已以工农自己的力量驱逐一切反动的武装，克复海陆丰两县，根本铲除土劣地主，实现一切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建立工农兵代表会，接受一切政权矣。当兹十月革命纪念之日，我们海陆丰武装赴会之工农群众，一致高呼：十月革命万岁！列宁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革命委员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工农群众解放万岁！海陆丰民众纪念苏俄十月革命十周年大会叩阳印。"

八　胜利后的社会状况

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建立了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一切压迫，都已解除无余，社会状况自然有所改进，兹将民众各方情形述之如下：

工农方面　工农因得到土地取消债务，当然解除了他们铁的锁链，所以他们都是喜气洋洋的舞狮、唱歌、演剧表示快乐和庆祝胜利，对于一切的工作，都热烈的参加。

商人方面　除了大商人的财产为工农没收外，其余中小商人的营业，反更兴盛起来，这是因为农民解除了一切困苦和剥削，购买力提高了，自然得多很多的到市场来买东西了。

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剧烈的阶级斗争，使一般知识分子如教员学生等，都感觉到只有彻底革命和反革命两条路可走。这次海陆丰的斗争，一方因受事实上的教训，一方因受环境的支配，一般青年知识分子，都跑到工农革命的营垒内来了。有的请求加入共产党，有的要求到农会、工会中工作。他们看见这种剧烈的阶级斗争，和对反革命的豪绅地主的严厉镇压，并不以为骇怪，反而很表同情的说："这是应该的。"

这次海陆丰农民大起义后创立的工农民主政权，算是中国破天荒第一次的工农民主政权，新的革命政权正由东江扩大至全广东，乃至全中国！

九　工农民主政府的外交

海陆丰工农群众以伟大的力量，肃清境内反动派，建立起自己的工农民主政权之后，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心惊胆裂，日夕在那里咒诅。帝国主义者眼见工农兵士们的奋斗精神，在工农民主政权面前，也只有恭恭敬敬，一点臭架子都不敢拿出来了。这次对汕尾英舰的交涉，实在可以开中国过去数十年失败外交史的新纪录。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四时由香港驶来一艘英国兵舰，泊在汕尾附近的海面。距离汕尾约七里路左右，该舰即用电船拖小舢板，载武装海军兵士三十余名，徒手兵士十余名并主教思理觉，驶近汕尾登岸。海丰工农革命军第三大队闻讯，即行散开于海边，以防不测，并制止其登岸。泊近岸的英国海军立即停止。由主教思理觉呈上该舰

致海陆丰工农民主政府书一通。书云：

“径启者，兹接确息，贵治下之中西男女教士被擅行捕拿，将被逐出贵境。敝舰承意领事之请，前来接载，请即释回，还以自由，实为公便。此致

海陆丰工农民主政府台照

计开列如下：

陆伯祥教士	白英奇教士	黄子谦教士
连玛利教士	刘玛利教士	梁儒理教士
黄玛利教士”		

汕尾区政府接函后即令该电船停泊，静候政府答复。随将复函送去。函云：

“径启者，来函悉。查本市所有男女教士，除黄子谦一名因犯罪为敞治府扣留外，余俱安住本市中兴旅店。前据来函，除黄子谦一名因案未决仍须扣留候查外，当即通知该住中兴旅店教士着其落船。此复”。复函送去后，船上又复来一函。函云：

“径启者，敞舰纯系为载男女教士前往香港，并无别意。倘贵军未有骚扰教士教堂等，当认为亲睦。如有骚扰，下次再来巡视。现查黄子谦一名系英籍，今日该舰之来，专为载此等耳。”

区政府接函后，再作以下的答复。

“径启者，查黄子谦系中国人，因犯罪被拘裁判，权在敝政府。无论任何国家，自不能干涉。惟既入英籍，为顾全邦交起见，自可释放。但有一言奉告：吾海陆丰民众对于一切宗教，早已觉悟，一致反对，嗣后请不必再来宣传。至于‘如有骚扰，下次再来巡视’之言，自可不必虚作威吓。须知吾人有全中国而至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一切任何万恶势力俱不足怕。更有进者，嗣后贵舰莫再擅越吾界，自由出入本港。否则吾人自有相当对待，莫谓言之不预也。此复。”

同时并将黄子谦并西教士七八人释放落船。该兵舰即向香港方面驶去。

工农民主政权之成立

工农民主政权之建立，是海陆丰农民起义后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工农民主政府之组织：全县代表人数三百一十一人，农民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工人代表占百分之三十，兵士代表占百分之十（但汕尾市工农民主政府则工人代表占百分之六十，农民占百分之三十、兵士占百分之十）。代表产生之方法，是由农会按照各区人数之多寡分配代表名额，由各区农民代表大会互选出来。工人则以职业种类及人数分配代表名额，由会员直接选举出来。兵士由集中驻防的农军和第四团分配代表人数，直接选举出来。

海丰代表会于十一月十八日开幕，陆丰代表会于十三日开幕，各开会四天。海丰各处农民工人以及贫苦民众在代表会开幕以前数天，都兴高采烈地舞狮、歌唱、鼓乐……无处不鼓乐喧天，较之旧历新年的热闹高数百倍，人人喜形于色，欢呼欲狂。很明显的表现出他们以为既得土地耕种，又解脱一切债务契约的锁链，好象已至无上极乐之国一般。到开代表会的那一天，自会场以至各马路以及各机关，都是红灯红旗红彩照耀满目，各马路均由民众自动的扫除得一尘不染，诚有天下升平万民乐业的景象。会场的布置，尤为庄严，中悬马克思列宁象，两旁则设军乐队及参观台，草地上铺满了席和松

针，各处结满了红布的花结，到处都是焕然一新的气象。

这个代表大会的意义：第一，使工农及一切贫苦的民众与各代表更明白的了解土地革命与工农民主政权的意义。第二，使一切代表可以尽量的发表对土地革命的意见，作参考的材料。第三，使一切民众及代表明白此次没收土地，夺取政权的胜利还不能说是永久巩固了，只有更积极的前进，更坚决的斗争，促进各地农民的起义一直到全广东、全中国的工农兵起来没收土地，夺取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后，胜利才有保障。但我们绝不因反动势力的反攻而恐惧灰心。只要英勇的斗争，坚固的团结，勇敢的作战，最后的胜利一定能得到。第四，使民众和代表更明白只有共产党才是彻头彻尾为工农贫苦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领导工农民众作英勇斗争，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工农贫苦民众的利益，一切工农贫苦民众只有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才能得到永久的胜利和解除一切的锁链。

（下略）

（原载中宣部编：《党史资料》1953年第4期）

中央致朱德并转全体同志的两封信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二十七日）

（一）

自从三河坝与潮州的交通被敌人切断后，党的指导机关即与二十五师全体同志失了联络。潮州失守后，粤省委会两次派人追赶你们，及你们退武丰*转入江西信丰时，江西省委又派人前往接洽，最后知道你们已越大庾岭而入湖南，中央乃又命湖南省委派人与你们接洽。但一切都是徒劳，始终未得赶着你们。现时你们的踪迹，但从报纸上的记载和辗转传来的消息，似乎正驻扎在桂东和桂阳一带，惟仍未能证实，并且据江西省委报告，你们入湖南时，曾与范石生有一度之联络，此事如果属实，在广东暴动失败后，能否不为范石生所解决，很是疑问，因此中央特派李鸣呵同志经江西入湘专与你们接头。除了中央一切重要的决议和关于军事运动的新政策以及最近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情形和统治军阀崩溃的趋势已令鸣呵同志口头向你们详细报告外，中央更有以下的话要说：

一、叶贺军队在潮汕的失败，一方面固由于军事战术布置的不当（如入粤时不以主力攻梅属而直下潮汕，主力既集潮汕与东江敌人对峙，而又留二十五师在三河坝失其作用），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革命政策的执行有许多未脱旧时机会主义和军事投机的遗毒，以致入粤后，未能发动群众使军队化为工农的武装力量，而造成土地革命在潮梅深入的局面，无广大工农群众拥护的军队便是侥倖战胜黄绍雄、陈济棠，结果也还是军事孤立。不能使土地革命深入，甚至于客观上还会阻止工农运动，因为革命的军队，假使不能与工农打成一片，则仍是一个雇佣的武力听少数领袖的指挥。不能表示群众的意识，即是说，不能以工农群众的意识影响此军事行动。固然这种错误，当时前敌的军队不能负什么责任，因为前敌的指挥机关，在“八一”革命前，既未能得到中央完全的指导，而本身的指导又犯了很多错误。而广东省委以及南昌局*对于前敌的军队到潮汕时可号召的工农暴动，亦未能有充分的发动准备；不过军中所有同志，应深切的了解这种错误，务使这种错误，不再在我们同志所组织的任何军队中发生。

二、军事运动新政策的主要条件，是在党的新政策以工农的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由土地革命向社会革命的原则之上建立的，为了在反动军阀统治之下秘密的增长工农武装的力量，我们必须在工厂里农村中组织秘密的工农军，必须秘密的给工农群众和党员以武装的训练；必须组织群众的红色恐怖队，反抗白色恐怖的压迫；必须很技术的有计划的布置工农武装暴动前的必需条件；必须在工农武装秘密的组织中，避免个人的英雄的无组织的指导，要充满政治的经济的阶级的斗争形势，更必须的是对于敌人——统治军阀——的武力，施以无姑息的破坏和分裂；在分裂和破坏的工作中，我们应一变从前巩固所谓国民革命军的态度，改成做侦探、作间谍、鼓动兵变、破坏军纪、勾引队

伍逃走、引诱兵士卖枪、煽动兵士反抗官长、谋害官长以至全体瓦解的种种工作。自然这种工作是一个时候一个部队里所未能做到的，但我们作军事运动的人，有了这种计划，便不应丝毫放过。所以我们一方面反对国民党所属的一切军队，一方面仍应想种种方法秘密进去，做下级军官，做兵士，进行这种破坏和分裂的工作，假使我们所鼓动的兵变和勾引的兵士能够成为一种力量，我们当然立即组织在工农的武装组织之内，进行斗争和暴动的工作，但是这种力量，我们必须认清是工农暴动的副力，工农暴动的主力必须是工农群众自动起来的武装，没有工农群众广大的参加，专靠着一部分的变兵，或已拿着几杆枪的武装队伍，工农暴动不会发动起来的。便是这种无广大群众参加的武装力量，杀了很多的豪绅官吏工贼，烧了地主的房子，分了资本家财主的财产，烧了借主的借契，充其量不过是梁山泊上英雄侠义的行为，在群众眼内看来是替他们打抱不平的，这样不但不能使土地革命深入，并且一旦统治阶级的军队以全力攻来，到了不能抵抗的时候，好则上山，坏则崩坏，群众中是无法藏身的，自然更说不到扩大群众的参加，蔓延暴动的区域，以抵抗反动的势力。所以我们分裂军队来助成工农暴动只能当做工农武装的副力看，切忌变成流寇式的队伍，来阻止暴动，现时你们队伍所处的境地和所负的使命，便应是这种工农暴动的副力。

三、关于工农暴动的范围，你们或已知道，你们队伍在暴动前后的责任，你们或已讨论过。不过我们要慎重指出的，你们用这种副力参加暴动或发动暴动时，必须避免军事投机的错误动作，大概军中同志，在这个新旧政策交替的时候，最容易把武力包办一切的观念，移植到工农暴动上面来，譬如农民暴动一开始，必须是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然后才能使暴动中一切行动有意义而深印在农民心里，但军事同志则常易于初发动时便代替农民执行一切暴动动作，而忘了发动群众，或是专注意军事行动，企图固守一个阵地，或是扑攻一个城市，而忘了执行暴动中政治经济的社会的土地革命的各项条件，殊不知群众的暴动和军队的对垒有迥然不同的广狭意义，军队打仗是专门比赛技术，人的条件，是要在一定的技术范围内比赛谁的勇敢，而群众暴动是要在广大的热狂的反抗的情绪中，趁着统治阶级动摇的机会，武装了自己，推翻当地统治阶级的权位，夺取政权，同时并会扩大这种反抗及于周围的群众，以至于摇动敌人所雇佣的武装群众，技术条件在这里虽也成为暴动条件之一，但他却不能比暴动扩大群众摇动敌人所奴隶的群众更占重要。认清了这一点，则我们以军队式的武力来参加暴动，便不会首末颠倒，否则我们不是因为群众尚未起来便代替群众单纯发动暴动，即是不信仰群众的创造力量，借口于几件技术条件之未完备便阻止暴动，前者是军事投机，后者是机会主义，你们带领队伍在城市在乡村参加这一暴动任务时，必须防止这些容易陷入的错误，时时注意群众的发动、群众的扩大，以至敌人所奴隶的群众的勾引或煽动。

四、你们的军队如已确实到达湖南的桂东、桂阳地方，你们工作的对象，便应从这几个县份计划起，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召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 不知你们已和他联络否？各部分农军从前也有不发动群众专门代替群众从这县打到那一县执行英雄式的暴动的错误，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这在现时的湖南敌人势力空虚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便是那部分农军已经远走无法联络，你们在桂东、桂阳一带应该单独的做起来，当地如有我们的

党部，自然应该与他们计议发动群众采取适当机会举行暴动，假使没有党部，你们亦应由军中挑选得力同志派入乡村做组织群众鼓动群众的暴动预备工作，同时并派人与湖南省委作切实的党的联络。

五、暴动的局面，须看当地的环境，如便利在乡村发动，便应在乡村中力求深入和扩大，而不亟于攻城；如攻城确有把握而影响又大，群众或更因此而扩大，故攻城亦所必需，便是守不住几天，仍为敌人攻下，亦只得去做。乡村与城市的暴动固然是最好的是能汇合在一起，但决不要彼此等待，尤其是乡村能发动时便发动，只要注意群众深入与扩大，农暴总是可以在乡村支持而扩大的，我们以队伍参加农暴，也须着眼于此点。

暴动的内容，自然应依照中央各号通告所指示的去做，但口号必须依照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原则，指定各种切实的口号，以合乎当地的需要。

六、万一你们所去的地方客观条件不容许一个农暴实现，即所谓统治军阀力量的强大，工农群众反抗情绪的微弱，党的指导一无所有的时候，你们的队伍便应向农运发达的区域移动，去发动群众，做成农暴的助力。这次同鸣呵同志同去江西省委代表，便在这个条件之下同你们磋商，将军队移往江西农运发达区域，如万安、莲花、赣州一带，去做农暴的助力，你们如认定湖南无发展农暴的希望，便可接受江西省委的提议。

七、假使你们已经与范石生发生了组织的关系，你们便应很坚决根据上述的使命，从他的军队中分化出来，这就是说不但将我们的军队抽回来，还将范石生的队伍拉出一部分来，这一工作自然是很艰难而且很秘密的，但我们必须很谨慎的努力去做，至少要将我们原有的队伍抽回来，指导机关应切实讨论迅快执行。

八、我们队伍中或者已经发生一些摇动分子不愿意过这种无希望于升官发财的流浪生活，你们应坚决的淘汰这些分子，假使他们不但自己摇动，同时还鼓动别人，你们便应很坚决的执行军纪斩断恶根。士兵中如有厌倦军队生活而愿归家者，你们首应以土地革命后士兵家庭可分得土地耕种，工农革命军队待遇改良生活平等的希望去鼓动他们，更应时常引导他们与农民打成一片，引起他们参加农暴的兴趣，以巩固我们的军队。假使士兵有受敌人宣传的影响，图谋反叛或逃走者，便应立即予以监禁式的劝诫，并将解除武装，武装热心农暴的农军。

九、你们队伍一切的给养，均应从豪绅官吏财主地主身上着想，千万不要空想党会来帮助，这不但事实不可能，而且原则所不许，旧二十四师在海陆丰参加农暴，不但自筹给养提高了兵士生活，并赞助农民分配了土地，分配了地主的财产给贫苦无业的农民，这一工作你们应首先注意。

十、军中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你们必须依照从前的组织系统——团成立支部下分小组，师成立委员会——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行动。

过去二十五师同志的许多行动多有可批评处，尤其是三河坝退后，直至现在许多同志的行动多应该拿到师委员会里讨论出一个大纲，交给全体同志公开的讨论给一判断，谁是谁非，报告中央核办，没有党纪便没有军纪，党员不能受严格的军纪，就无以处罚非党的群众，故你们对过去工作的审查千万不要马虎一些。

一切党的政策均须拿到支部会议或小组会议中讨论，使每个党员都能表示意见，有些并可向非党的群众宣布，使他们认识ＣＰ的真面目和这部分军队正当的出路——工农

革命军。师委会的组织以五人为合式，除指定朱德同志为书记外，余四人可由全体选举，但必须有个士兵同志被选。

十一、你们这一部分队伍的组织形式，广东革命委员会已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你们现在已到湖南，如果暴动占据了一个地方，即可由当地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任命为某某地工农革命军第几师，在这师中的一切训练，除了军事的正式操练外，必须有严重的政治训练，在非同志或不得力的同志中必须有党代表的派遣，严厉的执行监督任务。

十二、你们过去一切的情形均须做一详细的报告——给中央——给湖南省委，你们向中央要求只要人材问题，中央可以供给，只要你们有信来，你们应派人与湖南省委联络，对中央，□□同志的任务完毕，即须回来报告，万一你们需要□□在那边工作，他可参加师委并任军队中一部分指挥工作。

一切一切都由□□面达，此次又不详写了。最后中央对于你们这一师死难的同志，特致最诚恳的衷忱和永不能忘记的心意，同时并祝你们后死的同志努力！

中　央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

广东省委来信，有你们部队已随范石生到韶关的消息，如果属实，则中央前信的指示，又有以下的变更：

一、广州的暴动，不曾严重的警告了范石生，但其对你们部队的注意的防范，并且前信所说："广州暴动失败后你们是否不为范石生所解决，尚是问题。"目前范石生恐将实际的回答这一问题。为避免消灭的危险，你们只有坚决的脱离范石生，联络北江的农军及广州暴动后退往北江的队伍，参加北江区域的农民暴动，扩大和深入北江的土地革命，做成北江农暴的主要副力，造成海陆丰农暴割据东江的同样的局面，这是你们队伍存在和发展的唯一途径，并且对于广东全省总暴动的前途更有深切的关系，认清此点，你们必须迅速的执行。

二、你们在脱离范石生时，必须扩大这个"叛变"的影响到他的军中去，尽可能的带去他的队伍，拆散或消灭他的军队，即是保障和增厚我们的力量，这一良好的而又危险的时机，你们也须谨慎的利用。

三、立即与广东省委接洽，直接受广东省委和北江特委（大约在韶关）的指导，完成你们对北江农暴应尽的责任，其余一切可参照前信斟酌实行。

四、假如同志中有怀疑脱离以及拆散范军的政策的人，必须无顾忌的予以开除，万一主持军队的同志领导着队伍反对这个决定，中央特命北江特委及□□同志行使非常手段领导服从党命的同志消灭这一个反抗。

中　央

十二月二十七日

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一　中央最近的策略及客观的革命形势

本年八月里中国共产党中央通过的政治任务决议案，已经考察武汉七月反动之后中国的一般政治状况，断定那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稳定，在现时中国这种社会经济政治的基础上，是完全不可能的。中央那时指明：一般政治军事经济的大危机，因资产阶级军阀反革命的结果，必然要大大的扩大发展起来，这是无论如何不可避免的事实。

中央曾经指出：虽然中国革命受着两次巨大的失败；四月间沪粤的反动，七月间武汉的反动，然而中国革命决不会就此长期的消沉，所以中央认为这种悲观的观念是绝对不正确的。中央那时认为必须继续扩大深入革命的斗争，并且要坚决的采取组织工农武装暴动的政策。以后的政局，完全证明中央这种考察是正确的，中央的大政方针是对的，固然南昌暴动及南征广东的革命军队失败于潮汕，固然广东两湖的农民暴动一处也没得确定的大规模的胜利，但是革命虽然又遇着了这几处部分的新失败，然而三个月来一般的斗争经验，更证明了本党的策略完全是对的。最近的一期，各地工农民众的斗争又重新猛烈的爆发，一般政治状况及各阶级的相互关系，经过了很严重的变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考察现时的新时机而决定适应这种客观时机的策略。

二　中国社会的总危机与农业经济

中国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虽然胜利，然而那些产生伟大的中国革命之社会经济政治关系仍旧存着。沪粤武汉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解决那些中国社会关系中的矛盾，而且更加使这些矛盾剧烈起来，增多起来，更加使这些矛盾的爆发急遽起来。这就是因为得着胜利的反动势力，竭力在那里巩固中国的旧制度——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是陈旧腐朽落后野蛮的制度，于是这种情形的背景里，那一般的总危机便尽量的大大开展起来。这就必然要引起无产阶级、城市贫民，尤其是农民的广大群众之革命斗争的高潮。

农业经济的衰落破败，一天天的更加带着天崩地陷的爆裂性质。今年（一九二七年）是相当的“丰年”（除直隶、山东两省已经完全被战祸天灾所破灭之外，其他各省的天时，照例应当使农业经济相当的改善，但是事实上差不多全国都因过去的灾荒与战祸，同样是成千累万的人饿死杀死，不过是比灾歉的直鲁略好些。），可是这所谓“丰年”，不但没有阻止些农民经济的崩败，而且更加增进农民经济崩败的过程。因为“丰年”的结果，人民反而要多出些钱米租费给地主和政府（例如浙江今年借口丰年追缴历年欠赋），地主和重利盘剥者要追取农民的旧欠，买办和商人要抑低农产品的价钱，军

阀更借口增加税捐至两倍三倍（江苏今年增收田漕的亩捐）。所以所谓“丰年”即使不比荒年更加使农民破产，至少也和荒年一样。地主的剥削农民，商人重利盘剥者的剥削农民，军阀的掠夺农民，豪绅官僚等等的压迫农民，现在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弄得农民不但不能恢复自身的生产能力，甚至于不能保存自己的性命，各省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已经被这些有产阶级剥削到不能一日忍受的地步，农业经济的“重复生产”，即使在极隘小的范围内也简直是不可能的了。除地主商贾重利盘剥者的直接剥削外，军阀还要掠夺农民，他们不但征发粮食牲口，并且要拉夫，再则因为战祸连年的关系，水利灌溉防旱防水的工作，都大受妨害，国家秩序混乱分崩，天灾日益频数（这些天灾亦大半由于中国社会制度而来的），还有财政金融的紊乱，使乡村中多量的出产品流入城市而不能得着相等的报酬，商业和市场的停滞纷扰，使农业经济上技术方面的准备也日益破毁，乡村中土匪蜂起等等。——凡此种种，都使农业经济崩败衰落。农业经济的危机是一天天的增加，而有天崩地陷似的暴落的趋势，这种危机的唯一出路，只有工农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剧烈的土地关系的变革。

三　工商业的危机

中国工商业及金融中的危机，尤其有明显的表演。中国革命客观上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造成统一全国的国内市场，没有统一全国的国内市场，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一革命任务，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阶段中就应当解决的。但是国民党的反革命，不但没有走近解决这一任务的一步，而且更加使这一任务的解决远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不但增加中国的分裂离析，而且发生许多新的混战，各省之间有战争，每省之内也有战争，现在全中国都是混战。商业交通在各省之间固然是时常断绝，就是在一省之内也往往东阻西隔，各省都是紊乱的金融状况，原料机器燃料的运输减少了不少。有些地方简直断绝了。反革命的屡次政变之后，外国资本家的竞争势力又增加了好几倍。再则中国农民的家庭工业，手艺等类的事业，更加破产停滞。国内国外的贸易都是日益衰落（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输入减少百分之五十）。外国资本利用银价的低落，财政的紊乱及国民党的屈服，更加在中国多量搜刮金钱财货。全国的破产穷困，经济的衰落，都在一日千丈的堕落下去。几百万农民，几十万工人店员，都在失业，都从商业及一般生产过程之中排斥出来。资产阶级军阀国民党的反动，就是如此的“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

四　帝国主义侵略之急进

资产阶级军阀的反革命，在国际关系上，便是完全降伏于外国资本主义，而增加帝国主义的侵略。英国帝国主义已经实际上夺回了汉口的英租界，而且完完全全统治了上海。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方得着了绝大的胜利，满洲、内蒙正在变成完全的日本殖民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国资本，他已经抛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不敢再争收回租界的问题；关税自主的问题，他竟无耻的完全屈服。他绝对的背叛了民族解放运动。现时国民党的所谓“反帝国主义”宣传，一忽而反英，一忽而反日，都不

过掩饰民族资产阶级实际上替帝国主义当走狗的那种无耻的奴性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只想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矛盾，而实在则替其中最强的当工具。从革命开始到现在，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统治力，从没有现在这样强大的。伟大的中国之被压迫的半殖民地的地位，虽然以前一向是治者阶级向帝国主义做买卖的“投机事实”的对象，但是从没有现在资产阶级军阀反动（国民党）治下这样厉害的。

五 民族资产阶级与国民党

国内政策方面，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便是只能采取法西斯蒂主义及亚洲式的野蛮专制之凶恶手段。白色恐怖，穷凶极恶的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劳动民众，这种反革命政策，在国民党治下，达到了空前的野蛮程度。中国旧式的野蛮毒刑，对于革命党人的非刑拷打，还要加上建立黄色工会的把戏和警察包探所组织的工贼性的“大会”，渗入工人运动。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日益增长同时他自身之内的分化崩溃的过程却也在急转直下的前进，中国资产阶级，固然绝对没有能力实行反抗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反动的革命使命，而在群众运动高涨的最初期，便背叛了革命，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更没有能力做稳定团结反动势力的动力。对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要他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的国家，或者就在资产阶级地主联合的基础上统一中国，都简直是他没有丝毫能力去实行的事。这是他历史上的命运。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地主的联盟，其结果是使中国更加分崩离析，使割据互争的局面更加纠纷，自然要造成继续不断循环不息的军阀混乱的屠杀战争，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各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最不成熟最没有力量的阶级，最不能负起历史上的改造社会制度之责任的阶级。一切建立巩固的国家政权之尝试，就算在一个小小省县的范围里罢，都是完完全全破产。无间断的屠杀混战及空前的贪婪淫佚腐化，——便是资产阶级军阀反动的国家机关之致命伤。国民党曾经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如今很快的腐化堕落，完完全全变成无主义无目的的帝国主义走狗的狗窠，屠杀工农的刽子手的党，贪赃舞弊杀人凶犯投机奸商的官僚党，这事实很明显的反映着资产阶级反动的全部腐化崩败的景象。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八月间便预言：国民党要变成一个像样的资产阶级反动的政府党，尚且是不可能的事，这是很对的。本次会议完全赞同中央九月间关于取消组织左派国民党之计划及提出苏维埃口号之决议。本党认为国民党左派组织失败之经验，证明国民党的旗帜已经完全变成白色恐怖的旗帜，凡是真正革命的分子，只有团结在共产党旗帜之下。本党不但要号召一切革命分子退出国民党，而且要努力揭发国民党的欺骗压迫民众的罪恶，要领导民众起来推翻国民党。

中国资产阶级是历史上的流产，甚至于连造成自己政党的能力都没有。他们不能造出一个有一定政纲的党，更不用说要他造出一个真有政治意识的政纲了。

六 中国革命的前途

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特别的作用，使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完全没有稳定的可能。经过革命的三次失败，仿佛反动稳定是件可能的事。但是必须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及政治制度

能够由改良主义的方法，解决一些，同时，必须在现时国际国内之中，有渐进的、作算是非常迟缓痛苦的改变社会制度之可能，可是实际上现时在中国没有这些条件。中国没有这样一个阶级，能够负起责任来，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不过是夺取革命领导权蒙蔽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手段，领导权到手之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立刻便不得不将他转交给豪绅地主阶级，就是完成反革命势力的复辟，结果是反革命的领导权仍旧在豪绅地主阶级手里，而不在资产阶级手里。如汪精卫等类的政客，想“改良”土地关系（如应允减租百分之廿五等），可是这种政策在几天之内便完全破产，单是这一例子便证明改良政策不过是公开的欺骗。再则全世界客观的形势是革命的，国际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又在急进的施行，这种情形也就是使中国没有由改良主义得着外国资本家的帮助，而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要帝国主义“帮助”中国完成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使中国完全永久变成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二）帝国主义战胜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战胜苏联。此外中国不能由改良主义的方法去达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却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革命虽然受着屡次很大的失败，而中国劳动民众革命运动的力量不但还有很多很多没有用尽，而且现在刚在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高潮。

最近几月的经验，铁一般的证明这件事。中国伟大的革命已经唤起如此广大的工农苦力群众，他们都起来实行独立的政治斗争；民众激愤的革命力量，决非几个月的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所能完全扑灭的。

所有这一些情形，都使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一观察，并不带着“革命在最短期间必定完全胜利”的幻想。中国的客观情形是如此；直接革命的形势之时期，并非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事，而是好几年的事。中国革命带着长期的性质，但是是无间断的性质。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为“无间断的革命”。——（一）在革命性质上，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实行推翻封建军阀的民权革命，所以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所谓二次革命的理论）；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二）在革命速度上，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着历次的挫折，但是他始终继续不断的发展，因为治者阶级之间自身的冲突矛盾非常剧烈，他们的统治不能稳定，民众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的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这种继续不断的革命爆发，显然证明中国革命之无间断性。总之，中国革命虽然简直还没有开始其民权主义任务的解决，但是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

七　革命的高涨与低落的问题

中国革命的无间断的性质，只要看最近各重要省份里农民暴动的高涨，就可以证明。九月间农民暴动普遍广东湖南。虽然这种互相隔绝的群众自发的暴动，遭着屡次失败，然而农民运动的爆发仍旧继续着，有些地方（如湖北）甚至于更加厉害起来。十月间农民暴动又在江苏、直隶、热河、山东开始了。同时几个主要的无产阶级区域，如上

海、广州、武汉，经过一期退落情形之后，工人运动又带起比较猛烈的革命性质。农民运动的潮流，已经引起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爆发，不过暂时还比较的弱罢了。南京与武汉军阀争夺地盘的屠杀战争强盗战争开始之后，劳动平民反(更？——校者)加受着痛苦，广大的工农 群 众 更 加愤激。虽然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非常之严重的压迫屠杀搜捕，然而群众的革命斗争，却正在刚经失败损伤的地方，陆续的继起。群众正在自己失败的经验上，学习革命的斗争。

固然，过分估量革命的高涨及群众的革命力量组织力量，因而认为可以有大范围内立刻的胜利，这是错误的；然而经过革命三次大败之后，在现今这种反动局面之下，群众的革命斗争终于重新爆发；如果对于这种情形估量太少，那就是不可救药不能轻恕的错误。

因为革命潮流的低落条件，至少是：（一）资产阶级军阀统治的稳定；（二）改良主义的渐次实行；（三）革命群众之溃散与消沉。单是敌人的屠杀进攻，不但还不是革命的溃散，反而证明革命潮流之高涨，才使敌人惊惶失措而拚命的严厉镇压。但是，如果无产阶级没有布尔塞维克的党，不去积极发动群众，领导革命潮流的发展，而以为自然的革命高潮到来，自会胜利，那也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八　现时的总策略

现时形势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总策略，便是：(一)努力使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得有最高限度的组织的性质；(二)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三)努力保证工人阶级的爆发与农民暴动互相赞助互相联络。中国共产党应当避免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武装暴动的发动，那是会变成拚命的“孤注”的，然而党应当去领导一切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之发动。所以共产主义者应当做一切农民暴动的指导者。如果农民暴动的发动，事实上不能有多分准备起见而推迟，如果这种暴动事实上不能估量到较大范围内的胜利，那么，党应当使这种暴动采取游击式的战争（不去占领县城或巨大的地域，长久的时期，不去费力建立大规模的军队等等，而以人数虽少却是团结巩固的暴动军，经常不断的袭击政府的军队或地主的武装）。这种游击战争，随后很容易发展而生巨大的农民暴动，进一步而达到在较大的范围内夺取政权。固然，游击战争开始之后，攻袭城市，尤其是小县城，是农民群众常有的倾向，本党尤当领导这种斗争，使适合于战术上的目的，袭其不备，夺其武装，杀戮豪绅，摧毁其各种权力机关。但是，农民暴动之后，如果专意占据县城而忽略乡村中土地革命的根本工作，不去发动更多更广的群众，不使群众自己取得土地取得政权（苏维埃），那么，这便是军事的机会主义。

至于城市之中，则游击战争的策略，比较起来要难实行得多，所以往往城市之中有不适宜采用这种策略的时候，要到城市之中已经最终决定举行暴动，巷战已经开始，那时，党才可以运用这种游击战争的策略。然而现在在一切工业区域，已经要建立工人的武装队自卫队，训练战术，利用他们在日常的反抗黄色工会的斗争之中；这已经是工业城市之中现时所不可迟缓的任务之一了。城市暴动的必须条件是：（一）工人群众的革命高涨及革命情绪——工人日常经济斗争的加紧与扩大，形成总的政治斗争；（二）治

者阶级统治之动摇崩溃的形势；（三）一般市民（中层阶级）的慌乱犹豫摇动，对于治者阶级厌恶而反对，甚至于同情于治者阶级之颠复；（四）工人阶级之革命力量之组织，技术上的准备。因此，党不但不应当在城市之中只注意到所谓军事工作之准备，而忽略各市以及各县工人手工工人店员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之指导与发动，而且应当更加加紧这种斗争，每一次极小的斗争之中，也要引导工人群众去了解暴动夺取政权之必要，及与农民暴动联合推翻统治阶级之必要；这样，于是切实的在政治上准备城市之中暴动，关于工人暴动与农民暴动的联络关系，是党的最重要的责任，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和赞助，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但是，这种联络，只有经过党的组织与规定计划。群众的暴动，不论在城市或乡村，都要适合当地的环境与时机，既不能互相等待，亦不能在明明没有立即暴动的形势中，而以军事投机的方式做军事上的互相影响。

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

再则，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之下，可以发生两种不正确的倾向：一是军事投机主义，过早的明知无希望的发动，固然是军事投机主义，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不以发动群众为根本政策，不相信群众的力量，而只相信军事的力量，只知道军事上的布置准备攻守进退的规划，因此，暴动之中只见军事的行动，并不充分发展群众斗争的根本工作。二是借口准备的不充分或者采取等待政策，而不发动当地的群众，甚至群众已经多数的起来暴动，尚且对于领导这种暴动仍旧是怠工或动摇犹豫，这种倾向的不信任群众力量，不发动群众的政策，甚至限止群众自发的斗争，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丧失政治生命。党对于这两种错误的倾向应预先指出他们的危险性而努力扫除之，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众暴动的责任，固然是使他尽可能的有最大限度的组织性，但是，一切群众自发的斗争，即使是党所认为过早的，党也有起而领导之责任。

最后，工农武装暴动的策略，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对于一般贫民苦力群众（小资产阶级群众）应当尽力吸引他们参加工农的斗争；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等，切不可以存着犹豫动摇的心理，如惧怕扰乱他们的安宁秩序，因而不去发展革命的群众的独裁制，甚至阻止群众的剧烈的革命行动。

现在虽还没有到总暴动的时机，而党的任务却正在于努力鼓动各地城乡革命的高潮，创造总暴动的局面。党不但要努力去组织农民自发的暴动，而且要去领导贫苦农民，领导起潜伏待发的暴动，发动游击斗争；应当发动工人的阶级斗争，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领导他们汇合而成总暴动，获得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胜利。

九　苏维埃的口号与工农政纲

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党应当在文字口头的宣传上，对于最广泛的群众解释："为建立工农兵手工工人城市贫民代表会议政府，而实行革命

斗争的必要。”（“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但是，只有确实无疑的群众革命运动的巨大高潮，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只有到了这种时候，方才可以并且应当组织苏维埃，以为革命的政权机关。这所谓“暴动之稳固的胜利，已有保证”，是说暴动在一定区域内已经有固守较长时间的可能；只要有这种可能，便应当建立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只要暴动真正是发动群众的，那么，暴动胜利时，这便是事实上不能不执行的任务。至于游击的农民暴动，还只在袭击移动的时候，当然，那组织暴动的当地革命委员会，继续以临时政权的性质为暴动之指导机关。总之各地农民暴动的发动，应当以当地农民的秘密团体（农民协会等）所推出的革命委员会来指导（城市暴动便是工会等推举的革命委员会）；应当尽量发动群众，引进更多更广大的群众参加，实行自动手（“民众式”）的没收土地，杀戮豪绅、工贼，摧毁中国一切旧社会关系，实行游击式的战斗——解除敌人的武装，组织工农革命军；这种暴动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得胜而有固守的规划之可能，便应当建立苏维埃（农民代表会议）；如果已能占据城市一县或数县，以至于一省，工农暴动已经联合起来而获得胜利，那便有建立苏维埃之必要。城市中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之建立，尤其要吸引广大的工人手工工人店员的群众；城市暴动一开始，甚至尚未开始之前，已经要有群众斗争组织的雏形，如总同盟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大会、革命委员会等，要积极领导这种群众斗争的组织，使成为革命的暴动的中心机关，实行革命暴动独裁的机关。暴动胜利一有巩固的可能，这类的群众组织便要变成苏维埃，而为革命的政权机关。暴动的胜利，只有在建立苏维埃的过程中，能使工农群众真正自己获得政权，而更加尽量的来发展革命巩固革命的胜利。——所以苏维埃的组织既不能在胜利绝未巩固之时开始，因为这可以陷于忽略军事战斗而专事选举，倾向于小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成见，因而减弱革命的独裁制以至党的领导权之危险；苏维埃的组织也更不能借口于军事尚未了结，基础尚未稳固，而延迟推宕，因为这便更加要增长暴动中的军事投机主义，这便将工农暴动完全变为军事行动，只去攻城夺地，只知道军事上的规划。

一切政权归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是武装暴动的总口号。城市贫民应当包括工匠手工农业者及一般非剥削者的小资产阶级。

党应当在斗争的过程中组织农民于农民协会等类的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依各地的情形群众的信仰而定）。这种农民组织必须是贫苦农民群众（破产贫困之自耕农、佃农、雇农、失业农民）之阶级斗争的组织，且是暴动的组织（决不能视为类似工会的经济的组织）。然而党应当确定方针：暴动胜利之时，要农民协会变为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现时就应当宣传苏维埃的口号及农民协会的过渡作用。所以苏维埃口号并不与组织农民协会相冲突，可是“乡村政权归农民协会”的口号，应当取消，苏维埃口号之外，还要团结农民于土地革命的旗帜之下，农民暴动未发动的地方，秘密的农民团体是有需要的，本党应当引导他们到抗租抗税不还债的斗争，一直到武装暴动没收土地。本党对于土地问题的总方针，已经载在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之中。党应当坚决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分子犹豫圆滑的修改或谬解土地问题上的党的主张。土地革命的主要口号应当是：完全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由农民代表会议自己支配给贫农耕种，耕者有其田，完全取消租田制度，同盟抗租抗税，取消一切苛约、重利债务，没收豪绅重利盘剥者的财产，歼灭豪绅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本党坚决的反对用减租、没收大地主、打倒

劣绅恶地主等改良主义的口号，来替代上述的革命口号。本党应当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游击战争之中也是如此。

城市之中，除苏维埃口号以外，还有劳动问题党纲：八小时工作制，绝对的增加工资，规定休息日，社会保险，要求监督生产等。再则，应当对于工人群众及城市贫民解释，并且要在暴动胜利之时实行下列的事：例如没收反革命派的一切财产，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收归国有，工厂归工人管，厉行劳动法，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的工厂，歼灭一切工贼反革命派，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改良贫民生活，如建筑工人贫民住宅等。只有在这种革命的口号之下，本党才能组织被压迫群众的暴动，而得到胜利。

十　反对军阀战争与军事问题

反对一切军阀战争的问题，是中国现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赞成中央最近所发反对军阀战争的宣言，认为对于军阀战争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的政策，是非常之对的。“失败主义”便是要使交战的双方军阀都失败，因为军阀的失败崩溃，就可以开展群众革命运动的环境，而使工农暴动容易得胜。本次扩大会议更特别的指明：失败主义的革命策略，在南北新旧军阀战争的时候，对于本党是天经地义。对于劳动民众，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的统治，与白崇禧、唐生智、汪精卫的统治是一样的。北方军阀大半自身便是很大的地主和重利盘剥者，是最大的官僚买办资本家的代表（商业资本与重利资本及官僚大地主的政权）；南方军阀是豪绅地主（重利盘剥者）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他们双方虽然现在还是反动之中互不相同的种类，可是工人阶级及农民对于他们的态度是一样的。本党的任务，便是在一切军阀战争之中，努力将这种军阀战争变成革命战争，将这种屠杀掠夺的战争变成劳动民众反对富豪军阀的国内战争。本党应当向劳动工农民众解释的，对付军阀屠杀战争之唯一方法，便是各地工农兵士群众起来实行推翻自己当地的军阀地主资产阶级之革命暴动。本党应当组织群众以备暴动，在优越的时候发动群众而指导他们暴动，领导工农群众起来夺取这些混战殃民的军队的枪支武器。

中央认为必须更加加紧在一般广泛的平民群众之中做反对军阀的宣传。“反对战争”的口号，中央认为是对的。但是宣传这一口号的时候，必须解释，要能永久消灭这种军阀的掠夺战争，只有劳动贫民的革命胜利，而建立苏维埃的政权。

军队之中的革命工作，因为战争的关系，更加重要而更加要加紧破坏这些军阀军队的工作。中央现时特别指明：虽然中央政治局屡次提及这一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到处受摧残，或者简直没有做。农民暴动屡次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央认为就是这一工作没有丝毫成绩的缘故。本次会议现时特别命令各级党部立刻开始在兵士及下级士官中的秘密工作。除主要的革命口号之外，军队中的宣传，可以加上下列的要求：例如，增加兵士饷项，要求发清欠饷，给兵士好衣服好住所，废除肉刑，反对军官侮辱兵士，兵士监督军官的财政收支等等，本党应当号召兵士参加工农暴动，没收军阀财产，兵士派选代表参加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的政权。

同时，中央认为必须特别指出：中国革命总经验，尤其是屡次失败的教训，都证明要使中国现在的雇佣军队，变成革命斗争靠得住的工具，是不可能的，因此，凡是暴动胜利而有可能组织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地方，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队不同的工农革命军，工农革命军组织上的主要原则，便是志愿兵制度，工农革命军的主要成分，应当是阶级觉悟的革命的工人和农民。党代表政治部的制度，应当在新军队的各级组织之中建立起来。新军队中应当有集权的军需供给的机关。新军队的名称定为工农革命军。

十一 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八七紧急会议以来的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阶级斗争剧烈的时期，这种情形自然的结果，竟使本党以全力去指导无产阶级农民的斗争；在这种艰苦困难的条件之下，本党所以没有能分一部分注意到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上来。同时，正在这一时期之中，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及其保镖的军阀（国民党）逐步屈服，实行其卖国的亲帝国主义的使命。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汉工人苦力群众赤手空拳夺回来的英租界，国民党竟归还了英帝国主义者，这是何等的耻辱。九月一日实行关税自主，也竟取消了。南京政府曾经企图使监务署的外国督办服从自己，但是英国领事几声抗议便把国民党吓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蒙，而国民党政府一句硬话也不敢说。所有这些事实都更加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是彻底的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无产阶级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引进极广大的农民与城市贫民群众。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应当领导中国劳动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严格的揭发治者阶级的卖国行为，以及国民党虚伪的“反帝国主义”的口头禅。本党应当号召无产阶级及广泛的被剥削民众起来奋斗：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立刻撤退外国海陆军，没收外国资本家的工厂、企业、银行——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中国人民公有，取消一切外债——满清政府及军阀政府零趸出卖中国所借的外债。

同时，本党应当经常不断的对工人及一般劳动民众解释：中国人民要完全战胜帝国主义，只有推翻统治者阶级，建立新的革命政权，真正的平民政权——苏维埃政权，同时，也只有得着国际无产阶级的赞助。

十二 机会主义之遗毒

八七紧急会议虽然严厉的反对以前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半孟什维克主义的政治方针，中央临时政治局虽然屡次纠正地方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然而党内仍旧有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之遗毒。叶贺潮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南昌暴动政治上意义的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前敌指挥者不是实行革命的政策，而是在各种主要问题上采取妥协的改良主义的方针（只提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之土地，主张减租到收获百分之三十，不注意农民群众的革命宣传，不准工农自动的独立的实行杀戮豪绅地主反革命派，抛弃征发没收地主豪绅财产之政策等等）。军事上很坏的策略，也表现前敌党的指导，没有革命的建议力，没有果断的意志和方针。许多次的农民暴动之中，指导者犹豫动摇，没有革命的坚决的意志，都是多次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机会主义的特

点，便是不相信群众运动的力量，不去依据工农民众，而总想依靠靠不住的军队力量，总只想做勾结杂色军阀的把戏。中央这次会议认为必须以全党的力量，来排除这种危险的致命的机会主义之遗毒，这种机会主义遗毒犹存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党的指导干部是非无产阶级的成分，本次会议命令各级党部立刻用最坚决的方法，使指导干部工人化，肃清其中的机会主义的分子。要知道最近两湖广东及叶贺南征的失败，其原因由于主观上的错误的占极大部分，没有强固健全的非机会主义的党的指导，革命是不能胜利的。

再则，本会议认为还要预防党内别一种危险倾向发生之可能，——这种倾向便是对于工人阶级日常的经济斗争，部分要求的斗争，职工运动的工作，估量太少。其实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不但和指导部分要求的斗争的工作不相冲突，而且更加要党积极的去领导工人阶级要求改善自己生活的日常斗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共产党发展成为群众的革命的组织。

政治纪律决议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1）本党第五次大会对于党内政治纪律的整顿，非常主观，只有最严密的政治纪律，才能够增厚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力量，这是每一个共产党所必具的最低条件。

（2）自从今年七月事变公开宣言退出国民政府之后，决定抛弃以前迁就资产阶级领袖的妥协政策，坚决的领导工农群众起来武装暴动，"八七"会议更加详细的指出：以前本党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今后应当毫不犹豫的信赖群众的力量，彻底实现土地革命的政纲。并且决定于秋收时间于湘、鄂、赣、粤四省领导农民举行暴动，去进行土地革命的斗争。

（3）这一政策的执行，不应有丝毫犹豫的余地，但是在各省暴动过程中，本党的指导机关与负责同志做出许多违背策略的严重错误：

（A）八一事变中前委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决定南昌暴动是四省暴动的一部分，应以农民主力发展土地革命的斗争，绝不是希望单纯军事上的行动与胜利，但是前敌委员会的指导在政治军事上面做成了极大的错误，仍然是继续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属于政治上的错误，就是没有明显的土地革命及工农贫民政权的政纲，不坚决的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而徘徊于没收二百亩五十亩土地主张之间，实际上只是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属于策略上的就是军行所到之地，对于豪绅资产阶级没有采取屠杀、并摧毁其一切政治社会组织、完全没收其武装的策略，反沿用军阀"不扰民"的观念，枪毙了乘机抢掠的贫民；再则没有实行没收豪绅财产以解决财政问题，却想用旧式军阀经过豪绅筹款的办法以剥削贫民和劳动民众。属于军事上的就是拘泥于原在武汉预定的军事保守政策，不走农民运动较有基础的赣西直入广东的路，而只顾避免敌人攻击，采取农民运动完全没有起来的赣东荒凉道路；在瑞金、会昌战胜敌军之后，复不直往南下进取梅县，惟恐伤兵辎重运输之困难，而折回走上杭汀州绕道取潮汕，使敌人从容布置以致完全失败；再则从暴动开始一直到潮汕失败，始终幻想与张发奎妥协，甚至写信与张发奎联络，委任小军阀的杂色军队在南昌暴动的后路，而对于不稳的蔡廷楷部队不敢采取非常手段，以致中途叛变，使我们军队受很大的影响与打击。这种指导上的错误，徒使我们军人同志在南昌、瑞金、会昌、汤坑、三河坝诸役很勇敢而决无退却的牺牲了三百多、兵士群众亦极勇敢的蒙了很大的损失，而结果仍不免于失败。此种错误的根本原因，乃在前委因袭着军事投机的遗毒，不信赖群众力量，没有发动农民创造真正工农民众政权的决心，完全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违背中央政策的行动。

（B）南方局广东省委对于农民暴动指导也做成了严重的错误。当南昌暴动军队向广东发动的时候，广东党部应即鼓动农民在土地革命政纲之下起来暴动，实行夺取政权，不容有丝毫的犹豫与等待。但是广东省委的指导仍然是动摇不坚定，表示不信赖群

众能作暴动的主力，重要错误就是：（一）政纲口号上拘泥规定五十亩以下不没收，另提减租百分之三十的口号；（二）战术上农军只取侧面攻击——仅仅作帮助贺叶牵制敌人之计，而没有号召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夺取政权和土地，因而没有猛烈搏击的战术；（三）根本上没有发动农民群众，完全靠已组织好的农军势力行动——或为纯粹军事行动，而不是农民群众的暴动，南方局反而只注意介绍小军阀的杂色部队与前委，只注重于军事上的牵制；（四）地域上海南高雷虽起，而无关大局，西江方面简直只接洽有枪的零星部队（农军或土匪），没有到群众中去号召，因此这地始终没有暴动，黄绍雄部队遂得安然渡过，东江农运除普宁五华海陆丰外都极其涣散无组织，党更失其指导作用，以致叶贺军队到达潮属后，农民暴动转反停顿而不能扩大；（五）既没有把广东农民运动做主力，又根本没有发动群众，所以使群众之中发生等待叶贺的心理，自然一般农民自己没有深切知道自己起来夺取政权——这是政治宣传的大错误。

（C）湖南省委对于农民暴动的指导更是完全违背中央策略。中央屡次指出湖南暴动应以农民群众为其主力，并且向省委书记彭公达同志当面警告其军事投机的错误，要省委改正此错误，把暴动主力建筑在农民群众上面，遵照中央两湖秋暴计划切实准备，当时经过反复辩论，结果彭公达同志虽勉强接受，但省委的指导仍然没有改变旧的军事投机的错误：（一）公达违背中央的指示，把暴动看做一种单纯的军事行动，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以致暴动开始除安源的工人很勇敢的参加斗争外，各地农民群众实在没有一点行动；（二）在暴动区域以内完全没有提出土地革命和政权的具体政纲，以致农民只以为是共产党捣乱，甚至省委怀疑农民应需要土地，反对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三）在工农军所经区域以内没有执行屠杀土豪劣绅的策略，以致农民视若客军过境。因这些指导上的错误与怀疑的结果，湖南农民暴动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

（D）鄂北暴动，中央在八七会议后便指定特别委员会前往发动指导，孰意特委至鄂北，对于农民群众反抗赋税钱粮、反抗军阀情绪不加重视作发动之指导，反转轻视民众力量，坐待张兆丰军队之到来。及张军被解决，又拟令张往联络农民反对樊钟秀、以图军事投机之尝试，这都是根本上与中央的策略和付托的使命相反。鄂南暴动已经引起广大农民群众的行动，湖北省委与鄂南行动委员会决定会攻蒲圻城的战略，但行委恐农民武装缺少，战斗力量薄弱，而临时决定停止攻城，以至溃散，这也是充分表现不信赖群众力量临阵退却的错误！

（4）除上列暴动区域党部指导机关犯了严重的错误以外，王若飞同志未经过省委指导上海国民党市党部以内工作同志组织革命同志会，欢迎来沪投降蒋介石的汪精卫，亦属组织上与政治上的极大错误。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同志，在汉口时因为怕环境险恶，不执行中央分配之工作，私自逃出汉口，显然违反党纪。

（5）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上列执行错误政策之党部执行机关及负责同志．决定下列的处罚：

（一）谭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会后当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一直到南昌暴动前后的行动与主张，完全反对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动更多离开党而自由行动，最著者如当今年七月武汉国民党及政府开始排共之际，曾秘密与邓演达等联络主张取消中国CP而另组织第三党，并向知识分子同志中作反对中央、另组织第三党之宣传，同时忽视党的决

议，不得中央许可私向汪精卫请假，在请假呈请书内复大骂农运之棘手；与汪精卫代表陈春圃谈话，更大骂本党中央及农运；最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其赴莫，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发展其个人行动，在九江因为他和贺龙谈话之投机和贺可反张，便在负责同志会议中，鼓动不管中央不管党而自干的反党空气，至南昌仍继续其第三党的宣传；在同志中在国民党员中、其后在革命委员会中更多先做而后通知或径不通知前委的举动，其于屠杀豪绅和没收等政策，亦时防碍其行动：这些表示都是违背本党组织的行动，应即开除党籍。

（二）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摇动。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三）这次前委指导做出极大的错误，前委全体同志应予以警告。

（四）徐光英同志在汕任公安局长时，取缔工人擅自逮捕并杀乘机抢劫贫民三人，应处以留党察看一年之处分。

（五）南方局广东省委指导农民暴动的错误，在于不了解土地问题策略的口号，不发动群众而只有军事行动，应全体予以警告。

（六）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消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七）鄂北特别委员会，违反中央命令，应予全体警告，陆沉为特委书记，其主张更多军事投机心理，根本不做农民运动工作，应开除其中央委员资格。

（八）鄂南行动委员会傅□□同志，应留党察看半年。

（九）王若飞同志因指导党团工作的错误，应予警告。

（十）杨匏安同志应开除中央监察委员资格。

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1）组织任务之重要——最近的革命的斗争之中，组织问题更加占了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布尔塞维克化，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之革命化，都是当前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在于他的组织，全在于他有革命的阶级的组织，尤其是对于工人阶级的先锋——共产党。共产党应当有布尔塞维克的组织。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成为群众的力量，决不能尽他在工农革命里的领袖及领导者的历史使命。最近劳动民众革命运动所受的历次失败，就是我们本党所受的历次失败，很明显的暴露出革命营垒里组织上的弱点和缺点。这许多弱点和缺点，不仅是表现本党在组织上乃能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奋斗，而且党员的本身在有些地方（如湖北）当反动势力比较严重的时候，便公开的脱党，以至为敌人当侦探；有些地方整个的党的组织甚至根本瓦解。同时本党自从放弃机会主义之后，虽然在极反动的政局之下屡次遭着失败，但是工农群众对于本党的信仰大增，尤其工人同志的积极，大增长起来，提拔工人同志负指导职任的工作，虽然还很不充分，可是已经使党日益健全起来，可见本党组织的健全与发展，只有在反机会主义的政策及组织原则之下更加努力，更加切实执行新的方针，战胜这些缺点和弱点，便是中国共产党现时第一等主要的任务。

（2）党的组织之大弱点——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一，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一个政治派别，形成一个政党，还在中国无产阶级没有自觉的成为一个阶级的时候，还在工农阶级运动初具雏形的时期。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中，资产阶级曾占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界，这种情形影响到中国被压迫民众之阶级自觉，及阶级斗争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去时期之中，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最主要的、最激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渗入了我们的党。这种成份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干部。工人贫农群众的加入共产党固然随着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发展而日益众多，但这已经是比较迟的一时期里的现象，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作用，竟留在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手中，当时这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仅仅受着最初一时期革命高潮的冲动，并未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锻炼，并不知道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经验，并且是站在工人贫民的阶级斗争之外的，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这种组织成份，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的策源地——这种机会主义一直影响到叶贺军队中党的领导机关的行动。

最近许多正确的彻底革命的党的决议案和方针，如土地问题、农民暴动的策略问题、劳动问题、国民党问题（八七紧急会议及其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议），往往在各地并不执行，谬解而成机会主义的实际行动，这是因为实行这些决议的分子，仍旧是那些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代表的旧干部。八七紧急会议就已经指出：党的下层群众是行动的革命的，党的指导干部却是机会主义的，这种情形便是党内有两种不同的社会成份，因而有两种不同的阶级政策之反映。只有小部分党的干部，团结在党的中央之下的，能够坚决的抛弃小资产阶级式的观点，抛弃机会主义的方法及犹豫动摇的政策，以及其他种种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特性，——必须全党都经过如此的改造，才能锻炼出彻底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布尔塞维克的党。

过去各省委在组织上更加犯了不集体化的毛病，各部处理各部的事务不是太专门化了，但是干预到党的整个行动，如工农部不经过党的组织系统而直接派人往各工会各县担任党的工作，军事部因有其离开组织部一贯的组织系统，致使各地党部时有工党、农党、军党之称，今后这种组织上的错误，中央必须负责纠正！务使这种各省党的各部的分裂的活动完全打消，并建立党的民主集权制，使一切工作都集体化于省委委员会及其常委中。

（3）党的改造之重任——因此而得的结论，自然便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之干部。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一切非工农的分子完全不给工作，或者完全开除出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不如此主张，这是要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份占最大多数。支部书记、区委、县委、市委、省委的成份，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员的成份，尤其是农民中党的工作员的成份，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工会机关的干部，则须全部换成工人。这一改造工作，当然不是一下子可以做成功，但是必须愈快愈好，应当开始建立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制度，去切实这一改造工作。同时从最底支部起，提出工农分子，使担负实际指导的工作，各省在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以前，要开各省党部代表大会，或者省委扩大会议，在这个过程中，彻底新造各级党的指导机关。尤其重要的是：各地群众党部的工作，譬如组织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军事部，要由最靠得住最坚决的工人同志担负，在乡村中呢——由贫农同志担负。工会中的指导干部，也要立刻换工人分子。总之，最主要的要使党成为斗争的组织，要使一切斗争都变成为党的集体指导，以消灭个人的英雄式的领袖和指导之弊病。至于一般党员的思想与行动，党的组织的责任，便是要监督与训练他们团结与熔化在八七紧急会议以来中央的政策指导之下，洗刷一切旧有的机会主义的遗毒。

（4）党的基本组织与民主主义化——党的组织上的第二个弱点，便是许多大工厂大商店尤其是乡村和军队之中，至今几没有党的支部。乡村之中，严格的说起来简直没有党的组织，各地乡村中，至多只有特派员或者隧少的知识分子的党部委员会，他们之下并无支部，甚至并无党员。农民运动的经验中，已经可以看出：没有先进的贫民分子所团结而成的党的组织，本党便很难指导农民斗争，或者简直没有指导的可能，至于农民暴动便成了完全自然爆发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最近各地农民暴动军比较的抗御力很弱，农民暴动的持久性比较的少，大半就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政党没有能在农民之中实行“群众之组织者”的作用。而农民广泛的群众组织，完全要靠党在乡村之中有扩大的支部组织，网罗全境，结合乡村贫民及苦力中最坚决最革命的分子。再则在军队之中没有

支部（兵士党员），也就是军阀能够很容易的调动军队镇压屠杀工农暴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党对于拆散军阀军队的工作，如果没有在军队中的支部去团结革命的兵士和下级官长，那么，简直是不可能的。当然，主要的还有在大工厂大商店之中建立并巩固党的支部工作。学校中的支部当然也要注意。总之，支部工作在党的组织现状之下，占极重要的位置，过去因为支部工作不好，以至本党不能在群众中起广大的作用，而党员之散漫，党的政策不能深入群众，甚至不能深入党内群众，都由此而生。今后须特别注重支部工作，经过支部起群众的作用，至于支部的经常组织工作如按期开会等要严格的执行，这些都是树立党的基本组织的工作。再则全体党员应严格的执行交纳党费的义务，党费以有收入者为标准，各级党部都要按月计算党员的实数，要做到依党费核算党员的数目。

现在很严重的秘密时期，固然不能实现完完全全的党内民主主义（党部机关自下至上全属选举，重要问题由全党党员讨论等等），但是就是在这种严重条件之下，引进党的下层群众，使他们参加党的一切工作与政策的决定，仍旧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比以前更加百倍的努力去实行。并且要使尽可能的支部书记由党员群众选举的办法，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支部，此等区域更须进一步尽可能的实行区委由各支部选举的办法。

（5）工会的组织问题——组织广大的无党工人群众于革命的阶级的工会之中的工作，也有非常之大的缺点。革命的工会现在只有很不健全的很薄弱的革命的机关，而没有工会会员。只在很少的几个工厂之中，有些工会现在的下层组织，如半公开或秘密的工厂委员会，至于一般而论，差不多完全没有工会会员的群众。其实组织工人，尤其是无党工人，却是工会的主要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工会中工作的党员，应当认清自己的主要任务便是吸引各个工人到工会里去，组织工人群众使各厂都有工会的组织，使工会成为群众的组织，必须使极广大的先进的工人，党外的工人，各个的加入工会做会员，必需每月的统计工会会员的实数，按时收工会的会费（宁可定到极少的会费），必须在各工会中实行发给会证，必须在下级工会机关（工厂委员会）除共产党员以外加入无党的工人，绝对要避免党代工会的形式，因而不发展工会会员的流弊，党应当建立工会独立的组织系统，使支部在工人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吸引广大的非党的群众加入工会。

（6）农民的组织问题——乡村之中，党的支部应当是很秘密的，除党的支部以外，必须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于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组织之中，这些农民协会在革命的高潮时，劳动者夺得政权，就要变成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

（7）党与青年团的关系——党与青年团差不多完全不发生关系，这亦是组织上非常之大的缺点，必须在最近期间改正。党与团的支部、区委、县委或市委、省委——必须互相发生密切的关系，互派代表。党部的各级委员会必须定期的听团的工作报告，而给他们以指示。党应当对于团给以经常的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

（8）党与反动团体——从前党曾经派遣党员到我们阶级仇敌的组织之中（如黄色工会、工贼工会、国民党党部等等）去做侦探的工作，但是经验上所得的结果，大半是很坏的。因此，如今在一般的通例上决定抛弃这种政策，除非有非常之大的必要和意义，才可以偶尔使用这种方法，而且所派遣的党员必须是确实可靠而忠实于共产主义的同志。

（9）党的组织与纪律——严格的整饬纪律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实在是党的工作成效之最必须的条件之一，对于违背组织上政治上的纪律的分子，必定要严厉的处分。秘密组织的规律，不容任何轻忽而破坏，秘密机关的地址，绝对只准在工作上必须知道的党员知道。保存秘密文件的数量应当减到最少限度，绝对不容保存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单。通信上必须用密码的方法。各级党部的常务委员会，不得超过五人至七人。五人以上及两点钟以上的集会，非极端的必需不得举行，凡是稍稍破坏党的秘密组织纪律的，立刻应当停止他的工作，或者简直开除党籍。

（10）发展党员的数量问题——党员的数量自从国民党反动以后有极大的减少，从五万余党员减至万余党员，这虽然一方面证明过去吸收党员与训练党员的方法错误，但欲使本党新的策略深入群众，党的组织重要责任之一便是吸收新的工农兵士革命分子入党，必须多吸收新的工农兵士革命分子扩大党的力量，然后本党才能担负新的使命。

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

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前公布土地问题党纲草案，各级党部及一般同志都可以：

一、参加讨论这一草案；

二、搜集当地的土地问题材料；

三、提出书面的增改意见；

四、以及一切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或分析的意见。

这些意见和材料应当临时寄来中央，在党报上公开讨论。这一草案及增加的意见，应当提出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作最终之决定。

附　　件

一、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

（本草案为立夫同志所拟，要大家公开讨论，以待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作最后的决定。同志等如有意见，修改或增补，理论分析之改正，或者自己另提一整个草案，都可以在本报刊布。）.

绪　　言

中国共产党认清：中国乡村之中，地主豪绅富农的成份不在少数，他们依据自己的暴力机关（民团、团防、商团、军阀的军队，以及他们所勾结收买的土匪），他们依据帝国主义的助力，对于土地制度革命的变革，竭全力以抗御。

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农民最剧烈的阶级斗争，能够消灭劳动民众敌人的经济政治上的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用最“民众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才能完成土地革命，才能真正实行革命的变革土地制度，组织乡村中的农民代表会议政权，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府。

在这一斗争之中，苦力和雇农将要有很重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坚决的反对并驳斥

一切蔑视雇农苦力之反革命的理论（如谓农民运动不应是“流氓地痞”的运动等等），而且要努力去组织苦力雇农于阶级的组织之中，引进他们代表参加革命政权之指导机关。同时，中国共产党要尽力吸引乡村中的中农分子，使他们站到贫民方面来，这些中农也是要推翻旧制度的。

中国共产党认清这一斗争是非常之艰巨的，但是，同时要指出：广东、湖北、湖南的农民，已经在本党指导之下实行许多次英勇的武装暴动，这种情形证明在好些省份之中，已经形成了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共产党要组织农民于农民协会等类的战斗的组织之中，竭全力以赞助农民的一切斗争，宣传以城乡劳动民众武装暴动而建立苏维埃政府之主张，并且在群众运动相当的阶段上进而组织苏维埃。中国共产党认明：农民之中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速的消灭，国民党欺骗民众的什么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减低利息到年利百分之二十等的主张，无论甚么地方也不能实行，即使实行也决不能解决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要坚决的反对国民党欺骗民众的政策。

各省红枪会等类农民组织的发现，以及这种组织的奋起斗争，也就证明农民了解武装斗争之必要。中国共产党要努力去肃清这些组织之中的反动分子，肃清农民意识里的反动遗毒，努力去改变这种组织，使成为真正阶级的组织，能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共产党员应当到这种组织之中去进行适当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要组织农民，实行同盟抗租罢税、不还债、拒用无价纸币和军用票等类的纸券，并且要竭全力去赞助这种斗争。

中国共产党组织农民群众反对军阀战争的斗争，并且赞助农民自发的这种斗争，反对军阀的征发拉夫派粮等等。中国共产党在每一次这种斗争之中，宣传农民武装暴动以反抗农民之阶级仇敌的必要。

（一）

中国的农业经济与土地关系，不但和现代资本主义的欧美不同，并且和欧洲中世纪时代（资本主义前期）的土地关系也不同。这种差异的最重要的前提，实在就是中国生产之自然界的环境与中国历史发展之特殊条件。中国农业生产的方法上，有许多特点，使农村经济呈特殊的状态，这些特点就是：自觉的整顿水利之重要（必须人工灌溉），多量的调剂水旱器械与建筑之必需，中国本部之主要区域没有畜牧事业，农村经济中用以耕种的牲畜比较的少，多量的肥料之需要，绝对没有停耕若干时间以与地休闲之办法，必须耗费多量的徒手劳动。如此的农业生产方法，再加上商业重利资本的早期发展，防御游牧民族侵犯及水灾必须巨大的工程（如长城运河黄河河工堤工等），应付天灾又须有种种救济组织，对于游牧民族要能征服他们，强迫他们，强迫他们变成农业民族，这些情形综合起来，便造成中国这样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马克思列宁所称为“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制度。中国如此之多的小农经济，实际上不相关连，可是中国很早便有貌似统一的国家政权，这种国家政权的物质基础之一，便是人工灌溉。中国官僚制度的作用向来非常之大，这个原因便在于此。中国的官僚不但是地主和商业重利资本利益之政治上的代表，他们并且就是直接实行重利盘剥和大商业的本人。诸侯制度的采邑以及阀阅专有土地的制度（如贵族阀专有土地之制度）之在中国，已经很早就根本崩

崩坏了（秦始皇之后，约当基督纪元前三世纪）。此后经过很长期的无政府状态，经过非常残酷的阶级战斗，然后最终的形成所谓亚洲式的生产方法。中国的国家便从细小的许多诸侯采邑变成亚洲式的专制政权，有极发达的官僚制度。农业与农民的家庭工业（纺织等）相联结，又使亚洲式的生产方法有很大的内部稳定的状态。商业重利资本，对于资本主义前期的地方市场，互相关联很薄弱的地方市场，有极大威权。诸侯采邑阀阅式的土地制度崩坏之后，中国的土地关系经过许多种的变更，都是由于种种历史形势而来的，或者征服其他民族，或者受外来的影响，或者经过很大的民众运动，各地市场关系之扩大或缩小等等，可是农业劳动的方法，根本是没有变更的。中国农村生活的特点是：人工灌溉有能决定一切的重要意义，官僚的作用非常之大，官僚和土地私有制及商业重利资本有密切的关联，欧洲中世纪所未有的地主与商业重利资本大规模的剥削农民，土地使用时分割得非常之琐碎细小（同时，并不妨害土地所有权的集中），资本主义前期式的地方市场对于农民经济有相当巨大的威权。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发展全国的生产力，农业技术的进于更高的阶段，在现时都阻碍于这旧社会制度的遗毒。

（二）

中国各省的土地关系并非一致相同的。本党各地党部应当细心研究各该省的土地关系，必须估计到各地的特殊情形，要收集各地的经验，适应各该区域特别的情形，而实行党纲及政治命令。南方各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绝对无疑义的是佃农及半佃农（粤、桂、鄂、湘、闽、浙等）。北方有几省农村中的中心人物都是自耕农（晋、直）。殖民地域的土地关系又有特殊的情形（吉林、黑龙江等）。中国共产党认为必须宣言承认内蒙古民族有自决的权利，一直到分立国家，并且要极力赞助内蒙国民革命党力争自决的斗争。对于回族地域，本党也应估计当地特殊的土地关系。中国有几省还有土著的苗、黎等等，本党应当努力奋斗，消灭对于这些土著民族之一切种种方式的剥削，而赞助他们进于更高的文化程度。

（三）

农民分做三种：一、佃农，二、自耕农，三、半佃农。三种农民之中，都有贫农、小农、中农与富裕农民的区别。分辨农民中的这些种类，在农业生产方法的条件上，必须不仅以生产范围（耕地亩数之多寡）为标准。水田旱田，田地之肥瘠，每年收获次数等，都要估计到。各地农民之中，在中国本部最大多数是贫农和小农，贫农和小农都是每年收入不够维持最小限度的一家生活的（这些农民在各省之中有的占百分之五十，有的占到百分之八十，以省份而不同的），富裕的农民只是农村中的一小部分，可是重利盘剥，剥削雇佣劳动，出租耕牛及农具，强租贫民田地，或者将自耕所余田亩出租，兼营农业、商业或农村副业，与乡绅及官署有交往联络；这些事实，富裕些的农民都可以做的；因此，富农虽少，而他们在农村之中却比较的有些势力，当然他们的势力比地主商贾重利盘剥者的势力要小得多。

中国阀阅制度（贵族）很早就消灭，族长制度有很大的影响，地主家族里的分家，

使田地分割，现时更有地价高涨的情形，农村中的资本流入城市商业，变成重利盘剥的资本；这些情形使地主阶级之中的中心人物并非大地主，却是中小地主。中小地主的贪狠，他们对于佃农剥削的残酷，并不让于大地主，甚至于有过之无不及。表面上宗法社会的旧俗，不能使佃农的地位比较好些，反而更加坏些。除地主、商贾、一部分富农、重利盘剥者之外，中国农村中的剥削者，还有土豪乡绅也有同等的重要。乡绅虽然常是有田地的，兼营商业和重利盘剥的，或者做官的，但是一般而论，他们是多余的知识分子，专靠农民的余剩生产品而生存，他们用租税课捐的方法，有时简直用强迫贡献的方法，榨取农民的余剩生产品。他们是官署与农民生产者的中介人。土豪和民团一样，亦是压迫农村劳动平民的寄生虫的暴力机关，这些寄生虫是反动势力在乡村中最靠得住的根基。

荒地沙田等官产，都被治者阶级所霸占。祠田族田庙田等的收入，都是乡绅所榨取。地主商贾乡绅所办的公司，或者各个军阀乡绅重利盘剥者，都能以极贱的价钱收买屯垦的官地。治者阶级霸占官地，以及侵吞祠族庙宇田产的收入，更加增加他们的权力。

（四）

中国的租佃制度有特殊的情形：分租大半是用谷物，并且大半的习俗是佃农有永佃权的。租佃制度，一般而论，都没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地主的对手方，极大多数并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租户，因投资于农业有承租地亩的；地主的对手方，都是穷饿的农民，租田耕种以求生的。只有沿海几省（粤、苏、浙）接近大都市的地方，有极少数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租户。地主对于佃农无限制的剥削，一般而论，都已经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地主不但将“绝对地租”与“收益地租”以及水田灌溉设备中所放资本的利息都拿了去，并且连佃农所耗费于田地的成本上的利息也拿了去（此处所有名词都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经济名称），不但如此，甚至于将佃农生产者及其家族所应得的工资之一部分，也拿了去；如此情形，自然使佃农的收入，往往低于他们维持生活之最小限度的数目。但是，除出这种习惯上旧式的剥削方式以外，新式的租佃关系也在发展起来。地主竭力在设法使永佃权变成定期的租佃制度，而且力求其为短期的租佃。旧式以谷物交租的方法，以及每年看收成交租的习惯，都渐渐的变成新的方法，铁租（每年不论丰歉，佃农须交一定的租额）的办法已经很广泛。押租（佃农预先交纳一定的押金方得租种田地）的办法，也在实行起来。这些新方法之外，旧时的剥削方法仍旧保存着。佃农一定要替地主做工，所得报酬非常之少；佃农一定要替地主送礼，有种种奇怪的名目，还需请地主或收租人吃喝等等。佃农欠债之后，便要替地主当奴隶（广东、山东），卖男卖女还欠租，不能还租的佃农须要坐监牢（广东、浙江等省）。土豪民团可以任意毒刑拷打佃农，或者是因为不能交租，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如此之类的剥削方法非常之多。

尤其在中国中部各省（江、浙、皖、赣等），租佃关系之中有所谓“共有田地”；地主有田底，佃农有田面。这种情形大半由重利盘剥而来的，或者是由于佃农代垦地主荒地而来的。中国永佃权的存在以及“共有田地”的制度，很明显的证明中国农村之中

并非资产阶级式的私有制度占优势。直到最近，地主方才开始用全力夺取那种“共有田地”的所有权，要想使旧式的“共有田地”，变成完全地主所有的田地。

地主竭力要想取消有碍于剥削的旧式的永佃权及收租时的旧习惯（荒年照例减租，每年只收一次收获的租，贫民可以自由捡拾稻场上遗落的稻梗等等）；地主要想变更旧式的土地所有制度，使成为比较现代式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度。然而农民的倾向，却是要使地主的土地，变成农民所有。

（五）

贫农小农甚至中农所有的土地，仅仅是形式上的所有权罢了，形式上享有这些田地的生产资料罢了；其实治者阶级用课税贸易诳骗种种方法，不但将“佃租”收去，并且收地价的利益之极大部分，甚至于将农民生产者及其家族所应得的工资之极大部分，都收取了去。自耕农占多数的省份，现在也在自耕农迅速的变成佃农的过程之中（山西、河南），赋税的压迫，经常不断的军用征收，根本破毁农民的经济。军阀的战争，匪乱的蔓延，商业交通的停滞，往往造成地价暂时低落的局面。地主军阀官僚商贾豪绅得以大批的收买田地，使自耕农变成佃农。时常不断的灾荒（直隶、山西、山东），预征钱粮，每年勒捐数次，更使重利盘剥的现象加增。重利盘剥者强逼农民将田地零星的抵押，农村中的治者阶级用种种方法掠夺农民的所有权。自耕的农民变成佃农。

（六）

水利的利用上，也有极剧烈的阶级斗争，地主竭力抢夺灌溉水利的支配权。商人的公司或豪绅地主的公司往往掠取河流溪沼，而使农民付钱买水。农民方面，自己也知道各个小农经济没有能力改良水利，开辟水源，甚至于不能保存原有的天然水利（水利是农民生产的最重要的前提），于是他们总是想望国家政府来解决这一问题，农民可以深切的明了：只有劳动者的政府能够实行改良人工灌溉的方法，应用新发明的技术。

农村之中金钱货币的势力日益增加，于是重利盘剥者的威权也就扩大。农民之中最贫苦的分子（占全省人口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以各省而不同），甚至于连维持生活之最小限度的资财也没有。天灾战祸，因而不断的破产失业，还要履行种种旧习惯中糜费的礼节（娘丧赶节等等），都使农民不得不向重利盘剥者借钱。借钱的利息，从月利二分到十分。重利盘剥之中还有一种借贷谷物的办法，这种办法的残酷更是无以复加，简直是公开的掠夺农民。收获前借一石谷，收获后便须还一石半，甚至二石谷。收获前几个月借的债，收获后即须照全年付利还本。荒年天灾的时候，重利盘剥甚至于可以剥削到几个几十个的村庄，剥削到全体的农民。

军阀的统治根本破坏农民的经济：他们的重税杂捐、军事征用、派车封船、派粮、拉夫、拉马匹等等，完全是破坏农民经济的。地主还要转嫁一部分赋税杂捐到佃农身上，以及一般农民身上，这种税捐一年之中收到两三次，甚至于六次。厘金杂捐式的关卡无限的增加，商人所受的榨取，也转嫁到农民身上，转出时，商人因为估计所负捐税，而更加抑低收买原料的价钱，如此转嫁税捐到生产者身上；输入时，又如此的转嫁

到消费者身上。军阀制度之下，以前征收赋税的旧习惯与相当的限度，完全消灭了；中国贫苦农民所负租税，远过于普鲁士或美国的农民。巨商地主与官署勾结，并且有些权势，反而可以比贫民少担负些。地方税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日益增多。再则，农村的破产使匪乱日甚，匪乱的蔓延又使农村破产更甚。

帝国主义对于农民经济市场的权威，也更加厉害更加深入。外国工厂生产品的输入，机器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式的家庭工业（纺织豆油等）受着非常之大的打击。同时，农业与家庭工业相联合的中国旧经济基础，根本破坏，其崩坏的速度，比工业的发展快得多，农村中多余的劳动者因此没有地方可以吸收，所以极大多数的失业群众到城里当苦力，变成土匪，流入军阀的军队，南方各省的人便到安南、暹罗、南洋群岛，北方各省的人便到满洲、蒙古去。

帝国主义的侵入，使农业中各种种植的分配，大有变动。例如茶的出产，因为印度、爪哇资本主义式的茶叶大农场竞争的力量很大，日本茶业生产的组织也比较的好，中国自身则厘金杂捐日多，所以中国茶叶生产大受破败的影响。种蔗的生产也是如此，爪哇、台湾等处蔗业大农场之竞争，外国糖的输入，都使中国蔗业生产衰落。

欧洲化学工业的发展，破坏了中国土靛的生产。帝国主义的侵凌，以及中国本国纱厂丝厂的发达，使国内植棉种桑的地亩大增，然而欧战之后，中国棉业受着美棉印棉的竞争，小农的棉场自然抵敌不过——中国小农还受着重利盘剥者的压迫呢。中国重利盘剥的资本家本来正在努力侵入与工商业有关的农业之中来。制油植物的种植也大大的发展；但是与植物油（豆油、菜油、桐油、花生油等）及豆类菜类同时输出的本来还有一种肥田用的重要物品——豆饼，满洲方面输出于日本的，就有大批豆饼。同时，种植鸦片及烟叶的地方也多起来。英国帝国主义用枪炮强迫输入鸦片于中国，完全是为着赚钱。现在军阀便强逼农民种鸦片，以便他们抽收鸦片税。稻田多变成鸦片烟叶等的田。水利不整顿，灌溉的设备破坏，于是农民往往不能不将稻田改种番薯（马铃薯），贫民的食料一天一天变得更坏了。

商业却日益扩大起来，但是尽在旧式的商业方法的范围之内。贫农和小农不得不在收获之后立刻出卖谷物，简直不暇顾及市价如何，他们只能照村中最低的价格出售，因为急于要付田租赋税、债息。等到第二收获以前，他们早已完全用尽了，只得出很高的价钱去买米、借米吃。商业重利资本将与工业有关系的农产品（丝、棉、茶、豆、烟、靛等）完全握入自己掌握之中，他们用极低的价格向农民生产者收买这些农产品。农民中最贫苦的分子受着市场的一切痛苦，而不能得着市场的丝毫好处，至多也只能得着很少很少的好处。与工商业有关的农产品之极大部分的利益，是国外贸易的输出商（外商洋行）所得的，是中国商业重利资本所得的。乡村中的货物流入城市不能得相等的代价，中国的货物流出国外，又不能得相等的代价。

这一过程，因为帝国主义霸占铁路内河及沿海的航路，造成扩大商业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于是更加厉害。外国财政资本引起中国的采取工业（煤、铁等矿），后来又发生几种制消费用品的工业（如纱织、烟厂、榨油、食物制造、酿酒等）。农村中剥削所榨取出来的资本，投入运输业商业，亦有些投入工业。

但是，同时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协定关税，国内市场容量的有限，军阀统治，货币制度的不统一，财政机关的混乱，商业重利资本的优势等等，都阻碍工业的发展；

频数的经济恐慌使资本溢出生产范围而停滞，甚至于商业之中也不周转，于是这些资本及城市中一般积蓄的钱财转而购买田地及经营重利盘剥，于是小地主的数量增多而农民之佃农化的过程更加急。

帝国主义利用银价的低落掠夺全中国。中国的银行家巨商及重利盘剥者受着了这种损失，便转嫁给农民生产者。同时，在欧战之前便开始一种过程：农村中及城市贫民中最流通的货币（铜元）之价格，日益低落，欧战之后这一过程继续的厉害起来，铜元的购买力，因为军阀政府的滥铸，而日益低落。再则，军阀政府发出许多纸币、军用票、国库券等等，这种东西过不了几天便不值钱了，使农民及城市贫民受巨大的损失。银行公司及单个的商贾，也各自发行纸币剥削农民。中国经济日益成为货币经济，然而乡村城市中流行的货币，仍旧带着资本主义前期的货币之种种特质。

中国农村中绝无田地的农民有极重要的意义：苦力、雇工、船夫、渔夫等，做搬运夫的苦力有好几百万，土木作及其他农业工作的苦力也不少。这一阶级是中国工业无产阶级的始祖、恩格思所称谓“前无产阶级”的，他们受着最残酷的剥削。他们往往几星期几个月找不着工作做，所以他们的境遇更加苦。

农民的失地和农民家庭工业的崩败，尤其主要的是田地的零星分割（贫农小农所耕田地非常之琐小），都使苦力农场工人的数量增加。中国条件之中，播种灌溉插秧等工作时，甚至于小农都不能不添请别人帮助。富农等便可以雇用长工。有些地方，地主给农具、种子、牲畜，叫雇农替他耕种，收获之后，雇农只得极小的一部分，或者很少的工资。这种农民，中国亦称谓佃农，其实已经是雇农。他们的地位很象半奴隶的农奴，却不象现代的农业无产阶级。按日计算的雇农，或者按期雇定的雇农，一到田忙过了之后，便无从找着工作。

对于农村的剥削，最近还有些新的方式发生，旧式的家庭工业，如缫丝等，现在固然已经崩败澌灭；同时，却发生新式的家庭工业，为领取资本家的原料而在家织布、制花边、绣花、制草绠、制帽、制伞、制中国旧货的估衣等，……这些新式家庭工业，大概有商店定制包销，对于农民，尤其是农妇的剥削非常之厉害，他们所得工资简直不能养活。

中国卷入国际贸易的漩涡之中，帝国主义攫得中国经济的最高权，中国劳动民众受帝国主义者与中国地主官僚商业重利资本联合的统治，交通与工业之中资本主义的原素增加，旧国家的崩坏，军阀制度的发展，凡此一切对于旧式生产方法给了非常之巨大的打击，根本上使他崩毁。然而同时要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却有许多困难与阻碍：一方面帝国主义阻碍中国的发展，别方面地主及商业重利资本依靠着帝国主义及旧官僚机关与军队的权力也阻碍中国的发展。帝国主义利用剥削中国劳动民众的旧方法去剥削全中国，中国的治者阶级又在竭力巩固剥削民众的旧方法，还要运用剥削民众的新方法，以稳固自己的威权和地位。所有这些情形结合起来，便形成中国农业的一般的衰落，收获减少，旧时的水利设备破坏，天灾频数，水旱饥荒相继，农村破产，土匪蜂起已成一般的现象，重利盘剥的加重与扩大。阶级斗争便在如此的背景上急遽起来。

旧社会制度崩溃下来，澌灭下来，而过渡于新的生产方法便只有两条路：资本主义的与非资本主义的。

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之中造成巨大的生产机关，应用极新的技术，列强竭全

力以互争世界市场，互争销售货物与搜取原料的场所，财政资本运用极新式极巨大的军事技术机关及海陆军以争夺市场，以征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如此的时期之中，帝国主义剥削与新旧军阀压迫之下的中国，只能够非常痛苦迟滞的发展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而且必须外国资本输入中国的速度大大的增加。资本主义的道路对于中国，就是几千百万农民苦力之死亡，几百万女工童工在工厂之中磨折惨死，流血的掠夺的战争（如此的混战局面之下，军事上简直不用甚么技术器械相斗，而只是用几千几万人的性命为牺牲，以相搏战），极巨大的天灾水旱，极残酷的剥削工人，陆续相继的国内战争，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更加侵略，更加要攫取矿山铁路租借地，瓜分势力范围，或者简直是默契的瓜分，很快的几辈工人相继死灭，一般劳动农民的死亡，全国人口的大减少。从崩溃的旧中国社会非常迟滞痛苦的转入新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道路，便有这些不可免的结果。

第二条路——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便是劳动民众反抗中国治者阶级与帝国主义之联盟统治的极艰苦的斗争，以群众的武装斗争统一中国、解放中国，推翻帝国主义，消灭一切剥削制度，除尽一切种种的剥削者，将劳动民众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从地主豪绅重利盘剥者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与全世界革命的工人运动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经过第一期艰苦的斗争之后，运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之辅助，而进于新式技术的生产方法，工业农业大大发展，造成新的习俗，提高一般民众的文化程度，行向劳动平民解放后之光明的将来，自由的劳动，一直到进于自由世界，没有一切阶级的世界——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要联合农民及城市贫民，组织并准备无产阶级的武装斗争，以推翻地主豪绅重利盘剥者及其代表之军阀官僚的政权，而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以实现第二条道路，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认为，要彻底变革中国的土地制度，必须肃清一切崩溃混乱的旧社会关系，所以主张为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起见，必须实行下列的办法：

一、一切地主的土地无代价的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

二、一切没收的土地之实际使用权归之于农民。租田制度与押田制度完全废除，耕者有其田。

三、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是乡村中的革命政权机关，他要按照土地之肥瘠水旱位置而分配土地，使旧时佃农中的富裕者不能变成富农，并使革命军队的战士及无地的农民，能够分到土地耕种。同时，共产党要努力实行革命的土地改良。

四、寺院教会的土地，皇族旗地官地公产等类的土地，一概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此等土地的租田制度，亦一律取消。

五、祠产旗产的土地，一律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共产党要赞助农民去根本消灭这种陈腐恶化的土地制度。

六、官荒沙田湖田等的土地，亦一律归农民代表会议支配；并且要努力设法，使实行垦殖政策时，得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以及工农军的兵士。

七、一切豪绅反革命派的财产完全没收。

八、农民代表会议要筹措基金，保证无产而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寡老病废等）的生活。

九、一切森林矿产完全归苏维埃国家所有，苏维埃国家之中央及地方政府应当设法保护森林，种植森林，并开采矿产。

十、整顿水利、改良灌溉方法之工程，由农民代表会议执行，井泉溪沼等完全归农民使用，农民经过农民代表会议而行使这种权利。

共产党并认改良水利扩大灌溉源流，采用新式技术机器电力等，为自己的重要职任之一。共产党组织并赞助农民之改良灌溉的合作社运动。

十一、共产党要努力设法实行防止水旱工程，建堤导河填筑淤地筑造牧场等等；并实行预防饥荒的设备。

十二、一切苛约重债一概取消。共产党要组织低息的农业借贷，设立农业银行及农民之借贷合作社。

十三、共产党组织并赞助农民之合作社运动：销售农产品及农民之家庭手艺产品，贩卖农民日常的必需品及家庭手艺的原料等。共产党要发展工业而使农民得着廉价的现代新式的农具。禁止贩售肥料的私人垄断，——贩卖肥料归农民的合作社办理。共产党还要实行乡村中筑路修道的建设事业。

十四、军阀政府一切赋税，完全废除，厘金废除，包捐包税的制度废除。革命政权重定单一的统一税制，税收的一部分应当作乡村的公费。一年只在收获后收一次税。确定统一的货币及度量衡的制度。

十五、颁布保护雇农苦力的法律。政府当以发展工业而开办公共事业的种种工程，修筑道路，奖励农村手艺，以保障苦力失业者的工作。

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瞿　秋　白

（一）革命是低落吗？

中国革命经过了三次失败：一、四月十二日蒋介石的反动，二、七月间汪精卫的反动，三、十月初叶贺南征广东的失败。但是，中国革命是否因此而完全失败，完全消沉呢？固然，中国国民革命战线之中，资产阶级几次陆续的退出革命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豪绅地主阶级的反革命势力扩大起来，小资产阶级的上层由动摇犹豫而终归走入反革命，去当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因此，整个儿的国民党，从革命的各阶级联盟变成反革命的官僚政客军阀工贼土豪乡绅的党，所谓清党反共，便是从这革命联盟之中将最革命的力量排除出去，将工农阶级摈弃，所剩的只是一切种种的反革命势力，自然，国民党变成完全反革命的政党。固然，如今是这个反革命党攫取了政权和北方旧军阀分治中国，他们共同一致的屠杀工农摧抑革命，但是革命潮流始终并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涨的。何以呢？革命潮流的低落与消沉，在现时的中国必须有三个条件：一、反革命的统治能相当解决中国社会关系中的严重问题（如土地问题劳资问题等）；二、反革命的统治能够逐渐稳定；三、革命的群众溃散而消沉。如今事实上中国绝对没有这些条件。再则帝国主义虽然利用国民党的反动而逐步进击中国，但是他自身并不能在世界范围之内战胜社会主义的革命，——苏联的国家日益巩固，而且他的社会主义的建设日益发达。帝国主义自相冲突没有能力协助中国反革命的势力稳定他的统治。

如今反革命的统治绝对不能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与民族解放的问题：土地问题上，减租百分之二十五及减低债息至百分之二十，算是国民党的改良政策，实际上丝毫不能实现，——豪绅地主正在当权，他们根本不许农民少交一粒米，少得一个利钱，他们遇见减租运动便动手屠杀农民，至少，他们也要退佃，使佃户根本失业，他们遇见减息运动，至少也要拒绝放债，使贫民根本没有法子度日。劳动问题上，就是极端改良主义的劳动法也不能实现，工人的工作时间正在延长，工资正在减少，生活程度日益低落，全国的财政金融大紊乱，全国绝大多数的工农贫民的革命需要只有更加剧烈起来，阶级斗争已经走到最剧烈的程度，成为公开的武装的斗争。民族解放问题上，关税不能自主，租界不能收回，外国资本的竞争不能遏止。——这都是显然的事实。

如今北方从直隶山东起一直到南方的广东广西止，不论是国民党也好，非国民党也好，是蒋介石派也好，非蒋介石派也好，都在军阀的纠纷冲突混战之中。每省都有若干

派别互相争夺，互相战争。豪绅资产阶级的内部纷争，而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也是显然的事实。

再则，七月间武汉反动之后，武汉的总罢工立刻便起来，九十月间鄂南湘东农民暴动，广东各县的农民暴动，山东直隶河南陕西安徽，无处没有农民暴动；最近，叶贺失败之后，广州工人还是直接起来奋斗，十一月初江苏的农民也暴动起来。暴动的民众一动手便是杀戮豪绅没收土地，他们彻底的感觉到非自己拿着政权不能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一丝一毫，非举起武器来不能取得政权！斗争形式的剧烈到了极点，并不因为受到屡次的大损伤而消沉。这更是很明显的事实。

可见国民党虽然偷取政权而背叛革命，但是他并不能消灭革命。革命仍旧陆续的暴发，革命仍旧继续着。最近半年以来革命虽然受历次的打击，而已是很严重的打击，然而革命的发展仍旧是继续着。事实已经表示得很明白：中国革命是高涨而不是低落，中国革命的高涨而且是无间断的性质，——各地农民暴动的继续暴发以及城市工人中斗争的日益剧烈，显然有汇合而成总暴动的趋势。

（二）国民革命完了吗？

国民党偷取政权而变成反革命的政党，中国工农民众的革命潮流立刻便向着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道路。这是不是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完结了，从此开始了第二次的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呢？不是的。国民党是背叛革命，并未完成国民革命，而且还是取消国民革命已得的胜利，帮助着统治势力的复辟。“第一次”革命并没有完成而是中断，根本上无所谓“第二次”的革命。国民革命的任务，至少应当是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之下，推翻封建式的剥削。如今事实上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立刻投降帝国主义，不但一条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废除，反而将工人所夺回来汉口九江租界都要交还英国；他们立刻造成千百军阀分裂宰割中国的局面，军阀的大混战的局面，中国不但没有统一，而且比以前更加混乱；财政交通不但没有统一整顿，而且比以前更加紊乱，——绝对没有发展自国工业的可能；资本家地主对于工农的剥削更是日益加重，生产状况显然退化，尤其因为豪绅资本家的榨取利钱不能在发展工业方面去图谋，于是他们都只在竭力加重对于土地的剥削，买田买地，加租加税，——半封建式的土地关系不但不能废除，反而更加厉害。中国革命中民族解放及民权主义的任务，丝毫都没有解决，没有实现。因此，可以断然的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并没有完。中国的国民革命的任务，并且必须工人阶级负起全副的责任，联合最彻底的民权革命的伟大力量——中国的农民，来实行。中国的资产阶级根本是懦弱妥协的，他一遇到民众的革命高潮，立刻便转入反革命的营垒。固然，他们想着以为可以用改良的方法，稍稍和缓工农的革命情绪，稍稍哀求帝国主义放松些侵略政策，这样可以避免工农的社会革命，同时还可以给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但是这始终是幻想。中国资产阶级自己本身非常之薄弱，他们对于工人的待遇根本不能实行丝毫的改良，更不能劝豪绅地主改良土地关系，帝国主义也无论如何不能放松侵略政策。而且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工业的不发展，自己大半和土地的剥削相关联，自己大半就剥削农民的重利资本，自身大半要倚靠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所以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与民权主义的任务。只有工人阶级能勇猛的彻底的推翻

中国的旧社会关系，彻底的领导农民消灭地主阶级，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

所以中国革命虽然现在已经是要革国民党的命，已经是工农的革命，然而他的任务仍旧首先便是国民革命——土地革命。彻底的土地革命，本来是民权主义的性质；只有彻底的革命——铲除中国的半封建的土地关系，铲除帝国主义剥削中国几万万农民的一切种种走狗的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这一革命的性质，由他的主要领导者来说，如今更显然是工人阶级（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由他的社会内容来说，却还首先是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

（三）中国革命只是民权主义的吗？

中国革命中民权主义的任务，要在工农反对豪绅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之中，方能实现。可是，即使为着彻底实现土地革命，工人阶级就不能不领导着农民根本推翻中国的资产阶级，——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根本上与剥削农民的豪绅地主相联结相混和。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何况工人阶级自身既是革命的领袖阶级，他便不能不在革命斗争之中，力争自身利益的保障，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最近一年来工人店员力争改善生活状况的斗争，其势不能不一直要求到监督工厂管理，参加管理店务之事实，便是证明；城市之中这种工人的斗争不能胜利，乡村中农民的斗争始终不能超出游击战争的限度而得到巩固的胜利，乃因为单是农民暴动而没有暴动的城市做他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权力。中国革命要彻底推翻旧社会关系（半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社会关系），也就不能不超越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的范围。所以中国当前的革命，显然是由解决民权主义任务急转直下到社会主义的革命。何况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胜利了已经十年，全世界是资本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相对峙的形势。中国革命势必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相联结，而在中国开辟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国革命是由民权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恰好是马克思主义所称为由民权主义生长而成社会主义的最明显的实行。中国革命根本上不能在民权主义的阶段上再成一个段落，像法国大革命似的；中国只有一个革命：中国革命除非不胜利，要胜利便是工人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获得政权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

总之，中国革命，不论是在速度上或是在性质上，都是无间断性的革命，要说中国革命已经是纯粹社会主义的革命，固然不对，要说中国革命仅仅是民权主义的革命，仿佛革命之后，只开辟些“民治气象”得着纯粹资本主义的，更是不对。

（原载《布尔塞维克》1卷5期）

武装暴动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

瞿秋白

（一）农村的游击战争之前途

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显然到了工农武装暴动的时期，所以暴动的策略与一般斗争的方式，成了最紧迫严重的问题。中国革命在斗争方式与发展形式方面，有积可注意的特点。中国的统治政权，现在已经由旧军阀买办阶级手中，大部份转移到新军阀豪绅资产阶级。豪绅资产阶级在各地都经过国民党而取得政权，力求巩固其统治及其剥削制度，引起工农不断的反抗。但是，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因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不能成为一个整个儿阶级势力，他们内部分裂冲突，而没有组织成全国家中央集权政府的能力。因此，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所以客观上革命斗争的形势，也就形成各省农民此起彼落，比较散乱而不相呼应的暴动。最近半年以来，广东农民从四月就有武装暴动，直到贺叶入粤；湖南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政变之后，就有长沙扑城的暴动，武汉反动之后有鄂南鄂西的暴动，有醴陵平江的暴动；最近江苏宜锡江阴海门等处也有农民暴动；直隶京东各县以及山东范县阳谷，都有如此的暴动；此外，便是豫鲁各省红枪会天门会的武装斗争，也带着有农民暴动的性质，虽然他们的领导权往往落于豪绅小地主的手里。这种情形，很显然的表明中国农民普遍的武装斗争的自发的发展。实际生活之中，自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这种战争是客观形势中必然发生的初期暴动的现象。湖北湖南广东的许多次经验之中，很明显的证明：一、如果武装斗争并非发自群众，而仅仅某一武装队（正式军队也好，土匪也好，甚至于工军农军也好）的游击战争，与群众脱离的武装队的游击，那么，这种斗争始终是要失败；二、如果游击战争是群众的，但是，不能从游击战争进于更高形式的斗争——政治的斗争与革命地域的建立和扩大，那么，这种斗争也是不能胜利。因此，对于游击战争的斗争方式，应当有明确的认识：

第一，什么是游击战争呢？列宁说：“现在的军事技术，不是十九世纪中期时候的军事技术了。用一大群人去抵抗炮队用几支手枪去守巷战时的屏障，自然是蠢事。……莫斯科暴动（1905年12月）提出了‘新的巷战策略’，这就是游击战争的策略，实行这种策略的组织，便是便于移动的很小的小队伍：十人队，三人队，甚至二人队。”列宁这里所说的游击战争，是指城市中的巷战而言。然而游击战争的意义是很明显的了；当暴动初起，革命方面的武力还很少的时候，对于军事技术精良的敌人——反革命的大队人

马，不用显然力不相敌的武装很不完备的甚至于徒手的群众大队，去硬冲硬打；而用分散细小的队伍，使敌人防不胜防出其不意的去袭击，——这就是游击战争，而非正式战争。现在中国农村中的暴动，客观上正是形成这一种策略。农民暴动初起的时候，往往事实上只有小队伍袭击敌人军队（团防民团等）；他们对于没有武装的豪绅地主以及武装并不很大的敌人，固然仍旧是广大群众的斗争行动，可是，一般而论，农民暴动在未能形成较大的工农革命军以前，在未能采取与反革命军队作正式战争的策略以前，他还是在游击战争的阶段之中。

第二，游击战争应当是群众斗争发动出来的。游击战争只是暴动的初期现象，而且只是暴动中武装斗争方面的策略。并非农民暴动就等于游击战争；也并非暴动之中除游击战争以外，完全没有其他方式的斗争。恰好相反。农民暴动的主要方式是群众的斗争，而游击战争不过是这个总暴动中袭击敌人的武装斗争之一方面。整个农民暴动应当包括什么？暴动不是几个武装队袭击敌人便算的；暴动不是群众之外，另外有什么第三者的武力来解放群众的。现在中国各地农村中，所以发生如此之多的暴动，正是因为地主豪绅国民党的压迫和剥削，使农民不能忍受，而群起反抗，正是因为各县各乡地主豪绅的地方政权，受革命潮流的冲刷而动摇崩溃。因此中国农民群众起来暴动，起来斗争。斗争的方式，开始可以是很平常的：农民不肯交租或交税交捐，不肯还债，尤其是乡中苦力贫民穷困到积点而起来反抗，群众的革命情绪普遍的高涨，他们拒绝收租收税的豪绅走狗，他们杀戮这些豪绅走狗，他们群起围攻地主，吃大户，吃排家饭，他们焚毁债券田契要求土地以至分配土地，他们进而杀戮豪绅地主，没收富豪的财产。这些种种方式的革命斗争的爆发，甚至于有时客观上以改良主义运动为导火线；例如要求减租不遂，要求减免钱粮不成，因而进一步的趋于暴动。——因为国民党统治之下，政府和所谓党部，往往想用这种改良政策来欺骗农民，但是事实上豪绅资产阶级没有能力做这些让步，而且这些政策决不满足农民的要求，国民党及新旧军阀，始终实际上是用强暴手段压榨。总之，农民运动的这些斗争方式，是暴动发动群众后必然的现象，有些斗争方式并且是中国几千年来历史上的经验，如吃大户，哄堂等等。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引导农民进一步的做有组织的自觉的暴动：从吃大户，抗租，抗税等的群众斗争进展起来，群众感觉武装斗争的必要，自然游击战争便要同时发生，自然群众之中要求有游击战争的组织——有集中指挥的武装队之成立。游击战争只有在这种发动极广大的群众斗争之中，才能成为有力的武装行动；农村中的游击战争是不能和农民群众斗争的发动相离的。农村中群众斗争的发动，同时也不能转入武装斗争而不从事于游击战争。

第三，游击战争至少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的。反动派如吴稚晖等，往往说共产党的革命方法是杀人放火。是的，农民暴动之中是有许多杀人放火的事：被压迫的反抗屠杀反抗豪绅地主国民党政府官吏，不能不是"杀杀人者的政策"；共产党对于农民的杀戮豪绅地主的运动，是努力赞助而领导的。但是，工农的武装暴动并不单是"杀人放火"；工农武装暴动是工农群众的斗争，是要积极建立工农的政权之斗争。所以，即使某地暴动的开始，并非群众的直接斗争，而是少数的武装革命党人或农民先动手杀戮豪绅袭击敌人武装；那么，这样开始的斗争也应当立刻引起极大的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单纯的武装队的游击与群众斗争不相混一的斗争，必然是军事投机主义。所以即使客观上有万不得已而从武装队的游击开始暴动的事实，这种暴动也必须立刻发动群众起来！

因为农民暴动的意义，是要用群众之中生长出来的武力，推翻治者阶级，而使群众自己取得政权取得土地，达到自己的要求。杀戮豪绅只是斗争的开始，只是肃清敌人势力的一步；要树立革命的群众的势力，便必须发动群众自觉的斗争，使他们得到政权和土地。

第四，游击战争必须进于革命地域之建立。农民群众斗争发动而开始游击战争之后，革命势力必须要继续的进取而又进取，决不能保守的，所以决不能停滞在游击战争的一阶段上的。湖南湖北江苏各省以前的农民暴动，正因为不能从游击战争更进一步，而未得着胜利。最近（十一月初）广东海陆丰的农民暴动，便从游击战争，进一步而创立革命的地域。海陆丰的农民，在叶贺入粤以前便暴动起来，随后叶贺虽然失败，但是农民暴动却从军事行动（游击战争）进而至于群众的斗争（尤其是海丰），由群众的斗争而创造更大的武力，并且有叶挺残部改编加入农军，增多武装的力量；于是他们努力发动陆丰、碣石、紫金等许多县农民的斗争；而且他们的作战，已经不须采取纯粹游击式的策略。海陆丰农民暴动的发展，便是超过游击战争的斗争方式之范围，而进于建立革命地域的实例。

现在各地的农民暴动的斗争方式，必须确切的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和明显的树立创造革命地域的目标。各省各区的农民暴动，将要运用这种斗争经验之中锻炼出来的策略，使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更加动摇削弱以至于各自推翻当地的反动政权；而使革命势力汇合起来，创造尽可能的大范围内工农政权胜利的局面。

（二）城市工人暴动的问题

农村中四处蜂起暴动的环境之中，城市工人暴动便成了革命胜利的关键。革命势力的发展，到了有几县，半省，甚至一二省内工农暴动胜利前途的时候，城市自然要成为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

现在客观的形势，虽然各大城市，如上海汉口天津等处，还没有工人暴动的事实；然而一般的政治经济条件，正在准备着这种暴动的爆发。如今大城市之中，如上海汉口，尤其是广州，工人的斗争剧烈起来，——广州当然不是特殊的状况，因为广东农民暴动的发展，与工人本身斗争的剧烈，已经直接提出广州暴动的问题。就是上海及其附近各县手工工人的经济斗争，也是日益增多。豪绅资产阶级没有方法解决这些斗争，客观的经济状况，使他们只有更加残酷的压迫工人店员。主要的，只是工人阶级的群众如何组织起来，如何在日常经济斗争之中团结起来，引导更多更广大的群众，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之意识。尤其可以注意的，是城市暴动的严重意义，是在于城市中的暴动，必要使革命潮流，从自发的散乱的农村暴动，更进一步而搏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中心，使革命更进一步的到建立起有组织的中心势力。

列宁对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准备暴动的指示说："暴动要能够胜利，必需不依据于军事投机，并不只依据于党，而要依据于先进的阶级。此其一。暴动要依据于民众的革命高潮。此其二。暴动要依据于日益生长的革命达到历史上的转变关头，就是革命敌人的动摇一天天的增加，而且薄弱的骑墙的不坚决的革命友军也一天天的更加动摇。此其三。解决暴动问题的这三个条件，便是马克思主义与白朗吉主义不同的地方。"列

宁这几句，是革命发展到决定胜负的斗争时期，所应当特别注意的。

现在每一区域之中，农民暴动的发展与城市暴动之关系，都有从发动斗争进于决定胜负的斗争之形势。现在中国城市之中，客观的条件多多少少都是足以造成群众的革命的高潮的，尤其是在农村暴动不断的爆发之环境中。城市工人以及各县手工工人店员的群众，应当尽量的发动；从客观上潜伏着的一切斗争问题，去发动群众的经济政治斗争；尽量的揭发国民党的欺骗政策。只有如此坚决发动群众的斗争，才能引导起更多更广大的群众，使他们深切的感觉到暴动与夺取政权的必要，决然进于武装的斗争——群众的武装斗争。如今工人中的先进份子，已经激起而武装袭击工贼；但是这还不够，必须一切革命的工人更勇猛的领导起广大群众的斗争，就是因此而要执行很琐屑繁难的日常经济斗争也是非常之必要的。城市的暴动，将要在这种革命高潮的普及于广大群众的过程之中，生长出来，而成为工农暴动在大范围内胜利的中心和指导者。

（原载《布尔塞维克》1卷10期）

中国革命低落吗?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五日）

瞿 秋 白

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有些人以为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结束；虽然革命内容进到更高的阶段，但是革命形势却低落下去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结果是无产阶级失败了。这种论调显然与事实不符。

第一，广州暴动之后，国民党的豪绅资产阶级统治更加分崩离析，军阀的混战更加要扩大，南京最近所开的国民党会议，议决广州、开封、太原、武汉设立四个政治分会，企图用这种瓜分政策，暂时稳定军阀的割据局面。但是，事实上南京会议是蒋派包办的，武汉、上海、广州三大中心城市，仍旧在桂系手中。蒋派与桂系军阀的战争正在酝酿着。这些主要城市的暂时没有战争，正是两大军阀拚命压榨民众，增加税捐，帮助资本家进攻工人，总而言之，是他们要准备战争，而施行极残酷严重的白色恐怖。如此情形之下，大城市的工人阶级极广大的斗争和罢工，自然还不能爆发出来。可是，同时工人群众的零星斗争仍旧是不断的冲破他们的压迫，而时时继续着起来。工人群众不但没有感觉到另有一种改良生活的道路，而日渐离散革命的战线，恰恰相反，群众正在这种异常艰苦的斗争之中，日渐团结自己的力量，更多更广大的群众集合到共产党旗帜之下。

第二，广州暴动之后，不断的军阀战争，正在广东湖南河南山东福建等等省份大大的发展起来，这是许多杂色军队的小军阀的战争，亦就是桂系与蒋派间接的战争。这些战争，如东江方面的战争，江西广东边境的战争，湖南省内的战争，鄂西的战争，以及河南南境的混战，——都是一般豪绅政权崩溃的现象。农民暴动的事实，差不多每天的报纸上都可以看见。农民群众感觉到这些军阀力量的动摇，而自己奋起斗争。最近，广东的北江南路与海南岛都有很大的农民暴动的发展。东江海陆丰邻近各县的农民大暴动。江西万安遂川等四县也已经成立苏维埃政府。湖北的当阳应山黄冈黄陂以及鄂南，差不多全部都在农民暴动之中。河南信阳四望山一带的农民斗争，也是非常剧烈。江苏的无锡江阴仍旧有农民斗争的消息，江北淮安泗阳也已经有几万农民群众起来。南部中国已经有五个苏维埃区域：海陆丰，海南岛，广东南路及北江，江西的遂川万安（最近的上海报已经说海南岛的海口——主要城市，已经有工农联合暴动起来）。

同时，四川河南直隶山东东三省，普遍的有红枪会天门会大刀会的骚动。他们虽在小豪绅的领导之下，但是始终是一般民众普遍的反对军阀战争的表示。他们的领袖固然是妥协动摇与迷信，但是最近枪会群众已经进一步开始反对这种领袖。例如河南红枪会中分化出“光蛋会”反对枪会首领。这些自发的农民暴动正在要求正确的领导与组织。

许多乡村之中农民群众自己开始寻找共产党。

第三，广州暴动之后，开始兵士的参加革命。广东三水广宁等处民团的团丁与兵士，都自动的脱离地主而归到农民方面来。陈铭枢张发奎钱大均等在东江战争的时候，不敢侵犯海陆丰，恐怕他们自己的兵士要受农民的影响而倒戈。海南岛文昌县驻兵一排携带步枪四十余支归到西边各县的农民方面来。最近江西农民暴动区域，有整连的兵士投到农民方面来。湖南极多量的本省兵士（李品仙何健刘兴程潜的军队），都因为战祸及欠饷的关系，异常的不安。他们之中有许多是从前农民协会会员，他们等待着自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一般兵士的骚动与倒戈，已经时常听见。

总之，从这些情形看起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中，是资产阶级占了最终的胜利吗？不是的。固然，军阀豪绅资产阶级能够用强暴的武力摧残广州的苏维埃。然而，他们对于一般群众的影响，只在日益衰落，而共产党——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工农兵士的影响却在日益增高。

中国资产阶级自己的经济政治都是没有出路，他不能实行丝毫改良政策，他不能稳定自己的统治。他有些地方甚至反对自己的政府——国民党的政府。他内部分成许多派，自相冲突，自相矛盾；甲派抓住国民党及政府，乙派便反对他。全国的金融经济是普遍的崩溃。因此，资产阶级一方面要“雇用”国民党新军阀做压迫工农革命的刽子手，别方面他的经济能力又负担不起。因此，军阀内部不能不互相吞噬，互争自己军队的生存，因此。资产阶级与国民党政府或奉鲁军阀政府又不能不冲突。如此的局面之下，就是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也开始反对国民党。那就更不用说对于工农的改良政策了！

中国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问题只在革命领导者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力量。固然，白色恐怖摧残我们的力量，但是伟大的艰苦的斗争之中，共产党的力量和群众的基础是在生长起来。革命虽然是高涨，那么，政治的总路线——发动群众斗争，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兵士贫民苏维埃的总策略——无论如何是不能不明确的规定，做一切工作的切近目标的。而且只有在这种总策略之下，领导工人去反抗资本家进攻，领导农民兵士的斗争，尽量发动群众，才能在组织上巩固团结革命的力量——共产党及一般群众组织。只有在这种群众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起真正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群众的党，不受任何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侵蚀和犹豫动摇的领导的党，然后才能保障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便在于努力去领导组织群众的斗争，使各区域的斗争能汇合起来而不散漫，使工人农民兵士的三大革命力量能够结合起来。要达到这一目的，也就只有坚决的认定革命高涨中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总策略。

（原载《布尔塞维克》1卷18期）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通过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哈布林等所提出之草案——

一

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民权革命在经济上既没有完成（土地革命及封建关系之消灭），在反帝国主义的民权斗争上也没有完成（中国之统一及民权解放），在政权的阶级性上更没有完成（工农独裁制）。认为中国革命现时的阶段已经生长了社会主义的革命之主张，是不对的。同样，认为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共产国际执委驻中国代表之主张）也是不对的。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同时并认革命为“不断革命”之倾向，其错误与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时的错误相类似。如此设问并且得出“不断革命”的答案，显然是将中国革命之最大特性，就是半殖民地的革命，一笔抹煞，所以这种错误大为有害。

二

中国工农广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个浪潮，大致都在共产党的口号并且大半在共产党指导之下者，已经过去。第一个浪潮的终了，是革命运动的几个中心地域，工农受着极厉害的历史失败，一部分共产党及一般革命的工农干部，受着极残酷的屠杀摧残，社会阶级两极端剧烈的发展，互斗的阶级各自确定自己的政治纲领，国民党军阀之指导完全暴露自己是反革命的指导，广大的劳动群众得着极大的革命经验，最后，使中国群众的革命运动，整个儿的进于新的苏维埃的阶段。自然无疑的，因为社会阶级的联合变更，而有相当的反动势力之结合：资产阶级不但进而与封建军阀结合完全的反革命联盟，而且事实上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妥协。帝国主义者不但表示攫取中国经济权利的高度的积极性，并且增高自己对于中国的政治的势力。反革命的这三个主要力量，协同的反对工农，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党。同时这反革命的营垒之内，也有极剧烈的内部斗争：一方面表现于中国互斗的各派之利益自相矛盾，别方面也反映着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利益矛盾。

三

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但是，许多朕兆，都指

示工农革命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不但英勇的广州工人之暴动，而且许多省区农民运动的开展（广东各县的暴动，湖南革命运动的开展，以及江西、湖北、河南、甚至山东、满洲北部诸省）；再则，军阀军队中兵士群众的愤激而倒戈也日益发见，这些都指出革命是走向新的高潮。经济状况之急剧的恶化，财政的紊乱，军阀混战的破坏，空前的政治压迫，都必不可免的推动群众到革命斗争的道路去。

四

中国革命的经验证实它的一种特性，就是运动的发展在各省是不平衡的，各自有当地历史的条件。它至今的发展，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也是不平衡的。现时的形势是：一方面许多省区之中农民运动往前发展，别方面在许多工业中心，工人运动受着极大的摧残；在极厉害的白色恐怖之下，表现相当的挫折。

五

这一切形势，可以确定主要的党的政策路线，党应当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这一高潮，必须要党起来组织并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之直接的策略任务，因为只有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能够解决革命之种种任务。正因为如此，现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组织他们，使他们围绕着党及党的口号（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推翻现存政权，工农独裁制，组织苏维埃）。现时形势之中的最大危险，就是工农运动的先锋因为估计现时形势的不正确，而过于轻视敌人的力量，可以脱离群众而过于前进，散乱自己的力量，而使敌人得以各个击破。如果共产党不了解组织群众与争取群众之必要，如果它不能战胜种种使它忽视准备群众到新的革命高潮之企图，战胜种种使它忽视准备当前的中心任务之尝试，那么，共产党一定要被击散而散乱自己的组织。

六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因此特别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它注意加紧工农之间的群众工作。必须竭力加紧组织工会的群众工作，为此目的而利用工人所谓“兄弟会”等等，并且（反对黄色工会的警察式的国民党式的机关起见），如果黄色工会多少有些群众组织的性质，那么，也可以渗入公开的甚至黄色的工会，以夺取阶级敌人影响之下的工人。必须同时永久抛弃职工运动中的恐怖政策，这是对于党有非常之大的危险的。必须最坚决的反对以强迫方法举行罢工。只有说服群众，使他们相信党所提议的方法之正确，只有取得群众中之绝对的赞助和完全的信仰，才能指导运动。同时，必须加紧建立和扩大农民组织的工作（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等等），特别注意贫农之中的工作，特别组织乡村中的无产阶级成份。有系统的日常不断的执行提高群众阶级意识的工作，指导他们的日常斗争，组织他们，这在现时对于中国共产党比任何时候都重要。

七

必须坚决的反对工人阶级某种成份之中的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反对玩弄暴动，不做工农的群众暴动，而去玩弄暴动，这是消灭革命的"正确方法"。党指导着各省区农民之自发的游击暴动，就应当注意到：这些农民暴动可以变成全国暴动胜利的出发点，只有在他们与无产阶级中心之新的革命高潮相联结的条件之下。党在这里也应当见着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在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准备几个临近省区之间的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准备有组织的有预备的广泛范围之内的发动。因此，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些危险在两湖等处曾经有过）。必须经常的、不动摇的去组织农民的发动，党应当预先便注意中国各省区的各种不同的特殊条件。这些不同的条件，首先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苏维埃区域之内估计到。并且，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苏维埃化的农民区域中，党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部队——以备这些部队渐渐联合而成全国的中国红军。

八

革命往前发展的主要条件，就是竭力以巩固中国共产党本身及其干部，巩固它影响之下的团体及党的中央。中国共产党虽然在"八七"会议之后，大致纠正了自由的机会主义错误，这在共产国际以前的议决案就已经说过。可是它还没有完全适应现时形势的新条件，表现策略上的动摇（看轻盲动主义的危险，职工运动中之恐怖方法，沉溺于乡村中的游击主义）以及组织上的动摇。巩固党部组织，吸收新党员，巩固中央党部与地方党部的联络，建立坚强的党的机关，正确的党与非党群众的关系，反对机会主义的余毒，反对"左倾高调"（先锋主义，组织"新共产党"的论调，恐怖主义，盲动主义，强迫罢工等等）——应当是党的当前任务。

九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实行严厉的斗争，反对组织新的仿佛是"真正共产主义的"党，或者所谓"劳农党"，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党。有些过去的共产党员（如谭平山等）是有组织这种新党的企图；其实这新党，将要是孟塞维克的反工农的党，做蒋介石及其他工农刽子手的走狗。反对工农运动中的右倾派与反革命派的斗争，是党当前的任务，而这种斗争，将要因为中国共产党内部愈加坚决的战胜"左倾机会主义倾向"，同时不对机会主义余毒有任何让步，而愈有成效。

十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必须估计中国革命运动的一般经验，而使这些经验的教

训一直到党的支部。广州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苏维埃政权之英勇的尝试，对于工农革命的发展有极大的作用；可是这里也暴露指导机关的一些错误：工农之中预备的工作不充分，敌人军队之中的工作也不充分，对于黄色工会会员的态度不正确，党部及青年团本身的准备不充分。中央完全没有接到广州事件的通知，政治上的调动群众也薄弱（没有广泛的政治罢工，没有选举的广州苏维埃以为暴动之机关；）对于这些，直接指导者应负责的，就是政治上对共产国际执委负责的同志(某同志及其他)。虽然有这些指导方面的错误，但是广州暴动应当认为是中国工人极大的英勇精神的模范，他们是的确有取得中国大革命之领导权的历史使命之资格的。

十一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定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都应当实行自己的天职：严厉的反对社会民主派及托洛茨基派的造谣，他们说“中国革命已经消灭了”，这种造谣诬蔑，不过使帝国主义的在华工作更加容易，帝国主义本来只想完全镇服中国的工农运动，而中国的工农运动却正在走上新的革命高潮呢。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各国共产党都应当竭全力赞助中国革命。现时这一时期，正是帝国主义反革命的干涉中国加紧的时期，所以各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赞助尤其必要。共产国际的各国支部，尤其是帝国主义列强国内的，更加要力争撤回驻华海陆军，反对割剧中国领土，瓜分中国领土，反对镇压中国革命的政策。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号召世界的工人，首先便是共产党员，要努力执行无产阶级团结之天职，实行帮助中国英勇的无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议决案的通告

（一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二月会议的中国问题议决案之后，接受这一议决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间，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议决案必要的具体步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义的倾向，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之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国际的决议亦就是指导我们努力继续战胜这些盲动主义以及青年团之先锋主义倾向，在艰苦的斗争之中锻炼，真正布尔塞维克的思想，彻底肃清机会主义的余毒。党只有在这种路线的基础上，才能履行自己的重要任务：组织并教育劳动群众，以造成革命斗争之胜利及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之必要条件。

现时反动势力虽然联合一致的反对工农及共产党，然而不但帝国主义军阀国民党之……

内部有许多矛盾冲突，而且财政上经济上很明显的趋于更大的崩溃（许多工厂停闭，新的税捐，内外借款的无着和困难等等），所以反动政权是不能稳定，同时农民斗争极普遍的发展，扩大到许多新的省区，引进农民中的新的成份，日进于更高的阶段（土地革命之深入）。军阀军队的崩溃现象。亦就明显的指出劳动群众中之新的成份（兵士）日益引进于革命的斗争。

中央政治局认为不但要切实的准备城市与乡村之间邻近省区之间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而且要加紧的领导自发的农民暴动，加紧的执行城市工人中之群众工作及宣传，加紧的执行兵士运动，使这些斗争相配合相适应起来。客观上农民自发的暴动是在发展，是在艰苦的奋斗，一开始便不能不很快的转入武装的斗争。必须要努力增高农民运动政治觉悟的程度。苏维埃的区域之中要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且要努力建立红军，联合农民及革命兵士的力量。

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则中央政治局向来明白的认清中国革命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土地革命。）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无间说”，认为“俄皇倒了政府是工人的。”确是要跳过民权革命的阶段，（工农民权独裁制）而直接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这种观点如果移到中国革命上来，是显然不正确的。中央政治局去年十一月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指出中国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只是要指出：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是有确定的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与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底决议案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一　政治决议案

1　中国与世界革命

一　世界革命发展底阶段

最近十年之间，世界革命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欧战——帝国主义大战之结果，发生了十月革命，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底胜利，世界革命之第一阶段，就从此开始。那时西欧各国也有激烈的革命危机（德国，意大利，奥国，匈牙利等）。

因为无产阶级底共产主义先锋队当时还很幼稚薄弱，还没有团结巩固的共产党，因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的奸细，工人阶级的极大部分，仍旧在他们这种改良主义的政党底领导之下，——所以群众直接的革命行动，受着创巨痛深的失败。只有苏联底革命是胜利了。欧美各国资产阶级，因为工人阶级底失败，却仍然能够压迫工人阶级，坚固自己的政权，而得着暂时的局部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稳定。

世界革命形势底第二阶段之中，便是资本主义局部的暂时的稳定：世界金融贸易，生产额已经恢复或超过了战前的水平线，资产阶级广大地进攻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底生产机关急剧地实行生产合理化，根本上是更使工人阶级底生活状况恶化，取消劳动者在前一时期所争得的权利（八小时工作制，工资的增加，政治的自由等等）。

虽然如此，一方面固然世界资本主义有稳定的过程，使生产力恢复而增高，甚至超过欧战以前的程度，然而别方面，国际帝国主义整个系统之中巨大的主要的矛盾也日益剧烈起来。资本主义的世界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之间，关系日益险恶；资本主义国家底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增长起来；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在日益深入，以至于引起许多直接的武装斗争及武装起义（中国、爪哇，印度，摩洛哥、叙里亚等）。再则，因为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帝国主义列强自己之间的矛盾，也是日益剧烈，以至于有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

所有这些矛盾的剧烈，便使世界革命的第三阶段开始。世界革命第三期底特点是：工人阶级底向左化和革命化，东方殖民地几千百万的群众起来参加进攻帝国主义的斗争，苏联更加成为摇动资本主义稳定的强大的动力，更加成为各国工人运动及世界被压迫民族底革命中心。

世界革命底第三期，重新要有工人阶级公开的决定胜负的发动，要有殖民地底武装

起义，同时，反对苏联的武装战争会有实现的危险，而且在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也有发生许多巨大冲突之可能。

二　中国革命底国际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估量现时的国际形势，认为必不可免的：是要有极巨大的、具有世界的历史意义的事变到来，它的性质将要是极剧烈的阶级冲突。因此，中国革命的国际意义更加增高起来。它本来是总的世界革命过程中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劳动群众之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它的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削弱它的力量，要求解放几万万的中国民众，要求脱离异乎寻常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也就减少帝国主义压迫苏联及各国工人阶级的暴力，这就是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底前途。

中国革命底第一阶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助力，亦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将来的第二阶段——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更要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底直接的组成部分。同时，中国革命波及邻近各国——巨大的殖民地，如印度、印度支那、爪哇、高丽等，唤起被压迫民族广大的群众，起来实行政治斗争，根本上要动摇日本、英国帝国主义的基础，而且给美国资本主义以巨大的打击。因此，中国革命底胜利完成便使世界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底日期更加接近。

2　中国革命底性质与动力

三　中国革命底性质和任务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第八、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之估量。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解放出来；（二）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三）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底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所以革命当前的目标，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中国革命现时的骨干，它的基础及中心任务是：

一、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底真正统一。

二，澈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中国底农民（小私有者）要将土地制度之中的一切半封建束缚完全摧毁。

这两个任务，还并没有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底范围之外，——可是必须用武装起义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地主军阀及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然后才能解决这两个任务。

三、因此中国革命现在资产阶级性民主阶段上的第三个任务，已经就是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这是引进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管理国事的最好的方式，也就是实行工农民主专政的最好的方式。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地主豪绅底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动摇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底无产阶级和农民。

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澈底变更土地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方才能够进行到底，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

四　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口号

中国革命底现在阶段之中，它的主要口号是：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底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地主阶级底一切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发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这十大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现在争取群众，准备武装起义，以推翻地主豪绅资产阶级政权的主要口号。

五　中国革命底动力及其转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

中国革命底动力，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且无产阶级底领导权，又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就建立起来（无产阶级能够帮助并指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领导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所以，这就可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使它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亦就是社会主义的前途。

世界资本主义现在正在恐慌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底社会主义建设已经有了十年，它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威力是在增长，这就足以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去力争革命底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保证胜利的可能。

同时，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主专政，就可以成为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出发点。只有斗争，只有力量，只有无产阶级贫农底团结力与组织力，只有阶级力量底对比能够决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底阶段要到什么时候完成，它将要怎样快地经过那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

3　过去斗争底经验

六　中国革命失败底客观原因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到第六次大会之间，中国革命之中，经过极重大的许多事变：北伐底胜利，帝国主义势力底削弱，极广大的劳动群众迅速地革命化，工运农运在半公开的条件之下广大的发展和勃兴，土地革命底开始深入……后来中国革命便遭受几次严重的失败，丧失革命所得的胜利，共产党受着摧残，群众运动受着压迫。

中国革命底发展，便发生阶级力量底分化，这就将中国资产阶级吓退，使它投降到反革命的帝国主义营垒里去。中国革命底第一时期，是总的民族联合战线时期。在这个时候，便转变到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了（所谓武汉时代），资产阶级脱离革命底营垒，变成反革命的力量之后，蒋介石叛变之后，左派国民党底武汉中央，便一天天动摇起来，一天天地反动起来。武汉中央底动摇，日益暴露，尤其到长沙许克详反动（马夜事变）的时候，更加明显。武汉中央底反对土地革命，到马夜事变就已经公开地与工农民众宣战，开始成为反革命底中心。同时，革命又在帝国主义军阀地主资产阶级底压迫之下，于是整个国民党公开的反革命事业便完成了。

共产党指导之下的南昌武装起义——这是以武装力量保持革命胜利的尝试，其结果是失败了，南昌武装起义失败底原因，是因为敌人底力量太大，同时也因指导机关底策略错误。南昌武装起义底失败，结束了中国革命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于是广州武装起义便开始了中国革命底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

中国革命虽然最初有很大的发展，始终受了失败。革命在这一历史阶段里，没有充分的力量战胜当前的许多困难。这些客观的困难和原因之中，应当说到：

（一）中国革命底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底力量强大。帝国主义是一切反动力量底组织者和支配者。帝国主义利用自己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威力，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做些小小的让步，威逼利诱地分裂民族联合的战线，用贿赂收买军阀的旧方法，用武力的炮舰政策压迫革命，实行经济封锁，利用自己的强大威力（银行、公司、军舰，军队等等）——造成阻碍中国革命发展和胜利底最严重的困难之一。

（二）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底联合战线。资产阶级在革命底初期，是参加革命的，这一事实早已伏下它必然要退出革命战线的叛变。民族资产阶级底叛变，暂时削弱了革命势力，而加强了反革命的联盟。

（三）中国军队是雇佣军队，这是中国军阀底特点，因此，反动派有着数量上占很优势的武力。许多地方这种武力是足以决定胜负的。革命曾经利用这种军队。可是这些军队底军官都是地主豪绅底代表，他们的兵士群众大都是久已脱离了生产的群众，和工农的联系比较很薄弱。当时军队还是封建地主豪绅及资产阶级底驯服工具。

（四）革命运动发展底不平衡。中国无产阶级实行严重的斗争的时候，农民运动才开始发展（例如“五卅”或上海三次武装起义时）。中国工人阶级组织得太薄弱，又是很分散的，它的力量并不充分，可是很早就加入政治斗争底舞台，首先受着反动底历次打击，没有得着农民方面及时的赞助。中国工人阶级，没有能等到农民运动发展到群众的广大的规模，就受着打击而失败。再则，地域上革命的发展也不平衡。南方的广东、湖南、湖北农民已开始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底政权，没收地主底土地，有些地方已开始分配土地，可是在北方那时农民刚刚才开始斗争，还只在开始解放运动的尝试。这种情形，当然使资产阶级封建地主底反动势力，更加容易实行自己的任务。

（五）城市底上层小资产阶级，极大部分是和封建的土地关系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和外国资本相关联。这种小资产阶级分子动摇而背叛革命。当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土地革命急剧进展之中，这些小资产阶级日益动摇，而终至于投降到地主资产阶级底反动营垒里去。

七　机会主义的错误

然而客观上的困难，并没有完全决定中国革命必然要失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革命失败底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无产阶级底先锋——共产党指导机关底机会主义政策。当革命危急存亡的关头，离开布尔塞维克路线的机会主义政策，客观上简直是背叛正在斗争的劳动群众底利益。这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最先便是由于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及联合战线的任务，有不正确的观念。不能保持共产党底独立性，不能对于革命同盟者实行阶级的批评，不去动员革命力量，准备群众力量，以求战胜自己暂时的同盟者之反动的企图，有时候，反而去阻止群众运动底发展，以迁就自己对于联合战线的不正确的观点，这样，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指导机关，就使中国革命受着不可免的失败。

当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去发展土地革命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却只做上层勾结功夫，蒙蔽阶级底矛盾，不去夺取军队，不去武装工农，不能利用参加政权机关的机会，去为群众谋利，所以在紧急关头不去打破敌人的包围，而被敌人包围——实际上是断送了无产阶级底领导权，这都是机会主义底最高表现。尤其是马夜事变时的政策是最可耻的机会主义底表现。最后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不执行共产国际底指示，——这样，它便使英勇斗争的工农，竟致于失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承认：当时共产国际超过中央委员会，直接号召中国底党员群众，要求澈底变更党底路线，改变党底领导机关——的确是对的。

八　八七会议与十一月扩大会议

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底指示，从根本上改正旧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它在使党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八七会议用布尔塞维克的公开的精神，指斥机会主义的错误，提出土地革命底中心口号，指出无产阶级与农民要推翻反动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底目标，定出武装起义的总方针；党员群众起来，开始肃清指导机关中的机会主义成份，改变旧的指导机关，——这样，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

固然，八七会议对于左派国民党问题，还保存了些幻想，对于土地问题，还不大澈底，可是这种缺点绝不减少八七会议在历史上的极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对于八七会议的主要决议完全赞同。

中央十一月扩大会议，继续布尔塞维克化的事业，要更加详细深切地确定土地问题底策略，提出苏维埃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坚决地决定改造党底组织及引进工人同志来担负指导工作的责任。同时，第六次大会认为：十一月会议指出准备好的联络好的武装起义之必要，是非常对的。但是十一月扩大会议在决议案上，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不正确地采用了“不断革命”的名词，于是就解释革命是不断高涨着，由此就得到不正确的策略。同时对于布尔塞维克的武装起义策略的观念很久是模糊的。于是有不正确的估量和策略，以及过于忽视敌人力量的观念，——这些都可成为盲动倾向底根据。因此没有严厉地防止当时党内已经发现的盲动主义的倾向（这种极左派的倾向正是很有害的）。

九　南昌秋收及广州武装起义的意义

同时，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南昌武装起义，秋收武装起义，——尤其是广州武装起义，在政策上决非盲动主义的政策。

南昌武装起义是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是对的。南昌武装起义失败底原因，客观上是敌人底力量过于强大。至于当时指导机关策略上的错误，乃是：（一）没有明显的政纲；（二）对于土地革命的不坚决；（三）没有与农民运动联络起来，没有武装农民；（四）没有摧毁旧的政权机关，而代以劳动者底政权；（五）其他军事上的错误等。这些错误亦就是南昌武装起义失败底主观上的原因。

秋收武装起义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底意识之中；后来继续发展的农民斗争，以至于许多苏维埃区域之创立，大致亦由于秋收武装起义的影响。但是，秋收武装起义底政策之机械地应用，亦就发生有些地方底玩弄武装起义和军事冒险的行动。

第六次大会赞成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所指出的广州武装起义之世界的历史的意义。广州武装起义是必要的英勇的尝试，是为保持革命胜利的斗争，是使革命深入，直接创造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不过在客观上，广州武装起义是革命退却时的“退兵战”。

第六次大会认为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会议很正确地指出武装起义时的错误：工农之中的工作，尚未充分；反动军队之中的工作，也是如此；对黄色工会群众的态度不对；党部与青年团自己的准备武装起义工作不充分；政治上调动群众还太薄弱（没有广大的政治罢工等）。第六次大会认为这些错误，也是武装起义不能胜利的原因之一。但是，广州武装起义的意义是非常伟大的。大会特别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底丰富的经验。

广州武装起义，客观上是革命失败过程中的“退兵战”，但是这一点我们党底指导机关却没有估计到。因为革命受了这严重失败的关系，工作底方向必须坚决地从广大范围内直接的武装发动，转变到加紧组织和动员群众的日常工作的方向来。必须集中注意于战胜盲动主义的倾向，更加加紧党在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更加要消灭对于工人阶级及一般群众的命令式的强迫方法。当时指导机关没有充分看清这一点，它按照这一方向进行的办法，显然是不很够的；轻视了帝国主义及反动派底势力，夸大了农民运动底胜利，对于革命失败程度的估量也是不够，因此，例如没有估量环境的两湖武装起义计划，就是错误的。

4　革命运动底现时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底总路线

十　革命高潮过去后之形势

工农运动底第一浪潮，大都是中国共产党所指导的。这个浪潮已经完结，因为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败，他们的革命组织受着极大的摧残（工会、农民协会、共产党党部），最好的干部遭受屠杀，工农底先锋遭受很大的损伤。

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底速度是不平衡的，亦就是现时形势底特征。农民底游击战争此起彼落地向前发展，并且还只在散漫不集中的状态中；军阀军队崩溃的形势已经开始显露；同时，城市的工人运动却有受着重大挫折的现象，工人阶级底战斗力削弱——因为他比其他革命势力，所受着的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底打击最重。

因为中国革命失败，因为工农武装起义被镇压下去，因为民族资产阶级背叛民族解放的革命，所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比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巩固了些，加强了些。日本对于中国北方的侵略，济南的出兵，实际上是瓜分中国的开始。

瓜分政策底目的：一是要用非经济的强暴力量实行殖民地的经济剥削，而完全消灭中国底革命；二是加紧争夺市场的斗争。同时，列强既在加紧争夺中国市场，因此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就要剧烈起来。

因此，就发生太平洋上帝国主义大战的危险，中国沿海各省，将要成为战场。战争底主要原因，便是争夺中国底市场，要求重新瓜分，以求适合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新的关系。同时，虽然帝国主义营垒之中有极巨大的矛盾（日美冲突等等），然而帝国主义现在的力量仍旧比中国革命强大得多。他们重新联合起来反对中国革命底统一战线；只要对于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稍有危险，他们就要联合一致地反对中国革命的。

资产阶级转到反动营垒，使反革命底力量大加团结，加强帝国主义底势力，以及军阀地主等底势力，因此也就对于工人阶级能够加以严重的打击。

虽然反动营垒之中，有很多很多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地主之间，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之间，地主阶级的各派各系之间等等），这种矛盾往往弄到武装冲突和军阀的混战，然而帝国主义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遇到中国劳动群众革命斗争的爆发，便结合联合战线来压迫。

十一　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如此，但仍有许多根据，指出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

有几种主要的动力，足以促进并加紧新的高潮之到来：（一）凡是引起革命的矛盾，没有一个是解决了的。（二）帝国主义者决不愿意轻易地抛弃自己的对华的特权，如租界，租借地，关税管理权等等；反动派在资产阶级领导之下，不能得到真正的集权和统一。（三）工业经济底危机很难找到出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极小限度的改良也是非常困难，殖民地地位上的其他种种困难非常之多，定期的农业危机更加厉害，于是原料食粮底价格不断地高涨，劳动后备军更是日益增加，使工业和工人阶级受着极大的压迫。（四）资产阶级式的改良方法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并没有空余土地可以对贫农佃农略略让步；因为中国底小地主是占极大的优势，而小地主是甚至于减租都不能接受的。（五）统治阶级之间继续着冲突，军阀混战不息，将来这种混战不但可能，并且不可避免，——虽然表面上现在南京政府统一了中国。

革命潮流生长底助动力，就是帝国主义列强冲突日益剧烈起来。这就更可以解除中国革命底束缚。此外，还有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底生长，以及中国底邻近的殖民地民族底革命运动底兴起（印度）。

第六次大会认为：新革命高潮之最初的薄弱的征象，已经可以看见。最先可以说的，

便是经济斗争的群众罢工已经有复兴的现象。工人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幻想迅速地消灭，自动地从下层组织起来，这都表示工人阶级觉悟底深入。再则，反帝国主义运动又在生长，不但激起工人群众，并且还有一部分革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起来参加。

至于农民斗争，则至今保存的苏维埃政权的根据地（南方各省）及其少数工农革命军，更要成为这一新的高潮底重要成份。

第六次大会同时认为：不可以过分估量上述的这些现象，因为即使这些现象综合起来，也还不能形成真正的高潮；参加这些斗争的群众，数量还是不够，城市工人阶级还没有能战胜当前的挫折现象。

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可以使革命先在一省或数省重要省区之内胜利。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然而这种前途是可能的。这里，城市领导作用底重要，和无产阶级群众底高潮，都将要表现它的决定胜负的力量，将要决定“一切政权归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口号，会如何由宣传口号变成直接行动的口开。

十二　争取群众的任务

将来的新的高潮，更加要使党将准备武装起义，以至实行武装起义，认做当前的实际任务，——这是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的唯一出路。

现在正是为此而团结收集无产阶级力量的时候。暂时武装起义在全国范围的意义，还只是宣传的口号。现在要在领导群众日常斗争之中，向群众解释：如果不推翻国民党军阀底政权，那就绝不能改良群众底生活状况。

现在，第一个革命浪潮已经因为历次失败而过去了，而新的浪潮还没有来到，反革命底势力还超过工农，党底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用一切力量去加紧团结收集统一无产阶级底群众，使他们围绕着党底主要口号。做极巨大的组织工作，以巩固革命工会、农民协会，尽可能地领导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以发展工农群众组织。最后，还要加紧地向无产阶级解释过去革命之中的经验。

党应当利用每一次工人与资产阶级在工厂中的冲突，农民和地主在乡村中的冲突，兵士与军官在军营中的冲突，——无论如何琐细的冲突，他要利用——去激动并且深入这些阶级冲突，调动极广大的工农群众到自己方面来。党应当利用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一切强暴行为，利用反动派对于民众的一切屠杀压迫（当然不是每次都要号召群众武装起义），扩大群众底反抗，使自己在将来高潮一旦开始的时候，便成为革命运动底唯一指导者。

争取群众的任务，就是准备武装起义的任务，——因为执行这些任务，就是新的革命高潮之必要的前提，亦就是将武装起义的宣传口号变成直接实际行动的口号之可能的前提。

十三　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危险

争取群众的成效，要看能否执行根据于正确的估量的政策，要看党内能否消除极左倾向的错误与情绪（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个人恐怖主义），要看党内能否消除国民党

式的命令群众的错误倾向而定。

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他们都是使党脱离群众的。

盲动主义理论上的意义，便是少数个人要去进功显然占着绝大优势的敌人，而不断地实行武装斗争，不要群众不顾群众的盲乱的瞎干。当然亦由于过分估量反革命营垒崩溃底速度和程度，否认一切武装起义应有的条件，不去认真地准备武装起义，而无往不是武装起义，否认日常经济政治的部分斗争之准备工作的必要。盲动主义实际行起来，便是少数革命“党人”底武装起义，简直只依赖武力，而实行军事冒险性质的强暴的斗争。当然，这种盲动往往要强迫群众去武装起义，结果往往变成散乱的零碎的恐怖行动。这是可以使党在群众之中的地位降低，而且枉费力量，损丧工人及其共产主义的先锋队伍。

盲动主义是代表非阶级化的分子，乡村底及城市底贫民（失业的破产的小资产阶级，一部分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及开始加入革命的雇佣兵士，这是他们的意识和实际行动底表现。所以盲动主义，可以表示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影响，这是与无产阶级底纪律性和组织性相反的。

同时，共产党不应当轻视这贫民阶级，他们在革命之中是很大的很有势力的力量。党底任务是对于这些贫民群众，进行最大限度的组织工作，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尤其对于城乡底半无产阶级，应当如此。党应当努力吸引这些贫民分子，使他们在工业无产阶级底领导之下加入总的革命运动。不过党应当日益加紧反对小资产阶级式的思想来影响工人阶级及共产党。

盲动主义之外，还有其他的危险倾向。有些党部底一部分，就是在其他问题上，也有使党离开无产阶级底基础，而倾向于破产农民、城市贫民和游民无产阶级底见解。例如对于工人阶级与农民的关系，有不正确的观念，误认平均财产就是社会主义（在乡村中平均田地，在城市中平均货物）。还有主张烧毁城市的倾向，在有些农民战争之中也曾表现出来，甚至轻视城市无产阶级底领导作用（对于城乡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对于党内这些倾向都应当严厉的反对。

此外，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还有命令主义的实际工作方法。党对于工人阶级的态度，简直会成为绅士式的国民党式的对待群众的方式。命令主义，就是不去教育群众，不去说服群众，而去命令式地指挥群众，强迫群众。以前在机会主义之下，曾经为国民党而命令群众不准动。现在又在盲动主义之下，为反对国民党而命令群众不准不动。

甚至在职工运动之中，也应用这种方法，到处命令，以命令委派工会领袖或指导机关，大半是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于是不去造成群众的干部，以至于征求党员及进行职工运动时，也采取联合工人某几个领袖以影响其群众的方法。于是真正的群众工作，便受着非常之大的障碍。

党内的组织问题上，也有这种倾向。就是党内民主主义底异乎寻常地缩小（并非完全因为秘密状态）。党部机关官僚化，对于党员群众也是大半只用简单的命令方式。如果不能坚决地完全地肃清这种命令主义，党便不能成为有战斗力的能指导群众的党。命令主义与争取群众是不能并存的。

过去的经验，使党应当战胜极左派的情绪和国民党式的命令主义，现在，都仍旧可

以发生对于小资产阶级问题的不正确的倾向。

党底任务之中，对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运动，是要引进城市小资产阶级底参加。党底任务之中，对于没收地主阶级底土地与反抗军阀税捐的斗头，也要引进农民私有者（自耕农）群众底参加。对于这种策略的误解，可以发生更不好的倾向。现在不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时候，对于乡村中的富农过于让步，甚至对于店东小资产阶级关系上必要阻止工人及城市贫民的革命运动；以至于名为保存联合战线，而实际上失去领导权，使这些运动服从小资产阶级的指导。

当工人店员底利益与城市店东小资产阶级剧烈冲突的时候，或者乡村贫农中农与富农发生冲突的时候，共产党永久应当站在劳动分子方面，而反对剥削者阶级。

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革命，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有主要的作用。忽视正在发展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而不去力争领导，是异常之错误的。况且，中国革命底新时期中（苏维埃阶段），阶级底关系已经与五卅时期完全不同。革命底深入，使将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推翻军阀的斗争，——一定要激起加强几十倍的剧烈的群众直接行动，——这种前途更不可以忽视。忽视反帝国主义运动及将来广大下层群众底反帝斗争，同时要加强反对国内反动阶级之前途，——这是极大的错误。

再则，阶级斗争剧烈地分化过程之中，彻底的土地革命底过程之中，对于无产阶级，在总的中国革命战线之内，最靠得住的同盟者只有农民。因此，忽视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忽视农民底革命作用，同样，跟着农民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尾巴主义——亦都是极危险的倾向。

上述这些倾向：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均产主义，让步主义，忽视反帝国主义，忽视农民底革命作用等，都是非布尔塞维克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底布尔塞维克化，是从反对机会主义的指导机关及机会主义的策略而得来的。现在必须继续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尤其要反对左倾的弊病。所谓"左倾"的这些危险倾向，也只是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别一方面，影响到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

5 党的任务

一四 在党内工作方面的任务

现在，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丧而减低了战斗力，党底主要任务就是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底无产阶级化：

（一）恢复被破坏的支部以及各级党部，特别注意大生产大工厂中党底支部底建设和发展，因为这里是工人阶级主要群众集中的地方。

（二）积极地在工人之中征求党员，继续引进工人同志的积极分子加入党底指导机关，务使指导机关工人化，同时，当然要注意纠正这种问题上的几种偏见和不正确的倾向。

（三）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地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地讨论和集体地决定主要问题；同时反对极端民主主义的倾向，因为这是可以破坏党底纪律，不负责任的态度可以因此而增加，而且损害党底指导机关底信仰。

（四）肃清党内一切纠纷，地方主义，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因为这些倾向是损害党内的统一，减低党底战斗力。取消所谓“惩办”制度；对于工作有错误的同志，如果不是有系统的有路线的坚持自己错误的同志，应当纠正他，并且在工作中去训练他。凡是同志犯了错误，他要是能纠正过来，应当使他工作而表现他的改正。

（五）加紧党员群众底教育，增加他们的政治程度，有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革命过去几个时期底经验。

（六）加紧宣传武装起义策略底正确观念，宣传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底政权的总任务。

一五　在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及职工运动方面的任务

（一）党底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底大多数，使他们自己积极地赞助阶级底先锋队——共产党，信仰共产党，而且自觉地接受党底指导。更加充分注意职工运动，尤其是产业工人，这样才能加强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

（二）为实行这一任务起见，必须立刻纠正旧的错误观念，——对于党与阶级关系的错误观念。这种错误观念，便是仿佛认为党是站在阶级之前的一种特殊的力量，可以帮助阶级，可以命令阶级，而不知道党只是工人阶级中最觉悟的最先进的一部分。

（三）坚决地反对对于自己阶级应用强制和命令的办法，反对强迫罢工以及强迫进行武装斗争的办法。大会认为这种方法是与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底利益相违反的，足以断送中国革命的。

（四）最大限度的努力，要用在恢复革命工会的工作上去。对于真有群众的工会，即使是反动的，党员也应当加入进去，以达到争取工人阶级群众的目的。

（五）有系统地各方面地努力工作，使工人群众最终地脱离对国民党的幻想。详细地对于群众解释中国革命底教训及中国共产党底策略和任务。

（六）凡此一切工作，都是争取群众的必要条件，都要在斗争底过程中去实现，要十二分加紧地领导群众底日常经济斗争。

一六　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主要任务

（一）农民运动底中心口号，是没收地主阶级底土地交由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

（二）战术底路线是：主要的敌人是豪绅地主，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紧反对富农的斗争是不对的，因为这就混乱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但是并不是说要放弃对于富农半地主的阶级斗争。

（三）赞助农民的游击战争，而且要使他深入，使他团聚起来。引导农民到有组织的斗争，到自觉地创立苏维埃政权和实现土地革命的斗争。要去联络乡村中的农民运动和城市中工人阶级底斗争。

（四）建立工农革命军，在现时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因为特殊的政治环境，现在这一任务，应当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这一任务底成效，可以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生长底一个动力——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

（五）加紧注意农民底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底秘密结社等等）。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组织之中的指导作用。

（六）赞助并领导农民群众底部分要求，抗税、抗租、抗债以至于减租等等，以组织广大的农民群众。

一七　党在苏区底任务

过去许多苏维埃区域中，有忽视发展扩大革命区域的错误，并有以党代替苏维埃的错误倾向。

今后的任务是：

（一）发展苏维埃底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底基础的。

（二）最大限度的发展正式的工农革命军——红军。

（三）澈底的实行土地纲领。

（四）建立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引进广大群众参加管理政事。

（五）坚决地肃清反革命的阴谋，澈底扫除统治阶级政治上经济上的权力。

（六）保存商业的货物交易，战胜均产主义的倾向——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如均分小商人小手工业等等底财产），因为这种办法，可以加重经济破坏而动摇苏维埃政权的。可是要知道店东小资产阶级底怠工是可能的；应当加以预防；应当有正当的经济政策。

（七）最大限度的保障与邻近城市及工人运动的联络。

（八）当苏维埃政权能扩大到城市中心的时候，要澈底地改良工人阶级生活状况。要尽可能地使工人群众积极地参加苏维埃，要实现苏维埃中无产阶级分子底领导权。

一八　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与反军阀的斗争

（一）积极地力争反帝国主义反军阀斗争底领导，引进极广泛的工人群众来参加，以及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暴露赞助帝国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底罪恶；联结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军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积极地领导兵士群众以及贫民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实行反对军阀的严厉的斗争。

（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之中，在公开的或秘密的条件之下，力争革命工会底存在。无所畏惧地要求群众运动的自由，以至于自动地实行这种自由。

（三）运用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口号，反抗军阀压迫的口号，要求最大限度的减税减捐的口号，实行反对高利盘剥的斗争（组织信用合作社，生产及消费合作社等等运动）——使大部分不剥削别人劳动的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及劳动者，游民无产阶级等等，离开国民党及民族资产阶级。

（四）赞助店员手工工人艺徒苦力底经济要求。组织这些城市贫民的小资产阶级，宣传他们，使他们在组织上与无产阶级直接联络起来，使他们知道革命胜利之后，会有由社会来组织他们的集体生产之必要。

一九　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赞成中央十一月会议及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国民党各派的决定，就是认清他们都是反革命的派别。他们代表买办地主豪绅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系各派，还有一部分与统治阶级联盟的小资产阶级。汪精卫的左派，张发奎、陈公博等，也是一样的反革命，在南昌武装起义与广州武装起义期间，这一派完全变成法西斯蒂派。他们表面上左派的空谈，实际上不过是要掩饰自己的投降地主资产阶级，而实行对于工农的屠杀压迫政策。

（二）在对待国民党中，党底主要任务，是要准备推翻它的政权。现在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就要这样来准备推翻国民党：争取群众，使他们围绕着中国共产党，同时亦就要对于国民党各派底反革命罪恶，不断地尽量地攻击；对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各派的政权，尽可能的要加以打击，不要放过一切可以损伤敌人力量的机会。这些就是准备推翻国民党的方法。

（三）大会同样赞成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邓演达、谭平山的所谓“第三党”的估量。现在在阶级力量“两个极端化”的条件之下，阶级矛盾非常剧烈的情况之下，这一类的“政党”，既没有广大的群众，就必然要成为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专来到群众中散布许多蒙蔽阶级意识的迷药，例如要求“国民党恢复民众运动和工农政策”等等，他们是要来削弱工农反抗国民党的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所谓“工农党”，“第三党”，等等的任务，就是指斥他们在反帝运动和民众运动中的动摇犹豫和妥协，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底奸细。

二〇　军事问题与兵士运动

中国革命中军事动力有一般的重要的意义，武装起义中军事技术之准备又非常必要，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都使共产党更要特别注意军事问题和兵士运动。

党的任务是：

（一）广大的反对军阀战争运动，破坏军阀军队，努力争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提出兵士应当得到土地或工作，“改良兵士底生活和待遇”等等口号，去发动兵士的群众斗争。

（二）建立苏维埃区域内的工农革命军，扩大革命的正式军队，巩固军队中的党的指导。

（三）最大限度的加紧工人和党员的武装训练，尽可能的建立工人自卫的秘密武装（纠察队等）。

（四）训练党的军事人材，造成最可靠的工人和党员军官。

（五）加紧与军事有关的工人之中的工作（兵工厂等），加紧交通工人的工作，使这种工作与军事工作发生一定的关系。

（六）开始有系统的破坏帝国主义驻华海陆军的工作，特别注意印度、安南等的兵士运动。

二一　中国共产党与各国共产党联络的问题

第六次大会为加紧与各国兄弟党密切联络起见，认为必须：

（一）实行互相经常的报告自己工作及革命运动之发展。

（二）中央委员会派遣负责代表团赴主要的各国兄弟党，以便决定密切联络的具体办法，并决定共产国际其他支部赞助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三）委托中国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的代表团，对于各国兄弟党赞助和参加中国革命运动不充分的问题，严重地提出讨论。

（四）巩固与日本共产党的联络，与之共同一致地反对日本出兵干涉中国，共同进行破坏驻华的日本军队的工作，鼓动日本兵士转到革命方面来；并且共同决定实际办法以进行中国境内日本企业（如南满路之类）的职工运动。

（五）要求英法美共产党加紧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作，选择充分的工作人员，到中国实行破坏列强驻华军队的工作，加紧在各国宣传赞助中国革命，暴露各该国帝国主义政府底侵略阴谋。

（六）此外，关于安南底职工运动与法国安南共产党的关系，南洋群岛中国工人运动与马来群岛共产党（爪哇共产党）的关系，蒙古问题与蒙古的革命党关系等等——都应当要与各该国共产党讨论实际的互相联络的办法。

（七）经过赤色职工国际与国际红色救济会，加紧与各国工会及世界一般的劳动群众联络，使他们能够加紧对于中国革命及群众组织的赞助，尤其要扩大反对中国空前的白色恐怖之宣传。

二二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而且是本决议案底基础，这两个决议案应同时为这一时期决定一切政策底方针。

二　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

1　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准备工作

党在准备武装起义中的主要任务，在于造成那维持并巩固苏维埃政权的先决条件。夺取了某地方的政权以后，党的主要困难，便在维持并巩固这个政权的问题。因此，党在取得群众使之参加武装起义以外，应事前采取种种必要办法，以组织城市和乡村将来政权之核心，俾此核心能于夺取政权后，准备各种必要动作，此核心的组织就要成为夺取政权后的政权机关，其意义，列宁在他那“布尔塞维克能否维持政权”一书中，已经指出来了。列宁说：“如果革命阶级的民众创造力没有把苏维埃建设起来，则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就会无望。因为无产阶级既不能用旧机关维持政权，而新机关又非一下便可建立起来的。”

中国革命的全部行程告诉我们，要把像俄国十月革命前那种“二元政权”（一方面是苏维埃，另方面是临时政府）的局面重现于中国，是少有可能的。十月革命前，将来的政权核心曾与旧政权对峙。但这在中国是难能的。而且我们预料经过工农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后，新政权必将即时实现，这就是说和俄国一九一七年苏维埃事前能够公开存在，不会一样。因此，中国共产党便须一方面采取必要办法，事先秘密建设政权的核心，另一方面采取必要办法，俾武装起义后可以坚决而敏捷地成立政权机关。

中国党应利用苏联苏维埃建设的经验，普遍此经验于党员及广大群众中去，俾预先准备干部人才，以敏捷的建设政权机关。党应在预定的各武装起义区域中，预先普遍地明了地传播苏维埃的理论，宣传苏维埃政权之一切具体形式与具体工作，准备民众在该区域起来时，有迅速建设苏维埃的可能。除宣传工作外，党还应做组织上的工作。这里，可以采上海的旧例，即把民众代表会议于夺取政权前秘密选好。但在中国现在秘密条件下，能否这样选举政权，很难说定。大概适当的条件是不会有的。因此在每一企业内，每条街道上，党应经过支部、党员个人或可靠的工人，预先准备起来，使他们能成为选举苏维埃时的干部，能实现革命委员会和民众间的联系，能参加将来的政府，能充任该区该企业该街道上的政府的代表者。党应预先拟定将来革命委员会大概的分工计划及最近将来的命令。党应派遣代表往各大乡村实行组织地方政府的工作，这些代表应与农民协会，游击队伍，积极而有威信的农民及一切能帮助实现武装起义的组织发生关系，并准备且择定革命而有威信的农民，俾他们能够掌握该区的政权，且加入该区的革命委员会。在这些分子中，必须绝对保证党的影响，以组织革命委员会。

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乡区的可简称农民代表会议）。中国的苏维埃政府的正式名义应当是：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2　夺取政权后的任务

夺取政权后的根本任务，即在建立足以保证新政权及其革命政策之实现的政权机关。如果认为这个机关只是一种执行工农兵代表会议的决议案的技术机关，那就错了，这机关的任务与作用，要比一个技术机关广大得多。列宁在他上述这本书里说：“或以为二十四万布尔塞维克党员不能指挥俄国，不能代表穷人利益去反对富人。但这二十四万人已经领导着一百万以上的革命民众。……我们国家机关已经有一百万人，他们在思想上都是忠于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并不是希图每月二十号多领些薪水。不但如此，我们还有个‘神妙的方法’，一举手能把国家机关增大十倍。这方法是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曾有过的，也决不会有的。这件‘神妙的’事实，就是吸收劳动群众，吸收贫人来参加管理国家的日常工作”。

“为要减轻那些空前的困难与战争所留下的贫苦，为要补救那些战争所赐与民众的可怕的疮痕，我们便必须采用革命的民主，必须采用革命的办法，就是要适合贫民利益，分配房屋等。同样，城市和乡村的食粮，衣服靴鞋，土地等等，也要适合贫民的利益去分配。这样，我们便能立刻吸收千百万人参加国家机关。这样的机关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曾有过的。这样的机关，只有我们才能建立起来，因为我们能够得到大多数民众底完满的同情。这样的机关，只有我们才能建立起来，因为我们有许多觉悟的，

经过资本主义长久‘教训’而纪律化的工人（我们并不是徒然在那里受资本主义‘教训’的）。这样的工人能够建立工人民警队，且渐次扩充为全民的民警队。觉悟的工人能够吸收真正劳动群众与被压迫群众，并应该领导他们去参加‘管理政事的事业’。最重要的是要使被压迫者和劳动者相信自己的力量，在实际上劝导他们，使他们知道自己能够而且应当起来管理，周密的、有次序的、有组织的、根据农民的利益，分配面包，分配各种食物、牛奶、衣服、住房等等”。这种由劳动者所成立的新政权之最广大的机关，应在苏维埃或委员会的临时政权机关之周围，组织起来。

3 苏维埃与革命委员会

在正式的代表会议（苏维埃）未组织以前，最初的政权形式是临时的，即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应由参加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组织之代表成立之。工作开始的第一天，便须把革命委员会的和武装起义参谋部的职务划分清楚。武装起义参谋部应受革命委员会的指挥，且宜迅速变为红军司令部，指挥该区的一切军事行动，准备动员工人的力量，组织红军的军需和其他需要，以及防卫该区内一般事宜。至革命委员会应即变成政权机关，应付民众一般的需要。革命委员会在它组织的第一天，应即宣布新政权的成立，并着手准备成立正式的代表会议政权。革命委员会是临时政府，“代表会议”（苏维埃）是正式政府。革命委员会仿佛是“代表会议”的筹备会议，它应当立即筹备召集“代表会议”；代表会议的成立大会，就是正式政府宣告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应绝对保证党的训令之执行。在军队中或地方民众中有影响之分子，应当加入革命委员会；可是，如果他们在加入后，立刻就表明他们不能在革命委员会中稳固的保证我们党的组织，那么，我们便须立刻设法使他孤立，并布置一切，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把他从革命委员会中开除出去。革命委员会应采取种种办法和群众发生关系，准备建立代表会议政府。因此，革命委员会应定期的召集工农（贫农）兵士代表开会，报告自己的工作，利用参加这种会议的分子去实行并督促革命委员会决议案之执行；革命委员会并宜在该区广大的工农手工业者大会上，报告自己的工作。及至建立了经常行动的正式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便可巩固该区政权，获得民众充分的实际拥护，使民众保障代表会议确有革命的成份及革命的政策。

4 组织红军

革命政权成立的第一天，便须设法组织红军。以武装起义的队伍做红军的基础。革命委员会在党的、职工会的和农民协会的帮助之下，必须以武装起义的队伍编成常备红军。更召集农民协会和职工会内的革命分子，作为红军将来的干部，作为红军最可靠的柱石。招募军队的办法，应从未婚的青年人着手。红军刚成立的时候，只能招募一般革命分子（即党员、团员、职工会或农民协会的会员）以及可靠分子充当。在红军成立以后，应当实行按照一定年龄征兵的办法（这只是对青年人而言）。募集的军队应过军队的生活。

现有游击武装起义军——也须用同样的方法去招募队伍，军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成

份须重新改组，使之成为常备的红军。

5　指挥员与政治工作人员底成份

我们必须从农民，工人和游击武装起义队伍中（反对地主的农民，有军事经验的工人）创造出自己的军事指导人材。

革命委员会应该立即设法开办短期军事训练班，以资提高革命工农的军事知识。

我们还可利用旧式军队中富有军事知识的人充当军官，但只宜利用下级的军官，高级的则不能经常的利用；他们的军事知识并不充分，且易叛卖革命。

政治工作人员尤其是政治委员应有很大的作用，只有共产党员才许担任，最好是工人或佃农出身的党员。如果军队中共产主义的影响很弱，政治委员及政治工作人员，尤其应该如此选派。

6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在军队中应组织党的支部和青年团的小组，后者宜直接服从前者。为领导政治工作起见，宜组织政治部。政治部的工作不仅限于军队以内以及鼓动人民，并应在战线各区域内组织革命的政权。因此政治部宜另设政务科，在战线各区域内，它的命令便是最高政权底命令。革命委员会和政治部也是应该准备各该区域内苏维埃的基础。

7　军队的给养与服务

各处无论在财政方面或物品征收方面，都须组织集中的军需机关。海陆丰苏维埃存在的经验，便是一个最好的集中的模范。为组织集中的军需机关起见，各区司令部应协同该地方革命委员会组织全区的军需机关，并指定办事人员管理各军供给事宜，设立粮食储藏处，尤其要注意供给底集中化。供给的权限宜集中于该区司令部之手。须竭力反对（另本无“反对”二字——校者）利用贫民服役军队。地方革命委员会应布告人民以革命所需要的人伕数目，首先须要征调富农。

8　反对反革命的斗争

在城市中应组织特别机关与反革命斗争，在该机关下，应有特别队伍，由工人组织之。宜学习过去在广州实行恐怖手段的经验。广州的恐怖手段虽极剧烈，然带有毫无系统的性质。只杀死了反革命的走狗，而未杀死反革命的头目。在广州（另本此处多“工人农民”二字——校者）之被诛杀者，虽为数甚巨，然广州的军事领袖及反革命势力之领导者却毫发无损。恐怖手段宜有系统，并应打击反革命的头脑。武装起义胜利的第一天，与反革命斗争的机关，便应将地方上资产阶级、地主、军阀、流氓的头目拘捕数十或数百人做抵押。同时并通告全体人民说：这些抵押人应负城市保安之责。在乡村中亦应拘捕些地主、绅士来做抵押人。

反对反革命的斗争机关，应登记人民的枪械，以便能在必要时立刻没收。武装起义胜利的第一天，便须解除商团、流氓和土匪的武装。私藏军械者，概处死刑。对反革命斗争的机关第一天便应举行人民的登记，统计曾经服务军队或军事机关的人员，因为他们以后还有成为反对苏维埃政权之暴动队伍的干部之可能。凡一切地方的、绅士的、大商的、地主的团体都应完全解散，禁止。反动分子组织任何团体的企图，都应予以严重的惩罚。

在乡村中与反革命的斗争，应由特别的农民自卫机关执行。农民协会会员，参加武装起义者，乡村中可靠的分子，都可以加入农民自卫机关（农村民警队）。其责任就是维持乡村秩序，镇压土匪，镇压反革命。

在城市中则须组织平民民警队。旧时警察不许在民警队内服务。

9　苏维埃对旧时军队的关系

对于投降革命的军队，应持特别慎重的策略。革命委员会应先解除其武装而改编之，并遣散其不稳的分子。这项工作，革命委员会应尽力完成。旧军官须更调，但事前在兵士中宜有相当的工作。更调旧军官应在“兵士升擢新军官”的口号下实现。凡投降革命的军队均应完全改编，决不宜优容不变。这些军队的兵士宜编插于游击队或红军中；如不能立刻做到，便应更动其军官，派政治委员严厉监视之。

10　对土匪的关系

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11　对迷信与半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红枪会等）之关系

在宗教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里（红枪会等等），我们应在民主化的口号下进行工作，并夺取其群众。同时应揭破其首领的行为，使与群众分离，陷入孤立地位。我们须坚持改编这类军队的办法，把他们改编到常备的红军内。如果他们在战争中确能表现纪律化，并忠实于新政权，始可全部保留。

12　民　团

只可以利用民团底部队（因为团丁大半是农民）。在民团长官投降革命后，应开除其军籍，全体民团解除武装；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利用其部队。但无论如何，决

不准民团在农民自卫机关（农村警卫队）或城市平民警卫队内插足。民团底部队，该送往前线上作战。

13　武装起义口号之实现

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一天，便该颁布土地法令及改良工农生活的命令，并宜组织专门机关，实现这些命令。这些命令在开始实现时特别重要。革命委员会在第一天便须予工农以实际的利益，如没收富豪的住室衣服，分给工人及一般贫苦群众，资助失业工人等。每区内在颁布法令以前，须详加考虑，务使一般的命令与武装起义的总口号相联结。

为巩固财源起见，须立即没收城市里的地主和军阀底财产。开始便该把银行收归国有，这乃是监督地方财政和市场之强有力的武器，并以新政府之信用制度代替旧银行之信用券。统计该地资产阶级底资本，把财政的监督权完全集中于政府手内。统计银铜等现币总额，禁止现币输出苏维埃区域，违者由肃清反革命斗争的机关处以严刑。

政府机关应速即设法以充实苏维埃的财政。为达到此目的，可对殷实之家施行临时征发，没收反革命者的财产并实行累进所得税制。苏维埃政权应预先考虑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反抗的可能性，因此应预先规定各种办法，如进行给养事业，设立合作社和国家商店等，并由自己监督之。

14　工人监督

实现工人监督的口号意义非常重大。列宁曾在他一篇论文里说过："问题底要点，不在于没收资本家底财产，而在于全体人民在各方面来监督资本家及其一切可能的拥护者。仅仅没收，那是什么事也做不出来的。可说没收的本身并未含有组织和正确分配底成份。我们只要能够防止种种谎报，假造账目，违法作弊，我们就不难用公平的税则代替没收。想要防止这种可能，便只有工人政府底工人监督才办得到。"

工人监督须经过职工会，工厂委员会，手工业工人的工会及一切有组织的劳动群众来实现。

再则，设置相当的机关监督该区一切经济事宜，并统计该区经济的财富，这个机关就是国民经济部。该部宜有广大的民众参加工作，办事员由大工厂中工人选出担任。国民经济部须统计一切经济富源，工厂企业，并号召一般工人实行监督这种经济活动。

15　组织苏维埃

地方政权已经巩固，便应组织苏维埃。党委员会应估计当地情形，斟酌组织苏维埃的时机。但在武装起义前及武装起义实现后，党即应有种种组织苏维埃的准备。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决不应当像在广州那样（在广州，实际上只有过革命委员会，而非苏维埃），而是要像在海陆丰和一部分在上海（人民代表会议的形式）一个样子。苏维埃不应当仅仅根据上层组织底代表集合。选举时应由工厂工人，

各马路工人和贫民，工会工人，手工业者（手工业者全体大会，而不是职业会底执行委员会），学生等执行，并宜包纳各地下层组织，职工会及党组织底代表。代表成份的分配，应使大多数为直接选出的工人和贫民，并应随地酌定选举条例，务使苏维埃底革命影响得到保障。对于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应看各地革命的深入程度，政权的巩固程度，阶级的分化程度等等而定。苏维埃中，应有小资产阶级下层成份的代表。本处驻扎的革命军队的兵士亦应参加苏维埃选举。选举苏维埃与进行苏维埃工作时，产业工人应有特权，以保证其在苏维埃中领导的作用。

我们应该牢记下面列宁所下的苏维埃的定义："苏维埃乃新的国家机关，它给我们以（一）工农的武装力量，这力量不像旧式军队一样是脱离民众的，而是和民众密切联结的；从军事上讲，这力量比以前的军队强大得多；就革命的意义上讲，这力量是任何东西所不能代替的。（二）这个机关是和群众及大多数人民密切无间的相联系的，容易考验自己的错误，容易恢复意外的创伤，这是从来国家机关所未曾梦见的。（三）这个机关由民意所选出，因民意而撤换，没有官僚主义的空架子，所以比从前的国家机关不知要更民主得几多倍。（四）它在各项职业间实现密切的联系，所以没有官僚主义，而能促进种种深入群众的改良。（五）它是先锋队，是被压迫的工农阶级中最觉悟最努力最先进这个部分底组织形式，这个先锋队可以经由这个机关来教育、训练并领导这些被压迫阶级的全体广大群众——直到而今还是僻处于政治生活及历史之外的群众。(六)它兼有议会主义及直接民主二者之长；人民选举代表同时有立法及行政之权；和资产阶级的议会政策相较，这种进步，在民主主义的发展上，实有全世界的历史意义。苏维埃只有取得全部国家政权以后，才能真正发展，才能充分展开自己的本能和能力。倘不如此，则苏维埃便毫无长处，不成为嫩芽（嫩芽是不能长久存在的），便流为玩具。'二元政权'是苏维埃底瘫症。"

列宁所下的这个定义把苏维埃目前和过去的作用，说得明白已极。至苏维埃制度和其他组织的关系，也可以由上面体会出来。

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议）的代表（议员）应提到苏维埃的工作中，执行苏维埃的决议案，或督察决议案的执行。

苏维埃的会议不应如上海市民会议的实行经验，具有那样群众大会的性质；更不应如广州苏维埃的实际结果，仅仅只有由高级机关直接指挥的机关——广州苏维埃之所以如此，因为它太窄狭了（总共只十四到十六人）。

苏维埃政权，从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应号召广大的劳动群众起来反对苏维埃政府中办事人员可能作出的各种流弊，如官僚主义，办事迟钝和滥权舞弊等等。

苏维埃计划当地及全国的主要政策，为更普遍的提高苏维埃委员会的效率起见，应分置各部，执行各项职务：

一、军务部（组织防卫队伍及红军）。

二、财政部（税务，没收及处置财产等）。

三、市政部（管理学校、自来水、救助病人等）。

四、社会保险部（劳动法，分配好房屋给工农和分配工作）。

五、国民经济部。

苏维埃代表须按期向选举人报告过去工作，选举人有撤回旧代表另换新代表之权。

城市苏维埃须包纳近郊农民和全区农民的代表，使他们成为该农区的革命中心。为执行城市的经常工作起见，应选出执行委员会，包纳该城市或该区重要组织的代表：军队、职工会、镇压反革命并供给必需物品的职员等。执行委员会人数约自十一人至二十七人。执行委员会选出常务委员会，这个差不多是该地的实际政府，人数约五人至七人。

这些机关的党团，都须绝对执行党的指示，并且一切最主要的政策，都该由该地党委员会批准。

16　苏维埃与职工会，武装起义司令部以及革命军队等的关系

苏维埃从成立之日起便要成为真正的政权；因此应当铲除前此在斗争过程中成立同样组织时所犯的错误。例如上海一九二七年三月武装起义时，市民会议实际上不是政权，仅是死的组织，真正的政权却集中于职工会和工人纠察队司令部手里；因此，上海市民会议就和广大的群众隔绝，不能发生经常的灵活的关系。

这种情形也令职工会感受极有害的影响；职工会于是不复成为职工会，而成了政权，遂丧失了它与工人经济斗争的通常联系。而政权因此和贫民及劳动群众隔绝，更为危险。广州武装起义胜利时，政权实际上属于职工会的苏维埃，职工会遂不能执行工人阶级经济组织的工作。事实上职工会的苏维埃虽代表新政权，但并不曾建设政权的执行机关。

对于黄色职工会及其他贫民或劳动群众的组织，我们应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此种组织应分化之，打击其首领，而非打击其群众。当广州武装起义宣布黄色工会解散时，我们把它的群众和首领一般看待。这种看待，这种错误，我们以后务须避免。俄国的苏维埃政权不曾封闭黄色工会，但积极和它的首领斗争，因而获得其群众。在中国也该采用同样的策略。我们如果用武力压迫组织内的群众，则他们可以变成反对苏维埃的力量。

苏维埃应和职工会建立正确的关系，使有组织的工人的代表能在苏维埃内占主要的地位。

所有派往苏维埃的代表，关于苏维埃底工作应对工人有经常的报告，同时关于工会底工作，亦应在苏维埃中作有系统的报告。凡工会与苏维埃一切纠纷，应由企业中派代表所举行之特种会议解决之。凡涉及工人阶级根本利益一切法律和处置，应预先会同该地职工运动之指导机关讨论之。

工人纠察队和红军司令部，应服从苏维埃。苏维埃应坚决采取各种可能手段以保障自己对于兵士群众和对于军官的影响，并可因此监督红军底一切动作。

17　苏维埃和党的关系

党在各处苏维埃中，均应有党团的组织，经过这些党团，经过党员所发的言论，表示党对苏维埃工作上各种问题的意见。党随时随地都应作苏维埃思想上的领导者，而不应限制自己的影响。不过，党应预防以党代苏维埃或以苏维埃代党的种种危险。党应预先保障其在苏维埃领导机关中的领导作用，因此，党须在苏维埃中，组织有威望的、能

工作的党团，以执行党的命令。但是以当地党部代替党团，那就是一种危险。党团只执行党部的指示。当党团和该地方党部的影响不能保持平衡，而后者的作用较小时，苏维埃常有代替党的危险。苏联革命后最初几年，在有些地方，党底作用几乎缩小到极端，这种经验应该顾及。在中国，也有以苏维埃代替党的危险。苏维埃政权之正确的组织是要以党底坚固的指导为条件的；为要达到此目的，必须注意党组织底工作，勿使其发生较弱的现象；所以在党组织里工作的同志，不应当较在苏维埃中薄弱。党经过苏维埃或其他组织内的同志，应该在一切条件之下，应该公开在苏维埃中，在苏维埃工作上增高和巩固党的影响。

18　乡村中政权机关的组织

当乡村中发生武装起义时，应在该地组织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的组织在武装起义前就要由党部规定。在革命委员会中，应吸收农民运动中最坚决的革命领袖，尤其要吸收乡间住的产业工人及出身城市或归自城市的工人。这些产业工人是乡村中党的作用的一个台柱，所以党应该非常审慎的利用每个工人做革命委员会的工作。

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应择具有广大农民运动和多量农村工人的地点，这些工人尤能坚决拥护各种革命政策，而为共产党最可靠的基础。在农民协会中须有革命委员会的基础，特别重要。革命委员会应以农民协会为基础，而成为革命的政权，不应以农民协会为政权（形式上革命委员会应当是农民协会等，在将武装起义前选举出来的）。革命委员会的工作，在该区人民中，尤其是在农民协会的会员中要尽量通俗化。为避免农民协会与革命委员会的冲突起见，可以把农民协会底领袖包纳在革命委员会内，并将农民协会全部负责人材，吸收在政府机关内，在革命委员会中，应保障那些积极参加武装起义的农民之领导作用。

当地的政权，尤其是城市中的政权一经巩固，就必须由该区全部劳动群众选出苏维埃，以代替革命委员会进行经常工作。农村里的工人及该区里的工人，应有特殊的较多的代表。

苏维埃选举常务委员会，应包纳该区最主要的领导者，自然更要保障党在常务委员会内的影响。

苏维埃政权的行政的中心地点，不一定仍驻原来旧政权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官僚最多），须择定足以保障工农革命影响的地点。

小城市内，没有工人，便该将该城苏维埃和近郊农民苏维埃联合起来，使苏维埃中的领导作用，归于农民。

19　农民协会与苏维埃

首先就要避免革命委员会与农民协会间的冲突，然后在农民协会基础上建立并扩大革命委员会，以代替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应准备苏维埃组织的基础，苏维埃则应执行农民协会的全部作用。

不过对于农民协会要非常审慎。在大多数人民尚未深信有组织苏维埃之必要时，不

可解散农民协会。惟农民协会变成了上层农民的组织，则须以农民代表会议来与它对立，使农民代表会议成为贫农群众所拥护的机关，使大多数人知道农民协会招牌已为富农土豪等所把持而迅速解散之。在没有农民协会的乡村中应直接组织苏维埃。但若下层的群众要求组织农民协会时，那便不可坚持反对他们的组织，而应主张多开农民协会的群众大会，尤其是代表会议，使渐变成农民苏维埃。

20　苏维埃区域中党的工作

在苏维埃的区域中，党自己的工作和大多数的党员，应普遍的公开，但是必须留下小的秘密机关，处在秘密的状况中。在成份上，党应扩大自己成为群众的组织，但吸收党员，须非常严格。在苏维埃区域内，实行清党，以便肃清混进党里来的富农及奸恶分子，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工人及乡村工人，入党时应受优待。

党应该特别注意贫农和工人的组织，因为他们是农村中拥护党的政策的主要成份。党应该处处准备退却时所应采用的手段，保留党的活动力量，交通，且须预先建设秘密的党部和工农组织。

21　苏维埃区域的扩大

当地的革命委员会、党部及苏维埃，务要尽力扩大自己的领土。这是他们存在的根本保障。领土的扩大可由两方面进行：一方面，苏维埃当以武力进攻邻近的反动区域；他方面，帮助邻近区域发动群众武装起义。因此红军的进攻应当与邻近区域的武装起义相呼应。苏维埃政权更应派遣全权代表往邻区去，准备和组织该区内的政权核心和武装起义。这种种行动要与红军的进行相策应。如果该地工农群众见解狭隘，只图保护本地的苏维埃政权（地方主义），则党应用全力打破这些地方的偏见。党应扫除这种偏见，说明不仅自卫，且要进攻，乃是苏维埃政权存在的唯一保障。

三　土地问题决议案

1　中国底土地关系

一　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

农民的土地革命，仍旧是中国革命现时阶段底主要内容。中国革命所经过的时期，并没有使农民得着胜利。不但如此，封建地主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暂时胜利了。他们的力量，暂时团结而镇压农民，所以乡村里的统治阶级更加凶恶地压迫农民。同时中国革命现时的形势，正在乡村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剧烈与深入之中发展着。

从最近几年的经验中，可以看见：中国农民的斗争，是反对一切封建的束缚，反对

农业之中的一切中世纪式的剥削；而斗争的主要的目标，是要推翻地主的封建式的剥削和统治，力争乡村社会制度底完全民主化；这种斗争，都表示农民是在要求得着土地，因为土地对于农民，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及维持生活的来源。

二 农民底种类和土地关系

中国所有可以耕种的地亩，极大部分（至少在半数以上），尤其是肥沃的田，是集中在地主阶级的手里。其余的土地属于农民。农民之中，又可以照他们的经济状态及土地的多少，分为几个集团（富农、中农、小农以及最小农）。中国差不多没有欧洲式的地主经济，而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中国所有可以耕种的地亩，都分割成极小极小的经济单位，由成千百万户的农民生产者的群众用中国式的农具来耕种。

中国几百万户的农民群众，大半是极小的农业生产者，他们之中的极大部分，可以分为：（一）绝对无地的农民（佃农）；（二）小农自己土地太少的，还要承租地主的田的（半佃农）；（三）小农自己有土地的，但是仍须做些其他工作，以补耕田的不足的（自耕农）。

中国农民之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是无地的农民和地少的农民。他们是历史上地主兼并的结果。兼并土地的过程之外，同时还有土地集中在非农业的阶级（“金钱资本家”）手里去的过程。农民所有的土地一天天地减少。因此，农业生产者（亲自耕种的人），极广大的农民群众，一天天更加受地主阶级的束缚。

在如此情形之下，中国土地关系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占有制度的问题。同时，土地使用关系上的剥削亦就成为剥削农民之主要的根本的方式。

三 中国土地关系底特点

中国土地制度的发展历史，是和大地主与小地主互斗的历史有密切关系的，再则，中国经济的发展有许多特殊条件，因此，最近几百年来，土地制度之中发生出许多特点，其中最要紧的是：

（一）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制度日益占着主要地位（土地大半可以买卖）。

（二）“物产地租”仍旧是很广泛的现象（有时仅只是表面上用金钱的形式）。

（三）在地主阶级里，小地主比较大地主占重要的地位（土地集中于地主个人的很少，然而土地集中于整个地主阶级的过程是非常之急剧）。

（四）各省地主的大小关系是不平衡的。

中国大地主的发展并不厉害；但是，地主阶级所有的田地，都是肥沃的居多，地段也比较好，中国的农业劳动又是极“强度的”（中国的农业在较少面积的土地上可以吸收巨量的劳动），土地所有关系上和土地使用关系上农民底田亩分割得极小，中国农村人口又日益增多而过剩，于是对于几万万农民群众的剥削，便非常厉害。而且地主越小，他的剥削方法越厉害越凶恶，他出租田地的条件越苛刻。

最可注意的是：中国之进步的（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方式和落后的半封建式的剥削农民的方式，互相勾结着。一方面，土地集中到金钱资本家手里去，别方面，农民（佃农）替地主做劳役的制度，还是存在；再则农民受地主底束缚，甚至丧失身体自由，要卖男鬻女；至于地主方面，用“非经济的”方法，就是说用强迫的方法剥削农

民，那就更有许多方式，实行得非常广泛。这些种种不同的方式，都互相勾结着，互相混合着。

农民破产贫穷化，土地的缺乏，更使无地的和地少的农民大受残酷的剥削，使他们不能恢复自己的劳动力，不能恢复自己的成本（生产资料），——就是不能实行“重复生产”，因为没有重复生产的根本条件。因此，一般的农业经济停滞而衰落，而极大多数的农民生产者群众，要活活地饿死。

租田制度之剥削农民，不但有地主私有田地之出租，而且还有所谓公地之出租，如族田祠田，以及寺院庙宇，官地等等。地主田地上的地租，是地主的收入；所谓公地的地租，表面是公共机关底收入，其实都是豪绅底收入。豪绅把持着公地，向佃农收租，在经济上就是地主。绅士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级（贵族）底名称；现在，凡是官吏军官甚至富商，都称为“绅商”。中国旧时地主阶级是绅士阶级；现在，凡是出租田地的人，以及富豪，在乡村之中都为绅士，享有政治上的某种特权。旧时破落户的绅士，自己虽然没有田地，却因为有政治上的特权，一部分能够把持着所谓公产，而成为实际上的地主。豪绅地主阶级，是中国官僚式封建制度之下的统治阶级，是实行政治上压迫中国农民的阶级。再有一种现象，就是地主为要镇压农民的反抗而办团防，由办团防而割据地方，转变而为军阀，更厉害地剥削农民，掠夺农民底土地，变成更大的地主，使农民渐次变为农奴。

小农经济占优势并且小自耕农占多数的地方，除地主直接剥削佃农外，还有另外一种剥削。军阀的课税制度（实际还是军事封建式的赋税）亦是一种榨取地租的方法。军阀课税是非常之重，并不比普通租田的地租少。而且军阀强迫的拉夫，抽丁当兵，征发牲畜粮食等等，简直是一种封建式的“军事的徭役”——同样是剥削农民劳动的方法。

2　高利贷与商业资本

四　中国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底作用

农民受着极残酷的剥削，几千万农家经济破坏而穷困，使农民遇到天灾战祸或者歉收的时候，简直要成千成万地饿死。再则，货币经济的关系发展，到处都已经是用金钱交易，而不是“自做自吃自做自用”的经济（自然经济——以前中国的农村经济大半是如此），市场经济的制度也已经成为统治的制度，已经笼罩一切，农民底出产品必须卖出一部分，得了钱以后，才能买其他消费品（洋油，火柴，布匹，盐等等），于是农民一天天地格外需要金钱。因此种种，造成了高利贷资本发达的条件。农民大多数每年都要借债，所以富豪便放债收息，利钱越抬越高。商业资本对于农民的剥削也是如此。中国商人豪绅，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出卖米谷给农民，或者出卖肥料给农民，他们也是放账，加上极重的利息；再则，商人买办收买原料（丝茧、茶、米、棉麦、豆、烟草等），往往也趁着农民急着要钱用，先付价钱，扣算利息，并且预先抑抵原料底价格。这种高利贷与商业资本之压迫农民和在土地使用关系上之剥削农民（出租田地），互相联络着，勾结着。中国农村的经济关系底特点，尤其是地主阶级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代表，差不多完全是混合的：一个人兼做地主和商业资本家及高利贷资本家。一个地主，他一方面

压榨佃农的地租，别方面便是债主，拚命地用高利贷盘剥农民。结果，地主简直将自己的佃户和债户，变成了农奴似的奴隶和“卖男鬻女还不清债”的债户。因此豪绅可以用这种手段夺取农民底土地——自耕农往往因为欠债而将田地抵押或典当，结果变成佃农。丧失自己土地的农民，重新要向地主去承租田地，往往就是租的自己原有的田地。收租的办法，大半还是以农产品交租。借米借钱而不能还清的农民，亦往往要出卖田地，而随后替债主（高利贷者，商人，官吏）耕种自己原有的田地。新的地主自然仍旧用放债的手段，继续剥削农民。总之，有钱的（高利贷者），有地的（地主），有货的（商人），都同是那一批人，他们用三种方法同时并进地剥削农民，有钱的变成有地的，有地的变成有货的（收取农民劳动的出产品的）甚至于变成“占有农民的”（暗中的奴隶制度，例如卖男鬻女，出卖妻子，替地主做苦工来还债）。

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仿佛石磨上的两块磨片，榨取农民的私有土地。商业高利贷资本，既然加紧地“没收”农民土地，加紧地集中土地于货币资本家之手，——同时，就使丧失土地的农民，更加受着独占土地的人底束缚而丧失其自由，出卖了田地还是欠债，于是这种束缚更加广泛起来。高利贷商业资本的作用，就是事实上没收农民的私有土地。同时，没收农民土地，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公开地掠夺土地。乡村中直接的统治阶级，富商、高利贷者、地主以及正式的统治者，军阀官僚，现在尤其是军官，他们往往公开“强占民地”，“强买土地”，“吞没田产”，“勾结讼棍，霸占土地”等等。

成千百万受剥削的农民，生产很多的农业生产品，其中极大部分被农村中的统治阶级所掠夺，掠夺他们的就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及其代表——官僚与军阀。农民生产者自己所剩的，只有非常之少的米谷，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不至于立刻饿死罢了。所以极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是在死灭的道路上。

3　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土地斗争

五　农民力争土地的斗争之意义

中国土地关系，照以上所分析的特点，很明显地表现出来：现代农村的社会经济制度，完全受过去的封建制度之余毒束缚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历史发展之特殊情形，和西欧封建制度有许多差异：中国以前的国家封建制度（所谓国有土地）与地主私有土地制度同时并存，这两种制度互相斗争。然而根本的事实并不因此而变更，这个根本事实，就是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现时这种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条件之下。凡是上述的那些中国经济底特点，土地关系底特点，很明显地是半封建制度。

如果因为现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农村经济，完全是从亚洲式生产方法进于资本主义之过渡的制度，那是错误的。亚洲式的生产方法底最主要的特点是：（一）没有土地私有制度。（二）国家指导巨大的社会工程之建设（尤其是水利河道），这是形成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一般小生产者的组织（家族公产社或农村公产社）之物质的基础。（三）公社制度之巩固地存在（这种制度根据于工业与农业经过家庭而相结合的现

象）。这些条件，尤其是第一个条件，是和中国的实际情形相反的。

许多欧洲国家之中土地斗争的意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土地与中世纪式的地主经济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土地斗争就不同。中国土地斗争的意义，是土地制度之中，几千百万的无地的和地少的农民与独占土地的阶级（大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中国农民力争土地的斗争，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私有土地者反对封建的大地主之斗争，而是几千百万完全被剥夺而绝无土地的农民（佃农），以及还没有完全被剥夺的农民（地少的自耕农），反对独占土地的阶级，力争经营使用土地的自由，脱离封建式的束缚，剥削，强制和压迫。

农民的革命斗争，在某种程度之下，虽只是简单的维持生活的斗争，但是，客观上是在力争农业经济底资本主义发展，要使自由的农民变成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

同时，因为地主与商业高利贷资本混合而纠缠着，而且大半都是合一的“兼差的”，所以如果农民不能脱离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压迫，他们是不能得到巩固的革命胜利的。

虽然如此，中国农民革命斗争底主要内容，在现时这一阶段，还是反对独占土地的阶级之斗争——这一阶级是中国社会之中经济上最有力的主要的封建余孽。

农民力争使用土地的自由，这种斗争同时也就是反对军阀的斗争，因为军阀不但在经济上和乡村中的统治阶级——地主豪绅及高利贷者，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在许多省区之内，军阀实际上是全省土地的主人。他们用收捐收税派谷等等的办法直接榨取农民的地租；例如北方有些省区，小自耕农居多数，而实际上的土地所有权是属于军阀。他们可以按照己意抽捐，使农民不能自由支配自己土地上的劳动产物。

革命的农民力争土地的运动，照过去经验看来，不免要发展到反对“半地主”的斗争。中国富农有许多是“半地主”，因为他们用雇农而剥削雇佣劳动，比他出租田地而剥削佃农劳动的程度是相差不远的。现在农民群众反对富农半地主的斗争，并非当他一个代表农村资本主义关系的人来反对的，却是当一个出租田地的半地主来反对的。这种斗争有些地方是很剧烈的。

4　帝国主义与中国土地问题

六　帝国主义侵略与中国农村底经济

农村的封建关系之余孽，还有帝国主义压迫半殖民地的制度维持它。帝国主义维持中国军阀封建式的割据，利用官僚的收刮及政府的苛捐杂税的掠夺，外国商品便更可以排斥“国货”，帝国主义并且更可以取得中国经济的最高权（关税管理，银行垄断，一切重工业，大商号等）。所以帝国主义实际上握有独霸的权力——集中中国经济生活底管理权。

外国资本主义最初侵入中国底时候，中国社会发展程度是很低的，有许许多多政治上经济上封建制度底余孽，帝国主义便利用这些封建余孽做他们的工具，用来实行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这种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制度——掠夺半殖民地的方式，就表现于外国财政资本与中国商业高利资本的密切的勾结。

帝国主义阻滞中国工业资本的发展，征服中国的封建余孽，间接的收刮农民底膏血，利用中国的一切积极的寄生虫阶级，以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商业高利资本得着帝国主义强有力的经济帮助，所以农村里的价值(原料，利钱等)大量的输出而得不着相当的代价，整个的农村是支出超过收入。

外国财政资本这样掠夺中国（中国是它商品销售的市场，是它收买原料的地方），但是除此外，帝国主义还有许多种剥削中国的方法（中国是它可以投资的市场）。帝国主义还自己开办工厂，剥削便宜的中国劳动。帝国主义还投资到中国——放出许多“外资”，还有在中国的租借地，都可以得着异乎寻常的利润，攫取中国底收入底主要机关，以保障掠夺来的利钱（关税盐税的管理），甚至公开地侵占掠夺，还要求军事赔款。外国教堂更是直接霸占田地剥削农民。

同时，中国还受着银价铜价低落的影响。这种情形，使钱业的投机商大大地掠夺农民。此外，还有许多无价的纸币库卷。帝国主义的侵入中国，不但使商业流转日益扩大，金钱的作用一天天地大起来，而且因为帝国主义采买原料，农村之中茶丝豆烟等“工商业植物”的种植增多，发展了所谓“商业的农业”。于是得着两个结果：一，是资本家多来购买田地开办垦牧公司或种棉种桑等等，土地的资本主义集中也开始了，不过这在中国现时还非常之少；二，是中国农产市场受着世界农产市场的监督。帝国主义需要某种原料，它就能用比较高的价钱收买，于是其他没有销路的原料就要少种。所以农村经济底命脉就握到帝国主义手里去。中国日益变成资本主义列强的农业原料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的趋势，是很明显的。

帝国主义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剥削，阻碍着资本主义底发展；别一方面帝国主义资本底侵入却一天天地增高货币经济底作用，扩大商业交易和货币的流转，加强“商业的农业”，使农民无产阶级化，又必然要使许多原始的（资本主义前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方式渐渐消灭，肃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国际帝国主义在中国发展了金钱和市场的权利，促进农业里宗法社会关系底崩坏及一般家庭手工业底衰落，一方面完全消灭了落后的农民的家庭工业，别方面，促进各种方式的资本主义家庭工业之形成。同时，农业与家庭工业分裂与衰落来得很快，而城市大工业底发展慢得多，于是农村之中便发现极大的人口过剩的现象。中国人民出国一天天地多，土匪流氓劳动后备军一天天地增加，工力的价值一天天地低落，同时又是中国雇佣军队底来源。

中国农民一定要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然后才能最终脱离地主高利贷的束缚，脱离官僚封建制度豪绅的压迫；同时，中国农民不消灭农村中地主高利贷的束缚，不彻底扫荡旧时的官僚豪绅政权机关，不消灭农民中经济政治压迫的主义翁——地主豪绅阶级，也就绝不能够推翻帝国主义。

因为帝国主义妨碍了中国工业的发展，使农村中的资本积累，不用来提高农业底生产技术，不投到工业里面去，反而再投到土地和高利贷方面来，更加重地用半封建的形式剥削农民。

5　土地关系发展之前途

七　为社会主义前途的斗争

帝国主义统治着中国，勉强的阻滞中国工业的发展，维持封建制度的余孽，而将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倾向变成寄生虫似的中世纪式的形式，同时，又不能不引起中国农业中相当的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帝国主义的影响，能够使金钱和市场底权力加强起来，商业的农业发展，土地买卖的过程增加。中国农业发展的途径，在这一点上说来，是和各国一样的。但是中国过去的历史发展有许多遗留的特殊状态。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因此中国农村经济的资本主义进化，有特殊的性质。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化的过程，是在一般的经济停滞状态之中，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停滞。这是中国与其他各国不同的地方。再则中国没有大农经济，差不多完全是最小的小农经济。不断的军阀混战，而且在帝国主义横暴侵略，全国一般的破产状态之中。

中国受着资本主义发展之最厉害的坏处（平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破产失业，广大的穷困等等），但是没有受着资本主义的伟大的好处（生产力的增高）。

从中国掠夺去的资本，极大部分是用在中国国境以外，而中国所得到的是群众的破产、失业、死亡和屠杀。

自然，在如此情形之下，中国境内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非常之困难的，非常之畸形的，半途而废的。这种情形是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各种可能的发展途径底共同的特点。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倾向，首先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农村中之发生富农的资本主义式的小（另本作“大”——校者）农经济——应用雇佣劳动的富农经济。自然，这种富农经济现时是很少的。

中国农民阶级分化的总过程之中，可以看见富农的经济有资本主义的成份。阶级分化的过程，是因为金钱底作用和商业底作用而发生的。这一过程底表现，一方面是中国农村之中发现剥削雇佣工人的小小的农村资本家，而别方面是无产阶级及半无产阶级的群众发生出来，所谓劳动后备军日益增加，因而增多城市里苦力工人的数量，农村之中所谓短工、长工的雇农也日益增多，所以开始造成小资本家经营农业的条件，农民中的富裕分子，便能雇用工人（雇农）而成为富农。

于是剥削雇农的方法便开始成为富农底主要的经济特点。然而中国经济的一般条件，使生产力的生长十分停滞，对于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自然是非常之大的阻碍，对于农民上层分子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阻碍。因此，农村资产阶级（富农），一方面实行雇用工人（雇农），别方面仍然要出租田地，而且还要经营商业和高利盘剥。再则，中国农民群众实际上是绝无政治权利的，农村之中一切强暴侵占的现象是常见的。在如此特殊的状况之下，一般农民之中强有力的人，便能不用经济的方法，而用直接的掠夺，侵占田地，强抢财产，如此而变成富农。不错，中国农民的阶级分化至今尚是含糊的，不纯碎的。但是在这个分化过程的观点上看来确是：一个极端上分化出农民资产阶级——富农，别个极端上分化出农村无产阶级——雇农。此外，一般农民之中

又有许多过渡阶层：中农，贫农——通常所谓贫农之中阶级的分析上还可以分为小农以及最小农，“最小农”是最接近雇农（工人）的，可以称之为半无产阶级。

至于农业的工人阶级，则为雇佣工人（长工、短工、日工），此等工人被雇佣于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及与农业相联系的工业（油坊、茶厂、糖厂等等）中以维持其生存。

最小农的特点是他还有最少数量的田地可以自己耕种（或者自耕农，或者佃农），给他们很少一部分的生活必需品；他们收入的主要部分，实际上是兼做雇工的收入（兼做短工、苦力工人等）。这种农民非常之多。而且因为中国经济的落后，这种最小农的半无产阶级与农村无产阶级间之区别，往往是很模糊的。

至于所谓“小农”，就是小耕作农，他们有田地可以自己耕种，勉强供给一家人贫困的生活，而不用雇农，即使雇用短工；同时也要自己兼做短工，那也大半是带亲友宗族之“劳动互助”的形式。然而最近，这种雇佣关系也渐渐地走到资本主义的雇佣形式。

“‘中农’的意义，在经济上是小土地的占有者，或者是自己的私产，或是租来的土地，这些土地虽然是很小，然而在资本主义之下，一般而论，这种田地不但足以维持一家生活，而且可以得着些余钱剩米，这些剩余，至少是在年代好的时候，可以变成小小的资本。他们常常要雇用雇工。”（列宁的话）

根据这些分析，可以看见农民经济中的几种基本经济形式。而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条件之下，尤其是农业经济之中，实际上可以看见许多过渡的中间形式。农民的这种分化，因各地金钱作用及商业作用之发展不同，而分化之程度也不同；金钱和商业之愈发展，农民的分化亦愈厉害；况且天灾战祸，使一般的农民生活程度降低，而加紧农民底阶级分化，穷的更加穷，而极小部分的富人更加富。

富农经济虽然很少，可是因为小农经济在中国占着完全统治地位，无论在农民自己的土地上也好，无论在“地主”的土地上也好，都是以小农经济占统治；另一方面，除农民经济外，差不多完全没有其他经济（其他耕作营业的方法，如地主的大经济，包括几百亩田地以上的农场，或者资本主义式的农场——在中国是很少很少）；因此，历史上中国农业之资本主义道路，正是上面所说的农民的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作为战胜封建残余的一定的形式。

现在可以说，在中国农业里，小的农家经济，是统治着全国，不过被封建余毒，强暴压迫等所层层束缚着罢了。

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理论上还有别一种的可能（因为工业发展得很少，生产的资本不够，所以欧洲式的模范的资本主义式的农家经济之发展是不可能的，就是说中国不会有一方面保存地主土地占有制，别方面有资本主义式的农家经济之现象），这就是：大封建地主（或半封建地主）经济变成大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

但是，这第二种可能是很少的。第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完全没有封建式的地主经济。即使认为佃农所耕的地主土地是“地主经济”，那末，要将佃农都变成雇农，使用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生产方法，也是非常之困难，因为如果要如此办法，预先就要有农业生产方法上技术革命：必须要农业的技术增高（利用人造肥料，改良水利，应用机器，改良家畜的应用方法等），然后才能真正运用资本主义式的雇佣制度，否则仍旧只能出租土地。如果照现在中国这种农业技术，那末在经济上看来，地主不出租田地而雇用多数的雇农，是很不上算的。可是，要增高技术，预先就要在农业里投一大笔资本，中国

的小地主是没有这样的大批资本的。

不但如此，即使中国地主有这么多资本，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仍旧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革命的农民运动非常之厉害，必须先将农民都镇压住了，才可以投资，否则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内政治制度要有极大的变更，否则国内战争不停止，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都不确定，土匪都没有肃清，这样投资也是不可能的。政治上这种情形不改变，封建式的强暴剥削农民，永久是农业经济中的一般现象。

所以这第二种的可能，客观上是很少的。现在的政治经济现状之下，地主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者，只有极少的可能。

现在中国的殖民区域（满蒙等处），也有少数较大的资本主义式的农村经济，农业公司，而且大半还是过渡式的半资本主义式的居多（仍旧参用出租制度）。这些农业经济的发展，遇着许多中国特殊条件的阻碍，所以非常之慢。它在全国农业之中的分量，是很小很小的。

然而理论上，中国农业资本主义式的进化，还有第三种可能的道路。这就是外国大资本家投资在中国农业，组成很大的农业公司，例如英美烟草公司的农场（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式的集中）以及其他方式。

这种道路，可以使资本主义发展底速度加强，生产力底增高加速。但是中国农业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也不能有多大的范围。因为，这是保存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还是更加增加这种压迫，简直要将中国从半殖民地变成殖民地。而要中国完全变成殖民地，现时却更加困难起来，因为现在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已经进到更高的程度，已经不是轻易可以压下去的了。

如果假定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在“地主经济”或地主租田制度转变到资本主义经济的方式中进行，——那么，农业的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是非常之慢和非常之痛苦的。要在几十年之中继续现时的状态。中国的农民还要受着更残酷的压迫，束缚，饥荒，灾害，亚洲式的屠杀，以及其他封建的余毒。

只有痛快的革命方法肃清土地关系里的封建余毒，完全消灭一切压迫束缚的方法，完全消除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才能开辟农村之中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比较快的发展——将中国农民（如佃农和农奴）变成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

但是，中国与当初的美国不同。美国的资本主义式小农经济，是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式的小农经济发展的模范。当时的美国是另一个时代，它的小农经济能有长期的发展。中国的这种农村经济的发展之可能，它的前途与美国不同。

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力既然很低，资本积累的进展自然比较的很慢。然而当革命胜利，而要开始往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发展的时候，它却要碰见一个极大的阻碍，就是帝国主义。革命胜利推倒了西欧、日、美帝国主义侵略半殖民地的工具——豪绅、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军阀等，使帝国主义必然要找新的方法来剥削中国。那时候，中国在自己的经济政策上即使只想得到半分的独立性，亦必须与帝国主义作残酷的斗争。而且中国在世界市场上与这些强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亦处于不利的地位。在这种情形之下，要自由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又是非常困难的。

在革命之后，与帝国主义作这样剧烈的斗争时，必然要把已经获得政权的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和阶级觉悟提得极高，但这是对于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的自由发

展很有妨碍的。取得政权的工农群众在这种情形之下，一定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怎样才可以更加集中力量去战胜中国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障碍？它所得到的答复，一定是赶快准备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就是说，要赶快准备各种条件，去消灭私有的资本主义市场而代以有组织的经济。局部方面，要准备条件，使工人政府能够去没收大工业生产机关，而在国有的城市大工业领导之下，去进行集体的农村经济，发展合作社，经过合作社而使数千百万农民经济与城市的社会主义工业经济相联合。但这就已经不是准备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了。这是准备社会主义发展的条件。

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已经处在完全破产的条件之下，在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必然胜利的前途之下，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突飞猛进——不讲别的，只有这一件，已经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容易得多。

中国的革命农民，除开与已经建设着社会主义的苏联无产阶级，与各先进国家和中国本国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一同前进，去建设社会主义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解放自己。

因此，中国民主革命得着胜利，农民从一切资本主义前期落后关系之下得到解放，这件事，客观上虽然是向资本主义道路进行的一个出发点，但是，在革命的过程里，它一定要转变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步，因为中国现在具体的环境，使它必然这样走。

就是现在，中国农村里面资本与劳动的冲突已经很剧烈了，以后只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一个初步的胜利，这冲突一定会更加剧烈。因此，就是现在，中国农村工人已经必须将自己组织起来，与农村中半无产阶级的分子，一同在有组织的城市工人领导之下，去与乡村中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斗争，以求前途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至于这个前途是否一定能够胜利，这当然要看将来的实际环境如何。不过有一件事是可以断定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要用斗争来解决，是要领导中国革命向这条道路上发展。

根据上面的分析，为了要完全消灭中国农村中所有的封建遗迹，为了要让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尽量发展，所以中国共产党将要采取以下的方针：

一、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另本作“豪绅地主官僚”——校者）的政权，解除反革命势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建立农村中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

二、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底土地财产，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

三、祠堂、庙宇、教堂的地产及其他的公产官荒或无主的荒地沙田，都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农民使用。

四、各省区中的国有土地的一部分，作为苏维埃政府移民垦殖之用，分配给工农红军的兵士供其经济上的使用。

五、宣布一切高利贷的借约概作无效。

六、消毁豪绅政府的一切田契，及其他剥削农民的契约（书面的口头的完全在内）。

七、取消一切由军阀及地方衙门所颁布的捐税，取消包办税则制，取消厘金，设立单一的农业累进税。

八、国家帮助农业经济。

A，办理土地工程；

B，改良扩充水利；

C，防御天灾；

D，国家办理移民事业；

E，国家由农业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经手办理低利借贷；

F，组织消费及生产的合作社；（另本没有这一条——校者）

G，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制。

九、一切森林河道归苏维埃政府经营处理。

革命完全胜利之后，在全国或在重要省份中已经建立了坚固的苏维埃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将进而帮助革命的农民去消灭土地私有权，把一切土地变为社会的公有财产。因为共产党认为土地国有，乃消灭国内最后的封建遗迹的最彻底的方法，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不论什么情形之下，在民主土地革命中不论什么状况之下，总是一定不变的力求农村无产阶级独立的阶级组织，要向他们解释，说他们的利益是和农村资产阶级的利益永远互相冲突的。要他们不受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蒙蔽，认清商品存在一天，农民群众还是穷苦一天的。要他们知道唯有彻底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才能消灭一切的贫困，一切的剥削。

四　农民问题决议案

1　农民运动发展的状况

（一）农民生活的日益痛苦　　现在农村情形，是广大的农民群众生活日益加坏。一方面因军阀不断的战争与国内经济的恐慌停滞，另一方面因为资产阶级地主豪绅的反革命得到暂时的胜利，对农民直接压迫剥削越发加剧，因此乡村中的阶级矛盾越加厉害，农民运动进到更深入更高的要求与更剧烈的斗争。

（二）农民运动的高涨与发展的不平衡　　最近几个月来，许多省份里的农民暴动与游击战争，都证明农民运动的从来未有之高涨（如许多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夺取并分配地主土地，消灭乡村统治的地主豪绅等），其范围也愈加广阔，蔓延到中国北部与满洲。现在特别显著情形是农民运动带地方性与不平衡，一方面有他的客观原因（如地方辽阔、交通不发达与经济情形的差异），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群众的散漫与缺乏组织性，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缺乏集中的指导机关。

（三）各地农民斗争中表现的要求也有差别　　在最近斗争中，全国各地农民群众所表现出来的要求的主要差别，在中国南部与中部一带，无地的农民占乡村人口大多数，其斗争方向在于反对地主阶级，夺取土地与夺取政权的问题。在北部（如河南，山东，直隶，满洲等处）则大半为小的自耕农，其斗争的方向，大都反抗军阀、官僚与豪绅等苛捐杂税拉夫的剥削和打倒军阀的政权，这些是破坏封建土地关系的另一方式，当然，同时在北方还有佃农夺取地主土地的斗争，不过现在主要的还是自耕农保持实际土地所有权的斗争。

2　农村中的阶级分化与共产党的策略路线

（一）农民斗争愈进展阶级矛盾愈暴露　过去农民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对军阀地主豪绅的一切剥削的斗争中，全体农民还可以结成政治上的统一战线，但是进到比较深入和发展的过程，乡村无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贫农与富农，其阶级的矛盾表现得非常之快，尤其到了暴动胜利平分土地的时候。

（二）中国富农的特性与对于富农的策略　富农在农民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常表现消极中立或仇视的态度，最后常更快的走入反革命的营垒中去，这是因为中国富农一种特殊的性质。他具有资本主义的与资本主义以前的半封建剥削的性质，他往往是农业企业和工商企业的剥削雇佣劳动的人，或者同时又将其土地的一部分出租以通常的残酷的形式来剥削佃农，或以高利贷来剥削一切贫农。党应当预先看见：农民必然继续分化，与富农的走入反革命营垒的不可免，所以应当在农民运动初发展时，即准备下一个阶段的斗争。

凡富农现在已成了反动力量之地方，那末反富农的斗争，应与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同时进行。

在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的可能性，因军阀官僚的压迫而继续斗争的时候，共产党应企图吸收富农于一般农民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斗争之内。当富农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时期，在不妨碍贫农雇农斗争范围之内，党不应该故意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使其更快的转入反革命方面去，而变为革命的积极的仇敌。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乃在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但贫农与富农的斗争应同时进行，决不能因为联合战线而对富农有让步。

（三）联合中农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　贫农与农村无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而斗争，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而与中农联合，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提出之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政纲，必能得到广大的中农群众的拥护，因为中农群众也是受地主阶级各种封建剥削压迫群众中的一部分。

（四）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共产党的策略的路线　在现在革命阶段上，共产党主要的策略，应该创造建设绝对大多数被残余封建势力剥削的农民群众的统一战线，从雇农起到中农止。无论任何条件之下，要特别注意于富农中的工作，防止富农的夺取贫农组织的领导权。必须在农民组织中，巩固贫农与雇农的思想上与组织上的领导权。

3　平分土地问题

（一）应赞助平分土地的口号同时应加以批评　在有很多的失业和贫苦的农民的地方，必然发生“平分土地”的运动，如果这一口号为多数的农民群众所拥护时，共产党应加以赞助，因为这是彻底肃清一切封建余孽的口号，并且是直接动摇私有制度的。

同时这个口号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幻想，党必须加以批评，使农民完全了解，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决没有真正平等之可能，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

后，才能够走上真正社会主义的建设。

（二）在中农占多数的地方，尤不可强施“平分土地”　在中农和小农私有制占农民人口多数的地方，“平分土地”必将触犯广大的中农的利益，尤其不能强硬施行。

4　农村无产阶级

农村无产阶级必须有独立的组织与政纲。农村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是党在农村中的基础，组织农村无产阶级（雇农），提出明显的政纲，并领导他们的阶级斗争，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中的急要任务。在南方几省的农民运动，已成为贫农所领导，必须在这些地方的农民组织中，组织雇农支部，以加强雇农在这些组织中的领导作用，在已有富农经济与地主经济的地方，最好成立乡村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雇农工会），同时加入农民协会，并与县工会发生联系。如不应独立组织，最少亦须在混合的农民组织中建立强固的雇农支部。手工业雇佣工人可以加入雇农工会。在满洲和内蒙的移民当中，亦应加紧工作，因为都是各省无地农民走到那边去做农业工人的。

5　妇女在农民运动中之作用

在农民革命运动求得胜利的斗争中，吸收农民妇女群众加入斗争有极大的意义。她们直接参加农村经济，在农民队伍中间占重要的部分，而且在农民的生活中有伟大的作用。因此她们必然参加到运动中来。过去许多区域中农民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农民妇女乃斗争着的农民中最勇敢的一部分，轻视吸收农民妇女到运动中来，必然会使农村革命减少力量。党的最大任务是认定农民妇女乃最积极的革命的参加者，而尽量的吸收到一切农民的组织中来，尤其是农民协会及苏维埃。

6　青年在农民运动中之作用

在过去斗争阶段中，农民青年对于土地斗争的作用确是很大。在苏维埃区域中，农民游击队伍以及其他农民斗争中，应提出青年农民特殊的利益并助其实现。应吸收青年农民积极参加农协及苏维埃。农协经过农协中的青年农民部，协助少年先锋队及劳动童子团的工作与发展，在苏维埃区域更应尽量赞助农村青年要求纲领之实现。

7　宣传土地政纲与部分要求

土地政纲的宣传与赞助农民部分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最近的任务是夺取广大农民群众在其影响之下，应当尽量的使本党土地政纲通俗化，并使之与各地特殊条件发生联系。在运动薄弱的区域或暂时失败的区域，党应当赞助农民所提出各种部分的要求（减租减息，抗捐等），并领导这些运动发展到较高的程度。

8　农民协会及其他农民组织

（一）应尽量扩大巩固农民协会的组织　　最近几个月来，在南部与中部的农民运动中，农民协会的组织与领导作用都有缩小的表现。这是由于农民斗争的方式转移到更激烈的游击战争与广大的群众缺乏密切的联系。农协在中部与南部各省，为农民有历史根源的革命组织，在广大的农民群众中都有很深的印象，中国共产党应努力于农协的扩大与巩固，团聚成千百万的农民群众并领导其斗争，以准备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农民协会应保存他的各种农民群众的广泛的组织意义，而以土地革命的口号来发动广大农民的斗争，在反动势力统治的乡村，农民协会应当在非法的组织，来领导农民的各种各式的斗争，从抗租抗税杀地主豪绅直到准备与领导武装暴动为止。农民协会的组织必须尽可能的民主化，极力纠正以党来委派农协委员的办法，使农协成为真正群众的组织。

（二）农民协会与苏维埃　　在暴动当中农民协会既已成为领导广大群众暴动的执行机关，在暴动胜利后自然要成为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新政权的中心骨干。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处置都应集中于苏维埃，而使农民协会自然消灭。

（三）对付大刀会红枪会等的策略　　许多地方红枪会大刀会等在农民群众中占有很大的势力，其领导权大半握在豪绅地主富农手里，但是这些团体的确有群众的性质与反军阀的客观革命作用，党必须继续加紧下层群众中的工作，以便在这些组织中夺取领导权，并须在这些组织中的贫农中农群众中宣传党的主要的口号，使成为党在这些组织中的中心力量，并渐次改变其组织。

（四）组织农协及其他团体　　此外还须继续发展农民协会的组织。如果农民协会不为群众所拥护的地方，可以组织其他名义或各种临时的组织，或利用农民原有的组织，以便更能适合于地方条件（如反军阀同盟或防守同盟等）。

9　游击战争

（一）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斗争的方式，党必须积极领导。在农村阶级矛盾斗争到了最激烈的地方，每一小的日常生活的斗争，都将要走到武装的冲突，所以游击战争已成为这些地方的主要斗争方式，所以共产党必须积极坚决的去领导这些斗争，使其更有组织性，与群众更有密切的联系。

（二）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和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等　　游击斗争的主要任务：第一，立即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杀戮土豪劣绅地主等。建立农民代表会议及苏维埃政权，发展农民更广大的群众到革命斗争的战线上来。第二，建立红军。游击战争中勇敢的青年，尤其是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分子参加到游击队伍中来，使其渐次扩大，成为工农革命的红军，及消灭反动派的力量，如收缴民团警察的武装等。

（三）游击战争的弱点：散漫，缺乏与群众的联系，毁灭城市和乡村无目的烧杀倾向　　在过去各处游击战争，发生不少的弱点和不好的倾向，这些弱点和不好的倾向，都足以妨害游击战争的发展，甚至消灭它，所以必须与这弱点奋斗。第一，脱离群众。

使群众完全不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甚至受豪绅地主的宣传，以为这是一种土匪行动。所以以后的游击战争的发动，必须出自群众的要求，尤必须在群众的组织与领导之下，必须与宣传煽动的工作同时进行。第二，烧毁城市与无目的大烧大杀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一种游民无产阶级的心理反映，足以妨害党在一般群众中，甚至工人群众中影响的发展。所以本党内必须极力肃清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当然农民群众消灭地主豪绅削弱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党应积极去领导，党所反对的只是无目的和总的任务不相关的和不是为革命真正利益的烧杀。第三，散漫而缺乏组织。以后必须有计划的组织而集中的指导游击战争。

（四）游击斗争发展到地方暴动时，党必须注意到客观的条件与主观的力量，用适当的策略来领导　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案指示我们："各省区自发的农民游击战争……能够变成全国胜利的民众暴动的出发点，只有在下列的条件之下：就是和无产阶级城市的革命高潮相联系起来"。从过去的经验证明是非常正确的。现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之下，一县或数县的苏维埃区是有可能的。不是游击战争必定可以变成地方暴动，而是必须要在斗争的过程中，真正发动了极广大农民群众，在群众中要建立真正自己政权的要求，在当地反动势力的确在动摇崩溃的时候，然后游击战争必定要发展到地方暴动。所以在游击战争发展到比较广大的区域，有广大的群众起来参加。有转到县市的地方暴动的形势时，党必须注意客观条件及主观力量，有准备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以县市工人群众的领导与联络去进行暴动。运用适当的策略，必须立即实现一切群众斗争的口号，肃清一切反动势力，以发展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尤其要注意扩大暴动的范围到邻近的区域中去。

（五）党对农民自发的暴动必须领导。现在农民群众生活日益痛苦，所受压迫日益厉害的时候，很容易发生自发的暴动，党对于这种自发的暴动必须切实去领导，尤必须加紧在县城或镇市手工业工人及店员中的工作，使他们明白农民暴动的意义，帮助并领导这种自发的暴动，一直到苏维埃的政权的创立与扩大。

10　对民团土匪的策略

党应在民团土匪中宣传土地政纲建立干部吸收他们的群众　民团土匪的社会成份，是与贫苦农民有联系，有些地方的农民因无法为生而去当土匪，民团更多是农民被雇佣为团丁的，所以应当加紧在里面的工作，宣传土地政纲，成立秘密的组织与党的支部等，吸收些武装群众，从豪绅地主领导之下分化过来。

11　工人阶级对农民领导

工人阶级在农民中领导的巩固是土地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　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密切的联系，与巩固工人阶级与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并将无产阶级的分子引入农民运动及其领导机关中来。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使工人组织与农民协会发生经常的关系，必须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工人阶级斗争的意义与目的，使他们觉悟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够得到解放，并在失业回乡去的工人中工作。

12　农村中党的工作

（一）巩固农民运动中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是乡村党部的主要任务　取得和巩固农民运动中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是乡村党部的主要任务及一切实际工作的总方向。在一切农民斗争与农民运动的组织中，党的支部应为自己保证领导的作用，在宣传煽动的工作中，党的支部应该解释共产党工作及其现时的任务。

（二）共产党在乡村中的组织，应该在无产阶级分子与半无产阶级分子（手工业工人，雇农，贫农）中扩大党的组织。如果吸收农民中一切革命群众加入党的组织，便形成党代替了农民的组织（农民协会）。所以革命农民群众，必须使之团结于农民协会或苏维埃之下，过去以党代替农协代替苏维埃以容纳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倾向，应即加以纠正。党只能经过党团的作用影响农协和苏维埃，更不能直接的命令和指挥群众。

党为实现这些工作起见，必须指导一部分积极的分子到农村中去工作，中央与省委的农民委员会尤应加紧工作。

五　职工运动决议案

五卅后工会的发展及武汉末期中我们工作路线的错误

（一）自一九二五年起，中国工人阶级便成为中国革命的引导力量。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之伟大的罢工运动，唤醒了城市及农村之广大的群众，使中国革命运动变成为真正的平民群众运动。工会从罢工运动之中生长出来，罢工委员会逐渐变成为工会的执行委员会或干事会，罢工工人成为工会会员。所有这些运动是在经济的政治的口号之下进行的，其中政治的口号，显然占着优势，都在中国共产党指导之下进行的。当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中开始工作的时候，很容易的便战胜了他的竞争者，无产阶级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

北伐开始以来，特别在武汉末期中，党在工人群众中工作的路线，没有时常依靠着无产阶级之阶级利益出发，反而时常站在“北伐”的利益上，站在民族资产阶级之联合战线的利益上，结果就使无产阶级之阶级利益，完全服从着别一阶级的利益。这种策略必不可免的使党的工作路线离开主要的产业工人阶级（例如停顿了北方铁路工人中的工作），渐渐不自觉的堕落到阶级合作的观点上去。

工会未曾作为真正的群众组织

（二）职工会在形式上取得广大的产业工人、轻工业工人、店员，但是并没有造成相当的组织上的骨干，没有造成与企业中的工人之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还没有训练出充

分的无产阶级干部。工人阶级看着职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造出来的战斗组织，可以来拥护中国工会利益，可以用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职工会在工人群众的心理中，有些地方认为是阶级以外的，是超阶级的。在国民革命及罢工运动的高涨时期中，表现着最积极的仅是一部份比较少数的而与群众联系薄弱的先锋队；群众仍然没有充分的动员，在日常工作中还没有表现得充分积极。

委派制度的遗毒

（三）职工运动的组织，越来越多的委派制度，这种不正确的现象，使着党去委派职工会的委员长、书记等等。当时并没有顾及到群众对于这种制度的感想怎样。对于职工会的指导人几乎完全没有应用民主的选举制，所有职工运动中的组织都没有建筑在从下而上的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一切成了相反的现象——是由上而下。没有在下层工作中训练工人群众，挑选他们加入指导机关，党时常派遣许多素日完全不知工人生活状况的学生加入职工会中的机关。因此，所有党与职工会的联系都建立在不正确的原则之上，于是反动势力联合起来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不得不为之削弱。这是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政变以前的状况，其后在秘密状态中，党为保存秘密机关起见，有的亦不得不用委派制，于是群众与党的联系更加隔离起来。

白色恐怖对职工运动的打击，今后基本任务是动员群众，使他们围绕党与工会

（四）政变以后，一切反动势力的政策及目的都在于：

甲、杀戮一切革命的先锋队。

乙、消灭革命的工人组织或是将它逼到非常秘密的状态。

丙、取消了革命的工人组织之后，若是不能完全将工人压迫下去，则创设他们自己的组织，以管理工人运动。

虽然经过了许多非常残酷的大规模的白色恐怖，杀死数万的工人和革命的积极分子，虽然在许多军事上经济上的压迫以及厂主以工厂管理机关的压迫，虽然有许多反动工会领袖的欺骗，然而反动势力仍然不能使中国无产阶级完全与他的革命组织脱离关系，政府工会仍是不能把持工人运动。但是革命的职工运动之范围，党的影响之渗入工人阶级所必经的门户——却缩小了很多。工人运动比较农民运动要低落些，这是中国革命现在阶段中之非常特别非常危险的地方。

因此，现在之基本任务就是动员所有的无产阶级群众来围绕着它的阶级组织（党及职工会）。这是在职工运动公开存在的时候所不曾充分解决的任务，现在逼着我们在艰难万倍的条件之下去解决它，这个任务不解决，则中国革命不能得到胜利。在组织问题上之基本策略任务是指导无产阶级之日常经济和政治斗争，反对反动工会，组织革命工会，用宣传与煽动的方法去提高广大工人群众之阶级觉悟。只有这样才能使党一方面促进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另一方面才能保证中国无产阶级在革命民众间的指导作用。

资本进攻，革命工会应当领导工人日常生活的经济斗争去团结群众

（五）中外资产阶级现在对于工人阶级进行很广大的进攻，这都在工人阶级之工资微小，工作时间的长久，以及一般恶劣的劳动条件上表现出来。在这斗争中资产阶级用尽了一切经济进攻的方法，例如：（一）关闭工厂；（二）大批的用童工女工来代替普通男工；（三）大批的开除革命工人。革命工会它的日常工作中要向广大的工人群众证明，这些群众的经济的阶级组织它不仅是号召无产阶级作政治斗争，并且也能以拥护无产阶级日常生活中之经济上的利益；革命工会应当要提出并拥护某种工人在一定时间或一定条件之下所认为比一切迫切的经济要求，图小而忘大事的危险在中国是不大的。中国工人之阶级斗争已经走到了非常严重的形势，因此工人阶级之广大的经济斗争是一定要转变为政治斗争的。但是若想政治斗争得到胜利，那就只有用经常的组织得很好的经济斗争的方法动员了组织了广大的工人群众之后。在经济斗争的过程中，职工会应当发展与巩固自己的下层组织，造成坚定的基础，尽可能的与大企业中等企业发生密切的联系。

正确的罢工策略之重要与命令罢工之错误

（六）在这种情形之下，正确的罢工策略，是有格外重大的意义。要根据中国总工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经济政纲（八小时工作制，每星期必有一天休息日，工资照付，每年的休假，最低限度的工资，禁止十四岁以下的童工，青年工人六小时工作制，禁止女工的夜班，女工产前产后照付工资，同等劳动同等工资等）。在各个罢工中须估计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以及自己的战斗力的程度，来提出当时工人阶级可以得到的要求，必须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几个工人阶级所完全明了的基本的要求上。在工人阶级经济斗争之最危险的现象是“从上面”宣布罢工，“命令罢工”，使一部少数积极分子抛弃工作，对于下层工人群众加以恐吓压迫等等方法。一切的罢工者需要有非常谨慎的预备，要使一切工人都来讨论这些要求，要在罢工之前就决定这次罢工之直接指导者的成分，罢工委员会应当由所有工人群众中选举出来的，要使每个工人都将罢工委员会认为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只要如此，然后把他们自己的指导机关或代表被捕之后，所有的群众才能起来因此而作坚决的斗争。

罢工策略的一般方针——须提出要求之注意点

（七）在白色恐怖及秘密条件之下，不论什么罢工都没有以中华全国总工会或上海总工会等的名义来提出要求的必要，若这样，有时可使一部分落后工人吓走，另一方面使反动势力可以得着一个挑衅和进一步施行强迫的借口。罢工必须由该企业或几个企业中的工人宣布，以后就以这些企业中之工人的名义进行。假若有可能，则可以使相当的职工会出来帮助这一次的罢工。为打倒反动工会之立足点起见，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之下

订立条件的时候，不必用职工会的名义，而可以用选举出来的罢工委员会的名义。在中国现在普及于工人群众而为他们所最了解的要求是：

甲、恢复反革命政变以前的劳资条件（团体契约），关于工作及工资时间的规定等。

乙、反对任意开除工人。

丙、反对强迫仲裁。

丁、反对包工制。

戊、恢复工人自己的工会，争得工会的自由权。

提出这些要求时（特别是恢复反革命政变以前所缔结的团体契约），事实上便巩固了斗争中之工人与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联系，继续旧时的革命遗传，随后便可以由此而引导这种经济斗争到旧时的革命旗帜之下来进行。一切阶级斗争是要企图实现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提出来的要求，在职工会的日常工作中却只要提出为一部分工人在当时所最有兴趣的部分要求；这种为争取部分要求的斗争，应当使它与无产阶级之一般的夺取阶级利益的斗争发生联系。

反对阶级合作的思想

（八）革命的职工会站在拥护工人阶级经济利益的观点上，应当尽量反对一切或明或暗之阶级合作的形式与倾向，反对欺骗工人的“工人团体参加提高生产力”的主张，反对资本家所办的工会，反对工人分红的诱惑（这与“赏金”或年底双薪有别），反对资本家工会创办所谓“工人银行”，“工人储蓄会”，“协作的企业”等，反对一切中外资本家、国民党、反动工会所宣传的思想——阶级利益应服从“全民利益”“全国利益”的思想，这种理论事实上使工人阶级的利益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

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欺骗宣传

（九）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工会，都异口同声的向中国工人宣传，说中国华商企业中的劳动条件比较外国洋商企业中的是好些。革命工会应当揭破这些欺骗，应当在宣传上事实上都证明给工人阶级看，中外的资产阶级都是一样的残酷剥削中国工人群众，都是一样我们的阶级敌人，工人应当同样的同他们进行极严厉的斗争，应当说明中国资产阶级这种宣传的实质意义，事实上是破坏革命的阴谋。如此的说明与解释，应当是揭破反动工会领袖之出卖阶级的一种方法。

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应当是对上层剥削者同样实行阶级斗争，对非剥削者的下层小资产阶级应赞助其斗争

（一〇）为了与白色恐怖斗争，为了把处在四周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的工人阶级从消沉状态中振作起来的缘故，所以引起城市小资产阶级与贫民对于工人阶级的同情是非

常重要的事。因日本干涉而在小资产阶级中发展起来的广大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国民党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都是企图阻止这个运动的），如果共产党和革命工会积极参加，一定可以创造许多适当的环境，以恢复工人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系。正确的随机应变的罢工策略是要能够估计复杂环境，分化敌人的营垒，要计算怎样才可以给最危险的阶级敌人一个打击，同时在小资产阶级的队伍中去找着可能的同盟者来帮助工人阶级的斗争。这样是可以削弱白色恐怖的力量，除去无产阶级中消沉的现象，掀起革命的工人运动来，而且对于反革命工会的斗争也可以占优势。但是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应分为二部分：对雇佣劳动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态度与对一般资产阶级一样；对于无雇佣劳动的（自己劳动或家庭劳动）下层的小资产阶级应帮助他们的利益（如赞助废除苛捐杂税等），以取得对我们的同情与帮助。总之，在这里的最高原则是提高阶级斗争，无论如何不能牺牲工人阶级利益或阻止阶级斗争之发展的。

与反动工会机关斗争，同时要能战胜一部分工人的落后思想

（一一）反动工会，有许多在反革命政变以后为中国豪绅、资产阶级军阀所造成，这种工会势力之主要来源，是依靠着军事警察机关。但是政府工会存在的这一年中间，特别从去年年底上海所谓“工人总会”成立以后，与反革命的“工会统一委员会”合并为“工会整理委员会”以后，是可以取得一部分落后工人的。他们不仅运用强迫方法，并且也用一些改良主义的方法，有时也放任一点罢工，向资本家为一部分工人取得很少的一点让步。因此与反动工会的斗争，不仅要战胜军事警察机关的侵犯，并且也要战胜一部分工人的落后思想及对国民党信仰之残余。

个人恐怖政策并非争取群众的政策

（一二）为与反动工会斗争起见，必要有广大的群众组织与阶级教育，用个人的恐怖方法来反对反动工会，这一定对他们有害，而且对于我们自己也有害处，单纯的个人恐怖的方法，仅只使革命者的注意力离开了主要任务。事实上个人恐怖乃是企图用一种便易的方法——刺杀反动工会中最坏的领袖——代替那种基本的困难方法——调动与组织工人群众。

应当承认的：恐怖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工人运动中，有它的深厚的基础，在相当条件之下，它是为客观环境所决定的（为着作自卫的方法）。但是，站在斗争方法的观点上来说，这个方法不是正确的，因为它对于发展群众工作是一种严重的危险和阻碍。关于这种行动，我们不仅在反对反动工会的斗争中可以看到，并且在正在发展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有同样的现象。新起的反帝运动之中已经有许多城市的职工运动因此重兴起来（汕头、厦门、杭州、无锡以及芜湖等）；而各地党部不去积极参加这种运动，不去力求争取群众，却又提出是否可以不去参加这种运动，而采取恐怖手段来对付几个日本厂主或其他的剥削者。这样便将反帝运动及因此而发生的一切团体断送给国民党，国民党却是希望消灭他们的。

反动工会有群众便须加入去争取群众

（一三）许多有工人群众的反动工会、改良工会、行会工会中，如广州的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及上海几个工会（英美烟公司工会、商务印书馆工会、邮务工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等）中我们是应当到里面去作工的。我们同志并不是要加入政府或国民党所指导的反动工会的上层机关，乃是要在这些工会下面所组织的群众之中工作。若不派遣工作同志到这些工会中去，那就是我们对这一部分重要的工业无产阶级抛弃在反动的影响之下。无情的揭破反动领袖出卖阶级性，在群众面前揭破他们的法西斯面具，应当夺取这些工会中的群众，彻底的破坏反动工会，但此时不宜提出“统一战线”的口号。

革命工会在产业工人中的工作是基本的工作

（一四）职工会是广大的群众组织，任何一个工人，无论他的政治观点如何，宗教信仰如何，帮口如何，他都可以加入；只要知道阶级的团结，并接受职工会的章程；章程上必须完全取消足以阻碍工人加入革命工会的一切限制。革命工会首先应当吸收各种基本的产业工人：纺织、铁路、海员、矿工、烟草、五金、市政、邮电等等工人，这一点应当特别注意的。因为最近在革命工作中发生了一种“贪便宜”的倾向，客观上只去走反抗力量最小的道路，将工作重心放到小企业、手工业工人、店员，以及许多其他的散漫的无技术的工人中间去。革命工会应当在所有的中国无产阶级中间工作，但在产业中间的工作却是基本的，仅在小企业工人中间的工作减弱了在技术工人中的工作，便是为反动工会所玩弄了。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在许多北方工业区域（五大铁路，天津、唐山矿区，满洲，淄博等），那里从来没有进行长期的有计划的职工会的工作。

工厂委员会的性质及其与工会支部的关系

（一五）革命工会应当在大工厂及企业中有它自己的基础。下层组织的形式，在现在的环境有很大的意义——特别是工厂委员会以及它对于“工会支部”的工作问题。工会支部多数是在秘密状态之中，通常的时候，它的会员只是这个产业中之工人的一小部分。“工会支部”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立刻组织成的，特别在现在工人脑中还以为赤色工会是共产党之附属物的时候。因此在多数情形之中，我们下层组织之最适合的形式是工厂委员会（不一定要用这个名称，或者用某地的新名词，例如，组织厂内委员会、保护工资委员会、视察委员会、保护劳动委员会、交涉团、维持会、代表会等），这种组织要能代表着一个企业中之全体的，或大多数的工人，不管他们是否工会会员。

工厂委员会在中国的条件之下，并不就成为职工会的下层组织，它——工厂委员会，拥护某个工厂之中之工人的最切近的最落后的工人也容易了解的利益，它便应成为阶级斗争和阶级训练之最初的形式。我们同志在这种工厂中的任务，是经过工厂委员会，经过由工厂委员会所召集的大会，树立在该工厂工人群众之间的影响，由反动工会之下夺取其群众，在长期工作的结果，可以组成工厂中之工会支部，这样便可以使这个

企业与革命的职工运动发生联系。在中国现在许多企业中已有了这种工厂委员会的原始形式，如各车间的代表会议，索薪团等，我们应当使它变为比较巩固的公开的经常的工厂委员会。

工厂委员会应当是一个适合环境的组织，在罢工的时候，若它已经取得了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则它可以整个的变为罢工委员会（再补充几个由大会选举出来专为进行罢工的代表。罢工胜利后，便可以很大的增强罢工指导机关在群众中之影响。假使我们同志加入这种机关之后便有很大的可能可以在这一工厂之中公开的或秘密的进行职工会的工作。由工厂委员会到罢工委员会以至于“工会支部”，这中间按照一般的政治状况的变迁及各企业中之具体的条件的差异，可以有许多过渡的形式。

党的支部、工会支部、工厂委员会之间要有正确的关系

（一六）必须确定在每个企业中之工厂委员会，“党的支部”，“工会支部”中间有正确的关系。现在党的支部及“工会支部”时常混合起来，但是这种组织形式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极端有害的。党的支部应当在政治上指导该企业中的工人；能加入党的支部的仅只是一部分最好的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无党工人最有影响的人。另一方面，在现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之下，党的支部与“工会支部”混合一起，若其中有一个受了打击，则两个组织都被破坏了。在“工会支部”之干事会或委员会中应该只有两三个秘密党员便足了，其余应当是无党的。仅仅只有这种制度才可以吸引“非党工人”的革命的干部来积极参加工会工作，而保存这个企业中之支部。

干部人才问题要从普通工会会员中提出干部

（一七）干部人才的问题，须特别注意。领导机关在群众中间联系的薄弱乃中国职工运动的老毛病。中国职工运动的积极分子，在数量上成份上，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其中工人分子太少，知识分子太多。创造出“非党工人”的干部来而加以训练，并增加其人数，并与大企业发生良好的联系，——这就是目前最大的任务。必须吸收参加着生产与群众有联系，懂得他们的情绪习惯等等的工人到一切工人组织中来。他方面，每个工会的工作者，即他不是直接在产业中工作着的，亦必须注意时时与工人发生直接的联系，自下而上的一切工会领导机关中直到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止，必须参加青年工人与女工的代表。

工会中要有女工委员会

（一八）女工在中国工业工人中占据很大的一部，她们所受的压迫最重，剥削的痛苦特别深，同时亦比较落后。革命工会须坚决的主张对妇女劳动的保护及改良其劳动状况。同时尽量吸收她们到自己队伍中来；在职工会组织系统下，应组织女工委员会，做女工运动工作。

工会之中要有青工委员会，工会支部甚至可组织青工小组

（一九）青年工人在革命运动中有莫大的作用，革命工会除保护青年工人的劳动条件以外，必须在一部分反对改良青年工人地位的一部分成年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必须吸收青工加入工会，与成工享受同等权利。同时在中国情形之下，青工之中儿童的数量非常之多，所以工会必须尽力设法发展童子团的工作。

为要有计划的在青年工人中工作起见，应在职工会组织系统之下组织青工委员会，在各工厂中可以在工会支部的组织系统之下组织"青工小组"，青工小组不能与厂外任何机关发生隶属的关系，亦不能离开工会支部单独行动。在内地县城店员和手工业的学徒和青工，不能按产业工会的组织系统组织时，青年团应辅助党组织这些学徒团体，以街道或区域为中心，如该地区有职工会的组织，学徒组织应直属于职工会组织系统之下。

失业工人运动要求政府社会的供给

（二〇）失业工人的问题，须特别注意。失业工人有分散及脱离阶级的危险，并且因为资本家利用市面萧条的与经济破坏的状况，尽量的开除共产党员及工会的积极分子，所以失业工人的工作便因此更加重要。必须用一切的方法——宣传、煽动、组织以至于示威等等——要求政府，市政局及商会等社会团体津贴救济，必须专门设立委员会，并维持失业工人与在工会会员间的联系；必须利用失业工人去做城市中工会的工作，及在适当的情形之下，派遣他们到农村中去作农民工作或到军队中去作士兵运动。

须注意原始团体工作（兄弟团等）领导他们走向赤色工会的组织

（二一）中国原有的许多工人群众自己的互助组织和斗争组织，如青帮等所谓"抱义气"的组织，现在严重反动之后，甚至赤色工会会员也自己退而组织"兄弟团姊妹团"等原始形式的组织——"抱义气"的组织。这些方式党固然应当努力去领导和运用——这是群众深处自动发展的斗争方法；但是他的短处便是复古到小的秘密的结社，而不去创造或巩固赤色工会。党应当经过党团领导这些组织实行斗争，而在斗争的过程中领导这些组织，使他们合并统一团结到赤色工会的组织方面上来。

最近由于反帝运动的加强和白色恐怖相当的缓和，又自然的发生出——尤其在南方——一些行会式的工会来，对于这些工会，必须特别注意。这种原始的结合，现在不在我们的影响之下，但革命工会不可置之不问，必须领导他们，使他们与赤色工会运动发生联系。但是再郑重说明一句吧：我们根本的路线却还是在大企业中组织工会。

工人纠察队工作要成为经常的自卫的组织

（二二）党与革命工会，必须严重注意于工人武装纠察队、自卫队的教育与学习，

必须把最可靠的同志加入到这种组织里面去。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武装纠察队在几次最大的阶级斗争中（香港罢工与上海暴动）有非常伟大的作用，同时作为平时自卫组织其作用也不下于此（比如保护工人集会，防止反革命的袭击，罢工时的纠察，与工贼斗争等）。党与革命工会必须竭力为纠察队的政治的与军事的教育而工作；且力求把纠察队变成党与工会机关领导之下的经常的组织。

工农联合要在实际的组织上的联系

（二三）中国的革命工会必须与农民有密切联系，要使农民拥护工人运动，工人亦拥护农民行动。各县的中心区域中的“县总工会”一向是全县的组织中心，在将来亦必须使他归作全县的中心，并且极力扩大其作用。“县总工会”的任务是组织农村中农场工人、挑夫、苦力、挑水匠等和手工业的工人，同时被组织起来的团体必须与农民协会有密切的关系。农村经济工人（雇农）应组织雇农工会，同时可加入农民协会，但须得保存其独立的组织。（另本作：“农村经济工人（雇农）在苏维埃区域或雇农独立斗争发展的地方，应不加入农民协会，保存其独立组织，到某种斗争必要时，可组织共同委员会”。——校者）

党要经过党团指导工会

（二四）各省及各大工业中心区域职工运动的领导机关，乃省总工会或市总工会，中国共产党要经过各总工会中的党团，才能够巩固他对于各地及各中心区域的职工运动的领导。在各级党委员会下，要组织职工运动委员会。党必须竭力巩固中国职工运动的领导机关，努力巩固及扩大其在工会所已争得的地位。

全国总工会与其他各国工人运动的联系

（二五）中华全国总工会必须与太平洋工会书记部发生密切的联系，必须与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及赤色职工国际发生密切的联系。

力争工会公开的自由

（二六）白色恐怖虽是厉害，然必须力争工会的公开存在，必须利用每个经济上的冲突，每一个罢工，每一个政治事件，以求脱离秘密状态，这中间工作的方法是非常要随机应变的。此外又可想法创造出某种合法或半合法的组织来，例如体育会、运动会、自修社、丝竹社、戏剧社（票房）、疾病、失业、婚丧互助会等，应照现在的情形力争工会公开（结社自由）和创造出种种合法的与半合法的团体来，让我们可以在他们的名义之下去工作，这是我们目前中国革命之阶段中主要的实际任务。

党与工会组织上的界限要分明

（二七）在白色恐怖疯狂的向共产党与革命工会进攻的情形之下，工会与党中间正确的互相关系就更要紧了，党对工会的经常不懈的政治领导，必须和党与工会之间在组织上严格的分工并行的。对工会的领导非经过党团不可，并且只能经过党团，不能再用任何别的领导形式。对工会有任何的决议工会必须实行时，必须经过党团将决议内容提出讨论表决后才施行。切不可直接采取党的决议或所谓“命令”，尤不可将党的决议在工会的报纸上公布。

口号要切合于工会及工人群众的需要和口气

（二八）现在中国全部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一切日常工作，都必须抱定这个观点去对付，工会虽是永远拥护党的，同时，却不可机械的背诵党的口号，工会必须在群众中巧妙的运用口号，必须使每一个普通口号都是从工人的日常基础要求中自然而然的喊出来的。党的政策和策略，必须用工会的口气及工人的日常用语去解释给群众听，机械的背诵党的口号，对于工会争取群众工作，有害无益。工会在群众面前另有自己的面目，但是这句话的意义却并不是说工会必须离开党的政策，而是说工会与党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不过方式是不一样。

厉 行 民 主 集 中 制

（二九）共产党必须时时记得工会是群众的民主式的组织，所以他们必须尽力反对工会中之命令制、指挥制和“革命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工人等等的恶习，应当严厉反对知识分子藐视群众无知识无文化而自骄自傲的态度，应当严厉的反对工会工作者“替代群众”“不顾群众”而擅自决定一切问题的企图，对于这些现象应当毫不容情的肃清。只有全党坚决的有系统的在职工会中实行扩大民主制的办法，和广大的吸引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到指导地位来，这样才能够把中国职工运动变成强大的群众组织而在党的领导之下完成无产阶级目前的任务。

实行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

（三〇）党认为必须实行广大的宣传去解释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世界大会的决议，并大规模的去实行第四次大会的决议，要利用世界职工运动的经验去发展并巩固中国的工会，这便是最好的方法。

六　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

（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在估计中国革命政治环境与今后发展前

途时曾指出："党应准备着对付革命新潮流的高涨，这个高涨定使中国共产党发生一个直接的实际任务，即组织与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因为只有用暴动和推翻现在政权的方法才可解决革命的任务。"（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根据对革命的环境与前途的这样估计，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中国共产党提出一个中心任务，即"争取千百万工农群众在政治上教育他们，使他们在共产党及其口号之下团结起来。"

（二）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若是他在实行夺取工农群众的中心工作时，不同时马上就开始实行有系统的军事政治、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以保证最近将来工农群众在反对大批军阀军队（中国现有政权的藩篱）斗争时期的胜利，那么，中国共产党就不能顺利的进行组织和实行群众武装暴动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应很明白的知道，任凭一般的政治环境是如何有利，但若在准备革命的时期，尤其是在革命高涨的时期，不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与纯粹带着军事性质的许多重要组织工作和技术工作，那么，仅只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是不能保证革命胜利的。

（三）与国民党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过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机会主义最大错误之一便是：

一、在政治上夺取国民革命的部队一方面，差不多完全没有作过什么工作，在北伐时客观的情形虽然是很顺利的，党没有利用国民党的军事政治机关以实行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并且毫未设法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党更没有看清国民革命军雇佣军队的性质可以容易使整个的国民革命军变为各个军阀的工具而一味的与上级军官作勾当，把与这个或那个军官达到联络的目的，看作自己工作的中心，而不把宣传与组织下层士兵群众和引导工农群众加入军队以改变军队性质的企图，看为自己工作的中心。

二、没有充分的注意准备和指导农民群众的游击运动，没有把配合各种散漫而致失败的单个的农民暴动为自己任务。

三、没有充分估计到工农的群众武装和工农的军事训练的革命意义，没有充分注意准备党里军事工作的训练的指导人材。

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在去年八月扩大会议前，除一般的机会主义错误外，同时又如此的看轻了军事方面的工作。当资产阶级变到反革命营垒中去的时候，不能不使革命全部遭到危亡的影响，仅于八月临时代表大会把政治路线纠正，但以后因为有了军事投机的恐惧遂在军事工作上犯了新的错误。

（四）回顾中国共产党以往在指导上的错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决议中对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政治任务，中国共产党对军事方面的工作应有下列数任务：

1 在军阀军队中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充分的明白，若是军阀的大批军队有帝国主义者派到中国的军队的帮助，又有最新式的军事技术的武装，若他们仍将以屠杀的方法继续反对革命，那么，纵然环境条件对于革命如何有利，他们还是能压倒革命运动的。虽然如此，但是军阀的军

队和外国派来中国的军队因自身阶级成分的关系，在一般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不会不受革命影响的！这时候，士兵群众中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这种动摇能够引起，且现在正在引起部分的军队转变到革命方面来。共产党在革命的准备时期，尤其是在夺取政权积极斗争的时候，在士兵中有系统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愈作的得力，则部队的动摇与转到革命方面来的事将亦愈有力而常见。

因此破坏军阀的军队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阀的军队，使几百万的士兵群众，都参加工人阶级与农民群众的阶级战线这乃是中国共产党目前严重的任务。

为要实现这一工作，应有下列决定：

（一）在士兵中做群众的鼓动工作，俾士兵群众知道而且直接受党的口号（关于本身利益和政治的）。为此，必须以最可靠的同志成立军事煽动组织的工作，设法与士兵群众接触，利用一切可能做口头宣传并出版关于日常问题且于士兵群众有兴趣的定期刊物、传单和小册子等。

（二）在各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的任何形式的团结，以便在一切部队中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使自己的人散布到军队，以便渐渐的扩大自己的影响，且于紧急的时候把军阀的军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

（三）在一切反动军队中不另外组织共产青年团的支部，但须尽量利用团的干部分子，经过党的支部在军阀军队及一切地方的反革命武装中，做宣传与组织工作。

（四）用各种方法发展士兵与长官的经济斗争，尽一切可能建立士兵和水手（海军）的群众组织，此种组织之最适当的形式如“士兵联合会”和“水手联合会”等都可。其任务在保护士兵和水手（海军）的基本的权利及其生活上最切身的利益。

（五）必须按各部队或参谋部成立通讯的组织。其目的在时时侦察部队的情绪，并研究实行军事政治工作的最适当的对象。

（六）军阀军队的招募：一、自愿的；二、按县征募的；三、或是强迫的。在这些时候，在军队中的分子按其阶级成分并不一致；自乡村的中农和贫农以至于流氓分子都有。本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应该注意计算士兵成分的这种特点，使自己工作的内容与方法能够适应他们。

（七）除在军阀军队工作以外，我们还应对于各地豪绅资产阶级的武装组织如警察保安队民团商团以至土匪中，实行破坏工作以夺取其群众加入革命的方面。

（八）必须使工农分子加进军队去当兵或当官长（首先入军校）的方法普遍施行。并设法使工农群众与士兵接触予以革命的影响。

2　二、在帝国主义者军中的工作

除在军阀军队中工作外，本党还应在外国军队中工作。文字宣传的方法与士兵建立个人的联系，成立革命的支部组织等，凡此种种都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外兄弟党积极帮助之下应做的工作。

3 党员军事化

（一）依据最近暴动的经验看来，不但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不会使用武器，便是多数的党员也是如此。党员在工农暴动时便不会很好的指挥这个暴动的军事行动，以致暴动发生后也不会利用很好的机会以战胜敌人。故党的任何应使一切党员用很好的机会以战胜敌人。故党的任务应使一切党员受到军事训练，为达到这一任务，应利用一切公开的或非公开的机会（如体育会或精武会等组织）。

（二）关于军事训练，CY团员应与党员受同样的训练，其方法除以上所述外并可在乡村中设立少年先锋队或体育会等等体育上的组织。

（三）党应特别注意养成相当的军事工作人材——党的军事工作指导员和组织员等等。

4 工人群众的军事组织和准备

除在军队中工作外，中国共产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工厂和作坊中成立无产阶级的军事组织（红色先锋队，赤卫队），此种组织的将来的任务，是应与变到革命方面来的军队共同击破军阀军队中尚未被破坏的部队。

本党应即刻在工人群众开始关于暴动是革命时最坚决的斗争形式的宣传和鼓动，应使工人阶级觉悟到“只有用力量才可解决历史的问题。现代的斗争中力量的组织便是军事组织。”（列宁）工人阶级武装的必要，使用现代的武器，学习在现代技术之下巷战的策略，建立阶级的军队（红军的思想宣传）等都是重点宣传的。

在实行工人群众的军事教育的时候，必须利用公开的（如体育会、射击组等）和非公开的（如战斗队、秘密的训练等）可能。

5 工农群众游击运动的准备

农民是受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故中国共产党应特别注意农民中的军事工作，如在中国现时有力的农民团体或军事团体中（农民自卫军、“红枪会”、“大刀会”等等有力的组织）及在没有组织的武装斗争的农民中，这种游击队应以贫农及与农业关系不深的青年农民为中心分子；发展自己的影响与建立新的革命游击队等是。

本党应特别使自己在农民中的军事工作与党一般的农民运动工作及其对农民运动的口号发生极密的联系。

本党目前在农村军事工作的根本路线应当是蓄积和准备力量以实行将来的革命斗争。

农民的武装暴动只有在都市中革命潮流高涨并受工人阶级指导的时候，才可得着胜利。脱离了工人阶级革命的农民运动，是定遭失败的。

在各处农民暴动自然爆发的时候，纵然料到其难免失败，本党亦应负责指导之力图

发展，并利用之以巩固党自己在农民中的影响，使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在农民暴动及游击战争失败时，党应设法保存其主要干部不要使之失败，而仍得继续其游击队的性质和作用。

本党应特别注意大工商业都市（如上海、武汉、广州等）及其最主要的交通线尤其是铁路附近区域的农民的工作。

本党在农民中工作的方法，应利用一九二五年——二七年游击战争的经验。中国中部与南部各有广大的农民协会，其斗争的口号是要根本的解决土地问题，在这些地方的工作，无论在内容上与方法上都应与“红枪会”有势力的各省大不相同，因“红枪会”的斗争在思想上是受着富农分子影响的。此外，农民少有斗争经验的各省（如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也应大有区别。

6 建立红军问题

在工农暴动胜利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本党应迅速将自己武装力量的组织从游击队的形式（不仅是农民的游击队便是工人赤卫队及转变过来的士兵暴动的形式也都在内）改组而成立经常的红军。只有如此，本党才能巩固已得的胜利，且将此胜利扩大到邻近各地。

建立红军的原则应为：

（一）士兵必须按征兵制由工农分子充之。达到这一制度的过渡时期可用自愿制，不过旧军队的士兵应经中央慎重选择和政治训练后方可采用。且从军阀转过来的各种军队，必须立即改编，以相当的可靠的革命战斗员参加其中。有可能时应将其旧时全体干部撤换，用我们自己可靠的军官。其主力应为革命的工农队伍。红军的士兵无论是征兵制或志愿制，必须规定其最少程度的服役期限。

（二）官长工人化，关于这些军事官长的造就，现在即应开始（派人至国外由兄弟党办理。）

（三）采用苏联红军组织的经验，实行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制度。叶挺与贺龙的部队的遭破坏，其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他们军队中没设法肃清反动的官长，未派遣政治委员，未设立政治训练等机关。

（四）红军在各方面都应服从当地最高苏维埃政权的命令和指导。

7 党的军事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军事工作都应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部。各地应设立军事委员会，受地方党部之一般指导而工作，但于军事技术方面则受中央军事部之指挥。中央军事部和各地军事委员会均依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所规定之计划书而工作。

军事部应要有系统的工作，为此，必须进行军事人员之统计和分配，且于必要时，能将自己的力量集中于少数重要中心地。

只有努力而有系统的工作，只有把工农的武装力量练成强有力的军事组织，在群众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才能达到武装暴动之胜利，且能在中国地域内巩固苏

维埃政权。

8 兄弟党之帮助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请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责成各兄弟党对中国共产党予以各方面之帮助，如派人帮助实际工作，物质上的帮助，以及设法破坏到中国去的帝国主义的军队等都是。

七 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意义，特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时列入议程并加入党纲。

中 国 共 产 党 党 章

——中共六次大会通过，一九二八年七月——

第一章　名　　称

（一）定名：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

第二章　党　　员

（二）入党资格：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

（三）入党手续：新党员入党时由党支部通过，并须经过本县委或等于县委组织的区委之批准。入党的条件分下列数种：

（1）工厂工人须经党员一人介绍，由生产支部通过。

（2）农民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及各机关下级服务人员，须有党员二人之介绍。

（3）各机关高级服务人员，须有党员二人之介绍。

附注：（一）介绍人应对被介绍者负责，如遇有介绍者不确实时，则应受党纪之制裁，以至于开除党籍。（二）在新党员未批准为正式党员时，各相当党部，得委任该新党员为某种工作，借以考查其程度及其对党之了解。（三）少共团员入党时，由少共委会介绍，亦须经上项相当之手续，由支部党员大会通过，或上级党部之批准。（四）在每种特殊情形之下，党的各级委员会均有直接征收或通过新党员之权。

（4）脱离其他政党（如国民党等）而加入本党的，须经有党籍一年以上之党员三人介绍。若从前为其他政党之普通党员者，则经省委之批准；若从前为其他政党之负责人员者，则须经中央之批准。

（四）组织之改变：其他部分的政治组织或整个的政治集体，以及党的整个组织，加入或转入共产党时，必须经中央的决议。

（五）党员的迁移：党员由这一个组织迁至别一个组织的工作范围内（区域内）时，应转入其所在地之组织中，作为这一个组织之中一员。党员由这一组织转入别一组织及一国移至他国的一切手续，须按照中央所颁布的规例。

（六）开除问题：开除党员须由党支部党员大会通过，经党的上级委员会批准方发生效力，同时在开除决议还未经上级机关批准以前，应即停止被开除者在党内一切工

作，不服从开除决议者，可以上诉至最高党的机关。党的各级委员会在党员有反党行为时，有直接开除其党籍权。不过此开除的决议，应通知被开除者所加入的下级党部的组织。

第三章　党的组织系统

（七）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其他支部一样，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如下：

（1）下级党部与高级党部由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及全国大会选举之。

（2）各级党部对选举自己的党员，应作定期的报告。

（3）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且切实的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管辖某一区域的组织，对该区域各部分的组织为上级机关。党员对党，因某一个问题，只有在相当机关对此问题的决议未通过以前可以举行争论。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应无条件的执行，即或某一部分的党员，或几个地方组织，不同意于该项决议时，亦应无条件的执行。

（八）指定指导机关：在秘密环境之下于必要时，党的下级机关，得由上级机关指定，并经上级机关之批准，得指定新委员加入党部委员会。

（九）党的地域区分：党以地域原则划分为单位管辖某一区域的组织，对于该区域内各部分的组织，为上级机关。所有党员无民族国界之分，都应加入共产党地方党部组织，成为中共的党员。

（一〇）各级机关执行权：党的组织在共产国际和党的决议范围内，对于地方问题有自由处决权。

（一一）各级党部的高级机关：各级党部的高级机关为党员大会，代表会议或全体大会。

（一二）各级执委：党员大会、代表大会或全国大会选举其各级党部执行委员会，此执行委员会，在前后两大会期间，为指导机关，指导各级相当组织之一切经常工作。

（一三）批准问题：一切新成立党的组织（支部县委等等），必须经过其隶属的上级机关批准。

（一四）本党组织系统如下：

（1）在每个工厂、作坊、商店、街道、小市镇、军队等中：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干事会。

（2）城区或乡区内：区党员大会或区代表会议——区委员会。

（3）县或市的范围内：县或市代表会议——县或市委员会。

（4）特别区（包括几县或省之一部分）：特别区代表会议——特别区委员会。特别区的组织如必要时，得由省委决议成立之。

（5）省：省代表大会——省委员会。

（6）全国：全国大会——中央委员会。

（7）为易于指导各党部工作起见，中央委员会，得按情形之需要，在数省范围

内，成立中央执行局，或中央特派员。中央执行局和中央特派员，由中央委员会指定之，并只对中央委员会负责。

（一五）党部机关：为处决党的各种特殊任务起见，各级党部委员会之下得成立各部或各委员会，如组织部，宣传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等等。各部或各委员会隶属于党部委员会，受其指导而工作，并经过党委员会而实行自己的决议。党部委员会下各部之组织，由中央决定之。

附注：为在其他民族工农分子中用其民族语言以便于工作起见，于当地委员会之下设立少数民族工作部。少数民族工作部，应在当地党部指导和监督下工作。

第四章　支　　部

（一六）基本组织：党的基本组织是党的支部（工厂、矿山、作坊、商店、街道、农村、军队等），所有在该地工作之党员，应一律加入支部，如有党员三人以上的地方得成立新的党支部组织，但须由县委或等于县委组织的区委批准之。

（一七）支部特别组织：在有党员一人或二人工作的企业中，这些党员得加入与该企业最接近的生产支部，或与邻近企业的党员，共同组织支部。在任何企业中工作的党员，如手工业者，个别工人，家庭工作的工人，知识分子等等，按住处的地方为标准组织街道支部。如在农村支部中，有农村经济企业，如小的矿山，或某种农业工人，得按生产关系组织支部。

（一八）支部任务：支部为便与工农联系起来的组织。支部的任务：（甲）用有计划的共产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在无党的工农的群众中，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使工农站到党方面来。（乙）以党组织的力量积极参加工农的一切政治和经济斗争，以革命的阶级斗争观点讨论他们的要求，组织群众革命的行动，为取得工农一切革命行动的领导而斗争，努力工作以吸收工农参加中国的与国际的无产阶级一般的革命斗争。（丙）征收和教育新党员，散布党的出版物，在党员及无党工农中进行文化和政治教育的工作。

（一九）支部干事会：以党员人数多寡为标准，支部选举三人或五人组织干事会，以进行日常党务，该干事会进行支部的工作，分配支部中党员的工作。如宣传，分发印刷品，在工会中及农民组织中进行党团工作，妇女工作，与少共支部发生联系等。支部干事会选举支部书记一人，执行党员大会或支部会议的决议，及上级党部的指示。

第五章　城乡区的组织

（二〇）区代表会议：在城或乡的分区范围内，党的上级机关为全体党员大会或该城乡区中该支部之代表大会。城乡区的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接收和批准区委之报告，并选举区委员会和出席县市委或特别区域及省代表大会之代表。

（二一）区委：城乡区委员会于前后全体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期间内，指导区范围内一切党务。城乡区委员会之常会，应该在秘密条件所许的范围内经常召集，每半月至少一次。区委员会前后会议期间内工作，由区委员会之常务委员会指导之，常务委员会由区委员会自身委员中选举之。

第六章　县或市的组织

（二二）县代表会：一县范围内党的上级机关为县代表大会，每三月召集一次，临时县代表大会，或经该县半数以上之组织的要求，或根据省委员会（或特区委员会）的决议由县委员会召集之。县代表大会，接受县委员会和县审查委员会之报告，并选举县委员会及县审查委员会，以及选举出席特别区代表大会或省代表大会之代表。

（二三）县委：县委员会由县代表大会选举之，于前后县代表大会期间内，系该县党的最高机关。县委员中除应由县城的代表加入外，该县区或各重要乡村党的支部代表亦同样须加入县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时间，可由县委员会自己决定，但至少须每月开会一次。县委员会推举常务委员会以进行日常工作。县委员会选举书记一人以处理日常工作，县委员会之书记须得上级党部之批准。

（二四）县委机关：县委员会应执行县代表大会省委员会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应尽可能的成立各部或各委员会（如组织、宣传、鼓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等）以进行指导的工作。县委员会在出版党报时应指定该党报的编辑。县委员会执行该县范围内的党务。在前后县代表大会期间内，对上级党部负责，并对上级党部经常的报告自己的工作。

（二五）县委员会所在的城市，不设市委员会，其工作直接由县委员会指导。城市的组织可分为城区，领导城区工作者为城区委员会。

（二六）市委：市委的组织如县委，除预算下得分城区外，并得管辖近郊乡区或近郊直属支部，在省委或特别区委、区委所在的城市，不另设市委，而工作直接由省委或特别区委指导。

（二七）特别区委：在特别区委已经成立的地方，特别区按照一切县委组织条例而工作，若没有省委的地方，特别区直接与中央发生联系，按照一切省委组织条例而工作。

第七章　省之组织

（二八）省代表会：在省范围内省之代表大会是最高机关。省代表大会的经常大会，每半年召集一次，临时的省代表大会或经该省半数以上组织之要求或依据中央的提议，由省委员会召集之。省代表大会听省委员会及省审查委员会报告，讨论该省党务和社会工作问题，选举省委员会和省审查委员会及出席全国大会之代表。

（二九）省委：省委员会由省代表大会选出，在前后省代表大会期间内，省委员会是省内党的最高机关。省之中心（省委）组织的代表及省内其他重要地方党部的代表，均应参加省委员会。省委员会决定自己开会的时期，在一个半月最少须开会一次。在省委员会前后会议期间，为工作便利起见，省委员会得从省委员会委员中推选一常务委员会，并为执行日常工作起见选举书记一人。

（三〇）省委职权及其机关：省委员会执行省代表大会及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省委员会在省内组织党的各种机关，指定该省党报的编辑。省委员会在省之范围内支配党的

力量和经费，管辖党部的会计处，指导省内非党组织中的党团工作。省委员会经常的向中央作工作报告，并经常的把自己的活动通知下级党部。省委员会为研究各种重要问题，而设立各部或各委员会，如组织部，宣传鼓动部，职工运动委员会等等，每部的主任按照一般通例应由省委员会之正式委员或候补委员充任之，并在省委员会之常务委员会直接指导之下工作。

（三一）省委凭藉城区委员会在其所在地之城市共同进行工作，因此在省委员会所在地所设县委员会仅得在其本县乡区内进行工作。

第八章　党的全国会议

（三二）党的全国会议按通常规例一年召集两次，全国会议的成份及选举率（每若干人选举一代表）由中央委员会决定。

（三三）党的全国会议决议案经过中央委员会审定后才发生效力。

（三四）党的全国会议开会时，如恰当共产国际世界大会之前，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同意，可以选举参加共产国际世界大会之代表。

第九章　党的全国大会

（三五）党的全国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按通常规例，每年开会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召集之。党的全国大会临时大会，或由中央委员会自动决定，或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创议，或由出席最后一次全国大会的代表，代表党员半数以上的组织之要求，由中央委员会召集之。但党全国大会的临时大会的召集，必须经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批准。党的全国大会，只有出席代表能够代表过半数以上之党员时，始能通过决议案。

党全国大会的选举率，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或由中央委员会决定，或由全国大会之前开会的党的会议决定。

（三六）党的全国大会：

（1）接受并审查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2）决定党纲上的问题。

（3）决定一切政治策略及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

（4）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审查委员会等。

（三七）党的全国大会应由党的省代表大会选举之。但在秘密工作条件之下，得共产国际委员会之同意，则代表可由省委员会派遣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如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同意，可以党的临时全国大会代替。

第十章　中央委员会

（三八）中央委员会委员之数量，由全国大会规定之。

（三九）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全国大会期间内，是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党与其他政党

发生关系，设立党各种机关，指导党的一切政治的组织的工作，指定在他的指导和监督之下的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按环境之需要可派中央特派员于各省党的组织并设立中央执行局，进行含有全党意义的印刷局等事业，分布党的财政和力量，并管理中央会计处等等。

中央委员会应该按期召集全体委员会之会议——至少每三月一次。

（四〇）中央委员会由其本身委员选出政治局，以指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内党的政治工作，并选举常务委员会以进行日常工作。

（四一）中央委员会按照各种工作部门而设立各部或各委员会，例如组织部，宣传鼓动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等等。各部或各委员会的任务，是由各该工作部门中依照中央所指示的进行各项工作，中央委员会指定各部及委员会主任，这些主任应尽可能的由中央委员会中委员充任之。

（四二）中央委员会以经济政治之条件为标准，而规定各地党部组织活动之范围，以全国之行政区域而划分各种地域的单位。

第十一章　审查委员会

（四三）为监督各级党部之财政会计及各机关之工作起见，党的全国大会，省县市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或省县市审查委员会。

第十二章　党的纪律

（四四）严格的遵守党的纪律为所有党员及各级党部之最高责任。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全国大会、中央委员会及其他上级机关的决议都应当迅速而且正确的执行，同时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

（四五）不执行上级党部的决议和犯了党内认为有错误的其他过失，应由相当的党部予以纪律上的处分。党部执行纪律的方法，对于团体的是：指责，指定临时委员会解散组织和党员从新登记；对于党员个人的是：各种形式上的指责警告，公开的指责，临时取消其党的重要工作，开除党籍或予以相当时间的察看。关于犯纪律的问题，由党员大会或各级党部审定之。各级委员会得成立特别委员会以预先审查关于违犯党纪的问题，此种特别委员会之决议，经该级党部批准后发生效力。开除党籍的问题，由本章第六条所规定之手续决定之。

第十三章　党的财政

（四六）党部用费由党费、特别捐、党的印刷机关及上级党部之津贴等充之。

（四七）入党者和党费的多少，由中央委员会规定，失业和极贫苦的党员，可完全不缴党费，无充分理由连续三月不缴党费者，以自愿脱党论，并将其宣布于党员大会。

第十四章　党　　团

（四八）在非党组织（如职工会、农会、社会团体及文化组织等）之各种代表大会和会议上及各机关中，凡有党员三人以上者均成立党团，其任务是在非党的组织中加强党的影响，实行党的政策，并监督党员在非党组织中之工作。党团得选举干事会及书记进行日常工作。党团在处决自身内部问题及日常工作有自由权。在党部委员会和党团中发生不同意见时，党部委员会应协同党团代表重新考查问题，并通过决议，该决议党团应即执行；如党团有不同意见而上诉时，问题由最近之高级党部解决，但在上诉时，仍应执行党委之决议。

（四九）党委员会在讨论与党团有关系的问题时，应使该党团的代表出席党部委员会之相当会议，有发言权。

（五〇）党团选举党团干事会，此干事会应得其所隶属党部之批准。党团干事会在党团工作上，应对于该级党部负责。党部得派自己的委员为代表加入党团干事会组织，并有权召回任何委员，但同时将召回的原因通知党团。

（五一）在党团工作的各组织中，各种职务人员的名单，得当地党部之同意，由党团提出。关于调遣党员由这一党团至别个党团的问题亦同样决定。

（五二）党团所在组织中，各项要解决的问题应该先经党团会议或党团干事会之讨论。凡党团对于每问题之决议，加入该团的党员应在该组织大会上，一致拥护和表决，凡破坏此条之党员，应由党部按党章给以党纪上之制裁。

第十五章　与共产青年团的互相关系

（五三）在党与青年团的各指导机关中（从支部至中央）均应互相派代表交换发言权同表决权，同样青年团得以自己团员的数量为比例选派代表出席党的一切代表大会。

中共中央告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份子

（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

全国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及国民党中的革命份子！

你们的经济地位，虽然一般的较工农兵士为优，但是贫穷的困苦压迫你们，有时竟和他们无异。你们受帝国主义军阀之剥削，豪绅资产阶级之欺凌，应该有革命的需要。你们在几年来中国革命巨潮中，的确也曾跟随无产阶级正确的领导，显示了革命的作用。然而你们不能早些明白：资产阶级之无革命作用，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走向非资本主义前途，以及土地革命为完成民主革命所必需的阶段。因此，在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国民党四一二屠杀上海工人，及去年武汉闹“国共分裂”时，你们竟有大部分受豪绅资产阶级的愚弄，以为自身的痛苦不是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大商买办豪绅压迫剥削之所致，而是共产党所领导的“过火”的工农运动所造成。以为自身的出路，还不在于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以后之民主自由，而在于残酷剥削更痛苦的工农同胞以抵偿自身所受之剥削，因此可以和平苟安。更以为在反共及限制工农运动以后，国民党政治势力之下，民众运动仍可以继续进行，反帝国主义运动亦可在“不过火”的方式之下，得到帝国主义的让步。而民众相当的民主自由之获得，苛捐杂税之免除，教育的发展以至一切平民生活的改善，也均可以实现。因为你们的一念之差，竟使豪绅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军阀，拿青天白日的旗帜，破坏了革命的联合战线，使中国革命受了绝大的打击。

一年以来，你们所希望的“国民革命”已埋葬在白色恐怖的血泊之中。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只是蒋桂各系军阀争相献媚于帝国主义之前，任帝国主义之屠杀而不敢丝毫反抗，让出山东，以求“中日亲善”，悬英国旗，毁沙基纪念碑，洗净反英标语，以求“中英亲善”，解决宁案交涉，承认美国军舰在南京开炮为不得已之举，兼通缉林祖涵，以求“中美亲善”，以杀戮苏俄领事，对俄绝交，铲除共党为要求一切帝国主义援助之交换条件，而对于民众的反帝运动，则一味压迫制止，北伐后对外宣言，居然“尊重友邦在华之合法利益”，对于不平等条约，特别宣称“以正当手续修改”，以求帝国主义谅解其敷衍民众并不敢实行之苦衷。我们所看见的只是封闭民众团体，屠杀工人农民共产党及一切革命分子，停止民众团体的活动，指派御用的假民众团体，以御用的民众团体为反动派互争的工具，在“反共清党”四字之下，更不知杀了多少的无党的平民青年，甚至使怀疑革命或反对革命的分子也因为他们当道的豺狼是“异己”而同遭杀戮。集会结社说话走路通信……等一切自由都被剥夺，散一张传单都要砍头，文艺家的刊物略有不平之鸣，也便马上封闭。

至于苛捐杂税，有加无减，一年来江苏一省，搜括一万五千万元，南京政府发国库

券到了一万四千九百万，江苏湖北的税收较孙传芳萧耀南的时代增加一倍。一年来新旧军阀的混战，无了无休，有唐生智与桂系之战，有李济深与张发奎之战，有蒋冯阎与奉鲁之战，在战争中临时的派饷勒捐，抢掠屠杀奸淫，拉夫封船，一般中小资产阶级所受的流离破产的痛苦，简直难以言喻。北伐后什么经济会议财政会议，无非是豪绅资产阶级与军阀勾结以求实现其“增加收入”的目的，其结果也是要将新的负担加到小资产阶级肩上，南京政府在北伐后已经发行煤油库券一千六百万，天津海关库券九百万，北伐军在北方取消了讨赤捐而增加煤油捐房捐人口税等更多的捐，打倒了奉军的军用票而代以中央银行纸币和国库券。

对于知识分子及学生群众，则一年以来，战争最多之区如两湖，简直停办一切学校，中小学生及小学教员，大半被赤化之名，非遭杀戮即已逃亡。江浙一带虽学校尚在开办，而教育更腐败官僚化，研究系，国家主义派，江浙学阀都已集合于青天白日旗下，向学生不断地进攻，学费比孙传芳时代还重，学校亦可借防共的名义随时关门。学生会学联会在旧军伐时代还可由学生群众组织，现在非国民党御用的，即不能存在。学生要求换一教员或小至换一电灯泡，也要被指为共产党而捉将官里去。

在上述一年来与日俱增的战乱，剥削，压迫，恐怖之下，中小资产阶级中大多数已因切身事实的教训而从幸福的幻梦中醒觉过来，因而失望，呻吟，烦闷，摇动，徘徊，想在迷途中找寻出路。于是中小资产阶级尤其是知识分子之中，有的受了工农革命巨潮的推荡而到处要求加入共产党；有的借文字发泄革命的小说诗歌以寄托思想的不平；更同时有些走到汪精卫陈公博所摆弄之夹攻派或谭平山等的中华革命党的迷宫之中，企图把已死的国民党还魂过来。

所谓“左打共党，右打西山会议派”的“夹攻派”（包含夹攻，革命评论，贡献，贯彻，干，前进，青年呼声各种刊物）在理论（？）上，虽以贯彻三民主义，继续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盟相号召，实则是在国民党失意的政客如汪精卫陈公博等借以向现在在朝的“忠实同志”讨价的一种骗术。他们反对工农领导革命，反对阶级斗争，完全是站在豪绅资产阶级的立场说话！所谓“改组国民党”，无非是说“你们滚开，让我们上台！”而且他们实际上是在蒋总司令的御用下每月向宋子文领津贴二千元，作施存统马浚萧淑宇造党国理论之笔资！换言之，即“夹”在豪绅资产阶级的卵翼下向工农进“攻”！

谭平山等的中华革命党运动，在理论上亦是反对共产党政策，指为超越时代，反对革命中之无产阶级领导作用，在客观上是帮助资产阶级，同时因为政争私仇的关系，虽然怎样痛骂现在的国民党，无非是喊出比陈公博较高的估价，结果与夹攻派是一而二，二而一。他们决不能在工农阶级与豪绅资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流血搏斗的巨涛中，找出一条中庸的出路！在阶级争斗的激流中，他们必然要同化于反动！其上层领袖终将在某种形式之下投降国民党，同时其群众（假定他们是有群众）中之先进分子将受工农革命激潮的影响而追随过来。

中国共产党在一年来流血的艰苦争斗中，虽然他的政策是坚决的独立领导中国工农群众循苏维埃革命的路线发展，但决不是抛弃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或拒绝中小资产阶级参加到同一战线来奋斗。反之，一切中小资产阶级之反帝国主义争斗，民权争斗，以至日常利益的争斗，中国共产党是竭力赞助的。现在是中小资产阶级徘徊于革命反革命阶

级血战的激流之中，呻吟而找不出适当的前途之革命的转变时期，中国共产党特竭诚向全国中小资产阶级之一切群众，指示他们之政治的，经济的出路。

第一，帝国主义对华的积极侵略与国民党卖国政策之相因的发展，成就帝国主义最近对中国数十年所仅见的武装进攻，英日帝国主义在华南华北各自取得空前优越利益的发展，将使为争夺中国市场之太平洋战祸日益迫近，同时在军事，政治，经济上束缚中国整个民族至不能呼吸的惨境，中小资产阶级决不能避免帝国主义进攻之切身的危害，因此，一切中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以至国民党中的革命分子，应一致奋起，与工农群众一致的扩大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反对世界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对华进攻！反对卖国媚外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实行抵制英日仇货，惩办一切奸商！扩大经济绝交的范围！

第二，在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下，一切民众的政治自由皆被剥夺，民众之反帝国主义运动，集会言论自由，或被"党"部把持而成为政府的工具，或被加上"共产党"的红帽子而完全制止，此而不争，将永远沉沦在奴隶政治之下，不能稍有动弹。现在被国民党压迫的民众应一致奋起作"民权自由运动"，打倒反动的国民党！力争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绝对自由！群众自动手的恢复民众运动！反对用任何党部政治部方式来把持或干涉民众运动！

第三，国民党循环不止的军阀混战和穷极征敛的剥削，已将全国工农以及中小资产阶级的生命与血汗，牺牲到不能忍受的极度，再若沉默屈服，即是民众的自杀！因此，全国中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为了切身的利害，应一致起来从事反对苛捐杂税，反对军阀混战的争斗！拒纳一切捐税！反对国库券及一切无偿币券！

第四，无论是汪精卫派或中华革命党，在主客观上都是豪绅资产阶级的工具，其一切行动宣传，不是直接反动，即是间接为反动派张目。青年革命份子不应走入他们的迷宫而终于四面碰壁，应立即在自己切身利害上组织起来，向反革命的国民党，同时向这些豪绅资产阶级的工具汪精卫派或谭平山派进攻。

第五，中国土地革命必须完成，地租制度必须扫灭，然后三百数十兆农民才能解放，民主政治才能实现，封建军阀的根基才能够完全铲除。而真正民众的民主政治之发展，则必须一面反对那些什么"军政""训政"等的党皇帝的统治制度，一面建设工农兵士贫民群众直接产生的苏维埃政权。民主问题必如此向着非资本主义的前途，可以渐次解决。现在全国工农革命的高潮为此目的已不断向前激荡。共产党及无数万工农群众的行动已逐渐深入扩大，决非豪绅资产阶级的任何严酷清乡铲共的恐怖工作所能消灭。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民主独裁政权的革命阶段已经开始了而不是政治的远景。中小资产阶级决不能在决定生死的阶级争斗的两大营垒之间，有所中立。你们必须在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之中，有所选择而决定你们的行动！

全国小商人，学生，自由职业者，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们！现在是你们对于国民党绝望而找自己的出路的时候，你们在悲痛的事实中得了深切的觉悟，必不愿再走入骗人的错路。中国共产党特依上列之分析敬告你们并提出如下列之口号，愿你们站在本身利害与革命前途的关系上，有切实的选择！

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海陆军！

收回山东满洲及一切租界港湾！

自动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没收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
恢复中俄邦交！
反对秘密外交！
反对压迫民众运动！
反对国民党党部政治部干涉民众运动！
民众自动手恢复民众运动！
反对剥夺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抗租之自由权！
反对新旧苛捐杂税，反对强迫摊派库券公债煤油特税麦粉特税等！
反对新军阀的战争！
推翻卖国的国民党及其政府！
建立工农兵及城市贫民的苏维埃政权！
反对买办豪绅大商勾结政府把持全国经济剥削贫苦商人！废除厘金！
反对鸦片公卖，严禁红丹金丸等毒品出售！
启封一切代表民众呼号而被封之团体和刊物！
释放一切争自由而被捕的政治犯！
减免学生学费，改良学校的课程与设备！
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文化机关！
妇女在经济政治教育上与男子一切平等！
拥护土地革命！
拥护保障小商人营业的苏维埃政权！
拥护废除苛捐杂税的苏维埃政权！
拥护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政权！
全国革命的民众联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原载《布尔塞维克》1卷25期）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结与精神

——中 央 通 告 第 二 号——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七日)

各级党部，全体同志们！

本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业已闭幕了，此次大会不仅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极伟大的意义，而且在世界革命历史上有极伟大的意义。此次大会的环境与时期：在国际形势方面正值第二时期（资本部分稳定时期）转到第三个时期——即国际革命形势开始转入新的革命高潮时期；国内形势正值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旧的革命高潮业已过去，而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时期。大会是当着这样革命转变的关头召集的，所要求于大会解决的任务是何等的伟大而严重呵！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和帮助之下，我们大会很顺利的成就了这严重的任务。大会最主要的成功在获得正确的政治的策略的路线及组织的路线，理论上解决了一些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估价了过去一切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并给予今后实际工作的方针与方法，现在简括报告如下：

革命性质与前途——这是最主要的根本问题。大会正确地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因为革命当前的主要任务和驱逐帝国主义，统一中国，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消除一切封建残余，推翻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统治权等，都是开辟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道路，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但是这资产阶级性的革命的彻底完成，必须要在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条件之下，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抛弃了他的历史任务，完全变成了反革命的动力。大会明白指出中国革命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因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已经大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无产阶级领导权已经在此一革命阶段中建立起来，这就可以开辟中国革命将来发展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的前途。同时又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时期，必然可以得到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尤其是已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帮助，更可以保障社会主义前途的胜利。

根本任务与政纲——因此大会指出现在的根本任务，第一，消灭地主阶级，彻底实行土地革命；第二，驱逐帝国主义，统一中国；第三，武装暴动推翻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大会确定本党目前政纲如下：

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

二、没收外国的资本企业和银行；

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

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

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六、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等，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

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有；
八、改善士兵生活——发给士兵土地与工作；
九、取消一切军阀政府地方的捐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
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

目前情势的计量——要确定目前策略的路线，首先要求对于目前形势之正确的估量，大会充分地分析了这一问题，明显地指出旧的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因为工农受着极严重的失败；现时没有革命高潮，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现时比中国革命力量大，他们虽有剧烈矛盾，但对于压迫革命是一致的；然反动统治根本没有消灭革命的能力，因为凡是引起革命的一切矛盾，没有一个能解决，反动政权根本不能真正集中和统一，长期的经济恐慌很难找到出路；所以新的革命高潮必然而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并且已有象征：如罢工斗争之复兴，反帝运动之生长，和各地农民继续不断的斗争，许多小的苏维埃区域的存在等，并且国际革命的新形势也要帮助中国新的革命高潮之到来；但对于这些象征，不可过分估量。

目前中心任务的策略——大会指出目前中心任务正是团结积聚革命力量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暂时武装暴动在全国范围的意义应变为宣传的口号，夺取千百万群众，以准备新的高潮到来——即是准备将来武装暴动之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这样策略的转变是与革命形势的转变相适应的。绝不是取消暴动的策略，乃是更进一步的准备最后胜利的条件。将来新的高潮到来时，实行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便要成为当前实际的任务。大会认定：现时新的革命高潮还没到来，反革命势力还超过工农，所以确定党目前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要加紧日常斗争的指导；同时指明自发的农民暴动与游击战争必须领导；已存苏维埃区域必须巩固与扩大，并在这些区域中扩大红军的组织。

土地与农民策略——大会改正"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大会认为平分主义为小资产阶级幻想，如果这一口号为大多数农民所拥护时，党在行动上可以帮助农民实现这一口号，但在思想上仍应批评平分主义思想。必须坚决的指出，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以后，才有真正平等的可能。大会确定了土地政纲，规定了"土地国有"为目前宣传的口号。大会确定农民策略的总路线是：主要敌人是豪绅地主阶级，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不要故意加紧反富农的斗争，但绝不应抛弃对于富农的半地主性的阶级斗争，注意乡村无产阶级成分之阶级意识的提高和独立组织之形成（雇农工会或在农协中成立农雇会），尤其要防止富农侵占农协及乡村苏维埃的领导权。

职工运动——大会指明党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大会严厉指出过去强迫罢工命令主义委派制度等脱离群众的错误，坚决的反对对于自己阶级应用强制和命令的办法。大会以为还应详细的对本阶级群众解释中国革命的教训及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与任务，使工人群众最终的脱离对于国民党的幻想。大会指出制胜虚伪的改良主义的正确策略（绝不是所谓"统一战线"），同时更详明的指出工厂委员会在目前环境中之巨大作用。大会指出在组织上必须极力发展革命工会的组织，纠正过去党与工会的混合状态，在工会中必须尽可能的民主化，反对委派制度，同时指出有群众的反革命工会或黄色工会中，都必须加入进去来夺取群众。大会主张十分的加紧领导日常的部分的经济斗

争。大会根据武汉时代的经验，规定了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正确策略——即当工人店员的利益与店东冲突的时候，共产党还应坚决的站在劳动者方面反对剥削阶级。

反帝反军阀的工作——大会认为应积极的领导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斗争，引起极广大的工农群众来参加，同时也应引进城市小资产阶级来参加。在此运动中，无所畏惧的争取群众运动之自由，争取革命工会的公开存在，反抗白色恐怖与一切压迫，提出最大限度的减税减捐的口号等等。

组织路线及精神——大会严格的指出过去组织方面之一切毛病，如机会主义、命令主义、农民意识、极端民主化等。大会认定党在失败之后，受着损失而战斗力减低，故现在主要任务在加强党的战斗力和党的无产阶级化。大会认为党的基础有由工人阶级转到农民的危险，必须坚决努力复建党的基础与工人阶级，尤其是城市大工业和交通工人之上。大会认为必须坚决铲除由机会主义、命令主义所造成的党与本阶级之对立的现象，才能改正党与本阶级的关系——即党不是站在工人阶级之上命令工人阶级或帮助工人的一种特殊势力。党只是工人阶级自己之中最觉悟最先进的一部分。大会坚决反对对于本阶级群众用命令和强迫的办法，应以“说服”去代替这些办法。大会认为必须继续完成党的改造工作，建立与健全工厂支部的基础，大会主张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同时严厉的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大会严厉的号召肃清党内一切地方主义、小团体倾向及一切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纠纷，国民党式的残余。大会认为这些恶劣的残余，是损害党的统一和减低党的战斗力的敌人。大会认为加紧党内的教育和加紧武装暴动的宣传是十分必要。大会认“自己批评”为强固党的武器，同时反对滥用此批评，以致削弱党的威信和纪律。大会维持铁的纪律，同时取消不正确的“惩办制度”。

过去经验与教训——第一个问题：机会主义是什么？大会明白答复：阻止群众运动的发展，抛弃独立的政治面目和批评，不了解在革命转变时期党的策略与口号的转变，以致使中国革命受着严重的失败。大会又指出革命失败之客观原因：（一）帝国主义力量强大；（二）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三）地主阶级领导的军事力量很大；（四）工农革命势力发展不平衡；（五）小资产阶级动摇以至叛逆。大会认为客观上虽然有这些困难，并没有完全决定中国革命必然的失败，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实是当时本党指导机关所犯的机会主义政策。大会承认国际一切政策和指导之正确，八七和十一月会议反机会主义开始布尔塞维克之伟大意义，采用暴动政策之根本正确。大会认为广州暴动开始苏维埃阶段有伟大的世界的历史意义；但他的失败使他成为退兵时的一战。广州暴动后，党没有及时转变策略，反盲目主义未能充分，这由当时对暴动观念的模糊，过分估量革命力量及敌人的崩溃，误用不间断革命的名词等。盲动主义是什么？大会认为是不顾群众，轻视敌人的玩弄暴动，他反映农民和游民无产阶级的意识与情绪，而理论上的根据则为对于革命的形势及势力关系估量之不正确。大会坚决的主张肃清盲动主义。大会指明南昌秋收及广州暴动都不是盲动，尤其是广州暴动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纵然准备工作和发动群众还不充分。

倾向之预防——大会不仅纠正了极左的倾向，同时又给可能的右倾危险以预防和警告。大会主要口号之一是肃清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并认反盲动主义即为反机会主义之继续。大会明白指出党与群众隔离的危险，便是盲动主义、机会主义及命令主义。大会指出联合小资产阶级和富农反对一切反动势力，但同时要知道领导劳动者反对剥削阶

级。大会明白指出如果对于这些策略误解，便可发生复活机会主义的危险。大会一面指出农民的不正确的意识（如平产主义、烧杀主义，忽视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等），另方面又指出忽视农民革命作用之危险。此外又指出忽视反帝运动之错误。

同志们！以上便是第六次大会的总精神！大会伟大的成功是我们制胜敌人的起点，大会伟大的成功是促进新的革命高潮和达到最后胜利之动力，一切敌人将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的完满结果之前发抖！中央受大会的委托，号召全体同志一致的热烈的起来认识、接受、拥护和执行大会一切决议与精神，使大会的成功一直到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央热诚的向同志们高呼下列口号：

一、一致拥护和执行第六次大会一切决议与精神！

二、夺取千百万群众准备最后胜利的武装暴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三、第六次大会的成功是促进新的革命高潮和达到最后胜利的动力！

四、肃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防止一切不正确倾向！

五、完成党的改造工作，建立党的巩固基础于工厂支部之上！

六、加强与提高党的战斗力！

七、铲除党内一切个人意气斗争、国民党残余、小资产阶级倾向！

八、党的巩固和一致万岁！

中　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一日）

各级党部并转全体同志们！

一

本党第六次大会，坚决反对一切不正确的政治倾向，坚决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指出党在目前的主要路线是争取群众，很艰苦的有耐心的，深入群众中去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斗争，团结千百万群众于党的周围，这样去促进新的革命高潮，推翻反动统治，完成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势力的两大任务。

消灭封建势力的主要口号是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打倒帝国主义的主要口号是取消帝国主义一切特权，没收外国资本在华的企业和银行。因为必须将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基础根本推翻，他们的统治才能完全打倒。这两大任务，一则肃清地主阶级封建的剥削，一则扫除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开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所以目前革命的阶段，完全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完全叛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现在阶段上已经建立起来，所以他的发展的前途，将要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革命。目前资产阶级的各派，从蒋介石派革命评论派以至中华革命党，都只想消灭工人农民的革命暴动，宁肯和帝国主义及封建豪绅妥协，甚至联盟他们提出的口号，如对农民只提减租和田赋政策，对反帝运动只提废除不平等条约，完全是要缓和工农的阶级斗争，分裂革命势力，只是一种延长帝国主义与封建阶级的统治的反革命的作用。因此中国的民权革命，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去干，对于资产阶级任何派，应当一律给以无情的打击。

革命既然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去干，革命政权当然不能要资产阶级官僚制度的形式。因此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必要。苏维埃政权，是彻底的民权制度，是一切生产者直接管理政权的最好的方式。他的形式虽然很便利于无产阶级的独裁，但是在中国目前的阶段，还应该建立工农民权独裁，而不能马上建立无产阶级的独裁，就是工农联合的政权，而不是单纯无产阶级独裁的政权。一年以来，党的政治总方针，即为建立这种工农兵贫民代表会议政权（苏维埃）而奋斗，广大群众推翻现在统治的武装暴动，即为建立这种政权的前提。

但是武装暴动并不可以玩弄的，必须在群众革命斗争的高涨，反动统治剧急的动摇崩溃，革命力量有了广大的组织的时期，才可以号召武装暴动。现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高潮已经过去，然而新的高潮还没有来，所以六次大会规定武装暴动暂时在全国范围的意义上只是宣传口号，不是直接行动的口号。这不是取消暴动的总方针，而是实际的加紧

准备武装暴动。现在要加紧群众的工作，争取广大群众来准备暴动，新的高潮到来，便立刻把武装暴动从宣传的口号变为行动的口号。

二

同志们！

第六次大会决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十分正确的，是我们目前决定一切策略的准绳，全体同志，都必须有深切的研究和了解，然后才能正确的运用。现在同志中发现许多不正确的观念。这些不正确的观念，都是没有了解六次大会决议的正确意义，都是以妨害我们目前争取群众的总任务：

第一，对资产阶级认识的错误。以为现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上，资产阶级还有革命作用，还需要一个革命的高潮，因此而发生不正确的策略，主张降低我们的政治口号，主张我们的口号可以与第三党大略相同。这种倾向，在客观上，完全是帮助资产阶级，完全不了解"争取群众"的意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反革命的动力，在政府中极力主张改良的政策，在群众中极力宣传改良的口号，只是一种阻碍革命，破坏革命的反革命的作用，正是我们争取群众的最主要的敌人。我们的口号，不单是不能与他相同，并且一定要不同，然后才能揭破资产阶级的欺骗，才能使群众团结到我们党的口号周围。

第二，就是合法运动与和平发展的观念，以为大会既经决定目前只是宣传武装暴动的时候，而不是直接号召暴动的时候，那么应该以合法的方法来发展组织，要取消一切武装斗争，乡村游击战争等，一切斗争行动，都要力求合法。这种倾向，只是引导群众增加对现在政府的幻想，减少群众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把群众送到敌人的影响之下，更不了解乡村中英勇的烧杀政策和盲动主义，固然应该严厉的反对，但是在许多乡村阶级斗争，已经到了极高度，每一斗争，都要走向武装斗争方面去，所以真正是广大群众要求和参加的武装斗争游击战争等，我们必须领导，然后才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同时，还有一种危险倾向，即群众工作和平发展的倾向，现在不知不觉的在党内有了些萌芽。这种倾向的表现，就是在群众工作中惧怕，甚至避免斗争，只做些组织工作和不激烈的宣传工作，采取了"先组织而后斗争"的机会原则。殊不知党和群众的力量，只有从日常斗争中能够扩大，革命浪潮只有从日常斗争中能够发展出来，党与群众的正确关系，也只有从斗争中能够建立起来，不要斗争，永远不能真正获得群众，永远不要梦想革命高潮。这种倾向发生的原因，在客观上是白色恐怖和工作困难的反应，主观上则是不了解盲动主义，因而"反盲动主义"成了"不动主义"，这种倾向正与六次大会"争取千百万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完全相反，其发展必然成为极庸俗的机会主义，因此在全党之内应当严重防止这一倾向之发生和发展。

第三，是忽视农民的革命作用。大会看到过去城市工作的消沉，特别指出职工运动的重要。但因此而发生一种思想，以为那些散漫的农村斗争可以暂时置之不理。要知道农民是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中，为主要的革命动力之一。如果丢开了农民群众，无产阶级便成孤立，决不能够战胜敌人。过去的高潮，农民斗争不能与工人平衡的发展，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客观原因之一。

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教训。

第四，但还有与上述思想正相反对的危险，则更为严重。这就是农民意识笼罩一切。一年来农村斗争特别发展，党的组织又有十之七八是农民成份，因此农民意识反映到党的内面，例如主张平分土地平分财产等均产主义的思想，主张焚烧城市及乡村中无目的的烧杀等流寇的观念，完全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共产党认农民是革命的同盟者，同时明白农民是小私有财产者，不能有正确的社会主义思想，保守的观念特别重，更缺欠组织的能力，所以只有在无产阶级的意识领导之下，才能走上革命的正轨。如果不极力去纠正这种农民意识的危险，将使革命完全消灭，党亦趋于死亡。再有过于重视农民斗争，放弃城市工作，专一注意乡村，也是一种极不正确的倾向，对于党，对于革命都有莫大的危险。

第五，轻视反帝运动和偏重反帝运动的危险。这是两个极端的观念，前一种，以为工人的经济斗争，农民的土地革命就是反帝运动，此外别无反帝工作；后一种以为只要造成反帝高潮，便可发动一切工作，甚至主张以"反帝运动来掩护阶级斗争"。其实这两种观念，都是不了解怎样去促进革命高潮，都不了解各种运动互相推动互相促进的意义。没有工人农民强有力的基础，决没有反帝的高潮，同时反帝运动也的确可以推动工人农民的斗争。所以工农斗争与反帝运动应该同时发展，同时并进。

第六，轻视或偏重兵士运动的倾向。这也是两种极端的观念，前一种，以为兵士是流氓无产阶级，没有积极的革命作用，所以在策略上形成"兵变主义"，以为兵士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造制兵变。后一种，以为兵士运动可以发展工农运动，只有兵士运动发展，工农运动才有办法，因此在策略上也主张多做兵变。这两种观念都是极不正确的。兵士多出身于农村，与农村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都有密切的联系，根本意识还是与农民相同，所以在普通的阶级分析观念上，兵士只能说是"武装农民"，决不是流氓无产阶级。所以决不能说没有积极的革命作用。在现在革命的阶段上，他与工人农民同为革命主要的动力，无产阶级当然更是这一联合势力当中的领导力量。所以兵士运动的目的，是夺取广大的兵士群众，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而成为将来的总暴动。但是兵士运动，必须有工农斗争的影响，没有工农斗争，兵士运动决不能够发展，所以偏重兵士运动，更是一种根本的错误。所以这两种观念，根本上虽是两个极端，但是在策略上都成为"兵变主义"。

第七，反对一切公开运动的偏向。以为凡属一切公开的组织，合法的斗争，都是引导群众增加对现在政府的幻想，都与推翻现在统治阶级的目标相矛盾，而不知道这是在我们党领导群众的策略正当与否。党的口号与策略如果正确，不但是可以利用公开合法的机会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并且可以揭破统治阶级的假面具，增加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视，提高群众的阶级意识。所以我们应该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来发动群众，宣传我们的口号，但是不能降低我们的口号，去找公开的机会。

最后一种，就是只幻想革命高潮就要到来，而不艰苦忍耐的去做群众工作。这一种幻想，是与目前党争取群众的任务，绝对不相容的。新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的确是客观条件规定的明显事实。但是新的高潮到来的迟早，与能否彻底的胜利，的确大半决定于革命的主观力量。如果群众力量增高，的确可以促进高潮更快的到来，如果群众的力量薄弱，或许革命还要走向暂时的消沉。所以我们只有很艰苦的，有耐心

的去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然后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若是只幻想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而不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这在客观上便是妨害革命，所以我们更应该严厉的打破这种幻想。

同志们！上面指出的这些偏向，都是犯了右倾或左倾的危险，我们必须严厉的纠正这些错误，才能正确的运用大会的决议与精神，才能走上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路线。

三

同志们！要贯彻六次大会的精神，实行六次大会的路线，更要肃清过去的许多政治上的偏向，因为这些偏向都是与六次大会的根本精神和路线绝对不相容的。

第一，便是机会主义。不相信群众本身的力量，而依赖单纯的军事力量，到了斗争紧要关头即发生动摇，为要迁就那不可靠的同盟者，而离开自己阶级的立场，牺牲自己的政治主张，自己取消批评同盟者的权利，取消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只顾拉拢上层的领袖，不惜阻止千百万下层群众的斗争，这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术，只是小资产阶级动摇不定，投机取巧的思想。现在客观的情形与党的路线虽久已变迁，但机会主义的思想，并没有完全去净。如上面指出合法运动的观念，和平发展的观念，承认资产阶级还有革命作用等，都是机会主义思想的残余。

第二，是盲动主义。不顾群众，不估量革命和反革命的力量，只凭少数人的英雄气概，就轻举妄动起来，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潮流中，大家只嚷着“暴动”“暴动”，几乎每次斗争都要作暴动的布置，以为不如此，便是机会主义。岂知群众斗争还没有发展，听暴动都要害怕，自然就不会来参加，遂使暴动成了少数人的烧杀行动。到了暴动失败使群众因反动势力的高压，连日常斗争都要消沉，其妨害群众斗争，和机会主义没有两样。这也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术，而是流氓无产阶级孤注一掷的拚命主义。上面指出的只幻想革命高潮，不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和“兵变主义”等，也是很明显的盲动主义思想的残余。

第三，是命令主义。如命令暴动，强迫罢工等。不去说服群众，鼓动群众自动的斗争，而用机械式的命令或威力去恐吓群众，以及群众中的委派制度，都是这个精神。这是不了解党仅是阶级的先锋队，而以为党权可以高于一切。这样必然使群众对党发生反感，或则把革命斗争认作共产党的事，他们只是服役的人，或则把党看成救世主，而不相信群众本身的力量。这就是使党脱离群众，绝对不能深入群众，争取群众。所以我们先要了解群众的要求，提出党的口号，使党在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群众只感觉党的主张好，在党领导之下起来斗争，而不觉得是由于党的命令，这才是争取群众的正确方法。

同志们！现在党内许多不正确的观念，都是上面指出的三种错误思想的残余。要实现第六次大会的精神，必须与三种错误的观念坚决斗争。

四

同志们！党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思想的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

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包括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五四运动以后，当时国民党只是一个官僚政客的集团，此外则别无革命的政党，因此许多急进的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都钻进我们党内来，尤其在国共合作时代，更加进了许多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所以革命一加转变，许多党员动摇消极，甚至公然叛党，投降敌人，陷害同志。八七以后，提出改造党的口号，坚决洗刷一般动摇的分子，改造指导机关，的确使党渐渐加强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这是党向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但是到现在党的组织，仍然还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基础，仍然存在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尤其在成分上，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那么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有大大发展的可能。所以要使党布尔什维克化，第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们在检查了政治路线之后，必须把组织观念上的错误严密检查一下。

第一，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又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可以随便不执行。上级机关发一传单，没有交支部通过，支部居然提出质问。同志不得党的许可，可以自由行动。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得粉碎，以至于消灭。还有一种不正确的平等观念。如用钱不管工作的重要与环境。要平均分配，用人要按地域区分，更完全是农民意识均产思想的反映，必须严厉的肃清。

第二，反机会主义认识上的错误，反机会主义主要的是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但有些同志竟专门攻击个人，因此而放轻了对于机会主义观念的批评，仿佛某几个人如果打倒了，机会主义便可肃清。殊不知机会主义的来源很深，决不是排除了几个人就能把机会主义肃清的。诚然，党对于那有系统的执迷不悟的机会主义分子，只有尽情驱逐，才能坚固本身壁垒，但是主要的还在攻击一切机会主义的观念，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至于因私人感情而借题发挥，那更是一种政客式的行为，这是与无产阶级的党，绝对不相容的。

第三，是个人的意气之争。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在政治上何等重要，但是一把对政治变成专门对人，便成了闹不清的意气之争了。因意气而攻击他人，因意气而不接受他人的批评，甚至有不站在党的立场去考查同志的意见与工作，专以意气去推测他的动机，而造成党内无穷的纠纷，这是充分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表现。

第四，是小组织的倾向。现在党内许多小组织的倾向，都是由私人感情的结合，或部落的观念形成的。少数有领袖欲的人，想造个人地位，利用这些结合，攻击地位较高或地位相等的人，因此资产阶级种种政客官僚的卑污恶劣手段，一例发生了。这是破坏党的最恶劣倾向。

第五，是工学界限。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知识分子虽然很多动摇，但是能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奋斗的人亦不少。在无产阶级中也不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意识而染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许多同志不明这个道理，于是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了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党内的纠纷。这种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意识。

第六，怀疑改造党的路线。不坚决的引进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保存一

种旧的组织观念，使党始终停留在一种命令委派的家长形式之下。分配工作，始终只相信脑筋中几个熟悉的人，而不相信下层中产生出来的新的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同志。这样要使党机体日益腐化，永远没有生机，永远不能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第七，改造党的形式主义。引进工农分子是改造党的重要方法。但许多党部执行起来，又陷于形式主义的错误。只是机械的找些工人分子进来，而不加以积极的教育，或则机械的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分的比例，结果还不是由那些旧人——知识分子包办？甚至闹成秘书长专政的笑话，这种引进工农分子的方法，是毫无意义的。

第八，是雇佣革命的观念。党只需要少数的革命职业家，担任日常的党务，至于在群众中工作的党员，应当不离开社会的职业而为党工作，方能深入群众。然而有些同志，竟有一种雇佣劳动的观念，做工作就要钱，不拿钱就不做事的现象，支部干事也要津贴，以为利益均沾，这是严重的错误。

第九，是把党看成救济会。许多同志因失业穷无所归，专门找党来解决生活问题。殊不知党并不是救济的机关，党的工作主要的是在群众中，而不是在党部，决不能人人都派作一党部工作。加之同志们如果继续不断的脱离了社会的职业，便不去找社会的职业，则党成了和群众没有关系的党，怎样能组织群众领导群众呢？

第十，是消极怠工。许多同志观念动摇，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或者看了党内有些个人的意气之争和政客式的结合挑拨，于是心灰意懒，不愿积极工作，这完全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悲观主义。其实革命每天都在向前发展，只要我们能够深刻的去了解群众的情绪，便可以引导我们走向积极的道路，至于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群众的党，只要全党同志们坚决的一致奋斗，少数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坏蛋，断乎不能破坏党的组织。消极观念，只是一种堕落的倾向。

同志们！上面指出的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的确还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全党的同志，应坚决的起来奋斗，肃清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中央受六次大会的委托，坚决的执行六次大会的决议，同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不正当的倾向，继续猛烈的奋斗，尤其在组织上要把一切小资产阶级意识扫除干净。中央对于党内的纠纷，反对弥缝敷衍的妥协办法，而要坚决的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党的同志团结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之下一致奋斗。

同志们！中央有决心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对于闹私人意气的同志，无论其历史的长短和工作的好歹，一律不客气的排除，决不让我们无产阶级的政党，保留着一毫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中央要求全党同志们共同负起这个责任，一致奋斗，完成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中央指出下面的路线为全党同志一致奋斗标准：

第一，强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要使党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加强，首先要扩大党的无产阶级组织基础。到产业工人中去，建立强固的工厂支部，增加党的工人成分，集中注意于全国产业区域党的组织之健全，造成党的新生命，这是目前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

第二，发展党内政治的讨论，提高政治的水平线。各级党部都要尽可能的讨论一切党的政治问题，引导每个同志都尽量发表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同时，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提高党的理论，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出路。

第三，是党员职业化。失业同志，应当设法找到职业，党部应当帮助同志去谋职业，无职业技能的还要学习，特别注意到工厂中去做工，同志也应互相介绍职业，要使同志不依赖党生活，而且能深入群众中去，把党的影响到群众中去扩大，同时能把群众的意识正确的反映到党里来，使党成为真正群众的党。

第四，是支部生活的改进。政治的宣传鼓动，群众的组织只有支部才能深入；日常的斗争，只有支部才能灵敏的领导。如果仅仅高级党部定几个空架子的计划，发布几种宣传的文书，而支部不起作用，党和群众终久没有接近的时候。所谓支部生活，并不是仅仅开会听政治报告纳党费就算完事，最要紧的是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工作问题，无论是一工厂，一学校，一军营，一农村，一街道，范围虽小，都有他不同的政治环境与工作方法。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运用，首先要了解一切实际的情形。这是每个支部的任务，每个同志的任务。必须能充分执行这些任务，然后支部才能成为群众的核心，每个同志都成为群众的领导者。

最后中央提出下列的口号，要求全党同志一致的拥护：

拥护第六次大会的精神！

详细研究第六次大会的决议案！

坚决执行第六次大会的一切决议！

反对机会主义的残余！

坚决的与盲动主义斗争！

肃清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强固党的无产阶级的基础！

到产业工人中去！

党员职业化！

发展党内的政治讨论！

发展党的理论教育！

健全支部生活！

继续改造党的组织！

坚决反对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意识！

闹个人意气的滚出党去！

完成党的布尔什维克化！

做艰苦的群众工作！

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争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

促进革命的高潮！

领导革命彻底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五日）

在现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机异常严重，国内的革命斗争日益紧张的时期，党内的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都乘时活动起来，积极的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好象与敌人联盟一样的来向党进攻，这的确是很严重的问题。全党同志必须明确的认识，只有坚决的肃清党的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的错误思想和小组织行动，才能顺利执行党在目前紧张形势中之“拥护苏联”与领导革命斗争的任务；同时必须坚决的执行“拥护苏联”与领导群众革命斗争的任务，推进革命的发展，才能根本肃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思想。

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对于目前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都走入了取消主义的观点，最近陈独秀同志致中央的信，便是一个很好的代表。他这信的观点，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

（一）他们认为过去机会主义发生的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的错误的观察”，因此他根本否认共产国际列宁主义对半殖民地的中国民族革命开始的阶段，可以与资产阶级暂时联合和加入国民党的路线，这就是托洛斯基当时攻击共产国际的观点，已经共产国际批评得体无完肤。在中国革命中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是由于中国党当时的指导机关，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不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不反对资产阶级，而极力向资产阶级让步，甚至无耻的投降，把共产国际列宁主义对殖民地民族革命理论，变成了孟塞维克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决不是当时暂时联合资产阶级和加入各阶级联盟的国民党的根本路线错误。独秀同志不去正确的认识历史的教训，只图避免责任，不惜把自己躲到托洛斯基主义的旗帜之下而诬共产国际的根本路线为机会主义，于是他遂与托洛斯基主义同样的走入了更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派的观点。

（二）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失败了，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这就是取消派的根本观点。照这样说，资产阶级克服了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也对他让步了，那么，在经济上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束缚都没有了，可以坐享资本主义发展的幸福了，在政治上封建势力，帝国主义的矛盾都没有了，自然统治阶级只有稳定，绝“没有动摇”了。这样很简单的取消了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取消反封建势力的斗争，自然根本把整个的革命都取消了。实际上中国革命的失败，不是无产阶级失败，而且整个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失败了，帝国主义与封建

势力得胜利。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是胜利了，但是对帝国主义是屈服了，因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加强，对封建势力妥协了，因之，封建势力又得到一时的恢复，所以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势力的任务一点也没有完成，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一点也没有解除，故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因为现在的这些矛盾，不仅没有减少，并且日益加紧，故革命高潮必然不可避免的要到来。

（三）他认为“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帝国主义，都胜利了”，自然结论到“现在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权，国民党是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历史证明这样的观点完全错误的，资产阶级是背叛革命，投降了帝国主义，妥协了封建势力，而得到部分的政权，并没有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统治而建立他自己一个阶级的政权，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就是这一联盟的具体形式，所以他们内部才包含了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各个帝国主义正在互相抢夺中国的统治，买办地主资产阶级正在互争这一反革命的领导权，各派军阀正在互争地盘，遂造成不断的军阀战争，一天一天的走向崩溃的道路。

（四）他们不了解这样的观点，因此得出极奇怪的结论，以为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一点矛盾也没有了，而军阀战争却是由于资产阶级各派（重工业资本与轻工业资本等）的冲突所造成，这是毫无经济常识之谈。在一国内的资产阶级内部因各种经济原因而发生利害的冲突，发生政治的派别，可是决不能发生国内战争，因为在经济上他们互相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更大于他们的冲突。在落后的农业国家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每个国内战争，都必然要反映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如解放黑奴的美国南北战争，扫除封建藩属制度的日本西南战争，都是一样。独秀同志把这些战争都认作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战争，这真是空前未有的奇闻！至于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军阀战争，主要是帝国主义相互冲突的结果，同时也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如目前的反蒋战争，双方都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集团，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资产阶级，其所以赞助这一战争，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为着利用这一工具来扩大他的利益范围，任何一方面的封建势力也是为着自己的阶级的利益，为着利用这一军阀来保持他的封建剥削关系。但是任何一方面的资产阶级都是要妥协封建势力，勾结帝国主义，都只有反革命的作用，都没有丝毫革命的意义，所以这样的战争是毫无疑问的反革命的战争。

（五）他从这样抽象的观点出发，因此对于经济的分析，不顾事实的而肯定“封建势力经过商业资本的侵蚀，帝国主义商品经济伸入农村，尤其大革命的经过，已经受到最后的打击，已经是残余的残余，”已经不再保持他的封建的剥削而“努力资本主义化”，而结论到“封建势力已经完全服从资产阶级的领导，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只有共同点而一点矛盾没有了”，这只是脑子里面的幻想。实际上中国的土地关系，虽然经过长期的变迁（主要是商业资本的侵蚀与农民暴动）虽然在土地所有关系上，资本主义的形式占优势，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关系则封建的形式仍然占极大的优势。帝国主义商品经济如狂风暴雨般侵入农村，使半自然经济更加崩溃，封建地主更加动摇。可是，地主对农民的封建剥削却更加残酷。大革命的经过，的确给这样的剥削以莫大打击，同时，在革命失败以后，这样的封建剥削关系，又得到一时的恢复，地主阶级的势力又得到暂时回光反照的机会。同时现在全国的情形，支配全国的经济生活的：第一，是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第二，是封建的剥削关系；第三，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

剥削。资产阶级虽然企图发展资本主义，封建地主也想蜕化为资产阶级，可是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无法实现这样的企图，因此资产阶级便不能放弃他的改良政纲的斗争（但这一斗争因为畏怕工农民众起来的原因又必然是要勾结帝国主义，妥协封建势力）而封建势力更加要保持并且要更加紧他的封建剥削，这是明显的客观的事实，任何人只要能抛弃脑子里的幻想与成见，细心的去研究中国经济关系，都能了解这一正确的观点。

（六）因此他所承认的"革命高潮当然有再到来的可能"与六次大会和中央所指出的"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到来"的意义完全不同。六次大会所指示的意义是指整个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失败了，帝国主义仍然在极野蛮的统治中国，封建阶级仍然是在加紧他的残酷的剥削。资产阶级因为得不着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让步，只有更厉害的向工人进攻，那么，广大劳苦群众找不到第二条出路，因之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反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必不可避免的到来。所以现在各地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突起，工人斗争的发展，农民暴动之不断的爆发，决不是甚么"革命失败之余波"，"革命高潮的反面"。而是明显的新的革命高潮的象征。他们否认这样的前提，他们认为帝国主义让步了，而且帮助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了，（那么所谓帝国主义宰制中国便成了一句空话！）封建剥削更没有了，那么，没有什么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民主革命了，有的只是工人对资本家的革命了。所以他们否认现在广大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农民不断的暴动是革命高潮的象征，而且否认一切的革命象征。六次大会与中央指出这些根本矛盾没有解决，所以统治阶级是走向崩溃，而革命形势是走向高潮，他们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否认革命斗争开始复兴。他们只承认工人与资本的矛盾一点，同时又认为现在工人的斗争"只是革命高潮的反面"，那么所谓"革命高潮必然有再来的可能"只是与"我们必然得到最后的胜利""共产主义必然得到最后的成功"一样的毫无现在实际策略意义的话。他们以为"说革命高潮将永远不会到来是取消派的见解"，其实说革命高潮永远不会到来，何只是取消派的见解，而且是疯子，或者是资产阶级的空想，所谓取消派的观点正是如他们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承认须经过统治阶级的稳定，然后才有革命的高潮的意见。

（七）依据他们的观点，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否认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那么不是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到来，而是统治阶级稳定不可避免到来，根据这样的观点出发来决定策略的路线，自然要在原则上采取合法运动，而"国民会议"应该是中心的口号，苏维埃的旗帜只好取消。独秀同志却是很怯懦的不敢如托洛斯基一样的公开主张合法运动与国民会议。只是消极的攻击中央的路线，攻击中央号召"五卅""八一"……的示威运动是盲动，是玩弄，不敢公开的提出积极主张。实则在他们的观点上只有取消一切非法的斗争，力求合法，才不是玩弄才不是盲动了。所以借着列宁所谓"不带何等血热性的合法手段"的一句话，透露他自己的观点。如果他的主张真果是如当时列宁的主张一样，那么，决不会觉得中央是盲动。因为中央的路线只是反对合法主义（带血热性合法），并没有抛弃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手段，而且积极指出要利用公开与合法的可能来发动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同时既然统治阶级是在走向崩溃，群众斗争是开始复兴，那么光只利用合法的可能来组织群众，光只注意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是不够的。必然同时要领导群众的斗争走向政治的示威行动，以扩大党在群众中政治影响。如果说这

是盲动，这只是从他的取消观点出发的取消办法，根本上与第三党的口号毫无二样。

（八）从他们对于中国农村经济的分析，认为农村经济关系主要是资本主义剥削，于是农村中主要的矛盾是雇农贫农对富农与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斗争，地主的封建剥削只是残余的残余，次要又次要的了。所以他们认为“富农是反革命，中农是中间动摇的分子，只有雇农贫农是革命的柱石”，所以他们的策略路线是“联合贫农使中农中立反对富农”，这又是对于土地革命对于农村斗争策略的取消观念！事实上中国农村经济关系，主要是地主军阀对于广大农民群众的封建剥削，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剥削，只是与地主阶级利用土地使用关系对农民的剥削相互勾结着，并且多半是豪绅地主兼营，至于富农对雇农的剥削在整个的农村经济关系中，还是次要的地位，所以农村中主要的矛盾是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对抗。但是中国富农兼有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他不能坚决参加反封建的斗争，所以现在农村中从雇农至中农都是遭受封建剥削的革命的群众，富农是动摇以至反革命的分子，所以我们农村斗争主要的口号是土地革命，斗争的策略以雇农为主要基础，联合中农，反对富农，如果现在不以反军阀地主封建剥削为中心口号，决不能发动广大的群众，如果不与中农结成巩固的同盟，便要削弱革命的力量，决不能推翻统治阶级。所以他们的策略是取消革命的最好办法。

（九）党的民主化的限度是要依据客观和主观的条件来决定的，如果客观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时候，而要求超越可能的民主化，只是“帮助俄皇宪兵”（列宁这样说过）的办法；如果主观的无产阶级基础薄弱，而要想扩大党的民主化，只是放任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妥协倾向在党内发展。现在中国党的情况，主观上无产阶级基础既弱，尤其是客观上白色恐怖是古今中外未曾有的残酷，加以革命斗争又异常紧张，国内军阀战争，国际的反苏联战争都摆在党的前面，他们却在这个时候要求公开讨论一切不同路线的意见，要求把反对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意见都公开在党报上发表，要求从支部到中央都实行民主的选举，这无异于要求党放弃目前实际的革命斗争的任务，来实行党内清谈。要求松懈党的极端秘密的组织好让警察巡捕得以大施破坏。至于因为中央要求全党同志服从党的决议，在党的策略上一致行动，便说：“这是命令主义”“这是一贯的命令主义”，这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列宁党的服从多数，服从上级党部的一切决议和指示的根本原则，绝不能容许这样无政府的思想来破坏的。至于主张党内和平，不过是要求党放弃对于一切不正确倾向的指斥，放任这些倾向在党内发展。诬蔑中央用“警察政策”，这更是学习托洛斯基攻击俄国党的最卑污的挑拨离间的手段。可惜太不聪明了，因为把这些话用到中国党来，只有得到全党同志的嘲笑与愤慨的回答！

依据上面的分析，他们的观点与路线都是一贯的取消主义，他们分析革命失败的根由是反对共产国际整个的路线；分析中国经济政治的状况，取消了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斗争，取消了土地革命，分析革命形势，否认统治阶级的动摇与革命斗争的开始复兴，这样根本把革命都取消了。因此在策略上自然要主张取消一切非法的斗争；罢工与示威，都成为玩弄与盲动了。在组织上自然要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不要纪律，不要服从上级党的决议与指示，主张党内和平，一切不正确思想都有权利在党内自由宣传。这便是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整个的路线。这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

中央认为这样的思想在党内发展，不止是破坏党执行目前迫切的革命任务，而且可

以使党分崩离析以至灭亡。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坚决站在共产国际，六次大会与中央决议之上反对这样取消主义的思想。把它彻底肃清。

现在党内还有一种严重的调和派的倾向，如说“托洛斯基主义是有理论的系统，我们不好简单的批评他。”“他们固然错误了，中央也不完全是对的”，……等，这种调和的观点，只是模糊同志的观念，松懈党对于取消派的攻击，掩护取消派的思想在党内发展，想拿一些技术的，非政治的问题，来动摇党为正确原则的争斗，为列宁主义路线的争斗。他们与取消派的不同，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比，原则上是一样的动摇党的路线的。并且不肃清调和派的倾向，决不能执行反取消派的斗争，所以反对调和思想的斗争与反对取消派一样的重要。

布尔塞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在未开新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全党同志都必须绝对服从最后一次大会的决议，违反大会决议的观点，绝对不能容许在党内自由讨论，并且现在革命斗争异常紧张的时候，煽动党内原则不同的讨论，毫无疑问的是阻碍革命斗争，破坏党，客观上便是帮助敌人。所以中央认为这样的思想，必须迅速的把它肃清，尤其不应该因为这样的讨论而松懈领导群众斗争的工作。

现在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不只是故意的煽起党的讨论而且实行了他们的小组织的行动。反对派已经有他们的秘密刊物，在党内传播，独秀同志也在未经中央决定以前，把他写给中央的信，自由在同志中间宣传，这是列宁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因此中央在组织上有下面的决定：

（一）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与以组织上的制裁。

（二）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

（三）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中央认为在目前革命斗争紧张的形势之下，上面的决定，是巩固党，使党能坚决执行领导革命斗争任务的必须的方法，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拥护中央的决议，肃清党内取消主义的思想与一切反党的小组织。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

〔附〕陈独秀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中央常委同志们：

现在关于时局之当面的危机，无过于中东路问题，这一问题不是简单的中俄两国间

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问题之导火线。由这导火线而至爆发战争，也许是慢性的（因为中俄都不利于轻率开战，尤其是帝国主义间都还未曾充分准备好，现在谁都不敢断然取独占的形式，会需要经过一些曲线的斗争），然除了恢复中东路原有的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

这种纠纷发展到爆发战争，有两种可能形势：一是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不但在远东，近东也是一样；一是苏俄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在夺中东路迟早要导入第二次大战。无论是那一种，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

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或者在受了欺骗而迷惑的严重空气之下，不敢别持异议。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

此事在中国发生，事体本身又和中国社会有直接利害关系，民众多数心理又是这样，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这些实际情况，都不能让我们闭着眼睛不理，而可以自由前进的。

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的宣传方法，似乎不能象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即是说单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苏联在中国的权利，仅只是在中东路没有完全放弃，唯一原因是因为中东路是进攻苏联之一个有力的军事根据地”。七月十二日的宣言中这句话，显然有几层语病。），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而未曾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制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此时中国大多数民众，尚在眼前的具体的民族利益的蒙蔽之下，这一层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使他们在实际利害上权衡一下，他们明白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在此时的确是有害无利的幻想，他们才能够了解苏俄和帝国主义不同，才能够了解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才能够了解苏俄是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领导者。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并且使国民党很便当的简单明了的把他们“拥护中国”的口号和我们“拥护苏俄”的口号对立起来，听群众自己选择一个。

第四十二号中央通告说：“并且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样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这只是在客观上也许会演成事实，但我们根本上反对一切反动的国际战争的党，尤其是正当极力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紧急关头，决不应该向同志这样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因此，我们主张中央赶快补发一个通告，取消这几句话！

我估计现在的情形和从前稍有不同，或不至因我的发言引起大家的误会与揣测，所以我以后对于重要问题，都想有点意见贡献于党；并且希望能够把我的意见全文都在党

报上发表出来。

此致

革命的敬礼

独　秀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转自《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

〔附〕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

（一九二九年八月五日）

中央常委同志们：

一　一九二五——七年革命之失败，其主要原因，是党整个的根本政策是机会主义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了。这个错误的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根由，乃是因为不曾洞察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尤其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之错误的观察，遂至不自觉的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助长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势力，造成了革命失败资产阶级胜利之前提。我们若不深刻的了解这个根由，将仍要辗转陷于不可拯救的泥坑中，莫由自拔，将只是口中反对机会主义这一名词，而手中所做的仍旧是各种各样变相的机会主义。

“八七”会议以后，仅仅是笼统的反对机会主义，并未曾指出机会主义政策发生之真正根由；更未看清实际情形，勇敢的承认革命之失败及资产阶级之胜利这些既成的事实。广州暴动失败后，我们分明是失败了，当时应该马上取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存阶级的战斗力，即是我们从战场上退出来，整理我们的队伍，积聚我们的力量，以图革命之再起。当时党的政策却不是这样，反而是在主观上肯定革命潮还正在一直高涨，因此取了直接进攻政策，直到六次大会前尚在进行湘鄂赣三省总暴动，使敌人得着机会，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把我们整个的阶级力量打得粉碎，无产阶级及农民群众，在党的“暴动！暴动！继续暴动！”这样命令之下，受了一时不能回复的损伤，党中最积极的战士亦因之丧失殆尽，党和群众也断了联系，至今还不易恢复。

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感觉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错误的估量，遂至有错误的政策，曾写了几封不避忌讳的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象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情绪也不象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昂，并且我们已失了和广大群众的联系；若不马上改变政策，从群众自身的日常生活斗争中获得广大的群众，若不估计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情绪到了若何程度，而随便暴动，其必然失败的结果，只有使群众更加离开我们，甚至于怨恨我们而接受反动派的宣传。当时的中央对于我的意见，不但不提起注意，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听说在六次大会时，特立对布哈林说：“盲动主义极盛时，我实

觉得不妥当，但在中央高压之下，不敢说出不同的意见。”的确，当时的中央同志们，以为只有自己和与自己同一意见者才是真正布尔塞维克主义，只有暴动才是布尔塞维克的正确路线，如有人对于革命高潮有点怀疑，对暴动有点审慎，便要拿“机会主义的残余”“观念不正确”等罪名加以打击，大有“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气概。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于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可惜太晚了，并且未曾把这些错误之根由系统的彻底的指摘出来，遂至留下现在的祸胎。

二　现在的中央的政策，是否已经改正了这些错误呢？我以为一点也没有改正。不但向左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未曾改正，向右的机会主义根本上也同时存在。始终不认识资产阶级的发展对于革命之危险，始终不认识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之阶级性，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则在政治分析与估量上自然要发生错误。政治上有了错误的估量，即是把敌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坏，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自然要发生盲动主义；盲动主义者碰着不动的阻碍，自然要发生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惟恐其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死党内德谟克拉西，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子，造成自己褊狭性的一致，以便令出惟行，好证明其“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说”（这是造谣，中央正反对认为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意见，参阅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与复江苏省委同志的信——编者。）及盲动路线之正确。有许多同志都感觉着中央在政策上组织上或工作方法上，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以为不是这样零碎的问题，而是有系统的一贯的总的路线之错误。若长此照这样不正确的路线蛮干下去，于革命及党的前途，都有莫大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又只得不避忌讳，向你们详细说明一下：

三　你们对于蒋桂战争性质分析的错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部的，乃是由于不曾洞察资产阶级发展对于革命之作用及其危险性，不了解统治阶级即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这种传统的错误这种整个的错误观念所表现之一例。把国民党看做是一种各阶级的政治联盟，而不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本是我们党传统的错误；由这传统的误错观念做出发点，所以你们才把蒋桂战争及一切国民党内部斗争，都当做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矛盾之爆发。（你们把蒋桂战争看得如此严重，如此夸大，所以一直到战争爆发之前一分钟，尚坚决的预言战争不会就爆发；这个错误决不是偶然的，代他们格外夸大，遂不得不代他们格外慎重。）

其实，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经济利益之根本矛盾，如领主农奴制，实质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剥削农民早已成了它们在经济上（奢侈生活或资本积累）财政上的（维持政权所必需的苛捐杂税）共同必要；至于说资产阶级企图发达市场，列宁曾经告诉我们，这是要靠“农村资产阶级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创造市场：第一，为生产手段创造市场，即是由富农把他们在衰微的地主及零落的农民身上搜集的生产手段转化为资本；第二，由购买能力较强的农民消费扩大，以创造市场”。若改良一般农民生活，增高一般（这里连工人也包含在内）购买能力，则非资本主义生产力终于不能有高度发展的中国资产阶级所需要与可能（国民党政府丝毫也没有想到怎样

解决土地问题，正因为现在没有这个需要与可能）。此外，这两个阶级之“阶级的经济利益”根本矛盾，还有什么呢？而且，中国的一九二五——七年之革命，无论如何失败，无论如何未曾完成其任务，终不失其历史的意义，因为它确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大转变时期；这一转变时期的特征，便是社会阶级关系之转变，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增加了它的阶级力量之比重；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至少在失去对立地位之过程中，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它为自存计，势不得不努力资本主义化，就是说不得不下全力争取城市工商业的经济势力，做它们各个区域内的统治基础。它们所以现在尚能残存，乃因为资产阶级受了工农革命势力的威吓，不但不愿意消灭封建势力，并且急急向封建势力妥协，来形成以自己为中心为领导的统治者，并且已实现了这样的统治，就是国民党的南京政府。

你们忽视了这些很明显的事实，遂至今还是过分估量封建势力的地位，甚至中央负责同志日前和我辩论关于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比重的问题时，竟说：“此时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配城市。”（又是造谣，中央只是说中国是农业落后国，农业生产还超过城市生产。在发展的方向上，当然是城市支配农村，这里没有争论，但农村总是比较城市落后，绝不能将中国农村看得如上海汉口一样——编者。）象这样不正确的观察，自然会幻想中国尚有这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封建与资本）战争之可能，自然会产生“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这是曲解，中央在反对向导式的唯心的分析的时候，指出每个战争每个政治事变都有他的经济的背景与阶级的意义。参阅中央通告第十五号，三十四号等——编者）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只可说每个战争都有经济的背景，在阶级的社会里，便有阶级的意义（这里所谓阶级的意义，如就阶级内部战争说，是和个人的意义及其他意义相对立，不是和阶级战争之涵义完全相同；因为每个阶级战争，必须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之革命战争），不能说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战争。这是因为未有阶级以前的原始民族，民族已有战争；已有阶级的社会里，各阶级内部也有战争，最显著的例，如日本的西南战争，中国的北洋军阀战争，南北美战争。

如蒋桂战争真是两个对立的根本阶级战争，蒋介石讨发桂系，如果真如你们所说是“为资产阶级本身的发展”，而要“相当的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三十号通告）不得不和你们所谓“更反动的”“尚有强固基础”的封建势力战争；那末，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还未完全丧失其革命性，我们便不应该而且也不能够号召群众起来反对这种战争，因为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这些也都是群众所要的。三十四号中央通告所谓：“同志中有以为‘蒋桂战争是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战争，也就是民主势力反封建势力的战争，并且还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因之这次战争在客观上是有革命的意义’。这是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在策略上可以跑到拥护蒋介石的路线上去”。这些同志对于蒋桂战争性质所下的定义，和中央自己所说的一样，这一个极端右倾的危险观念与策略，正是中央自己错误的分析之必然的结论，如何能够归咎于同志！于是你们又解释道：“阶级战争不一定都是革命的”（许多同志都说中央有这样的解释），（中央只说中国的军阀战争虽然反映着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可是主要的动力是帝国主义，所以没有一点革命或进步的意义。——编者）；如果真是这样，则马克思主义及无产阶级的战略基础，便根本倒

台！“每个战争都是阶级战争”及“阶级战争不一定都是革命的”这两个理论，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加了闻所未闻的修正，显然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四 蒋桂战争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对于他及一切国民党内部战争，究竟取什么态度呢？我以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正在很复杂的流变生长过程中，和欧洲已经能够和平发展而且已有高度发展的资产阶级不同，它们的阶级来源太复杂，又加以帝国主义之操纵，它们内部各派之间，政权及地盘的明争暗斗，以至爆发战争，这是必然的现象，而且是较长期的现象，蒋桂战争，不过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新政权之内部冲突，而和国民党从前对北方封建军阀战争有不同的性质。不但代表复杂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之国民党是如此，即在欧美先进的资产阶级，它们当中，工业资本和农业资本，轻工业和重工业及财政资本之间，虽然很少国内战争，而冲突仍然不断，这一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那一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更有大的冲突。无产阶级对于它们的态度，只是分析出它们之间的冲突，是为了经济上或政治上某种具体问题之利益矛盾而必然不可避免，我们只有利用它们之间每个冲突（不管它是经济的或政治的），来扩大自己的运动，对于他们之间因利益不同而爆发的每个战争（不管它是大规模的或是小的），都只有号召群众起来反对，不但是消极的反对，且须积极的转为阶级战争，此时不需要代他们分别那个是纯资产阶级的，那个是带封建性的；或者那个较进步较左些，那个更反动些，那个还有改良政策的企图或欺骗，那个连这些都没有；因为这决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当面的任务是推翻整个反革命势力之统治，因为我们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立脚点上，对于他们之间已经不能有不同的战略。

对于它们之间采用不同的战略者，例如从前俄国的少数派；少数派总以为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立宪比代表封建势力的沙皇进步些，沙皇更反动些，它们之间的确还有冲突，无产阶级就该和资产阶级联盟扫除更反动更有强固基础的封建势力。多数派坚决的回答说：否。它们对我们已经是整个的了，我们对它们也必须是整个的。“我们正在反对封建，你们不要反对我们！”这是民主立宪党所要的；少数党居然做了它的应声虫，多数派则断然拒绝之。“对桂战争是反封建势力”，这是蒋介石爪牙的宣传，我们共产党中央也这样说，这是何等痛心的事。

五 因为不曾洞察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不曾看出资产阶级各方面的发展对于革命的作用及其危险性，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政纲中，对于富农取了犹豫态度。列宁说：“农民社会之分解，是为资本主义创造国内市场。”“农村资产阶级之形成与发达，以二重方法创造市场。”（“富农中农及农业无产阶级”）富农即农村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在农村发展之初步形式，它对于下层群众的革命，必然和城市资产阶级取一致态度；是因为富裕的农民，蓄有余资的以营利为目的而购入或租入家族需要以上的土地，雇用较多的雇农，生产商品，出卖于市场；或于农业之外兼营商业；或放高利贷以至包耕包佃；他已经走进剥削阶级，和被剥削的下层群众（贫农）站在利益相反的地位。尤其是经过了初步的民主革命之后，进入土地革命的阶段，下层群众起来均分土地，取消高利贷，富农反对革命是不会有丝毫犹豫的。

每个革命斗争都首先要看清那些社会成分必然因革命所给予的利益不同而发生向背；现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贫农（雇农，小佃农与小自耕农）是革命的柱石，中农是中间动摇分子，富农是反革命者，因为它所失于革命的农民的东西比所失于地主的要大得

多。所以若是始终想和富农联盟来反对地主，和始终想和资产阶级联盟来反对帝国主义，是同样的机会主义。

并且中国的农民革命，不是简单的反对封建地主问题，中国的地主阶级中，根本就没有象法国、德国、俄国革命时封建领主那一特权等级。商业资产阶级，不但直接剥削农民，不但有些地主本身就是商业资产阶级，并且许多衰微的地主正因为商业资产阶级及富农的两种榨取，更要加紧剥削农民以自存。在垄断原料方面，城市商业买办阶级，使农民经济陷于极困苦不自由的奴隶地位。富农占有较多的土地剥削雇农，高利贷所剥削的，不用说多数是贫农；包佃者对农民所取租额，当然比较地主所取得还多，他才好于中取利。所以商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及富农和地主阶级同样是农民革命的对象。

六　最令人不解的，你们不但在阶级比重上把封建势力看做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或者更强固些，最后更进一步否认了中国资产阶级之存在。你们从前肯定的说桂系和冯玉祥都不代表资产阶级，随后又说："蒋介石并不等于资产阶级"（三十四号通告及六月二十九日第二十七号红旗）；那末现在中国统治阶级的阶级性及其领导势力是什么呢？国民党政权和他的一般政策之中心意义所表现的是什么呢？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他的政治代表呢？如说有，既非桂系，又非冯蒋，那末究竟是谁呢？如说没有，那末，以前所谓"阶级联盟"，及所谓"资产阶级背叛革命"都成了弥天大谎，岂非滑稽之至！大约是你们看见代表资产阶级的蒋介石并未能排斥帝国主义，并未能改良农民生活，并且它战胜了桂系反而马上取消了已实行的二五减租，你们对他很失望，所以说他不等于资产阶级。你们致河南省委的信上说："假如冯玉祥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势力，必须解放农民等等。"如此说来所谓中国资产阶级之存在，并不是现在实有的这些冒牌的假的资产阶级，只有幻想着在你们头脑中如此这般的资产阶级，才算是中国老牌的真正资产阶级。你们对于中国资产阶级这样的观察，分明不是依照辩证法，在一切现象流变生长过程中，抓住现在实有的资产阶级，而是依照形式逻辑，虚构一个超时间性的一定模型的资产阶级。国际说你们"夸大资产阶级"，正确点说乃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

这样的幻想，决不能够领导群众向当面的资产阶级斗争，而是领导群众去寻找你们心目中的资产阶级。在事实上你们心目中如此这般的资产阶级，带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只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期才会有；现在不但在中国寻找不着，即欧美各国也都已寻找不着了。各国革命史已教训我们；资产阶级一抬头，一看见下层阶级有独立的行动，马上开始反动，毫不犹豫的和封建的旧势力妥协，什么无耻的反革命举动都会做出来；这正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是历史的必然，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是如此，经济文化落后国的中国资产阶级更没有例外。所以我们不能除开现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即是除开冯蒋等派这些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另外幻想会有某一派（如在野的汪精卫，陈公博等）或者是不反动的；我们对于整个的资产阶级及其各派代表不能有丝毫幻想，无形中帮助他们欺骗群众。

七　不错，你们着实做过反对资产阶级的宣传，可是你们说了千遍万遍反对资产阶级的话，都被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打销了。这是因为你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把所要反对之目的物（资产阶级）从地上引到空中去了；你们对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之错误的分析，又把群众政治斗争的视线混乱了。因此，群众会向你们反问：诚然应该反对

资产阶级；但是蒋介石既不等于资产阶级，冯玉祥也不代表资产阶级，桂系，阎锡山，张学良更不用说；那末，我们反对谁呢？我们的阶级斗争，是不是仅仅反对工厂主和公司老板们就算完了事呢？或者说：你们以为资产阶级还要打击封建势力，改良农民生活，排斥帝国主义，是否就是要反对干这事的人呢？更或者说：资产阶级多少还有点这些企图，虽然不彻底，总比封建阶级进步些，是否还要联合它，领导它，为实现这些企图而斗争呢？群众只认识简单明了的事实，对于许多"然而""虽然""可是""但是"玄妙曲折不可捉摸的哲学，不大理会，你将怎样回答他们？党内同志因为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也会复活他们对于资产阶级之幻想与希望，并且觉着更反动的封建阶级尚有这样的强固基础，遂至推论到阶级联盟的老政策，在理论上现时仍有客观的可能性，遂至怀疑工农单独起来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这一政策，失了理论的根据，莫非真是谭平山所谓"超时代的政策"。诸如此类的右倾思想，都会跟着你们的幻想与错误的分析发生出来。

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党外的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国民党（从汪精卫到张学良）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已经是不会排斥帝国主义，不会肃清封建残余，不会解放农民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了，此外并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比国民党各派较革命的资产阶级代表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能够彻底完成这些任务的，只有列宁当年在俄国喊出的"无产阶级及农民的民主革命"。

八　革命高潮过分的估量与宣传，和盲动主义有直接的关系，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第一，所谓革命高潮，乃是群众的革命斗争逐渐发展，汇合达到最高点，而不是陡然可以到来的。第二，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征象，必须是广大群众的（尤其是重要产业工人的）不断的经济斗争，有转向总的政治斗争的趋势，决不能把断断续续的经济斗争，都当做革命高潮的征象；至于因为资本进攻之部分的反抗，正是革命高潮之反面。第三，革命高潮即指群众斗争本身而言，统治阶级之内哄及中间阶级之动摇，只是帮助革命运动易进于高潮，而不是革命高潮之本身。第四，革命势力是高涨或低落，是党决定政策时客观的估量，而不是向群众宣传鼓动的口号，我们固然不能向群众宣传革命低落，也不能向群众宣传什么"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使群众以为在他们自身斗争之外，另外一个什么革命高潮将从天上降下来帮助他们，一切问题都静候他到来解决，因为他就快要到来了。

说革命高潮将永远不会到来，这种取消派的见解，自然是不正确；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也永不能把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消尽现实革命之可能性，即是说解决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从前考茨基拿莫斯科一九〇五年革命，比较巴黎一八四八年革命有四个不同点，决定俄国革命有再起之可能（见列宁"俄国革命与无产阶级的任务"）；多数派也曾指出俄国的一九〇五年和德国的一八四八年不同，而决定了俄国无产阶级的战略，这都非常正确。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宰制之下的中国资产阶级，除了孙中山及其党徒的梦想，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之可能性，不但远不及经过毕士马克时代由上而下大改革的德国，并且还不及斯特黑并时代的俄国。中国的革命高潮，当然有再来之可能，至于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只可说不会快要到来，因为现时群众虽有些斗争，而拿他当做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

现在是一种什么时期呢？我们怎样工作呢？前一个革命高潮已经过去，后一个革命

高潮还未到来，并且还没有到来的征象，现在还是两个高潮间过渡时期，在这过渡时期中，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工作路线，便应该和这个时期相适应，即列宁在一九〇八年所说的："过渡期之特殊任务是准备力量，集中力量。"我们要准备集中力量，首先要铲除盲动主义的精神，低下头来设种种方法接近群众，然后才说的上推动群众向前斗争，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我们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够推动群众，不应该也决不能够站在群众外边，命令群众，我们只有在日常工作的努力，来推动群众的实际斗争；不应该用临时拉夫的办法，来制造群众大斗争的空气，我们的工作，应该切切实实推动群众不断的斗争，在客观上走向革命高潮的路线进行；不应夸大吹牛在主观上假定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路线进行，夸大吹牛，不但要助长同志们的盲动主义，同时也要助长他们轻视日常琐细斗争的心理。一般的合法运动，自然是放弃革命之企图，但在一定条件之下，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必要时，列宁所谓"不带何等血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这个时期，也不应一概排弃，列宁在一九〇八年，为此曾和多数派内排弃一切合法手段的"召还主义者"有过剧烈斗争。

当然，群众的力量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并且群众"自发的"斗争发展到愤激不可遏制的跑到街上示威，这更是走近革命高潮的倾向；但这决不是党以命令强迫少数群众三三五五的在街上出现一下，或者喊几声我们发下的口号可以冒充的，群众上街示威，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每次号召群众示威运动，也都要有严肃的精神与意义，不可常常随便把他们领到街上玩弄；至于根本就还没有群众，也要命令同志充当群众出来做示威运动，以便证明"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之说绝对正确，这种把戏更万分玩不得的。这样的玩弄，这样的把戏，夸大主义者（即盲动主义者）无可如何的这样的最后的手段，决不能增加党的力量，只有削弱党的力量；决不能取得群众，只有丧失群众；决不能促进革命，只有断送革命。

当然，我们领导群众做一切斗争，必须指出总的中国革命前途，方不至使群众感觉着一切斗争，好象是盲行大海中，丝毫也看不见彼岸的远景。并且，中国革命也不是没有很有希望的前途；他就是群众在不断的斗争中积聚下很好的力量，一直到武装暴动的力量，和宰制中国的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剧烈冲突，国内统治阶级内部不断的冲突所加于中国各下层阶级之榨取与痛苦及因此而发生绝大的经济及财政恐慌等事情结合起来，那时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潮必然形成；那时我们的党在群众中如有强固的领导力量，革命必然获得胜利，简单的急性的屡次预约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而事实上屡次没有到来，这种"打吗啡针"的办法，决不能使群众明确的认识革命前途，其结果只有使群众失望，减少了革命情绪。

九　盲动主义在中央政策上依然存在，除国际所指出的事实外，在此次"五卅"运动中，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旧根性，由事前夸大的企图和事后夸大的报告，完全暴露出来了。

不认识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不认识统治者的阶级性之转变，以为现在国内战争的性质和从前是一样，统治阶级将因之崩溃；不认识现在还是革命两个波间过渡期，把群众斗争程度夸大得如何如何的高昂，虽然经过六次大会以后，不便公然说中国革命高潮仍旧是一直高涨，只好说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最近索性更进一步，换一句更确定的话说："革命复兴"；并且以为"各国工人阶级斗争与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尤其是日益激

烈起来”。现在已是“世界革命的激剧”时期（四十号通告）；拿这样错误的政治认识与夸大的估量为前提，以为在这样好的革命环境，自然应该“动”，一点也不“盲”，从前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好夸大的人。永远是盲动主义者，永远自己不承认是盲动主义，永远不认识盲动主义，把它当做真正布尔塞维克主义，把他当做革命的正确路线。

你们在此次“五卅”运动前政治的估计，是统治阶级动摇，然而经过蒋桂及蒋冯冲突后，他动摇了没有？又说是改良派的势力缩小，然而对中东路事件各工会一致发反俄宣言，改良派的势力缩小没有？又说是群众自发的革命斗争之进展；然而为什么你们还要用那断然用不得的办法，派几个同志到老怡和及恒丰纱厂去强自关车呢？你们在此次运动中所取政策，完全是从中央一直到支部一贯的命令主义，“可恨的只是这些自发的革命斗争已经进展的群众，在革命运动现在这样紧张的时期”（江苏省委委员的话），不听命令去革命！从前盲动主义极盛时，有人说：“中央骂省委不革命，省委就去骂区委不革命，区委又去骂支部不革命，支部去骂谁呢？只得骂群众不革命。”这样的怪现象，现在仍旧存留着，省委委员因为工厂罢工办不到，遂逼着下级党部下命令罢工，说：“在原则上必须罢工。”这是什么话?!你们忘记了列宁“罢工与否，要依工人自己的意识和自由意志来决定”的遗教了吗？你们不是根据群众的斗争情绪和意志来决定党的政策，而是拿党的政策来决定群众的情绪与意志。

“五卅”运动应该尽可能的努力去做；所得的成绩无论如何小，都有相当的意义；这都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但根据你们盲动主义的精神，在事前夸大的企图和事后夸大的报告，都给了党内党外群众很坏的影响，以至有了“强迫同志吹牛皮”的谑评。

在客观上看来，即以上海一隅而论，我们若有正确的估量（非夸大的）和切合群众实际需要与可能的政策（非夸大的），群众斗争是能够逐渐开展的，我们和群众的关系也能逐渐恢复的；可是下级党部同志们刻苦工作所得的一点效果，决敌不过中央机关盲动政策之摧毁（例如邮政工会及恒丰老怡和事件），在这种状况之下令同志们如何能够安心努力工作！

十　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落，营私舞弊，粉饰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

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之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德谟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并不是什么“相当缩小”：由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同志们对于政策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的意见一概不许开口，从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都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传达机关”；这样的办法，为了操纵一切使盲动的命令能够顺利的施行，自然觉得很方便，其如毁坏了党的组织与力量何！倘若现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之下，党内德谟克拉西势必缩小到连区委支部都不能行选举制；这根本上连少数人都不能集会，一切工作都无从谈起，党内的基础组织便已经不存在了，还说什么党已有相当的发展，还说什么革命复兴！倘若说他们的观念都不正确，只有中央政策是对的完全对的，他们盲动执行命令好了；那末，中央的政策或工作路线若有小小的

不正确或大大的不正确，则是否需要“自我批评呢”？

列宁说过：“我们的机关报上，并不一般的排斥同志的争论，宁可说，为了说明现存之意见相差深到若何程度，为了争论诸问题的全面讨论，为了讨论诸种见解之代表者等，陷于褊狭性之斗争，在每个社会民主主义者有意识的劳动者面前公然争论，都是必要的，既然有不同的见解，而缺乏公然的争论，把关于真实问题之不同的意见隐秘的搁置起来是现代运动缺陷之一”（火花发刊宣言）。他又说过：“一切团体员，选举代表者，同时独立的各自对团体全部利害的争论题目，都有陈述意见的必要，民主的组织之党也没有例外，征求所有党员的意见，不能视为原则上可以否拒的，至少在最重大的场合，例如罢工，选举，大规模的杯葛（Boycott）特于政治的行动”（“一九〇七年彼得堡之分派”），他又说过：“中央委员会知道党员大众之意识的意见，从而不是盲目的指导大众……”（同上），他又说过：“在我们的报纸上，努力给关于理论问题的论文占了很多的篇幅；并且怂恿同志们对于争点无忌惮的发挥”（“我们的纲领”）。

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辩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经公开的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隐藏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俄国布尔塞维克党的理论，就是长期在这样的争辩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同志政治水平线一般的低，也只有不同意见的相互争辩中增高起来，决不能拿出陈套话什么“程度不够”（又是造谣，中央只说在目前白色恐怖的严重环境中，党的主观上无产阶级基础又薄弱，党的民主化是要相当缩小的。——编者）的理由，以为必须他们的政治水平增高了才好“恩赐”他们发表意见的理由，你们主张：党内民主化是要依着党员政治水平提高而扩大，党员政治水平低便应缩小；这正是因果倒置了。

如果你们老是固执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简单的用“小资产阶级观念”“非无产阶级意识”“观念不正确”如此等类没有内容的抽象名词来排斥他；更或者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阻住了党的进步。

公开的理论争辩尚未被容许开始，你们突然发生“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了，这是因为少数派的阶级联盟政策及经济主义取消主义，一贯的推翻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根本战略，目前在中国党内，如有人以为中国还是封建势力所领导的统治，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仍主张什么“四个阶级联盟”政策，又或者有人以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已消尽了中国革命之可能性，革命决不会再起，党当然要和这班人不顾党内和平的斗争，除此以外，其他或稍左或稍右的错误，我们可以用教育及争辩方法来矫正，用不着小题大做，拿“反对党内和平”这种严重的口号来代替“团结党内争取群众”的口号（有人说这是六次大会喊出来的口号，又有人说是国际代表个人的意见，未知孰是？）至于同志们没有任何错误，只是“和中央意见不同”便是错误，而且是很严重的错误，便要拿

“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来对付他们，这更是天大的笑话，同志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即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见，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谟克拉西所容许的。（只有革命战争紧急时，这种德谟克拉西才应受限制，甚至于一点也不能有；然事后的自我批评仍须是德谟克拉西的。）

我会见过一些曾为党努力工作或现在正为党努力工作的同志，说他们在政治上，在工作方法上，有许多和中央不同的意见，而不敢说出来，我曾很诚恳的指出他们的错误；有意见应该向中央陈述，或在党部开会时提出讨论，不应只在个人间闲谈。他们都很惨痛的回答说：“你的话在原则上是对的，可是在事实上，中央用了警察政策，派出心腹同志侦察一般同志的，差不多各机关都有，只要你一开口便取消了工作或者调到万难工作而且不能存身的生远地方去，甚至教你从党滚出去；我们是不忍心离开工作的，你说怎么办？现在有许多同志，都因为这样情形烦闷着没有出路，而灰心丧气，而取了消极态度，或是严守‘休谈国事’的教训，敷敷衍衍的做着工作再说，而没有一点兴奋精神，或者找个机会给敌人杀了完结，大家也都感觉到这不是好的现象，然而没有办法！”（这些完全是谣言，是独秀阴谋破坏党分裂党之最无耻的煽动同志反中央的话——编者）

听说布哈林曾责备特立说：“你是个政治家，不是小孩子，为什么对于盲动主义有不同的意见而不敢说出来！”列宁常常说过：“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是有政治自觉的”，党教育党员，是要教成有政治自觉的战士，而不是要教成随声附和的奴才，不是要教成看鞭影而行止的牛马，不是要教成纯粹的雇佣劳动。只要不是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者，便不能不承认“活的人究竟和死的人机器不同”，照你们现在的办法，你们褊狭性一致的团体即或造成了，而各个党员都有政治自觉，能够自动的奋斗活泼有生气的党在那里！？

十一　综合上述的说明，可以看出你们有系统的在政治上工作上组织上一贯的错误路线。为改正这些错误之总的路线，我现在提议几个要点：一、在政治上对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性问题，对于革命高潮问题即目前在革命中是什么时期问题，对于富农政策问题，都需要重新有个正确的决定。二、在组织上，尽可能的扩大党内需要的德谟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区委都实行选举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党员对于党的政策有“自我批评”的自由，各级党部开会有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的自由，党员间政治上意见不同的争辩，准其在党报上发表。三、更有一个根本而紧急的问题：六次大会对于党的全般政策并未充分讨论，七次大会又不能即开，应由中央及地方把党的全般政策之各个问题提出于全党党员之前，要求每个党员都充分发表意见，尽可能的在党报上陆续公布，以便形成多数意见之一致，即真正党的一致，以便重新估定党的政策，以便决定党的一切工作之真正的正确路线，必如是才能统一整个党的意志，才能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才能唤起全党党员对于工作自动的努力，对于铁的党纪自觉的服从；必如是才能使党复兴，使革命复兴！

十二　最后我还要告诉你们：因为我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写这封信贡献于你们，希望你们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狭性，平心静气的把我的意见详细审查一

下；并希望把这封信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

此致革命的敬礼！

独　秀

文中几个完全造谣的地方，略加了短注——编者（本文的编者注，是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的《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一书的编者加的注。）

（转自《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

〔附〕陈独秀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中央常委同志们：

读了你们八月四日对于我论中东路问题宣传方法那封信的回答，我感觉得你们对于我的意见根本不曾了解，因为是关系党的宣传策略之重要问题，不得不再向你们剀切的重复说明一下，这是我对于党的责任。

我们要懂得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复杂的错综的全部理论与政策，首先要懂得辩证法的时间与空间之变化性；资产阶级的学者不懂得这个，所以往往拿他们自己的形式逻辑之“不容间位律”来攻击马克思和列宁，说他们是诡辩派；有些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因为不懂得这个，才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了。

七月二十八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并且还不是替党起草关于这一问题的全部宣传大纲，也不是讨论中央对于这一问题的宣传原则，而是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此外你们已有的话，当然不用再重复加上一些赘词了。你们对于我的前信不了解，有许多是由于这一点。

原则是一定不变的，此所以谓之原则；至于策略战略，则因有复杂的时空性之不同，便不能时时事事都必须照着原则机械的死板的应用不能有一点变化性；有时因为在时空性上有需要经过曲线方能达到革命之目的，竟可采用和原则形式不同的策略。我们若不懂得这一点，就会责备列宁布勒斯特和约的政策，是“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问题”，是“因为原则的错误，所以发生策略上的不同”；因为布勒斯特和约这一政策，在形式上显然违背了“不和资本帝国主义妥协”的原则。象这一类的“矛盾”政策，充满了列宁一生革命的全部活动；此所以列宁被称为“政策上的辩证论者”，此所以列宁骂反对布勒斯特和约这一政策的同志：“不如一个鸡尚能跳出人画的白粉圈”。我们若只拿几个原则甚至几个名词，以为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这未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主义看得太浅薄了，我们便不需要精深的研究了。你们的来信把策略和原则混为一谈，这不是偶然的错误，乃是“你们的原则”之错误。你们的原则，是原则和策略不分，以为策略必须是原则的印象，所以在一切宣传上工作上，都只是拿几个原则机械的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而不

知道对于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有时间空间性不同的话的策略运用之必要，这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任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在原则上，"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不仅是无产阶级所必需，而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我不但不反对这一口号的宣传；反之，我却以为我们以前宣传这一口号太不充分。至于在策略上战略上，这一口号应用到夹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争取广大群众计，便要小心，单是这个口号便不够了。并不是说对群众解释因收回中东路而必然发生的危险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之后，而不归结到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拥护苏联，而是说必须对中东路问题本身有了正确的详细的解析，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碎，然后我们的口号才能发生比较大的效力；所以我在前信上说："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析，'只是'拿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则"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这是因为有许多群众还在小资产阶级民族偏见和国民党的欺骗迷惑之下，没有解放出来。

或者你们以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党，不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对于中东路问题，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上向群众宣传，对于其中夹杂的民族问题，不需要我们有什么正确的详细的解释，使群众的观点模糊了；并且你们很肯定的说："实际上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广大群众……都在自己实际斗争的经验中了解了这一事实"。这是你们完全忘记了列宁曾经说过："落后国家的小农经济，族长制度，爱乡的观念，根深蒂固，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即民族自我主义和民族的排外心，必然热烈的存在着。这种偏见，必须先进国之资本主义根绝了，后进国之经济生活的全部基础都根本改变以后，方能消灭；消灭这种偏见，决非短期所能。因此，各国阶级觉悟的共产主义者，对于长期间被压迫的国家与民族里面所存在的民族偏见，应予以特别的戒心和注意"（民族及殖民地问题的提案）这是你们还没有真能深切的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自己阶级以外的群众，最革命的以至比较落后的广大群众之拥护，才能够成功。你们说："不应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这是对的。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要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在我们领导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照你们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战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争取群众，而是脱离群众。一个布尔塞维克，若是脱离了群众，便成为只是口头上纸面上的布尔塞维克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实际是个幻想；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也实际是假面具；用收回中东路的名义而开始帝国主义向苏联进攻的战争，或弄起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以及战争中加于中国民众的灾难，也都是实际可能的前途；怎见得这是"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呢？又怎见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同时也反对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呢？前一个是反革命势力对革命势力的战争，后一个双方都是反革命者牺牲下层群众为上层阶级争权利的战争，我们能不反对那一个？只有反对一切战争(不论是革命或反革命)才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若虑同时反对两种战争，群众对于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一战争，会把苏联和帝国主义的国家当做两个交战团体，平等看待，"双方都要打倒"；则当然应该如你们所说："帝国主义战争是反革命的势力内部战争，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反革命势力进攻革命势力的战争，我们须公开的明白的把这一分别告诉广大群众，然后群众才能知道对付这样两种不同的战争之不同

的策略”；如此，群众还何至误会吗？并且，我还要问：“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这一口号，其涵义是些什么？为什么不说“反对俄日战争”或“反对俄美俄英战争”，而说“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这是否已经明白表示对两方的敌与友的态度？“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和“反对英美战争或日美战争”，已有显然不同的意义；何况还有在这些口号之下不同的详细宣传，何至使群众误会？

单就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向无产阶级的苏联进攻这一点说，不但在本质上，即在字面上，也已很明显的是阶级冲突，这是任何同志都无需解析而能够懂得的；并且不需要把中央已在通告上解析的话再向中央解析一遍。所以我前信上的说话，目的是在说明由中东路问题将引起各种可能的纠纷之总的前途，而不是说明其性质。我所以要说明各种可能的纠纷之总的前途，是因为我对于中东路问题的发生原因及发展前途之客观的观察，都不象你们主观上的那样简单。美国对于北满的野心，有他的经济基础和长远的历史，近来正在企图以共管的名义攫取中东路；日本一刻也不忘中东路，自然感觉着中东路落到美国手里比暂时留在苏联手里对于他更是不利；所以除了把中东路仍旧回复中俄共管的原状，这两个帝国主义对于此路的竞争，必日益加剧，虽然他们对付苏联之目标是一致的。并且在总的国际局势上，帝国主义间尤其是英美两国领袖的帝国主义之间，由于他们经济上之生死存亡而难以久延的战争，和他们向苏联进攻的战争，是同样的严重；这两种战争那一种先行实现，谁也不能机械的肯定象你们肯定蒋桂战争不会即来那样，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这两种战争发展的前途，都同样有深切的注意之必要。

即以中东路问题的时空性而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固然应该告诉群众，同时帝国主义之间因互夺中东路而战争的危险，也不能不告诉群众；这是因为：第一，若是我们隐瞒了这一可能的事实，一旦局势转变，群众所眼见的战争，不是向苏联进攻而是帝国主义互斗，他们不是感觉到我们的指导不正确或欺骗了他们，便是以为帝国主义的互斗于中国人没有什么危险；第二，指出帝国主义会因互夺中东路而战争的危险，不但没有迷乱群众对于进攻苏联危险的认识，而这样正是暴露了帝国主义所以要进攻苏联之秘密（当然，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还不在此，这里可不必说），也正是暴露了国民党仰承帝国主义意旨收回中东路进攻苏联之真实的卖国罪证。

你们以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误国政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那么，七月十二日党的宣言，也攻击国民党“卖国外交”以“卖国勾当”，难道这也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口号吗？绝对不是的；因为我们总的政策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决不能单拿这一方面的话来指摘党离开了阶级的观点。所谓资产阶级的左派如汪精卫等，也会拿这样的话攻击南京政府；可是我们要问：他们总的政策是些什么？他们用这样的话是否为了要打碎他们的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之假面具，而达到动员群众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之目的？如有这样的目的，他们已经离开了资产阶级的立场，而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了，因为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左的资产阶级。我们不能赞成无政府主义的意见，以为现在的无产阶级字典上已经不应有“国际”“国家”这类的字，有用这类字的人，“就是离开了阶级的观点”，“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点”。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大声攻击沙皇及克伦斯基政府因战争“把国家及资本主义弄到未曾有的荒废”。如果我们不懂得列宁这句话有战略上复杂的时空性（即是除了深入阶级利益的口号外，还需要这类广泛的宣传，才能动员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来拥护无产阶级革命。），也会曲解诬蔑他是降低口

号，是国家主义观点，并且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或者你们以为这种资产阶级的口号，在国民党政府参加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时，无产阶级也可以用；在国民党政府参加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时，我们便只能用拥护苏联的口号。其实如果我们认定某一口号应该是资产阶级专有的，完全是为他们阶级的利益的，即在帝国主义战争中我们也不能用；至于在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中，也不能说“只能”用拥护苏联的口号。这一口号，不是在原则上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在策略上够不够的问题。“只是”这一口号，实际应用起来到底够不够，最近几次我们号召的示威运动已经明白的回答了我们，不能再用夸大的言词欺骗同志，你们如果仍不觉悟，老是拿夸大的言词欺骗同志，同志们不接受欺骗发生反感，则大失中央的威信；同志们接受了欺骗，以为我们已经有如何的力量，则去刻苦工作争取群众的精神日远，这也不是个小小的问题，至于你们把群众没有在你们提出的口号之下起来的原因，归到白色恐怖，这乃是机会主义者把自己主观上错误的责任推到客观原因的老法子。

只是因为这一战争有害于无产阶级的苏联而反对，同时不提及这一战争也如何加害于中国人民，不能使一般群众都真实感觉到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的联系，只是为无产阶级而拥护无产阶级，为苏联而拥护苏联，则“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只能动员苏联及各国（中国也在内）的无产阶级，而不能动员中国的广大群众。“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也只能动员中国没有小资产阶级偏见的革命分子，而不能动员多数比较意识落后的革命群众。你们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方法之缺点正在此，我前信主要的意思亦正在此。你们所提出的口号，在原则上自然不错；可是在策略上即宣传方法上，便大大的成问题。问题就是“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则能动员无产阶级的最觉悟分子；同时对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又未曾有正确的详细的解析，使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尤其是比较落后的群众，明白自己的幻想与国民党卖国误国的罪恶，而接受我们的动员口号。你们这样大成问题的战略，乃是建设在“广大群众都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这一前提上面；这正是你们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

帝国主义战争会引起革命，这是对革命发展前途的估量；正在号召群众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同时“告诉群众”：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中国革命有利的条件”终非时空性所许。

前言所谓“因我的发言引起大的误会与揣测”，乃是恐怕增加党的纠纷，并不是由个人出发而隐藏自己的意见。

以上的说话，似乎稍复杂了，为使同志明了我主要的意思起见，再简单的重说几句，做一个总结。我这封信和前一封信，都不是陈述关于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之全部内容，也不是讨论此次宣传的原则问题，而是觉得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

（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碎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至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

（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最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我为什么要提出这两点，因为我们的党应该是实际斗争的党，不能忽视下列的各实际问题：

一、每个原则是否都可以机械的应用，不许有策略上的变化？

二、中国此时是否有许多群众还在小资产阶级的民族偏见和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之下，没有解放出来？

三、在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上（关于中东路问题的），除了它勾结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外，是否还要说到它这样反革命的政策，对于中国有怎样的结果？

四、中国的广大群众是否都已认识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

五、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是否需要正确的详细的非我们主观的而是群众所能亲切了解的解析？

六、无产阶级以外的广大群众，是否都能够无条件的接受我们阶级的口号？

七、对于比较意识落后的群众，我们是否应一概不要？

八、除阶级的口号外，是否还应该用其他广泛的最利害切身的口号，能够唤起广大群众，参加反对进攻苏联的斗争？

我希望这封信和前几天论党内各种问题的那封长信，都能早日在“红旗”上登出。

此致

革命敬礼

独　秀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一日

（转自《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会议通过）

中共党的六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之下，综合全党同志的意见，依据历年来斗争的教训与国际革命运动的经验，决定了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一年来国内政治与国际形势的变迁，群众革命斗争的开展，以及中央根据此路线而执行的一切工作，都在实际上证明了六次大会路线之正确，并得到全党同志的拥护。陈独秀彭述之等在中央回国之初，即表现对六次大会决议的怀疑，对大会结果的不满。中央当时曾对陈独秀有过详细的解释与批评。

不仅在六次大会之后，更远在“八七”会议时，当时的中央曾根据国际的决定，屡次要陈独秀前往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独秀当时不仅不服从国际决定，且于同志间谈话，表露其不满意共产国际的意见。彭述之彼时在顺直省委工作，亦曾有不满意“八七”会议的宣传。嗣六次大会召集，国际及中央要独秀前往参加，且曾几次催促，但都遭拒绝。六次大会中及大会后，国际又曾数电促独秀赴莫。新中央继续向独秀解释他赴莫之必要，但他初则应允，继则取消，终则推延到明年开春。其实这都是他表面上的应付，他中心意见在他最后致中央的两封信中，已完全表示他反国际反党反中央的一贯路线出来了；他根本便不愿赴莫去接受国际的训练，他根本便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地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而堕入到更深的机会主义。

这次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联合进攻苏联，中央在此紧迫时期依据国际与中国党的六次大会决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与“拥护苏联”的口号。动员全党同志，号召全国无产阶级，农民与广大劳苦群众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军阀。陈独秀等不特不在中央的决定之下一致工作，并且离开中央的路线，提议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他在分析中东路问题之前途中，更认定“一是帝国主义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一是苏联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必然互相争夺中东路而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见解的结论，除掉落后的群众会主张苏联退让外，便只会得出如独秀致中央信中所说“无论那一种战争，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于是我们只要反对战争的祸害好了，不必去问战争的内容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在进攻苏联，还是帝国主义自己互打，所以“误国政策”的根本观点，即是产生于此。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精神，与无产阶级的民族革命

的观点和阶级观点绝对不相容的，必然要在群众中间散布起小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幻想，必然要落入资产阶级左派的泥坑。他这种见解，完全表现他仍然固执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路线，一点也没有接受六次大会的决议与精神。中央对于他的两次来信，曾在理论与实际的各方面，指出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之危险，并告诉他在这样革命斗争紧张的时期，必须放弃这种错误思想，回到党的路线之下来一致行动。

陈独秀对于中央这样的指示，完全拒绝，且更进一步提出与国际及中国党的六次大会根本不同的路线，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他认为过去大革命时代的机会主义错误，乃是"对于国民党的阶级性的错误的观察和加入国民党"，乃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而不是当时他所领导的机会主义中央不执行国际正确策略的错误。他认为现在中国革命失败了，"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封建残余……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地位，……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没有了"；由此便得出"现在统治阶级不是走向崩溃，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之取消主义的结论。于是他完全站在反对六次大会的观点上，认定"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的中国党第六次大会，不仅对于将来的革命性质仍旧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也估量不正确"，因之他同彭述之便认定"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而没有实际意义，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的"总的政治口号"，来代替"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在策略上更攻击中央所领导的五卅与八一在上海的示威是玩弄，是盲动，而主张应采用"合法的方式"。这表示他已经从机会主义深入到取消主义，已经离开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堕落到资产阶级左派的立场去歌颂豪绅买办资产阶级之"稳定"（？）的统治。这与脱洛斯基反对派对中国革命问题的取消思想，完全是一致的。这样极端右倾的思想，这样反国际反党的路线，如果在党内存在，毫无疑问地是破坏党，破坏革命，以至背叛阶级帮助敌人。

并且他在行动上，更于中央未决定与答复以前，便将他写给中央的信，作公开宣传，经过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等极力煽动同志起来反党，并破坏支部与党宣告脱离。这很显然是反党的小组织行动，并且是第二党的萌芽！中央在开始，是坚决地与他作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并于十月五日通过了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脱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可是陈独秀完全不接受中央的警告，并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地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脱洛斯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布尔塞维克党决不能容留这样永不真实地承认自己错误与接受国际和中央决议，公开的与国际开除的反对派一致的分子在党内，决不能容留他们在党内散布叛变无产阶级，叛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尤其不能容许有这样反国际反党的小组织在党内存在，因此中央特决议：

一、开除陈独秀党籍。

二、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固执与陈独秀一样的错误意见，经过支部区委省委与之作详细的讨论和批评后，一点也不改变他们的错误思想，并且积极作小组织的活动，煽动同志反党，破坏支部开会。因此，中央批准江苏省委关于开除他们四人的

决议。

三、各级党部须严重注意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如果发现了这样小组织的存在，须根据党的最高原则，立即予以解散。对于这种小组织的领袖分子须坚决地开除出党。参加活动或接受这样错误思想的同志，须有详细的解释和批评，来纠正他们的错误。如果经过多次教育以后还固执他的错误思想与行动，便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去。

布尔塞维克党能够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完成历史的使命，就是因为有他的宝贵武器——一致的精神与铁的纪律。服从大会决议，服从指导机关的指导是布尔塞维克党之民主集中制的最高原则。如果破坏这样的原则，如果个人或少数人不同意大会的决议，不同意国际和中央的指导，便可以自由宣传，自由行动，这便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行为，这便是破坏党，破坏无产阶级的利益，必须对这样的行为予以坚决的制裁，才能巩固党的组织，发展党的斗争的力量。

“谁愿意稍稍削弱无产阶级党的纪律，谁就是事实上帮助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列宁——左派幼稚病）。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拥护党的铁的纪律来巩固无产阶级的阵线。现在党内各种各色的调和派的思想，实际上就是阻碍党对于取消主义的斗争，帮助机会主义——反对派在党内发展，松懈党内铁的纪律。且这种调和倾向，根本便伏有右倾成分，如不彻底肃清，则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要与机会主义走同一的道路。因此，中央号召全党同志在肃清党内取消主义的斗争中，同时要坚决反对各种各色的调和派的倾向。

党的巩固是建筑在党的统一的意志的基础上，“肃清党内机会主义的分子，不只是不会削弱了党，而且是加强了党，加强了工人运动与革命。”（列宁——虚伪的自由论）尤其在现在革命斗争紧张的时期，党的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捣乱、毫无疑问的是帮助了敌人，如果不肃清这样取消主义的思想，不开除这些机会主义——反对派的领袖分子，决不能坚强党领导革命斗争的任务。中央号召全党同志起来为党的统一的意志而奋斗，为共产国际与六次大会的路线而奋斗，肃清一切反列宁主义的机会主义与脱洛斯基主义的取消派的思想与小组织，肃清一切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肃清一切调和派的倾向，拥护中央的决议，拥护党的铁的纪律！

中　　央

〔附〕告全党同志书

亲爱的同志们：

我自从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

夙夜劳动而功不抵过。我固然不应该效“万方有罪在予一人”可笑的自夸口吻，把过去失败的错误而将自己除外。任何时任何同志指摘我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我都诚恳的接受。我绝对不愿为要拥护我个人的错误（自从八七会议到现在，我不但对于正当的批评不加掩护，即对于一些超过事实的指摘，也以为是个人的细故，默不答辩），而使过去无产阶级付了重价的苦经验埋殁下去，得不到一点教训。我不但不愿掩护我过去的错误，即现在或将来，如果我在思想上在行动上有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同样不愿掩护，同样希望同志们在理论上在事实上加以无情的批评，只要不是附会造谣，我都虚心接受。我不能有瞿秋白李立三那样的自信力，我深切的认识，任何个人任何党派，想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深邃的马克思主义者如考茨基与普列哈诺夫，晚年尚犯了不可恕的机会主义；长期追随列宁学习的如斯大林与布哈林，现在也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象我辈这样浅薄的马克思主义者，更何可自满，一旦自满，便是自己阻住自己的进步。就是反对派的旗帜，也决不是张天师的灵符，小资产阶级意识没有根本去掉，对过去机会主义的系统没有深刻了解并坚决参加斗争的分子，若仅仅站在这一旗帜之下骂几声斯大林李立三的机会主义，便以为机会主义的魔鬼永远不会近身，这便是妄想。我们要真能免除机会主义的错误，只有在马克思列宁的遗教中，在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中，在同志相互批评中，不断的虚心学习，才庶几可望。

我坚决的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原因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策之错误。[①] 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该公开的勇敢的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义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了；但只是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必须忠实的彻底的认识过去的错误即机会主义的政策之内容及其原因结果是些什么，并且毫无顾忌的暴露出来，然后才可望不至继续过去的错误，方可望不至使下次革命又陷于以前机会主义的复辙。

本党创立之初虽然幼稚，然在列宁主义的国际指导之下，尚未曾做出很大的错误，如坚决的领导工人斗争和对于国民党阶级性之认识。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由国际召集的远东劳动人民大会，中国方面是由本党领导国民党及其他各社团的代表进行的，大会的决议，在东方殖民地国家应进行民主革命的斗争和在革命中进行农民苏维埃的组织。于是中国党的第二次大会（一九二二年）遂决议了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政策。并根据此议决发表时局主张，同时青年团国际代表达林来中国，向国民党提出民主革命派联合战线政策。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大会散会不久，共产国际即派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从此国际代表（及中共代表）进行国民党改组运动。差不多有一年，国民党始终怠工或拒绝，孙中山屡次向国际代表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的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国际代表马林因此垂头伤气而回莫斯科，继他而来的鲍罗庭，他

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

在此时期前后，中共所染机会主义还不很深，所以还能够领导二七铁路大罢工（一九二三年）和"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都未受国民党政策的牵制，并且还严厉的批评国民党的妥协政策。"五卅"运动中，无产阶级一抬头，便惊醒了资产阶级，戴季陶的反共小册子便应运而出了。是年十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势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次年（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的三月二十日政变，正是执行了戴季陶的主张，在大捕共产党，围缴省港罢工委员会，苏俄视察团（内多联共中央委员）及苏俄顾问的卫队枪械后，国民党中央决议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分子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员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我们都一一接受了；同时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来巩固广州国民政府和进行北伐。我们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武装农民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这一时期是最严重的时期，具体的说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的时期，是无产阶级自己正式宣告投降资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甘心作它的附属品之时期（国际代表公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党到了这一时期，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党，完全成了资产阶级的极左派，而开始堕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了。我在三月二十日事变后对国际报告中，陈述我个人的意见，主张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否则其势必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获得群众的信任。国际见了我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上发表布哈林的论文，严厉的批评中共有退出国民党的意见，说："主张退出黄色工会与退出英俄职工委员会，已经是两个错误，现在又发生第三个错误，中共主张退出国民党"。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矫正中共退出国民党之倾向；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

其后，北伐军出发了，因为我们在机关报《响导》上批评因北伐而抑制后方的工人运动和向农民勒派军费大受国民党的压迫，同时上海工人将近要起来暴动驱逐直鲁军，暴动如成功，必然发生政权问题。此时我在中央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起草中提议：中国革命有两条道路，一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始能贯彻目的；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此时虽然可以与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要夺取领导权。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说这样的意见会影响同志们过早的反对资产阶级，并且肯定的说上海暴动如果成功，政权应属于资产阶级，工人不必有代表参加。那时我又因他们的批评，而未能坚持我的意见。

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后，秋白所重视的是上海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

级（中小商人）反对大资产阶级；彭述之、罗亦农和我的意见以为：当时市政府选举及就职，并不是中心问题，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小资产阶级不会倾向我们，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屠杀群众，那时不但市政府是一句空话，势必引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失败。因为蒋介石如果公开的背叛革命，决不是简单的他个人行动，乃是全中国资产阶级走到反动营垒的信号。当时由述之亲到汉口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介石的计划。那时他们对上海事变都不甚措意，连电催我到武汉，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国家大事都该集中力量在武汉谋解决。同时，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等，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下，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命令，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而且根据国际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汪精卫联名发表那样可耻的宣言。

我于四月初到汉口，第一次会见汪精卫，即听到他一些有反动倾向的言论，和上海谈话时大两样。我告之鲍罗廷，他也说是如此，并说汪精卫一到武汉，即受了徐谦、顾孟余、陈公博、谭延闿等的包围，渐渐和他疏远了。蒋介石李济深相继屠杀工农后，国民党日益看轻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汪精卫及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的反动态度与政策日益发展；我在本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象是这样或那样的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乃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我始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了，才消极的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国际始终承认国民党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主体，“国民党的领导”这句话，在斯大林口中叫得异常响亮（见中国革命问题中反对派的错误）所以始终要我们屈服在国民党组织之内，用国民党的名义，国民党的旗帜领导群众，一直到冯玉祥、汪精卫、唐生智、何健等全部国民党公开反动，公开的取消了联俄容共（他们老早就说：“只承认容共不承认联共”）及帮助工农运动等所谓三大政策。国际还电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所以“八七”会议以后，自从南昌暴动一直到占领汕头，共产党仍旧是隐藏在左派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在群众中只看做是国民党的内阁，并没别的什么，中国幼稚的无产阶级所产生幼稚之共产党，本来就没有相当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一开始就遇着大革命的斗争，只有在国际正确的无产阶级政策指导之下，才可望不至发生很大的根本错误，不幸在以上这样始终一贯的机会主义政策指导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怎么会看清自己的前途，怎么会有自己的独立政策，只有

步步投降于资产阶级，附属于资产阶级，以至一旦资产阶级的大屠杀到来而我们没有一点办法。长沙马日事变后，国际训令我们的办法是：

（一）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不用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然而不要侵犯军官的土地。（两湖的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当时的两湖军官的本家亲戚故旧，而或明或暗，受他们的包庇之。没收土地若以不侵犯军官为条件，便是一句废话。）

（二）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过去就实行了制止农民的“过火”行动这一可耻的政策，然而事后国际却批评中国党“常常成了群众的阻碍物”，指为中国党三个最大的机会主义的错误之一。）

（三）消灭现在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加上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分子组织新军队。（如果能得到这许多军器，为什么不直接武装工农而还要扩张国民党的新军队？又为什么不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既没有工农兵苏维埃，又没有武装工农，试问有什么人，用什么方法消灭那些不可靠的将领？想必仍旧是哀求国民党中央撤换他们，国际代表鲁易把国际训令送给汪精卫看，自然是这个用意。）

（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以新的工农分子代替老委员。（我们既然能够这样自由处分老委员，重新改组国民党，为什么不能自己组织苏维埃，而必须把工农领袖送到已经屠杀工农的资产阶级国民党里去，替他们装璜呢？）

（五）以知名的国民党员做领袖（不是共产党员）。组织革命法庭裁判反动的军官。（已经反动的国民党领袖所组织的革命法庭，事实上将是谁裁判谁呢？）

企图在国民党内执行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头上左倾机会主义的，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改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当时要执行左倾的革命政策，根本政策必须转变，即是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真正独立起来，尽可能的武装工农，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推倒国民党的领导。否则任何较左的政策，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时中央政治局回答国际的电报说接受国际的训令，并且依照训令方针进行，惟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列席中央会议的樊克（听说他是斯大林的特别使者），也以为没有即时执行的可能，他同意中央致国际的电报说：“只好这样回答”。“八七”会议后，中央极力宣传，说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机会主义者不接受国际训令（当然即指上述这些训令，此外别无什么训令）即时转变：不知他们以为在国民党圈内能够如何转变，所谓机会主义者是指谁？

党犯了以上这样一贯的根本错误，别的大大小小不可胜述的枝叶错误，自然要跟着不断的发生出来。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现在的中央说我们企图把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国际好躲避自己的责任，这简直是笑话。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犯过机会主义而永远取消他批评上级机会主义及他自己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权利，同时任何人也不能因为机会主义政策之来源出于上级机关而有躲避自己执行机会主义政策的责任之自由，机会主义政策固然来源于国际，然而中国党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向国际抗议而忠实地执行，这个责任又推到谁呢？我们应该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幼稚的中国党领导机关应该负责任的。若是互相推诿，大家都各自以为没有什么错误，难道是群众的错误

吗？这不是太滑稽，简直对革命不负责任，我坚决的相信，我或别的负责同志，如果当时能够象托洛斯基同志对于国际机会主义政策之错误有那样深刻的认识，有那样坚决的争辩，不但自己争辩，并发起全党党员群众的热烈讨论争辩，其结果即或走到被国际开除和党的分裂，也于党于革命都大有补救，也不致使革命这样可耻的失败，使党这样政治破产。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竟没有这样做，党若根据我过去这样的错误，更或者因为我坚持过去的错误路线，对于我有任何严厉的处罚，我都诚恳的接受，而没有半句话可说。然而现在中央开除我的党籍之理由是：

（一）说我“根本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的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其实我正因为根本的诚意的认识过去机会主义领导的真正错误所在，和决心反对现在及将来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而被开除了。

（二）说我“不满意共产国际的意见”“根本便不愿赴莫去接受国际的训练。”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够受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现在因为不满意国际意见而被开除了。

（三）我在八月五日致中央信中有下列诸语句：“此外，这两个阶级之‘阶级的经济利益’根本矛盾，还有什么呢？”“当广州暴动前后，……我曾写了几封信给中央，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象你们所估计那样的崩溃，”“现时，群众虽有些斗争，而拿它当作革命高潮到来的象征还太不够。”“一般的合法运动，自然是放弃革命之企图，但在一定条件下，为发展我们的力量，有必要时，列宁所谓：‘不带何等白热性的一切合法的可能手段，在这个时期（即过渡时期），也不应一概排弃。’中央把这些语句似是而非的改为‘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没有了’。‘现在统治阶级不是走向崩溃’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主张应采用合法的方式”，并且每个语句都加上引号，好象是引用我的信的原文。这也算是开除我的理由。

（四）我在十月十日致中央信中说：“在目前没有革命高潮的时期，即反革命的时期，应该提出总的民主主义的口号，如在‘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之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国民党军事专政’‘召集国民会议’等……必须使广大民众在这些民主的口号之下活动起来，才能动摇反革命的政权，才能走向革命高潮，才能使我们的‘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根本口号，根本成为民众运动中的行动口号。”我和彭述之同志在十月二十六日致中央信中说：“目前即非直接革命的过渡时期，便须有适合过渡时期的总的政治口号，方能争取群众；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目前若提出‘为组织苏维埃而斗争’作行动口号，当然得不到无产阶级群众的回声”。中央说我们是“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的‘总的政治口号’来代替‘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这也是开除我的党籍的理由之一。

（五）我说要指出“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还有民族偏见时，广大民众能够同情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借口中东路问题而向苏联进攻的阴谋”。这正为帮助拥护苏联的口号能够深入群众。中央说我是“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这也是开除我的理由之一。

（六）我写给中央几封信乃是党中严重的政治问题，中央延搁起来久不发表，而且国际代表及中央向我明白宣告以不能公布党内不同的政治意见为原则。由党员群众合法

讨论以纠正中央错误这一方法，既已绝望，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这也是开除我的理由之一。

（七）“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不许我参加任何会议，未曾派我任何工作，直到本年十月六日（距开除我的党籍只四十天），因为我几次发表批评中央继续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他们为准备开除我的手续，才忽然来信说：“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你一周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假话？

（八）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坚决反对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我们不能听斯大林派的造谣，便相信和列宁携着手创造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真有反革命的事实（只拿中国的斯大林派李立三等对于我们的造谣，便可证明）。称托洛茨基为同志，中央便说我们“已经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走向反革命”而将我们开除了。

同志们，中央现在竟勉强制造以上这些无理的理由，将我们党籍开除了，并且凭空加我以反革命的罪名；我相信同志们对于这件事多半还莫名其妙，就是中央他们自己也说：“有些人或者有些莫名其妙！”可是他们竟公然在有些同志还在莫名其妙的状态中将我开除了，说我反革命了，他们为什么要诬蔑我为反革命呢？我真正为他们的巧妙手段哑口无言。这正是现代中国人为攻击敌人而发明的武器。例如国民党漫骂我们共产党是反革命来掩饰自己的罪恶，蒋介石挂着革命的假招牌骗民众，把自己捧为革命的化身，并把反对他的一切人们当作反革命和反动分子等，也是属于这一类的。

许多同志知道，中央以这些无理由的理由，剥夺我的党籍，这一切都是表面的官样文章。其真正的原因是在于我在党内发表各种意见，批评他们继续执行盲动主义和破产政策，成为他们眼中钉之敌。

世界上任何资产阶级国家，都存在着封建残余，并实行剥削的方法（黑奴和南洋群岛的“猪仔”，事实上就是封建奴隶制度）有些国家甚至还存在封建势力，中国就是其中一例。我们在革命途径上固然不能忽视它，但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却一致认为：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封建残余仍然占优势，并保持统治地位。因此，他们竟把封建残余当作革命的目标，并认为是压迫革命的当前仇敌，即轻视了资产阶级势力，把资产阶级的一切反动行为归之于封建残余。他们好象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正在求革命，他们是永远不反动的，一反动就不能称为资产阶级。因为这样，他们不承认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不承认国民政府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从而下结论：中国在将来或目前，在国民党之外，或南京的国民党之外，必然存在一个不反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在当前策略上，以及在实际行动上，走上改组派的反蒋军事投机的尾巴；在政纲上，则主张将来的第三次革命。至于其革命的性质②又限于资产阶级及民主革命的阶段，并在将来的革命途径上反对侵犯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反对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如此始终一贯的对资产阶级的留恋和对资产阶级的幻想，显然是过去机会主义的继续，而且比它更加深入，从而必然造成将来革命的更可耻的，更悲惨的失败。

如果要把“建立苏维埃政权”当作行动口号，起码要在革命高潮和客观条件完全成熟的时期，而并不是在任何时期都可以随便提出的③。过去当革命高潮之际，没有提出“组织苏维埃”和“建立苏维埃”等口号，是主要的错误，将来革命一旦起来，必须立刻组织工农兵苏维埃，发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而斗争。当然，它必须是无产阶级专政

的苏维埃，而决不应该是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在当前反革命势力全盛的时代，大众的革命运动没有高潮的时代，不管任何角度来看，“武装暴动”和“建设苏维埃”的客观条件是没有成熟的。在目前，把“建设苏维埃”仅仅当作宣传教育口号，还说得过去，但是如果把它当作行动口号，将来要纠合工农运动煽起实际行动，为“建设苏维埃”而奋斗之时，势必无法争取群众的响应。因此在目前行动上，应该采用最民主主义的口号，如“为召集国民会议奋斗”。这一运动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目前，可以仅仅用这一口号推动广大群众，从政治暴露斗争走向革命高潮，进而发展为“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可是，继续执行盲动主义的中央派却完全与之相反，他们认为革命复兴的气运已经成熟；④ 并指责我们认为工农苏维埃在目前只是宣传口号，自然他们认定目前已经是行动口号了。所以，不断地以命令强迫党员代替群众上街示威，以命令强迫罢工，每个小的日常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政治斗争，以至工人群众甚至党员同志更加和党脱离了。并且最近在江苏代表大会上，竟至议决了“组织大的罢工运动”和“地方暴动”。自从去年夏天到现在，上海工人起来一些小小斗争的萌芽，一露头即被党的盲动政策铲除了，今后自然还要继续铲除，江苏省代表大会的议决案，如果真去执行，更要大大的铲除。现在我们的党已经不是助长工人革命斗争高潮的领导者，而成了铲除工人斗争萌芽的刽子手！

现在的中央，忠实地依据在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第六次大会的破产政策路线⑤ 执行上述的破产政策，把过去的机会主义和过去的盲动主义结合起来，以断送革命。无论是国际或中央过去不自觉地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致革命失败，已经是罪恶了；现在既经反对派的同志很明白的指摘出来，还是悍然不承认过去的错误，而且自觉地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还要为了掩护少数人自己的错误，不惜自觉的抛弃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滥用上级机关威权，箝制党的自我批评，并且对于发表政治意见的同志大批的开除党籍；有意造成党的分崩离析，这更是罪恶以上的罪恶，更是顽钝无耻。每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都不应该害怕在群众面前公开的自我批评，党只有勇敢的实行自我批评，方能够获得群众，决不会因此失掉群众。反之，象现在的中央这种掩护自己的错误，则真要失掉群众。全党大多数同志，对于党这样的错误与危机，没有不或多或少感觉到的。我们只要不是简单地为生活费混饭吃，只要自己有一点觉得对党对革命不肯放弃责任，任何同志都应该站起来严厉的实行对党自我批评，以拯救党的危机；倘眼看着党日就危亡，而袖手旁观，默无一言，这也是一种罪恶。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我们都知道，谁一开口实行自我批评，党的错误还未纠正，谁就自己先失掉了党籍。但是我们要权衡一下，自己个人一时失掉党籍和拯救整个党的危机，孰轻孰重？

自从“八七”会议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各处实行暴动，我曾写过好几封信给当时的中央，指出当时群众的革命情绪并不是高涨，国民党政权也不会很快的崩溃，没有客观条件的随便暴动，只有更加削弱党的力量，更加使党离开群众。应该改变政策，在日常斗争中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当时的党中央以为普遍的武装暴动是纠正机会主义之绝对正确的新的路线，主张要估量暴动的条件和计较成败，便是机会主义。当然对我的意见，不但丝毫不加考虑，而且当做笑话到处宣传，说这是我仍旧没有改正机会主义的错误之证据。我当时为党的组织纪律的拘囚，不得已取了消极态度，而未能积极的超越

组织对中央的毁党政策作坚决的斗争，致党走上了崩溃的道路，这也是我应负责任的。其后经过第六次大会，我还是怀着错误的见解，还是幻想新的中央受到许多事实的教训，将能够自己醒悟过来，未必盲从国际的错误路线到底。我自己仍是继续消极态度，不欲独持异议，致引起党内纠纷，虽然我对于六次大会的根本路线十分不满，直到经过蒋桂战争及五卅纪念运动，我深深的感到中央牢不可破的继续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明明是不会自己改变的了，非有自下而上党员群众合法的公开的讨论和自我批评，是不能纠正领导机关严重的错误路线了。然而党员群众都在组织纪律的拘囚与箝制之下，一时陷于"敢怒而不可言"的状况。此时我实在不忍眼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严重错误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挺身出来，自从八月初起开始向党发表意见，以尽我的责任。此时有些同志还劝阻我说："中央的人们把他们少数领袖的利益，看得比党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更重要，他们坚决的企图掩护自己的错误到底，决不能接受同志的批评。象你这样不避忌讳的批评他们，他们将来会借故开除你的党籍"。我知道这个，然而我爱党的心逼迫着我一定要走向不顾计到我个人利益的道路。

国际及中央一向是反对算旧账的，一直到现在看见我批评了他们的错误，他们才忽然想起来说我："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免的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这几句话正是他们自己的真实写照。其实，我若是能够昧起良心来不顾阶级利益和他们肮脏一气。没有决心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并附和他们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他们必然还要借重我老机会主义的笔和口，来攻击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以希图大家心心相印的掩护自己的错误，更何至于开除我的党籍。和社会恶势力奋斗了大半生的我，怎肯做这样颠倒是非黑白的下流事。李立三说："中国的机会主义者，⑥不愿意正确的去认识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而想躲藏到托洛茨基主义旗帜之下，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其实，在托洛茨基同志所发表的文件中，他所指责我个人的话，比斯大林、布哈林更严厉；然而我不能因为他指责了我个人，便不肯承认他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我宁愿受任何同志任何严重的批评，而不愿使过去革命的经验与教训埋没下去；我宁愿今天被李立三等少数人开除我的党籍，而不愿眼见党的危机而不力图拯救，将来要受党员群众的责备。我宁愿心安理得的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受恶势力几重压迫，不愿和一切腐化而又横暴的官僚分子同流合污！

同志们，我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完全是他们少数人为掩护他们自己错误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不但免得我在党内发表意见和主张公开的讨论政治问题，并且拿开除我向党员群众示威，叫大家都免开尊口；我知道决不是党员群众有开除我的意思。我虽然被党的上层少数领袖开除了，我和党的下层群众丝毫没有什么隔阂与芥蒂。所有党中的同志，只要不是始终坚决的跟着斯大林派（国际的和中国的）机会主义政策走，我仍旧要和你们携着手为无产阶级服务。

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现在党的错误，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仍旧和过去一样，是斯大林所领导的国际整个的机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之表演。甘心做斯大林留声机器的中共中央负责的人们，自今还没有一点政治自觉，而且日益倒行逆施，无可救药了。列宁在联共第十次大会上曾经说过："党内有了根本不同的政治意见，而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小组织才是正当的"。他当年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运动，就建筑在这个

理论之上的。现在我们党的危机也不容许在党内有别的方法（即党内合法的公开争辩）来解决了。我们每个党员都负有拯救党的责任，应该回复到布尔什维克精神与政治路线，一致强固的团结起来，毫不隐讳的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即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者奋斗到底。不但反对斯大林的及类似斯大林的机会主义，并且要反对季诺维也夫等的妥协态度，不怕所谓“轶出党的范围”，不惜牺牲一切，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

此　　致

无产阶级的敬礼！

陈　独　秀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

---

① 斯大林说：“多数派在一九〇五年中的政策是不是正确呢？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有了苏维埃的存在，有了多数派的正确政策，一九〇五年革命还是不能胜利呢？这是因为封建残余和专制政府要比工人革命运动的力量强大些，能不能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过去没有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没有亲密无产阶级与广大群众的关系，和没有增长无产阶级在这些群众中间的威望呢？很明显的是不能这样说的。”正确的政策固然不是胜利之唯一保证，而错误的政策却是失败之主要的保证。若以为敌人的力量如果强大些，虽有正确的政策还是不能胜利，则俄国一九〇五年的失败都是命定的了。我不愿意斯大林为中国党有这样的辩护，我更不愿意借斯大林的话为我自己辩护。

② 中国革命之现阶段是反革命时期，目前对于反革命的民主运动，只有走向革命之可能，而不是革命。至于改组派倒蒋运动，只是反革命的国民党内部冲突，根本连民主运动还说不上，只有民众运动高潮发展到推倒整个的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才算是革命。六次大会所谓“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革命的阶段，”事实上应该是指将来的第三次革命。他们承认现在的阶段是革命的阶段，所以产生出思想混乱的“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政纲”即所谓“中国革命之十大要求”，这正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之混合物。

③ 一九一七年四月，巴格大梯夫为首的一部分多数派发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尚且公开的责骂他们发出这一口号太早，说他们是冒险。

④ 最近国际训令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了，中共中央初接此训令时尚疑成熟二字或译文有误，后交宣传部查对原文，译文并未错误，目前在江苏省代表大会中，多数代表对成熟二字也一致怀疑，群起争论，后经中央出席委员极力坚持，终于决定中国革命复兴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成熟了！（大概他们以为改组派倒蒋就是革命复兴。）

⑤ 第六次大会所决定之破产的路线，用白纸黑字写在议决案上的，如“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民权革命”“实现工农民权独裁制”，“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性……不应加紧对富农的斗争”“革命运动现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新的革命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一省或几省革命高潮与苏维埃政权的前途是可能的。”“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等等。中央所忠实执行的，正是这些破产的路线。项英、李富春、何孟雄等调和派，以为六大议决案没有错，只是中央执行得不对，这是表现出这班调和派不但不懂得我们反对派的政治路线是什么，并且也不懂得国际直接指导之下六大的政治路线是什么，他们自己更是没有路线。

⑥ 李立三辈对于机会主义，不愿探本溯源的使全党认识机会主义整个的路线之错误，而且想利用党的宣传机关与权力，把那几个个人造成机会主义的象征，以集中全党同志的视线，形成群众心

理，好自然而然的把他们自己除外了。他们对于盲动主义的宣传也是这样，只是瞿秋白造成盲动主义的象征，好把自己他们除外。其实，在汉口时代，瞿秋白在农民部通告上大骂农民“过火”，运动是流氓行动，命令各级党部须顾到国民政府一般政策。马日事变后，国际代表鲁易说了一声“国民党中央已经是反革命了！”李立三马上红着脸提高嗓门抗议道：“鲁易同志说这样的话，简直是送棺材给中国党”，蔡和森力主自行取消汉口总纠察队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请问这些都是表现什么意识，什么主义？！杨殷以罗绮园都曾亲自告诉我，李立三在广东省委负责时，他所表现的盲动主义，比全党任何同志都厉害。

〔附〕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托陈取消派纲领）

一　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

自从列宁同志患病和逝世，在季诺维也夫史大林布哈林主持之下的共产国际及联共领导机关，发生了机会主义的绝大危机，即是在政治上，以一个国家建建社会主义的保守理论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苏联的官僚外交策略代替了各国革命的阶级斗争，以和上层领袖谋妥协结合的策略代替了推动下层革命群众斗争的策略，以联合并拥护资产阶级之孟塞维克的策略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领导农民革命之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以少数派机械的阶段论代替了不断革命论；在组织上以官僚威权的形式主义代替了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主义，因此消灭了无产阶级战士政治自觉的积极活动。在这种根本错误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之下，先后断送了一九二三年的德国革命和保加利亚的革命，断送了英国的革命工人运动，使英国的改良派在工人群众中的统治意外巩固，并且造成了苏俄的大危机。在史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的领导之下，失败最惨的，要算是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革命失败之总的原因，是由于对资产阶级革命性和国民党的阶级性认识之根本错误，有了根本错误的认识，遂发生了错误的策略，主要的就是帮助并且拥护资产阶级，不使中国无产阶级有它自己的真正独立政党领导革命到底。

中国国民党，无论在其行动的历史上，在其三民主义的政纲上，在其建设中国实业计划上，在其上层领导成分上，都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自始即带有不少的反动性（如希求帝国主义的帮助及不主张没收土地及大贫小贫论）；至于其中的下层群众含有不少的工农分子，在欧洲各国资产阶级的政党中不乏此例，决不能因此改变其党的资产阶级性；无论其如何口头上主张世界革命，拥护工农利益，和联合苏俄，凡在一个革

命运动高潮中，羽毛还未丰满的资产阶级往往采用一部分迎合无产阶级的口号，甚至于拿出社会主义的幌子，以猎取无产阶级的同情与拥护，这是资产阶级的常态，是在欧洲革命运动史中所常见的。无产阶级在没有独立的政党时，常常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常常的是简单的替资产阶级服务，无条件的为资产阶级去推翻封建的统治，而马上即被资产阶级践踏。中国的无产阶级不幸也在共产国际及中共错误的幻想的政策领导之下，不自觉的做了中国资产阶级国民党简单的工具，以苦力的资格替它们推翻了代表官僚买办资本的北洋派的统治，以与帝国主义妥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刚一抬头即以空前的白色恐怖摧残它们的昨日的拥护者——无产阶级。我们加入国民党和长期留在国民党的结果是：在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掩饰了国民党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松懈了工农群众对国民党的戒备，提高了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组织和强固了资产阶级反对工农的统治，终致国民党对工农不断的大批屠杀和它的政权意外巩固。

我们在国民党的政策，因为希望留在国民党内，保持长期的阶级联盟，所以不惜不断的让步：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代表允许国民党组织国际联络委员会，监督我们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凡国际所给中共的政策和命令须先交该委员会看过；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蒋介石政变，围缴省港罢工委员会及苏俄顾问和苏俄视察团的卫队枪械，逮捕大批共产党党员后，复以国民党党务整理议决案的形式，令共产党及青年团将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单缴存国民党，禁止我们批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令我们同志退出军事学校或退出共产党；这些事实已经是资产阶级公开的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与指挥，而不是什么联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国际的政策不但不因资产阶级进攻使无产阶级自己更加独立起来，反而采用了最可耻的投降政策，严厉的阻止中共退出国民党，连准备退出都不许，继续极力武装蒋介石，国际代表还极力主张我们应将所有的力量帮助并拥护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从此无产阶级更进一步完全投降了资产阶级，不缔〔啻〕自己正式宣告为资产阶级的附属品。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蒋介石开始大屠杀，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仍然是继续拥冯拥汪，说冯玉祥是工人出身，说汪精卫是土地革命的领袖，反对中共退出国民党，反对组织苏维埃。并且在蒋介石叛变以前，曾命令我们以劳资仲裁代替罢工斗争，命令我们避免与蒋介石的军队冲突；在蒋介石叛变以后，曾命令我们在土地革命中不得侵犯军官们的土地，命令我们以党部的力量制止工农的“过火”行动，最后，全部国民党已公然反革命，还命令我们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直到南昌暴动，还是在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举行的。这样的政策，分明是使中共撕碎了自己的旗帜，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变成了国民党约束工农的工具；这样的政策，分明是自始至终从头到尾一贯的空前未有最可耻的机会主义，分明是卖阶级的政策，完全不是一九〇五年布尔什维克坚决的反对资产阶级妥协，独立的领导农民，准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的政策。关于阶级联盟问题，列宁常常引用巴尔夫斯的话说：“我们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的条件是：共同奋斗，分别走路，不混合组织，看同盟者犹如看敌人一样”。国际既强制中共混合在国民党组织之内，复大喊“推倒国民党的领导是超越阶级的危险”。事后却责备中共不应损失其组织上及政治上的独立；其实使中共加入国民党，根本已毁坏其独立便不能执行其独立政策。中共要执行国际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则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乃必然的逻辑，难道除了这些实际问题外，还有悬在空中的独立吗？！

共产国际对国民党这样破产的政策，是根据他们对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关系之根本错误的认识。他们以为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因受帝国主义的压迫需要革命，因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可以团结中国国内进步的各阶级，形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种联合战线的方式便是国民党，国际称它为"各阶级联盟"或"四个阶级的联盟"。这分明是组织上的阶级混合，而不是在某一时期某一运动中两个独立政党行动上的联盟，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对中国商品与资本侵略之深入，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非依赖帝国主义不能生存，这种依赖外力而生存的幼稚的中国资产阶级，必须靠更残酷的剥削工农，才能勉强抵制住和资本技术更高的帝国主义国家工商业竞争，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因此使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农的冲突更为不可调和，更易于爆发阶级战争。资产阶级最初参加民族革命，乃是企图利用能够在它们控制条件（过去国际的政策正是对资产阶级担保这种条件）下的工农群众声势，向帝国主义做买卖，好取得于它们自己阶级的那几种利益，一看到工农群众根据其本身利益，侵犯资产阶级的利益领导革命时，资产阶级便马上感觉到工农革命比帝国主义对它更是根本的危险，所以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快的反对革命，乃是其阶级性之必然。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使国内的阶级斗争加紧，决不能因此促成阶级联合和缓阶级斗争。国民党是一种资产阶级欺骗利用民众的工具，用抽象的"国民革命"的口号（在我们不进行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状况之下。）麻醉住工农群众意识，不组织自己的独立的武装，而只是无条件的为资产阶级夺取江山，资产阶级独享胜利之果，而且马上回过头来屠杀工农群众，这是一件白日经天的事实，谁都不能否认。

我们加入及留在国民党的另一理由，便是要经过国民党去争取小资产阶级的群众而与它联盟，这也是机会主义的模范的表现之一。无产阶级之最可靠的同盟者，只是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即城市及乡村的贫民。固然，无产阶级随着革命发展之现实的环境，要团聚一切革命势力，但无论如何我们的着眼是在群众，尤其是下层劳苦群众，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所领导的民主政党。我们要团结广大的劳苦群众在自己方面来，首要的就是无产阶级自己要有独立的政治地位与鲜明的旗帜。有时可以甚且必须在一定的明确的行动纲领上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建立联盟；但这个联盟之根本作用，是在以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去揭破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妥协与欺骗，以夺取广大劳苦群众在自己的政治影响方面来，而不在掩藏自己的政治面目，迁就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更不可在组织上与它混合起来，以"集中革命势力"！从前第二国际即主张俄国的社会民主党应与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党合并，他们常说：不懂得在落后的俄国为什么多数派少数派和社会革命党分而为三。列宁则坚持只能和社会革命党有政治上的联盟，而不能在组织上和它混合。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尚保持和劳动者同盟对封建党及大资产阶级的党作革命的反抗；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三月以中央委员会名义致共产主义同盟的信，严厉的指出这一同盟者的危险性，指出它们号召一切民主派联成一大反对党之欺骗，极力主张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独立政党，他说："即为对付共同敌人，亦不必有特殊的共同组织，对敌直接斗争时，两党利害一时一致的，自然而然有一时的结合"。过去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政策，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的遗教，而是采取了从前第二国际的意见，特意把国民党装成一个狮子灯，我们都钻在里面去舞。象这样混合组织的联盟，则遇事掣肘和混乱了我们自己的政治面目，不但不能经过他们争取其下

层群众，并且要丧失我们自己阶级的群众。

在革命高潮中，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即城市乡村的贫民联合之最好的形式，便是苏维埃，即是由工农贫民兵士的广大群众选举代表组织的苏维埃，它的任务是武装群众及指挥群众的政治斗争夺取政权的机关。共产国际的领导，在革命高潮中，为要跟着大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上层跑，作那种无希望的同盟梦，于是根本抛弃代表城市乡村贫民的利益，在斗争上服从国民党的政纲，越此便是"过火"，在组织上把农民协会及店员小商人的组织工作通统交给国民党，不许组织苏维埃；他们竟至说："中国的国民党对现时中国革命的作用与一九〇五年的苏维埃对俄国革命作用是一样""武汉国民党为革命运动的中心""武汉政府是革命的政府""若现在即刻建立苏维埃，拒绝拥护武汉政府，提出二重政权的口号，推翻武汉政府，便是对蒋介石和张作霖予以直接的援助"（史大林）。"在将来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还可以利用国民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布哈林）。他们的错误，完全由于迷信少数派的阶段论遮住了眼睛，不去观察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内容和当时民众革命斗争急激进展的环境，以至盲目的反对建立苏维埃；他们完全不认识不但南京的国民党已公然反革命，即武汉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也已日渐走向反革命，尤其在马日事变后，他们和蒋介石张作霖已经没有区别，此时国民党资产阶级（凡是剥削劳动者的大小资产阶级都包含在内）参加民主革命的历史已经告终；同时从共产国际到中国国民党一致承认"过火"的工农运动，已经打破了各阶级联盟，超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开始由民主阶段，走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革命性质已经开始转变了。无产阶级的政党，至少在三月二十事变后即应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在北伐开始时就应该在北伐军所到的地方组织苏维埃，至少在四月十二事变后即应建立苏维埃与国民党政府对抗，由二重政权进到推翻反革命的国民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是这样，而是始终拘泥民主革命的阶段，始终迷信国民党，始终想用大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党代替了工人与乡村城市贫民群众的苏维埃。中共中央此时未能力争退出国民党，建立苏维埃，推倒国民党的领导，反而在国际代表所起草的宣言中及农民部通告中，都承认农民有"过火"行动；并且自行取消汉口总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以避免和国民党军队冲突；这都是莫大的错误。一直到国民党全部公然反革命，革命运动已经一败涂地，此时反而突然想起用苏维埃的口号，作夺取政权的冒险尝试。

一个革命的政党，不但要善于进攻，也要善于退守，上海广州长沙汉口的共产党党员及工农群众相继被屠杀后，没有一点有力的反攻，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已完全走到反动营垒，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都已经结合起来，革命分明是失败了，此时即应马上采取退守政策以保存阶级的战斗力，整理我们的队伍，积聚我们的力量，做改守为攻的准备。当时党的政策恰与此相反。联共及国际领导者史大林布哈林此时企图以无产阶级的武装暴动挽回其机会主义政策之绝望，以抵制反对派的非难，乃特派心腹代表到中国，以国际名义包办"八七会议"，在此会议中，既未便根本的系统的指出改正机会主义（仍旧说留在国民党有四大理由，仍旧主张站在国民党左派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又加以从莫斯科带来的事实："中国革命浪潮还在一直高涨"，"中国已经到了直接革命的形势"，经过翻译员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等之手，造成了盲动主义。当时党的领导者，以为只有武装暴动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只有自己和与自己同一意见的才是真正

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如有同志对于革命高潮及中央政治路线表示有一点怀疑，对暴动有一点审慎，便要拿“机会主义的残余”“观念不正确”等罪名加以严重的打击，严厉的命令各级党部改组并实行新的政治路线即所谓“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凡不赞成此新的路线者即不许其登记，甚至开除已登记的同志。不仅命令党部，而且命令群众，命令他们无条件的乱动；以至盲动的情绪和大大小小的暴动普遍了全国所有我们党有组织的地方。从“八七会议”到“六次大会”乃是整个的暴动时期，在此时期中，党的领导机关之唯一的工作，“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用中央绝对正确的路线，客观上帮助国民党把工农群众的组织力量打得骨断肢脱伤残委地，至今不能立起来从事战斗；党的本身更加溃散，党的政治地位更加堕落，变成了单纯的“杀人放火”之象征。

机会主义是使中国革命失败，盲动主义是彻底完成这个失败，六大以后的路线是继续巩固这个失败，并为下次革命准备新的失败！

二　党的现状与危机——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

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对于机会主义的批评，并未曾把中共中央在革命高潮中所执行的机会主义政策之根本错误（没有及时退出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没有组织苏维埃等）指摘出来，因为这样便要侵犯到国际对中国革命政策之本身，而只是指出中国党三种主要的错误（一、缺乏独立性与批评性，二、不能了解从一阶段到另一阶段的转变，三、党没有成为广大群众革命力量的中心。），这不过是说中国党执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在技术上太不高明，所以共产国际所指示的六次大会所议决的新的政治路线：将来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将来的政权性质应该是工农民主专政；富农还没有消失革命性，应联合富农而不应加紧对富农的斗争；他们虽然口头上大喊反对机会主义，而这些实际政策，仍然没有转变到另一阶段，仍然是十足的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对于盲动主义的批评，虽然口头大喊反对盲动主义，也同样因为要掩护国际自身的盲动主义，未便指出中国党在革命失败后，按照当时全国总的形势采用暴动政策是根本错误，而只是指摘中国党对暴动政策机械的应用，没有事先组织好，玩弄暴动等等，这也不过是说中国党执行国际暴动政策在技术上太不高明，所以六次大会政治决议案公开的说：“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定出武装暴动的总方针……走向革命的大道”。并且更说：“新的革命高潮之象征已经可以看见”“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六大决议案）“我们的面前是一个大的全国革命的高潮”（国际代表的政治报告），所以第六次大会后中共中央第一个政治通告，开口便说“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最近国际更进一步训令中国党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这分明是国际自从“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极力供给中国党以盲动主义之前提。对于机会主义的错误不探本溯源的把整个的机会主义路线指摘出来，便不能得到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因此现在党的政治路线，仍旧沿着机会主义进行；对于盲动主义的前提即革命潮流没有正确的估量，便不能了解目前的革命形势，因此现在党的工作路线，仍旧沿着盲动主义进行；政治路线工作路线，事实上日益证明破产，因此现在党的组织路线，便不得不日益效法联共的现行党制厉行官僚主义，借以箝制党员群众的异议，来保持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这一切一切都不是中国的国货，都是史大林布哈林所主持的

国际领导机关之所赐。没有相当时期经过马克思主义及阶级斗争锻炼的中国党，自己本没有发明理论决定政策的能力；过去及现在错误的根本政策与理论，自然都来自国际。但过去党的领导机关对于机会主义没有一点认识与抗议，忠实的可耻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政策，这是应该负责任的；现在党的领导机关仍旧继续执行国际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路线，经反对派明白指出，依然毫无觉悟，而且自觉的掩护错误，这简直是罪恶了！我们对于过去革命之失败，只简单的承认错误还不够，重要的是在深刻的了解错误，彻底的改正错误，并且坚决的参加反机会主义及盲动主义的斗争，对于革命才有实际意义，这才是我们正当的道路。

现在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所表现的是：国际及中共中央一致主张将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将来的政权应该是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理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并未掌握政权，中国还是封建势力的统治，并且中国还是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或封建社会势力占优势。现在的国内战争还是资产阶级对封建势力的战争。这样的说法，简直是和第三党改组派以至蒋介石都站在一条战线，因为他们都正在大喊反封建势力。第三党最近发表的政治主张说："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封建社会，而掌握国家政权的便是封建势力，支配社会关系的，……最显明的亦是封建阶级的剥削。因此，分明的表现，中国革命还没有通过民主革命的阶段"。"反动统治势力的政治中心便是下级的封建势力，构成反动势力大联合"。"社会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而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封建阶级，中国目前的革命运动，如果不针对着封建势力，可以说绝对收不到集中革命势力的实效，必归失败。"这些话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及中共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案没有两样。

我们以为：说中国现在还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把资产阶级的反动性及一切反动行为都归到封建，这不但是说梦话，不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简直是有意的为资产阶级当辩护士！其实，在经济上，中国封建制度之崩坏，土地权归了自由地主与自由农民，政权归了国家，比欧洲任何国家都早。自国际资本主义打破了中国的万里长城，银行工厂铁路电线轮船电灯电话等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都应有尽有，已经形成了官僚买办的资本主义。到了欧战前后，更进入了民族的大工业资本时代，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及货币经济，连穷乡僻壤都达到了，自然经济已扫荡殆尽。并且全国一切形式的经济之最高统治，都在本国的一万五千万元以上银行资本依赖外国的五十八万万元以上银行资本的支配之下，因此资本主义的作用及其特有的矛盾形态，不但占领了城市，而且深入了乡村，乡村主要部分经济都直接间接隶属于市场，因此城市经济绝对的支配了乡村，因此一切封建残余的政治势力都不得不力求资本主义化以自存。土地早已是一种个人私有的资本而不是封建的领土，地主已资本家化，城市及乡村所遗留一些封建式的剥削，乃是资本主义袭用旧的剥削方法（以前美国的黑奴及现在南洋群岛的猪仔，还是封建前奴隶制度）；至于城市乡村各种落后的现象，乃是生产停滞，农村人口过剩，资本主义落后国共有的现象，也并不是封建产物；若因此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在中国不占绝对优势地位，则只是常识的判断，而不是科学的观察。在政治上资产阶级经过两次革命，已经掌握政权，社会阶级势力之转变，更是异常明显。在民众斗争发展上，已经"过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火"；并且广州上海汉口的工人和两湖的农民，已经有过相当的二重政权的形式，广州暴动中且出现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开始了社会革

命的行动；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总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已经是将来第三次中国大革命的预演，在第三次革命中各阶级的行动与变化，给了我们许多丰富的材料，使我们能预测第三次中国革命的远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及土地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城市及乡村的贫民取得政权，才能彻底完成，换言之，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完成，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城市及乡村中都与帝国主义经济及现在的土地关系有很密切不可分离的联系，它决不能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以土地给贫农，而且当革命高潮时必然坚决的反对工农运动"过火"，无产阶级没有与他们合作的可能。其次，在城市中，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的第二日即应进行没收中外银行及大工厂企业，打破私有财产制。在农村中，因为土地在资本家化的地主之手，富农多兼高利贷与商业剥削者的资格，是贫农与雇农仇视的中心，是农村贫民革命的对象，当然在乡村中更无与富农联合战线之可能；我们应该领导贫农，反对富农，使中农中立。当下次革命高潮初起时，我们即应动员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奋斗，而不是为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站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民主专政奋斗。民主专政现在已成了一种反动的口号，成为将来机会主义者与小资产阶级政党联合，阻碍群众革命运动发展的理论根据。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依据这样的机会主义的理论根据和政治路线，已经演了过去可耻的悲惨的失败，现在又在准备重演将来更可耻更悲惨的失败。

现在盲动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所表现的是：不承认资产阶级是胜利了，不承认过去的革命是完全失败了；在"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前提之下，强迫罢工，每个小的经济斗争都要任意强迫扩大到大的政治斗争，不断的命令党员代替群众上街示威，召集小组或支部会议时，都照例不讨论政治问题，不讨论日常生活斗争的工作方法，只简单的传达上级机关命令上街示威，散传单，贴标语；无处无事不采用盲动政策，无处无事不实行"自己失败主义"，弄的党内党外群众都感觉没有一点出路，党的下级干部同志都感觉着在中央路线之下无法工作，党内工人同志都一天一天感觉着党的政策和行动绝对不适合工人群众目前的需要与可能，尤其是盲动的命令逼得他们一批一批的与党无形脱离，因此各生产机关的支部已凋零不堪，党员数量及无产阶级的基础已削弱殆尽，象汉口，长沙，广州，这样重要的中心都市，连党的组织都没有了。党和无产阶级群众的联系，更等于零：铁路，矿山，纱厂，丝厂，五金等重要产业工人都没有群众的组织，就有点组织也都在国民党领导之下，海员方面也只仅仅有点线索，在这样状况之下，革命高潮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

我们以为：自从机会主义的政策断送了上次大革命，又加上盲动主义根本破坏了工农组织，减弱了工人阶级之阶级斗争的力量，形成了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我们在现阶段中，应一面采取防御战略，反省过去失败的教训，溶化过去革命伟大的经验与教训，以锻炼我们的党，重新团结离散的队伍，在日常生活的斗争中，恢复和工农群众的联系，恢复群众的组织，以积聚自己阶级的力量；一面重新估量现阶段中新的客观局势．即因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和经济相当恢复而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与其政党军人间之冲突，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资产阶级军事专政间之冲突而开始的民主立宪运动之趋势，我们应利用这种趋势，而力争彻底的民主主义做我们目前过渡时代政治斗争形式，重新闯进政治舞台，由现在的政治斗争，缩短反革命的现阶段，开

辟新的革命环境，走向将来的第三次革命。民主要求口号，现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群众以至工人群众还需要，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自身，也须有相当的政治自由才能够实现其力量发展所需要的组织上之民主集中制。因此，我们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应力争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即力争由平等直接普选不记名投票产生的国民会议，并且必须与“国民会议”同时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民族独立”，做我们在过渡时期中四个不可分离的民主要求口号，以充实国民会议的内容，必须如此才能够动员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公开的现实政治斗争，不断的扩大斗争，由要求资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走到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即拥护劳动大众——全国多数民众权利的苏维埃政权。我们对于国民会议的态度，是主张积极的号召及参加，力争其彻底民主化，而不主张消极的空喊苏维埃来抵制；因为“苏维埃政权”必须由“武装暴动”来产生，在目前只是教育宣传口号，而不是行动口号。在主观客观条件都未成熟时，若发出“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做行动口号，号召工人群众马上行动起来，为这些口号奋斗，不仅得不着群众的应声，而且更加扩大党的盲动情绪，离开群众，削弱党的力量。同时，我们更不是主张用国民会议来代替苏维埃，而是要利用国民会议的斗争来发动广大的下层民众反对国民党资产阶级的军事专政，走向“武装暴动”和“苏维埃政权”。

现在的中央，一面大喊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大喊苏维埃政权，大骂承认中国革命已经失败的人，大骂提出国民会议口号的人是取消派或反动派，并且发出“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战争”和“以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的口号；同时一面又声明：“现在客观的革命形势并未高涨起来，所以现在决不能马上号召群众暴动，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这就是说我们的党现在没有号召群众行动的政治号召，只有盲动，只有继续长期的离开政治舞台。

最近党的政策，不但极力发挥国际对于中国现局势盲动主义的观察之谰言，丝毫不了解民主运动在两个革命间过渡时期的政治斗争上有重大作用，而且是机会主义的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不断示威，双管齐下，表面上说是采取失败主义，实际上是命令同志帮助改组派做“反蒋运动”，并且在香港参加各派的反蒋会议。不领导民众做公开的政治斗争，而跟随改组派将军们做军事投机，这不但是离开政治舞台，而且是葬送党的政治生命！

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所表现的是：以委派制度与绝对的命令主义消灭了党内德莫克拉西；以夸大的虚伪的报告，从国际直到中国党各级机关，上下互相欺骗，以欺骗群众。团结无原则的系统，如周恩来所领导的黄埔系，项英所领导的全总系，拥护个人的势力，各自庇护私人，互相排挤，任意摧残有政治自觉的党员；以大批开除党员的手段来解决党内的政治问题；置领导机关少数人的威信于全党全阶级的利益之上，以借口“敌人进攻”，“时局紧张”，“秘密工作”，“铁的纪律”，……等，箝制党员对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变布尔什维克热烈争辩的精神为官僚的盲目服从，从支部到国际活象君主专制之下从地保到皇帝一样，只许说一声“是！”，否则马上便有不测之祸，因此所有党员都不敢说一句心中所想说的话。

现在党的统治机关的官僚们箝制党员之最大的武器，要算是“铁的纪律”；党员也因为迷信这一武器自己束缚了自己，对于官僚们的统治，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我们以为：“铁的纪律”自然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可是列

宁曾告诉我们：铁的纪律之基础“第一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之觉悟及其对于革命之忠诚，能自主，勇敢牺牲；第二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和无产阶级以至半无产阶级广大的劳苦群众融成一片；第三是极广大的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相信它的策略与战略是正确的，没有这些条件，一切要创造这个纪律的企图，都必定变成废话，矫饰，欺诈。”关于服从组织纪律的限度的问题，列宁又说过：“我们曾经屡次确定对于工人政党的队伍中纪律之重要与见解：行动统一，讨论和批评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一个纪律，才配称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所以无产阶级，若没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即不承认有任何行动的统一。所以有阶级觉悟的工人永不应该忘记有非常严重的原则之违犯，竟至逼令我们必须与一切组织的关系决裂。”现在党的官僚们的所谓“铁的纪律”，恰恰和列宁的遗教相反，恰恰是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已经明知党的策略与战术是错误的，而他们还不顾一切的继续执行，恰恰是不容许党员对于他们错误的策略与战术有讨论和批评的自由，恰恰是官僚们用为掩护自己错误和维持官僚统治的工具；这样的“铁的纪律”，除废话，矫饰，与欺诈而外，没有别的意义。

我们的党，始而在机会主义指导之下，未能使全党党员群众参预到党的政治生活及接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因此党内一般政治水平线非常之低；继而又在盲动主义指导之下，党的组织弄到残破不堪：第六次大会后，更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交互错杂，不能进前一步。处此情形之下，党的领导机关要想恢复党的基础，形成党的纪律，必须根本改变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民主集中制代替官僚集中制，实行讨论和批评的自由，产生能够使群众在自己的经验中相信是正确的策略与战术，以接近广大的劳动群众；必如此，才可形成真正的行动统一，抵御敌人的进攻。现在党的官僚统治机关，反而利用党内一般政治水平线之低落，党员群众对于党的生活之隔阂及党的组织之残破实行任意操纵，欺骗与威吓，实行以金钱维系党员及空洞的工会机关和雇人示威，实行制止党内的讨论和批评，以国际威信和党的威权强迫党员强迫群众相信“中央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并且胆敢凭借敌人进攻做护符以恐吓党。这样的领导机关如果听它们仍旧存在下去，我们的党，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必然要名存而实亡，一切有政治自觉的分子，都应当及时奋起，从党内推翻它，才能够将我们的党从堕落而危亡的现状中拯救出来！

三　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略）

四　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略）

五　我们的态度与建议

反对派的责任是在使全体党员明了机会主义的危险，摆脱机会主义的领导，而回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真正民主集中的党中，党内政治不同的意见本可由公开讨论的方法来解决，不但不会使党分裂，并且使党更加巩固。反过来，官僚主义的压制与蒙蔽，势必使党崩坏与分裂；反对派为拥护真正无产阶级的路线，为实现布尔什维克列

宁主义的统一，不能不与机会主义的领导有组织的作坚决的斗争。机会主义已迭次在中国宣告其可耻的破产，中国无产阶级已付了过重的代价，直至近一年来方产生反对派的斗争，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受第三国际长期机会主义的领导与蒙蔽，直到现在才接近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我们下列签名的人，认为我们站在恢复列宁主义的国际，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拥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上，都应该起来根本反对史大林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国际的苏联的中共的现行政策和党制，都需要根本改变。我们相信在中国的反对派运动得到党内多数同志同情时，史大林也会采用反对派一部分主张和口号或更换一部分领导者，以图统驭群众的左倾；但是我们所争的乃是整个路线之根本改变，而不仅不是一时策略上的曲折，更不是简单那几个人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共受史大林派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之害最为酷烈，应当是国际各国党中站在最前线勇敢的反对现在国际机会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因此，我们提出下列建议，希望全党同志一致坚决的要求并督促中央以中共名义向国际并直接向各国兄弟党提出；同时我们应该在国际左派反对派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为下列各项奋斗到底：

一、召回托洛斯基同志等反对派，释放在监狱中和流放在西伯利亚土耳其士坦等处的联共及其他各国反对派同志，恢复其党籍，并恢复托洛斯基同志的领导工作。

二、公布五六年来反对派对联共及国际政策发表的各种文件，公布列宁遗嘱及其他被史大林派隐藏着的列宁遗著。

三、重新审查五六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所犯政治上的组织上的错误，并重新决定联共的政策及国际政策。

四、恢复中国党因反对中央机会主义路线而被开除的同志之党籍，并立即公开的讨论根本政治问题。

五、重新审查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并决定新的政治路线。

六、改组联共及国际与各国支部的领导机关。

王阿荣　王永庆　王芝槐　王视民　王　畅　王绍华　王季平　王大昌　尹　宽
左　斌　史文学　江鸿生　汪常师　江又容　李果夫　李　季　李　轩　李静涛
朱崇文　朱继熹　朱天章　何炳根　何资深　杜　谦　杜发义　杜　琳　汪泽楷
汪复兴　汪复盛　林金生　余　伟　吴季严　吴若萍　吴琢辅　岑舜乡　马玉夫
马　图　徐竹林　段　浩　段震亚　孙平州　高语罕　梁筱山　庄季贞　陈　洪
陈碧兰　陈独秀　陈其昌　张　虚　张以森　张素秋　张胜秋　张阿宝　屠景山
屠维纳　陆　沉　程裕和　汤　正　彭桂生　彭桂秋　彭述之　单直夫　叶录堂
董江素　刘右山　刘静真　刘伯庄　刘　毅　刘逢鼎　潘希真　潘伯华　蔡振德
郑　重　郑超麟　蒋石甫　钱又萱　薛农山　罗世藩　韩治臣　顾幸到　顾　满

（附记）以上是我们签名者今后的集体意见，以前个人所发表的言论，概由个人负责。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共任务问题的信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同志们！

中国最近的事实，迫着我们在还没有接到你们关于党在现时条件下的行动和路线的消息的时候，就来说一说我们对于中国时局的估计，就来预先指出你们中国共产党底最重要的任务。

（一）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这个危机底表现是：（1）各军阀之间的混战重新爆发，在这各派军阀背后，站立着帝国主义列强，帝国主义列强间的矛盾正在日益剧烈起来；（2）“国民党改组派”（以汪精卫、陈公博等为首）形成起来，与南京国民党对立着，它因为得到一派军阀(张发奎)底帮助，而走了上政治舞台；（3）反苏联的冒险行为使一切矛盾尖锐化，结果就使全部局势复杂化；（4）希图外国资本家稍许多投资本和希图帝国主义方面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这一切尝试，已完全破产；（5）国民党底整个国内政策，显然失败，它的国内政策，既没有能够把群众底革命运动完全镇压下去（虽然已用尽空前的白色恐怖手段），也没有能够在财政统一和武力统一国家方面得到多少实在的成绩；（6）许多工业部门都衰败下去，而外国资本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却增大了；（7）农业危机正延长和加深下去，这种农业危机在现存的地主资产阶级制度之下，是没有出路的；（8）工人阶级及农民基本群众底生活状况，本来已经是不堪忍受了，现在更加是一般地恶化下去；（9）工人运动底新浪潮高涨起来，而工人运动就是革命新高涨底急先锋；（10）农民运动以及其中的游击运动，复兴起来。

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曾企图在反革命胜利底基础上去建立和巩固民族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国家，可是，这个企图，却没有成功。在南京政府统治底第一个时期内，还能够稍许造成一些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稳定的幻景，可是，在现时，我们却看见：旧的矛盾正在扩大的基础上重复表现出来，这是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底加强，由于经济危机底深入，由于执政上层分子底新崩溃，由于工农群众革命运动底复兴。我们现在不能预先断定，究竟全国危机会如何迅速地进到直接革命形势。然而，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底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同时，要积极地发展和扩大革命形式的阶级斗争（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运动等等）。

（二）一九二七年年底，为着镇压和摧残工农运动起见，形成了帝国主义者、地主及整个资产阶级的统一的反革命的联盟，这个联盟，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胜利底初期还继续存在过；现在，这个联盟中的内部矛盾和分裂，是增长和加深着。虽然一切剥

削阶级一般的是反革命性的，虽然他们这些阶级，对于中国国内一些主要矛盾以及对于中国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彼此所抱的立场间的界限很不清楚，可是，现在，这个联盟终于分裂成两个主要政治集团了。

第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包含有军阀、封建地主和土著大资产阶级（极大多数是买办资产阶级和银行资产阶级，当然不只是买办资产阶级和银行资产阶级）。现在这个集团底政治代表，就是执政国民党的和非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集团（蒋介石派、西山会议派、安福派、冯玉祥、阎锡山、广西派等等）。因为中国经济结构底极端复杂，以及中国各区域资本主义发展底不平衡，所以，在这些集团里，每一派底阶级性质都各有其特点，而且在各种不同的配合里，代表着地主和土著大资产阶级底利益。可是，他们却共同一块来使中国服从于外国资本。由于中国存在着封建割据形势，又由于中国是帝国主义列强相互斗争底舞台和目标，所以在这一个政治营垒里，没有内部的和平，而不断地发生军阀战争。

第二个集团。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等阶层利益的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的中间派，即工商资产阶级底一部分，企图形成为第二个政治集团。这个集团对于现在执政的国民党，抱着反对派的态度，它对中小资本主义企业家，对那些心怀不满的小地主，以及对城乡小资产阶级底上层分子（剥削分子），传布自己的影响。这个集团的政治代表，就是“国民党改组派”（汪精卫、陈公博等）。国民党改组派，极广泛地运用社会问题上的骗人宣传和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斗争的虚伪口号，企图在现时利用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去达到刷新南京政府和预防新的革命爆发的目的。这一个集团，以及它的代表“国民党改组派”，是反革命的，极端仇视工农革命运动，仇视苏联，而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制度，则完全抱着妥协态度和唯命是听。这种情形，很明显地表现于：“国民党改组派”靠着“自己的”军阀（张发奎），并且与北方军阀（冯玉祥等）联合，而实行军阀式的军事行动。这第二个集团所代表的阶级，无论怎样企图，可是还是没有能力指出中国可以在资产阶级发展道路上逃出延绵危机的出路，当然更加没有能力去实现这种出路，即使他们愿意改变现存政权底社会性质，他们也是同样没有能力来实行什么改变的。在独立工农革命运动将来更加高涨时，他们很快就会丧失他们对于现存政权反对派态度，而在无产阶级与农民一起来实行坚决的阶级战斗的时候，他们很快就会和第一个集团合并起来，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

但是，在现时革命高涨底初期，既然“国民党改组派”（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幻想国民党会“刷新”起来，而改组派就正是收集这些幻想的一个政党）还没有在劳动群众之前完全暴露自己的真面目，那么，实行最坚决的斗争去反对他们的反动妥协影响，便是继续发展革命斗争和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须前提。

与这些政治反动集团对立的，就是唯一的革命营垒——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贫民。领导这个营垒的，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

一九二七年资产阶级叛变的结果，它投降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结果，国民党内各个政治集团底社会基础，而特别是“左派国民党”底社会基础，已经变更了和变化了。凡是不带批评态度而企图把现时的政治集团拿去与武汉时期的政治集团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这都是机会主义底公开露骨的表现。从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底联盟里，暂时地和很

有条件地分出了中等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的一翼，对于这种分裂，无论如何都不能象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那样去解释为小资产阶级底独立发动，或者解释为民族改良主义资产阶级底革命发动，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分子，总是准备用资产阶级营垒里的各种各样的变动和拉拢，来代替工农的群众革命斗争。

事实上，在南京政府完全破产之后，这个中等资产阶级的、民族改良主义派分裂出来，这只是表示，中国资产阶级又企图借宣布改组国民党为摆脱政治绝途的出路，来阻止革命爆发，或推延革命爆发。只是为着这个目的，“国民党改组派”才企图把自己参加军阀混战的行为描写成为拥护民主和民族的斗争，描写成为恢复“真正的国民党”的斗争：他举起“改组国民党”的旗帜，刚好是为着要挽救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而不是为着消灭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

（三）统治阶级里面政治派别底变动，“国民党改组派”底形成，就是表明，在中国，是存在着深刻的全国危机。

全国危机和革命高涨，有其特殊的中国式的特点。

张发奎底发动，蒋冯战争，便是证明。全国危机底发展，又用军事政治冲突形式表现出来。军阀混战，是地主资产阶级联盟之反革命政策底直接继续，同时，这种战争，在客观上将削弱统治政权，将吸引群众参加政治斗争，将引起他们日益积极的反抗，去反对军阀战争及其结果，而促进独立工农运动底开展。

中国全国危机和革命高涨底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农民战争。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没有能够完全压倒农民革命运动。在反动派领导之下的，但由于自己带有群众性质，所以在客观上是革命的那些回民武装起义和“红枪会”武装起义等等，尤其是中国大多数省份内群众土地运动之一般的增长，以及已往保存下来的、而且最近以来更加扩大并巩固起来的苏维埃区域，以及南方的绵延不断的游击战争，——这便是革命潮流中的一个支流，全国革命运动底雄伟高涨将顺着这个支流而更加增长起来。然而，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底最准确的最重大的特征，却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工人运动，已经走出一九二七年严重失败后的消沉状态。无产阶级底经济罢工斗争，正在发展着。这种斗争，表明出来，这种斗争大有转变为政治战斗和游行示威的趋势。工人运动中的这些过程，已经使得共产党巩固起来，而共产党已经能够成绩卓著地领导五卅、八一、九一等纪念底革命示威和罢工。

然而，共产党底思想政治影响，以及工人阶级组织程度，比起群众不满情绪和积聚起来的革命毅力及自发运动三者底增长，还是落后。大多数赤色工会，还没有成为群众组织。黄色工会和国民党工会底影响还是很大。国民党“改组派”在黄色工会里的影响特别大（在北方）。共产党在黄色工会国民党工会里的工作，没有认真进行。共产党还千万没有把在生产里的基本革命工人干部团结在自己周围。尤其是，党还没有解决争取工人阶级大多数的任务，没有解决取得无产阶级自发经济政治斗争中的领导的任务。共产党还没有成为广大群众直接革命斗争底急先锋、组织者和指挥者。

在共产党本身里面，关于党策略和政策底主要问题，是有严重的动摇（陈独秀取消派；与“改组派”及黄色工会官僚联合的倾向；否认赞助和指导农民战争之必要的倾向），这些动摇，足以妨碍共产党在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涨底新条件之下去领导群众的独立斗争。

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底落后，革命职工运动，和共产党本身组织程度之比较工人阶级日益坚强的自发斗争落后，这便是妨害中国革命斗争继续向前发展的最重要的危险。

（四）根据上面所说的一切情形，就可以决定共产党底最近的任务。为要补充以前两封信（关于农民问题的信和关于工会问题的信）起见，我们认为，你们必须注意到现时条件之下摆在你们党面前的下列基本任务：

甲、必须尽量利用已经开始的军阀混战，来继续展开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必须在报纸、杂志、传单、口头的群众鼓动和宣言里，最大限度地揭露国民党一切集团底反革命作用。党应当破坏在每个区域内统治着的任何一个军阀集团底政权（在南方统治着的是南京派、张发奎派等等，在北方是阎锡山派、冯玉祥派以及奉天派等等）。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这些口号，应当成为党在群众鼓动工作中的基本的迫切的口号；

乙、同时，争取对群众的影响，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应当加紧，首先是去反对所谓国民党“改组派”，因为它企图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并且是妨碍工农革命运动底向前发展的主要危险。必须立刻发展最坚决的，尽可能群众化的运动，去破坏“改组派”底任何影响和揭露他们的反革命实质。必须积极揭露“改组派”底劳动纲领和土地纲领，因为“改组派”在事实上是反对工人和反对土地革命，而拥护地主的土地占有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剥削。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群众面前，来揭破“改组派”向帝国主义者效劳的态度，这种效劳态度底特别明显的表现，就是改组派在中东路问题上用疯狂的和真正法西斯蒂式的造谣来攻击苏联。应当坚持到底地揭露“改组派”底假冒的民主主义，“改组派”主张“党权”原则（完全不许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的原则）和只是为着另一军阀底专政而来反对蒋介石底专政。当然，无论如何也不可以与“改组派”实行联盟。如果与他们实行什么联盟，那一定不过是使无产阶级底独立运动，去服从反革命的民族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底领导，这种联盟，结果必然会使革命运动失败。现在，比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更加着重在我们党领导之下的工农独立斗争；

丙、共产党应当极其注意工人底罢工斗争。在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配合起来的时候，必须紧张全部力量，去发展政治罢工，立定准备总政治罢工的方针。应当在一切地方，只要那地方国民党反革命政权是在削弱而革命的斗争是在增长，就要实行使革命工会运动走出秘密地位的尝试；

丁、共产党应当更加注意发展反帝运动，并争取反帝运动底领导作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列强，就中也反对美帝国主义。利用帝国主义者方面一切暴力压迫底表现，来本着革命精神发动群众，组织政治示威和罢工，力谋使这种示威和罢工扩展到工人阶级极广大的阶层，并吸引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运动，使他们脱离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底影响。反帝运动底发展，将又给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以巨大的革命影响，使它积极化。因为东三省底冲突事件，你们必须拿拥护苏联的公开口号来组织运动，揭露国民党底一切派别，“改组派”当然也在其内，使大家知道它们都是帝国主义底走狗；

戊、巩固并且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东三省，以及在毛泽东和贺龙活动的区域里。在你们党里，有人轻视农民斗争——游击战争在内——底意义；你们应当给这种倾向以致命的打击。你们应当更加注意士兵工作。要解除军阀队伍的武装和夺取他们的辎重，消灭军阀的队伍，这样来尽量武装工农队伍。要夺取军阀的区域，并在军阀所放弃的区域里巩固起来。凡是农民群众革命斗争扩大和增长的地方，都要力谋建立苏维埃策源地，在现在已经有苏维埃政权的区域里，要积极地实行没收地主土地，武装农民和建立苏维埃。要使广东、湖南、福建、湖北的工农红军底零碎斗争统一起来。要使全中国的农民群众斗争积极化，领导和加深农村的日常冲突，去反对国民党地主和军阀。党在“红枪会”这类组织和武装起义回民里的工作，应当实行一个转变。要在工人群众中加紧解释农民斗争底任务，以全力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

（五）只有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先锋队底战斗力和积极性，才能顺利地解决上面这些任务。在新条件之下，共产党底基本主要任务，是要争取革命运动底领导作用。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大体上已经纠正过来，你们现在切不要重复这种错误，而应当尽力鼓动并加紧阶级冲突，领导群众底义愤，按照阶级冲突底向前发展而提高要求，把革命斗争推进到日益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去。为要达到这些目的，你们就要把共产党底队伍团结一致和积极化，勇敢地吸收奋斗的革命无产阶级底优秀干部来充实党的队伍，要进行坚决斗争来反对离开党的总路线的那些机会主义倾向。

现在，党应比较任何时候都更加要保证自己思想上的布尔塞维主义的团结一致。党应当实行无情的斗争，来反对陈独秀底取消主义的主张，他的主张，不但否认正在增长的革命高涨，甚至于否认使这革命高涨必然到来的那些客观前提。

必须继续和加紧揭露托洛茨基主义底反革命实质，必须向大家指明，托洛茨基派底“社会主义革命”主张，实质上就是“左”倾取消派观点底补充。

党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的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可是现时党内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心理和倾向，这些心理和倾向，企图削弱反“改组派”的斗争，错误地把“改组派”看作小资产阶级底代表，轻视农民战争底意义，轻视和阻碍群众底革命毅力和主动性，减轻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底独立作用和领导作用。这些倾向，和列宁主义没有丝毫相同的地方，而是否认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底领导权，而情愿作反革命资产阶级底尾巴。共产党如果首先不在自己队伍里克服一切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那它就不能做新革命高涨底急先锋、组织者和领导者。

中国人权派的真面目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

瞿秋白

一、中国人权派的"反对"国民党和政府

中国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之下，现在有一个所谓"人权派"。这些自称为"人权运动者"的大学教授，胡适之，罗隆基等，在1929年写了好些篇文章，说了好些俏皮话，搭出了"反对政府派"的架子。那位罗隆基博士并且曾经被捕过一次，——当然立刻就保释了，——被捕而又保释之后，做了一篇"感想"，说了一大泡愤慨的话。最近，5月5日的国民会议开过了，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也颁布了——这本是1929年人权派的要求：那时胡适之说过："我们的口号是：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制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论理，人权派可以满足了。中国的人权运动大功告成了！然而不然。国民党的这种滑稽到万分的约法，太欺骗不了人民——人权派是知道的，因此，他们又发了一次传单表示反对那个约法。总之，他们的"反对政府派"（Copposition）的架子，还没有拆掉。

现在中国的政治是异乎寻常的黑暗，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异乎寻常的露骨，民众一点儿自由也没有，一点儿"人权"也没有，有的只是挨打挨杀的"权利"，和饿死冻死淹死烧死……的"自由"。地主资本家自己，在国际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自然而然的，必然的分成许多种式的集团派别互相竞争和抢夺，演成军阀混战。工人阶级，农民群众和一切劳动民众，正在不断的反对和斗争；那不统一的散乱的中国地主资本家的阶级统治，正在肢肢节节的瓦解，这里许多脆弱的地方就已经拆了台——豪绅地主资本家的统治推翻了，政权到了当地工农群众的代表会（苏维埃）手里。总之，目前的形势对于整个的帝国主义和中国统治阶级，实在是太没有乐观的根据，因此，不但民众方面，一般的反抗情绪天天在那里高涨，不但小资产阶级的份子正在走头无路的徘徊动摇，不满意，就是剥削阶级内部也就有很多的裂痕，互相的埋怨着，你说我是"赤祸"的罪魁，我说你是造灾的能手。一般的景象，是个剥削阶级手忙脚乱的样子。于是"人权派"的一些敲边鼓的议论和俏皮的文章，自然会有点儿的销路。甚至于情绪是革命的一些人，读了人权派骂政府的话，也觉得痛快，俏皮。

因此我们得问一问："人权派为什么反对政府和国民党呢？"

二、“反革命大竞赛”之中人权派的新鲜旗帜

中国人权派反对国民党和政府的原因，说起来很有趣，——是为着国民党不会反共，是为着国民党反共还不彻底，是为着国民党快要不能够保障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了。中国的人权派表面上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实际上却并不是反对什么国民党，并不是反对什么压迫和剥削，而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压迫剥削的不得法——这是人权派的真面目。最近（“新月”杂志第3卷第10期），罗隆基发表了一篇大文，叫做“论中国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这篇文章就把人权派的真面目完完全全的暴露出来了。

罗大人（Sir Lo Longki）不是被捕过么？人权派胡适之等等不是被国民党政府“警诫”过么？他这篇文章难道是为着要表明态度刷洗自己的“共产嫌疑”而做的？不是！不是！假使我们这样说，未免太小看了罗大人们了。这有他们人权派的政治良心——阶级良心使他们做的。他们的反对共产并不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他们的反对工农民众是他们的阶级立场。

中国自从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工农民众的革命运动不久又开始发展，到现在苏维埃区域的发现，扩大，红军的进展……共产党影响的日益增高，在一般的经济危机深入的背景之上，实在使整个的统治阶级感觉到死亡的危机一天天的接近。于是乎剥削阶级的内部发现日益紧张的“反革命竞赛”。

“反革命竞赛”是什么？就是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之中的每一个集团，每一个派别，每一批走狗，都争先恐后的表示只有他自己才是反对共产消灭“赤祸”的能手，都在力竭声嘶拔剑张弩的声讨其他各派“勾结”“帮助”“引起”共产的罪名。对付共产本领，早已成为谁应当统治的最主要的考试题目。一切种种反革命派在对付共产的问题上进行着极热闹的大竞赛：

孙传芳吴佩孚张作霖张宗昌等都曾经声明他们是反赤最早。

西山会议派几乎要说他们“自始即反对国民党之改组”，“首揭国民党的反共旗帜”。

蒋介石戴季陶派说，没有我们的3月20政变和4月12上海的屠杀，国民党早已断送于共产党之手。

汪精卫张发奎派说，镇压广州暴动之功应归我有，而且现在再改组国民党，实行“民主主义势力”的大集中，方能根本消灭共产。

邓演达谭平山派说，我们反对第三国际干涉中国和束缚中国革命，同时抛弃已经不是欺人的国民党旗帜，而树立第三个“民众”的政党，共产自会消灭于无形。

托洛斯基陈独秀派实际也是说，列宁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已在深入民众，故必须假借“列宁马克思主义”之名，来反对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然后共产才会真正消灭。

这个热闹的反革命大竞赛里面，每一派都开出一张药方来，当做消灭共产的万应灵药。现在人权派的罗隆基大人，就把他们的药方整理起来清清楚楚的写了一篇文章。自然，人权派的这些药名早就已经说过，现在不过是综合起来罢了。因此人权派参加反革命大竞赛的旗帜也就格外鲜明了。

三、人权派替地主资本家想着的“出路”

中国人权派对于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和其他的剥削阶级的一切派别一样，抱着非常之悲观的态度。他们说：经济上……“兵事愈多，人民愈穷，人民愈穷，土匪愈起，土匪愈起，社会愈乱，社会愈乱，人民更穷……毕竟，穷乱，乱穷，……直到真正破产而止”，政治上……“已成的政府，不克维持，无形的政府，遍地林立，国家不求崩溃，亦必崩溃……稍有资望……的人民……杀戮逃亡，几已近尽。剩下一般市侩流氓，他们政见上朝秦暮楚，政绩上行险侥幸。……地方政治愈恶化，人民愈纷扰．毕竟政治上……立刻真正亡国而止”。“总之，国共相持的结果，在我们看来，亦有：（1）经济上的破产，（2）政治上的亡国”。这都是说“假使共产党继续蔓延下去，既不能完全成功，又不能立刻消灭”的话。如果假定共产党能够成功，“成为支配政局的势力”，那又怎么样呢？据他的意思，“中国工农只能够打倒中国的资本家，而外国的资本家，可否动其毫末，是又成为大问题”，他以为“英美法日的共产革命未成功以前”，中国工农只能够在内地得到胜利，在大商埠上洋人要来共管。所以“结果，中国的内部，流氓共产；中国的商埠，洋人共管”。“洋人共管，流氓共产”这是共产党胜利后的局面，照他看来，自然这亦是破产亡国。再假定蒋介石讨共胜利，肃清了“红匪”，那时又怎么样？他说：“尽管讨共军得到胜利，湘鄂赣彻底肃清，然而余毒未尽，病根仍存，共产党在中国，总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样：（1）如果共产党的苏维埃运动继续蔓延，又不能成功，结果是“破产亡国”，（2）如果共产党的苏维埃运动“居然”成功，结果是“洋人共管，流氓共产”，（3）如果共产党的苏维埃运动“幸而”彻底肃清，结果，这仅仅是暂时的，始终又要有“共产”发生——仍旧是老套。可怜啊可怜，中国的绅士，中国的资本家，中国的一切大人老爷，竟这样的命苦吗？

罗大人说：——不要紧，不要紧，我有绝妙的方法。这个救命方法是什么？——就是第一，“在今日中国的状况下，为中国人求生路计，自然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谚所谓‘两恶相权取其轻’即此意耳。然而国民党剿共工作的成败，有待于他们的策略。”因此，必须有第二个方法，就是：“（1）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2）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这两点做到了……共产党不剿自灭了”。

这里，罗大人自己说的清楚得很，不用代他再加说明：——人权派的所谓人权，其最主要的用处是在消灭共产。人权派的立场，整个儿就是忠告国民党说：要替帝国主义及中国地主资本家消灭共产，就必须择取我们人权派的主张；我们人权派主张的“自由”决不是要平民群众自己得到什么自由，我们人权派所主张的“自治”也决不是什么真正的平民群众的民权主义，这“自由”和“自治”都不过是豪绅资产阶级压迫剥削工农的更有效力的工具——比国民党的统治来得更加有效力！这就是人权派在反革命大竞赛之中的旗帜。

谢谢你，罗大人！谢谢你们，人权派！你把“自由”和“自治”的真面目这样显露的标明出来，我们工农群众真是少吃几碗迷魂汤，不胜感激之至！

可是，中国国民党对于这些人权派，却不给他们以充分的发展可能。人权派这样忠

心耿耿的替国民党上条陈，出计策，替地主资本家想出“剿灭共产”的办法，而国民党对他们，还是没有好脸色给他们看，所以人权派要大呼小叫，痛哭流涕长叹息的说经济上破产，政治上亡国……这真是“孤臣孽子”的“椎心泣血”。所以大家不要听见他们说什么“思想压迫，民情堵滞，走头无路的时候，发生与尔偕亡同归一尽之想”，就以为人权派怎么大胆的用革命来恐吓国民党。不是的，不是的。人权派是决不革命，誓死以反革命，而且是自命为最会反革命，真正能够消灭革命的专家呢！

四、人权派赞助屠杀的“聪明”方法

总之，中国人权派的立场，根本上是和国民党完全相同的。他们的所以反对国民党和政府，原来是只因为“国民党采用共产党的制度”。他们说：“如今国民党的组织，他的党治的策略，他的由党而产生出来的政府，那一项，不是师法共产党，抄袭共产党，整个的模仿共产党？”所以如果国民党放弃这些“师法”共产党的地方，人权派一定不但不反对他，而且要竭力拥护他。人权派的所以反对国民党，决不是因为国民党的政治是代表地主资本家的帝国主义走狗的政治，决不是因为国民党的政治是压迫和剥削工农民众的政治，而只是因为国民党的“采用共产党制度”。

究竟国民党的党治是不是采用共产党制度，我们以下再说。

这里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人权派和国民党的分别，决不是根本的政治立场上的分别，而只是他们自己所说的策略上的分别。什么策略呢？他们自己也已经说得很清清楚楚，就是“剿共工作……的策略”。

那么，这策略上的分别，是否是国民党主张用屠杀方法，人权派反对用屠杀方法呢？决不是的！国民党主张用屠杀方法，人权派亦馨香而祷祝屠杀的成功——罗大人的文章里有这么一段：

> “五十师大兵，五十万人马，主席出征，总长临敌，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国民党对剿共，总算慎重其事了”。

这几句文章，已经是对仗工整，声调铿锵，值得摇头晃尾的高声朗诵几遍，以表示人权派颂扬国民党的大杀人大放火大大摧残蹂躏真正的自由和民治的情调。何况罗大人还直说“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因此，我们断定人权派绝对不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绝对赞成国民党的枪炮，飞机，炸弹，瓦斯等等……的一切杀人方法，认为这些不但不违背“自由”和“民治”，而且还有所不及。人权派的反对国民党是反对他除屠杀政策之外，不会更精细的进行反革命的欺蒙人民的宣传政策。所以人权派和国民党的分别，所谓策略上的分别，只在于这一点。“分别”是有些“分别”，可是这个“分别”正是忠心耿耿的人权派，不辞劳怨，不避艰险的对于国民党的直谏，这正是人权派努力帮助国民党屠杀民众的地方！

五、人权派所有的一些儿有限的常识

在有些问题上看来，中国人权派的确比中国国民党要聪明些，的确比国民党要有常识些，固然这点小聪明和小常识是有限的。比如，人权派对于共产党的力量和在群众之

间的影响，就有点儿小识见。

国民党和一般肥头胖脑的豪绅，常常说“中国无产可共”，而人权派知道这是没有常识的蠢话。人权派知道“共产党所主张的是根本打破私有财产制，是生产工具公有。中国虽穷，私有财产制存在一天，生产工具私有制存在一天，土地私有一天……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有发展的可能”！因此，人权派警告国民党和豪绅资产阶级，教他们□□□□①欺人，糊里糊涂的说什么“无产可共”的宽慰的话，教他们不要放心大胆，而□□□②起来，更聪明些更精细些进行更彻底的反共斗争。

国民党只知道造谣诬蔑说共产党杀人放火，说什么在苏维埃区域已经“实行共产”，人权派可知道这也是糊涂昏蛋自己给自己当上的蠢话。人权派知道：国民党“专制的中国，的确‘有权可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策略上很可利用的民众心理，这或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可以成功的理由！”这里，人权派了解现在的苏维埃运动，的确是中国统治阶级的很大的危险。苏维埃运动是工农群众自己起来拿到政权，这是工农民众要解除压迫和剥削的政治斗争，这是大多数“民众心理”——政治觉悟上的领导方针。国民党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放任民众心理的“共产化”，懂得要为苏维埃而斗争——为着工人农民兵士以及城市贫民自己选出代表来组织自己的政府而斗争，那么，这是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最大危险。无论你用多么怪诞的“共匪杀人放火，挖心肝，吃肚肠……”等等的笨宣传，也吓不退民众的“苏维埃化”。因此，人权派为国民党着想，为豪神地主资产阶级着想，提醒这一点，劝他们早些实行所谓“自由”和“民治”，挽回这种“民众心理”的发展，还可以实际上更巩固的保障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保障帝国主义的对华统治。

六、人权派用“共产嫌疑”恐吓国民党

人权派反对国民党的党治，不过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过是因为要挽回中国地主资本家统治的崩溃，不过是因要消灭工农革命。

所以人权派眼光里的国民党罪状，只是：“（1）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孙文说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2）国民党采用共产党的制度（孙文的‘以党治国’）；（3）国民党协助共产党实际工作（党衙门威权愈高，党主义威权愈低，党老爷声望愈大，党主义声望愈小。天怒人怨，众叛亲离，时日曷丧，及尔偕亡，在这分际，共产党利用人民心理，利用国民党弱点，乘机以进了）”。

这行议论，在豪绅地主资本家看来，或者也可以算人权派在反革命大竞赛之中可以博得锦标的手段。可是，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值一笑。中国现在有好些地主资本家看见国民党不能够保障他们的利益和统治，看见国民党的反革命势力一天天的动摇，的确会这样抱怨国民党。这就是人权派的阶级背景。但是，在工农民众看来，罗大人的这种议论，不过是更加暴露人权派苦心孤诣的替国民党出计策保障国民党主义的威权和声望，更加暴露人权派苦心孤诣的替地主资本家出主意保障他们的统治罢了。

我们已经说过：人权派的小聪明和小常识也只有限。这里就已经看得出来了。孙文

---

①② 原文缺字。——编者。

说民生主义又名共产主义。这正是孙文的老奸巨猾。他想偷天换日的把共产主义换成一个不痛不痒的孔孟仁政的民生主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和孙文的民生主义，就没有一点相同的地方。罗大人说因为国民党的主义有这样的解释，所以播下现在“共祸”的种子。这真是罗大人老爷式的见解。事实上，工农民众只有了解一分国民党的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剥削主义，他们才有一分革命。凡是现在热烈参加革命斗争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这样。

再则，罗大人说，国民党的“以党治国”是学共产党的榜样，这尤其是天大的笑话。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冒充着模仿俄国，也是孙文蒋介石的狡猾。民众的羡慕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真正得到解放，这种觉悟十年以来一天天的增长，使得国民党很早就抢着说：我们国民党也学俄国办法，他们想这样欺骗民众。其实，共产党绝对不主张以党治国！俄国的苏维埃政府是各级苏维埃选举出来，从市区和村镇一直到中央政府，都是工人农民——总之，一切不剥削别人劳动的人民，真正普遍的参加选举而选出来的。绝对没有党的机关指定政府的事！

至于说国民党帮助共产党的实际工作，那么，这是罗大人们真正痛心疾首的事！国民党的政治是太不巧妙了，一天天的更加激起工农的革命。可是，这是历史的必然，没有办法，国民党的腐化政治，只有苏维埃革命能够推翻它。

共产党的党员，在俄国不但没有任何的特权，而且多负很多的义务，并且多加一重党所给他的责任。举一件极小的事来说：俄国一切非共产党员，不论是政府机关或其他社会团体的职员，可以拿到的薪水，是不受什么限制的；党员，就有一种“党员的最高限度”——以前是250卢布，现在是300卢布。所以党员无论兼职有多少，至多只有这一点收入，即“升官”也无从发财的。这为什么可能呢？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每一个党员都是为着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工作，无产阶级是为着全人类的利益——创造将来的无阶级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而斗争。而国民党的党员，在中国却是老爷，是大人，可以是封建诸侯，也可以是市井流氓，可以是资本家，也可以是资本家的走狗。国民党的党员替天行道——替帝国主义和豪绅资本家执行政权，一方面压迫工农，别方面表演帝国主义豪绅资本家之间的互相争夺——互相争夺在工农身上榨出来的血汗。这些阶级，中国的豪绅地主资本家，在历史的道路上已经一天天的走近他们的死期，所以自然而然只有这些狼吞虎噬奸淫掳掠贪污卑鄙的代表——国民党党员。所以国民党，为着要保证豪绅资本家之中的某一些集团榨取工农血汗的特权，只能够实行所谓“以党治国”。谁借假得着国民党机关和政府机关的名义，谁就可以多剥削一些；谁借假不着，谁就只能够少剥削一些。这是“以党治国”的真诠。

罗大人，如果你愿意知道为什么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会发生在中国，我还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理由。这就是你自己说的中国的“贫穷”。换句话说，就是中国豪绅资本家的“贫穷”。他们愈“穷”，就愈要互相争夺，愈要互相争夺，就愈要凭借所谓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他们没有英美资本主义初兴时代的余裕，“可以规规矩矩”的在“自由”的市场上实行“自由贸易”的竞争，可以在国会式的“老牌民治主义”的政治舞台上实行“自由政见”的竞争。

因此，你罗大人的苦心，永世也行不通。你罗大人罗博士，很迷信英美国的宪政学说——不流血的带着白手套的人权运动。可惜你罗博士投胎投晚了二三百年，又投错了

三四万里！你现在在中国来用“共产嫌疑”恐吓国民党，要他放弃党治，实行你的所谓“民治”，也不中用了。

七、人权派用“共产足以召共管”来吓人

中国现在的政治经济状况，很明显的表示着一种趋势，就是：如果苏维埃运动暂时不能够成功，那么，中国只有日益殖民地化——亡国破产，而只有苏维埃运动的胜利能够救中国，只有苏维埃运动战胜国民党，消灭国民党的统治，消灭一切种种形式的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独裁，而建立工农民权的独裁，才能够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压迫统治之下解放出来。苏维埃运动，就是把全国的政权交给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从市区和村镇起，由当地的工人农民，红兵，其他不剥削别人劳动的人，不论男女，一概绝对平等的参加选举，选举出来的代表会议就是当地的政府，这些市区、村镇、城市、省份的各级苏维埃，再选出代表来，召集全中国苏维埃的代表大会，就是全国最高的主权机关，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是中央政府。只有政权完全归在这种苏维埃手里，只有这种真正工农民众的政权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土地，没收外国资本家的一切企业，实行真正保护劳动的工厂法，劳动法——八小时工作制等等，并且严厉处置怠工破坏生产的中国资本家，一直到没收他们的企业……只有这样，方才能够把中国从经济危机和破产之中救出来。地主资本家在中国现在也闹“穷”，可是“穷”的只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日益破产的一些地主资本家。他们虽然“穷”，自然还有因为他们的“穷”而大大发财的少数大地主大资本家、大军阀、大官僚、大“党老爷”。他们虽然“穷”，他们还是要剥削工农，而且他们愈是“穷”，他们愈加要加重剥削工农。工农对于他们不能够比对于大地主大资本家有什么特别优待。所以他们的地位是十分“为难”。所以你们这班“穷”的地主资本家要想早些“脱离苦海”，只能够等着“永生西天极乐世界”！总之，只有消灭中国的封建余孽，消灭中国的土地私有，引导中国走上消灭资本主义的道路，才能够解决中国的经济危机。

罗大人怀疑着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能够“动摇外国在华资本家的毫末”。中国的工人阶级现在领导着农民战争，将来工人阶级在城市的大暴动，他的胜利的发展必然要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什么领事裁判权等等，必然要没收外国资本家的企业和银行。这是没有疑问的。罗大人毕竟是绅士，常识有也有限，他自然很怀疑中国工农有这样大的力量。他这种人根本也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但是我们只要举一件历史上的事实：汉口的英租界怎么收回的呢？这不是什么陈友仁的革命外交。这是武汉工人的群众力量，这是当时南部中国几千万农民革命斗争的力量。这还是在四不象的国民党左派政权时期。将来苏维埃的武汉，苏维埃的上海，那更不必说，帝国主义的力量固然是非常之雄厚，飞机大炮比现在国民党的军队自然还要强十倍百倍。但是，中国几万万劳动民众的真正动员一定可以战胜他们。中国的革命不用等待英日法美国内无产阶级先行革命；中国的革命民众至少也可以直接在帝国主义到中国来的军队里面发生革命的影响。俄国苏维埃政府初初成立的几年，有过十八路的战线，抵挡过英美法日波兰等等几乎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国家。那时，英美法日等国的革命也没有起来。可是，俄国苏维埃政府始终战胜了这些外国的反革命进攻，以及国内的白党。为什么？因为有真正群众的力量。何况

中国最近的革命，正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欧战后的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已经大大的动摇的时候，各国的革命运动，——无产阶级的革命势力至少可以对于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国革命加以牵制。

罗大人当然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这些，他这是以“共产适足以召共管”来吓人。前清时候的保皇党，如梁启超之流，早就用过“共和适足以召瓜分”的话吓过人。这些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的大人先生，企图预防革命消灭革命的手段，也只有这一点儿。罗大人始终没有在梁启超的伎俩之外，想出什么多大的新鲜花样。

八、人权派原来也用“流氓土匪”的口实反对真正的民权

再则，罗大人不但反对共产党的“党治”，而且以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才和干部人才根本不能掌握政权。共产党绝对反对所谓党治，这我们已经在上文说过。至于领袖人才和干部人才的问题，也不象罗大人所说的那么简传。苏维埃的制度之下，共产党将要是政治人才的学校，许多工人和劳动者能够得到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训练，在斗争的过程之中学习管理国家的能力。大人先生们自然是看轻工农，以为他们之中不能够有什么领袖人才和干部人才。可是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及中国苏维埃区域现在已有的一些儿小小的经验，已经完全打破了大人先生们的成见。1914——15年以前，俄国的绅士和资本家，梦里也没有想到现在俄国工人之中会产生这许多的人才。那时，除掉“地底下的”党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列宁等等。就是到了1917——18年，还有许多白党天天咒骂布尔什维克这些德国侦探，刑事犯，流氓，无赖，……说他们的政权至多只有六星期。但是事实是怎么样呢？！

自然，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就是罗大人的所谓人才，所谓领袖，所谓干部，另是一种解释。他自然只有绅士的眼光。他说：“目前共产党所谓的干部人才，大部份是中小学的青年男女学生……共产党的所谓下级人员，公开的说，大部份是市井的流氓，乡村的土匪。”罗大人自己首先向国民党提出警告说：“我们绝对不这样轻视中国共产党，认一切相信共产的人，都是杀人放火的土匪。”这是他对国民党的忠心，教国民党不要轻敌。但是，他说了几句之后，仍旧是“流氓土匪”的滥调。在大人先生的眼光里面，下等人的工农兵士，究竟那一个不是流氓土匪呢？！我们知道罗大人是个西洋留学的博士，博学多能，不至于抄袭人家的文章。但是，有一件凑巧得很的事实：俄国二月革命之后有一军官说过一篇话，简直象罗大人这种议论的俄文译本，我现在也不必再把他“重新”译成中国文。我们很知道罗大人不致于抄袭成文，同时，我们也很知道罗大人的阶级立场使他自然而然的说出和俄国白党军官同样的词句。

总之，主张“民治”的罗大人，等到碰见真正大多数人的民权主义，劳动民众的民权主义，镇压豪绅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民权主义，他就自然而然的说：这是流氓土匪的“快刀砍头快枪杀人”。他不愿意知道：现在建设着社会主义的苏联，现在五年计划的成绩震惊着全世界的苏联，当初正是他所称谓“流氓土匪”的人才创立起来的。罗大人，请你看看苏联当初的“中小学生，流氓土匪”现在干的是什么样的建设事业，至少要比你们这班博士教授们高明几千万倍呢？！

九、人权派的理想原来如此！

那么，罗大人的所谓“民治”究竟是什么样的民治呢？

这种“民治”是为着铲共的利益的——这在上文已经说过。详细点来说明，就是：

（1）可以保持国民党的皇位——罗大人说“英国的公园里，人民可以公开讲演打倒君主，直到如今，乔治第五依然是皇帝”，所以，照此推论下去，就是如果国民党准许所谓“思想自由”，这正可以使国民党经过二百年“依然还是皇帝”。

（2）可以使共产主义自行退落——罗大人说：“十九世纪中叶及末年，英国的共产运动，也确有端倪！？后来费宾学会这班学者们出来……创造所谓费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行退落。我们觉得这种剿共铲共的策略是最根本最聪明最敏捷的方法。”

（3）可以取消民众争取政权的“口实”——罗大人说，国民党一党专政，所以人民要求政权，所谓“有权可分”，如果说是“民治”——取消一党专政，就可以说，一切民众都有政权了，不用争取苏维埃政权，这更加巩固了“国民党反共的立场”，消灭“共产党的口实”。

（4）可以增加“人民”积极加入铲共的机会——罗大人说，现在“一班党外的反共人民，热心的束手无策，悲观的坐以待毙”，如果说是“民治”，所谓“人民”——豪绅资本家一定还要更加积极，组织团体，大大的参加铲共。

（5）可以团结“人民”拥护国民党的胜利——罗大人说：如今“人民不希望共产党的成功，他们却切望国民党的失败”。为什么？因为是党治。如果取消党治，“人民”不至于切望国民党的失败了，就不期待国民党以外的另外一个同是地主资本家的势力来铲共了，而能够团结在国民党的周围，切望并且帮国民党铲共成功了！

（6）可以巩固地主资本家的统治——罗大人说，“党治”独裁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趋叛离，这就是如今共产党发展的机会”。如果取消党治，把现在的地主资本家统治改良改良，就可以使它稳定而巩固了！

请看，罗大人说得多么清楚：每一条都是替国民党打算，为国民党设想。罗大人的所谓“自由”和“民治”的目的是在保持国民党——帝国主义走狗地主资本家的统治。这种“民治”和自由的内容也就可想而知的了。这不过是英美式的宪政，国会制度。照罗大人的口气，美国是一个理想的国家了：“美国是比较富足的国家，人民平均的财力，比任何国家的人民更高。共产党在美国发展机会，比任何国家更小”。人权派的大人先生们甚至于说美国差不多每家都有汽车（见“新月”杂志某期）。

这真是海外奇谈了。美国“人民”平均的财力，比任何国家更高；美国人民的自由比任何国家更大？政治上美国的“平等自由”，我们只要看一看辛克莱哥尔德的小说就可以知道了：美国工人过的是何等惨酷的生活，何等的不自由，何等的不平等！这些文学家是美国人，他们知道美国社会的深切，至少比中国人权派的几个美国留学生胜过一千倍。美国家家都有汽车的海外奇谈，只好去骗小孩子！

同时，我们知道目前的世界经济的事实：全世界经济恐慌日益发展，而苏联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有长足的进步。苏联不但没有一个失业工人，而且感觉到工人的缺少，而美国最近的官场报告，尚且说美国有七百万的失业工人，加上没有登记的失业工人，只做

半工的失业工人，季候工人的失业工人，总数至少在一千万以上！这些失业工人的生活是困苦到极点。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所谓最理想的"民治自由"国家的成绩是怎样，而苏维埃国家的成绩又是怎样！

人权派的大人先生们，你们的"理想"不过如此！你们的理想，充其量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民治"——国会制度，带上一层民选的假面具的资产阶级独裁，更聪明更敏捷的剥削劳动者的政治制度。你们现在的实际作用，只是帮助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忠告国民党在屠杀之后还必须实行"民治""自由"的欺骗。你们还嫌国民党摧残工农的自由，剥夺工农民众的人权，太不彻底！你们说："青年思想的左倾，红色刊物的增加，学校做共产领袖的训练所，书店做共产思想的件介，这是政府的飞机炸弹手枪快炮所不能动摇其毫末的"。言外之意，实在是不胜惋惜之至。所以要你们这些所谓"反共政府派"大呼小叫鞠躬尽粹的上这么一大套"剿共铲共最根本最聪明最敏捷的方法"的条陈！人权派的真面目实在暴露得清清楚楚的了。因此实行无情的反人权派的斗争，应该是中国工农革命民众在整个苏维埃革命运动中重要任务之一。

（原载《布尔塞维克》4卷6期，1931年11月10日出版）

〔附〕党的改组原则（摘录）

（一九二八年七月八日）

陈 公 博

自从我们提倡出党的改组主张以后，一时引起党内外关心国民革命人们的注意。截止今日接到各地的来函已有二百余通，虽然他们提出的要求各不相同，而赞同改组的主张则一。现在我敢相信党内一般老同志，如果肯平心静气，稍稍观察今日党所具备的条件，也知非替党找一条出路不可。不过以为"改组"恐怕作始也巨，倒不如说"整理"似乎顺理成章。目前我且撇去名词上的争持，先归纳这二百余通函件所提的原则。这二百余通函件里面，在本国远至甘肃，在国外远至澳洲，若以区域计算大概一百余通都发自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各党部，这是值得我们十三分注意的。

（一）信 条

1. 相信总理的全部遗教是我们一切思想行动的标准。

2. 相信以民生史观解释三民主义是最正确的解释，反对唯心派及其他似是而非的解释。

3. 相信三民主义是指导革命之最高原则。
4. 相信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必须与经济革命相辅而行。
5. 相信实现民生主义是国民革命的最后目的。

（二）对于党的主张

1. 要求党的改组。
2. 巩固党的农工基础，确定农工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
3. 提高党的权威，实行党的专政 。
4. 促现党的民主化青年化，反对干部少数人的独裁。
5. 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
6. 扫除个人主义，地方主义，与家族主义，及一切封建思想。
7. 反对一切旧礼教和宗教迷信。
8. 建设三民主义的民族国际：
   甲 团结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促成民族自决的实现，先积极谋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
   乙 反对第三国际的东方政策。
   丙 联合帝国主义国内之被压迫阶级。

（三）对于目前政治的主张

1. 促成本党一切对内对外政纲之实现。
2. 实行三民主义的法治。
3. 扫除政府机关中之一切昏庸老朽及投机分子。
4. 取消政治分会制度。
5. 肃清割据军阀。
6. 实施革命的民权，防止资产阶级操纵政权，扫除土豪劣绅及一切封建势力。
7. 厉行县自治，完成训政工作。
8. 要求军政民政财政之统一。
9. 厉行裁兵，实行全国民兵制度。
10. 反对现役军人兼任省政府主席。
11. 非党员不能充任政务官。
12. 厉行考试制度。
13. 设立监察院，造成廉洁政府，严惩贪官污吏。
14. 确立革命的外交政策：
    甲 积极反对英日帝国主义。
    乙 在不损害国家主权范围之内，与各国建立邦交。
    丙 于相当时期，有条件的与苏俄恢复邦交。
15. 厉行儿童义务教育，成人补习教育，及乡村教育。

16. 设立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

17. 建设国家资本，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

（四）对于各派之态度

1. 对于第三国际之态度：

   甲 暴露其指使中国共产党破坏中国国民革命之罪恶。

   乙 指摘其东方政策之错误：

   A 不当联日。

   B 不当阻碍朝鲜革命。

   C 不当援助日本在满蒙之侵略。

2. 对于中国共产党之态度：

   甲 对其团体尽量反对，并严厉制止其活动。

   乙 对其主义与政策尽量指摘与批评。

   丙 对其分子，在可能范围内，予以自新，使其脱离共产党之组织。

3. 对于第三党之态度：

   甲 根本反对第三党之存在。

   乙 批评其与本党不相容之主张。

   丙 诱善其觉悟的分子。

4. 对于西山会议派之态度：

   甲 坚决反对其整个派系。

   乙 掖进其有革命性的分子。

   丙 纠正其思想与行动之错误。

5. 对于无政府主义派之态度：

   甲 防止其混淆本党的理论。

   乙 制止其混入本党活动。

6. 对于国家主义派，安福系，研究系，交通系，政学会等反革命组织之态度：

   甲 暴露其反革命的罪恶。

   乙 纠正其理论的错误。

   丙 严厉防止混入本党之活动。

…………

（原载《革命评论》10期，1928年7月8日出版）

〔附〕党的改组方法和时期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日）

陈　公　博

自从我们提出党的改组问题以来，截至今日（8月27日）收到各地同志赞同这个主张的信已达三千二百五十二通，这个主张今日已成了普遍的要求，同志间对党已有了深切的认识，而改组的人们也已形成强固的壁垒了。可是同志当中最急切而要问的是改组的方法和时期，我在未曾讨论这两个问题以前，再简单的述述我为什么主张党的改组经过。

17年7月15日我们在武汉分共之后，25日我在汉口中央党部作政治报告时，即提出党的改组主张，10月10日我在广州写那篇“为反对特别委员会敬告各同志书”也提出党的改组主张，及汪精卫先生由奥来沪出席四中预会时我也提过党的改组主张。我为什么有这个主张？因要党真能领导国民革命，真要党重新团结，除了党的改组别无他路可走。

（一）理论的建设　我们党内不是已有了总理的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已经明明白白的诏示我们吗？为什么还要理论的建设？不错，总理已在遗嘱告诉我们，应当本着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贯彻他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可是自共产党加入本党以后，第一国民革命的涵义怎样，普遍党员已经被几年内的共派宣传和反共派宣传，弄得模糊不清，第二国民党的政策虽有对内和对外政纲，但自15年联席会议以后，突然有所谓三大政策。恰象除了这三大政策以外，国民党更无政策。第三国民革命的方法，因区域的扩大而愈迷其正途，在老同志思想以为只有军事发展，即国民革命的成功。在共产派思想以为指导群众破坏，即收中国革命的大效。第四国民党的基础部队到底谁属，已成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在狃于18世纪革命经验者，以为国民党应尽量容纳资产阶级于整个革命中，而中于第三国际的宣传者，以为只有大倡阶级斗争才使革命合于进化的正则。其次则所谓走“非资本主义的路”，非资本主义的路究竟有几条？在逻辑上只有“白与非白”可通。若说“非白就是黑”决非逻辑的律令所许。在“非白”的涵义分析，色素就非常多，以此而例于“非资本主义”，都不能不就其内籀充以充实的意义，又其次则造成“三民主义国家”的步骤究竟有几阶段？是不是采国家干涉政策促其形成，抑或采自由政策徒尸三民主义的虚号？凡此种种，在今日的过去，一面只见共产派拿了苏维埃的政策代了三民主义，而一面又只见空虚派（这一派实在没有主见只好谥以空虚派）拿了修正资本主义代了三民主义，理论愈辩而愈模糊，政策愈摇动而愈空幻，如果非重新建设一种理论，必无以巩固党基，更非在统一理论之下，将党重新改组，必不能领导整个的中国国民革命。

（二）组织的建设　过去的国民党，可以说本身绝没有组织。中央虽然有组织部，

各省虽然有组织部，而所谓组织就等于零。我自始就说，过去的党务，下层党部对于上层党部缺乏批评，上层党部对于下层党部缺乏指导，从横方面看失了民主的精神，从纵方面看，养成独裁的结果。然此仅就抽象来说，若就具体来说，在分共以前，无论何省党务，共派组织都做了党的核心，在分共以后，只有小组织，操持了党务。今日我们虽诟病于小组织之形成，但衷考来源，在分共以前，本党即乏本身组织。为对抗共派之活动，小组织的成立，出于行动的自然（其实即不采对抗行动，党员见进于共派的，也自然形成一种壁垒。）在分共以后，本党又无统一政策，党员就其各个活动之所趋，小组织只有增加，绝难减少，若欲打破一切一切的小组织，除了党的改组，其道末由，此其一。

民众组织为国民党的基础，而民众运动尤为国民党的命脉，但今后民众运动的方式是否即为昔日的民众运动的方式？诚为一绝大问题。我们若更象共派之率民众破坏，国民革命必因无法收拾而夭折告终，若我们率民众而从事建设，势非另定新的趋向不可，然而于此而有一个切要问题，即民众运动干部之养成。如何始能重新确定民众运动的方针，如何始能养成民众运动的干部，非经一次党的改组，不是重新蹈民众盲动之复辙，必流入警察民众的嫌疑，此其二。

今日党的破碎，中间虽偶因理论之不同，然大部多流于意气的争执。一中客气，即曲解主义以护其所私，每因人的问题，不惜故反真理以文其所短。派别一立，融解更难，从前加入共产党的，我相信仍是相信国民革命者多，相信共产革命者少，但清共问题一起，脱党大感困难。从前加入西山会议派的，我相信仅感于共派之压迫，中心未尝不知脱离党部之不当，但既成一派，虽在全党清共以后，犹不能不独树一帜，甘心与党为敌。人们既各个有其本身历史。今日难唱党之团结，互防之意，终未相忘。要把各人的意气，一笔勾消，湔过去的错误，忘已往的历史，生出新的互信，结起党的大团，除了重新确定纲领而为党的改组以外，更无其他方法，此其三。

（三）国际的建设 中国国民革命，决不能与国际无关。一国的生存，尤不能脱离国际而独立。目前形成有力的国际的，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国际联盟，一个是共产主义的第三国际，资本主义的国际既压迫中国国民革命，而共产主义的国际又扰乱中国国民革命，则中国欲保革命的成功而使革命不至中堕，惟有组织三民主义的国际，另在东方形成被压迫民族集团的壁垒。而且我们更要进一步推想，资本主义的国际若在东方稳定，三民主义必无以自存，共产主义的国际若在东方发展，三民主义亦从此失败。而且我更相信，经济最发展的国，如果革命，必不会形成苏俄式的国家，经济最落后的国，如果革命，也不会形成苏俄式的国家（此理由待另为文论之），尤其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更不会形成苏俄式的国家。根据东方的民族性，客观的条件，被压迫民族的环境，都非火速建筑一个东方国际不可。但当这破碎支离的现象，新的国际，自难形成，纵使形成，也乏领导。我们为要保障中国的革命，领导东方民族的革命，所以要建一个东方国际。但要建筑一个新的国际，就非先从党的改组不行。

（四）社会的建设 今日我们所需的是建设，而非破坏。但要建设，不止有建设的计划，建设的人材，还要有建设的意识。我们没有建设计划吗？现成摆着总理的实业计划。我们没有建设人材吗？现成摆着许多在国外国内训练过的工程师。现在为什么弄得一塌糊涂！实在缺乏了社会建设的意识。我们姑摆开经济建设不说，言论建设就找不出

一个端绪出来。现在各地刊物，何止千数百种，但我只见消极的破坏言论，找不到积极的建设言论。只批评人的行动不对。总不提出我的办法是怎样。只就这一端观察，中国社会建设意识的贫弱，已暴露无余，想由破坏意识转移到建设意识，必须由党重新确定一个方针，重新训练一般党员以深刻的建设意识。目前破碎的党能负这个责吗？党的改组是引导这种建设意识一条坦途。

改组的原则和意义，我们已在本刊屡次言之而重言之，今日因讨论改组的方法和时期，所以再附带说说鼓倡改组的经过。

（一）改组的方法 目前党的改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中央革命干部的团结，一个是下层革命干部的团结。什么是中央革命干部的团结？就是目前中央的同志觉得党非谋一条出路不可的，都团结起来，准备改组的大纲，确定统一的理论。但只是中央革命干部的团结还不够，缺乏了下层革命干部，还是空谈。现在没有下层干部，无论谁提出改组，结果只有多发几张登记表，在每一格内填言不由衷的答词。问一问党员和党有什么密切关系，仍是扬袂而来，掉头而去。民国13年的改组有伟大的总理在，可以由上而下，今日的改组有了广大的群众，就非采自下而上不行。假使下层的革命干部一日未成，则改组的实行一日也不提出。但中央的革命干部怎样才可团结？十个同志，有九个这样怀疑。可是我们不要忙，大凡革命的过程，时日愈久，分化愈显。四中会议的过去，无论如何妥洽，分野渐渐清明，五中会议的过去，无论如何互让，壁垒已较四中为显析。我们要知妥洽和合作不同，妥洽只是一时，合作才是永久。我相信在最短期间理论和政策必因斗争而更鲜明，从而革命与不革命必因分化而森严各个的壁垒。罗马非一日可以筑成，革命更非一时可以完成的大业。分野一清，中央的革命干部团结马上可以构成。革命的同志们忍耐着，时间可以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先从团结下层的革命干部着手，否则只有司令部而没有作战部队，还是空的。

（二）改组的时期 改组究竟在什么时候？这是烦闷的同志急不及待的问题。但我可以简单地回答，没有革命的下层干部，改组还没有到期，下层干部还没有接受统一理论，改组也还没有到期。所以在我个人推断，若要的的确确的改组，最少还在一年以后。前几天有几个同志问我：“我们已等不了，究竟何时才可改组？”我只答：“要组织国民革命军，不能不等革命的黄埔学校办起来，陈炯明虽打到广州市，只好让杨希闵刘震寰去挡一挡，黄埔办不起，断不组织革命军。所以各地的下层干部还团不起，改组也只好等一等。”

最末一句话，我们过去革命的失败，所受教训已多。没有充分的准备，必难得充分的改革，我们更不愿因躁急而牺牲了党，因躁急而牺牲了民众，因躁急而牺牲了已成雏形的整个革命。破坏固难，建设更难；只要求同志们坚忍，在这坚忍期间，团结下层的干部，准备建设的纲领，接受正确的理论，锻炼革命的技术，不可又到了相当时期，手忙脚乱，没有办法不得不妥洽，没有目标不得不乱冲，若更失败时，国民更不会对我们原谅。

（原载《革命评论》18期，1928年9月出版）

〔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摘录）①

（一九三〇年九月一日）

六　我们和共产党及改组派的分界

…………

……我们的争斗目的就是实现三民主义。具体的说，我们争斗的目的，是要彻底的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群众取得政权，要实现社会主义。

…………

……我们的争斗的手段，我们应取的主要方法是下面这样：

1．要彻底的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民族完全解放，一定要唤起并组织广大的民众，使其觉悟的参加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只有广大的民众觉悟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无畏的反抗帝国主义之斗争，直接由国民会议决定，立行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后次，我们相信：中国革命可以扩大并影响于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解放斗争。同时世界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也可以促进中国革命，声援中国革命。

中国革命的势力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工作中可以并且应该与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阶级联合起来作争斗的同盟。所以孙先生临死的时候还要嘱告同志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们一定要联合以平等待我的革命势力及民族，而排斥及抗拒不以平等待我，蔑视中国民族要求的势力及民族，才能解放中国。

2．平民群众要取得政权，必定要用平民群众的本身组织形成坚强的力量，去推翻千余年来传统的官僚政治。过去的换朝与革命，都只是新旧的封建统治者的交替，新旧的士大夫阶级的交替，和人民隔离。所以人民必然会受欺骗。过去的猪仔议员及最近的"党衙门"都是好例。即虚伪民主的欧美流行的代议制，也不是广大

---

① 据杨逸棠1949年6月记述的《邓演达先生传略》一文中说："这个具体的纲领，经过许多同志的集体讨论，终于1930年8月19日由10个省区19位干部同志的决议一致通过——即现在流传于国内国际的'政治主张'。"这是"第三党"的重要政治文件之一。因为篇幅过长，我们只摘录了与本书有关的部分。——编者。

平民群众要求的制度，他们所要求的是和人民利益关切不离的政治权力与组织。

3． 要实现社会主义，一定要在以直接生产的工农为重心的平民政权确固以后，运用政权去发展生产，统制生产，使生产组织化及社会化。

…………

平 民 政 权 之 建 立

A．平民政权涵义和先决条件。政治制度是政治争斗的结晶，因此所谓政权是统治者权力的具体表现。我们的党是代表大多数劳动群众利益的党，党的要求是大多数劳动群众的要求。凡是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的，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参加生产行程的分子，都应该是劳动者，也就是我们所代表的人们：如直接参加生产的各种工厂工人，手工业者，自耕农，佃农，雇农，及设计生产、管理生产与担任运输分配等等及其他辅助社会生产的职业人员。这些直接的及间接的参加社会的人们都是被现存封建势力及资本势力压迫着，都是要求解放的平民。所以我们总称上述这些人们为：平民群众。这个广大的平民群众既要解放，自然要夺取政权。这个已经夺取得的政权，必定掌握在平民群众手里，因此我们叫做：平民政权。构成平民群众的工人与农民。因为他们所受的压迫最为厉害，更因为数量较多而争斗较勇的缘故，必然的成为平民群众的重心。因此所谓平民政权，就是以工农为重心的争斗同盟。并借参与政权的比量，保障这个重心。夺取政权的过程就是整个广大的平民群众向目前的统治者作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即等到推翻整个的反动统治，确实建立自己政权为止的过程。

建立平民政权的先决条件是形成平民群众本身的组织。无组织的平民群众至于一盘散沙，虽多无益，只有坚强组织之下，平民群众才能发挥他们的伟大的威力。在今日的中国，在平民群众的组织当中，最切实的莫过于职业组织，如工会农会等。只有职业组织能使从事各种生产的平民发生密切的利害关系，只有职业组织能够团结他们。其次重要的是准职业组织，如学生会，妇女组织，兵士组织等等。唤醒平民群众和组织平民群众：这是平民政权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只有这样才能真实的集中平民力量，只有这样才能有力量从根本上推翻官僚政治，军阀势力及其他一切封建遗骸，而把政权收归平民手里。主张平民革命而不尽全力去唤醒平民，组织平民，从事于政治和经济的斗争，等于自欺欺人，完全是假革命的行为。至于害怕民众组织，借口于民众组织之不易节制而去禁抑它的人们，那当然无疑的是反革命了。

B．平民政权的组织，要收平民政权的实效，必须以有组织的职业团体代表构成中央及地方的政权的发动机关。因为只有如此才可以使参加生产各部门的民众确实的和政权联接而不发生隔阂；只有如此才可以彻底的铲除官僚制度及军阀政治的积弊，不再发生新的官僚政治。同时，我们以为：欧美流行的地域选举代议制度，容易酿成少数操纵多数的弊害，此种弊害与中国过去的“猪仔议员”及现在的“党衙门”等怪象都是因为民众和政权隔离，才会发生，要消除及预防上述的弊害及怪象只有由职业团体代表掌握政权的方法。

我们主张：各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应按下列的比例数派遣代表以组成全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国民大会：

直接参加生产的农民工人占60％

其他各职业团体及准职业团体占40%

临时接收政权，议订宪法的国民会议，应按此原则组成之。各地方权力机关应以地方的职业团体为单位按上述原则组成之。

必须用这样的组织才能使平民群众相信革命党的领导，才能免除那些假借“训政”及“以党治国”的名义去压抑平民群众剥削平民群众的流弊。其次，我们反对欧美流行的三权分立制，而主张立法机关不与执行机关分离，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大会，在国民大会之下设立执行机关。各地方的权力机关为省民大会，县民大会，乡民大会等。

C.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我们认为，在历史地理及经济的条件上，过去的中央政权都只是形式统一，并且妨害了地方人民的发展。我们主张，应将中央权限缩小至最低限度，除外交军事以及关系全国产业统制，全国的交通及全国的财政事项，等等必须中央举办者外，其余应由各地方负责自行治理。只有这个分权的原则，才能使庞大而落后的中国，向上发展。当然我们是要坚决的反对一切军阀割据式的“联省自治”和无政府的“分治合作”。在另一方面，我们主张，应于最短期间根据经济地理国防的种种条件，将现今的省区，重新施行一种合理的划分，因为这样才能使各省区均等发展。

D.政权的保持。要从根本上扑灭军阀产生的根源，必须做成人民的武力。过去数年来的事实已经昭示我们，人民武力不是单靠什么“以党治军”“党权高于一切”的空话可以做成的。要建设人民武力，必须一面限期实现普遍的征兵制度，一面暂时用职业团体强迫征兵的方法，使各生产部门的民众，在取得政权以后按额抽丁入伍，组成真正人民武力以保护革命。只有由有组织的城市并乡村的平民职业团体确实的掌握政权，才能使广大的平民群众热诚自动的形成自己的武力，保持自己的政权；所以平民的职业团体的政权和人民的武力二者有不可分的关系。

“耕者有其田”及一般的农业政策

我们为着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必须达到土地国有的目的。但是在目前的阶段，如果立刻普遍的实行土地国有，则不但容易引起农民不能安心改良土地，生产力低落，甚至使农地荒废。这样不但不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方法，而且会更增加农民的痛苦，使农民离村的倾向，比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为更甚。所以我们在原则上主张土地国有，而用耕者有其田为过渡的办法。

…………

我们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具体方案与程序如下：

甲　立行宣布耕者有其田的法令，不耕作的人不能有耕地。

乙　立行宣布免纳佃租，其耕作中的佃农及雇农可暂行保有原来佃耕土地的使用权与收益权，听候详细办法解决。但地主回村并能实际耕作者，主佃两方，暂时共享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其形式以契约定之。

丙　由国民会议规定土地法，并斟酌各方状况，分别规定农户占有耕地的最高额及最低额。及国家收买土地定价法。

丁　在允许私人占有耕地最高额以外的土地，应由国家以全国国有土地为抵押，发行五十年长期土地公债，按照国民会议所规定的土地定价原则及各地方政府所决定的土地价格，收买归为国有。在最低限额以下的土地，应强迫使其相互合并或加入合作社经

营之。

戊　国家以外的公共团体所有土地亦按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法，由国家收买为国有。

己　一切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的及其他反革命的团体的全部财产应没收为国有。

庚　所有一切收为国有的土地应由土地管理机关按照土地分配原则及各地方标准负责分配于耕作的农民。原日佃耕的佃农，及无地的雇农，与退伍的革命军人等应有同等的机会领用土地，但只限于使用权与收益权。

辛　领用土地而不行耕作，或怠工，耕作不力的农民，应被剥夺其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耕作私有土地的农民如犯以上条件则被剥夺其占有权。

壬　不准私行买卖土地，必不得已时的土地占有权及使用权的移转应按土地法得土地管理机关的允许而后行之。

我们一般的农业政策如下：

甲　消灭寄生剥削的大小地主，使不耕作的不能保有土地，而要从事耕作的人民随时可以得到土地耕种。即是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农民安心改良土地并提高生产力。

乙　改订田赋，清丈田亩，依照各地收益情形及农民收益状况，拟定税制。

丙　积极的利用科学方法以振兴水利，及一切农业改良的设备，发展内地交通，推广农业教育及研究，办理农业调查，广设模范农场，务使各农村均能进行农业实验及改良的工作。利用国内外的资本广设农民银行，供给农村以必需的资本。

丁　提倡及促进农业合作。利用生产合作，使各农户能自由联合成大规模的耕作，用进步的技术以改造农业。利用贩卖及购买合作以消灭商业资本的剥削。利用信用合作以消灭高利贷。这些合作的进行，即为农业社会化的过渡。

戊　办理国营及公益的农业，尽量的应用新的技术及经营方法，使农民彻底的明了大农业及小农业的利弊。使农民能逐渐的志愿的由私营及合作的阶段进入农业社会化的阶段。

己　速行办理移民及垦植事务，使人口与土地的比例能相对的平均。

我们和共产党及改组派的分界

1．我们和共产党的分界，共产党纯粹是国际的，而我们是带民族性的。共产党以中国革命为手段，而我们的目的就是中国革命。共产党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还是以小农及手工业的生产为主的组织，是被本国的高度佃租，高利贷，商业资本的剥削及其他政治的掠夺并帝国主义所窒塞妨害而日就崩溃破产的组织。我们以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不是资本主义，而且在中国还未形成近代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共产主义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而主张要把妨害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源除去，去发展社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都是要使农工的利益都确实得到保障，使工农的利益能够平行的发展，用这种方法建立平民的政权。共产党只盲目的追求未来的空想，我们却要把历史现阶段上的要求得到解决。因此共产党在目前要使中国社会更穷乏混乱化，我们却要使中国新的社会秩序早日形成。

2. 我们和改组派的分界，从改组派上部成分上说，它是一大群旧社会的统治者或半统治者的集团，他们只是因为偶然的一时的利益共同合作，只是各自寻出路。所以它无从建立一个共同的纲领，它的政策忽左忽右，忽而投降南京，忽而反对南京而投降北洋系和西山派。它的工作对象只是勾串及依附旧势力，他无决心实现革命的主张，它只是反蒋而不反南京的统治，所以结果至多是取蒋而代之，或去一蒋介石而产生出多数蒋介石。我们和改组派不同，我们不但要和现存一切的统治势力绝缘，而且坚决的要推翻一切反动的统治势力。我们认定，只有抱稳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旗帜继续不断的和一切叛徒们战斗，才能克服伪善和凶恶，而使中国民众历年所受的痛苦羞辱一齐摆脱洗涤净尽。

（原载《革命行动》1期，1930年出版。摘自《邓演达先生遗稿》，1949年出版）

〔附〕我们走那条路？（摘录）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

胡　适

缘　起

我们几个朋友在这一两年之中常常聚谈中国的问题，各人随他的专门研究，选定一个问题，提出论文，供大家的讨论。去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中国的现状”，讨论的文字也有在“新月”上发表的。如潘光旦先生的“论才丁两旺”（“新月”2卷4号），如罗隆基先生的“论人权”（“新月”2卷5号），都是用讨论的文字改作的。

今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我们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分了许多子目，如政治、经济、教育，等等，由各人分任。但在分配题目的时候，就有人提议说：“在讨论分题之前，我们应该先想想我们对于这些各个问题有没有一个根本的态度。究竟我们用什么态度来看中国的问题？”几位朋友都赞成有这一篇概括的引论，并且推我提出这篇引论。

这篇文字是4月12夜提出讨论的。当晚讨论的兴趣的浓厚鼓励我把这篇文字发表出来，供全国人的讨论批评。以后别位朋友讨论政治、经济，等等各个问题的文字也会陆续发表。

19，4，13，胡适

我们今日要想研究怎样解决中国的许多问题，不可不先审查我们对于这些问题根本上抱着什么态度。这个根本态度的决定，便是我们走的方向的决定。古人说的好：

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得其平易，遇小人则蹈于沟壑。（“淮南泛论训”，文字依“意林”引。）

这正是我们中国人今日的状态。我们平日都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要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国家，也不肯彻底想想究竟我们应该走那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地。事到临头，人家叫我们向左走，我们便撑着旗，喊着向左走；人家叫我们向右走，我们也便撑着旗，喊着向右走。如果我们的领导者是真真睁开眼睛看过世界的人，如果他们确是睁着眼睛领导我们，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跟着他们走上平阳大路上去。但是，万一我们的领导者也都是瞎子，也在那儿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那么，我们真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大危险了。

我们不愿意被一群瞎子牵着鼻子走的人，在这个时候应该睁开眼睛看着面前有几个岔路，看看那一条路引我们到那儿去，看看我们自己可以并且应该走那一条路。

我们的观察和判断自然难保没有错误，但我们深信自觉的探路总胜于闭了眼睛让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并且希望公开的讨论我们自己探路的结果可以使我们得着更正确的途径。

在我们探路之前，应该先决定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的目的地。这个问题是我们的先决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想到那儿去，又何必探路呢？

现时对于这个目的地，至少有这三种说法：

（1）中国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在于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2）中国青年党（国家主义者）说，国家主义的运动“就是要国家能够独立，人民能够自由，而在国际上能够站得住的种种运动。”

（3）中国共产党现在分化之后，理论颇不一致；但我们除去他们内部的所谓斯大林——托洛斯基之争，可以说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地，就是“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拥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在讨论这三个目的地，因为这种讨论徒然引起无益的意气，而且不是一千零一夜所能打了的笔墨官司。

我们的任务只在于充分用我们的知识，客观的观察中国今日的实际需要，决定我们的目标。我们第一要问，我们要铲除的是什么？这是消极的目标。第二要问，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这是积极的目标。

我们要铲除打倒的是什么？我们的答案是：

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

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

第三大敌是愚昧。

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

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共铲除这五大敌人。

………………

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

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

"治安的"包括良好的法律政治，长期的和平，最低限度的卫生行政。"普遍繁荣的"包括安定的生活，发达的工商业，便利安全的交通，公道的经济制度，公共的救济事业。"文明的"包括普遍的义务教育，健全的中等教育，高深的大学教育，以及文化各方面的提高与普及。"现代的"总括一切适应现代环境需要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卫生行政，学术研究，文化设备等等。

这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深信：决没有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而不能在国际上享受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的。我们不看见那大战后破产而完全解除军备的德国在战败后八年被世界列国恭迎入国际联盟，并且特别为她设一个长期理事名额吗？

*　　　　*　　　　*

目的地既定，我们才可以问：我们应该用什么法子，走那一条路，才可以走到那目的地呢？

我们一开始便得解决一个歧路的问题：还是取革命的路呢？还是走演进(Cvolution)的路呢？还是另有第三条路呢？——这是我们的根本态度和方法的问题。

………………

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这一边刚打平，又得招兵购械，筹款设计，准备那一边来革命了。他们主持胜利的局面，最怕别人来革命，故自称为"革命的"，而反对的人都叫做"反革命"。然而孔夫子正名的方法终不能叫人不革命；而终日凭借武力提防革命也终不能消除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工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我们认为今日所谓"革命"，真所谓"天下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用武力来替代武力，用这一班军人来推倒那一班军人，用这一种盲目势力来替代那一种盲目势力，这算不得真革命。至少这种革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没有多大价值的。结果只是兵化为匪，匪化为兵，兵又化为匪，造成一个兵匪世界而已。于国家有何利益？于人民有何利益？

就是那些号称有主张的革命者，喊来喊去，也只是抓住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变戏法。有一班人天天对我们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阶级。"又有一班人天天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势力。"我们孤陋寡闻的人，就不知道今日中国有些什么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

………………

以上所说，不过是要指出今日所谓有主义的革命，大都是向壁虚造一些革命的对

象，然后高喊打倒那个自造的革命对象；好象捉妖的道士，先造出狐狸精山魈木怪等等名目，然后画符念咒用桃木宝剑去捉妖。妖怪是收进葫芦去了，然而床上的病人仍旧在那儿呻吟痛苦。

我们都是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们仔细观察中国的实际需要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现在所谓“革命”的方法。我们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张这种种革命。因为这种种革命都只能浪费精力，煽动盲动残忍的劣根性，扰乱社会国家的安宁，种下相残害相屠杀的根苗，而对于我们的真正敌人，反让他们逍遥自在，气焰更凶，而对于我们所应该建立的国家，反越走越远。

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昧，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打倒这五大敌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条路，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地达到之时。

这个根本态度和方法，不是懒惰的自然演进，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号标语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

这个方法是很艰难的，但是我们不承认别有简单容易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很迂缓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有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喊口号贴标语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机关枪对打不是更快捷的路子。我们知道，暴动与屠杀不是更快捷的路子。然而我们又知道，用自觉的努力来指导改革，来促进变化，也许是最快捷的路子，也许人家需要几百年逐渐演进的改革，我们能在几十年中完全实现。

最要紧的一点是我们要用自觉的改革来替代盲动的所谓“革命”。怎样叫做盲动的行为呢？不认清目的，是盲动；不顾手段的结果，是盲动；不分别大小轻重的先后程序，也是盲动。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如组织工人，不为他们谋利益，却用他们作扰乱的器具，便是盲动。又如人力车夫的生计改善，似乎应该从管理车厂车行，减低每日的车租入手；车租减两角三角，车夫便每日实收两角三角的利益。然而今日办工运的人却去组织人力车夫工会，煽动他们去打毁汽车电车，如去年杭州北平的惨剧。这便是盲动。又如一个号称革命的政府，成立了两三年，不肯建立监察制度，不肯施行考试制度，不肯实行预算审计制度，却想用政府党部的力量去禁止人民过旧历年，这也是盲动。至于悬想一个意义不曾弄明白的封建阶级作革命对象，或把一切我们自己不能脱卸的罪过却归到洋鬼子身上，这也都是盲动。

………………

（原载《新月》2卷10期，1929年12月10日出版）

〔附〕论中国的共产

——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

罗　隆　基

一、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
二、改革政制，以民治代替“党治”

（一）

对共产主义的理论，赞成与否，这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以内（参看本刊3卷1期）。如今我们当头的问题是：共产党在中国能否成功？

许多年前，梁任公先生在“北平晨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共产的文章，他的大意是中国“无产可共”，所以不能提倡共产。直到如今，社会上许多乐观派的人物，依然拿“无产可共”四个字，断定中国共产党的失败。湘鄂赣的共产，已成遍地荆棘的局面，黄河以北的人民，还这样乐观的说：“中国北部象陕甘鲁豫这种省分，永远不会有共产成功的机会。我们北方是‘无产可共’，所以不能共产。”这种话是对共产主义理论上根本的误会。共产党所主张的是根本打破私有财产制，是生产工具公有。中国虽穷，私有财产制存在一天，生产工具私有制存在一天，土地私有一天，在这点上，共产主义者就有文章可做。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就有发展的可能！

揣“无产可共”四字的命意，大约指中国现在的生产力太低，经济能力落后而言。于是又有“中国经济问题在生产，不在分配”这议论。“不在分配”云云，大约指“无生产的货物可分”说的。其实，有生产的工具可共，无生产的货物可分，这就是中国目前经济上绝大的危机，这就是共产党可以在中国发展的原因，这或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将来可以成功的理由。

以全世界的情形论，美国是比较富足的国家，人民平均的财力，比任何国家的人民更高。共产党在美国发展的机会，比任何国家更小。美国是有生产的工具可共，同时是有生产的货物可分。做到了“有生产的货物可分”，人民就可以放松“有生产的工具可共”一点。经济问题真正的症结，不在人民产的多寡，而在人民产的有无。愈到“无产可共”的地位，愈有共产发生的危险，愈在民穷财尽的国家，愈有共产成功的希望。这是讨论中国共产问题者，应首先认清的一点。

共产主义者革命的目标是经济；他们革命着手的步骤，依然先在政治。共产党人说，国家在经济上是有产者压迫无产者的工具；在政治上是少数压迫者保障他们的地位的一种威力。他们这样说：

“近代国家根本就没有实现他所标榜的理想的可能。一个团体，他的目的是少数压迫多数，是压迫者制服被压迫者，就不能希望这样的团体来保障公道，自由，平等。现在的国家是阻碍国家本身所标榜的目的实现的一种力量。唯一达到国家所标榜的目的的方法，是享受不着国家利益的这班人，把国家这工具抢过来。”

共产党在中国能不能成功，就看在国家的政治上，他们上面这种攻击，有没有切实在佐证。在如今党治的招牌底下，谁能够出来否认，国家是做了少数人的工具，谁更能出来辩证如今的国家不是保障少数者特殊权利的威力？

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用不着从小节上去挑他的黑暗腐败的内幕，我们要看他立脚的基本原则。什么时候，国家一部分人独占了政治上特殊的优越地位，使大多数的人民，在政治上成了被治的奴隶，这样的社会，就有了阶级。这样的政治，就给阶级战争者，一个口实。共产党的革命，无产的打倒有产的，是最终的目的；无权的打倒有权的，是着手的手段。民穷财尽的中国，或者“无产可共”，一党专制的中国，的确，“有权可分”，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策略上，很可利用的民众心理，这或者就是中国共产党可以成功的理由。

总括起来，我认为中国目前促成共产成功的主要原因，最紧要的是两点：（一）经济上的贫穷；（二）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无产可共”，就是民不聊生；政治上“有权可分”，就是民不安命。到了人民的生命关头，革命总是要暴发的，挂什么招牌，打什么旗子，这是毫不相干的问题。

赤色帝国主义的侵略，第三国际的协助，俄人的阴谋，罗布的势力，这些是讨论共产问题者应附带注意的东西，然而这些，不是共产党在中国可以成功的真实理由。

（二）

如今中国经济政治的环境，为共产主义者准备了这样好的机会，这是上文认共产革命有成功可能的论据。共产党是否真能利用这种环境，成就他们革命的目的，似又当另为分析。

把中国造成共产主义者理想中的社会——绝对无阶级的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的社会，——这是共产党真正的成功。这种成功，苏维埃的成绩，还距离太远，起马克思列宁于九泉，有没有方法，使人类社会，臻此盛境，实为疑问。这当然不是本文所谓共产党在中国可能的成功。

共产党成为支配政局的势力，中国共产党取得共产党在今日俄国同样的政治地位，做到俄国共产党同样的成绩，中国共产党是否有这样乐观的前途，这是本文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第一，共产党本身的人才问题。我绝对不这样轻视中国的共产党，认一切相信共产的人，都是杀人放火的土匪。里面的确有具备牺牲精神和组织能力的领袖。然而这是少数的少数。就在这少数的少数中间，有没有象列宁，杜诺斯基，斯大林这类有几十年革

命的训练的人物，另为问题。进一步，共产党如今已有所谓取消派、斯达林派内部分裂的现象。一旦取得政治地位，领袖们是派中有派，蹈今日国民党自相残杀的故辙，又为问题。根本改造一个社会，象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同时在改造的手段上要运用迪克特托的组织，领袖人物，是必具的要素。国民党有几十年的历史，如今艰难困苦的局面，依然是缺少伟大的领袖。共产党里，有破坏的勇气，有建设的才具，可以指挥号召全党的领袖在那里？姑假定共产党有了领袖，建设上的干部人才，又成问题。目前共产党所谓的干部人才，大部分是中小学的青年男女学生。这些青年男女，做宣传，喊口号，甚而至于攻城略地，杀人放火，有他们的勇气。打倒一个旧的国家，建设一个新的社会，一班中小学的学生一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中小学的学生，如今就是国民党里中下级的干部，国民党如今党务上政治上的缺点，将来一定照样表现于共产党中下级的干部。共产党所谓的下级人员，公开的说，大部分是城市的流氓，乡村的土匪。在如今快刀砍头，快枪杀人的革命过程中，当然是豪爽痛快无往不利。一旦要安定起来，流氓，土匪，怎样来位置，怎样来叫他们"各尽其能"，怎样能限他们"各取所需"，共产党本身恐有穷于应付的日子了。凭借流氓，土匪，来谋共产革命，一定有可放而不可收的结局。这是共产党前途可顾虑的一点。

第二，中国的国际问题。国家，共产党亦承认，不是绝对可以独立的。所以共产党要主张世界革命。换言之，共产在某个国家的成功，有赖于共产革命在其它各国进展的形势。国际形势这问题，在中国比从前的俄国更为复杂。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对象，第一步是中国的资本家，第二步是外国在华的资本家。中国共产党或者可以打倒本国的资本家，而外国在华的资本家，可否动其毫末，是又成为大问题。到了中国共产党直接与外国资本家冲锋的时候，俄国的协助，是否足持，英美法日的共产革命未成功以前，他们肯否坐视中国的共产党做"没收外国资本家的企业和银行"的工作，这一切都是问题。结果，中国的内部，流氓共产；中国的商部，洋人共管，流氓共产，洋人共管，这又是共产前途可顾虑的一点。

有人认定杀人放火，是中国共产党将来失败的原因，革命就是杀人放火的勾当，又何必独责共产党。有人认定中国的农业社会，是阻碍中国共产党将来成功的原因，农业社会，并没有阻碍俄国苏维埃的成立。这两点在研究共产问题上，可以考虑，然而这是次要的问题。

（三）

中国经济政治的环境，给共产党革命运动上种种的便利。共产党本身的人才和中国在国际上复杂的地位，又令我辈怀疑共产党在中国，有支配政局的可能。设不幸，中国共产主义，不能完全成功，中国共产革命不能立时消灭，中国前途，成如何局面，这又值得我们的讨论。

（1）经济上破产。说中国经济尚未破产，是十分客气的措词，如今的政府，公债接济，典当度日，鸦片公卖，饮鸩止渴。军阀苛捐杂税，是竭泽而渔；土匪明枪暗劫，是涸彻求泉。这一切都是国家经济破产了的现象。如今，城市工商凋敝，乡村田地荒芜。如今市民歇店失业，村居家破人亡。如今人民食宿的供给，赶不上英美的猫狗，人民生

活的安全，抵不上西洋的家畜。这不是经济破产是什么？这是实况，这用不着统计来证明。在这种千钧一发的时机，姑无论我们私人在政治上的信仰如何，立场如何，我们总希望如今已成事实的政府有法维持他的地位。他们有法恢复和平，安定秩序，保障私产，维持民主，使小民在九死一生的危机中得一出路。假使共产党继续蔓延下去，既不能完全的成功，又不能立刻的消灭，在国共两党军事相持的局面下，于是私产更为破坏，民生更难维持。兵事愈多，人民愈穷，人民愈穷，土匪愈起，土匪愈起，社会愈乱，社会愈乱，人民更穷，……毕境，穷，乱，乱，穷，成为绝无休止的循环圈，在这循环圈中，国家经济，比今日而愈下，直到真正破产而止。

（2）政治上亡国。我们相信民主政治的人，很诚意的认定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能把中国的政治引上常轨。共产党一旦得势，政治上“党治”的方式，自然是一丘之貉。在我们爱护自由，崇敬平等，坚信民主政治的人，对国共两党的党治，最少是一视同仁，无所偏爱。然在今日的中国，在今日无和平，无秩序，无安全的国家，有政府总比无政府聊胜一着。使不幸共产党继续蔓延，既不能完全成功，又不能立时消灭。已成的政府，不克维持，无形的政府，遍地林立，国家不求崩溃，亦必崩溃，此不过指中央政府说的。国民党共产党相持愈久，地方政治，愈趋紊乱。拿湘鄂赣的情形来说，地方政治，无论在国民党或共产党统治之下不是市侩专政，在共产党统治之下的就是流氓擅权，当然，这不是国共两党本来的政策，然而这是他们军事相持的局面上必然的结果。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治，都有“党治”的成见，地方上一班稍有智识，稍有资望而政见与国共不同的人民，不为“资本阶级”罪名的株连，就遭“土豪劣绅”招牌的诬陷，杀戮逃亡，几已近尽。剩下一班市侩流氓，他们政见上朝秦暮楚，政绩上行险侥幸。这种境况愈延长，地方政治愈险恶，地方政治愈险恶，人民愈纷扰，毕竟政治上又走入绝无休止的循环圈，直到真正亡国而止。

（四）

假使中国的共产运动，真能做到苏俄的成绩，这或者是中国日暮穷途中的一条出路。上面的分析，我们又怀疑他能臻此盛境。国共相持的结果，在我们看来，只有：（1）经济的破产；（2）政治的亡国。

在今日中国的状况下，为中国人民求生路计，自然只有希望国民党剿共及早成功。谚所谓“两恶相权取其轻”即此意耳。然而国民党剿共工作的成败，有待于他们的策略。在讨论国民党剿共策略以前，我们希望他们认清他们在如今共产主义的发展上，所负的责任；希望他们承认前此的错误，改弦易辙，而后在对付共产问题上，才有得到适当的策略之可能。

国民党对如今中国的共祸，所负的责任最少有这几点：

第一，国民党宣传共产党的主义。共产党在目前有今日的地位，共产主义在一般青年的头脑里，这样的时髦新鲜，谁亦不能否认这是孙中山先生，汪精卫先生，以及许多国民党领袖们帮助的功劳。

中山先生在他的“民生主义”第一讲里，说“我现在就用民生两个字来讲外国近百十年来所发生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又名共产主义……”

在“中山全书”里，象这类的话，还可以发现许多。这些，直到如今，依然是天经地义，不可指摘的圣经。

孙中山先生的死，遗嘱上还这样说：

“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这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联俄容共的最后叮咛。这种遗嘱，直到如今，依然是与基督教里祷告文一样的神圣。

汪精卫先生帮助共产主义宣传的力量，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汪陈联名的宣言，第一句就是“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这样亲热的口吻。最后，他这样说：

“国共两党同志们！我们强大的敌人，不但想以武力对待我们，并且想以流言离间我们，以达以赤制赤之计。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重。事事开诚协商进行，……万端各自省察，勿至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中国幸甚，两党幸甚……”

汪先生如今仅管洗刷共产的嫌疑，当年代共产主义播散的种子，如今都一粒一粒的生长发育起来了。

如今党国要人戴季陶先生，当年在广东何尝没有“人民是火车，鲍罗廷先生是火车头，火车要跟着火车头跑”的妙喻？

如今身临前敌与“赤匪”不共生死的领袖人物，当年出师北伐何尝没有听第三国际指挥的宣言，当年何尝没有五体投地的拜倒苏维埃，卑躬屈膝的恭维鲍罗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莫恨遍地是荆棘，只怨当年乱播种。

最冤屈的是一班无知被误的青年。容共则招之以来，清共则处之以死。“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依然是今日神圣不可侵犯的党义，依然是考试必须，学校必读的课本。共产主义的发展，共产势力的蔓延，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第二，国民党采用共产党的制度。如今国民党他的党的组织，他的“党治”的策略，他的由党而产生出来的政府，那一项，不是师法共产党，抄袭共产党，整个的模仿共产党？

13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先生就这样说：

“十三年以来，我们的革命的智识进步，有了许多方法，旁边又有俄国的好榜样……那种革命，当然象俄国一样……”

在另一次会里，他又说：

“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

孙中山先生看中了共产党这个模范，于是就照样改组了国民党，照共产党的原则，订定了“建国大纲”。根据总理遗教，如今又产生了“党高于一切”“党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的政府。

严格说起来，如今党的制度，如今党治的制度，在形式上，在精神上，在运用上，与俄国的苏维埃制度比起来，不同在那里？

“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好焉者，下必有甚焉。官家可以放火，百姓自可点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共产势力在中国的蔓延，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第三，国民党协助共产党实际的工作。先知先觉的遗教，为共产主义作宣传，后智

后党的组织，为共产制度造实例。同时国民党下级党员的一切工作，又直接间接的为共产势力实际造机会。联俄容共时代的事实，姑不具论。即以如今的局面说，中央政治的缺陋，远不及地方政治的残暴，这点就在中央一班领袖们亦屡屡公开不讳的承认。在我们小民看来，二十年前吃洋教的教民，三五年来办民党的党员，是一样的天威神圣的人物。如今，党衙们威福森严，党老爷气势喧吓。一班青年，中小学毕业以后，一成党员，便登龙门。主席身份，委员资格，名片上衔挂几“长”，职份上事兼几“差”。于是乎穷杀“反动”，乱捉“叛逆”，结果，党衙门威权愈高，党主义威权愈低，党老爷声望愈大，党主义声望愈小。天怒人怨，众叛亲离，时日曷丧，及尔偕亡，在这分际，共产党利用人民心理，利用国民党的弱点，乘机以进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主义及制度，态度如此，下级党员在党务与政治上的成绩又如彼，共产主义的发展，共产势力的蔓延，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五）

明了了国民党在共产革命上所负的责任，我们才可以谈基本解决中国共产问题的方法。

五十师大兵，五十万人马，主席出征，总长临敌，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国民党对剿共总算慎重其事了。在我们看来，湘鄂赣军事的胜利，与中国共产问题根本的解决，完全为两件事。湘鄂赣的红军，不过溃痈决堤的表现，毒的症结，水的根源，另有所在。举例来说罢，青年思想的左倾，红色刊物的增加，学校做共产领袖的训练所，书店做共产思想的媒介物，这是政府的飞机炸弹手枪快炮所不能摇动其毫末的。在我们看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剿共方法，纵有暂时的或局部的效力，终久是疲于奔命的。

在我们看起来，果然要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应该从这几步着手：

（一）思想的解放。思想上，第一步，国民党要修正他的党义。国民党人要平心静气的承认，先知先觉的遗教，许多地方是受了当时环境的支配。“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这类的话是环境支配了立场的证例。这种遗教，特别是拿来做“党化教育”的课本的遗教，一方面可以供对方的利用，一方面可以起青年的误会。这是后知后觉们应及早开诚布公修改的地方。第二步，我们主张思想的自由。稍为明白一点文化历史的人，就应该承认，思想是愈求统一，愈不统一的。只有公开的发挥，比较的研究，平情的讨论，才能得到真理。压迫对方的思想，其实是代对方做宣传；偶象本身的主义，其实是为本身造僵尸，求诸往例，无一或谬。如今中国教育方面的情形，大约如此：三民主义是官家的“五经”“四书”，共产刊物是禁品的“西厢”“红楼”。愈要青年必修的，愈是干枯无味；愈防青年偷看的，愈是秘中求宝。同时，社会科学要三民主义化，文艺美术要三民主义化，于是学校教授先生们采明哲保身的格言，守危言行顺的策略，成为无思想无主见的流声机。照字讲书，按月领薪，这就是他们的职务。在国民党的本身，又有所谓党义教师者流。大部分是智识上无根底，党政上无地位的人物。一场考试，一张证书，而后课堂上解经典，大学里充牧师。在求智欲正强的青年，这一班学术上无地位，思想上无主见的牧师们自然得不看敬仰。共产主义者，于是乘时而起。刊物上美女图做封面，书籍里唯物论充实质，利用时机，迎合心理，以石投水，以风扫叶，无往而

不利了。这种现象，就是如今党化教育，思想统一的真实情形。在如今教育上，所谓的思想，公家演讲的是三民主义，暗中宣传的是共产主义，实际所摧残的是三民共产以外，学术上一切的真理，学术上所受的压迫的影响，尤为次要。以必修的“五经”“四书”，与禁行的“红楼”“西厢”相对敌，结果，张生宝玉成了青年的口头语，仲尼孟轲是陈腐的人物了。这是讲党化教育，用党化教育压迫思想者应根本顾虑之一点。

照我们的眼光看来，世界上防止反动的方法，只有以思想代替思想的一条路。在这点上，英国的往事，可供我们的借鉴。马克思是在伦顿以老以死的，他的资本论就在伦敦博物院图书馆里写的。以理推测，英国人受共产学说的影响，一定较其他国家更强。历史上的事实，19世纪中叶及末年，英国的共产运动，亦确有端倪。后来费宾学会（Fabian Society）这班学者们起来,他们就英国的情形，做实际的研究，创造他们所谓的费宾社会主义。他们研究有得，用公开讨论的方法，平情批评的态度，公诸社会。费边社会主义起来，共产主义自行退落。我们觉得这种剿共铲共的策略，是最根本最敏捷最聪明的方法。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以思想代替思想的方法。假使当年英国执政的保守和自由两党，认他们的主义是神圣，认他们的政策是万能，实行所谓“党化教育”，所谓“思想统一”，如今英国的共产政府，或已在苏俄以前建设起来了。

我们很早就忠告今日的当道者。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险，是思想没有人来压迫。压迫对方思想的人，到头把自己的思想造成僵尸，把自己的思想暴露弱点，把自己的思想，表示愚笨。被人压迫的思想，思想本身添了刺激性，添了引诱力，添了磨练，添了考验。英国的公园里，人民可以公开的演讲打倒君主，直到如今，乔治第五依然是皇帝；俄国的国会里，人民不可自由主张民主政治，到了如今，共产政府毕竟执政权。这种明显的往事，这种确切的教训，这样简单的榜样，如今的人，都不能看得清楚明白，如今的人还在盲人瞎马的做思想统一的工作。这真令人悲感无量。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思想的解放。

（二）政制的改革。政治上，第一步，要取消一党专制。我知道这是冒大不韪的提议。然而我十分诚恳的希望如今的当道来研究，容受，并采纳我们这种主张。“一党专制”，“以党治国”，国民党本身，亦应该开诚布公的来承认，这是共产党的制度。以党治国，一党专制，本身的缺点，他本身与民主政治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一再指陈过，这里我们不事重复。在抵制共产党上，维持党治，是增加了许多障碍。以党治国，果然是营救中国的办法，国民党是后进，共产党成了先觉了。若然，如今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立场在那里？国民党倘攻击共产党“不要国家”，共产党亦可以攻击国民党主张“世界大同”；国民党倘攻击共产党“没收私产”，共产党亦可以攻击国民党“平均地权”。实际上，共产党还可以说，苏维埃并没有打毁国家（中山先生的演讲里，极力称赞苏俄讲民族主义呢！）并没有完全取消私有财产。国民党倘攻击共产党杀人放火的战略，共产党亦可以说，阎冯战争，死伤三十万，丘墟千万家。这里，我们不是来为共党辩护。我觉得我们与共产党分歧的，就是“民治”与“党治”。国民党实行党治，国民党就取消了反共的立场，增加了共产党的口实，取消一党专制的利益，尚不止此。仅管政府发宣言，领袖做文章，要全国人一致反共，党治下人民的心理总觉得国是党的。国是党的，国是共产党的，国是国民党的，于我们这些享不到政权，问不了政治的人民，有什么分别？横竖我们是亡国的流民，失权的奴隶，党的代表大会，我们是过问不了，

国的统治大权，我们是干与不着。这样，我们又何亲何疏，何厚何薄？这是铲共上极大的碍障，然而这是许多小民真实的心理（杨杏佛先生最近大声疾呼要人民不要漠视共祸要全国大团结共赴国难，就没有看到这一点）。

我们在铲共上主张取消党治的理由，尚不止此。全国国民中，在共产问题上固亦有深忧国事，畏惧共祸的人民。这些人民，在如今党治底下，又绝对无积极加入铲共工作的机会。如今，政权是独擅了，政治机关是独占了。非国民党的人民，一有组织，即为反动，一有团结，即成叛逆。一班党外反共人民，热心的，束手无策；悲观的，坐以待毙。这又是解决共产问题上，极大的危险，极应顾虑的问题。

我们主张取消党治的理由，尚不止此。政治心理上，每每有拥乙倒甲，以泄愤怒，快意一时的现象。如今的党治，我们敢开诚布公的说，反对的人，实占多数。思想压迫，民情堵滞，走头无路的时候，发生“与尔偕亡”“同归一尽”之想，结果，人民不希望共产党的成功，他们却切望国民党的失败。这又是今日人民漠视共祸之主要原因之一。果能取消党治，消灭政治上的阶级，保障政治上的平等，民情得一归宿，思想得一疏导，政府成了人民的政府，国家成了人民的国家，不求团结，人民自团结了。这又是解决共产问题上应注意之一点也。

我们主张取消党治的理由，尚不止此。共产主义的发展，共产势力的蔓延，国民党政治成绩的失败，下级党员的失德，应负责任，这是上文指正出来的。政治失败，党员失德，我们认为这是一党专制自然的结果，在一党专制底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人民没有监督指摘当局及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的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趋叛离，这就是如今共产发展的机会。这又是解决共产问题者应注意的一点。

总结起来，我们认为解决今日中国的共产问题，只有根本做到这两点：

（一）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二）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这两点做到了，思想上青年有了归宿，政治上民怨有了平泄，以后，政治可以上轨道，经济可以谋发展。这些初步条件做到了，共产学说根本在中国站足不住了。共产党不剿自灭了。

这两步做不到，尽管讨共军着着胜利，湘鄂赣彻底肃清，然而，余毒未尽，病根仍存，共产党中国，总是：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原载《新月》3卷10期，1930年12月出版）

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

湖南省委：

袁、杜二同志于六月卅日同时抵永新，所携省委通告及中央对湖南工作决议案均收到，在省委两信中所指示的前后颇不同，前者要我们继续建设罗霄山脉中段各县政权，以为军事根据地，不更变一个月前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后者要我们于攻永新后冲往湘南，以避敌人“会剿”及解决经济上之困难。此间，六月二十三日击溃杨池生后，四军已大部来永新向莲花、安福及吉安之西南端游击，筹款并发动暴动。即于六月卅日晚上由特委、军委、永新县委开联席会议，讨论省委来信，袁杜二同志皆参加，决定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地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其理由分述如下：

（一）在四军本身有许多过去习于流寇式的生活，极不愿住定一处，艰苦的作群众斗争工作，充满红军冒险的遗毒。近一月来经多方洗刷，同时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他们才渐渐死了心，懂得中央及省委上次主张建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四军重行走徒游动的道路，四军之改造必更困难。前次省委来信指出四军转战千里，近于流寇，必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此意非常正确，正在遵照执行，不宜轻率变动。

（二）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赣敌被我连败四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计尚能作战者仅王均之第七师，一师与一团驻萍乡，二团分驻九江、南昌，料其难于抽调，抽调来后且补可用适当战略战而胜之。湘敌则不然，与我交手在五、六次以上，仅能将其小部分击退，而敌毫无所损，顽强如故。故为避免硬战斗，此时不宜向湘南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现在湘南敌军所有桂系两师，二十一军，尚成杰一军（三千炮），许克祥一师，吴尚一军，敌乃大于赣西七、八倍，我军纵可以胜尚、许，决无法胜吴、桂，我军一去马上在吴、桂、尚、许的包围中，有立被消灭之虞。此点省委似未曾虑及。

（三）宁冈能成为我军事大本营，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以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

（四）此种主张绝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敌。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立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

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能有一天工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利的把握。

（五）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七百元，湘南各省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六）伤兵增至五百，欲冲往湘南去，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根据以上六种实际理由，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以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自可出茶、攸、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至此时与湘南通讯息，当竭力设法得到，以期彼此呼应，互相为了犄角。

上项意见，请省委重新讨论，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祷。关于军队与地方详细报告容后奉呈。

特　委
军　委

七月四日于永新城

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一　政治问题及边界党的任务（略）

二　边界各县党的改造与建设

边界特委是最近四个月才产生的，在此短的期间内，虽然曾领导工农红军作过了“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及给旧社会以伟大的破坏等工作，但因为边界是个农村经济的环境，加之党的历史很短，独立斗争很少（因为有红军可靠），故机会主义的遗毒及农民党的倾向，在边界各级党部中表现出特别可怕的色彩。指出过去党内一切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是今后各级党部重要的责任。

攸县的党到现在还未建立。其他各县党的影响亦只及各该县之大部或一部，并未建立坚实的中心区域及普遍发展到四处的广大群众中去。故建立攸县的党和各县的坚实中心区域，及普遍建立各县党的基础，同样是边界党部今后的重要责任。

（一）过去党的错误

1．过去各县党中机会主义遗毒太深，依靠军队而不领导群众做独立斗争，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2．过去各县的党，很有农民党的色彩，有走上非无产阶级领导的倾向，永新的党要公开脱离特委，成立“独立国”。其他各县，如宁、□、莲等县亦不注意向特委作报告，以与特委发生关系。这都是组织上很严重的错误。

3．过去党的机关，在上半期是个人专政，书记独裁，完全没有集体指导及民主化的精神。如特委只有书记毛泽东一人，永新县委只有刘珍一人，以致客观上群众发生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的误解，这完全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党。紧急会议中虽然很严重的指出了这种错误，特委经常有三个常委驻会指示工作，但各科及秘书处等机关，因人材缺乏之故，仍然还是无法建立，加之特委工作人员病者极多，政治时（常）变化，各县委与特委

---

[1] 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在宁冈步云山召开的。本决议第一部分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故略之。

的关系不能密切，故特委本身及对各级党部的指示，仍然还是没有尽量执行紧急会议之决定。

4. 指导机关，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对于提拔工农分子参加指导机关，缺少注意。

5. 过去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伕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尽，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

6. 过去党没有注意基本组织——支部。

7. 过去党的工作方式不对。党的一切问题应该集权于常委会，组织科宣传科……等不过是常委会的技术机关。但是边界的党，不但没有集权到常委会，甚至连组织科宣传科都没有，而仅是书记一人的独裁，紧急会议后，特委本身及永新县委比较好点（由常委会决定各项工作），但特委以下之各级党部，仍然还是犯同样的毛病，一点都没有改正。

8. 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秘密工作，以致养成极大部分党员不懂秘密工作。在夺取政权时，就全部公开出来；失掉政权时，就去“打埋伏”。

9. 过去工作，上级与下级隔开，下级对上级没有很详细的报告，甚至不报告（如宁、遂等县）。上级对下级也没有很好的巡视和指导。党只偏重机关工作，犯了与群众隔离的错误。

10. 过去党太少注意城市工作和工人运动。

11. 过去特委只注意军事范围的布置，如宁冈永新两县工作。没有顾及全部，以致成为军队附属品。如军队打到某县，就注意某县的工作，军队没有到某县，某县的工作就不注意了。

12. 过去党太不注意团的工作，甚至有取消团的倾向。

（二）今后党的改造与建设

1. 党必须彻底改造，从支部改造起，肃清组织上和政策上机会主义的领导。

2. 特委县委都须有四个以上的巡视员，经常指导下级的工作，帮助各级党部改造。

3. 尽量提拔工人同志到指导机关，各级执委会、常委会都须有过半数的工农同志参加，提拔工农分子，特别要注意教育的意义。

4. 各级党的机关，必须组织健全，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集中常委会，各科都是技术机关。

5. 在党的改造当中，应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极力注意讨论和执行党的新政策，坚决与过去党的小资产阶级、自由、独立、浪漫、思想犹豫作斗争，在组织上绝对不容许这些小资产阶级、自由、独立、浪漫的分子，严密防止“独立国”的倾向。

6. 党应该扩大民主化到最高限度，一切政策都要党员热烈讨论，深切了解，使党员群众能根据政策定出工作计划。各级党部委员及书记应尽量用选举方法产生。

7. 党员成份必须是先进的觉悟的忠实的勇敢的贫苦工农分子，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农须严格限制。

8. 党的发展，特别注意质量，在介绍党员当中，介绍者应对被介绍者做许多宣传

和考查工作。凡介绍一个新同志，应在支部会议上通过，经过区委批准，反对拉伕式的吸收党员，必须使每个党员成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员。党的组织不必求其普遍，应特别注意造成坚实中心区域党的基础。

9．党要注意党的基本组织——支部，实现“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同时要特别注意城市支部工作，并提拔很好的工人同志，尽量当农村支部书记及委员，增加工人领导力量，严格防止农民党的倾向。在乡村中的党员，须选出先进分子，加以特别训练，以养成党的中坚。

10．党的组织应绝对秘密，各级党部每个党员，应当极力注意秘密工作，反对依靠军事政治势力去组织党，应在敌人范围内秘密组织党，反对逃跑和“打埋伏”。

11．特委应极力注意使本身和各县委健全，攸县县委应马上建设，对于边界各县党的工作，应有整个的布置。

12．“铁的纪律”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抑止党走向非无产阶级的道路，消灭机会主义的分子，洗刷不斗争的腐化分子。只有如此，才能集中革命先进分子的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使党壁垒森严步伐整齐的成为强健的斗争组织。只有如此，才能增加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所以严格的执行纪律为改造与建设党中的重要工作。

（三）各县工作问题

各县工作详细计划由特委负责讨论。

（四）农村斗争问题

1．过去农村斗争，并没有坚决执行“土地革命”。所谓分田，完全不是适应贫苦雇农的彻底要求，而只是站在富农中农贫农的调和观点上，去平均分配的。这是过去一种重大的错误。

2．过去我们在“土地革命”过程中，并没有施行严厉的赤色恐怖，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莲花茶陵比较好点）。

3．过去在乡村赤色政权之下，太忽略农村中富农、中农、贫农之间的阶级斗争，以致在白色恐怖之下，贫农无团结无力量，富农反对，中农动摇。

4．我们今后农村斗争整个的策略是：团结贫农，抓住中农，深入土地革命，厉行赤色恐怖，毫不顾惜的杀戮地主豪绅及其走狗，用赤色恐怖手段威胁富农，使不敢帮助地主阶级。

5．根据这个策略，我们应即组织：（A）雇农工会（贫苦的佃农加入此组织），以此团结雇农，加强雇农的力量，以为乡村中的主干。（B）赤杀队或暴动队，在白色恐怖之下，以最勇敢工农分子组织之。赤杀队以五人或七人为一队，实行黑夜游击，造成乡村中的赤色恐怖。在夺取政权时，赤杀队可改为赤卫队。（C）在工农群众选举勇敢分子组织暴动队，发展农村暴动，夺取乡村政权。

（五）工人运动问题

1．工人是各种劳动群众之先锋，是各种劳动群众的领导者，过去没有注意工人运动，工人领导更是说不上，以致造成农民党的倾向，这是党的一种重大危机。

2．农村手工业工人及城市工人，我们党须用大的力量去组织工会，领导工人由零碎经济斗争进而武装暴动，纠正过去忽视工人运动的错误。

3. 各级党部各级苏维埃，应极力提拔工人，使之能站在领导地位，领导斗争。

（六）兵士运动问题

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必须将工农兵三种力量很好的配合起来，然后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因为中国的“民权革命”尚未实现，故军阀豪绅买办阶级得以运用封建关系愚弄工农而雇用之，以为保护他们的工具，故现在的士兵有大多数尚安心在敌对阶级指挥之下过饥寒交迫（敌军有几年未发过饷的）的生活，但在国民党未叛变之前，国民革命军相当的都接受了一点“阶级斗争”的宣传。至于事变以后，投入军营的（农协或工会的办事人）当然更有觉悟。这些觉悟分子在反动军官高压防范的严密之下，而又苦于找不着领导者，故不敢轻易在反动军营中作宣传组织工作，实则他们的革命情绪、反水志愿是很丰富的，这可以证明在客观上的士兵运动的可能性，实在已经具备了。而且此运动的成功，在湖南广东等省，已有事实可据。现在反动统治的屏障，完全是靠几百万尚未觉悟的国民革命军，我们士兵运动做的好，则反动统治很迅速的便要倒台，反之，我们不注意士兵运动而只专门做农民工作，则中国的革命，永久也不会成功的！

边界各级党部向来少注意兵士工作，而只顾工农运动（有些党部还仅只有农民工作）。须知我们过去许多失败的经验，主要原因是没有士兵运动参加暴动（如去年广东的年关暴动，湖南屡次的暴动失败……）。现在如再不注意，则将来的失败便可预言。很明显的现在单靠边界主观的力量，妄想打出一个天下，或造成更大的割据是不可能的。所以各级党部必须努力进行士兵运动。莫忘记“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政策，是要将工农兵三种势力配合起来才有可能的。

1. 兵士运动此时与工农运动同样重要，各县应有计划有组织的选派大批工农同志去反动军队内当兵，当伕，当火头，……在敌兵内部起作用。尤其是永新、茶陵、遂川等大部敌兵汇集的县份，要特别注意此项工作。

2. 加紧对敌兵的宣传工作。

3.派人到敌人内部去组织党，不要组织士兵委员会，以免组织复杂而易于惹起敌军军官之发觉。

4. 利用灰色同志及农村妇女，向敌兵作口头宣传和煽动工作。

5. 造谣、恐怖、煽动，以动摇敌军人心，由动摇而瓦解。

（七）宣传问题

1. 过去边界各县的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个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同时在各项工作中（如组织苏维埃、暴动队，分田，组织党等工作），完全不宣传其方法和意义，只是利用军事政治势力去逼着做，“不做就杀”。这是一种最严重的错误。

2. 特委县委宣传科，应设法使之健全，每周标语宣传大纲，都须按期发出，每日壁报亦应发给各级党部缮写张贴。各游击队出发游击，都须有很好的宣传（群众大会——化装讲演、宣传队、个别宣传）。

3. 以后下级党部对上级党部工作报告，须有宣传工作的报告。上级巡视和检查下级工作时，亦须注意宣传工作的检阅。特委县委每周应有宣传大纲发给各下级党部。

4. 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应极力分析军阀内部的冲突，注意反对军阀混战的宣传工

作，同时应极力宣传工农及共产党的力量之伟大，说明军阀混战其结果必被工农暴动所消灭。

5. 我们目前对一般工农群众的宣传，须极力揭破军阀及豪绅欺骗工农政策，多发表本党的主张。

6. 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须制定专门宣传纲要，加紧宣传，深入到群众脑海中。

7. 此时我们应对同志和群众，详细分析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之矛盾与冲突，极力宣传工人农民本身力量及各地暴动的势力，打破灰心没有希望的失败观念，同时要打破同志及群众专门依靠军队的等待观念（自然我们不否认军队发动暴动与帮助工农暴动的力量）。

（八）训练问题

1. 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式都没行过。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

2. 特委组织教宣委员会，制定训练材料，计划每周训练工作。

3. 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训练班，造成干部人材。

4. 各级党部的会议及实际工作当中，应极力提拔工农分子，训练工农分子及干部人材。

5. 目前基本训练工作，应竭力铲除一般同志的机会主义思想和封建小资产阶级思想，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

6. 增高同志的文化程度政治教育，同时要做识字运动，以提高工农同志的“写”“看”能力。

（九）苏维埃问题

1. 过去苏维埃政府差不多完全是农民协会的变形，所以它的工作，是秘书长和主席包办，甚至有些政府还是富农当权，或为知事衙门，这些所谓苏维埃政府，应一律改组。

2. 由特委制定苏维埃组织法，各县各区各乡苏维埃，应一律照组织法组织之。

3. 苏维埃必须以工人贫农革命兵士为主要力量。反对富农、秘书长把持，实现一切政权归苏维埃。

4. 湘赣边界政府重新彻底改造。

5. 各级党部与各级苏维埃的关系要弄清楚，免除党即政府的弊病。关于党与政府不同，特委须发一通告，各级党部要作一普遍宣传。

（十）土地问题：接受中央对土地问题的通告，交特委讨论，作最后决定。

（十一）CY问题

1. 青年团是党在工农群众中的政治组织，过去边界各级团部多不明了青年团的政治任务，团在边界各县仅只作了些扩大影响的文化运动，事实上成了党的附属机关。因此造成边界各级党部更严重的错误——主张取消团。

2. 目前边界各县当是建设团的工作，但是团的本身力量薄弱，很难单独担负起这个责任。各级党部必须划出一部分力量，经常注意团的工作，帮助团在边界各县普遍的建设团的支部，扩大团的组织，健全团的指导机关。

3． 团的经费应该独立，以便团在工作上能够措置如意，避免团在经费上依赖党的观念。

4． 注意团的工作，是各级党部应有的责任。今后各级党部向上级报告中，必须有“团工作”的一项。上级巡视员在检查各级工作中，亦须留心团的工作。

5． 各级党部、团部多不明了党与团的关系，以致发生各干各的倾向。（下缺）

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

（一）大 会 记 事

四军五次大会是本年五月在宁冈茅坪开的，到现在经过了六个月的艰苦斗争，六次大会于十一月十三日开预备会，十四日开正式会，十五日闭会，计到代表七十九人*，四军全军的支部除三十二团一营远在永新派代表来不及外，所有支部均有代表参加，各代表所携提案计三十余种，经一度整理将意见相同者合并计得十七种。大会中讨论了政治、军事、党务各种重要问题，尤其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有极长时期之辩论，这是六次大会的特点。关于各种提案因各代表身负重责急须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讨论，乃决定移交新军委讨论执行。新军委选举最初由大会主席团提出四十九人候选名单，经大会选定二十三人为六届军委委员，组织执委会进行一切工作，大会于十五日闭幕。这次大会一切决定关系红军前途及边界发展至巨，乃志其概略于此。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编者于新城

（二）政治问题决议案

（1）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根据国际二月间对中国革命问题决议，认定中国革命还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阶段，这个革命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其内容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完成中国民族之解放，对内推翻军阀完成土地革命，将封建剥削关系消灭，使中国被压迫群众得到民权自由。要这样才能培养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若果否认这个民权的革命阶段，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到了社会主义的革命时期，这种误解与中国革命极有害，我们从过去的斗争中，证明国际意见的真实。从广州暴动以来，各地烧杀主义便是根本误解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红军四军于……（注：原稿缺字）苦的经验，我们今后的行动是领导工农兵群众及小资产阶级，扩大民权革命运动，深入土地革命，推翻目前最反动的局面，红军必须宣布具体城市政纲，力改前次无限制没收军需品的政策。

（2）国际情势——从德奥资本主义复兴，英法海军协定、美国非战条约、意大利争地中海海权、日本对华出兵、美国对华单独修约诸事件，证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间的冲突日趋激烈，这是国际革命涌进的时机！

（3）国内情势——近来国民党各派军阀成立了一个联合政府，表面上鼓吹永庆升平，实际上蒋介石派专政拉各派图一时的相安。从军政、财政、党务三方面国民党内部

* 另一说四十九人。

包含了极繁复的裂痕，尤其是北方匪祸与南方工农兵暴动证明这个“统一的政府”的力量薄弱。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统治中国的主人是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帝国主义既是不一致，则其卵翼下的军阀政府更是分崩离析的了。所以中国现时政局的暂时相安，只是在酝酿着军阀们的大混战。

（4）苏维埃政权的产生与存在问题——在白色势力统治下的中国能生长出苏维埃政权而且有继续存在的情势，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征。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在半殖民地的统治阶级根本是割据的确不能统一的。苏维埃政权即从其分裂中长成，如果统治阶级的分裂是继续不断的，则苏维埃政权也同样的能继续的存在下去，我们从一年来各地苏维埃政权之发生证明了上面理由之真实，又从边界一年来的割据证明苏维埃政权之继续存在须要下列四个条件：①能坚决斗争的共产党；②广大的有组织的工农群众；③有相对力量的武装红军及赤卫队；④有利于斗争以少胜多的地势。

（5）目前政治任务——湘赣两省在中国地域上过去经过极汹涌的革命潮流，群众运动比较有深入的基础，边界割据便负有影响两省革命运动的使命，怎样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党，领导群众扩大民权革命运动，深入红军所到区域的土地革命，向四周发展以促统治阶级的分崩离析，这是党在红四军中的政治任务。

（三）党务决议案

（1）红军中各级党部，不应公开处置各种事务，竭力恢复秘密状态，党的机关可设置在各级士委会内，党的负责同志须兼为士委职员，对外须提高士委权力，成立党团指挥之。军事机关亦需健全，使其有执行党的命令指挥军事的权力。纠正过去党部直接处理日常事务，视军事机关及士委为虚设的毛病。

（2）五届军委决定健全各团委，军委只负政治指导责任，因此对于下级情况毫不明了，各团委亦独自为政，遂有不能集中之弊，今后应健全军委，军委须经常明了各支部的工作。

（3）红军迭经巨战，党务干部人材已伤亡殆尽，此后军委须经常成立政治训练班，陶铸党务工作人材。

（4）须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其比例至少须二分之一。

（5）连上支部干事会应改变称连支部委员会，扩大委员数量，使多数同志参加干部指导工作。切实做到连支委为红军核心，支委人数定五至七人。

（6）连支委为红军党的工作的核心，党代表则为此工作核心之负责者，并同时负有计划督促政治工作之公开任务，在事实上目前党代表制度不应取消。

（四）军事问题决议案

（1）建立军事根据地——A、在大小五井建筑巩固工事；B、在根据地尽量屯积粮食；C、在根据地建筑医院、营舍及红军纪念堂。

（2）部队编制——每连长枪定七十五支，每营四连，每团一特务连，其枪数与步兵连等，每团可有机关枪连与迫击炮连，每连步枪四十支，团部传令排定枪八支、营部

四支，军部可成立特务营，其组织与步兵营等。

（3）一切枪弹归军部，各团、营、连不得自由分配。

（4）短枪每连至多不过六支，营部至多不得过三支，团部至多不得过五支，军部至多不得过六支。

（5）红军战术遇小敌则以主力迅速消灭之，大敌则用群众力量四面包抄，使其疲于奔命，然后用主力消灭之，红军竭力避免硬战。

（6）军事技术须加紧训练，对于下级干部的军事指挥更应注意。方足健壮红军战斗力。

（7）在军队组织中要特别健全侦探队，卫生队，担架队，辎重队，军需处诸种组织，并须训练专门人材，担架队在每营可设担架排。关于经济经理及报告应采用新式簿记。

（8）编纂红军战史及死难同志传略，并收集其遗嘱遗物作纪念品。

（9）红军政治训练要注意下列诸种：A、健全士委会，使其全能代表士兵利益，参加军队管理，维持军队纪律，厉行士兵政治教育及对外作群众运动；B、分期举行士兵识字运动；C、启发士兵阶级觉悟，使士兵了解革命中各种主要问题，并具备政治常识；D、筹备各种娱乐，引起士兵自动参加，使其得到艺术的享乐；E、连上须组织三人以上宣传队，战时平常不断地作宣传工作；F、标语口号须由军委规定发出，以求统一，免至混乱。

（10）各级党部须随时计划作破坏敌人工作。

（11）为使红军扩大须应募工农及革命分子来红军入伍。

（12）军委须着手健全三十二团第一营。

（五）经济问题决议案

军部军需处及各团辎重队，每月需要作一详尽经济报告，交由士兵代表会审查，审查后向群众公布，务使红军经济彻底公开。

（六）纪律问题决议案

十一月十日红军新城、永新之役，宁冈四区赤卫队及一部农友不来前线作战，夺取敌人枪械及担任运输、救护、搜山等工作，仍在新城附近农村中专事收搜耕牛及其他杂物。此种行动实属违犯革命纪律，侵犯农民利益，我代表大会应向宁冈县委及县政府提出质问，希望以后不宜再有此项行动，关与索去耕牛须尽数发还，并公开发表宣言，解释此项错误，使群众明了。

（七）大会各代表提案

（1）健全担架队；

（2）健全侦探队；

（3）健立军事政治学校；
（4）优待敌军；
（5）招新兵；
（6）收买枪弹西药；
（7）派员联络五军；
（8）整饬军纪党纪；
（9）屯积粮食于后方；
（10）颁布民权革命的政纲；
（11）禁止盲目焚杀；
（12）保护中小商人利益；
（13）恢复罗霄山脉政权向北发展；
（14）红军须依照太平天国军队的编制；
（15）速定红军人员武器的编制表；
（16）军队中不准私行买卖；
（17）健全士委会；

以上十七种提案，大会因提前闭幕，未及详细讨论，均交新军委讨论执行。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六日　发行

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湖南省委请转中央：

（一）关于中央来信

中央六月四日来信，经过江西省委吉安县委，于十二月二日才到井冈山。这封信好得很，纠正了我们许多错误，解决了这边许多争执的问题。这封信一到，即已发交军中及地方各级党部。十一月六日，向遂川出动的部队集中井冈山，特委委员、军中及地方的活动分子，共三十余人（朱德、陈毅、何挺颖、何长工、袁文才、王佐、谭震林、邓乾元、李却非、陈正人、王佐农、肖万侠、刘辉霄、谢春标、刘敌、熊寿祺、杨开明、曹 铄、邓 久 廷、毛泽东、宋 乔生、彭祜等均到，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亦参加），由特委召集开会，讨论中央来信。认中央来信除一二点（如游击区域过宽与废党代表制）具体事项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党的最高机关亦即组织前委。依照来信，前委现在江西境内，受江西省委指导，如到湖南境内时，即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请中央经过两省委随时直接指挥。可惜中央来信四个附件中，只翻出了《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国际二月决议》两件，《军事工作》、《组织问题》两件翻不出来，这两件十分急需，请速告翻译方法，或另写一份寄来。

（二）边界割据及八月失败（略）

（三）九月至今的边界割据（略）

（四）现在的问题（略）

（甲）军事问题（略）

（乙）土地问题（略）

（丙）苏维埃问题（略）

（丁）边界党的现状（略）

（戊）革命性质问题（略）

（己）割据地区问题（略）

（庚）交通及其他

1. 交通机关的建设极其紧要，兹付二百元（金四两）交袁、肖两同志，即由两同志负设立机关的完全责任。续需经费由此间担负。地点在萍乡。吉安方面亦须建设一交通机关，由江西省委负责。

2. 此信差不多写完，接到中央来信。由湖南来的一份，多了第四十七号通告（秘密组织问题），军事工作决议案仍没有。此外有润仙同志八月十五日信一件，内说以前派交通送中央的信及通告来，均未到，诗三首亦不见。

3. 我们已能随时得到报纸，比之以前二三个月得不到报纸高兴多了，惟仍望你们随时将政治情况分析见告。

4. 杜修经的错误，经八月南征部队到桂东沙田时开的代表大会议决，请求省委给以处罚，因他是省委代表。

5. 毛泽东八月写给省委并转中央的长信，前委完全同意，仍由袁同志带上。

6. 袁德生同志因等候对中央来信的讨论及答复，现在才回省委。

7. 以后兄处对此间的指示，务请参考我们的报告，切不宜单依据巡视员的片面报告。六月巡视员杜修经对省委的报告，观点完全错误（如赤卫队加二百枪足以保卫边界割据，红军当时是保守主义等），省委即依据此等报告决定行动，所以失败。又兄处以后对于此间军事行动的指示，千万不要太硬性。中央来信要我们依据环境自加决择，有回翔余地，最为妥当。至于去冬今春的湖南省委及湘南特委，听信此间开除了党籍的犯罪逃兵苏先骏（团长，后告密捕郭亮者）何恋（参谋长，后郴州烧杀的负责者）的造谣，更是危险。以后任何不负责任的话，务请勿听。

8. 杨开明重病，宛希先在此间有重要工作，不能来湘东。

9. 青年团的状况，由团的特委报告省委，此处不赘。

10. 此信写三份，一份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份由湖南省委转江西省委，一份由吉安县委转交江西省委转中央，必有一份可以送到。

前敌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

注：省略各节，即《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土　地　法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制，在井冈山）

（一）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之：

（1）分配农民个别耕种；

（2）分配农民共同耕种；

（3）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种。

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

（二）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之后，除老幼疾病没有耕种能力及服公众勤务者以外，其余的人均须强制劳动。

（四）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殊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备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乙）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丙）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五）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1）以乡为单位分配；

（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

（3）以区为单位分配（如遂川之黄坳区）。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六）山林分配法：

（1）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2）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3）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土地税之征收：

（1）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以上三种办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得分

别适用二三两种。

（2）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3）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

（八）乡村手工业工人，如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九）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按：此土地法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井冈山（湘赣边区苏区）制定的，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内土地斗争经验的总结，在这以前，是没有任何经验的。这个土地法有几个错误：（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二）土地所有权属政府而不是属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三）禁止土地买卖。这些都是原则错误，后来都改正了。关于共同耕种与以劳力为分配土地标准，宣布不作为主要办法，而以私人耕种与以人口为分田标准作为主要办法，这是因为当时虽感到前者不妥，而同志中主张者不少，所以这样规定，后来就改为只用后者为标准了。雇人替红军人员耕田，后来改为动员农民替他们耕了。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一九二九年一月）

红军宗旨，　民权革命。　赣西一军，　声威远震。
此番计划，　分兵前进。　官佐兵伕，　服从命令。
平买平卖，　事实为证；　乱烧乱杀，　在所必禁。
全国各地，　压迫太甚。　工人农人，　十分苦痛。
土豪劣绅，　横行乡镇；　重息重租，　人人怨愤。
白军士兵，　饥寒交并。　小资产者，　税捐极重。
洋货越多，　国货受困；　帝国主义，　那个不恨。
国民匪党，　完全反动，　口是心非，　不能过硬。
蒋桂冯阎，　同床异梦；　冲突已起，　军阀倒运。
饭可充饥，　药能医病；　共党主张，　极为公正：
地主田地，　农民收种；　债不要还，　租不要送。
增加工钱，　老板担任；　八时工作，　恰好相称。
军队待遇，　亟须改订；　发给田地，　士兵有分。
敌方官兵，　准其投顺，　以前行为，　可以不问。
累进税法，　最为适用；　苛税苛捐，　扫除干净。
城市商人，　积铢累寸，　只要服从，　余皆不论。
对待外人，　必须严峻：　工厂银行，　没收归并；
外资外债，　概不承认；　外兵外舰，　不准入境。
打倒列强，　人人高兴；　打倒军阀，　除恶务尽。
统一中华，　举国称庆。　满蒙回藏，　章程自定。
国民政府，　一群恶棍；　合力铲除，　肃清乱政。
全国工农，　风发雷奋；　夺取政权，　为期日近。
革命成功，　尽在群众。　布告四方，　大家起劲。

军　长　朱　德
党代表　毛泽东

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

——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党的策略方针——

（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

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

自六次大会新中央回国工作半年来，几次派人通信给你们，始终未能得你们回信，真不胜焦念。只是赣西特委在前两月曾来一信，说你们给中央来了一个报告为他们遗失了，而中央给你们信托他们转的，也同遭遗失，其原因恐系同志窃去向敌人告密，现正在严查中，但即此也是妨害了你们的工作，帮助了敌人进攻的布置。

敌人这次进攻计划第一步似已失败，你们的主力现已退出井冈，依报载似经过大庾往南雄拟与胡凤璋部会合不遂，而又转往湘南的。你们的别支似经过扬眉寺来往信丰以牵制赣州王均部队的。报载你们将经过寻邬往闽粤边境，我们根据湘赣边境土地革命的深入，武装群众多湘赣□□□□湖南农民以及前年南昌暴动的经验与海陆丰苏维埃的失败，判断你们未必即取入闽粤边境的计划。不过另一方面，根据敌人军事布置，你们由大庾经汝城开往湘东□□□□及闽南农民斗争最近的发展与闽粤边境的□□□□曾预料你们或有不得不走闽粤边境的一着。□□□□大明，但你们的主力确已离井冈至赣南。□□□□你们的指示在原则上仍与先前的指示无大变更，×现在再将各项问题的要点重复指示如下：

目前的国际形势，依国际大会的分析，世界革命已走入第三期，世界资本主义因生产量的恢复与发展又发生了新的矛盾，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又需要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市场，生产的合理化在资本主义世界更增加了工人失业减资加时的痛苦，各国工人运动更加左倾。如帝国主义一致地向苏联进攻，更证明苏联政权的巩固与增加帝国主义的恐慌，殖民地民族的发展，尤其是印度罢工的高涨与中国群众斗争的复兴。在这一时期的国际任务是，反对世界大战，反对瓜分中国，保护中国革命。

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已日益加剧。英美的冲突成为未来世界大战的中心。英在欧洲便联法以制美，在亚便联日以制美。日美冲突仍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中心问题。自济南惨案直至目前新关税协定的实施，美日的冲突更加明显。美帝国主义显然是以其财政资本企图垄断中国。中国资产阶级与蒋系军阀已显然依赖美国金元以达其发达资本主义压服革命的企图。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是日有发展，现在南京政府正在极力进行各项借款与聘请美国顾问的卖国工作。相反的方面，便是英日两帝国主义仍极力进行其瓜分割据的企图，扶助桂奉两派军阀霸占西南东北以及长江×游以延长中国的封建势力。自然

英日中间亦有很多矛盾，尤其是过去一年间长江流域的商业竞争，显然是英日在□□□霸，故武汉广州南洋的排日多少带有当年省港罢工的□□的意义，中国统治阶级中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矛盾根本不能调和，只是资产阶级目前尚需要□□□□虚伪的和平与形式的统一，以求得帝国主义的赞助，好□□□的减轻租税企图商业振兴运输便利。在买办地主阶级的武力现在虽不甘于受资产阶级的进攻，但目前也□□□直接开火。故编遣会议仍然在相互的让步中成就□□□妥协虚伪和平的相持局面。在这一相持中当然各自还时刻不忘准备更大的冲突。所以两派战争的直接开火终于不可避免的要到来。各派小军阀虽还各有其地方性愈易爆发其军阀混战，但混战结果也终于不可避免地联结到两大系军阀的对峙局面之下。

统治阶级在目前稳定的可能有多大？在中央的分析认为，武断地说统治阶级绝对没有稳定可能也非事实。但依照资产阶级与地主买办阶级根本的矛盾，得不到地主减租和帝国主义更多的让步。各帝国主义在华彼此间的矛盾冲突，完全殖民地化了中国的困难，军阀制度的存在，工农斗争的不断兴起，均是说明资产阶级稳定的可能限度极小。稳定的可能小，便是崩溃的前途多，故军阀战争也如世界大战一样，成为中国革命群众的反对的主要对象。

但军阀战争——两个统治阶级的冲突，虽终不可避免，然目前仍是相持局面，对革命仍是一致的压迫。且他们因为各自加增其战争力起见，都在争夺群众做他们政□的工具。自然资产阶级的争取群众是要以改良主义的口号欺骗，封建阶级则根本在屠杀群众不要群众，但目前在策略上则因受资产阶级的群众策略和群众斗争发展的影响，亦利用改良主义口号向群众□□，收买群众领袖以为己用，或是组织劳资或佃主合组的工农会，以便御用。因此，全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虽然奋起，但困于我们□□□□薄弱和工人组织力战斗力还未健全以及改良主义□□□□影响，以致工人斗争很难造成广大的革命发展。农民□□□方，则因城市工作未能建立和发展，得不到城市援助，致使许多苏维埃区域都相继失败。现时的斗争虽还在坚持着，仍总是起伏无定。北方农民运动多还停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乡村阶级分化亦极不明显。反军阀捐税的运动多为新豪绅（中小地主与富农的化身）所领导，所出卖，以换得乡村村长的地位，以延缓农民反地主的斗争。兵士的阶级觉悟在南方虽渐发展，但在北方则甚落后，且其对土地革命的认识还未深切，故全中国的军队、民团仍然为军阀豪绅用以屠杀工农的工具。城市的贫民虽因苛捐杂税的繁重，生活的痛苦，教育的破产，对现政府渐致不满，但对国民党仍未能完全打破幻想，对我们亦还多未能为政治上的了解，政纲的接受，甚至还认我们为杀人的“匪党”的。

党的方面自广州暴动后，城市支部更加达到削弱的地步。到现在除掉上海、香港还有支部的组织，其他重要城市、产业支部的组织，有的仅具形式，有的连形式都不存在。乡村中党的组织在南方虽甚发展，但多半是群众的组织，且常随着农村暴动胜败而起落，有时一县可发展到数千数万党员，有时一个也不（没）有。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既如是削弱，而干部分子又因两年来白色恐布的摧残损失极（大），故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经六次大会正确路线的指导，终未能健全起来。加以革命失败的反映，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浓厚，党内政治水平线的低落，一般干部分子的观念更易消极悲观，□□错误，以致党到现在还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群众的先锋队。所以就统治阶级趋向崩溃的前途，他对革

命□□□□□但也不能解决，而工农斗争仍继续存在的形式，使中国革命的高潮仍是必不可免的要到来。只是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工农群众的组织和斗争都还未能有□的较平衡的发展，故革命的主观力量反不能促进这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有时因主观力弱，任凭客观的形势如何有利，反会延缓或阻碍革命的到来。目前的革命性质仍在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阶段中。革命的任务是赶走帝国主义与彻底地消灭封建阶级。革命的动力却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兵士及城市的贫民。所以革命的目的必然要推翻豪绅资产阶级——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因为革命是无产阶级在领导，资产阶级已背叛革命，而革命的任务必然要走到打倒帝国主义，加以世界革命的发展与苏联的存在，故中国革命又必然地要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

六次大会指导的争取群众的中心任务，在目前更证明是极正确的需要。我们党若不能团结广大的工农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群众于党的周围，任凭客观的政治环境于我们如何有利、工农的斗争如何发展，甚至农村苏维埃区域还能继续建立，红军的组织如你们所领导的队伍在其他区域又能存在，但仍然不能促进这一革命潮流的高涨。因为目前的形势很显明；无产阶级若不在我们党的指导之下，领导革命的发展，则反帝运动——尤其是工农运动便如目前的复兴也会被资产阶级领导向着（改良方）向走。工人斗争可以为改良主义的口号所欺骗，□□的农民区域可以为敌人聚集的力量，在城市斗争已经□□下，□□后来图谋消灭（自然不能根本消灭）。这困难的环境，需要我们党以无产阶级极大的耐心□□□的努力来战胜他。故目前党的主要工作在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支部）与领导的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但这并不是说土地革命我们不求深入，农民自发的暴动我们不去领导，乡村的游击战争我们不去发动，农民的武装组织我们不去工作，而是说我们这些工作，必须与目前党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相适应，必须与日常生活斗争和群众组织相联系。然后，这些群众斗争的发展才能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较平衡地前进，才能促进全国的革命高潮。

因此，你们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宜在这一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前面重新下一责任的决定。中央依着六次大会的指示，早就告诉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的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中央这一指示，主要的条件是根据于目前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发展农村广大的普遍的斗争，所以采取这一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的政策。不过这一政策的指示或者是未达到你们的组织，或者是未为你们所接受所采取，故这次战争中你们应取的战术仍然是集团的行动。自然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中，你们目前不得不采取这样的战术，只是中央的意见仍以为你们必须认清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决的执行有组织的分编计划。但你们切须弄明白：中央决不是要你们来采取失败主义的精神将红军遣散回乡，而是要你们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分编我们的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中去。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自然这不是太死板的数目）。这些分编的部队必须互有联络，互相策应，且须尽可能地散在农民中间，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现在你们的部队不管是仍留在赣南的三南或又退入湘东，必须采取这一决定。不然，东窜西奔，这一武装力量将日益与广大农民群众的日常斗争隔离而成为农民群众以外的一个武装力量。自然，在革命高潮来

到的时候，农民的武装将愈加积聚成为红军的组织，从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看来是愈于革命有利的，但目前的问题中心并不在此，而是要计算这一武装力量如何能避免敌人的消灭。有时为作战起见，许多武装力量必须联络起来，但决不宜在任何时候竖起一个集中的目标给敌人攻击。过去海陆丰琼崖的红军成例，因为集中的缘故（自然海陆丰的红军有不得不集中的客观条件，如兵士□□□□□但也不是绝对不可分编的）便易于为敌人□□□□□甚至消灭了多部分。故湘赣边特委所领导的部队，必须懂得这个教训，急速地在被敌人击败之后，□采取保持实力，散在乡村中去的分编部队计划。假使你们退避的路线是往闽粤边境，则□□□便须更从长计议。因为部队群众多□赣□分散在闽粤乡村必极虽深入，故一时的集中组织或还需要。但仍应尽可能地采取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的策略，切忌将自己做成太平天国式的农民军队的行经。闽□□半年来农民斗争颇发展，尤其是永定暴动在乡村中支持了六个月，现在虽失败了，但并未根本消灭。且斗争的发展极广，不只永定一处，许多县都有我们党的组织。如你们领导的部队开往闽南，必须十分注意助长闽南农民斗争的发展和扩大。

中央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利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即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至部队的分编与两同志脱离部队的办法，另由中央军部拟具详细计划附去（此计划当然不能机械地执行，要很（灵）活的运用）。

湘（赣）特委组织仍暂存在，其改组办法由你们自己决（定）。

（此信由湘赣粤三方面设法送达）

中　央

前　委　来　信

（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于瑞金）

中央：

二月七日的来信由福建省委转来，四月三日在瑞金收到。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三次进剿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固然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的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六次大会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但革命的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有可能。

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部却袖手不去领导。由闽西赣南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劣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积极防止。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的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六次大会指出了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中央此信有"发展农村中广大普遍斗争"之言，这种意见才是对的。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一九二七）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多不是本地人，与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的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见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红军成份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平、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

虏兵）。（二）分小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五军在平、浏，四军在边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敌人击破者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之刻不能离。

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因我们的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失败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大于我们的失败。宁都和汀州两役的胜利，地头蛇之郭、刘二旅完全消灭了战斗力，使赣南闽西一方致有现在之群众发动成绩，设无部队集中，指导机关健全决办不到。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

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在湘赣边界时，大概集中兵力一度击溃敌人之后，可以散开工作两三星期（分数大支出去，每大支都（又）分数小支出去），及至敌人再整军来，我们又集中起来了，再去击溃敌人，再分散工作。此一次敌人穷追，我们用盘旋式的游击，可以走很宽的地方，发动很（宽）的群众，每到一处少则顿住半天，多则顿住五天，先之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统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人，路上行军和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继之以散发财物（大地主反动分子的谷子、衣物、器具），然后进行组织（党的支部、秘密工会、秘密农会）。群众工作的技术，现在比以前更娴熟了。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与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只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的。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决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要失败。

现在党的指挥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为别的需要朱、毛两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昌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

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的会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粤湘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旅已被击破；陈（国辉）卢（兴邦）两部均土匪军战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比较能打，但根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团好的；且

现完全是无政府，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其中一大半和我们作战过，除李文彬一旅之外，其余都是被我们打败过的）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

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团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的红军独立第三团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立无产阶级的斗争基础，使能领导浙、赣、闽三省的农民斗争。江西省委必须健全。南昌、九江、吉安及南浔路的职工基础须努力建立起来。

我们三月十四日到汀州，战败郭旅，打死郭凤鸣，始知蒋桂决裂，国民党大混战快到来。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以发动群众，以群众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因此，我们不下杭永，也不去龙岩，在汀工作十七日，于四月一日开到瑞金，定四月八日进占于都，到于都当召集一扩大会，与赣南特委与中央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同志等讨论行动计划。闽西、赣南的群众非常好，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土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在汀州组成了二十几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二倍。组织了一个赤卫队，单独站不住，随军来到瑞金。政权机关开始是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政治部任命的及至工会农会各组织了几个之后，即召集代表会议选举正式革命委员会。临时与正式的革委都发布了政纲。到瑞金规定四天工作计划，把部队分散到县城、壬田、西江、九堡四地工作，每地再分小支，指挥机关在县城，瑞金民众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可惜以前毫无组织，一个同志也没有，无本地领导组织，工作仓卒，难得做的好，特别是县城。到于都后，大约有一星期在县城及四郊工作，以后或向宁都、广昌，或向万安、太和，看情形决定。赣南游击一个时期再赴闽西，那时须与郭凤鸣残部及卢兴邦、陈国辉战，福建省委须努力准备。

军中状况，四军除小部分留边界外，大部出来计三千六百人，二千一百支枪，在大余、信丰、寻邬损失约二百支枪，六百人（多数是作战时失去联络），真正被敌拿去的不过几十支枪，一百多人。报纸所载那些骇人的消息，都是敌人欺骗的话，宁都、汀州两战之后，不但恢复原状，而且增长些。全军现在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纵队，每纵队辖二支队（等于营），每支队辖三个大队（等于连），每纵队约枪五百余支，一千二百余人。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与集合，都很便利。彭德怀同志之第五军到井冈山有八百人，枪五百支。此次到瑞金有六百人，四百枪，现在编为四军第五纵队。彭德怀同志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之。数日后须返湘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政治部已设立，军设军政治部，每纵队设纵队政治部，政治部内部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分职工、农民、党

务三股）、政治保卫科。支队大队两级设党代表，纵队以上拟废除党代表，只有政治部主任。全军在汀做了整齐的服装，每人发四元零用费，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赣东黎川方面（与广昌接近）有两个部队想来接头，一是金汉鼎部下反叛出来五百多人，三百多枪，现编为第四纵队，纵队长田桂清；一是土匪军三百多人，二百多枪，到处被打无出路，现编为独立营，胡竹笙为营长。此两部约定四月十四日后开到宁都编就训练。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现在兴国一带，与我们联系很好，湘赣边界一度被击败之后，现必到了恢复的机会，那边除王佐部二百支枪系属红军第四军外，宁、永、莲、遂、酃、茶六县有赤卫队共八百支枪，在军阀混战无力顾及的时候，不但可以保守，且可以向外发展，彭德怀同志率部回去，当更会有办法。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是邓乾元同志。湖南自去年三月暴动失败之后党的基础在盲动主义之下完全毁灭，农军武器也被豪绅缴出，群众被镇压下去了。去年八月红军攻郴，在资兴、汝城、桂东组织三个县委，三个农民武装赤卫队，另组织一个特委辖之，杜修经为书记。近接报告，他们又在盲动主义之下牺牲了。醴陵去春暴动之后，党的组织被打破武装被消灭之后，夏季又向四军领去七十支枪，秋季全部覆灭于攸、礼交界之黄土岭，此足见少数武装单独存在之不易。

红军党的领导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去年六月四日中央来信云：“关于前敌指挥机关，中央认为有组织委员会之必要，委员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此外还须组织一职工委员会，前委的工人同志为书记，一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书记。军委及工委名单由前委决定。所有管辖的范围，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归前委指挥。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时受湖南省委指导。主管的省委，接到前委的报告，应立即回答，并将前委的报告及省委的回答立送中央。”我们对中央这种组织的指示，认为十分适当，合乎斗争的需要。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指挥，亦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五军在平、浏，四军在湖南及湘赣边界，多次的失败，在地方主义指挥之下，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毒害。

从去年八月起共有三个报告给中央，一个是去年八月毛泽东在边界失败时写的一封长信，讨论割据地及湖南省委的政策，由湖南省委转中央，原稿已失；一个是去年十一月起接到中央六月来信红军须重回湘赣边界时前委做的一个报告，历史的叙述湘赣边界斗争的经过及割据问题政策计划等，由湘赣两省委转上，此信原稿尚存，特重写付上。以上两重要报告，中央一个未收到，无怪对我们的情形完全隔膜了。一个是三月二十日前委在长汀发的信，由福建省委转来，未知能达到否？今亦重新寄上。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及到汀州才看到少年先锋第三、四期，中国工人第三期，北京版的人言第二期，汀州留沪同志出的前哨第二期。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由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县可以看到何健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言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个报告。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

关于五军四军会合后的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四月四日于瑞金）

彭　德　怀

中　央：

我们现在已到闽赣互界与四军会合了，并得四军前委的介绍，特将我们的情况略告如下：

一、我们在平江城于一九二八年七月廿二日鼓动军阀士兵闹饷，引入革命的道径，解决该地武装，建设苏维埃，割据了七天，对敌人估量太小，实行分兵主义，一部分到浏邑，一部分去通咸发动群众，大部分留驻平垣与敌应战一日，不知拖上山去作盘旋式游击，后来去浏之部反水，以致平垣失守，伤亡甚多，再攻长寿又退败，攻泗水没收反动的物品散给贫民，建设苏维埃，恢复党的组织，割据了九天，敌来犯，因得了前次的教训，故不与应战，向铜鼓，然铜垣商人闻知红军到了就要没收商品，故该垣大小商民物品搬走一空，且民团极为反动，同时追兵又到，乃仍撤回平江东乡，今该地区委要求再攻长寿街，并报告该地敌只有七百人（实在三团），后来死战了一天，结果失败，子弹消费，官兵伤亡，损失甚大，这完全是举行农民的意志以满足其地方观念所致失败，同时湘赣出兵围剿，黄金洞战久不利，适得湘省委的指示，五军因前任务要打通华与四军取得联络，根据指示于阴历八月到万载，遇鲁涤平部，被击败，又撤回铜鼓，到修水，通过九宫山武宁等处，盘旋游击，后因湘粤赣大会剿，为减少目标，转移敌人视向，决定盘旋游击，留一大部分在平、浏、修、铜等处，保全乡村割据，余经万载莲花，到井冈山与四军取得联络，这个当中修水的西乡，在苏维埃领导之下的农民已有六七万了，浏阳的党已有起色，平江除城市外已普遍的组织苏维埃，党员已达七万五千，不过犯了大烧大杀的盲动主义，以致乡村经济完全破产（如农民数日不得食）。后来召集修水平江浏阳铜鼓的党开了一次联席会，产生湘赣特委，组织修水铜浏的党，纠正过去的错误。这是平江暴动在十一月底的经过大概情形。

二、第五军达到井冈山时，前委决定五军守山，四军向赣发展，群众打破会剿，实行围魏救赵的政策，与我以物质的补充。四军于一月十四日出发，湘敌即于十六日迫近根据地，至廿六日前湘赣敌军围攻井冈山，他们猛攻了一昼夜，自那天大雪严寒的时候，亦决心极少的挣扎挣扎，至廿九晚湘敌由右翼小路爬上山，攻破黄洋界，我们力图恢复，未克。卅日晨八面山又被攻破，敌人死亡的数百之众，我方亦牺牲七八十人，但因子弹告尽，疲困已极，不得已集中兵力冲出包围，我方死伤约四十人，虽大部冲出，

仍被截断一小部约百余，再拟回救，但以官兵三日应战，疲困万分，同时损失又大，并据俘虏云敌人尚有一团增加，马上就到，实在事实上已不能回救了，故只得舍去。以后虽打了些败仗，但也打了些胜仗。损失相等，故不赘呈。

三、总上三项的缺点如下：

（1）在平江暴动时没有与当地的党发生关系，准备不充分。

（2）暴动时仅有三个同志，党的基础完全没有，以致敌军压迫最利害，时常发生动摇与叛变（到十月间三个团长叛变，参谋长叛变，当时就处决一个，余者皆逃走，但结果也叛去二连。）

（3）在清怀入党至暴动时尽三阅日，党的训练极少，在暴动中虽介绍些同志，也没有人去训练，实际上等于零，这些官兵不肯上山，总要占城市，以致免不了硬战。以上是浏、平经过的缺点。

井冈山失败的缺点：部队复杂，指挥不统一，兵力单薄（一与廿比），昼夜出兵，得不到休息。子弹缺乏，然敌人此次会剿有决心，有计划，悬重赏，比如得我们一支枪赏卅元，其兵前仆后继的攻击，虽然如此，敌人没有缴一支枪去。

四、所得的教训如下：在反革命高潮时不宜分兵，分则气虚胆小，以致卖枪变私（因红军不是本地人），又不全数是党员。即平日是好党员，到危急时，也有许多不坚决的。领导人能力亦大有关系，有些同志是忠实的，但到了紧急时想不出办法，以致消灭，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严重时期，只有领导者下决心与群众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的游击，才能渡过难关，万万不能采藏匿躲避政策，就立刻上了消灭之途，另一方面西南各省团防，洪匪的组织是普遍的，如果分散，他们也要来打，这是作盘旋式游击战争的理由。

①中国道途交通不便，尤其是西南各省多山，我们的部队轻便，行动敏捷，敌则反之。

②为什么白狼穷追而失败，因他不知发动群众，又无党去领导，他又在河南一带平地，当然是要失败，我们知道夺取群众，有党报说敌人兵力较小，我们就打，他较多，我就避免，似此敌人虽多他是没有办法的，若分很小，一定是消灭，这是我们多次得来的经验。以上是五军的始末，现已合并四军编为第五纵队，受前委指挥了，合并奉阅。

红军第四军军党部布告

（一九二九年）

告商人及知识分子

做生意的同胞们：

读书的同胞们：

（一）共产党所指导的红军到你们这里来了，共产党会怎样对待你们呢？你们要怎样对待共产党呢？你们要怎样对待革命呢？

（二）共产党在现实领导的革命，叫做民权革命，是要打倒三个反革命东西。第一个，打倒帝国主义。不许洋人在中国逞凶，中国归中国人管，不许洋 人 支 配 中国。第二个，打倒地主阶级，废止收租制度，田地平分与农民。第三个，打倒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兵政府。这就是共产党在现时领导奋斗的三个大任务。

（三）提出这三件任务，你们不要吓倒了。岂但不要吓倒，应该十分欢迎。做到这三件事，是工农阶级的盼望，也是于你们有大益的。你们明白你们的地位么？你们是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洋货不断的进口，中国工商业不能发展，你们想，打倒了帝国主义于你们的益处几大？半封建的地主阶级集中了多数田地在他们手里，重租重息，农民贫困到十分，乡下人无钱到城市买货，城市工商业因此雕敝不能发展。打倒了地主阶级，取消了收租制度，农民得了完全的收获，向城市买货的力量大大增加，你们想，城市的生意不会大大发达么？国民党及其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地主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及其政府打倒了，帝国主义失了走狗，地主阶级失了代表，工农兵政府掌握了政权，民权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的革命）就算有成功的希望了，你们不觉得这于你们是有益处的么？

（四）共产党对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在革命时候对工商人的是筹款供给军需，但不准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动分 子（军 阀 的 走狗，贪官污吏，国民党指导委员，工贼，农贼，学贼）的财物要没收，乡村收租放息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们的财物也要没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财物，一概不没收。但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资产阶级应该赞助工农革命，服从工农阶级的指导，齐心一致向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三大任务上努力。不要三心二意，表面服从，心怀敌意。须知共产党领导的民权革命是一定要成 功 的，而 且 很快要成功的。此时一不服从，就走入反革命一路，将来决无立足之地。

（五）知识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参加工农革命。知识分子若肯参加革命，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们，依照他们才干的大小，分派他们相当的工作。红军政治部正须招收大批

政治工作人员，那些能够刻苦耐劳勇敢奋斗的革命的学生们教职员们，均可加入红军来作政治工作。

（六）蒋桂战争已在两湖爆发，全国新军阀大战，业已发动了。欺骗民众的国民党已完全解体，三民主义完全是狗屁，全国统一完全是臭话。美国走狗的蒋派冯派，英国走狗的桂派，日本走狗的奉派阎派，只是为着私利就混战起来。国民党国民政府及各派新军阀之倒台溃败就在眼前，工农阶级的革命政权不久就要代替反革命政权而出现于全国。商人们，学生们，一切被压迫的小资产阶级，速起帮助工农阶级参加此历史的革命斗争呵！

商人起来帮助工农阶级！

学生起来帮助工农阶级！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赞助土地革命增加农民的生产力和购买力！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断绝洋货的来源！

商人要使商业发展只有推翻国民党政府拥护工农兵政府！

商人只要赞助革命共产党就不没收他们的财产，并保护他们营业自由。

革命的知识分子加入工农队伍里来！

革命的知识分子加入红军政治部！

民权革命万岁！

全国被压迫阶级解放万岁！

共产党红军第四军军党部

土　地　法

（一九二九年四月，兴国县土地法）

（一）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农民耕种使用。

（二）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经工农兵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

（三）分配土地的数量标准：

（1）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2）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土地一倍。

以上两个标准，以第一个为主体，有特别情形的地方得适用第二个标准。采取第一个标准的理由：（甲）在养老育婴的设备未完毕以前，老幼如分田过少，必至不能维持生活。（乙）以人口为标准计算分田，比较简单方便。（丙）没有老小的人家很少。同时老小虽无耕种能力，但在分得田地后，政府亦得分配以相当之公众勤务如任交通等。

（四）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1）以乡为单位分配；

（2）以几乡为单位分配（如永新之小江区）；

（3）以区为单位分配；

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准。

（五）山林分配法：

（1）茶山柴山照分田的办法，以乡为单位平均分配耕种使用。

（2）竹木山归苏维埃政府所有。但农民经苏维埃政府所许可后得享用竹木。竹木在五十根以下须得乡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下须得区苏维埃政府许可，百根以上须得县苏维埃政府许可。

（3）竹木概由县苏维埃政府出卖，所得之钱由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六）土地税之征收：

（1）土地税依照生产情形分为三种：一、百分之十五，二、百分之十，三、百分之五。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形，经高级苏维埃政府批准，得分别适用二三两种。

（2）如遇天灾或其他特殊情形时，得呈明高级苏维埃政府核准，免纳土地税。

（3）土地税由县苏维埃政府征收，交高级苏维埃政府支配之。

（七）乡村手工业工人，如系自己愿意分田者，得分每个农民所得田的数量之一半。

（八）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

按：这是前一个土地法制定后第四个月，红军从井冈山到赣南之兴国发布的。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但其余各点均未改变，这些是到了一九三〇年才改变的。这两个土地法，存之以见我们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发展。

红军第四军司令政治部布告

（一九二九年六月）

为布告事，我们红军受共产党的指导，执行民权革命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为宗旨。现在国民党四分五裂，蒋桂冯阎全国混战，反动政府根本动摇，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及受压迫的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革命，人数越多，势力越大。兵士组织红军，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各省、各县、各乡、各镇都大大的干起来了。本军来到此地，知道民众痛苦甚深，谷价很贵，利息很高，租谷很重，苛捐很多。土豪劣绅操纵一切，借了祠堂公会，欺压各姓贫民。这种土豪劣绅，百人之中，不过几人。大多数人应该联合起来，打倒这少数的豪绅，求得多数人的利益。现将急于要做的事开列于左。

（一）收租二百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外）的谷子，一概没收分与贫民，不取价钱。收租二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家里的谷子须减价出粜，规定每担谷价照原价减半。（但谷米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不在此例）

（二）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但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

（三）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交租与田东。

（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钱粮。

（五）工人组织工会，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工农联合组织革命委员会，并夺取反革命的枪枝，组织工农的赤卫队。

（六）凡平日压迫工农或阻碍革命，或经手公款账目不清的土豪劣绅，农民协会可以把他一概捉起来，按照他们犯罪的轻重，分别处以死刑、监禁、肉刑、罚款、游行示众、写悔过字等刑罚。

以上六项出示之后，即刻实行，如有反对的，即是图他自己的私利，妨碍大多数人的公利，这种人即是反革命，当用全力铲除这些恶人。决不宽贷。切切此布

军　长　　朱　德

党代表　　毛泽东

政治部主任　　陈　毅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七月）

一、闽西斗争的前途

（一）全国政治形势

1. 反革命政权向前崩溃

自从蒋桂战争结束以来，表面上蒋系军阀战胜了桂系，征服了冯系，并拉拢奉系，以威胁阎系；资产阶级"打倒封建阶级势力""实行和平统一"的口号仍在唱着；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竞争，好象是帝国主义一时占了优势。但这些完全是表面的。实则军阀与军阀之间，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之间，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了，他们的冲突越发紧迫了。帝国主义彼此间，对中国统治权的争夺，帝国主义彼此间在全世界上，冲突的紧迫而更加紧迫。英国的旧工具桂系军阀，虽形式上解体，却马上在全国大小军阀中找得新的工具；日本的工具奉系军阀虽表现得不很顺利，但冯阎却正是合用的；美国的工具蒋系军阀虽则始终尽忠于美国，却不能不兼受英日的支配；这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斗争发展的新形势。资产阶级"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完全是假的，他不但不能打倒封建势力，且有屈服于封建势力的趋势。蒋系南京政府的日益右倾，即日益投降于帝国主义与地主阶级，汪陈派的活动因之猛进，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裂痕日益发展，"和平统一"的口号，只是垂死前的一片微弱的哀声。至于大小军阀彼此间，对地盘的竞争，和每个军阀内部的冲突与分裂，越发成了普遍的现象。全国范围内大小战争的继续爆发是毫无疑义的趋势，这样的形势，都是表明全国范围内各个统治阶级各派军阀，都很迅速的向着崩溃的前途走去。全国的政局是一天一天更混乱，更不统一，更无办法。

2. 革命势力的发展

统治阶级的混乱，不统一、无办法，给了革命势力发展的很好机会。数月以来，长江下游及北方产业区域，罢工潮流的高涨，南方各省农民游击战争的发展，与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军阀士兵群众的怨恨加深与逃跑日多，土匪扰乱的遍于全国，商业小资产阶级，对于苛捐杂税剥削的愤怒，学生小资产阶级的日益革命化，都是表示革命潮流之逐渐发展。这种革命潮流发展的形势和统治阶级的混乱，不统一，无办法的形势相汇合，足以促进统治阶级崩溃的速度，而与工农阶级的革命政权，日益接近起来。

（二）闽西的环境

1. 福建反动统治是分刈的而且是向前崩溃的

福建因经济、地形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因，产生许多刈据的小军阀，这种刈据的形势，不到军阀消灭的那一天，是不会变更的。福建自国民党占领以来，分布的五个小军阀，到最近形成了鼎立三派，即代表福州、泉州、厦门一带，买办地主阶级的海军为一派，代表漳州龙岩一带资产阶级及地主张贞、陈国辉为一派和代表闽北闽西地主阶级的卢兴邦、卢新铭为一派。这五部三派反动小军阀，因地理的形势分刈福建全省，各在其范围内剥削工农阶级，同时联合成一统一的同盟，以便分配赃物（福建岁入一千八百余万元的分配是：海军三百五十万，张贞一百六十万，卢兴邦一百八十万，陈国辉、卢新铭二百万，新豪绅——党务费五十万，贪官污吏——行政费、政务费、司法费、财务费五百万，反动宣传——教育费一百五十万，其他三百万），而联系同盟完全是表面的形势的。实际上三派对省行政权分量上分配的斗争（即对剥削分配的斗争）特别是张杨两派对省政领导权的斗争，是一天一天走向激烈。在全国各派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最混乱、最激烈的时候，福建的小军阀是一定要爆发战争的。同时闽西一带工农暴动的发展和红军的游击，汀龙两属统治势力和卢陈两个小军阀，均受了极大的打击。闽南闽北的工农势力在全省全国工农势力影响之下，亦当逐渐的发展起来，这种革命势力的发展与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相汇合，福建统治阶级之向着崩溃的前途行进是完全没有疑义的。

2. 东江赣南的革命势力发展

东江赣南的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发展，使闽西打破了孤立的形势，于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

3. 不是统治阶级没有进攻闽西的可能

全国和闽西四围的形势虽在大的倾向来说是反革命势力向下低落，但不是说统治阶级从此便完全无力向闽西进攻了。闽西的革命势力，向前发展，则四围反革命势力一定要尽可能的调动他们的力量来进攻革命势力，特别是福建统治阶级，尤其是闽南的统治者，随时派兵进攻的可能，这是不可忽略的。

（三）闽西政治经济情形

1. 土地的分配

据龙岩、永定、上杭、连城、长汀、武平六县调查田地平均百分之八十五在收租阶级手里，农民所有田地平均不过百分之十五。这可见农民要求土地之迫切，而两年来广大的农民斗争，目标完全在于土地。

2. 剥削情形

田租各县最低百分之六十，长汀百分之七十，连城南乡高至百分之八十，利息龙岩每月二分为最低，连城、武平、长汀均三分，上杭、永定均二分半，最高利息各县有到十二分的（惟不多）。税捐很重，除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项外，县政府、驻军、民团三者的捐税是十分利害的。

3. 农民成分

六县除连城外，雇农都在百分之五以下，长汀少至百分之一，永定溪南等处甚至完全没有雇农，这是因为闽西没有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几乎本体都是非经济的封建剥削的原故。富农平均不到百分之五，中农平均亦只有百分之十七，而贫农则占百分之七十五，这证明在帝国主义、地主阶级的双重压榨之下，农业之资本主义发展在闽西是不可能的。土地集中到收租地主，有地农民一天一天减少，无地农民一天一天增多，客观上土地斗争便必然要剧烈起来。

4. 洋货之侵入与手工业之失败

无论什么偏僻的乡村，都有许多种洋货侵入，对于手工业厉行袭击，特别是烟纸两业的失败影响手工业，同时影响农业，巨额的收入减少，失业的人数增多，完全是受外国纸烟的影响，这在闽西是一种重大的事变。

5. 商业资本之发展

闽西的商业即在扰乱的政局下仍然是发展的，特别是龙岩和永定之坎市香港式房屋之建筑表示新兴的商业资本的发展形势，这些城市商人到近年逐渐变成政治上的主人，和驻军与地主勾结起来，尽量压榨农民（销出高价货物，收买廉价农产和手工业品〔如烟、纸等〕，收买土地，征马路捐，修筑马路），这是一种新兴势力。

收租土地中城市商业资本占的成数极大，龙岩连城及永定的丰田区均占到全额土地百分之五十，长汀百分之三十，上杭百分之二十五，武平百分之二十。商业资本土地有二种形式：一种是城市资本家赚了钱进乡购买土地。龙岩、连城、永定商资土地之多，就是因为除本县商家购买土地外，还有一大批往南洋经商的华侨发了财，拿钱回来购买土地。一种是乡村地主的商人化。他们一面在乡村是地主，一面却把从农民剥削来的孽钱投入城市经商，这一种比较的少。商业资本与乡村土地的关系，既如此密切，可知中国资产阶级在民权革命阶段中是必然要和地主阶级联合，反对土地革命，完全没有疑义，而闽西土地革命的最大敌人，不是腐败的豪绅地主阶级，而是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这一点是最可注意的了。

6. 豪绅地主阶级的地位

依据上面的分析及从斗争中所得的经验，我们可以估量闽西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了。首先去看豪绅地主阶级，这个阶级虽是目前反动的中心，但他们是最腐败、最没有能力，他们的团结极松懈，他们办的民团极脆弱，在革命中完全表示他们招架不来的神

气。他们是垂死了的阶级，每天在恐慌崩溃的途中。

7. **商业资产阶级**

这个阶级是一个反动的主力，他们是城市中等以上商人，他们与洋货及土地有密切的关联，所以他们对于反对封建势力、反帝国主义的工农、民权革命是一定要反对的，在事实上龙岩、坎市、湖雷、金丰等处，过去及现在，与革命势力作死战的就是他们，他们所办的民团和商团比起地主的民团来强得多。他们和着潮汕漳厦南洋等处的闽要籍商人是剿共声中奔走呼号攀兵请将最努力的，这个阶级是有坚决的反革命性，是闽西革命势力的主要仇敌。

8. **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农村的与城市的不能混为一谈，农村小资产阶级，如富农小地主等除小地主中有一个破产部分有些革命性外，其余均是反革命的。他们在革命高潮中，投机混于革命队伍，白色恐怖一到即表现其 反革命性。这是因 为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他们是受损失的（贫农群众对他们剩余土地的没收和政治上的打击）。农村小资产阶级中并有中农可以参加革命。城市小资产阶级如国货小商人小手工业等(城市中占很大部分)，即要革命中不出打击他们的错误政策（如以前一样），他们对革命是同情的，因为推翻帝国主义、地主阶级，与军阀政府革命是于他们很有利益。龙岩、永定等处在我们保护商店的口号之下，取得了商人普遍的好感，是最近几个月来的证明。

9. **工农阶级**

闽西革命主力是广大的乡村贫农（百分之七十五）和城市手工业工人，中农是可以帮助革命的。

10. **游民阶级**

半失业与完全失业的不同。半失业的，既使一面做匪，仍可以参加革命。完全失业的，在闽西或做匪，或当民团，或在卢新铭部下当兵，或在城乡靠赌钱过活，以前大半是附属于反革命势力的。这个阶级在闽西各地占当地人口百分之二十五——一个不小的群众，对付他们是很要注意。

11. **军阀军队民团商团**

这些反动阶级压迫革命的工具中，陈、卢两部军队。陈部已驱逐去了，不能再为害。卢部釜底游魂，不是工农势力之敌。所以豪绅地主的民团，都是脆弱无用的。只有商业资产阶级所办民团及商团，以及和他们勾结的土匪刀匪，始终是工农群众的一个敌。他们是武装反革命很坚决而且操习了相当的斗争力，他是剿共军清乡搜山的响导，是最可恶的一个东西。

12. **国民党**

闽西国民党在改良主义的改组派把持中，无成分建筑在农村中，小地主富农阶级及

城市商业资本上面。组织很小，过去不是力量。在目前赤色斗争中改良口号亦自然没有和我们争群众的可能。但旅外的闽西范围国民党人在张贞杨树庄庇荫之下者，都呼口号剿共颇为很起劲，严防这些人派遣其走狗混来闽西工农组织中捣乱，却是要紧的。

（四）闽西斗争的前途和闽西党的总路线

1. 闽西有一个工农武装割据的前途。依据上述的分析，在下列各项主观的客观的条件之下，闽西工农武装刈据的前途是确定了的。

（1）有比较丰富的斗争经验。

（2）农民得了土地（红色区域田契已经烧完。夏收的谷又即可得到，田地的分配亦赶快可以完成）。

（3）民众百分之八十，是贫苦工农，要求革命，而且十分积极。

（4）工农武装扩大。

（5）红色政权区域比前扩大，并且连成了一片。

（6）有红军第四军帮助。

（7）经济条件不缺（粮食不成问题，外来日用品是在我们正确的经济政策之下，是可以继续维持的）。

（8）邻近反动区域的群众，对我们已有相当的认识，不象以前之受反宣传蒙蔽坚决反对我们了。

（9）对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正确，可以得着小资产阶级的同情。

（10）有利于斗争的地势。

（11）全国政局变动很快，敌军没有长期围剿的可能。

（12）闽西统治阶级的经济破产，无法维持其统治势力（收不到租息税）。

（13）反动武装削弱。

（14）改良主义不能得群众，而且根本不能实现。

以上十四项都是有利的条件，但亦有六个缺点：

（1）党的组织不普遍、不健全，干部人材缺乏，不足以领导广大群众。

（2）新发展区域的群众，没有巩固的组织，没有斗争经验。

（3）城市与中心区域的工作没有巩固的基础。

（4）武装组织不健全，战斗力薄弱。

（5）盲动主义的残余，过分打击农村小资产阶级，使农村小资产阶级有脱离革命之趋势。

（6）赣南东江的群众革命势力，还没有与闽西联络起来。

依上所述客观环境主观力量的估量，可以确定闽西是有一个工农武装刈据的前途。虽然在主观力量方面还有好些缺点，但这些缺点是可以用党的努力去弥补的。

2. 闽西工农政权的意义

闽西可以造成一个刈据，但这个刈据有什么意义呢？闽西的刈据有两个重要的意义：

（1）闽西痛苦的工农群众，为反抗反动政权的压迫，解除繁重的剥削，起来实行武装斗争，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这是闽西工农政权的本身意义。

（2）为发展更广大的群众，扩大土地革命的影响，于远地建立红军的根据地，与赣南东江及湘赣边界的革命势力取得联系，促进一般革命潮流的高涨，把这样去和党的全国总任务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夺取政权联系起来——这是闽西工农政权的全国意义。

（3）党的总路线

依客观环境主观力量的分析，确定了闽西有一个工农政权武装刈据的前途。因此闽西党的总路线是："坚决的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刈据而奋斗"。

其主要任务是：（1）巩固并扩大党的组织；（2）发动并组织广大群众；（3）实行土地革命；（4）建立苏维埃政权；（5）扩大工农武装。而实行土地革命，使闽西广大的贫苦农民得到土地建设斗争的坚实基础，尤其是闽西斗争的主要目标。

二、闽西过去斗争的经验

（一）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的斗争

闽西的斗争从一九二七年开始，而激烈的武装斗争则在一九二八年，兹分述批评于后：

1. 永定溪南里

（1）由日常斗争转变到武装暴动。

（2）深入土地革命，扩大苏维埃区域。

以上是溪南里斗争最有意义的两点，最值得各地效法的。

（3）六月（一九二八）群众武装攻城是表现农民对地主阶级（溪南的大地主多住城内）及地主的保护者贪官污吏与军阀军队的愤怒的最高潮，是一个英勇的行动，虽然失败，但发动了闽西的土地斗争，意义是很重大的。但此次斗争不在乡村发动直接夺取地主田地的斗争以后，攻城时口号不适当（没有分别城内穷人与富人），事先没有发动城内群众的准备和攻城技术错误等，则是此次斗争的缺点。

（4）大规模的杀戮反动豪绅及其走狗，并烧毁反动房屋，这种群众的肃反行动，是十分对的，但烧了一些不应该烧的房屋，杀了一些不必杀的人（如吃鸦片的及略有嫌疑的），焚烧商人账簿，没收丰稔市的商店，则是犯了盲动主义的缺点。

（5）在暴动失败后，白色恐怖到来，群众中调和空气很浓厚，党在此时提出"杀净一切调和妥协分子"口号，并且毫无群众基础的强迫的，想这一口号执行起来（实行杀人）这仍是盲动主义的错误，有脱离群众的极大危险。但党随即改变了政策，采取了退却的正当策略（取消杀尽一切调和妥协分子的口号，但对群众说明地主的调和主张是骗人的，各种压迫会跟着到来，应准备持久的奋斗），才仍旧取得群众（后来我们所说皆验群众乃谓到底共产党对）。

2. 永定金丰里

（1）去年金丰的斗争，扩大了武装数量。并且用继续不断的游击战术，亦发展一些群众组织（虽然这些组织现在是消灭了）。但使金丰的斗争，犯了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偏重军事行动，这是与溪南斗争方式根本不同的。五月陈东坑武装暴动后不到一天即将赤卫队开往下洋，完全忽视了陈东坑群众工作（不发动群众，不建设政权），这是单纯军事行动的开始。以后历次向下洋古洋等地游击，不知发动当地的群众自己起来斗争，却由游击队代替包办一切，游击队做了一切的主体，失了帮助群众自发斗争的意义，以致环陈东坑各乡群众长久消沉，至今尚没有广大地起来，这个错误是非常严重的。

（2）陈东坑暴动后，县委采取埋枪政策，解散陈东坑正在斗争高潮的武装群众，失了发动全金丰群众的机会，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3）抢下洋商店拉抢金丰商货，失了小资产阶级同情，使一般人认我们做土匪，这是流氓无产阶级意识领导的错误。

3. 永定太平里

（1）不注意从事日常斗争，尤其是不用土地革命口号去发动群众，而欲用军事力量进攻政治经济中心之坎市，单纯的欲用这个方法去发动群众，这是偏重用军事力量去发动群众的错误。

（2）暴动的条件既不具备，尤其是群众没有暴动的可能，欲强迫暴动，以蛟洋红军为主力去攻坎市，失败后群众受摧残，埋怨我们，以致全里工作陷于长期的消沉，这是盲动主义的错误。

4. 龙岩白土

白土的斗争，从前年减租，到去年一月平分猪肉、平粜、算账，二月捉委员，杀土豪的走狗、捆家长、缴枪，一步一步走到高潮，这个方法本是很对的。但在二月间不举行一个群众的暴动，斗争到了捉委员、杀土豪、走狗、捆家长，同志们还有闯祸还不甚大，可免严重压迫的幻想。二月十三杀人缴枪，在客观上做的是暴动，同志们主观上却不承认是暴动，不于此时以赤色政权宣布地主的罪状，烧毁田契，发布土地政纲，取得党在全白土各乡广大群众的信仰。这种不把斗争范围扩大，而只求缩小的政策，实是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至六月蛟洋红军攻城既不是群众的又不是有准备有目的的，只算是一种军事投机的举动。

5. 上杭蛟洋

（1）由日常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每次斗争有广大群众参加。

（2）由政治影响的扩大，发展了新区域。

（3）有斗争的决心，始终不与反动派妥协，得了最后的胜利。

（4）游击战术进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在敌军四周出没无常，以此与敌军持久斗争）。

以上各点，是蛟洋斗争的优点。下面则是他的缺点：

（5）去年四月群众斗争已到了高潮，党没有领导群众杀土豪、分田地、深入土地革命。九月对客观上环境观察不正确（悲观），不相信斗争有我们胜利可能，不下决心帮

助白沙群众的斗争，失了围捉大批反动领袖的机会。这些都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6）二月杀土匪八人，招致土匪群众之反对是不对的。

（二）一九二九年的斗争

1. **盲动主义在今年闽西已经纠正了许多，但还有一些残余**。如龙岩赤卫队不顾主客观力量一连三次攻城遭了失败。畬心在卢部到了之时没有发动经济斗争，而布置一个缴卢部枪械的计划。均显然表示盲动倾向。其余如蛟洋农民烧丘坊房子二百余家，白砂赤卫队烧茶地房子九十余家，这种盲动的大烧杀，更是非常错误的。

2. **一面烧杀主义矫枉过正变成了不杀不动的机会主义**。如卢丰、华家亭、大池一些地方捉着土豪却放了生。

3. 对小资产阶级政策不正确

对小资产阶级政策及城市政策，过去受了农民资产意识的支配，做了很多的错误，如没收商店、烧家簿账等。自五月四军来以后，这种错误纠正了好多。

但党的领导力量薄弱，在农村中过分打击富农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如派款、烧“一切”借约，田契等。尤其是分谷子采取平分主义，因此引起农民的反感，至有同志为群众所杀者（东山社之坑头）。新发展区域中，最普通的坏现象就是派款。好些地方是贫农派小资产阶级的款，有些地方农会为地主走狗所把持，有些流氓地痞所把持的，则反向穷苦农民派起款来，简直是变相的地主剥削农民。至对城市商店以前所做的错误，近来大体上均改正过来了。

4. 党的领导力量薄弱

闽西党员数量太少，六县共计不上三千，当然是不足以领导百几十万新发展的群众。兼之党员质量亦不很好，政治水平太低，组织涣散、纪律废弛，去年斗争中干部损失太多，为了这些原因，党的领导力，就削弱了。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组织性，简直象一盘散砂。而各级党的指导机关很少用会议的集体的方法去指导工作，分配工作，乃是组织涣散的总原因。至党与群众关系不正确，党的秘密完全公开出来，还是缺点的较小者。

5. 忽视团的工作

党对团完全没有指导，而且把团员随便调动，有些更把团的活动分子调到党里来工作，客观上犯了取消主义错误。

6. 地方主义

如在分谷派款分配枪枝禁粮食出口等事上充分表现地方主义，不但群众如此，党员乃至党部均不能免。

7. 士兵运动

兵运仅长汀有点成绩。团丁和土匪运动简直没有注意。

8. 职工运动

不但乡村工人没有组织，即城市工人组织亦没有好的基础。过去对于城市工作一般的忽略，这个错误是很严重的。

9. 对流氓阶级的政策不正确

过去闽西一般的说都不注意土匪运动，并大部分都是仇视土匪，如蛟洋杀土匪等，尤其对城市流氓取仇视态度，这在客观上是把土匪流氓群众让与豪绅阶级使之进攻我们。

10. 政权组织的缺点

组织方面：最大的缺点是政权机关组织不健全，各部分很难起作用，因此客观上等于个人包办。这种现象仅在过去有斗争的地方，如溪南、东乡、蛟洋等处比较少些。再则已经建设苏维埃的地方，并没有建设真正的代表会议，仍然只是一个人执行委员会。至于政权机关产生方法，大多数都由一哄而集的群众会选出，不是由于代表会议。岩永一个临时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已二月，还没召集全县基础的代表会议。上杭则至今无县政权机关。政府委员成分固然大多是贫农阶级，亦有些为流氓所把持。另有一二处为地主所霸占。

工作方面：过去有斗争地方对于肃反、发动群众及分配土地做得很好，但新发展区域大多数没有好成绩。宣传工作除永定有点成绩外，上杭龙岩都没有。

与党的关系：各县都很不好，政府委员、党员占多数，成了党包办政权。

11. 土地斗争

闽西各处发动了斗争的地方，对于烧地主田契、分土豪谷子，向土豪派款、抗租等，做得很普遍，这是对的。但分田一事，只永定龙岩做了三分之一，其余大部分还没有做。分配土地这样缓慢，不能使起来了的群众迅速得到土地，使他们为自己土地的利益而战，忽视这个最主要的工作，是十分不对的。

12. 武 装

最近几个月斗争中，赤卫队枪支，永定由五百条发展到一千二百余条，龙岩由几十条发展到六百条，上杭由三百余条发展到一千余条，这样大的数量发展是这回的胜利。此外闽西红军第四纵队之成立尚不在内，但枪的质量不好，大多数还没有组织，战斗力薄弱，且有半数以上在非无产阶级领导之手，这是有被敌人夺去的危险的。是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成为革命的能斗争的武力。

三、党 的 任 务

闽西党的总路线。是发动广大群众创造闽西工农政权割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依

据过去的经验，及斗争的需要。规定今后党在闽西斗争中，各方面应该执行任务如次：

1. 党内工作问题

（1）从工人及贫农中创造党的无产阶级基础。

（2）健全支部生活。

（3）严密党的组织，洗刷原来无组织状态。同时要扩大党的组织，使党员数量和党的分布区域都发展起来。

（4）党的指导工作集体化，废除从前不开会的不良习惯。

（5）执行铁的纪律。

（6）在城市及中心区域建立党的基础。

（7）建立党的理论的基础，加紧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党员政治水平线。

（8）训练干部人材。

（9）消灭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洗刷非无产阶级意识，如地方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

（10）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2. 土地问题

（1）着群众起来建设了政权的乡村（不论农民协会或苏维埃），即须用政权机关宣布没收一切收租的田地山林（大小地主的祠堂、庙宇、及团体的）并随即分配与贫农。

（2）一切收租田地的契约烧毁。

（3）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田契不烧毁。惟富农田地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在贫农群众要求没收时应该没收。

（4）为求敏捷起见，田地以乡为单位，按男女老幼依原耕形势，将他们在本乡及邻乡田地总合起来，抽多补少平均分配，在下种之后第一道的禾只归原种农民收获分配的效力，从第二道发生——农民按照分配的田地各自下种。

（5）农民对地主债务宣布废除，债约烧毁。

（6）为公共的用途及斗争需要征收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五的土地税，但须在经过宣传之后。

（7）工人及雇农工资生活以物价为标准相当的提高。

3. 政治问题

（1）由下而上，建立苏维埃的群众政权组织。

（2）扩大苏维埃区域。

（3）严密政权机关的组织，各级政权机关的指导工作集体化，防止个人包办。

（4）政权机关中确立工人贫农的领导权。

（5）引进劳动的妇女及青年积极分子参加政权机关工作。

（6）建立闽西统一的政权机关——闽西革命委员到闽西苏维埃。

4. 武装问题

（1）严密武装组织洗刷涣散状态。
（2）武装集中在忠实勇敢尤其是有战斗经验的贫农工人手里。
（3）加紧政治训练以加强战斗力。
（4）在武装组织中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打破地方主义，尤其是新发展区域武装队要加注意。
（5）县区乡均组织赤卫队，县区二级应有常备组织。
（6）建立和扩大闽西红军，开办红军学校训练干部人材。
（7）各级武装受各级该政权机关指挥，不得自由调动。

5. 职工运动

（1）从日常斗争中发展工会组织，在重要城市中（各县城及重要市镇）及重要职业（店员、烟纸、运输）建立工会基础。
（2）在赤色区域农村中的雇农及手工工人应该组织工会；在白色区域农村工人可以加入农协，但工人人数多的地方应该有独立组织。

6. 农民运动

（1）在秘密状态之下的地方应尽量扩大农会组织。
（2）在真正群众政权的苏维埃建立之后，农协可以不要，但在群众尚未完全发动起来，党无基础又已经建立苏维埃地方，则秘密农协还是必要的。
（3）从日常斗争中发动广大农民去扩大农会组织。
（4）在未暴动区域，尽量深入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及苏维埃政权的宣传。
（5）在公开农会之下要吸收勇敢忠实分子组织秘密农会，准备退却时起作用。

7. 游击问题

（1）在白色区域内群众有革命的要求，但因反动力量太大而不敢起来的地方，党应调遣其附近赤色区域的游击队前去游击，以削弱该地反动力量，发动该地群众建立和扩大该地党和群众的组织，逐渐引起该地群众自己起来斗争。
（2）在白色区域群众的斗争情绪已经涨到最高程度，非爆发公开斗争即不能领导他们时，党应坚决的领导群众，布置暴动局面，夺取反动武装、杀戮反动豪绅、分配地主土地、建立赤色政权。如尚无建立政权可能时，即就暴动群众组织武装游击队，在当地及附近一带用游击方式和反动派斗争，以逐渐削弱反动势力，发展工农自己势力，达到建立政权的目的。
（3）在游击队中主要应该注意的是：要发展当地群众自己起来斗争，游击队只是一个帮助的力量，一种启发的作用，不要代替当地群众办理一切，要使当地群众自己（当局）负责任去和豪绅直接斗争，才能免除群众不信任自己力量，单依赖游击队力量以及游击队去后当地的斗争立即消沉的弊病，同时须禁止盲目的烧杀，致群众脱离我们。
（4）在游击队行到的地方，必须坚决号召群众自己起来打土豪、分谷子、烧田契等。并应把这些事尽可能的以群众与群众大会的形式表决去干，开群众大会应是游击队经常工作之一，游击队若不做这些工作那就是很坏的游击队。

8. 妇女问题

（1）闽西妇女在生产上占重要地位，发动妇女参加土地斗争，并引进他们的积极分子参加苏维埃政权指导机关，是保障闽西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2）党应提出适合妇女要求的口号，以取得妇女群众，但妇女不必有单独组织。

9. 青年问题

（1）青年工农群众在革命中有很大力量，而且有特殊要求，发动广大青年群众参加革命是十分必要的。

（2）组织少年先锋队及劳动童子团。

（3）团是青年工农群众的先锋。我党是应该坚决地纠正过去对于团的取消主义的错误，帮助团在闽西建立工作基础。

10. 士兵问题

革命势力如得不到士兵参加，特别是闽西已在武装斗争时期中，如单靠和敌军硬打而不用很大努力做破坏敌军工作，则前途很是困难的。党应该坚决纠正过去忽视士兵运动的观念，在现在驻军及随时向我们进攻的军队中，很艰苦地去建立士兵运动的基础。

11. 党和政权及群众发展的方式

有三点是要注意的，第一建立中心工作区域。闽西范围内应有一地或相连属的数地为中心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建立深入工作基础，以为全闽西向前发展的根据地。一县之内亦应有中心工作区域，以为一县发展的根据。第二赤色区域的互相连属。要加紧赤色区域与赤色区域间空隙地带的工作使之打成一片，免去孤立的弊病。第三波浪式的向外发展。依傍着已有工作的地方如波浪一样的向前推进，不要是不相关联的冒进。

12. 对商业资产阶级政策

（1）这一阶级因为与华侨、洋行及土地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必然成为一个反革命派。为巩固革命政权起见必然要剥夺他们的政权，而且没收他们的土地。

（2）对大小商店应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对反动商人宁可杀人、罚款，不可没收商店，但压迫商人最利害而为一般商人所深恶，没收后可以得到多数商人同情的，在宣传工作做好后才可以没收。

13. 对小资产阶级政策

（1）在反帝、反军阀、反豪绅、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店口号之下，可以取得小资产阶级的同情。因此，对城乡小商人绝对不要没收商店、焚烧帐簿和废除帐目；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他过分打击；对富农在革命初期时间——向豪绅斗争最激烈时间，不没收其土地，并不派款，不烧契，不废除其债务；对自耕的中农不要与以任何的损失。这以上的政策都是取得小资产阶级对革命的一致或者中立者。

（2）在革命向前发展，城市中店员对于店主、工人对于厂主的斗争已经起来的时候，党应帮助店员、工人达到他们的要求。在农村中贫农群众对于富农的斗争已经起来的时候，党应帮助贫农分配富农的土地。因为革命已经发展，广大群众已经起来，革命势力有了保障，这时候经济的进攻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主富农）是必要的。但并不是抛弃小资产阶级，也不是要过分的打击他们，这是要注意的。

（3）商人及小地主不应参加政权。富农凡亲自劳动者可以参加政权。但须防止他们在政权中的领导（不要使他们当选为政府及农会的委员）。

（4）小资产阶级不要有单独组织。

14. 对流氓无产阶级政策

（1）以抢劫为业，勾结豪绅资产阶级与革命为敌的土匪，党应坚决的解除他们的武装。

（2）虽以抢劫为业，但与豪绅资产阶级有冲突，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土匪，党应派人插入他们的队伍中，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领袖（反动的不革命的），使之站在反豪绅、资产阶级战线上来。

（3）对半耕田、半抢劫的土匪，党应把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进攻地主阶级。

（4）在赤色区域城市中的流氓分子，应分配他们以田地或强迫他们做工，不要胡乱打击他们，但如系显著反动嫌疑的流氓领袖，应处以死刑。在白色区域中则应设法拉拢流氓分子，使之不为豪绅资产阶级利用。

15. 对付敌军进剿

（1）敌军进剿是不可避免的。党应有与敌人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建立长期应敌计划，这是闽西党目前迫切的任务。闽西的刈据就是从这样斗争中创造出来。

（2）在党内通告各级党部，唤起党员群众依据过去斗争经验，明白埋枪和与敌人和平妥协的政策是自杀的政策，只有党的团结一致，领导广大群众与敌人作坚决的奋斗，才有胜利的前途。

（3）在党外对工农群众，应宣传我们只有继续团结，坚决与敌人奋斗，才能保持已得的胜利。应使群众明了过去斗争经验，只有自己能够团结有决心不和反动派妥协，又有很好的斗争方法，是一定能够战胜敌人、保护土地革命胜利斗争，虽有一时的失败是不要紧的。

（4）应使群众明了反动派尚有藏在工农分子里头，如不赶快肃清是一定会做敌人的响导，危害我们的。有政权的地方应迅速肃清反动分子。

（5）党应准备退却时的一切计划。最主要是建立党的秘密机关和工会农会及政权的秘密机关。

（6）党应对敌军士兵作广大的宣传，提出适当的口号，用很好的方法打进敌军士兵中去。

（7）加紧红军及赤卫队的训练随时准备作战。党应规定最好的战术，通告各地应用战术，不打硬仗多方扰敌，夜间袭击、截击小队，破坏交通，断绝粮食，秘密肃反。

16. 对付国民党改组派

国民党改组派改良口号虽根本得不到群众，但在农民受到白色恐怖的摧残，发生和平妥协观念的时候，是有一时受他的欺骗的可能，党应在此时努力揭破改组派欺骗群众的黑幕，使群众知道只有团结自己力量，反抗改良妥协到底才能出路。

17. 反帝反军阀问题

（1）反对军阀战争是现时党在全国范围内主要口号之一。闽西对于此一口号的宣传亦是非常之紧要的。但中国的军阀斗争，即是帝国主义世界战争的序幕，所以反对军阀战争，同时反对帝国主义因争夺中国统治权，酿成不断的军阀战争的罪恶。

（2）闽西的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自然是反帝反军阀最实际最具体的行动。但不是做了这些事就不要另外有反帝反军阀的宣传了，党应纠正过去闽西忽视反帝、反军阀宣传的错误，而尽是这一宣传于一般群众之间，特别是新的军阀战争到来时候，这一宣传更加要紧。

（3）在赤色区域中取消教会学校并没收其财产。

18. 与东江赣南湘赣边界之联系

（1）加紧长汀、武平工作，注意瑞金、会昌、寻邬、平远、蕉岭工作，特别是闽赣粤三省枢纽的长汀要加紧工作。

（2）建立闽西、赣南、东江、湘赣边界四个区域的最高党部，指挥四区的工作，造成四省边界的赤色政权。

（3）应与东江、赣南两地党部发生秘密关系。

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

陈　　毅

四　军　的　历　史

一、四军未成立以前的来源：四军由三种力量组成，一为朱德率领之叶贺残部，一为由毛泽东率领之卢德铭团，（张发奎之警卫团）及湘东农军，一为湘南郴、耒、永、宜、资五县农军，叶贺军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在潮汕一带失败，三河坝一战，二十五师及九军失利，向闽赣边界撤退由朱德率领转入广东北江，曾与范石生有一时期的合作，得范之补充不少，一九二八年一月脱离范石生到湘南连战击溃许克祥、周烂、白崇禧所部，实力增加了两倍，是年四月湘南暴动失败，不战而安全撤退至江西宁冈与毛部会合，同行有湘南郴州、耒阳、永兴、宜章、资兴五县农军，计宜章第三师，郴州第七师，耒阳第四师，永资两县各有一独立团，毛部基础为卢德铭团，卢在八一暴动之后二日由武昌率队至九江，见张发奎业已反革命，乃中途起举，初拟沿赣边去广东与叶贺会合，继因道途梗阻乃留在湘东赣北一带复与平浏农军会合，并由毛泽东率领参加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秋收暴动失败后毛部被迫向南移动至宁冈，复得当时绿林（洪会）首领袁文才王佐之帮助乃留在井冈山附近各县游击，这是一九二七年底至次年三月间的事，到了四月朱部二千余人，湘南农军八千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如此庞大军队有统一指挥训练的必要，乃决定成立红军第四军以朱为军长，毛任党代表，改编为三师，率以枪械及人数不足乃改编为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六团，取消师部由军部直接指挥。全军约万余人，枪仅二千余。

二、四军成立以后的经过：四军成立后与反革命斗争经过极艰难的历史可分作五段叙述：

1． 第一时期，从一九二八年四月至七月，这一个时期四军初初成立，内部成分复杂，训练的程度各异，加以湘赣边界贫瘠致此庞大红军的给养非常困难，同时边界各县的群众斗争没有发动，单独军事行动无法避免，只是在茶陵、酃县、桂东、遂川、永新、莲花、宁冈七县皆同属崇山峻岭，尤以井冈山为最险要周围约有五百余里，四军得此地势却可以休息整顿，当时决定在宁冈建立军事根据地，分兵到各县游击发动群众斗争，这一个政策非常正确，但当时湘南农军皆有□思不十分注意执行，卒于五月底因给养困难卅团、卅三团转回湘南，结果分散到农村中，有一部分受了损失，留在边界之四团非常努力于对外游击及内部整顿的工作，赣军三次进攻皆被击溃，敌军团长阵亡，师长杨如轩杨池生受伤，尤以六月廿八日龙源口一战敌以两倍于我之兵力被我击溃为最有名，当时边界群众有两句联语道“不费红军三分力，打破江西两只羊”最能表示群众的欢迎，

在赣军几次失败后，乃联合湘军举行大规模的会剿，吴尚八军全部于七月初入驻宁冈，我军适在永新回师应敌，湘军在宁冈一星期，不敢驻民房通通露宿，日夜被农民群众之包围袭击，恐慌万状不得引退，我军回师彼已连夜逃去，在此时期红军迭获胜利，边界党及群众组织皆大大发展，宁冈永新及莲花之一部皆按人口平均分配了田地，各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边界临时苏维埃政府业已成立为当时最高指挥机关，群众武装各县成立了赤卫队，由六十名至三百名，红军武装大大扩充，有一倍以上的增加，同时在井冈山上成立了红军医院，成立了红军学校训练工农干部，按此时期为边界斗争的全盛时期。

2．第二个时期（从七月中旬到九月）

在七月初吴尚部进攻宁冈，我军由间道回师应敌，吴逃入永新，我军恐其与赣军联合，乃以二十八、二十九两团进攻酃县茶陵入据吴之后方，以三十一团应付赣军，三十二团守后方，攻酃茶之二十八、二十九两团迭获胜利，使吴尚不得不连夜赶回老巢，二十九团全部为湘南宜章县之农民，到酃县全体要求回湘南，二十八团则主张去遂川牵制江西敌军，两团行山道两日，非常疲劳，卒转道而入湘南，计由七月十五日由酃县宁冈交界之十都出发，二十二日占领资兴，二十七日进攻郴州，击溃范石生部两团，是日黄昏时范部反攻，我军不及应付，当夜撤退，廿九团大部去宜章散入农村有一营在乐昌受了损失，廿八团及廿九团之小部取道资兴桂东到汝城游击，中间发生第二营长袁崇全之叛变，袁率所部四连及机关枪连迫击炮连作前卫，袁逆假传命令，日夜急行意在脱离大队往江西作土匪，或投降反军，卒因各连官兵不受欺骗胁迫忠实于革命自动脱离袁之羁绊归回大队，袁只胁迫了第五连迫击炮连逃窜，至江西崇义界，其后十日大队取道崇义回井冈山复与袁遇，第五连及迫击炮连均全部回来，袁逆只身逃去，不幸廿八团长王尔琢同志于是役不慎惨遭毒手，为红军干部极大损失，计袁逆叛变至各部回来，前后经过两周之转折卒得恢复旧观，此皆官兵忠实革命出于自动，此点实一般雇佣军队所绝不能有的。

在军部率领廿八、廿九两团去湘南之后，赣敌杨池生残部八团及第六军一部联合向宁冈进攻，卅一团以一团兵力在广大群众合力之下与敌鏖战一月之久渐次引退，复于八月初湘赣联合以五团兵进攻宁冈黄洋界，卅一团以两连兵力利用要隘鏖战一日，敌知不可犯慌忙引退，毛在失败后率兵一营至桂东与军部取得联络于九月间返至宁冈，计至由七月至九月，出发湘南部队及留边界部队均遭失败，边界群众组织遭了不少的摧残，割据区域逐渐缩小直至井冈山下，是为四军第二时期之八月失败。

3．第三个时期（从十月至一月）

四军回至宁冈，廿八、卅一团损失虽不见大，但数量质量均不如前，不过在一个失败之后政策方面较前进步，单独军事行动，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装冒进观念等，皆渐次改变，军队有相当休养，各级组织有切实的整顿，军队训练亦有进步，边界群众组织亦逐渐恢复，同时又三次击溃周浑源旅，三次击溃刘士毅旅，宁冈及永新遂川莲花之群众赤色割据，又重新发展起来，在反动政府方面以为八月失败朱毛部队业已消灭至少是不能为大患，不期卷土重来又复如前，使他们大吃一惊，又因蒋桂战争在未发动前肃清朱毛打破井冈成为湘赣两方共同需要，乃有本年一月之三省会剿的进攻。

敌人这次进攻从十一月至一月，准备了两个多月，四军亦从十一月起积极整顿，同时彭德怀部红军第五军于十一月初由平江游击至宁冈附近与四军会合，红军声势更加浩

大，红军对于敌人三省会剿决定以四军出发赣南游击向吉安一带推进，以彭德怀及袁王部留守边界应付湘赣进攻部队，在四军至吉安附近，赣敌后方动摇必然撤退，彭、袁、王应付湘军仅有余力此为我方之计划，再者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红军经过空前的艰难，在浓冬之际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履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在此时期中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二月没有一文零用钱，物质条件如此困难，官兵奋斗精神并不低减，四军的基础确于是时建立在事实上有了考验与证明。此时期为红军四军复兴与整顿时期。

4． 第四个时期（从一月至三月）

A、出发赣南游击部队之经过：一月十四日四军军部率廿八、卅一两团及一特务营出发赣南游击企图击破湘赣会剿，一月廿八日与赣军三团战于大庾，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猝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垒积重叠于一线致失利，我军引退折回粤边南雄界，取闽粤赣边界转至吉安兴国一带，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事非常困难，敌人又有采轮班穷追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复于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四次皆失利，枪械虽未有大的损失，但官兵经过卅日左右之长途急行军已属难支，但皆能一致团结奋勇直前无怨言，从未发生叛变逃跑等事，此足以打破集团军事行动之空前记录。至二月中旬（正阴历正月初一日）复与刘士毅师全部鏖战于江西宁都瑞金交界之大柏地，从是日下午三时起相持至次日正午始将刘部完全击溃，其团长肖致平经桓被活捉因不认识被逃去，得械八百余支，俘虏数略同，是役我军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此后红军由宁都至兴国，吉安、永丰交界处得江西红军二团、四团之掩护，有一周以上之休息整顿，是时知井冈山业已失败，乃决定到闽粤交界处游击。

B、彭德怀、王佐部留守宁冈根据地于一月廿八日敌分三路兵力各三团左右，向井冈山进迫，彭王部仅只千余枪左右与敌相持五日夜自动引退，彭部取道赣南与朱毛合，王部则埋伏在井冈山附近，所谓三省会剿实际只到井冈山游了一次，除红军因战略引退而外，所谓三省大兵对成千整万之赤色群众只有一个“莫可如何”，所以不到一个礼拜即行撤退，边界区域仍然在赤色群众之掌握中，彭部至赣南于三月初与四军会合于江西雩都，在此大的战斗之后四军共存有二千余人，彭部只存有八百余人，两共枪约二千支。

5． 第五时期（从蒋桂战争爆发到现在）

二月廿一日桂系袭长沙，酿成湖南事变，湘、粤、赣三省敌人为自己要打架，不能再向红军进攻，红军是时入闽西击溃郭凤鸣部，郭于是役阵亡，于三月中旬入汀州，工作了两个礼拜红军大大补充，衣履焕然一新，人员增加，款饷亦得有五万元，决定蒋桂混战中放手争取群众，发动群众斗争，以闽西赣南为游击区域相机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井冈山附近群众割据，红军于三月底由闽西入赣南，游击区域及于兴国，宁都、瑞金、雩都、广昌五县；五月初蒋桂在武汉混战告一段落，赣军又向我进攻，红军乃于五月中旬第二次入闽西，正值张贞入粤讨桂，红军决定汀州、上杭、连城、永定、龙岩、武平六县游击计划，至七月初复扩大至漳平、宁洋一带直至现在，计二次入闽，两次击溃陈国辉部，陈部实力丧三分之二，两次击溃罗兴铭部得械两营左右。

彭德怀部在退出井冈于四月底与朱毛会合于雩都，受了使命回边界恢复群众割据游击区域，经过北江赣南湘南一带最近在赣北湘东游击，在城口得商团械二百余，在南雄得商团械三百左右，在遂川得赣军六十八团一营械，在安福击溃赣军一次，该部实力已增加四倍左右。

四军的组织及训练

一、军队的编制：

A、军队的编制在原则上要注意武器与地势两个条件，尤其红军在游击战争时期，因为他是流动性质的，他的编制应该与普通军队不同，红军的战术原则不外“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争取群众”但要军队的编制能恰如其分，做到分散集中两面都好，红军四军此刻还没有这个经验，四军此时成了庞然大物一切都是吃大锅饭的集体行动，分散比较为困难问题，同时四军此时的武器以步兵为主要，游击的地区时时要不脱离边界山林区域，在流动自如的意义上，红军要通常比敌军行动快才不易受敌人包围或很快退出敌人会剿的范围，四军中经过几次讨论仍然一仍黄埔式军队的编制，虽然有人曾在红军教导队试验俄国红军的编制法，结果大家看了一回稀奇，在实际工作上仍然只有照抄老的办法，因为上了五个单位不好指挥，每一个连单位超出了百五十人于宿营给养就大不方便，若一连单位只五六十人则作战警戒就疲劳得要死，因此四军此时编制仍然为国民革命军的办法，每排三班每班十人，每连三排，每营三连至四连，每团二营至三营，加以机炮连或特务队，不过时常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红军需要多的徒手兵，一面红军不轻易作战，每战必有把握，因此在胜利后若没有徒手兵缴得枪械就没有人，同时在经常行军红军病兵多，一个病了若无一个徒手兵，他的枪弹就无人拾了，所以红军的兵要多于枪为好。第二红军的非战斗兵如伕子及政治工作人材非要多不可，因为红军的任务不仅是打仗的问题，伕子多于搬运物品器械有极大的方便，政治工作人材多于发动群众训练兵士有极重要的意义，因此每每红军一团人数有二千，枪还不及千支，就是这个原故，但这是一般旧军官所不懂得的玄妙。

B、四军的经济组织可分为执行、计划、监督三部，计划筹款与全军预算及分配支取问题原则由党的委员会负责，监督经济则由上级士兵委员会负责，每月由军部军需处公布一月收入支取情形，由士委代表会审查，军需处长出席报告负答复解释之责，如有毛病则处罚负责人，执行部则军部有军需处，团部有辎重队，营连有经委会，因此四军此时的经济脱离军官的影响，做到彻底公开，于经济上最能表现红军的平等精神，红军有一付联语道“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再则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初看见顶顶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伕头，同时到现在伙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绰号。

C、在军医方面，各团有卫生队，军部亦有一个直属卫生队，另外赣南闽西游击边界皆特别成立红军休养所，来容纳病伤兵，不过医药与医官很感困难去解决，在十分无法时雇佣本地中医内外科也相当有功效，同时此休养所唯一的条件要四面有群众组织及武装的拥护，在伤兵好了以后不必一定要回红军即可由当地农协及革委分配到赤卫队工

作。

D、在军事机关人员分配方面，军部有军长党代表两人直接处理全军日常事务，参谋长一人辅助之，外有参谋处长一人指挥参谋处工作，副官长——处理交际庶务等事，军需长——负责管理经济及计划等，军成立政治部设主任一人，秘书长——秘书若干名，外有宣传组织总务等科，对内担任军队政治训练，指导士兵委员会，对外作群众运动，在一个区域群众政权机关未建立前政治部得代行其任务，又政治部职权与军部平衡，不相隶属军部与政治部以上的权力在此未建立最高苏维埃政权机关时集中于党的最高委员会，在团营连设党代表，团又设政治部主任由党代表兼，因此各级党代表担任政治工作受政治部指挥。

E、四军士兵的组织，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官长同时为士委会员全连士兵大会选举五人至七或九人为连士委执委，推主席一人，以全营人数按每五人举一代表组成全营士兵代表会推举十一人至十三人组织营士执委，推举一人为主席，按全团人数每十人举代表一人组织全团代表会，推举十七人至十九人组织团士执委，推举一人任主席，全军按卅人或五十人举一代表组织全军代表会，选举十九人至廿一人或廿三人组织军士执委，选一人为主席，军士执委选五人或七人为常委，团举五人或七人为常委，营举三人或五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各级士委的任务规定是下：1、参加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作群众运动。5、作士兵政治教育。此外士委与军事机关的关系士委只能对于某个问题建议或质问，而不能直接去干涉或处理，士委开会须由党代表参加，等于一个政治顾问的性质，在非常时期党代表可以解散士委，或不准其开会，另诉诸士委代表会。

F、四军的训练：

1、军事训练可大致为四种方式。第一种日常操课由参谋长或军官制定日常操课表，按日实施之，所有科目课程均一仍国民革命军之旧没有什么改变，只是把那些摆架子的于作战无大关系的繁冗虚文去掉，大概注意传令侦探警戒瞄准，及野外实习，关于可以操作精神之制式教练亦有相当注意。第二种于作战之后或一月之后一种结束讲评，由军官负责报告工作经过并指出缺点与优点。第三种为实地训练，于放哨时由官长说明放哨守则于守卫时说明卫兵守则，一面使士兵于讲了之后照着去做，一面免掉说教式的训练的干燥无味，第四种由各级负责军官召集各级官长开军官会议，讨论训练方法或对于某种专门问题的报告。

2、四军的政治训练：

1. 讲演由官长召集全体讲话或作政治报告，或作生活批评或作工农运动概状报告等。

2. 讲课在军队有三日的休息则每日必有一小时政治课，由党代表担任去讲，这个讲演比较有计划的，或定于一月讲演许多题目，这些题目是可以连贯的使士兵得到一些有系统的政治知识。

3. 早晚点名讲话与呼口号则例每日士兵生活批评或对于明日行动之煽动宣传等。

4. 在一次游击工作，一次战斗，一次行动经过以后的批评，要详细向士兵讲出来。

5. 军队里举行识字行动简易的办法就是要士兵认红军的标语，认得一个标语即将

此标语包含的意义策略告诉他。

6. 参加群众大会，举行各种纪念会，追悼会，俱乐会亦为政治教育之另一种。

7. 在士兵委会内将士兵编成若干小组，小组会上有各种报告，及工作批评亦为训练的方法之一。

3、四军士兵之生活状况：

A、被服方面在今年三月以前非常吃苦，浓冬尚穿单衣，在到汀州以后每人缝了两套新衣鞋袜草鞋军帽已解决，所以近来军队表面非常整齐。

B、驻军方面，士委有卫生部管理宿营的卫生事宜，饮食清洁，便所扫除，卧处整理等。

C、给养方面，每人每日伙食费大洋一角五分，在物价低贱或有土豪打，或有农会赠的时候常常有剩余，可以分得伙食尾子，若没有帮助的时候，则常感觉太清淡了。红军费除了发饷制度，经济公开多时，每人每月可以发四元至五元的零用费，作洗衣剃头买草鞋之用，若钱少则少发或竟至不发，士兵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闹饷的事，没有钱发他只怪这几日筹款不到，不会向军长要钱。

D、士委内有娱乐科，仅于纪念日或每月举行工农兵联欢会，或红军纪念会，有演说，有新剧，有京广团，有双簧，有女同志跳舞，有魔术，这些多能引起士兵的快乐。

4、四军的军纪：

四军军纪可以分为下列数项：

1. 战时纪律，临阵退却，畏缩不前违抗命令，可由军官就地枪决。

2. 一般纪律，通敌，叛反，拐枪潜逃开小差，强奸乱烧乱杀，毁坏人民财物均处死刑，赌博则没收其所有金钱并决定一月内不发零用费，嫖妓则处以夜不归营之罪因嫖妓而滋事者，量其大小或处以死刑或罚勤务或打屁股或手心，其余比较小的错误则按其轻重处罚之。

3. 红军三大纪律，各种纪律之后多而复杂，士兵每每弄不清楚，又特别归三大纪律。

(一) 不准乱拿工农小商人一点东西。

(二) 打土豪要归公。

(三) 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这三条纪律是一个原则，但包括了一切，所以现红军士兵每每都要抬出这三条来批评他不愿的人，他自己犯了处罚他也就没有话说。

四军的游击工作

四军出发达到某一定地点，即估量敌人并斟酌地方革命群众需要决定五日至七日或十日以至于一月的游击计划，计划定了以后，即分兵四面出动，在数县范围内经常以每一个纵队（团）为单位，在一县范围内则以一支队（营）或一连为单位出发游击，指挥地点通常在县城或出发部队之中心，在一期游击工作完毕以后则开始第二期游击工作，或向前推进，或向四方延伸，均由指挥机关斟酌情形定之，如任何方面发现敌人，游击队一日夜即可集中，在部队未集中前，各游击队不得轻易与敌人冲突，至各游击部队之

工作通常为下列各种。

1、调查工作，游击部队达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经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因为红军行动如行云流水一般，所到之地皆不明情形，若不调查则一决定必不能切合当地群众的需要，比如红军标语打倒土豪劣绅，这样写的时候很少，因为太空洞而不具体，我们必须先调查当地某几个人是群众最恨的，调查以后，则写标语时就要成为打倒土豪劣绅某某等，这个口号不论如何不浮泛，引起群众深的认识，关于调查的内容，由政治部制定一个极详细的调查表，内分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当地经济生活工价，物价等，当地土地分配情形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比较，及土地百分比之分配以及当地特殊产品等；其次对当地情形观察，交通河流之测量，此关于军事上极需要，大概是调查工作之内容，这个工作是一个极有趣味的工作，一般同志作起来感觉极麻烦，红军经过一时期表册便堆积起来，政治部工作人员缺乏无人整理，每致散失却是一个遗憾，可是他的好处可以使红军不致不顾环境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

2、宣传工作，红军在成立初期对宣传工作仍沿国民革命军旧习，把宣传工作认为是一部分人的事，尤其是感觉军队是打仗的，宣传是卖假膏药，是讨厌的，这自然是表示兵士对于国民党的不兑现的口号的一种强烈的反抗，红军在经过许多斗争，觉得宣传工作太差，每每红军经过某地，只是少少的几张标语，群众毫不懂红军是什么东西，甚至许多把红军当作土匪打，红军为解决这困难，宣传才逐渐进步了，红军现在有一个宣传兵制度，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如连部，营部，或政治部，卫生队等）均须派五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五个人不背枪，不服勤务名叫宣传兵，此五人分两组，一组为演讲队，担任口头宣传，凡红军所到的地方，行军时经过的乡村酒店茶店，或大市镇均须手持红旗，及标语传单向群众宣传，到了城市便须全体出发大街，小巷或商店作个别宣传或挨户宣传，半日的时间必须召集一个群众大会，群众为了懂得红军这个怪物，及朱毛的仪容，常常是普遍的跑来参加这个大会，其外一组为文字宣传组，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笔各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要统统写满红军标语，写字要正楷，以愈大愈好，要用梯子写得高使反动派不能随便涂抹，达到一个城市各连的宣传员由政治部或党代表分配宣传区域，并派人巡视以观勤惰，各连写的标语有晤记不怕冒功或混淆，写错了亦易查出予以处罚，因此红军达到一个县城只要三小时，宣传工作可以普遍，同时宣传员还负责破坏反动宣传品如国民党标语总理遗嘱等，许多群众说："红军一到满街鲜红，等于过年"。

3、组织工作，红军到达比较工农发展地方，则助其组织发展，或参加他们的会议，为他们纠正过去错误及目前工作计划，在未有组织的地方，则从宣传工作中物色群众中进步分子，大概注意下列对象：

1、与土豪有仇恨的。2、极贫苦的。3、在贺叶军队当兵的。4、由外地农协失败来此避难的。5、以前参加革命斗争的。6、与邻县工农会有关系的。把上列的人请到政治部用茶点招待，作一详尽之宣传，征求他们同意，如愿意组织则成立临时革委或工农筹备处，举出人负责，一面派人为红军作侦探，一面要他们报告土豪劣绅姓名，或引路去打，红军得帮助十元以为办公费，红军去后要他们继续有报告来，如果报告能来，则此种组织是可靠的，该地即有组织的初步了，同时要把一些负责人的姓名住址形

象记下来，送到邻近有组织的区域，叫他们派人来接受，这个方法可于半日内收效，有许多白色地方用这个速成方法收了效验，许多同志反对这个办法，以为不可靠，或者工作上特别慎重选择，其实这个意见是不对，我们把他当作一个特别宣传工作，日后有效无效可不必去顾虑的。

4、筹款工作，红军每月至少要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款项大部出在土豪身上，小部出在城市商人，有时可以□光敌人输送一部分来，筹款的秘诀有以下几种：

（1）城市筹款，红军在城市在扶助工商发展之条件下不举行经济的没收，只是召集商人代表（拒绝与商会接洽）参加当地革命同志或机关的意见提出最低额款项限三日交齐，此款项由商人代表自行摊派，但须依照累进的办法，对于千元以下商店不筹款，如发现包办强迫或不公平等事，得由被损害人用书面及当面报告，再去查明处罚，这个办法十分得着商人拥护，商人每每出很少而红军的购买力超过了许多，于他们是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同时红军卖买公平是任何军队及不上的，所以商人十分欢迎，每每红军写信到邻县去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来。

（2）对豪绅的勒款，若捉去了豪绅家里的人固然可以定价购取，这个办法比较难，因为红军声势浩大，土劣每每闻风而逃，此时只有贴条子一个办法，就是估量豪绅的房屋的价额，贴一张罚款的条子，如可值一万元则贴一百元，余类推限两日内交款不交则立予焚毁，每到期不交，则焚一栋屋以示威，这个办法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

（3）挖窖，豪绅许多现款藏在地下，红军一到他房内便要搜查枪弹或现款，墙壁内室内之低洼处或有新痕的地方都要去试探一下，有时用一盆水倾在房内，某处的水先浸没，则有查知该处土质松疏，从那里挖下去每每得到现款或金银首饰，红军前后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两，挖得之现款常常可得着数百元，数千元或至万元不等。

（4）奖励来报告土豪窝藏处或其他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按所得的金额百分比例奖励他们，他们很踊跃来帮助红军。

5、欢送俘虏，在与敌人作战得许多俘虏兵，则公开征求同意，如他们愿在红军则马上补名字，如不愿在红军则开欢送会，每人发一二元旅费，由兵士代表致欢送词，希望他觉悟，归田去打土豪，不用再当兵，不要再来打工农和红军，敌人的伤兵则上好药发了钱派人宣传又请他带了大批传单，雇农友抬到敌人区域附近去，敌人得着大批俘虏伤兵回去，只有气得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人蒙红军不杀之恩，深深觉得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他自己的军队跑了回去必然要交头接耳谈红军如何如何好，反动军官诬蔑红军共产党的宣传不攻自破，这是一个兵运的好方法之一，此外对土豪的走狗，如许多农民为了拥护家族，出头来反对分谷，分财物，一经捉获又不能枪毙，又不好释放，因枪毙了他的罪不致死而且引起不好影响，若释放则他分明是一个反革命的行动如何能放他，不得已才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召集一个群众大会，由他请几个保人，红军代表宣布他的不是处，但说明他是没有阶级觉悟受了土劣欺骗可以不杀他，望他改悔，再由保人及本人向群众说明他是犯了错误，愿以后改过，如此当群众释放可以得一个很大的宣传。

6、红军的游击战术问题：四军的战术从战斗中有许多进步，但只限于大规模的军事游击行动，对于小部队游击的经验比较要少兹分述如下：

A、关于行动的：在前卫之四五里或前之后四五里，均须派遣便衣短枪侦探以防敌

人意外袭击或无之冲突。

B、关于驻军的：每日对敌人方面必派遣一连或一排以上之武装游击队作卅里左右之侦探，及宣传工作，若发现敌人该队一面抵抗，一面飞报，使我军能准备应付或撤退不致打不必要打的仗。

C、红军不攻坚，若土豪跑到炮楼里去，或敌人闭城固守，或据险抵抗，红军绝不去攻击他，因为：1、攻坚费时日。2、攻坚我之损失必数倍于敌。3、在游击中我军炮兵是不健全的。4、若轻易攻坚，一个时期急切难下，四面的敌人很易从四面包围拢来。关于此点指挥官务要有决心，不要轻易凭气愤去乱干一下。

D、打圈子脱离敌人包围与穷追，大敌前来，我不能与之作战，则利用打圈子的办法，向没有敌人的地方跑，我军须要走得路使敌人赶不上，同时要经过地方有群众及党的组织才有人担负前后侦探工作，不致受敌前后突击。

E、在没有党及群众组织的地方，不轻易作战，有党有群众的地方，我军有极大扶助如运输，救护，扰敌，侦探等，敌人处于孤立地位，与之作战比较有胜利的把握，即不幸失败亦有法收容。

F、不明敌情，绝不作战，红军处在某处忽然发现敌人；不知敌人多少，或从何处来，则绝不应战，千万撤退数十里，十分接近只好派掩护队，因为敌人敢向我进攻，他是有计划的，我们不要轻易去如他所愿而上当，如果敌大我退自然我占便宜，如果敌小我退不过有点疲劳，再去打不迟。

G、单纯军队的袭击，侦知敌距我有百里以外，我军轻装尽一夜功夫跑到出敌不意而歼灭之。

H、用群众封锁的袭击，在敌接近我时，我方有群众的组织四面断绝敌人交通，使敌人不知道我军已在其附近，然利用拂晓将其击溃。

用群众扰乱，红军以主力解决敌人，在作战时，分一部红军，以一排为单位，每一排领导三四百工农勇敢分子，多打红旗占领四面山头，和用工农的武器土炮，刀矛，喇叭、利用满山遍野群众打吆喝去扰乱敌人，然后红军以全力出其不意，从侧面击溃之，或利用赤卫队日夜打冷枪或埋伏在山林中瞄准打大旗左右的指挥官，先使敌人恐慌疲倦，然后用生力军袭击之。

J、在后有追兵，前有阻挡部队的时候，或追兵过于强硬的时候，为了脱离敌人，可以一部队伍距敌四五里引其走大道，大队则取间道脱离敌人或猛出敌后而袭击之，或用农民在另一路上划路标，贴标语，以引诱敌去穷追，我军从小道冲出。

K、不打硬仗，不能十分有把握的仗就不打，杀人三千，自损八百，这是一句好话，尤其红军干部补充困难，子弹不易，打了胜仗不能得枪械在红军战术上均是失败。

L、敌人若进攻我的根据地，我军则绕道去却其后方此为围魏救赵之老办法，红军常用有效。

M、我要攻击某处，不直接前去，偏偏走旁一个方面，到了中途忽然打转，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击溃敌人。

N、敌人急急追来，择一个好地形，埋伏的好好的，候敌一来一网打尽。

上面十四条，有的为旧式战术所无，有的为旧式战术所本有，但为四军的法宝，故一并录出。

四 军 的 近 状

1、目前的游击区域：本军五月廿日左右红军击溃陈国辉部两营，占领龙岩，五月底进占永定陈之全部由粤撤回，红军经连城游击，复于六月十九进攻龙岩，陈部五营三营全部缴械，陈仅以身免，其余两营因未在龙岩幸而得免。红军由此即决定闽西，龙岩、永定、连城、上杭、汀州、武平六县游击计划，龙岩城由六月起迄在红军手中，至近日始放弃，永定自本年四月起直至现在始放弃，上杭全县均有群众暴动，汀州、武平有一部公开斗争，连城南部全为赤色区域，宁洋、漳平红军派部队前往游击，在目前闽西之游击计划，积极准备反动派三省会剿之到来，如三省合兵进兵闽西，红军可取道闽北入赣东赣南发动沿途的群众，或入闽省腹地到福州延平之间活动，或分兵两路一路往闽北，一路留闽西，上面三个方式视敌人逼近情况大明时才作决定。

2、四军的实力：四军现分一二三纵队，此项为基干部队，每纵队分两个支队，外加直属机炮连及一特务队，一纵队可当反动军一团战斗力过之，每纵队人数在一千六百人左右，枪八百至九百，手枪排长以上军官均有一支，手机关枪每纵队有两挺，每纵队有机关枪两挺，迫击炮两门，合组机炮连，四军子弹不甚充足因经常没有接济，另属于四军所指挥的彭德怀部江西红军二四团当另有报告说明之。

3、四军官兵夫的成分：

（1）历史的：贺叶旧部到现在大半成了干部分子，现在还在当士兵者为所极少，以官兵夫合计，此项人数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二，湘南农军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四，历史俘虏敌方士兵所改编的约占十分之二左右，在赣南闽西新招募的约占十分之二。

（2）籍贯的：湘南人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五，闽赣人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二，其余十分之三则为其他各省人。

（3）年龄的：少年（十八至廿五岁）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六，壮年的（廿五至四十岁左右）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三，老幼的（十六岁以下四十岁以上）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一。

（4）战斗兵与非战斗兵之比例：战斗兵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六余为官佐夫役等。

结 论

把四军一般状况详叙之后，还有把它的优点和缺点指出作为一个结论，以补足上面的不足处。

1、优点：红军与普通军队大概从四方面去分别：

A、红军是阶级的军队，为自己本阶级利益而战，没有雇佣性质。

B、红军是工农阶级的学校，官长当是提高士兵各种文化智识，不象旁的军队以严刑峻法，把兵士作成好管理的奴隶。

C、红军各部分间非常团结，内部官兵是兄弟一般关系，非常欢爱，不会象反动军队之不能团结，发生互相厮杀等事。

D、红军是由工农斗争中产出，不能脱离工农群众。在上面四点，红军四军渐做到

了，如雇佣性，四军在过去困难当中能继续奋斗，实由于兵士自知当兵是为的自己及工农大众，不是为的饷银而当兵，尤其伤兵同志在困苦万分，没有抱怨或持功骄傲等事，如红军的学校化，因此刻在流动时期及训练人材缺乏没有做得十分好，但较之反动军队，士兵的政治认识文化程度都要高些，在四军各团营兵士内是非常团结彼此相依为命的。尤其是恶劣的政治环境及斗争历史更坚决了他们的团结，其次为红军与群众的关系非常密切，四军在过去经验上使每个兵士都知道对本地工农的帮助的重要，达到某一地方每个兵士能自动向群众宣传与之发生亲密的关系，压迫工农是红军最重的犯罪。

2、缺点：

A、造成党军的错误倾向。

B、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时常发生职权上的纠纷。

C、士兵委员会的运用不好，有时士委超出职权的范围，有时又不发生作用等于空闲机关。

D、因经常在行动期中伤病兵安插非常困难，安置在农民群众中医药仍然没有办法，相当影响斗争力。

E、集团军队的力量须能驱逐较大的敌人，但养成了群众依赖红军的心理，忽视本身的力量。

F、经常受敌人封锁，对政治消息及各地革命实况隔离以致红军中人常常有囿于一隅的观察，进退比较困难。

G、经常与敌人冲突，干部感觉着补充的困难。

H、红军士兵来源多半出于招募及改编敌兵，因此军队只能集团行动，竖极大目标引起敌人围攻而不能做到化整个为零。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闽西古田会议）

一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略）

（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二 党的组织问题

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大会对于这个问题特作详细的分析与决定。同志们应站在大会的精神之上，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才算得到成功。

甲 党的组织路线

一 党员发展的路线，以战斗兵为主要对象。同时，对非战斗兵如伕子勤务兵等，亦不应忽视。

二 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在党员数量过少的部队，事实上不能每班建立一个小组时，则暂以排为单位建设小组，而把组员有计划的分配到各班，但须明白这是过渡方法。

三 红军原有小组的编制法，即干部分子与一般分子，知识分子与劳动分子的混合编制法，是很对的。但还缺乏有计划的将各种工作不同能力不同分子很好的混合编制起来，以后此点要多加注意。至于单纯地把干部分子编成小组，那是要不得的。

乙 党的组织松懈问题

一 四军党的组织现状：

（一）党员加入太随便，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也拉了进来，特别是官长，不要任何条件，一概拉进。因此党的质量就弄得很差了。

（二）各级党部的工作做到了解决问题，但完全忘却了教育同志一个任务。关于训练性质的会议，如活动分子大会，书宣组联席会，委组联席会，支部大会，纵队或支队党员大会等非常开得少。

（三）一般的纪律松懈。特别在负担重要工作没有人代替他的情况，对他所犯错误，往往敷衍下去，不执行纪律。对一人如此，对他人亦不得不如此，因此把纪律一般的放松了。

（四）所有官长既都成了党员，结果所有军事政治机关的工作人，便很少注意他的社会职业的工作了，都以为社会职业的工作就是党的工作，两者分不开来。如各级军事工作会议，各级政治工作会议几乎完全没有，一切都以为党决定了就完事了。党员在社会职业中起核心作用一件事，简直不谈起了。

（五）上下级的关系不密切。下级的报告，上级少有批答或指示。下级会议上级少有派人出席。这固然是因为上级机关组织不健全，但上级机关工作态度不积极，也是对下级指导缺乏或指导不详尽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对于指导实际工作，如一个部队出发游击的工作指导等，一般的缺乏详尽。还有某几个部队，几乎连粗略的指导都没有。

（六）支部大会及小组会，有许多没有按时开。

二　纠正的路线：

（一）旧的基础厉行洗除。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

（二）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

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

2、忠实；

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

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

5、不吃鸦片，不赌博。

以上五个条件完备的人，才能够介绍他进党。介绍人事先要审查被介绍人是否确实具备上列条件。经过必须的介绍手续。介绍入党后，要详细告诉新党员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介绍人对所介绍人应负相当责任。支委要派人对将入党的人谈话，考察是否具备入党条件。

（三）各级党部不单是解决问题和指导实际工作的，他还有教育同志的重大任务。各种训练同志的会议，及其他训练办法如训练班、讨论会等，都要有计划的举行起来。

（四）严格的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

（五）分清党员社会职业与党的工作的性质，每个党员（除开党内负了重要或专门任务的人是为革命职业家外），必须担负一件社会职业，同时即在他的社会职业中担负党给他的工作

（六）各级党部的工作态度，应该比较从前更积极起来，下级对上级要有详尽的报告，上级对于这些报告要有详尽的讨论和答复，并尽可能派人出席下级会议，不能借口工作人少工作能力薄弱和工作时间不够，来掩护自己的不积极，而把这些工作疏忽起来。

（七）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的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的督促开会。

丙　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

一　党员到会少兴趣的原因：

（一）不明白会议的意义。支部会议的重要意义第一是解决问题。一切斗争的问题，内部的问题，都要在会议上集中讨论去解决它。若不到会或到会不积极发表意见，就是他不了解会议的政治意义，就是他对斗争没有兴趣，凡是对斗争积极的人，他一定是热心到会，热心发言的。第二是教育同志。会议不仅解决了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要考察问题的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动了同志们的心思才力，由会议的政治化与实际化，同志们每个的头脑也都政治化实际化了。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了。这就是会议的教育意义。我军党员因为不明白这些意义，所以成为不爱到会或到会少兴趣的第一个原因。

（二）决议案决议了不执行，或对上级请求事项很久得不到答复，因此减少讨论的兴趣。

（三）负责人事前没有好的准备。不准备议事日程，对问题的内容及环境不明了，问题应怎样解决也没有准备一点意见。

（四）主席轻易停止党员发言，发言偶出题外，便马上禁止他，他便挫兴不作声了。如发言有错误，除停止外还讥笑他。

（五）封建式的会场秩序，死板无活气，到会如坐狱。

二　纠正的方法：

（一）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二）要把会议的重大意义时常对同志提醒，尤其是新党员及工作不积极的党员。（三）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四）上级机关要勤快答复下级的问题，不要拖延太长，失了热气。（五）负责人事先要准备议事日程，议事日程要具体化；对问题的内容和环境先要调查清楚，并对于怎样解决先要想一想。（六）主席指导会议要采用很好的技术，要引导群众的讨论潮流奔赴到某一问题；但有重要意义的超出题外的发展，不但不要大杀风景地去遏止他，而且要珍重地捉住这一发展的要点，介绍给大众，成立新的议题。这样会议才有生趣，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同时会议也才真正实现了教育的意义。（七）废止封建的会场秩序。共产党的会场是要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泼的爽快的精神，把这些做成秩序。

丁　红军党内青年组织及其工作

一　军队中青年利益与成年利益不能划分，团没有特殊的工作对象。又党的小组以班为单位建设方才有利斗争。因此党的支部里头无设立团的小组的必要。

二　党员中青年部分因其有比成年不同的情绪，除一般地接受党的训练外，还有特别受一种青年教育之必要。又因争取青年工农群众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须有专门组织去担任这种工作。因此，应在支部中划出年在二十岁以下的青年党员（有特别情形如担任党的重要工作的除外）成立青年工作会议。这种会议，除以大队为单位经常有计划的召集开会外，支队及纵队亦各应酌定时间，召集开会。

三　为计划对青年党员的教育，计划争取青年工农群众的方法，并指导青年工作会议，前委及纵委里头各设立五人之青年工作委员会，支队委及支部则各设一个青年委员，在各级党部的指导之下从事工作。

戊　政治委员与党内工作关系

大队支队两级党部的书记，以不兼政治委员为原则。但在工作人员缺乏的部队，仍可暂时兼充。没有担任党的书记责任的政治委员，上级党部应察看情形，在条件适合的环境之下，得委为党的特派员，有指导该级党的工作的任务。

己　直属队最高党部问题

军及各纵队的直属队，均组织直属队委为最高党部，委员人数五人至七人。

庚　士兵会党团问题

大队士兵会不设党团，工作由支委指导，纵队士兵会要设党团，此党团受纵委指导。

三　党内教育问题

甲　意　义

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作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的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大任务之一。大会规定用下列的材料和方法去教育党员，党的指导机关要有更详细的讨论，去执行这一任务。

乙　材　料

一　政治分析；
二　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讨论；
三　组织常识；
四　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的纠正；
五　反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问题的讨论；
六　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
七　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
八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
九　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
十　革命的目前阶段和他的前途问题。

以上十项，除一部分（如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事实上限于适用在干部分子外，其余都适用于一般党员。

丙　方　法

一　党报；

二　政治简报；
三　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
四　训练班；
五　有组织的分配看书；
六　对不识字党员读书报；
七　个别谈话；
八　批评；
九　小组会；
十　支部大会；
十一　支部委组联席会；
十二　纵队为单位组长以上活动分子大会；
十三　全军支书以上活动分子大会；
十四　纵队为单位党员大会；
十五　纵队为单位各级书、宣、组联席会议；
十六　全军支队以上书、宣、组联席会议；
十七　政治讨论会；
十八　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

四　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甲　红军宣传工作的意义

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

乙　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

一　宣传内容的缺点：
（一）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从前发布的政纲如四言布告等，均不具体）；
（二）忽略群众日常斗争的宣传与鼓动；
（三）忽略城市贫民之取得；
（四）忽略对妇女群众的宣传；
（五）对青年群众的宣传不充分；
（六）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宣传不充分；
（七）极少破坏地主阶级武装组织（民团靖卫团等）的宣传；
（八）宣传没有时间性地方性。
二　宣传技术的缺点：
（一）宣传队不健全。

1. 宣传员由每大队五个缩小到三个，有些只有一两个，有些只有一个，有少数部队连一个都没有了。

2. 宣传员成份太差，俘虏兵也有，伙伕马伕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便把他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当司书当不成器便送入宣传队去的也有，因残废了别的工作机关不要塞进宣传队去的也有，现在的宣传队简直成了收容所，完全不能执行它的任务了。

3. 差不多官兵一致的排斥宣传队（同时也是因为宣传员成份太差，工作成绩少，引起一般人对他的不满），“闲杂人”，“卖假膏药的”，就是一般人送给宣传员们的称号。

4. 宣传队没有够用的宣传费。

5. 对宣传员的训练没有计划，同时对他们工作的督促也不好，因此宣传队的工作简直随随便便，做一点不做一点都没有人理他。

（二）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同时散发和邮寄都不得法。

（三）壁报出得很少，政治简报内容太简略，又出得少，字又太小看不清。

（四）革命歌谣简直没有。

（五）画报只出了几张。

（六）化装宣传完全没有。

（七）含有士兵娱乐和接近工农群众两个意义的俱乐部，没有办起来。

（八）口头宣传，又少又糟。

（九）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前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

（十）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谈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

（十一）群众大会很少开，又开得不好。

（十二）对白军士兵的宣传方法不好。

丙　纠正的路线

一　宣传内容方面：

（一）发布一个具体的政纲，名曰红军政纲。

（二）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的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

（三）城市贫民（中小商人与学生）是民权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相当的力量，忽视了这个力量之争取，就无异把这个力量送给豪绅资产阶级。以后对城市中小商人及学生群众，要有深入的宣传工作去取得他们。

（四）妇女占人口的半数，劳动妇女在经济上的地位和她们特别受压迫的状况，不但证明妇女对革命的迫切需要，而且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以后对妇女要有切实的口号，做普遍的宣传。

（五）劳苦青年群众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在斗争中他们又是最勇敢最坚决的。因此对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六）中国广大的游民群众，若站在革命阶级方面，就成了革命的工具，若站在反动阶级方面，就成了反革命的工具，因此从反动阶级影响之下夺取游民群众，是党的宣传任务之一。执行宣传工作时，须注意各部分游民生活与性质之不同，分别的对他们宣传。

（七）地主阶级武装组织之破坏及其群众之争取，是农村中土地革命胜利条件之一，以后关于对民团靖卫团等团丁群众的宣传工作，特别要注意。

（八）到一个地方，要有适合那个地方的宣传口号和鼓动口号。又要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时期与汪蒋战争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

二　宣传技术方面：

（一）宣传队问题：

1. 意义：

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宣传队若不弄好，红军的宣传任务就荒废了一个大的部分。因此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从理论上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闲杂人”“卖假膏药的”等等奇怪的称呼，应该从此取消掉。

2. 组织：

（1）以支队为单位，军及纵队直属队均各成一单位，每单位组织一个中队，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伕一人（挑宣传品），公差二人。每个中队的宣传员分为若干分队（按照大队或其他部队与机关的数目，定出分队的多少），每个分队有分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

（2）各支队宣传队，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各大队分开游击时，每大队应派去一个宣传分队随同工作，受大队政治委员指挥。直属队宣传队，受政治部宣传科长指挥。全纵队各宣传队，受纵队政治部宣传科指挥，全军宣传队，受军政治部宣传科指挥。

（3）宣传队用费，由政治部发给，须使之够用。

（4）改造宣传员成份的方法，除请地方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红军宣传队之外；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尽可能不调班长）为宣传员。政治部应经常的作出训练宣传队的计划，规定训练的材料、方法、时间、教授人等，积极的改进宣传员的质量。

（二）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旧的应加以审查，新的应从速起草。

宣传品分布的适当有效，应是宣传队技术问题的重要一项。邮寄宣传品，从邮件中夹带宣传品，或在邮件上印上宣传鼓动口号，政治工作机关应该注意去做，且要做得好。

（三）壁报为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军及纵队各为一单位办一壁报，由政治部宣传科负责，名字均叫做“时事简报”。内容是：一、国际国内政治消息；二、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三、红军工作情形。每星期至少出一张，一概用大张纸写，不用油印。每次尽量多写几张。政治简报的编印，应注意下列各项：1.要快；2.内容要丰富一点；3.字要稍大点要清楚点。

（四）各政治部负责，征集并编制表现各种群众情绪的革命歌谣，军政治部编制委员会负督促及调查之责。

（五）军政治部宣传科的艺术股，应该充实起来，出版石印的或油印的画报。为了

充实军艺股，应该把全军绘画人才集中工作。

（六）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装宣传。

（七）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设俱乐部。

（八）宣传队中设口头宣传股，及文字宣传股，研究并指挥口头及文字的宣传技术。

（九）严格的执行三条纪律。

（十）上门板，捆禾草等项，是从行动中扩大红军影响、增加群众对红军信仰的良好方法，应当好好去执行。

（十一）政治部及宣传队，要有计划有组织的召集各种群众大会，要预先规定开会秩序，演说人，演说题目及时间。

（十二）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官长的宣传非常之重要，以后要注意下列的方法：

1. 宣传文字要简短，使他们顷刻间能看完，要精警，使他们一看起一个印象。

2. 除有计划的在敌人经过道路两旁多写切合某现实部队的标语之外，还要将传单存储于沿路党部及群众机关手中，俟敌军经过时，巧妙地传达给他们。

3. 从俘虏官兵中及邮件检查中，调查敌方官兵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番号，邮寄宣传品去，或写信给他们。

4. 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优待俘虏兵的方法：第一是不搜查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士兵搜检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的废掉。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得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地留下来。以上各项，对于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

5. 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对待敌方受伤官长亦然。

五　士兵政治训练问题

甲　材料问题

下列各项，应很艺术的编制课本，作对士兵训练的材料：

一　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之任务与计划；

二　土地革命各方面；

三　武装组织及其战术；

四　三条纪律建设的理由；

五　早晚点名口号；

六　识字运动；

七　怎样作群众工作；

八　红军标语之逐个解释；
九　各种偏向之纠正；
十　苏联红军；
十一　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
十二　红军白军比较；
十三　共产党国民党比较；
十四　革命故事；
十五　社会进化故事；
十六　卫生；
十七　游击区域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常识；
十八　革命歌；
十九　图报。

乙 方 法

一　上政治课：

（一）分普通、特别、干部三班。普通班分两种形式：一个支队在一起时，以支队为单位上课，教授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除战斗兵须到课外，传令兵，勤务兵，长伕，马伕、伙伕，均须到课。普通班之目的，在使一般兵士得到初步政治常识。

（二）特别班以支队为单位，从各大队士兵中考选稍识文字及略有政治常识者五十名编成。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教授，大队政治委员分担各课。特别班之目的，在造成较普通班高一级的政治常识人材，以备将来升当下级干部之用。

（三）干部班以纵队为单位，军直属队另成一单位，以大队长，大队副，中队长，中队副，各级军佐，及其他指定人员编成。目的在提高现在下级干部的政治水平线，使能领导群众，以备将来能充当中级干部。由纵队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纵队司令官及其他有适当能力的人担任教授。

（四）以支队为单位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以支队各政治委员并军事长官中能任政治训练者组织之，以支队政治委员为主任。其任务为讨论在一个支队内关于执行士兵政治训练的种种问题。

（五）军及各纵队直属部队的政治训练，由军及各纵队政治宣传科负责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执行之。

（六）教授法：

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2．由近及远；
3．由浅入深；
4．说话通俗话（新名词要释俗）；
5．说话要明白；
6．说话要有趣味；
7．以姿势助说话；

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

9．要提纲；

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

二　早晚点名说话：

（一）说话时间每次最多不得过半小时；

（二）材料：

1．报告政治消息；

2．批评日常生活；

3．解释每周政治口号。

三　集合讲话：

（一）支队每星期一次，纵队每半月一次，全军不定期。

（二）每次讲话，须要有计划的由政治工作机关（支队由政治委员）商同军事工作机关规定讲话内容，指定讲话人，并分配讲话时间。

（三）每次讲话除任勤务的以外，不准不到。

（四）每次讲话内容及对于群众的影响，下级政治机关须报告上级政治机关。

四　个别谈话：

（一）对下列各种人必须和他做个别谈话：

1．有偏向的；

2．受了处罚的；

3．伤兵；

4．病兵；

5．新兵；

6．俘虏兵；

7．对工作不安的；

8．思想动摇的。

（二）谈话前，须调查谈话对象的心理及环境。

（三）谈话时，须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和他说话。

（四）谈话后，须记录谈话的要点及其影响。

五　游艺：

（一）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做下列各种游艺：

1．捉迷藏等；

2．打足球；

3．音乐；

4．武术；

5．花鼓调；

6．旧剧。

（二）于每个宣传队下，设化装宣传团。

（三）游艺设备费由公家支给（大队的由纵队政治部批准）。

六　改良待遇：

（一）坚决废止肉刑；

（二）废止辱骂；

（三）优待伤病兵；

（四）恢复每月发草鞋钱大洋四角的制度。

七　怎样作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教育：

（一）把红军生活习惯，如1.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2.三大纪律及其理由；3.士兵会的意义和作用；4.红军中的经济制度（经济的来源，管理经济的组织，经济公开主义及士兵审查制度）；5.经济委员会管理大队伙食和分伙食尾数；6.废止肉刑辱骂；7.优待俘虏等项，讲给新兵们俘虏们听。

（二）讲述红军斗争略史。

（三）红军的宗旨：1.红军与白军所以不同，此点对俘虏兵要详细讲；2.红军与土匪所以不同；3.红军三大任务。

（四）讲述红军组织系统。

（五）普通政治常识。如1.国民党与共产党；2.英日美三大帝国主义侵略中国；3.各派军阀受帝国主义指挥，到处混战；4.分田；5.苏维埃；6.赤卫队等。

六　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

甲、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识字课本（以商务馆小学教材，平民千字课，龙岩文化社教本等作参考）。

乙、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个支队一班，直属队一班，每班学生不得超过二十五人。以政治部主任为校长，以宣传科长为教务主任。每班设一主任教员，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

丙、由公家出钱置备纸笔墨等用具发给学生。

七　废止肉刑问题

甲　红军中用肉刑的效果

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伕差不多跑完了，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这个大队长调走了，士兵才得到解放。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伙伕，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的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最后这班官长自己也立不住脚，都不得不离开四纵队。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

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意义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也不能不说是二纵队打人的风气特别浓厚的一种结果。现在红军中一般士兵的呼声是："官长不打士兵？打得要死！"这种群众的不平和怨愤的表露，实在值得我们严重的注意。

乙　肉刑的来源和废止它的理由

封建阶级为了维持它的封建的剥削，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刑罚做工具，以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和叛乱，这是肉刑所以为封建时代的产物的理由。经济的发展，进步到资本主义制度，它便需要提出自由主义，以发展工农士兵群众的个性，增强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打仗能力，以造成资本主义发展之条件。因此，凡资产阶级的国家，一般的废止肉刑，在军队中亦早就没有什么打人的怪事了。至于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的诞生，阶级斗争的激进，工农阶级有推翻统治阶级的权力和依于这个权力的剥削，便要发动自己阶级的广大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苏维埃政权，是最进步阶级的政权，它的下面，不应有一切封建制度的残余存在。因此，苏联不但红军中老早没有肉刑，在一般法律上，亦通通严禁肉刑的使用。红军第四军产生于封建制度尚未肃清的中国，它的主要成份，又多是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转变过来的，一般封建的制度思想和习惯，依然很浓厚的存在于一般官长士兵之中，由是打人的习惯和非打不怕的习惯，还是与封建军阀军队里头的习惯一样。虽然老早就提出了官长不打士兵的口号和规定士兵会有申诉他们的痛苦的权利，但简直没有什么效力，其结果造成官兵间的悬隔，低落了士兵以至官长情绪，逃跑的数目日多，军中充满了怨恨空气，甚至发生自杀的事件，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果不赶快纠正，危险不可胜言。

丙　纠正的方法

一　坚决的废止肉刑。

二　举行废止肉刑运动。这个运动，要从官兵两方面工作，使"废止肉刑，方才利于斗争"的意义，普及于官兵群众之中。这样才能使官长方面，不但不致因废止肉刑觉得兵带不住了，而且了解废止肉刑之后，将要更利于管理与训练。士兵方面，不但不致因废止肉刑更顽皮了，而且因废止肉刑，增加了斗争的情绪，撤去了官兵的隔阂，将要自觉的接受管理训练和一般纪律。

三　肉刑废止之后，因为历史的习惯的原因，发生一些临时不良现象是会有的，这应该加紧我们的责任，努力于说服精神和自觉遵守纪律精神的提倡，去克服这个违反斗争任务的最恶劣的封建制度。决不能借口有些不良现象，便掩护了它的封建制度打人习惯。凡那些借口临时不良现象反对废止肉刑，或对废止肉刑运动怠工的，客观上便是妨碍革命斗争的发展，也就是帮助了统治阶级。

四　红军废止肉刑的法律程序：（一）修改红军惩罚条例；（二）由最高军政机关会衔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并颁布新的红军惩罚条例；（三）通令发布后，一方面由军政机关召集官长会议，详细说明废止肉刑的理由，使全体官长拥护这个通令的重大改革，良好地努力地在部队中执行起来；（四）一面由士兵会召集士兵代表会议，除拥护这个改革，以后要自觉的遵守纪律外，并要森严群众的纪律制裁，以达到肉刑废止后的良好的收获。

八 优待伤兵问题

甲 伤病兵痛苦的现象及影响

一 全军各部队卫生机关不健全，医官少，药少，担架设备不充分，办事人少与不健全，以致有许多伤病兵，不但得不到充分治疗，即大概的初步治疗有时都得不到。

二 全军军事政治机关对伤病兵注意不充分。如(一)对于卫生机关的健全，不但没有尽得最大的努力，而且简直不加注意，各种会议对卫生问题讨论很少。(二)官长对于伤病兵没有尽其可能去随时安慰他们，如官长替伤病兵送茶水，盖被窝，随时慰问等习惯，在红军中简直没有。官长对伤兵病兵采一种不理问态度，甚至表示讨厌他们的态度。(三)行军时，官长以至士兵对在沿途落伍的伤兵，完全不表示一点同情，不但不为他们想法子，反而一味的怒骂，或无情的驱逐他们。

三 重伤重病兵给养和用费不够，伤兵伤后七八天还没有衣服换，调养费，病官有，病兵没有。

四 蛟洋医院的缺点：（一）无组织状态；（二）医官和药太少；（三）医官卖私药；（四）不清洁；（五）御寒衣被不够；（六）看护兵太少；（七）饮食恶劣；（八）房子窄；（九）与当地群众关系不良。以致伤病兵看医院如牢狱，不愿留在后方。

上列各种对伤病兵的待遇不良，便发生下列的影响：（一）使士兵不满意红军，“红军好是好，就是不要带花，不要病”，这种舆论简直普遍全体士兵以至下级官长之中；（二）士兵和官长不满意，越发增加官兵间悬隔；（三）士兵及下级官长都怕带花，因此，减少红军战斗力；（四）逃兵多；（五）影响工农群众，减少他们加入红军的勇气。

乙 解决的办法

一 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象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

二 卫生机关的组织应特别使之健全，办事人要找有能力的，不要把别地方用不着的人塞进卫生队去。并要增加办事人，达到照料完备之目的。医生少和药少的问题，要尽可能设法解决。对于医生，应注意督促他们看病详细一点，不要马马虎虎。

三 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以上这些招呼伤兵的方法，要定为一种制度，大家实行起来，因为这是最能取得群众的方法。

四 对行军时，沿途落伍的伤兵：(一)禁止任何人对他们的怒骂或讥笑；(二)伤病兵让路的时候，要好好对他说，不要一把推开他；(三)无论那一个部队或机关，凡有因病因伤落伍下来的，不论是战斗兵，非战斗兵，均要立即派一个人去招呼，他如系重伤重病，并要尽量设法雇佚来抬；(四)每次行军，后卫要耐烦带上落伍的伤病兵，必需时还要替他背回枪弹。

五　发给伤病兵零用钱，要酌量伤病的轻重，重伤重病的要比轻伤轻病的多给一点。调养费一项，对于特别重伤重病的，应该不分官兵伕，酌量发给。

六　伤病兵衣服被窝问题，公家尽力置备外，应该在各部队官兵中发起募捐，这不仅为了增加伤兵的零用钱，而且是唤起全军互助济难精神的好方法。

七　蛟洋后方医院许多缺点，应该有计划去纠正。此外还应该在闽西工农群众中发起募捐（衣被现款粮食），以密切联系工农群众与红军。

九　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甲、在高级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

乙、红军与群众的关系：

一　凡有全军意义的事项，如发布政纲等，军事政治两机关会衔发布。

二　群众工作，如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设政权，以及没收，审判，处罚，募捐，筹款，济难等事之指挥监督，在地方政权机关没有建设以前，均属政治部职权。

三　凡没有建设政权机关的地方，红军政治部即代替当地政权机关，至地方政权机关建设时为止。凡地方政权机关已经建设的地方，应以使地方政权机关独立处理一切事情，在群众中巩固其信仰为原则。只有在地方政权机关还不健全，及红军与地方有关系的事项，得用地方政权机关与红军政治部会衔的方法处理之。

四　帮助地方武装之建立与发展，这个责任是政治部的，帮助地方武装之平时的军事训练及战时的作战指挥，这个责任是司令部的。但均须尽可能的经过地方政权机关的路线，极力避免直接处理。

丙、红军里面用人行政，军事政治两个系统，各有独立的路线。彼此有关系时，如人员等之互相调动，消息之互相传达等，则用公函平行通报。

丁、礼节及军风纪之执行，军事政治两个系统，相互间均用阶级服从原则，不得借口系统不同，有所怠慢或不服指挥。

戊、凡给养，卫生，行军，作战，宿营等项，政治系统应接受军事系统之指挥。凡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之指挥。但指挥的形式，只能直达对方机关里头的从属机关（总务科或副官处等）。

己、凡红军筹款的指挥及政治工作用费的决定与支出，均属于政治部，军事机关不得干涉（取款手续，政治部直接军需处）。党部用费向政治部支给。

庚、军事机关一切命令，除政治委员须副署外，政治部主任无须署名。政治机关一切命令，政治部单独行使，政治委员无须副署。

给林彪的一封信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

毛 泽 东

林彪同志：

新年已经到来几天了，你的信我还没有回答。一则因为有些事情忙着，二则也因为我到底写点什么给你呢？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你呢？搜索我的枯肠，没有想出一点什么适当的东西来，因此也就拖延着。现在我想得一点东西了，虽然不知道到底于你的情况切合不切合，但我这点材料实是现今斗争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使于你的个别情况不切合，仍是一般紧要的问题。所以我就把它提出来。

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最明鲜。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由你相信□□□式的流动游击政策一点看来，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有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

（中略，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

我要对你说的话大致已经说完了。扯开了话匣，说的未免太多。但我觉得我们的讨论问题是有益的，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果然正确地解决了，影响到红军的行动实在不小，所以我很高兴的写了这一篇。

末了还有两点须要作个申明。一是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之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二是我说你欲用流动流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不是说你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你显然没有此二者，因为二者完全没有争取群众的观念，你则是主张“放

手争取群众”的，你不但主张，而且是在实际做的。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的就在于这一点。

我的不对的地方，请你指正。

于上杭古田

土　地　法

（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

第一章　土地之没收及分配

第一条　暴动推翻豪绅地主阶级政权后，须立刻没收一切豪绅地主阶级及祠堂庙宇社会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归苏维埃所有，由苏维埃分配与贫苦农民及其他需要土地等项的人民。只有农民协会，尚未成立苏维埃时，农民协会亦得执行没收及分配。

第二条　自耕农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除自食自用外，尚有多余，经当地多数农民要求没收的，苏维埃应批准农民的要求，没收其多余的部分并分配之。

第三条　豪绅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审查，准其在乡居住，又无它种方法维持生活的，得酌量分与田地。

第四条　现役红军官兵夫及从事革命工作的人，照例分田，并由苏维埃派人帮助其家属耕种。

第五条　乡村中工商学各业能够生活的不分田。生活不够的，得酌量分与田地，以补足其生活为限。

第六条　雇农及无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与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苏维埃收回他的田地。

第七条　旅外不在家乡的，不分田。

第八条　分田的区域标准有二：

（1）以乡为单位，由某乡农民将他们在本乡及邻乡所耕田地总合起来，共同分配。

（2）以数乡为单位，如有三四乡互相毗连的，内中几乡田多几乡田少，若以一乡为单位分配，那田少之乡不能维持生活，又无它种生产可以维持生活的，则以三四乡合为一个单位去分配。以上两种办法，第一种是普遍适用的，如有特别情形经乡苏维埃要求，得区苏维埃批准的，可用第二种办法。

第九条　分田的数量标准：

（1）为满足多数人的要求，并使农人迅速得到田地起见，应依乡村人口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

（2）有特别情形的地方，经乡苏维埃请求得区苏维埃批准的，得以劳动的标准分配。能劳动的比不能劳动的多分一倍。（十四岁以上至六十岁能耕种的为一劳动单位）。

第十条　为求迅速破坏封建势力起见，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不得采取绝对平均主义，重新瓜分。分田后，由苏维埃制定木牌插于田中，载明此田生产数量、现归某人耕种。

第十一条　所有豪绅地主及祠庙公田的契据，限期缴交乡苏维埃，或乡区农民协会，当众焚毁。自耕的田契，如有多数农民要求焚毁的，亦得焚毁。

第十二条　田地分配后，由县苏维埃或区苏维埃发给耕种证。

第十三条　凡乡中死亡、改业和外出的，将他所分得的田地收归苏维埃再行分配。或来或新生的，苏维埃应设法分与田地，但须在收获之后。

第十四条　暴动分田时，如农民已下种，则本季生产归原耕种农民收获，他人不得刈取。

第十五条　河坝及大规模池塘，不便分配的归苏维埃管理，供给人民公共使用并督促人民修浚整理。

第十六条　大规模山林不便分配的，归苏维埃管理。人民需要采用竹木时，按照下列数目，得苏维埃批准，二十根以下的由乡苏维埃批准。二十根以上五十根以下的，由区苏维埃批准。五十根以上的由县苏维埃批准。

第十七条　大规模山林的出产，除供给人民需要外，其余归苏维埃出卖，所得之价，作苏维埃用费。各级苏维埃应得之成数，由高级苏维埃规定。

第十八条　木樟山杉山竹之不便个别分配的，得由人民数家合为一组，向苏维埃领取栽耕，以其生产分配组员使用。

第十九条　为满足贫苦农民要求起见，应将所有没收田地，尽数分与他们，苏维埃不必保留。但得保留没收房屋之一部分为公共事业之用。

第二章　废除债券

第二十条　工农穷人欠豪绅地主之债，一律不还，债券借约限期缴交苏维埃或农会焚毁。

第廿一条　豪绅地主及商人欠公家或工农贫民或小资产阶级之债，不论新旧，都要清还。

第廿二条　工农贫民欠商家交易之帐，而非商业高利贷的，仍旧要还。但非本身之帐不还，年限太久之帐也不还。

第廿三条　工农穷人自己来往之帐，革命以前借的，应全还、减还或免还，由乡区苏维埃按照情形，适当规定。革命以后借的，全然要还。

第廿四条　工农穷人典当物件及房屋与豪绅地主及典业奸商的，无条件收回抵押品。

第廿五条　工农穷人典当物件及房屋与小资产阶级的，其抵押品，应收回若干或不收回，由乡区苏维埃照双方经济情形决定之。

第廿六条　钱会、谷会，豪绅地主奸商接取工农穷人在先的，接会人应将钱谷交还于纳会人，会取消。工农穷人接取豪绅地主奸商在先的，接会人无须交还钱谷于纳会人，会也取消。

第廿七条　苏维埃政权之下，禁止高利借贷。由县苏维埃按照当地金融情形规定适当利

率。但不得超过普通资本在当地一般经济情况中所得利率之数。

第三章 土　地　税

第廿八条　为打倒反革命的需要（如维持并扩大红军及赤卫队，维持政权机关等），及增加群众利益的需要（如设立学校、看病所、救济残废老幼，修理道河坝等），苏维埃得向农民征收土地税。

第廿九条　土地税须在苏维埃建立之后，而且群众已经得到实际利益，并经高级苏维埃批准时亦可征收。

第三十条　土地税按照农民分田数量分等征收：

1. 每人分田收谷五担以下的，免收土地税。
2. 每人分田收谷六担的，收税百分之一。
3. 每人分田收谷七担的，收税百分之一·五。
4. 每人分田收谷八担的，收税百分之二·五。
5. 每人分田收谷九担的，收税百分之四。
6. 每人分田收谷十担的，收税百分之五·五。
7. 每人分田收谷十一担的，收税百分之七。
8. 每人分田收谷十二担的，收税百分之八·五。

以后每加收谷一担，加收土地税百分之一·五。

第卅一条　土地税按照下比例分配于各级苏维埃：

百分之五十归乡苏维埃，百分之二十归区苏维埃，百分之二十归县苏维埃，百分之十归省苏维埃。

第卅二条　山林出产，只供人民自己食用，没有多余的，不收税。自己食用之外尚有多余的，其多余部份，由苏维埃按照出卖价值，用适当比例收税。

第四章 工　　资

第卅三条　农村手工业工人及雇农，以前工资过低的要适当提高，以后工资数目，由苏维埃依照生活物价涨跌及农民收入丰歉两个标准决定之。乡区苏维埃规定工资，须得县或省苏维埃批准。

前委通告（第一号）

——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六日）

四军前委、赣西特委、五、六两军军委联席会议在吉安之陂头举行，二月六日至九日开会四天。联席会议开会时节的政治形势是帝国主义积极布置反苏联战争，世界无产阶级和殖民地被压迫群众共起反抗帝国主义、中国军阀混战日益扩大，财政经济危机遍布全国，工农兵士城市贫民的反抗运动到处发展，特别是以江西为中心的南方各省红色武装斗争有大规模的开展，打红旗的工农兵士贫民群众在三百万以上。联席会议明确认识，世界革命高潮要随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运动中爆发，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地要到来，中国苏维埃将继俄国苏维埃而出现，成为世界苏维埃的有力支柱。而中国之内首先出现的将是江西苏维埃。因为江西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都比各省要成熟。联席会议明确认识，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是一个日益发展的形势，也是扩大土地革命影响于全国各地的鲜明旗帜，他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有力分子，他而且是世界意义上实行着武装拥护苏维埃、促进世界革命的有力分子。

联席会议在上述政治估量之下规定着党的主要任务是：①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②深入土地革命；③扩大工农武装。由于这三个任务之实现，将使南方各省反动势力次第消灭于红旗之下，广大群众团聚在红旗的周围，成为推动全国革命的一大动力。联席会议又告诉同志及一切正在斗争的群众，实现这三个任务不是完全不费气力的，它是要从激烈的艰苦的斗争中方能取得，以前所没有的大的艰苦斗争将随革命势力的前进而到来。因为和我们作对的不但是中国的统治者——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而且是世界的统治者——帝国主义，但艰苦斗争的前途则必然是全国革命高潮援助南方革命势力，南方革命势力则要汇合全国的革命势力，把统治阶级完全埋葬。

联席会议指出赣西赣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联席会议决定革命的土地法，反对迟迟分配土地，指出不论何地凡暴动驱逐了豪绅之后，须立即没收土地分与农民，没收标准不限于豪绅地主，只要真实的群众要求，自耕农的土地亦得没收。对于分配土地，指出土地革命的当前目的，是动摇封建基础和争取广大群众。因此应把头（所）有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尽量分与一切需要这些东西人。只有不便分配的（高山大塘），才由苏维埃管理，仍归人民公共使用。联席会议指出，表面上站在左边，现时阶段主张所谓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理想，实际是帮助豪绅保

持封建势力，达到造（违）反彻底破坏封建基础的任务。同时以劳动力为标准分配，与男女老幼平分，应该采取后者，这是为了争取广大贫农群众，所不可忽略的紧要策略。“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争取群众”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联席会议为指导广大的武装斗争，指导在这斗争局面下的土地革命的深入，政权的建立和武装组织的扩大，有组织最高的领导机关的迫切需要，以前中央任命的指导四军及随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应该扩大其任务，变更其组织，担负这一伟大的使命，四军则组织军委指导之。

前委名单如下：

毛泽东、郭贞、曾珊、王怀、方志敏、朱德、潘星元、黄公略、刘士奇、彭德怀、谭震林、陈毅、邓子恢、张鼎承、袁国平、李文林、滕代远，指定毛、曾、刘、朱、潘五人为常委，黄、彭为后补常委，毛为书记。联席会议为了赣西南的统一指导，决定将赣西赣南两个特委合并，指定新的名单，成立赣西南特委，同时指定四军军委名单，又决定召集赣西南党的代表大会及江西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

前委在联席会议指出的任务之下，业已开展工作，特为通告红军及地方各级党部和全体同志。

前　委

前 委 通 告 （第三号）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八日发于赣州城郊
楼梯岑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

（一）环境分析和行动计划

吉安吉水永丰一带现有成光耀、朱耀华、邓英二旅及唐云山残部，蒋系因对阎作战虽不能分兵到江西，但即此三旅以上兵力，使四军暂时不能走北进的路。

金汉鼎师向福建开，目的在与刘和鼎夹击卢部进占福州。赣南闽西空虚，给我们以争取群众，打通三省联系的好机会。闽西只张贞部队，稍远的将来我们可取得漳州，使红色区域直通海口。同时两广战争益趋激烈，东江驻军只有一旅内外，东江西北七县红色区域有扩大之可能。赣州虽未攻下，然给赣州群众的影响仍然是不小的，对全国亦有相当的影响。新的军队到赣州接防短时期没有可能。新的军队未到赣州以前，金部七十团是无法离赣州的。

在上述环境之下，红军第四军的行动应该以三个月为期分路游击，其游击区域应是：赣南之赣县、雩都、瑞金、会昌、南康、信丰、安远、寻乌各县；东江之五华、兴宁、丰顺、梅县、平远、蕉岑、大埔各县；闽西之上杭、武平、长汀、宁化、连城各县。六军二纵队的游击区域，三个月内应该是万安、赣县东乡、雩都北乡、兴国东乡、宁都南乡和广昌石城各县。六军一纵队的游击区域是吉安、安福、分宜、宜春、新余、峡江、吉水、永丰、乐安、新干各县。六军三纵队则是太和西乡、遂川、万安各县。赤卫队的二十二纵队应与六军二纵队的行动配合，担任兴国全县、雩都北乡、宁都全县的红色区域的完成，宁南游击队则担任广昌、南丰、宜黄的红色区域完成。红军第五军：第一步应与六军二、三纵队的行动配合，完成赣河上游的工作（太和、遂川、上犹、万安等县），第二步应开返五军的根据地湘鄂赣边一带，推广湘东鄂南赣北的红色区域，并使赣北与赣西的道路打通起来。

分兵游击的意义，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分配土地和建设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在现时这种环境之中，若仍采取大部队集中行动的策略，显然是单纯军事路线，违反了争取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分兵游击一时期后，因为别一种环境的需要和夺取闽南发展赣东等地，便应该集中行动。所以我们要反对绝对集中主义，同时也要反对绝对分兵主义。

（二）同时扩大同时深入

只求扩大不求深入是严重的机会主义路线。过去赣西南与东江等处，很久不分配土地，不建设苏维埃和忽视赤卫队组织是十分错误的。红军游击时，亦常犯这种只求扩大不求深入的错误。每处住不到三五天又开起来走，做了些宣传，也组织了几个小小的农工会、几个嫩牙般的支部，但红军一走动，马上就塌了台，这样的组织算不得组织。这种只做宣传不做组织的地方不是没有的，如南康、大余、会昌、瑞金、石城等县，有些原来没有一点组织的，有些原来有点组织的但只是很小的一点，我们要在这样的地方做深入的组织工作是白费力的，在这样的地方自然是只能做些宣传及分配豪绅谷物的工作，给群众以相当的影响，就可以开起来走。但在别的地方，如宁都、雩都、安远、寻乌、长汀、武平等县就完全不同。不但原有党和群众的组织，而且有小块甚至大块公开的红色区域，有长期的武装斗争经验。红军到了这些县内，要有计划地帮助原有红色区域的党及群众去组织政权，建设武装，分配土地，加强党与团体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将原有区域扩大到全县，并推广到邻县。比如在赣南，就应该扩大宁都、雩都、安远、寻乌四县整个的赤化。在闽西要往武平、长汀各县整个赤化。这样就把瑞金、会昌、石城包在中间。再图发展闽赣的联系，就成功了。寻乌的红色区域与东江红色区域原来是通的，这样三省的接连都成功了。若不使这五六县工作深入，单是走马观花的游击一番，如去年赣南四十五天工作，则闽粤赣接连的任务，就不知何日才能实现。在一定时间，指定区域内集中精力扩大这地区，同时即深入这一地区，是很有效力的工作方法。红军各部队分开工作时，应将指定时间、支配于指定区域。应该做深入工作的地区，工作时间要支配多。不做深入工作的地区，工作时间要支配少。在一定地区内（如四军三纵队之于雩都）那块是要支配时间多的，那块支配时间少的，又要有计划，才使工作更有效。

（三）伴着发展

伴着发展的工作路线从我们的经验中是显示工作的效力的。伴着原有小块红色区域发展，及成立新的小块红色区域，再促进他去发展这个观念，要深刻地建设起来，因为从前没有过。过去的经验，非如此则工作白费力。湘赣边界大块红色区域的创造，是因为大革命时，茶陵、酃县、莲花、永新、宁冈各县的群众斗争有一些党的组织的残渣伴着这些固有的基础，才发展起来的。遂川原来没有基础，勉强制造的结果，仍然弄不出一个局面。四军闽西七月的分兵游击，一纵队在坎市兰家渡沿汀河而上，复折返上杭，永定交界一带，都是伴着原有的一些基础发展的，是“打通”“连贯”的工作，所以一纵队那次的工作效力特别大。三纵队在龙岩龙门一带是伴着原来斗争的区域，帮助农民去工作，所以也收了效力，可惜工作时间不久，仓卒开入闽中，所以效力不及一纵队远甚。二纵队去的雁石姑田一带，原来一点基础没有，所以是完全白跑一趟，简直无效力可言。这回四军到江西来宁都、乐安、永丰、藤田四地的分兵，只有宁都四纵队一路收了大的效果（四纵队在宁都二十天不但推广了红色区域，主要还在他纠正了宁都党的机会主

义，执行了分配田地，组织苏维埃，建设赤卫队的重要任务）以外，其余三路都没有达到推广赤色区域的效果，因为三地都不是原来有组织的，只有三纵队曾派了一个小部队到吉水，可惜三纵队的党发展这个区域太迟，未能派很多的工作人员下大力去工作。虽然我们并不放过它，上面这些例子很够我们认识："伴着发展"的口号是无疑的正确。虽然我们并不限止红军的脚板，不准跑入纯全白色区域去一步，有时为了全国的意义或其它不可避免的原因，如"影响时局，解决经济问题"和"退却"等等，是要跑入原无基础的区域去的，但这不是工作路线的原则，我们的原则无疑是"伴着发展"，也即是历来所说的"波浪式的向前扩大"。

在这里我们还要说到应对地方党及群众"请兵"的问题，有些同志对于地方党及群众向红军请兵去打土豪、打民团一件事，随便的看过了，不知地方群众请兵是好的工作机会，因为群众做了主体，一切布置设计都是群众自己的，红军趁此机会帮他一手，斗争之发展是异常迅速的，不顾群众的请求只是主观的布置工作，失掉极好的发展机会，这是个人主义的工作路线也是错误的。

（四）武　装　农　民

扩大红色区域主要条件就是农民武装，若不能创造农民武装，则所谓深入工作只是一句空话。游击队所到之处，凡属做有深入工作希望的地区，不但不能把原群众武装收缴了，去扩大红军（要在广大赤色区域的腹地部分土地斗争业已深入，武装作用减少了的时候，才能有计划地集中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红军）。在红军斗争力不大，感觉损失的条件之下，还一定要由红军拨枪枝去武装群众，不但要出枪，有时还出子弹，不但拨出枪弹，有时还要拨出军事工作人员。在红军力量不强，事实上无法拨出枪弹及人员的时候，就要尽可能的努力去收缴豪绅及小部队敌军的武装去武装农民。总之，游击部队对于地方武装是与他的工作同始终的，谁不把武装地方看作十分迫切的工作，谁不看重地方武装，如同看重他们自己的部队一样，谁就是抛弃群众的机会主义者。

（五）训练地方干部

红军党的斗争经验，是比许多农业区域的地方党部要丰富些进步些的。同时地方斗争的发展，工作人缺乏，工作路线不正确，也就越发表露。因此红军党的指挥机关，无疑的要负担新发展区域地方干部人材训练的责任，短时期党内训练班和群众领袖训练班之说，依然要按照从前的经验去进行。

（六）地方党的行动要与红军的行动合拍

去年四军在赣南东河一带游击时候，赣南特委却去注意西河的日常斗争，把东河方面红军发动起来的热烘的群众，一点不去指挥，让他冷下去，机械地执行赣粤大道为中心区域的口号，忽视红军在东河一带的政治作用，忽视赣南东江闽西三区域联系的伟大意义，表现了十足的机会主义，赣南等处如有过许多许多乌龟干部，红军到了许久不出

来接头，要他发动武装斗争就吓得魂飞魄散，有的比较积极一点却也不能利用红军游击的时机，加紧发展斗争的工作，这种地方党的行动与红军的动作不合拍的现象，是使工作失去效力的最大原因，此现象赣南最厉害，赣西南特委要努力的纠正他。

（七）红军党部地方党部的关系

红军的军委与地方的特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下，军委可以直接地指导工作。红军的纵队委与县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区委以下可以指导工作。红军的支队委和地方区委开联席会，解决问题，对地方的支部可以指导工作。红军的大队委与地方的支部，开联席会解决问题。特委对于纵队委可以指导他的工作，但在超地方性的红军各纵队，不能完全束缚他的行动。前委以纵队为单位，派遣的巡视团与特委开联席会议解决问题，对县委以下行使指导的职权。

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

（一九三〇年六月）

从前军及纵队政治部做了一些横的动手的工作，忽略了他的主要工作是指挥全军或全纵队的政治工作。

军及纵队两级政治部，同时又是群众的临时政权机关，从前对于这一任务的工作，也做得不好，如对于群众请求，缺乏好的答复，对于群众组织及地方政权机关，缺乏帮助他们作成全盘的计划，使于红军走后，还能很好的做下去。

（一）军政治部的工作纲领

1． 抓住每一个时期红军的政治任务，计划从政治工作上实施起来，例如打倒闽西军阀，扩大闽西赤色政权一个任务，计划着鼓动全军官兵，使他们明了这一个任务的意义，提高他们的斗争情绪。

2． 计划督促并检阅全军官兵的政治训练，如（1）新兵及俘虏兵的特别训练；（2）青年士兵的特别训练（青年士兵学校）；（3）一般士兵的训练（普通班）；（4）下级干部的训练（特别班）；（5）供给政治训练材料；（6）规定早晚点名口号；（7）各种集合讲话等。

3． 指导并检阅全军士兵会的组织及工作。

4． 计划督促并检阅全军的宣传工作，如（1）供给主要的宣传材料；（2）检阅并指导各部队的宣传材料与方法；（3）督促各部队宣传队之组织与训练；（4）化装宣传之组织与检阅等。

5． 督促各部队政治机关，协同军事机关，执行三条纪律及一般军风纪。

6． 督促各部队政治机关，协同军事机关，执行优待伤兵事项。

7． 督促各部队政治机关，协同军事机关，执行红军各种治军政策，如废止肉刑，废止枪毙逃兵等。

8． 制发社会经济调查表，指导各部队的实际调查方法，并督促各部队做成统计，交由军政治部做成总统计。

9． 计划并督促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体。

10． 计划并督促帮助群众建立地方政权机关，如革委会，苏维埃。

11． 计划并督促、帮助地方政权机关，建立地方武装，如暴动队、赤卫队及地方红军。

12． 计划并督促各部队，或帮助地方政权机关，肃清反动势力。

13． 计划并指导帮助群众机关，没收分配田地。

14．计划并指导各部队，办理群众领袖训练班。

15．指导并督促各部队，帮助地方政权机关，做深入群众的各种建设工作，如学校，合作社，看病所等。

16．处理并答复群众的请求。

17．计划并指挥各部队及最高群众机关，筹措红军给养，及群众工作用费。

18．指导并督促各部队及群众机关，良好地执行城市政策。

（二）纵队政治部工作纲领

1．抓住每一个时期上级所赋予的政治任务，计划从政治工作上实施起来，例如打倒闽西军阀，扩大闽西赤色政权一个任务，计划着鼓动全纵队官兵，使他们明了这一任务的意义，提高他们的斗争情绪。

2．计划督促并检阅全纵队官兵的政治训练，如（1）新兵、俘虏兵的特别训练；（2）青年士兵的特别训练（青年士兵学校）；（3）一般士兵的训练（普通班）；（4）下级干部训练（特别班）；（5）供给政治训练材料；（6）规定每周早晚点名口号（在分开游击，离开军政治部工作时）；（7）各种集合讲话等。

3．指导并检阅全纵队士兵会的组织及工作。

4．计划督促并检阅全纵队宣传工作，如（1）供给主要的宣传材料；（2）检阅并指导各部队的宣传材料与宣传方法；（3）督促各部队宣传队之组织与检阅等。

5．督促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协同军事机关执行三条纪律及一般军风纪。

6．督促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协同军事机关，执行优待伤兵事项。

7．督促各级政治工作人员，协同军事机关，执行红军各种治军政策，如废止肉刑，废止枪毙逃兵等。

8．督促指导各级工作人员，做实际社会调查工作，并督促其做统计，汇交军政治部做成总统计。

9．计划并督促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体。

10．计划并督促帮助群众，建立地方政权机关，如军委会及苏维埃。

11．计划并督促、帮助地方政权机关，建立地方武装，如暴动队、赤卫队及地方红军。

12．计划并督促各部队，帮助地方政权机关肃清反动势力。

13．计划并指导帮助群众机关，没收分配田地。

14．计划并指导各部队，办理群众领袖训练班。

15．指导并督促各部队，帮助地方政权机关做深入群众的各种建设工作，如学校，合作社，看病所等。

16．处理并答复群众的请求（和军政治部在一块工作时，须转呈军政治部办理）。

17．计划并指挥各部队及军需机关等，筹措红军给养及群众工作用费。

18．指导并督促各部队及群众机关，良好地执行城市政策。

上述各项和军政治部在一块时，须秉承军政治部的指导办理，离开军政治部时，得

自行计划决定，但事后须报告军政治部。

（三）支部政治委员工作纲领

A 计划全支队官兵政治训练，并督促和帮助各大队实施

1． 加紧官兵的政治教育。

2． 指导全支队士兵会工作。

3． 努力使本支队官兵了解上级政策的指示。

4． 随时考查并纠正官兵的错误倾向。

5． 训练并指挥宣传队工作。

6． 计划开办青年士兵学校（督促各部选送学生，指定教授时间、地点、教授人员，编定教材等）。

7． 计划并实施士兵特别班的政治训练。

B 监督全支队行政事宜

1． 督促官兵执行上级的一切命令。

2． 监督经济的管理。

3 督促维持军风纪。

C 改良士兵待遇

1． 注意改善管理士兵的方法。

2． 注意改善士兵的日常生活（饮食、娱乐、卫生等）。

3， 注意改善伤、病兵的调治。

D 扩大政治宣传，组织群众团体

1． 计划并指挥召集群众大会。

2． 指挥官兵及宣传队，随时随地对群众做口头及文学和化装宣传。

3． 指挥官兵做社会调查，报告上级机关。

4． 指挥官兵组织群众团体，并指导其斗争方法。

5． 指挥官兵战时对俘虏兵之招待与宣传。

E 指导肃反与筹款工作

1． 指挥官兵调查并设法逮捕豪绅及一切反动分子，报告上级机关处理（单独行动离开上级较远时，得先处理后报告）。

2． 指挥官兵调查土豪及帮助做筹款工作。

（四）大队政治委员工作纲领

A 计划并实施官兵的政治训练以巩固政治领导，团结官兵力量增强战斗能力

1． 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上政治课、集合讲话、读报纸、个别谈话等）。

2． 指导士兵会工作（指导开会，在会议中讨论各项工作并指导执行各项决议案）。

3． 努力使本部队官兵了解上级政策的指示。

4．注意纠正本部队官兵的错误倾向。

5．注意对新兵、俘虏兵的特别教育。

B 监督本部队行政事宜

1．督促官兵执行上级的一切命令。

2．监督经济管理。

3．督促维持军风纪。

C 改良士兵待遇

1．注意改善管理士兵的方法。

2．注意改善士兵日常生活（饮食、娱乐、卫生等）。

3．注意改善伤、病兵的调治。

D 扩大政治宣传、组织群众团体

1．计划并指导召集群众大会。

2．指挥官兵或宣传分队，随时随地对群众做口头及文学和化装宣传。

3．指挥官兵做社会调查，报告上级机关。

4．指挥官兵组织群众团体，并指导其斗争方法。

5．指挥官兵战时对俘虏兵之招待与宣传。

E 指挥肃反与筹款工作

1．调查并设法逮捕豪绅及反动分子。报告上级处理（单独行动离开上级较远时，得先处理后报告）。

2．调查土豪，帮助筹款工作。

红军第四军政治部发布

富 农 问 题

——一九三〇年六月前委闽西特委联合会议决议——

（一）什么是富农

富农有三种：第一种是半地主性的富农，就是自己耕种同时有多余土地出租的一种人；第二种是资本主义性的富农，即不把土地出租有些还向别人租入土地，雇佣工人耕种的一种人，第三种是初期的富农，即不出租土地，又不雇佣工人，单以自己劳力耕种，但土地劳力两俱充足，每年有多余粮食出卖或出借的一种人。

各种富农对于贫苦群众的剥削有两种共同的方式：第一种就是高利贷（钱利、谷利、猪利、牛利、油利）和商业性的出卖粮食；第二种富农各有一种特殊方式的剥削，即半地主性富农的剥削地租，和资本主义性富农的剥削雇用劳动。此外各种富农中有许多是兼营商业的——开小商店及贩卖产品，则是用商业资本方式剥削贫苦群众。

（二）富农的反革命性

富农是农村资产阶级，但中国富农的剥削则一般带着半封建的残酷性。无论在地租方面，在高利贷方面，在雇佣劳动方面，在商业资本方面，都表现富农的剥削比较地主更加残酷。因此这个阶级的利益和贫农雇农阶级的利益根本冲突。这个阶级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

在革命初起时，富农阶级虽然有反军阀苛捐杂税的需要，但为了他们的根本利益（土地和资本），只要革命是从贫农、雇农方面起来的，他们一定站在地主方面和贫农雇农作对。

在革命潮流高潮，富农慷慨焚契分田挂红带子称同志甚至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行为，是为了取得社会地位，争取对贫农雇农的领导权，企图挽救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危机（由目前的保护家产进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这是农村斗争中最严重应该唤起同志们充分注意的问题。

在农村斗争深入时，就是在那贫农雇农建立了坚强的领导权，打落了富农的政治地位，没收了富农的土地、山林、耕牛，废除了富农的债务时，富农的表现就是造谣惑众和消极怠工。

在革命由危急走向失败时，富农就由动摇妥协，以至完全叛变，站在地反路线向贫农雇农进攻。

（三）对于初期性的富农的争论

过去各方面（特别是东江）只承认半地主性的，资本主义性的两种农民的富农，初期性的则不叫做富农而叫做“中农”，反对把他们多余的土地没收，甚至反对废除他们的债务，这是忘记了这种初期性富农仍是一个剥削阶级。他们虽不收租，也不剥削雇佣劳动，但他们放高利贷，并且高价乘危出卖剩余粮食，这两种剥削是和半地主性、资本

主义性两种富农完全相同的。这种富农靠了上述两种剥削，逐渐积累资本，跑向资本主义性和半地主性的两种富农队伍里去。贫农雇农不但对于半地主性和资本主义性两种富农的土地要没收，债务要废除，就连那初期性富农的土地、债务也要没收也要废除。凡属斗争深入的地方，贫农雇农都照这样的做了。但在共产党里都还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联席会议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坚决的赞助群众没收他们的土地，废除他们的债务，要和没收其他两种富农的土地，废除其他两种富农的债务一样的坚决。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政策呢？因为只有没收他们的土地才能回答他们高价乘危出卖剩余粮食的残酷剥削，只有废除他们的债务才能回答他们高利贷的残酷剥削。这两种剥削都是半封建性的，只有把这两种剥削彻底废除了，农民才算彻底从半封建关系下得到完全的解放，单单废除地主和第一、二种富农的剥削还是不够。

（四）广大贫农群众的力量足以克服富农，也只有党建立了反富农的策略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彻底完成民权革命任务，走向社会革命阶段

在长江珠江两流域，一般说来，是贫农雇农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富农不满百分之十。在农村斗争中斗争的主力是贫农雇农广大群众，加上中农是可以结成同盟的，富农是个极孤立的小群众。富农虽有必然的反革命性，但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上，是要被广大贫农群众打倒的，那些说南方各省中也有富农或自耕农占多数或占一个颇大的数目（如“江西是自耕农占多数”“梅县大埔自耕农多，不能实行土地革命”，“福建、长汀、建宁富农占百分之四十”等等说法），显然是夸大富农的阶级力量，以为第一步只应反对地主，反对富农尚非其时。这不只是与社会情况完全不相符合的客观上的错误，有些并且是主观上企图建立富农的领导权于党内和群众内，模糊党和群众内的阶级认识，减轻以至取消党的反富农任务的一种反革命阴谋。

那些夸大富农的阶级力量以为当进攻地主时应该向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是很危险的。同时仅仅认识富农是“一个极孤立的小群众”而不认识富农的“极残酷的半封建”也必然要减轻以至取消党的反富农任务，也同样是危险的。机会主义反对派陈独秀们说中国农村已经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只是残余的残余，他们的结论固然要放弃民权革命取消对地主的斗争。但若我们的答复不从剥削的本质上看，单从剥削的方式上看，也势必承认“富农不是主要敌人，地主才是主要敌人”，不承认反富农斗争的性质也和反地主斗争一样是反对残酷的半封建剥削，因而我们的结论也必然要走到减轻以至取消反富农斗争的重大任务。放弃了这个任务，就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彻底完成民权革命，走向社会革命阶段。反之，只有认识反富农斗争和反地主斗争同样是反对残酷的半封建剥削，才能坚决地建立党的反富农策略，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才能彻底完成民权革命，走向社会革命阶段，也才能推翻全部陈独秀们的理论根据，不许他们还据有“富农”一个区域在那上面胡说八道。

（五）海陆丰斗争失败是失败在盲动主义和海陆丰地方主义、不是失败在反富农

东江的同志以过去海陆丰的失败，富农（初期性富农他们所谓“中农”反水为鉴戒，叫各地不要打击初期性富农），同时别地也时有这种论调，这和大革命失败时两湖的同志跟着唐生智、许克祥的尾巴大叫农民运动过火差不到许多。现在大家已经明了大革命失败不是失败在“过火”而是失败在“没有过火”（机会主义）；海陆丰及他处的失败，是失败在盲动主义、狭隘的地方主义和这时革命的全国形势适当低潮，而不是失

败在反富农。在盲动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领导之下不论何时都要失败的，决不因不反富农而可避免失败；同时决不能以反富农斗争，和大烧大杀大抢同样列入盲动主义，可以引为以后的鉴戒。适得其反，坚决的和富农斗争树立贫农雇农的绝对领导权于农村之中，乃是保障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

（六）为了流通金融而保存富农的债不废是最蠢不过的

为了“流通金融”即为了使富农再借钱给贫农，而阻碍贫农群众对富农彻底废债的斗争，这是很不对的。这种口号由富农以欺骗的性质提出来原不足怪，若站在贫农观点上作这种主张则是最蠢不过的。因为农村秩序一骚动，一切借贷赊欠立即停止，那有斗争到了没收土地时候而有富农出来流通金融之理。一切红色区域的事实早已教训了我们，要流通金融只有靠贫农自己组织信用合作社和苏维埃向富农强借办理低利借贷，靠富农在贫农不打他的条件之下发慈悲心救济贫农，那完全是空想。

（七）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

“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是南方各省土地斗争中不可移易的两个中心口号，到处的群众普遍的在执行这两个口号，党却到处作群众的尾巴，要到群众自己执行了才去“追认”；有些更是始终“否认”。则不但是群众的尾巴，且变了群众的对头。这种严重现象如不纠正，党是不能领导南方各省的土地斗争的。毫无疑义“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和“废除高利贷”两个口号是不适当了，许多地方被富农及机会主义的共产党员利用了去做为阻碍贫农斗争的工具。毫无疑义“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要在南方各省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公开的正面的提了出来，“否认”固然是极端错误，“追认”也是尾巴主义。要拿了这两个口号去发动群众，而不要待群众有了斗争党才加上去领导他，这种“待群众起来了再去领导他”的策略仍是不深切南方各省土地情况，由此而得到机会主义的动摇性的策略，这种动摇性的策略，是于飞快要到来的上万万数目的贫苦农民大斗争之领导，不适合的。

（八）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叫出两个口号

有一种意见主张党对富农的策略在白色区域和在红色区域要有不同，红色区域可以打击富农，执行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白色区域仍是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地主债务的口号，这是为了使富农暂时中立使贫农对地主的斗争先胜利。这种意见是错误的。我们只要承认富农（包括实际是富农而普通看作“中农”的那些农民）数目在农民比例上是占少数（比起地主数目来却是多数）。而这少数的富农乃是用最残酷的半封建剥削对待贫农雇农，是必然要反革命的。我们的策略便应一起始就宣布富农的罪恶把富农当作地主一样看待，绝不应该模糊富农与其他农民的阶级界限，让富农的一投机取巧的机会，应该让他一起始就现出本来面目，使群众认识他的反革命。并且富农决不会“中立”，他看见贫农雇农一起来，马上就站在地主战线去，那有什么中立的事！这种使富农中立的幻想，必然要妨碍无产阶级发动贫农雇农的猛烈斗争，并争取中农与之结成同盟的任务。因为我们若不一起始就提出反富农的口号，贫农便要表示失望，这在闽西和各地斗争中业已证明，因为贫农雇农的敌人决不止地主一个，还有富农一个，地主的剥削固然是厉害，富农的剥削却是更厉害。

（九）不论什么地方都要叫出两个口号

又有一种意见，是承认在某些地方要向富农让步，如一省之内某些县，一县之内某

些乡，凡是所谓“富农多数”的地方，在分田、废债两件事上可以不照贫农数多地方一样，由当地苏维埃决定和一般办法不相同的一种办法，如土地依劳动力分配，小资产债务不废除等上级苏维埃要批评他。这种意见的危险有两种：第一是在那些所谓“特殊地方”为了取得富农的欢心，便完全牺牲了贫农雇农的利益，他们不知道富农多的地方，贫农雇农一定更多，把贫农雇农的利益，去迁就富农的利益，这是国民党的策略，共产党不应如此；第二是准许特殊地方的苏维埃有保障富农利益（即不平分土地，不废除小资产债务）的权利，那么不必真是所谓“富农多”或所谓“自耕农多”（其实这都是南方各省没有的事，只是富农共产党员造的一种谣言）的地方，即在富农自耕农很少的地方，只要那个地方的苏维埃是富农管事，他就可以蒙蔽群众提出这种要求。所以这种意见的危险不啻保障富农对贫农雇农的剥削与压迫，在南方各省中应该不分地域叫出没收一切土地、废除一切债务的口号，方才免去这种危险。

（十）分配土地不按人口平分，而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只于富农有利

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土地，劳力多的多分，劳力少的少分，这只于富农有利。因为中国的富农主要还是半地主性的和初期性的两种，纯粹资本主义的农场或农业公司是很少的，南方各省中简直看不见几个。中国的富农既是以自己劳力为主体的占绝大多数，那末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土地，这于富农是很有利的，因为他们不但有劳力还伴随着充足的牛力、农具与资本，不比贫农虽有劳力，但伴随的牛力、农具资本很不充足甚至没有，所以以劳力为标准分配土地是于富农有利的。即在贫农中说，那些劳力多的贫农家庭（如一家八人中四人有劳力）因为多得了田，便比较劳力少的家庭（如一家八人中两人有劳力）具备迅速发展为富农的条件。

（十一）争取群众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

当着红白交战胜败未分时候，亦即现在这种时候，当前的唯一问题是怎样争取广大群众克服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时候决定一切策略的标准是争取群众，而不是什么发展生产。因为这时候生产的工具（土地等）还在敌人之手，或虽落在群众之手，但仍有被敌人夺回去的可能，这时候完全谈不到发展生产的问题。那些在这种时候提出发展生产一类不适时宜的问题的，显然是代表富农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为客观上不是什么发展生产而是阻碍斗争发展，帮助地主延长寿命，使革命走向失败的。

（十二）按人口平分不但不会减少生产反而是增加生产的条件

上面说了当着斗争激烈时候，只有按人口平分土地才能争取广大贫农群众。即就发展生产来说，也是按人口平均分较按劳力差别分为有利，闽西就是很好的证据。闽西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今年田禾非常茂盛，估计要比去年土地未分配时多收百分之二十，以前闽西有些同志所忧虑的“田地分刈割太小了”“原先未耕田的人分了田不会耕”耕田会荒废种种可以招致生产减少的危险，现在事实证明不足忧虑，并且适得其反，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了。什么原故呢？因为贫农及失业群众得了田，就把一切人力用在田内，从前农村中一切不生产的寄生虫和地主及游民现在不耕田就没饭吃，都反得耕起田来了；从前贫农中之因土地不足而闲置起来的劳力，亦因得了田而使用出来，因此生产就增加了。又因中国的农业生产还在人工耕种，人工灌溉，人工肥料（绿肥厩肥等）阶段，地主剥削时代贫农因以田不是自己的，不肯努力耕耘，所谓“深耕易耨”他们完全不愿，他们亦不愿整水利，肥料也不愿多放，简直懒得去弄肥料，以此田地日就荒

芜，生产大大减少，造成普遍全国的农业危机。闽西农民既得了田，且是平均分配，每人都得一份，便把从前那种怠工现象完全除去，他们愿意深耕了，他们把大规模人力用在修陂圳，在地主、富农剥削时代，陂圳不开大不相同，若不平分，则不能把大规模人力利用修复陂圳上；谷草放在猪栏牛栏里造厩肥，把草皮挖了来沤荡作粪，再加上人粪尿，肥料问题也解决了。以上这些都是平分土地发动大规模人力的效果，有了这些效果生产就增加了。

如说他们缺乏牛力，分了田不能耕，那些原先租用富农的牛的，没收了富农的牛就完事（不出牛租就完事），那比原先连租来的牛也没有了，他可以同他的亲戚朋友临时借牛或租牛。

如说农具不够用，他们可以向富农借用多余的农具（富农的多余土地没收了，有农具多余），甚至没收富农多余的农具。

如说田地分割太小于生产不利，这只在大规模的公司农业才有此现象，公司农业在中国简直看不见几个，普遍现象是小农生产，即使是大地主的土地，他亦是分租给许多农家耕种，并不是整租给一个农家耕种，并没有分刈太小生产不利的事。并且我们有于农业是要鼓励贫农用集合生产向社会主义道路走去，而不是要鼓励富农走向资本主义生产。贫农们集合许多小块土地用合作社方式组成合同生产制度由此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这样才是我们的目的。

革命时代农产物价格特别低落，剪刀现象发展，富农田多因为耕了没有利益不热心耕，结果反破坏了生产。

一家之中能劳动的少不能劳动的多，平分了田亦不会减少生产，因为那一家中少数有劳动力的，他们的劳力亦常常能够担负供给全家粮食的任务。并且所谓没有劳力的人亦不是完全没有劳力，他们仍可帮助一些工作。至于那种大家庭，不能劳动比能劳动的特别多（如九人对一人），这种情形很少，他可以把田地交还苏维埃，转给别人耕，亦不至使田地荒废。

（十三）富农要求留公田并利用共同生产口号

苏维埃的模范农场和合作社的集合生产，是以农业走向社会化的好方法。但在现在这样斗争时期，苏维埃的主要任务是指挥斗争而不是发展生产，因此，现时不能经营模范农场。为了争取群众扩大斗争，应把田地尽数分与需要的人，苏维埃没有留公田的必要；山林及多余房屋，凡属群众需要的亦以分配为原则。那些为了苏维埃要钱用，或为了明年生儿子，主张田地不全部分配，要留出公田、山林和多余房屋完全不分配，还有表面上站在左边主张所谓“社会主义的共同生产”（全部土地归苏维埃经营，农民在苏维埃指挥之下出力耕种，生产品由苏维埃按人口需要分配，剩余属于苏维埃）如江西的袁文才，福建的傅柏翠等，都完全是富农路线的主张，这是聪明的富农，当革命高潮时，延缓贫农分配土地的巧妙欺骗政策。因为贫农忙的不是明年生儿子的问题，而是明天自己吃饭问题，因此贫农的要求是赶快分配一切土地。为明年生儿子留出公田，在贫农眼中完全没有什么必要。至于社会主义生产只要在分配土地彻底肃清封建关系之后，由贫农组织合作社集合耕种，在革命的全国胜利之后，由苏维埃择地经营农场，由此，走向社会主义，若不经过分配过程，合作社过程，就执行苏维埃经营政策，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客观上是阻碍土地斗争，使土地革命走向失败，根本取消了社会主义

前途。

（十四）何时分田，何时得禾

过去的办法是土地分配在下种之后，本届的生产归原耕人收获，这种政策只富农是满意的，贫农大不满意。依这种政策，在每年收入一次的地方，贫农及失业群众名曰分了田，实际要等到明年秋禾才第一次收得谷子，每年收两次的地方也要下一次才收得谷子，以此贫农及失业群众不满意。应该何时分田即由分了的人得到田里的收获，富农虽不满意，却取得了贫农及失业群众的拥护。向富农偿价然后得禾，亦是站在富农利益方面的办法，依据贫农的需要连价也无须偿他，因为贫农无钱付价。

（十五）谷子亦可以平

农村斗争发展到暴动形势，贫农雇农及失业群众在打豪绅烧契约的斗争中，一定有一种平谷斗争，接着就是平田斗争，所以平谷是农村斗争中一个重要项目。平谷斗争做到彻底的不但要平地主的谷，而且要平富农的谷，拿一乡人口的总数除一乡存谷的总数，无代价的把一切人家的多余谷子平了下来。在这种斗争中我们若站在富农观点上提出“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口号，一定要失掉贫农群众，显然是不对的，无疑要站在贫农雇农及其贫苦群众的观点上，发动平谷斗争。在游击战争时政权连短时期稳固可能都没有的地方，则要用“抢谷”的方式。虽然，要是抢地主的谷，但群众要抢富农的谷时，我们应完全拥护群众这种行动。

（十六）向富农筹款不是盲动主义

红军游击队及苏维埃向富农征调费用是应该的。过去阻止群众向富农筹款把这种行动算作盲动，这是从拉拢富农一个观点出发，根本是不对的。

（十七）抽肥补瘦

平分土地，若单只按“抽多补少”执行，如闽西去年的经验，并在文件上写着“不得妄想平均”，那么富农得了护符把瘦田让人自己把持肥田，贫农就大不满意，不但闽西，各地亦大都发生这种现象。这是土地斗争中一种实际的重要斗争，我们不应忽略。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还加上“抽肥补瘦”一个原则，并在文件上将“不得枉想平均”改为“不得把持肥田”。

（十八）反对富农的调查研究口号，土地要很快地分配

许多富农共产党员阻碍土地斗争，延宕分配土地时间，他们的口号是调查未清研究未好，以致有暴动之后调查研究了三年还没有分配土地的，有调查研究了一年还没有分配土地的。我们应该根本反对这种清谈主义的调查研究。在土地实际分配一个问题上简直不要上级机关的调查研究，只要经过乡政府的调查，马上即可分配。为了迅速的彻底发动群众迅速的传播革命影响，应该很快地分配土地，凡属群众暴动起来的地方至迟两星期内要分配土地完毕。

（十九）土地税以保护贫农联络中农打击富农为原则

土地工农业累进税的目标是供给斗争的财政需要，在这个目标下，以保护贫农联络中农打击富农为原则。为了斗争的财政需要，贫农自不能不出相当的土地税，但必须收得很轻，极贫的（每年食不够的）应该免税。中农出税较贫农可以多一点但需不违背联络中农的原则，就是说中农出税亦不能太重。对于富农可以抽收高至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税，为了斗争的紧急需要，得向富农无代价征收剩余粮食。

（二十）平田之后仍有富农

现在的打富农，主要目的不在消灭富农，而在争取贫农群众，扩大斗争，取得革命的胜利。实在富农打过之后，富农并不会绝灭，因为富农具备种种优越的社会经济条件，既使把它的田地平了之后，他仍比贫农要占优势，富农的发展比贫农的发展一定要快，贫农雇农仍然要受富农的剥削（剥削方式是商业性的囤买囤卖和开小商店）。要真正消灭富农，要真正使贫农雇农不再受富农的剥削，一定要在有了民权革命的全国胜利再转变到社会革命的全国胜利，把农业社会化了之后，必须依靠城市工人的帮助与指导和贫农雇农自己的努力，使农业社会化了，富农的资本主义生产才被社会化的生产所消灭，那时候一切农民都无产阶级化，农村中才真正没有了剥削，这就是工业无产阶级和他的先锋队共产党所要领导农民共同走的目标。

（二十一）批评是鼓励贫农前进，而不是对他们泼冷水

当群众热烈的起来做平田斗争时，"妄想平均""小资产阶级的幻想"等批评语句，常常为富农以至富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利用了去，把意义改变，抵抗贫农的平田斗争，这种例子到处发现，这在正当起劲的贫农斗争不啻泼下一瓢冷水，必然要使贫农失望。原来我们所要提出的批评，不是说平田不好，乃是就农村范围说，平田之后，私产制度没有废除，共产制度没有实现，富农对贫农的剥削依然会续继发现，所以贫农在平田之后，要更进一步用集合耕种方法向社会主义走去，才是最后的胜利。就全国范围说，平田之后，工人还没有汇合农民的力量把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推翻，资本主义不但依然剥削农民，而且比前更加厉害，造成农村中残酷的剪刀现象，农民虽有饭吃，但无衣穿无货用，一切农产品贱得要命，一切布匹货物贵得要命，农民的生活依然痛苦不堪。农民要解决这种剪刀痛苦，只有扩大红军，扩大斗争，帮助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大城市取得胜利，打倒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苏维埃管理全国，同时促进了全世界的革命高潮，推翻了全世界的资本主义，这时候农民才能取得全国以至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帮助，把剪刀痛苦消灭。我们的同志应该在每一红色农村中把农村及全国两方面的政治经济形势（如上所指）借各种机会用各种方法告诉农民，鼓励他们向前一步，而决不是站在富农的观点把他们拉后一步。

批评的开始应在平田斗争胜利之后。若正在平田斗争激烈拚命之中提出这种批评，不但容易被富农曲解利用，而且是群众面前涌现两个目标（民权主义与社会主义），容易混淆群众的观念，因为群众在当前目标未实现前只了解当前的目标，不了解进一步的目标，我们若不在当前目标未实现前鼓励着群众猛烈实现当前目标，却放松了当前目标去鼓励进一步的目标，群众就会有"既说这样好，又说那样好，究竟怎样好？"的怀疑发生出来。若在群众平田斗争胜利之后（两星期即可完成平田斗争）开始批评，就没有这种弊病了。

（二十二）组织上肃清富农

（一）要保障土地革命胜利，首先要肃清党内富农成分。

为了争取广大的贫农雇农群众坚决的进攻富农，建立贫农雇农在农村中的领导权，保障农村中土地革命胜利，首先就要肃清党内的富农成分，特别是农村中的党，这一工作十分重要。因为过去一直到现在地方党的组织，尤其是指导机关里面，不论什么地方，都充满着富农分子。这是因为各地农村斗争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上级机关派去农村

工作的人农村中首先出来接洽的多属富农、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由这些知识分子续继引进来的，当然又是他们气味相投的同类。到了农村斗争发展的时候，这班富农、小地主党员多半成了支部以上各级指导机关的干部，各地斗争发展之迟缓和不深入都是这班人在那里作怪。高级指导机关的指示被他们阻隔着，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一直要待群众斗争发展到冲破他们机会主义领导，高级指导机关的反富农策略又对着他们压迫，这样高级指导机关的反富农策略才与群众斗争合拍起来，肃清党的各级指导机关的富农路线，这种过程，差不多每个地方都经过的。

很显然的，富农（特别是领导机关中）若不洗刷出去，群众斗争是不能起来的。无条件的开除富农及一切富农路线的人出党是争取群众保障农村斗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怎样洗刷富农？从多种斗争过程中去观察那些表现富农路线的，就马上给他洗刷出去。

（二）富农不参加苏维埃

要建立农村中雇农贫农的领导，防止富农领导作用，除了党内肃清富农之外，还有一个根本办法就是剥夺富农的选举权。一切从前的现在的富农不得参加苏维埃的选举，当然更不得当选为苏维埃代表及其他一切政权机关职务。这是保障革命由民权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关节，忽视这个重要关节，就必定要演出严重的错误。

（二十三）发展反富农的理论斗争

不但组织上开除富农，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发展反富农的理论斗争，不论党内及群众内，这种反富农的理论斗争都是大大使之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根本克服富农路线。不但实际上推翻现在的富农领导，并且要使他在任何时候不能抬头。

苏 维 埃 土 地 法

——一九三〇年六月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

第一章　土地之没收及分配

第一条　暴动推翻豪绅地主阶级政权后，须立即没收一切私人的或团体的——豪绅、地主、祠堂、庙宇、会社、富农——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归苏维埃政府公有，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及其他需要的贫民使用。只有农民协会，尚未建立起苏维埃的地方，农民协会亦可以执行没收及分配。

第二条　豪绅地主反动派的家属，经苏维埃审查，准其在乡居住，又无他种方法维持生活的，得酌量分予田地。

第三条　现役红军官兵夫及从事革命工作的人，照例分田，并由苏维埃派人帮助其家属耕种。

第四条　乡村中工、商、学各业能够生活的，不分田，生活不够的，得酌量分予田地，以补足其他生活为限。

第五条　雇农及无业游民愿意分田的，应该分予田地。但游民分田的，须戒绝鸦片、赌博等恶嗜好，否则苏维埃收回他的田地。

第六条　旅外不在家乡的，不分田。

第七条　分田以乡为单位，由某乡农民，将他们在本乡及邻乡所耕田地总合起来，共同分配。如有三四乡互相毗连的，内中几乡田多，几乡田少，若以一乡为单位分配，那田少之乡不能维持生活，又无他种生产可以维持生活的，则以三四乡合为一个单位分配；但须经乡苏维埃要求，得区苏维埃批准。

第八条　为满足多数人的要求，并使农人迅速得到田地起见，应依乡村人口数目，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不采以劳动力为标准的分配方法。

第九条　城市商人及工人，以不分田为原则，但失业工人及城市贫民要求分田者，得酌量在可能条件之下分给之。

第十条　为求迅速破坏封建势力并打击富农起见，分田须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不准地主富农瞒田不报及把持肥田。分田后，由苏维埃制定木牌插于田中，载明此田生产数量，现归某人耕种。

第十一条　所有豪绅、地主、富农及祠庙公田的一切契据，限期缴交乡苏维埃，或乡区农民协会，当众焚毁。

第十二条　田地分配后，由县苏维埃或区苏维埃发给耕种证。

第十三条　凡乡中死亡、改业和外出的，将他所得的田地，收归苏维埃再行分配。外来或新生的，苏维埃应设法分予田地，但须在收获之后。

第十四条　暴动分配田地，在农民业已下种之时，田中生产即归分得该部田地之农民收获，原耕人不得把持。

第十五条　菜园、河坝、荒地（能耕种杂粮的）要分配。大规模池塘不便分配的，归苏维埃营业或定价出租。

第十六条，竹山、木梓山项，须照其收成，折成田亩计算，合并田地分配。但其原来系雇用劳动，设厂制造，有工业资本性质的，由苏维埃整个出租，不必分配。

第十七条　松杉等项山林，由苏维埃政府经营或出租，但该乡人民须用以修坡圳，建造公物公屋，修理被反动派焚烧的房屋等等。要用木料时，经区苏维埃政府批准，可以采用。

第十八条　柴火山由苏维埃政府公禁公采。

第十九条　为满足贫苦农民要求起见，应将所有没收田地，尽数分予他们，苏维埃不必保留。但在某种情形之下，得将分配不完的部分，建设模范农场，或临时出租。同时保留该房屋之一部分，为公共事业之用。

第二章　废除债务

第二〇条　工农穷人欠豪绅地主富农之债，一律不还。债券契约，限期缴交苏维埃或农会焚毁。

第二一条　豪绅地主及商人，欠公家或工农贫民之债，不论新旧，都要清还。

第二二条　工农贫民在暴动前，欠商家交易之老账，无论是否商业高利贷的，或是否本身之账，一概不还。

第二三条　工农穷人自己来往之账，在暴动前借的，原则上亦一概不还。只有那种以友谊扶助为目的，不取利息之债，经借债人自己愿意归还的，不在此例。

第二四条　工农穷人典当物件及房屋予豪绅地主及典业商人的，无条件收回抵押品。

第二五条　钱会谷会，概行取消。

第二六条　苏维埃政权之下，禁止高利借贷。由县苏维埃按照当地金融情形，规定适当利率，但不得超过普通资本在当地一般经济情形中所得利率之数。

第三章　土　地　税

第二七条　为打倒反革命的需要（如为了扩大红军及赤卫队，供给政权机关等）及增加群众利益的需要（如设立学校、看病所，救济残废老幼，修理道路坡圳等），苏维埃得向农民征收土地税。

第二八条　土地税，以保护贫农、联络中农、打击富农为原则，须在苏维埃建立之后，而且群众已经得到实际利益，经高级苏维埃批准时，才可征收。

第二九条　土地税按照农民分田每年收谷数量，分等征税：

（一）每人分田收谷五担以下的，免收土地税。

（二）每人分田收谷六担的，收税百分之一。

（三）每人分田收谷七担的，收税百分之一·五。
（四）每人分田收谷八担的，收税百分之二·五。
（五）每人分田收谷九担的，收税百分之四。
（六）每人分田收谷一〇担的，收税百分之五·五。
（七）每人分田收谷一一担的，收税百分之七。
（八）每人分田收谷一二担的，收税百分之八。
以后每加收谷一担，加收土地税百分之一·五。

第三〇条　土地税之收入支出，须统一于高级苏维埃政府，低级政府不得自由收支。支付标准，按照税收多寡及各级政府需要的缓急轻重，由高级政府决定。

第四章　工　资

第三一条　农村手工业工人及雇农，以前工资过低的应该提高。以后工资数目，由苏维埃依照生活物价涨跌及农民收入丰歉两个标准决定之。乡区苏维埃规定工资，须得县或省苏维埃批准。

兴 国 调 查

一九三〇年九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打长沙回到江西，十月初打开吉安，进到袁水流域，兴国送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我趁此机会做了一个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的调查。找了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八个人开调查会。调查的时间是一九三〇年十月底，开会的地点，是新喻县之罗坊，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永丰区位于兴国赣县万安三县的交界，分为四个乡，旧凌源区为第一乡，洞江区为第二乡，山坑区为第三乡，江团区为第四乡，以第二乡之永丰圩为本区政治经济中心。人口分布：第一乡三千，第二乡八百，第三乡三千，第四乡二千，总共八千八百。这一区介在兴、赣、万之交，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了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这次调查，一般说来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中的基础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我在寻邬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这个调查的缺点，是没有调查儿童和妇女状况，没有调查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没有调查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也没有调查文化状况。这些本来是要调查的，因为敌人对罗坊进攻了，红军决定诱敌深入的方针，我们的调查会只得结束。下面的材料是这样得来的：由我提出调查的纲领，逐一发问并加讨论，一切结论，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们八个同志的同意，然后写下来的。有些并未做出结论，仅叙述了他们的答话。我们的调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很夜深，他们也并不觉得疲倦，应该深深感谢这些同志们，他们有几个是共产党员，但多数不是党员。

毛 泽 东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于宁都小布圩，整理后记。

一 八个家庭的观察

傅 济 庭

第十区第一乡人，开小屠坊，没有本钱。五个人吃饭。有二十三石谷田，要交出三石租，留二十石。五人每人要吃七石，共要三十五石，不足十五石，靠屠坊生意来补

足。每杀一个猪，能赚一元三角左右（现在没有大猪杀了，每个猪只能赚五角左右）。五个人是：父亲（八十岁），妻子（煮饭、养猪、弄柴火、洗补衣裳，不能耕田），儿子（五岁），女儿（一岁），和自己（三十九岁，耕田兼杀猪）。除自己的田以外，又同人家租入五石谷田，每年要请一个月的零工帮忙作田，母亲五年前死了，死的时候用了小洋一百多元，除兄弟出的以外，自己借了小洋五十元债，利上加利，今年已是百五十元了。二十三石谷田中有十七石是自己的，六石是"退脚田"，乃白鹭（赣县属，离十区一乡十里）钟姓的公田。六石每石押去小洋六元，共三十六元，另外每年交租三石（十分之五）。

去年三月革命失败，跑往均村山里，帮人修山。九月红军到兴国，回家，靖卫狗钻山走了，没有分田。今年二月（阳历三月），红军打赣州，二月分田，没有分进来，但三石租不要出了，百五十元债不要还了。同时押金三十六元也没有收回。二月起在村政府当了三个月土地科长，帮人家分田。四月起当赤卫队中队长，有梭标无枪，当了三个月，六月十五日带队打兴国县的靖卫狗一次。六月起，赤卫队改编为红军预备队，当排长，一个多月，当连长。这时第一乡编了二个连。八月打七坊，带队去打，打胜了。这次（阳历十月）出发新喻当营长。脱离生产不得，肉账又没有收好还与别人，要回家去，不愿当红军。

读过六年书，勉强看得报信。

李　昌　英

十区一乡彭屋洞人。

六个人，自己四十八岁，耕田。妻也四十八岁，心气痛，只能煮饭，洗衣衫，供猪子。儿子二十岁，耕田，很笨不会算计。媳妇二十岁，每天弄柴烧，不能耕田。女儿十二岁，今年六月嫁出去了，嫁到四十里的吴姓。第二个儿子三岁，今年四月死了，现在只有四个人吃饭。

自己有三十石谷田，借老弟李昌芬二十石谷田，李昌芬因田不好不够开销往泰和罗坑作田去了。李昌芬的二十石谷田水打得到，只能收十三石谷，要量九石租。李昌芬欠了千二百毛债，九石租，就代昌芬还了利。自己的三十石谷田，因是山田磡易崩坏，实际只能收十七石，连昌芬田的实收数四石，共二十一石，均水谷（毛谷），七折成燥谷十五石，年好也只十七石罢了。六个人每年要吃四十石谷。不够一半以上，靠番薯帮助，年收番薯三十担左右。喂一只猪，喂到十二月，卖给人家，买油盐回来吃。平时不能吃肉，只有清明（四毛），莳田（十五毛），端午（三毛），吃新（十毛），七月半（二三毛），中秋（二三毛），割禾（二十毛），重阳（二三毛），过年（三十毛）才买肉吃。吃新要买十毛钱肉，因为要请工种番薯。莳田，割禾都要请工。一年要请二十个工。父子二人除做自己的事外，还要帮兄弟老二耕二十石谷田，每年要花费八十个工（每一石谷，好田要费三个人工，坏田要费四个人工），因为老二死了，剩下老二嫂，昌英他的第二个儿子过继与她。八十个工没有工钱，除做自己的事并做老二嫂的事外，再无余力帮别人做工了。

欠债一千二百毛，欠得义仓上的，每年还利谷七石半（借百六十毛量利谷一石，每石价二十四毛）。每年年终卖猪卖得二十多元，除拿六七元买油盐外，均拿了折了利谷

还与义仓。本村新义仓老义仓各有三十余石谷，共有七十石谷。

今年三月分田，六个人每人分得七石谷，共四十二石谷，即把昌芬那份田完全归了昌英，昌芬欠的那笔账由昌英还利的，也废除了，义仓上千二百毛债也废除了。四十二石谷是瘦田，只能收六成，二十五石谷左右，加上番薯，勉强能吃。

今年八月赣西南来公事，重新分过，抽肥补瘦。他家死了一子，嫁去一女，只有四个人了，每人分得六石一桶（四桶为一石）共得谷二十五石，他的坏田拨出一点给人家，人家的好田拨来一点与他，这回分田分得匀净。为甚么三月每人分得七石，八月只分得六石一桶呢？因为革命胜利，彭屋洞早先去泰和耕田的农民这时候回来了十二个人，因为泰和那边还没有革命，听得兴国革了命，有田分，都回来，所以本村每个人的田分少了些。

彭屋洞只有易、李、丘、郑四姓，共一百三十多人，没有村政府。

他在乡政府没有办什么事，他的儿子李全拔在乡政府经管彭屋洞方面的军器（梭标、鸟枪、刀等）。

打兴国，打良口，均他儿子出发，打七坊，打南昌轮到他出发。他愿当红军，只是要请一个月假，归去买回一个牛子，才好耕田。因为他的一只牛，今年六月二十七跌死了，前年二十三元买进来的，跌死了卖牛肉卖得了十元。六月费去十二元买进来一条牛，七月又跌死了，卖牛肉卖得了八块钱（还不曾收拢），须得再买一只牛子才好耕田，所以要告一个月假回去一转，再来当红军。

“叨红军的恩典”，过去七十块钱一头的牛，如今只要二十元买得到了。“叨红军的恩典”，百物都便宜了，油过去二十三元一担（一百斤），现在只要十元一担了。谷过去四元一石，现在一元一石（三个铜片一升米）。柴过去二十文一斤，现在八文一斤，肉过去五百三十文一斤，现在三百二十文一斤。只有盐、布等项大贵特贵，盐过去三百二十文一斤，现在八百文一斤。布过去白棉布一百四十文一尺，现在三百二十文一尺。

温奉章

十区四乡（候径）人。候径有三百多人，有一个乡政府。

四个人吃饭。

父亲五十六岁，脚痛，一点事也不能做了。母亲四十六岁，眼睛看不到了，供猪而外，不能做别事。自己二十二岁，耕田，今年三月起当少队大队长，七月起在乡政府当财政委员，十月出发打南昌，代理红军后备队连长。妻十六岁，煮饭，弄柴烧，看牛，不帮耕田。

自己有八石谷退脚田，父亲押去多少钱不知道，每年还租二石半（燥谷）。本是八石水谷田，因系好田，能收八石燥谷，四个人每年要吃二十八石，少二十石，从地主租来一百二十石谷田，不押钱，要量租。一百二十石均水灾田，实只能收九十石水谷（每年收一次），八折成为七十二石，燥谷要量去五十五石租（租率百分之七十五），剩十七石，吃食不够。六月至七月收禾，虽然收了禾，还了租去，还了去年的生谷去，随即没有食了。八月九月又要生谷，向富农生，生一年，一石还三箩。每年要生十多石谷。去年生的十二石谷，今年“叨红军的恩典”，不要还了。欠了六十元债，欠了大地

主刘花让的，每十块毫洋量一石谷利息，现在不还了。幸得能收四十担番薯，三担番薯抵一石谷，共可抵十三石谷。

今年三月，四个人共分了三十二石谷田，除自己的八石退脚田外，分进来了二十四石。分法，即就原耕的一百二十八石（佃人百二十石，自己八石），铲出九十六石与别人，剩下三十二石。铲出去的尽量拿歹田，剩下的都是好田。八月重分，发见他分多了，又太好了，铲出去二石，剩下三十石，又把好田铲出一些，歹田铲些进来。“乡政府分田很公道”。

过去耕百二十石谷田的时候，自己忙得要死，莳田割禾种番薯三个时节还要请工，莳田请六七工，割禾请三十多工，种番薯（早迟两次）请三十多工，共要请七十多工，莳田种番薯交伴（我帮你做你帮我做）十多工还不在内。现在只耕三十石谷田，不但不要请工了，也不要交伴了，自己也不如过去那样苦做了，比方过去苦三分，现在只苦一分，闲空时间很多，在乡政府管财政，办些公事。打兴国，打良口，这回打南昌，他都出发。

读过四年书，标语能认一半，能写账。

陈 侦 山

十区二乡（指阁寺）人。

第二乡共有八百人，乡政府设在永丰圩上。

七个人吃饭，三个兄弟，各人一个老婆，老大一个女。老大二十九岁，陈侦山老二，二十四岁，老三，十八岁。老大摆油盐摊子，摊子摆在人家店门口，专卖零油零盐。借人一千三百毛做本，失掉了；“搭便革命”，不要还债，摊子不能再摆，现在二十军当兵。老二读过八年书，十九岁以前在自己家看牛，十九岁起学看“地”，看了五年“地”；在乡政府当宣传员；这次出发，当连政治委员。老三是做篾匠学徒，学了三年，现在二十军当兵。老大的妇娘煮饭，弄柴火，种菜。老二的妇娘同做上项各事，现在乡政府当妇女赤卫队队长。老三的妇娘才九岁。老大的女二岁。

自有二十石谷田，又租来十石（还租谷五石），老大主持。永丰圩三天一圩，逢圩老大去卖油盐一次，圩毕在家耕田。老大自己耕田之外，每年要请八十个工帮做。

欠债一千三百毛，要利谷十石。每年耕田有谷三十石，还去租谷五石，利谷十石，只剩十五石。七个人除老三帮人做篾不在家外，六个人要吃四十二石，不足二十七石，靠了老大做油盐生意老二看地赚点钱来添补。老三还在学徒期中，不能赚钱。

去年二月起革命，老大老二都参加，老大当农会粮食科长，老二当宣传。几个妇娘子都赞成革命，原因是往常债主逼债，逼得她们过不得年，她们听得抗租、抗捐、抗粮、抗债，心里喜欢，故此赞成老大老二革命。老三是个老实人，人家说怎样他就怎样，这时他没有参加革命。四月革命失败，靖卫狗来，老大跑往均村帮人修山，老二跑到泰和的冠朝，在那里看地，赚了七八十块钱。去年十二月，红军又占兴国，老大老二回家，又干革命。革命失败时，被靖卫狗烧去六间房子。

今年三月分田，除自己的二十石谷外，还分进来二十九石，共计四十九石，每人得七石。妇娘子看见分了田，租也不要量了，债也不要还了，心里不胜欢喜，老二的妇娘子便高兴的去乡政府当妇女赤卫队长。三月分田尽是好田，八月重分，好歹扯匀，扯去

一半好田，扯来一半歹田，还是每人七石，妇人仍是喜欢的，因为妇娘子自己在政府办事，经常说别人应该好歹扯匀，所以在扯匀自己的田时，她也是赞成的。

老大、老二、老三及老二婆均离家做革命工作，家中只有老大婆，老大婆的女及老三嫂三个女子，都没有耕种能力，所以乡政府派人为他家耕田。派乡中劳力多的去耕，先耕陈家的，后耕自己的，耕得很好，派去耕田的人吃陈家的饭。七个人有四个人吃外边的饭，这四个人的每人七石谷便余了下来，拿了发卖，得了钱买油、买盐、买布。

钟 得 五

十区三乡（山坑）人。

家里有十一个人。自己二十八岁，读过七年书，在白鹭（离山坑三十里）王姓杂货店里当先生（管账），年薪小洋六十元。连当学徒到当先生共计做了十三年。去年三月红军到白鹭，跟着回家，在家居住。母亲五十七岁，老了，带小孩子。哥哥老八，三十一岁，耕田。老八嫂三十二岁，煮饭、弄柴火、洗衣服，不耕田。两个侄儿，一个九岁，读书。一个三岁。妻二十八岁，煮饭、弄柴火、供猪子。两个儿子，一个七岁，读书，一个两岁。大侄讨了一个老婆，九岁，带小孩子。一个侄女，两岁。以上共十一个人，只有老八能耕田，他自己能做生意，其余均缺乏生产能力。

自己只有三十石谷田，租别人三十六石，共六十六石。租的田还六成租，还去二十一石六斗，折钱与他，留下谷子。每年能收四十多担番薯。十一个人要吃七十七石，养鸡、供猪、煮酒、请工、待人客等项，每年要吃二十石左右，共需一百石左右，收支相抵，不足二十多石。全家每年盐钱布钱工钱籴谷钱及一切应酬用项共要百五六十元，内中盐钱要二十多元至三十元，布钱要三十多元，籴谷二十五六石每石三元左右共七十多元，此外要应酬费二十多元。这一百五六十元的来源，从白鹭商店付回薪水六十元，红利二十元，种杂粮如豆子等项出十多元。供猪除自己吃肉之外能余十多元，卖松树柴火每年出十多元，共约百二十元，每年须欠债三四十元。他家前共欠债二百多元。

从前有四十六石谷田，十年前卖去七石（价每石十元），前年又卖去九石（每石十二元）故只剩三十石了。老八耕田，力还不够，每年要请零工一百二十多个，每工二百四十文，每年要出工钱二十八串。

今年二月（阳历三月）革命成功，每人分得五石半谷田，十一个人共得六十石零一箩（内自己的三十石）。因为本乡这次分田好歹没有扯匀，现在又要重新分过，目前还未分好。本乡人多田少，每人分五石半，不够食。他家过去每年须食谷百石左右，杂用百五六十元，分田结果得谷六十石零一箩，比革命前之六十六石少六石。但二十一石租谷不要还了（折钱六十多元），二百多元债的利息四十元（二分息）也不要还了，则是好处。不好处是白鹭王姓的店倒，他无事做，每年少了八十元（薪水六十元，红利二十元）的收入。两样相比，革命前比革命后差不多。但革命后，杂用减少了许多。蒸酒，为了请工，虽然还要，但可减少一些。布因省穿，也减少了。吃谷不够，虽然还要籴入，但谷价大减，七毛钱可以买一石。应酬亦相当减少了。所以从前要百五六十元杂费，现在大概减少一半，八十元一年就够了（兴国的钱均以毫洋计）。

三月分田，“以原耕为标准抽多补少”，以村为单位，本村人多田少，故只做到原耕不动，并没有抽多补少。目前再分，从别村抽些过来，大概每人能得七石谷，若能这

样，食谷就差不多了。

五月，他在乡政府土地科负分配山林的责任（四个分山委员之一），把第三乡的山林都分配了，法由乡代表会议决，他便去各村分别开群众大会，实行在各村分山。分山多的分田少，分田多的分山少。分田不分山的有，分山不分田的没有，分山的总是分了一点田。五月当赤卫队后备队中队长。六月当独立团的宣传员。此次出发新喻，又是当宣传员。第七第八次攻吉安他都去了。

愿到红军当宣传员。

黄大春

十区一乡茶干村人。

本村有三百九十多人。

四个人吃饭。自己三十六岁，同人家做爆竹。母亲五十四岁，病了九年，做不得事。妻三十一岁，砍柴火挑到白鹭市上去卖（茶干去白鹭十里），卖了钱来买米煮，又要煮饭，又要种菜，又要洗衣服，非常之苦。老弟三十二岁。做篾匠，去年三月去二团当红军，一去无音信。

家有五石谷田，自己耕了，没有租别人的田。

他帮人家做爆竹，由人家请做零工，一毛四分钱一工，如天天做每月能得四元。老二做篾，一毛子一工，食黄烟，做衣服，没有什么钱多余。

革命之后，爆竹没有做了，老二也不做篾，当兵去了。

从前靠做爆竹，靠老婆砍柴卖，年头做到年尾，弄不得饱饭吃，分了田，吃便够了。欠了陈姓富农的债四十元，把五石谷田作抵押，这个富农非常之恶，革命中被群众打死了。去年三月组织秘密农会，茶干村农会，有五六十人，他在农会当交通。去年十一月当赤卫队队长，今年四月当土地干事，六月当红军预备队排长。八月当预备队连长，这回带队下新喻。

三月分田，每人只有六石半，都是歹的。又因为原耕下了种，原耕得去六成，新户只得四成。七月（阳历八月）重新分配，每人分得七石，又分来了一半好田。

他是爆竹工人，失了业，老二是篾工，改当红军，故都分了田。别的在业工人，也都分了田，且与农民同数量，这是因为工人虽在业，但业不安定，常怕失业，故要求分田。又因为工人分田自己不能耕，要请人耕，故须与他人同数量。农民开头只答应工人分半田，工人说分半田就要加工价，农民才说“我们准许分全田，你们不要加工价”。

工人分了田，没有牛，要从亲房朋友借牛，没有犁耙，也要借，所以感觉困难。

未曾读过书，只会写账。

陈北平

十区三乡（山坑）人。

十一个人。三个兄弟，每人一个老婆，两个侄子，一父一母，一个祖母。老大，三十八岁，做泥水匠。老二，三十一岁，耕田。老三即陈北平，二十四岁，读过六年半书，在高小读过一年半，在乡教小学五年。父亲六十五岁，母亲六十二岁。三兄弟的老婆在家煮饭、砍柴、种菜、洗衣服，不耕田。侄子一个两岁，一个三岁。祖母九十一岁。

自有三十二石谷田，租人家二十石，还十石租，十一个人有两个吃别人的，小的老的吃得少一些，因此每年六十石谷就够食，收入只有四十二石，不足约二十石。此外还有杂用，蒸酒啊、匠工啊、油盐布匹杂货啊、婚丧季节送礼啊、等等，每年要用百二十元左右，靠了老大能入工资五十元左右，老三教书薪水五十元左右，山里棕、柴、竹、木等项出得二十元左右，每年牛婆生一牛子，能出二十元左右，共约百四十元左右，以供杂用及补食谷之不够。

欠债八十元毫洋。

去年祖母、母亲、大嫂，两个侄儿都死了。剩下三兄弟。老二、老三各一老婆，加上老大的岳母，现在六个人吃饭。

三月分田照九个人分（那时有新生儿子一人，新生侄子一人，新讨大嫂一人，但今年下半年便都死了），每人五石半，共五十石零五斗，自己有三十二石，分进来十八石五斗，都是歹田。目前重分，业已调查清楚，还不曾实行分配。

地主富农倒，不造房子了，老大失业，改了耕田。新办乡村人民学校，老三还有书教，照政府工作人员一样，每天一毛子伙食费，没有薪水。老三（陈北平）三月在常备队当政治委员，四月在乡政府当宣传员，五月在乡政府当文化科长，六月在乡政府当秘书，闰六月回家教书。九月下新喻当预备军第二连政治委员。

打王塘、打浪村，老大老二都去了。

雷汉香

十区第三乡（山坑）人。

五个人吃饭，三兄弟，一个母亲，一个大嫂。老大四十三岁，一分帮人做雇农，二分自己耕田。老二三十九岁，二分雇农，一分自耕。雷汉香是老三，二十五岁，泥水匠学徒二年，回家做雇农。母亲七十岁。大嫂三十四岁，煮饭、弄柴火、种菜。

自有七石半谷田，租公堂四十四石谷田，公堂田还租六成。

欠债千二百毛，二分息，借了同乡富农雷祖荣的。

老大老二替别人做零工，在家做事的时候，老大三分之二，老二不过三分之一，老三差不多全部时间替别人做零工。老大当家。

自己的七石半谷田，年成不好，只能收六石，公堂的四十四石只能收七成，计三十石，收成虽减，租不能减，仍要交四十四石的六成租，计二十六石。作一场田，只剩四石谷吃。连同自业的六石，共不过十石，食谷差得很多，又要还二百四十毛利钱，使得一家困苦不堪。

补足生活之法，第一是靠老大老二尤其是老三帮人做工赚点钱回家。老三每年帮人做二百二十工左右，老大每年帮人做三四十工，老二帮人做百七八十工，合计帮人做四百二三十工。这些工中，平时每工二百文，割禾摘木子每工五百文，共计每年工钱约四十元左右。第二靠种番薯，每年出得四十多担，抵得十多石谷。第三靠"番稻"，即晚禾，每年出得十多石谷，这是不要还租的。种番稻就不能种杂粮。第四靠供猪子，每年供得两个，每个可出二十多元，共四十多元，除掉自己吃一半，可剩二十多元。

照上面的计算，共可收入三十多石谷子，六十多块现钱。支出方面，只有三个人的吃食（三兄弟约有两个吃人家的饭，只有一个吃自家的饭，加上两个女子，共三人），

和二十四元的利息，相抵有余，用作油盐杂费，应该不至很苦。为甚么他家还是很苦呢（简直没有什么好东西吃，长日吃番薯丝拌饭，穿也没有好的）？第一个原因，是他们三兄弟都好赌，特别是老二总是赌输。第二个原因是老大嫂好吃懒做，在家闹得天翻地复，弄的三兄弟都懒得做工，猪子也被她打死了。第三，一连死了两头牛，一个吃硝水吃死，一个跌死，家运不济，大背其时。有这三个原因，所以他家总是苦。

三月分田，每人分得六石半谷。共三十二石半。即从原耕五十一石半中（自有七石半，租人四十四石），抽出十九石给别人，其余归自己。不过抽出去的十九石，都是山边瘠瘦每年只能出一道的歹田，留下来的都是每年可出两道的好田。

要重新分配，调查好了，尚未实行。

三月分田抽出去的十九石，因为这田彼时即归新户耕种，故十九石谷，都归新户得。别家分田抽出部分的收获，原耕六成，新户四成，乃是本届田禾新户完全不理，施肥下力仍托原耕，所以收获时新户愿以六成归之原耕，原耕愿以四成归之新户，好象原耕对新户完租四成一样。

老大在本乡赤卫队当兵，打七坊打王塘都出发过。老二当赤卫队班长。老三开头在赤卫队当兵，后当排长，这回出发新喻当连长。

二　本区旧有土地关系

一　田地分配

照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圩一带的土地情形来说，旧有田地的分配如下：

地主　　百分之四十
公堂　　百分之十（为地主富农所共有）
富农　　百分之三十
中农　　百分之十五
贫农　　百分之五

二　人口成份

兴国第十区人口成份大略如下：

地主　　百分之一
富农　　百分之五
中农　　百分之二十
贫农　　百分之六十
雇农　　百分之一
手工工人　　百分之七
小商人　　百分之三
游民　　百分之二

依上所述，真正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人数不过百分之六，他们的土地却占百分之八十，其中富农占去百分之三十，公堂土地又有许多在富农掌握中，若不平分富农

的土地，多数人民土地不足的问题更难解决。中农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土地却只占百分之十五，平分土地中农是需要的，因为他们土地不足，平分土地对于他们是增加不是减少土地，那些说平分要损及中农是不对的。

此处人口成份的分析，是以家为单位，不是以个人为单位。雇农百分之一是指完全的雇农，那些贫农兼雇农的虽为数不少，不在此例。小商人百分之三是指完全的小商，那些半农半商的不在此例。游民百分之二是指完全失业靠赌钱做土匪等为生的一群人，那些半失业的不在此例。

为什么地主人口只占百分之一？因为本区占有土地的地主，多住在邻县之白鹭区、田村区、及本县之县城的原故。若把他们算进来，大概地主阶级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二或三。

三　剥削状况

第一种：地租剥削

一乡（凌源里）二乡（永丰圩）四乡（候径）地租均是百分之五十，三乡（山坑）大部分百分之六十，小部分百分之五十。因为一、二、四乡有水灾，又有旱灾，收成常不好，故租较低。第三乡没有水旱灾，故租较高。

为什么一、二、四乡有水旱灾，第三乡没有水旱灾呢？因为一、二、四乡是墩田，那一带的山都是走沙山，没有树木，山中沙子被水冲入河中，河高于田，一年高过一年，河堤一决便成水患，久不下雨又成旱灾。第三乡是山田，田高于河，虽田亩很小，却雨不怕水，晴不怕旱。

走沙山是没有法子种树的。

本区的田年种一次，种番稻的不足百分之五。少数番稻及杂粮不收租。

第二种：高利剥削

一、钱利：分为两个阶段。民十六以前要三分利（百元年利三十元），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借到的，有田有山有屋作抵才可借到。民十六后“世界起变化”，把钱出借的就很少了。

在本区居住的纯粹地主极少，地主多住在赣县的白鹭、田村一带，不过土地在本区。富农是多的。因此本区贫农向地主借钱的完全没有，向富农借钱的占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则向公堂借。中农不要借钱，雇农不能借钱，要借钱而又有抵押品能借钱的，只有贫农，另一方面把钱出借的主要是富农，因此土地革命中贫农与富农的决斗，无疑要剧烈的。富农也有时向地主借钱，几百元千把元一借，利较轻，一分五到一分八。富农这样成趸的借了来，再几十元一注的借与农民，收得抵押品，榨取高利息。这样，富农就做了地主剥削贫农的中间人，因此富农和地主的利益是分不开的。

公堂，本区多数把持在劣绅手里，这种劣绅，大半家里有些田，但不够食，所以不是富农也不是地主，他是劣绅。因不够食，所以要把持公堂，从中剥削。一乡、二乡及四乡的公堂，劣绅管的占十分之六，富农管的占十分之四。第三乡，民国以前，劣绅管的最多，因为那时公堂要有功名的才能管得。民国以后，富农管的最多，与一、二、四乡恰好相反，十分之六是富农管，十分之四是劣绅管。贫农从公堂借钱时，利比从富农借稍轻，富农利二分四，公堂利二分。公堂借钱一样要抵押。公堂索债比富农还要厉

害，期满利钱不清，索牛赶猪，下田割禾，都做得出。借富农的，到期利钱不清，同他讲明，利上加利，下年一同还他。或由他将押抵的田出租与别人耕种，收得租子抵偿利息。富农目的只在图利，所以期限有时还能通融。

钱利中有一种最挖苦的，就是月子利，这是流氓借了去做赌博用的，一月为期，一元还二元。但不常有。

二、谷利：借谷叫做“生谷”，富农的，利很重，公堂义仓的，利较轻。富农借谷与贫农，不论去年十一月十二月借的，或是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借的，七月割禾还与他时，都要百分之五十的利，就是一石谷还三箩，十一月借，七月还，没有一年，一月二月借，七月还，只有半年，三月借，七月还，仅四个月，为什么要这样重的利息（比钱利重得百分之三十）呢？因为冬春两季，谷价大贵，较之秋天贵一倍，秋天每石一元半的，冬春常是三元，因此，富农要将谷价所失，加在利息上面。他还只愿卖谷，不愿借谷，因为利息即使高到百分之五十，还不如冬春把谷出卖来得有利。贫农向富农借谷，要有好大的人情，才办得到。富农一百石谷，卖的九十多石，借的不上十石。茶干（第一乡）的富农陈凤鸣，贫农黄大春同他借谷（民九四月），他不肯借，同他借钱转而同他买谷，他就肯借。

贫农借钱，由富农借出的占百分之八十，公堂义仓借出的占百分之二十，地主直接借出的没有，贫农借谷，由公堂义仓借出的占百分之九十，由富农借出的占百分之十。由此看来，富农是完全的剥削主义，公堂义仓，确实还有些周济之意。

公堂亦大部是剥削主义，公堂谷子第一乡出卖的百分之八十，出借的百分之二十。第二、三、四乡都是出卖，几乎没有出借的。惟独义仓的谷子，是全部出借，没有出卖的。本区义仓，各乡都有。第一乡（人口三千）有四个义仓，八百石谷，第二乡（人口八百）有五个义仓，五百石谷，第三乡（人口三千）有六个义仓，四百石谷。这三个乡共有十五个义仓，一千七百石谷，几乎每村有一个义仓。只有第四乡（人口二千）仅一个义仓，一百石谷。本区贫农渡荒月，全靠义仓借点谷食。靠富农借谷是无望的。义仓借谷利息百分之三十，虽较富农借谷为轻，但要抵押是很严格的，铁器（犁耙）、锡器、银器、棉被、帐子、衣服等，均可作抵，总要一样。只有第一乡之洋坊村义仓借谷，不要抵押品，只要找邻户写张“顶票”，担保本利照还。义仓的谷是由地主、富农、中农捐集的，他们捐集谷子起个义仓，荒时暴月接济贫民，是和缓贫民暴动的一个改良欺骗政策，不明白的却在那里颂他们的恩德。义仓的谷，除地主、富农、中农不能借也不要借外，贫农、雇农，工人、游民，都可以借，只要有抵押，或能写“顶票”。

“生谷”厉害，“检新谷钱”更厉害。二、三、四、五等月，贫农没饭吃了，向富农检新谷钱，当时谷价三元一石的，一元五毛一石检了新谷钱，七、八月间交谷，这时谷价总是二元左右。拿这时候市价说，并不算怎样厉害，问题就在贫农把谷子廉价交出去了，明年春夏之间，望着富农拿了卖贵价，三元一石，富农一元五买进来，三元卖出去，利息百分之百，比之利息百分之五十的“生谷”，不更厉害么？

三、猪利：本区没有。

四、牛利：各乡都有，但不多。富农把牛婆借给贫农，贫农喂养此牛拿了耕田，每年出利谷一石半（三箩）给富农。生了牛子，贫农富农各占一半。一、二、四乡富农十家中有三家把牛出借，叫做“税牛”，第三乡十家富农中只有一家有牛出税。牛也会病

死，跌死，所以这种牛利是不见得很稳当的，富农不很努力放这种利。又怕贫农喂养不好，把牛弄瘦，又怕贫农把牛劳动过度，又怕盗贼偷去，所以贫农向富农税牛，要是很有人情的才能税到手。

五、油利：贫农有油山的，五、六月间，无米煮了，向富农借钱买谷吃饭，把新油出卖，五、六月间油价每担（百斤）二十五元的，作十二元出卖，少的只作十元，九月交油，不得短少。即是六月同富农借十二元钱，九月要还一担油与他。九月油价普通总是十七八元一担，高的要卖二十元，低的也有十五元。假如六月借十二元，九月油价是十八元，其中六元即算四个月的利钱，就是百分之五十的利率。假如九月油价是二十元，利息就是八元，百分之八十的利率。富农九月收了油，藏起来，等到明年四月至八月油凑时候，运下江口，运下赣州府，起码卖得二十五、六元一担，价顶高时卖四十元一担的也有。前年六月，第一乡农民到白鹭卖油，一元钱（十毛）只买得一斤十二两，这虽是买零油，但若集合起来，要五十七元才能买一担油。去年六月一元钱买二斤半，也是四十元一担。若照此例计算，贫农今年六月从富农得十二元卖去一担新油，到第二年六月就要损失二十八元之多。简直是百分之二百以上的利。这种油利不但重，而且很稳当，九月起到十二月都是贫农打油时候，富农不怕贫农“走空”的，就放心让贫农把油送到家里来，怕贫农“走空”的，自己到贫农家里守着打油，亲自取回。

油利就是这一种形式，从贫农方面说来，叫做“检新油钱”，从富农方面说来，叫做“放新油钱”。富农把油出借的事（不是放新油钱）非常之少，但也间或有。今年十二月贫农向富农借一担油，卖得二十元，明年油价贵时，还油一担，或照市价折成钱还去，不要利息，这等于贫农为富农收藏这一担油，所以不算恶利，要与富农有人情的，明年靠得住有还，才能借到手。贫农借这种油，或为死了父母，或为讨妻子，或为其他的紧急用途，向有知交的富农借钱，富农说我没有钱，只有油（或者说只有谷），就是这样借了油来，发卖得钱，以济急用。明年油贵时节，借主要油，债主就从市上买了油去还他，借主要钱，就照当时市价折了钱去还他。这种借油法，叫做“扯油”。

不论前一种“检新油钱”，或后一种“扯油”，都是不多有的，只在有油山的地方才有。在有油山的地方，如兴国第十一区（均村一带），那一带的贫农耕油山的多（贫农自有油山很少，多是向地主富农租的）。百家耕油山的贫农，检新油钱的占二十家。均村一带的富农，对油利剥削得很厉害。在那一带地方，贫农向富农“扯油”的，百家之中，不过一二家。

六、当利：分大当小押两种。大当，本区没有，田村、白鹭才有，月利五分，当一百文，月利五文，当一千文，月利五十，当一元，月利五分，都拿小洋计算，十个月为期，到期不赎，延一个月死当，月利百分之五，即年利百分之六十，这种剥削非常厉害。贫农、雇农、工人、游民四种人中，进当铺的很多。这四种人，一百家中，有六十家进当铺。抵押品：铁器、锡器、银器、蚊帐、被窝、衣服都要。本区跑到白鹭去当东西的非常之多，占贫苦群众百分之六十，白鹭开当铺的是兴国县城人，十一个月死当，当铺老板把抵押品运到兴国城去拍卖，抵押品值三元，当得一元五。但当铺老板的目的是利息，不在拍卖抵押品。

小押本区各乡都有，富农干的，不开门面，也不经常做，只是贫苦工农苦得很时，拿了东西跑到富农家里，求押点钱，间或有之。贫苦工农一百家中，有十家当小押的。

为什么当大当的多，当小押的少呢？因为这种干法名誉太坏，并且本乡本地人太熟了，抵押品虽拿来了，贫民总想求情多当几文，富农也不便苦争，因此富农多不十分肯干这件事。小押的利息与大当同，但日子很短，由富农讲，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到期不赎，作为死当。

这次到调查会的八个人中，陈北平、钟得五、傅济庭、陈侦山四家不曾当过东西，温奉章、雷汉香、黄大春、李昌英四家都当过，温奉章每年要当一次，四五月间当了籴米煮，去年还当过一次。去年四月，把铁耙一架，酒壶两把，当到白鹭恒兴当铺，当了小洋二元四角，拿了回来籴谷子一石。十二月赎了回来。雷汉香家也是年年要当，老大老二当的不说，单说老三雷汉香，去年正月当过一回，单长褂一件当一元，锄头两把当六毛，未曾赎回。六月又当过一回，一把泥刀，当三毛，一个“洋头子”，当五毛（都是老三做泥水匠的用器），也不曾赎回。李昌英去年以前没有当过，去年二月起革命，去游击大队工作，白匪来，跑往白鹭，妇娘子在家没有饭吃，当了棉袄一件，得钱一元二毛。革命再起，未曾赎回。黄大春去年以前未曾当过，去年五月，爆竹不销了，无人请作爆竹，没有饭吃，当了棉被一床，得钱一元五毛，当给本村富农钟块子，今年七月全县革命，白鹭红色游击队到本村，贫农起暴动，捉了钟块子到白鹭杀死，棉被取回。这个钟块子的父亲好，肯周济贫民，故群众不曾杀他。钟块子在唐江开爆竹店，学会一手打，打得几十个人开，把他杀掉，人人称快。他的田平了，又罚了他家三回款，罚了好几百元。

七、盐利，很厉害，因为兴国的盐，都是从广东来的，贫农兼做盐生意的颇多，本区百家贫农，有十家兼去挑盐。没有本钱，向富农借，收买鸡子，挑往嘉应州（广东梅县）一担鸡去，一担盐回，借洋一元，还盐一斤做利。时间不过廿天或一个月，一斤盐价一毛二三，即一个月间，借本一元，要还一毛二三的利。民十六以后，革命的一天多一天，一般的利息减下来，减到二分四，盐利也没有了。

第三种：税捐剥削

本区除钱粮以外，对于农民没有什么直接的税捐。

三石谷田为一石“秧租”，完粮四分四厘（银子）。完粮，每银一两，完大洋三元六角。四分四厘升大洋一角五分八厘四毫，这是一石秧租田的粮价。一石秧租田，就是现时三石普通田，所以现时普通一石谷田要还粮大洋五分二厘八毫。本区去年谷价每石小洋三元，折铜元六串。每大洋一元折铜元二串八百，大洋五分二厘八毫，折铜元钱一百四十八文，能买谷二升半弱，这即是说，兴国现时一石谷田，每年要完粮二升半。但本区一石谷田，实际只能打七斗谷（收七成），这样就是七斗谷中要完粮二升半，约完去百分之三·五。

本区除钱粮外虽无别的直接税捐剥削，但本区去广东做盐生意的却要受沿途各种税捐剥削。中农或贫农做盐生意的，从本乡收买鸡子七十斤，三毛二分钱一斤。一担挑到嘉应州，讲银子，从前每斤价银三钱零，有时高到四钱一斤。今年价高，每斤高到四钱八。每银七钱四分升大洋一元，银四钱八，升大洋六角五，升小洋九毛一，除去本钱三毛二，每斤鸡子能赚小洋五毛九。七十斤鸡子能赚小洋四十一元三。为什么今年嘉应州的鸡价特别高呢？因为革命，赣南各县的鸡子去的少了，所以价钱大贵起来。

四十一元三毛赚项中，要除去沿途的开支。第一是工钱，往年十天可到嘉应州，如

今红色区域与白色区域相间，许多地方要绕路，至少要十五天，每天工钱二毛五，十五天共三元七毛五。第二是吃伙食、吃黄烟、吃茶水、穿草鞋，每天至少要四毛五，十五天共要六元七毛五。第三是鸡食谷，七十斤鸡每天吃谷子三毛，十五天共要四元五。第四是厘金，从兴国到门岭不抽捐，到门岭要过厘金，每担鸡大洋一元（升小洋一元四），门岭过去不抽。第五，还要加上在本区收鸡子的用费，每一担鸡要费三天，工钱、伙食、买鸡笼，共费二元。以上五项开支，共要十九元四毛。四十一元三毛，除去十九元四毛，每担鸡实赚二十一元九毛。

一担鸡去，一担盐回。今年嘉应州买盐，大洋一元买十八斤。过去嘉应州盐每大洋一元只能买十四斤，去年还是这样，今年因革命发展，盐销停滞，所以便宜了。挑一担，八十斤，价钱大洋四元五，升小洋六元三。盐挑回兴国，今年五六月间盐缺万分，因此价涨，小洋一元，只买得二斤半，照这时市价，八十斤盐，卖得小洋三十二元，除去本钱六元三，赚得小洋二十五元七。

但二十五元七赚项中，要除去沿途开支。第一是工钱，十五天，三元七角五分。第二是吃伙食、吃黄烟、吃茶水、穿草鞋，六元七毛五。第三是厘金，吉潭、门岭、白埠、钓鱼潭、会昌、花桥六处，门岭要过厘，其余五处要验票。过厘，从前每担盐六七毛，如今要大洋一元，五处验票，每处小洋二毛，合共要大洋二元(折小洋二元八毛)。以上三项开支，共计十三元三毛。二十五元七，除去十三元三，实余十二元四。

一担鸡去，赚二十一元九，一担盐回，赚十二元四，共赚三十四元三。时间一个月。过去鸡盐两项生意，赚钱赚不到现在这样多，但比较靠得住，不要绕路，时间只要二十天可往返，现在赚钱较多，但路上不安静，民团靖卫团时常搜抢客人身上的钱（卖掉鸡子的钱只以一小部分买盐，大部分带在身上）。虽不要盐，但时时要捉鸡吃，仅不至于杀人。虽然如此，去做生意的人并不减少。

五六月盐贵，每元二斤半，现在（十月）盐便宜些了，每元三斤十二两，这是因为江口、大湖江两处打开，赣州可以来盐了。比之未革命时，依然是很贵的，未革命时每元六斤四两，比现在（十月）差不多便宜一倍，比今年五六月差不多便宜两倍。

三 斗争中的各阶级

一 地 主

第一乡地主均在兴国城及白鹭，不在本乡，租要送到兴国城白鹭去。在本乡有田在白鹭住家的大地主有四至五家，每家收租千多石，有在白鹭开店的，有在南昌、赣州干事的。在兴国城的有一家，收租千石，在城内开恒春号洋货店，在赣州也有店。

第二乡有三家地主，每家收三百多租，均在本乡住。刘月林，三百租，自己不耕。革命中杀了他家两个人，月林之子老大、老三，都是靖卫团分团总。革命后还有十人吃饭，分了田，服从政府。杜喜猷，自耕二百谷，收三百租，二十多人。杜喜猷，四十岁，去年二月参加革命，今年二月红军来，首先自动拿出契来烧，田都平了，杜在政府办事，当宣传。谢文林，三十个人，自耕五百谷，收一百租，与杜喜猷是亲戚，自愿烧契分田，现在乡政府当财政科长。他家六兄弟，五人耕田，还请四个长工，在本乡第一

发财。他家无一人识字，很老实（谢文林其实是个大富农）。

第三乡有两家地主。曾锡群，分为五家，共收一千多租，自己不耕。五家共二十多人。著名大地主，反革命。男子都跑了，留下女人小孩五六个，每人也分了田，屋烧了，他家的人未曾杀到，他同姓替他当走狗的杀了两个。谢远香，四百多租，自己不耕，二十多人，反革命，跑了，不曾杀到人。

第四乡，王润兰，大地主，四百租，又自耕二百谷，油山很多，均自耕。反革命，靖卫团总，杀了许多工农，烧了许多工农的屋，跑了。刘家洪，三百谷，自耕一百，出租二百，五个人，反革命，与王润兰、曾梅喜共起靖卫团。刘家洪和他的儿子均被杀。曾梅喜，收一百租，自耕百多谷，是个富农，五个人，靖卫团副团总，杀死工农多人，贫农高老狗被他杀死，“魂魄在他家吵闹，曾梅喜和他的父亲均被鬼缠死了”。谢传珍，六百租，自己不耕，五六个人。谢传珍被第三区捉去交区政府看押，尚未杀，家财抄了。

二 富 农

第一乡共十二家，其中七家反革命，七家中有两家杀掉了家长，其余五家壮丁都跑掉了。跑的家中均被抄，锅子都有被抄的，杀了家长的两家没有抄，七家女人、老人、小孩均未跑，分了田，女人有些与别人结婚了。被杀的一家刘能昌，他的儿子刘述尧，二十多岁，参加革命，出发新喻当班长。一家叫陈凤鸣，屋烧了。十二家中有五家不反革命，捐了款子，平了田，进了赤卫队，做革命工作也努力。其余徐昌函，四百谷田，大部自己耕，小部出租，十多个人，还有很多钱放利，被游击队罚了七百元，家里未被抄，谷子未分掉，田分掉了。徐昌函二十六岁，去年二、三月即参加革命，今年三月起做少年先锋队指导员，后到赣西南政府做工作（不知做什么工作），八月回乡在区政府又作少先队指导员，被人咬他是AB团，押起来了。凌月波，四百谷田，均自己耕，十二个人，儿子凌雷汉，是个“毕业生”。在村政府当秘书，罚了他百多元，依然当秘书，有人咬他是AB团，押到区政府两个多月，许他自首，放了。谢忠节，二百多谷，大部自耕，一部出租，八个人，最近乡政府把他捉了，要罚他钱，还未放。以上十二家富农中，七家是积极反革命，五家虽表面参加革命，却有两家是图谋反动的AB团，剩下三家，一家也被捉了。

第二乡有富农九家，陈先为、梅嘉生、杨祖莲、谢钟玉、谢文林、陈衮伟、王正科、邹相春、谢良慈。陈先为二百谷，自耕百二十石，出租八十石，有钱放债，十多个人，剥削很厉害，反革命。陈先为跑了，三个儿子都杀死了。抄了家。梅嘉生其实是小地主，百多谷，均出租，有钱放债，做布生意，反革命，当靖卫团的指挥。梅嘉生，和他的母亲，又一个长工，均被游击队杀死，家抄了。杨祖莲，百多谷，自耕出租各一半，反革命，AB团的暗杀队长，七月区政府把他杀了。谢钟玉，也是小地主，均出租，有钱放债。反革命，AB团团总。平素是个劣绅，八月十六日区政府把他杀了。谢文林，六百谷，自耕五百，出租一百，三十个人，六兄弟，五个耕田，还请长工，在本乡第一财富，是个大富农，与杜喜猷是亲戚。自愿焚契分田，全家三十多人，均不识字，颇老实，现在乡政府当财政科长。陈衮伟，二百谷，自耕出租各半，有钱出借。二十个人，参加革命。八月被人咬为AB团，区政府把他捉起了。王正科，二百谷、自耕

多，出租少，反革命，当靖卫团，今年五月被杀。邹相春，百六十石谷，出租一百，自耕六十，七个人，参加革命。他的儿子邹丽东，当区政府文化科长，还忠实。谢良慈，四十石谷，均出租，在永丰圩开杂货店，起头参加革命，在第二乡乡政府管财政，侵吞八十多元，撤了他的职，罚他出百五十元，有一天开民众大会，他就着人家的现成笔墨，连写两个反动标语，“巩固苏维埃政权定要AB团改组派”，“拿下赣州吉安定要AB团改组派”，捉了拷问，供出当AB团秘书，八月十七日把他杀了。以上九家富农（中有三家小地主，一家小商人），七家反革命，只有二家是革命的。

第三乡，九家富农，谢九璋、毛世榯、雷永霞、陈凤鸣、姜滔书、丘福田、丘世礼、丘质葵、谢益星。谢九璋，四百多谷，自耕二百多，租人二百，八个人，放高利，反革命，乡下称霸王，当土棍。革命起来，全家跑了。毛世榯，二百多谷，均自耕，放债，早前二十三个人，现在分为四家，孙子毛章平，二十二岁，中学生，AB团团总，捉起了。雷永霞，二百多谷，自耕五十石，租出百多石，有钱放债，早前走了，乡政府捐了他二百多元，他回了家，乡政府叫他去红军学校，没有考进，乡政府又叫他进了兴国县的教导队。年二十一岁，高小毕业。陈凤鸣，百多谷，均自耕，七个人，无钱放债，因为他的儿子在赣州读书要用钱，反革命，AB团的秘书，杀了，抄了家。姜滔书，百多谷，均自耕，有钱放债，十个人，参加革命，捐了他百二十元。丘福田，百多谷，自己耕，稍有一点钱放债，五个人，反革命，自己跑了，妻子跟了别人。丘世礼，百三十石谷，自耕四十石，出租九十石，吃大烟，无钱放债，反革命，本人跑了，他的妻乡政府叫她嫁别人，房子做了乡政府办公地。丘质葵，百五十石谷，自己耕，有钱放债，六个人，参加革命，儿子编入赤卫队，捐了他六十元。谢益星，二百谷，自耕出租各半，有钱放债，十二个人，AB团，捉起了，他的第四个儿子跑了，还有三个儿子在家，以上第三乡九家富农，六家反革命。只有三家尚未反革命。

第四乡，刘家洪、曾梅喜两家富农，均是反革命（见前地主节）。

本区四个乡，第一乡十二家富农，九家反革命，第二乡九家富农，七家反革命，第三乡九家富农，六家反革命，第四乡两家富农，均反革命。四乡共计三十二家富农，二十四家反革命，余八家现虽尚未反革命，也不知将来怎么样。

富农的田是很好的，和地主的田、公堂的田一样的好。他们买贫农的田总是要买好的，贫农也不得不把好田卖给他，因为若卖歹田，要几亩才抵得一亩的价。他放债与贫农要抵押，也要好田不要歹田，因此好田一天一天集中到了富农的手中。

革命初起，如今年二三月间，富农投机加入革命的颇多，乡区苏维埃中富农及其走狗占去百分之三十的位置。四五月间，举行反富农宣传周，把他们打下去。到现在，本区只有两个富农办事了（一个是谢文林，在第二乡苏当财政科长，一个是邹丽东，在区政府当文化部长）。

三 中 农

中农在土地革命中是得利的。第一、中农在土地上不但不受损失，而且多数于平田时是平进了的。本区中农人口占全人口百分之二十，土地只占百分之十五，故本区中农平田时平进的多。虽然也有平出去的，却是极小部分。

第二、过去讨一个老婆要费二百元内外，几乎等于中农的全部家产，所以中农讨亲

很不容易，为了讨亲而欠债的很多，假若一个妻子死了，再讨一个就非常之困难。现在婚姻自由，一个钱也不要，这是很大一个利益。

第三、过去中农人家，老人死了，起码要用五十元、一百元，百多元的也要用。过去中农为了死爷死娘，负债破产，是常有的。现在迷信习惯破除，死了人埋了就是，一点钱不费。

第四、过去牛贵，跌死一条牛，卖得十元八元牛肉钱，要加上十多元钱，才能买回一条牛。现在跌死一条牛，虽仍只卖牛肉卖回十元八元，却只要加上三四块钱就可买回一条牛。

第五、地主富农权力被打倒，礼节废弃，迷信破除，送情送礼，香纸蜡烛，都不要了，也要节省一点用项。

第六、除上述五项经济利益外，尚有政治上的利益，算是最重大的利益项。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统治之下，没有"话事权"，事事听人家处置，现时，却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中农在乡区两级苏维埃中担负工作的，约占百分之四十。内中完全不欠债的占百分之十，稍许欠一点债但家计仍然敷得下去的占百分之三十。

中农参加革命很勇敢，和贫农一样"出发"（谓编在自卫军中，有时要出发作战），一样放哨，一样开会。

本区中农，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土地占百分之十五。中农的土地虽然要比贫农好些，比富农却差得多。大概中农的土地，好的歹的各占半数。

四　贫　　农

革命后，贫农取得利益如下：

第一、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

第二、分了山。过去贫农是少有山的。第一、第二两乡贫农百家中三十家有山，七十家无山。第三乡（山坑）近均时，那块山多，故贫农百家中七十家有山，三十家无山，那块的山多是油山。第四乡贫农百家，五十家有山，五十家无山。各乡贫农有山的，每家山的数量亦很小。本区的山，一、二两乡因走沙山多，故地主只要田，不要山，富农、中农、贫农各占山之一部。第一乡山的分配是：富农百分之四十，中农百分之四十，贫农百分之二十。第二乡山的分配是：富农百分之五十，中农百分之三十，贫农百分之富二十。第三乡因油山多，山里有出息，故地主要山，但仍以富农占的山为最多。其分配是：地主百分之十五，富农百分之五十，中农百分之二十，贫农百分之十五。前面说第三乡贫农百家中七十家有山，但这七十家所占山的数量不过百分之二十，每家只有一点点。第四乡山的分配是：地主百分之二十，富农百分之二十，中农百分之五十，贫农百分之十。没有山或山太少是贫农一大困苦。第一，没有柴火，或柴火不足，要向人家山上采芦茅。第二，不能伐了松柴挑到市上去换油盐，只能挑芦茅去换油盐，三担芦茅才抵得一担松柴。第三，没有木头盖房子做用器。第四，没有油山或油山不足，就没有油吃，或油不足吃。现在分了山，且和分田一样照人口分，每家每人都有山了。虽然各乡山有多的有少的，因此各乡人民分山，有分多的有分少的。但即使那个少山的乡，每个都分了一点山，因此解决了贫农的困难问题。贫农为了需要，是坚决主张要分山的。为了生产，亦非分山不可，过去山多人家，因为人力不足，有些荒了，有些修理不好。

人力足的贫农群众，因为无山，便把人力闲置起来，现分了山，贫农大力用到自己的山上，生产便会大大的增多。

第三、革命初起时，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贫农不要钱挑了谷子吃。白鹭（大地主集中的地方）并按人口平分了，贫农吃到割禾时还吃不完。

第四、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三月革命初起时，上头的公事说，商家的账要还，会账要还，贫苦工农相互的账要还。六月十几（阳七月）赣西南（即指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又来公事，说一切不要还了。本来从三月起，便是一切都不还了，不过不还虽然是事实，而上述三种债要还，却尚是一种道理（尚成一种理论）。六月以后，连道理都推翻了。贫农十分拥护这种办法。为什么贫农主张连那三种都不还呢？第一，商家的账，大商家多半跑了（白鹭三十五家商店，十家大的都跑了）。小商家（如白鹭之二十五家小商店）虽多少也有些货账在工农手中，但小商家多半欠大商家的账，欠地主的账，欠富农的账，贫苦工农不还小商家的账，同时小商家也不还地主、富农的账，两者比较，小商家还较得利，因为小商家欠大商家和地主、富农的账比他放给贫苦工农的账为数要多些。第二，会账。为了讨亲，为了还账，邀定亲戚朋友打一个会，这些亲戚朋友不是中农就是富农，取消会账是无伤的。虽然打会是出于友谊扶助，但起会是贫农，还不起，取消是应该的。即使二会三会是富农接了，取消不还也有理由，因为富农接了会，把钱放利放到别的贫农手中去，贫农现在不还他了。并且他的全部家产，充公的充公，捐款的捐款，已经闹空，所以不还也是应该的。至于地主、富农为剥削贫苦工农而打的会，本区没有。第三，贫苦工农相互的账。革命了，“你是贫苦的，我也是贫苦的，我拿什么还你呢？”这样就答复了这个问题。所以一概废债是最正确的。

第五、吃便宜米。今年正二月，谷价每石四十六毛，三月开始革命，每石二十毛，六月至今（阴九月）每石七毛，以七毛与四十六毛比，便宜六倍半。谷贱，在贫农分了田已经耕种收割以后，自然有相当的不利，但在革命开始尚未收割的数个月间，谷贱于贫农是有利的。

第六、是“由”了老婆（江西农民把婚姻自由的由字变成动词，使之区别于旧时强迫的买卖的婚姻，普遍通用于全苏区农民中）。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因此许多贫农讨老婆不到。即讨，不是带童养媳，就是要到好大年纪。若是讨了老婆又死了，再讨就非常困难。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

第七、死了人不要用钱了，埋了就是。

第八、牛价便宜，没有牛容易买到，死了牛容易买回。贫农的牛力是很缺乏的，以贫农百家论，本区每家一个牛的只有十五家，两家共一牛的四十家，三家共一牛的十家，四家共一牛的五家，无牛的三十家。在这种情形之下，牛价便宜是贫农的利益。

第九、应酬废弃，迷信破除，两项的用费也不要了。

第十、没有烟赌，同时也没有盗贼，夜不闭户，也不会失掉东西。

第十一、分了田，家家能供猪，不专为卖钱供别人吃，自己也可以吃肉了。过去，屠坊中，贫农买肉吃的很少，现在买肉吃的多起来了。

第十二、这是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权。贫农是农村政权的主干，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

贫农可以依照牛力多少，分为五个阶层，如上边第八项所述。

五 雇 农

雇农和贫农一样分了田，因为地主、富农倒，虽有人请零工，没有人请长工了，所以他们坚决要分田。分了田，牛力农具没有，又很难耕种，此问题现在尚未解决。区乡政府不把没收地主、富农的耕牛农具发与雇农，把它出卖了。

傅济庭的外甥朱大喜是个雇农。家中七个人：四兄弟，父，母，同他的老婆（童养媳带大的）。他是老大，二十二岁。老二，十九岁。老大在富农钟姓家中做长工，每年工钱小洋三十九元，老二在人家看牛，每年工钱十元。共收入四十九元，买得十六石多谷，只能供两个半人的吃食，靠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砍茅草卖，弄点钱吃饭，冬天吃两餐。欠三十多元债。自己无屋，住地主的山棚，为地主招呼山。父亲原也是雇农，现六十多岁了。

本区雇农每年可抽十五个工，正月过了元宵上工，初一、十五没有牙祭打。老板供给被窝，衣服没有。有病吃药，吃自己的。病在三天以内，不扣工钱，三天以外，要扣工钱。工钱零碎支给。天光做到黑，除吃饭、休息时间外，工作至少十点钟。冬天，晚上剥木子，刨番薯。

雇农没有老婆的占百分之九十九，是农村中最苦的一个阶级。地主、富农不但人人有老婆，一人几个老婆的也有。中农百分之九十有老婆，百分之十没有。贫农百分之七十有老婆，百分之三十没有。手工工人百分之七十有老婆，百分之三十没有。游民百分之十有老婆，百分之九十没有，也比雇农的老婆数多些。只有雇农才是百分之九十九无老婆。七月（阳八月）政府下令，男子无老婆的赶快“由”到老婆，女人无老公的赶快“由”到老公，于是“由老婆”“由老公”的事情，就突然增多起来。七月以来，两个多月时间，中农、贫农从前无老婆的，多数有了老婆，没有的很少了。雇农比较难于“由”到。女子嫌雇农家中没有器具用品，又嫌他不常在家中，所以雇农不容易解决老婆问题。第一乡傅济庭住的杨坊村，四个雇农（两家的两兄弟），只有一个“由”了老婆。本来另一个也可以“由”到，乡政府的社会保险科长说：他们两人过去有勾搭，不准登记，因此那个女人“由”别的男子去了，这个雇农依然没有老婆。第二乡永丰圩附近，六个雇农，四个“由”了老婆。第四乡，温奉章住的候径村，只有一个雇农，至今没有老婆。

分田后，没有长工了，零工亦十分减少七分，只剩三分。工钱没有涨，雇农也没有要求涨，“工都没有做，还话涨的事！”

雇农分田后牛力农具问题。杨坊村的两家雇农，一家姓陈的，老大、老二，都是雇农。老大帮富农陈姓做长工，每年工钱三十三元。老二帮钟姓富农做长工，工钱四十二元。他们的父亲是个佃农，死了，母亲带了他们两兄弟讨米。他们长大了，就做雇农。母亲死了，剩下两兄弟。老大，二十九岁，老二，二十三岁。有一个屋，有煮饭器具，也无桌凳，过去有的耕田器具也卖掉了。二月分了田，两兄弟都回家来，老二“由”了一个老婆，本钱也没有，老二本来有百多元钱，借给钟姓贫农，废债一行，也不能收回了，因为那个贫农没有法子还。幸得有个叔子是中农，借给他们牛力与农具。三个人共分十六石二斗谷田。二月分田后，即拿来自己耕种，收获全归自得。头禾割了，又耕二道，禾长得很好。如有牛，一个人能耕一百石谷田，他们两兄弟共只耕得十多石谷，所

以有许多工夫空出来，为人家做零工，挑脚，赚些钱用。

杨坊村又有一家雇农钟姓，也是两兄弟，父母死了，叔父（钟恩江），叔母，叔父的两个儿子，一个媳妇，两个孙女，全家共九个人。叔父及两个儿子都耕田，租别人的，他自己没有田，欠了债，每年不够生活。他们两兄弟帮人家做雇农，老大钟声坡，四十多岁，在钟姓富农家做长工。老二钟声槐，三十六岁，在钟姓中农家做长工。二月分了田，即由自己耕种。原有一条母牛，租得钟龙潭中农的，养了两个牛子，革命后，钟龙潭要这个牛子回去。乡政府对钟龙潭说："税的牛，看各乡办法，各乡都交还，你才能要回，现在不能要回"。因此这头牛仍在钟恩江家。两兄弟分田之后，牛力农具不成问题，因为他们的叔父有。

在这里要说一说那个中农钟龙潭的事。钟龙潭，三十多岁，母亲六十岁，老婆，二十多岁，三个人吃饭。自有十多石谷田，租人三四十石谷田。还租之外，自食有多，拿了出卖。有三条牛出税，税在三家贫农家中，每牛每年收租谷一石半，生了牛子各得一半。很有钱放账。二月平田，三人共分二十四石谷（每人六石），比自有的多了一点，但不能租人田，因此没有余谷出卖了，税出的牛和放出的债都平掉了。他是个很老实的，不反革命，也没有担负什么重要的工作，在本村红军预备队当伙伕。

革命后雇农在政治上没有当权。中农贫农总以雇农"不认得字，不会说话，不开通，不熟公事"，办不得事。本区区乡政府委员，没有一个雇农，只有一个当乡赤卫队队长的。

六 手工工人

本区手工工人的种类：木匠，泥水匠，缝匠，铁匠，剃头匠，篾匠，砻匠，棕匠，石匠，画匠，锡匠，机匠，银匠，染匠，槽匠，漆匠，窑匠，纸匠，十八种。以木匠，泥水匠，缝匠，篾匠四种人数较多。剃头匠，铁匠，槽匠（打油的），次之。其余又次之。铜匠，弹匠，鞋匠，皮匠，四种本区没有，油槽一乡一个，二乡两个，三乡十一个，四乡十二个，每个油槽有槽匠一人。

工钱：过去每工木匠二毛，泥水二毛，缝衣一毛五，篾匠一毛五。剃头一、二、四乡每人每年谷子一斗，三乡每人每年一斗五，均吃老板的饭。铁匠二毛五。槽匠二乡十个钱打一斤油，三乡三个钱打一斤油，四乡打一担油（百斤）抽二斤，一乡产油少情形不明。三乡特贱，乃因油多。砻匠，每座砻六毛，三工打一座。棕匠二毛二。石匠四毛半。画匠以画计，画豪绅地主的象，画神象。锡匠以锡器计。机匠夏布每丈一毛，春布每丈也是一毛（夏布即麻布，春布八成麻二成棉），木区无织棉布的。银匠以银器计，"吃冤枉很大"。染匠不明。漆匠，以件数计。窑匠也以件数计。纸匠一毛五（做皮纸，只第三乡有）。

过去木、泥、缝、篾四匠每年多的做二百工，少的百把工。革命后，泥匠、缝匠做工日子大减，大概一年只能做几十工了。木、篾二匠仅比过去稍为少做一点，差不很多。剃头比过去发达，因为女子都剪发了。革命后，锡匠，画匠，漆匠，纸匠都不见，因为用不着他们了（纸匠是做喜爆引线的，喜爆不用，纸匠不要了）。

"上头的命令"，是手工工人分半田，但手工工人要求分全田。理由是失业的失业，工作减少的工作减少，并且靠不稳，只有分田才靠得稳。农民说："上头命令，你

们分半田。”工人说：“分半田就要涨工价。”农民不愿工价涨，因为贫农雇农分了田要做农具，须请工，富农中农原来已有农具，无须请工，只有贫农特别须要请工，因此他们不愿涨工价。贫农说：“好，你们就分田，不要涨工价。”工人并且说，分田之后，若每年还做得一百工，他们愿每年交还两石谷子于公家都可以。剃头工不分田，因为剃头工长日在人家，吃人家的饭。赣县工人分了田减了工资，木匠、泥匠原二毛，减到一毛五，篾匠原一毛五减到一毛二。

手工工人有老婆的百分之七十，没有的百分之三十。革命后，原先没有的，现在多数“由”到了。因为手工工人熟人多，又有一门手艺，又较聪明，又会说话，又有许多识字的，在这些点上均比雇农强些。

手工工人，区有总工会，乡有分工会，村有支部，譬如第一乡之凌源有各业工人共二十多人，合共组织一个支部。

乡村手工工人，总是兼耕田。以工为专业，完全不耕田的，百人中找不出十个。

手工工人百分之八十是欠债的。

七　商　人

本区商人的种类：开油盐杂货店的，卖米果的（又分几十种），开茶店的，开酒饭店的，开屠坊的，作豆腐的，开鸦片烟馆的。本区不兼耕田专门开小商店的占全人口百分之三（百家中有三家）。

本区四个乡中，过去只有三家五百元本钱的小商人，均在永丰圩，别乡没有。全区小商店：第一乡五家，第二乡三十五家（均在永丰圩）。第三乡六家，第四乡没有，共计四十六家。四十六家小商店中，本钱五百元的四家（三家在永丰圩，其中一家是药店，樟树人开的，二家是洋货店，兴国城分来的，均不是本区的地主，革命起，均跑了，店没收，货给贫民。一家在山坑，是本乡的地主，全家跑了，店封）。四百元的一家（在山坑，杂货店，两股合伙，一股韩礼陶，耕田二十石谷，一股韩礼东，耕田六十石谷，革命后，韩礼陶跑了，韩礼东混入革命，做政府土地科长，现被人咬为ＡＢ团，押在区政府），三百元的三家（均在永丰圩，两家杂货布匹店，兴国城人开的，均反革命，跑了，店改开茶馆；一家屠坊，兼有六十石谷田，参加革命，继续开店，当村政府主席，老实人），一百元的两家（山坑一家，杂货兼客栈，没有田，反革命，人杀了，店倒；西江一家，杂货店兼打银器，耕田数十石谷，不反革命，店在开），五十元的两家（在第三乡。竹坑一家药店，有田二十石谷，不反革命，现仍开；上颈岬一家药店，也有田，反革命，跑了，店倒），二十元的二十四家（第一乡四家，两家在五娘庙，两家在焦田江，第二乡二十家，均在永丰圩），十元的十家（第二乡九家，均在永丰圩，第三乡一家，在骑岭隘）。以上是以小商店为专业，不兼营别业的。

乡村中以农为主，商为辅的（八成靠农，二成靠商）很多，约占全部人家的百分之四十（百家中四十家）。这种人多数是贫农，少数是中农，因为生活不够，做点肩挑生意补足生活，如到江口，到赣州，到湖口面，挑盐回，去时多少带点油，做本钱。挑鸡子到嘉应州（即梅县）去卖，带点盐回的也有许多。

本区商人本钱五十元以上的共十二家，其中九家反革命，三家不反革命。

资本五十元以上的十二家商店中，只有五百元资本的四家雇了店员，其中三家各雇

店员一名，一家雇两名，其他八家均未雇店员。

二十元以下的三十四家，名叫商店，实是贫民，因此他们中间没有反革命的，店均在开。

本钱二十元及十元的三十四家所谓“商店”中，职业别如下：

客栈九家（第一乡四家，第二乡五家，均在永丰圩）

烟馆四家

糖果两家

屠坊四家

米铺四家

木器一家

铁匠一家

杂货四家（以上均在永丰圩）

茶馆五家（四家永丰圩，一家第三乡）

这回分田，商人本钱五十元以上的，除杀了跑了的不算，未杀未跑但店封闭或倒歇的，均分了田。不反革命店仍在开的，只有三家。一家是永丰圩三百元本钱的屠坊，因为向他写了二百二十元的捐款，只剩八十元本了，十五个人吃饭，不反革命。他原有六十石谷，此次分田，店主陈少林分一半田，家里十四个人分全田，因此除原有外，还分进了一些。陈少林的老弟陈少英在三军（原二团）当连长，所以他家也革命，少林当村政府主席。一家是竹坑五十元本钱的药店，也是店主分半田，家人分全田。一家是西江一百元本钱的杂货银器店，不反革命，乡政府写了他的捐（数目不明），分田店主本人分半田，家人分全田。此外那三十四家贫民小店，第一乡四家客栈，第三乡一家茶馆，因为历来没有好多生意，过去生活大部分靠耕田维持，故此次分田，不论店主家人，一概分全份。但永丰圩的二十九家，过去专做小生意营生，没有田地。革命后除烟馆四家倒闭外，其余糖果、屠坊、米铺、木器、铁匠、杂货、茶馆、客栈等二十五家不但依然存在，生意亦较过去没有减少。虽然如此，他们仍照章分了田，店主分半份，家人分全份。没有牛力农具，向亲戚借用。

总括上述情况看来，本钱五十元以上的商店（其实多数均是小商店），在革命中受了严重打击，是当地过左政策的结果。二十元十元的贫民小贩，则在革命中得到了很大的利益，除了分得田之外，应酬消耗减少，老婆容易讨，死了人不费钱财，政治上出了头，都是以贫农相同的。这种贫民小贩是与贫农同阶级的，因此他们所得的利益，也与贫农所得利益差不多。

八 游 民

本区游民有下列各种：

（一）赌钱的：全区约五十余人。第一乡约十人，第二乡约二十人，均在永丰圩，第三乡六人，第四乡约二十人。过去赌钱的十个有九个吃大烟，现在不吃了。本区五十多个赌钱的人中，没有一个反革命，听到打土豪分田地，心里十分喜欢。过去寒天没有衣穿，一身稀烂，现在穿得好了。过去有钱时吃鱼吃肉，无钱时饭都没有吃，现在虽没有好东西吃，饭却天天有吃。赌钱的十分之八没有家室。现在分了田，从亲房借牛力农

具用，赌钱的平日颇慷慨，因此现在容易借得东西。第一乡十人中有一个原先在第四乡政府当财政委员。他平素赌钱赌硬，有信用，革命后当财政委员当得很好。第二乡二十人中有下述四人在乡政府办事，"天上人"，在区政府当宣传部长，有房子，无家室，前年参加革命，被靖卫狗把房子烧了。陈滚同，前年即参加革命，在区政府当裁判，后当预备军第三连连长。杨大湖，前年即参加革命，今年二月革命当乡政府主席，当得好，后在区政府办事。陈少其，前年即参加革命，今年二月当本乡土地科长。第三乡六人中之雷永黄，有家室，赌钱卖烟，今年二月加入革命，在乡政府当财政科长，很忠实。

（二）讨饭的：即叫化子。第一乡四个，第二乡五个，第三乡四个，第四乡四个，共十七个，这是完全没有出路的，多半是无家室的孤单人。十七人中，只有四人有家室，这四人都是全家讨饭。现在分了田，从亲房借牛力农具用。革命后没有办事的。

（三）卖水烟的：第二乡二个，第四乡一个，共三个。第二乡的两个均有老婆有儿子，家里租了田耕，但本人不务正业，在赌博场中卖水烟。第四乡的一个没有家室，也没有耕田。现均分了田。革命后无办事的。

（四）打卦的：只第四乡一个，无家室，不耕田，专门打卦。分了田。

（五）挑观音的：第一乡一个。分了田。

（六）道士：第一乡三个。均有家室，不耕田，做佛事为业。第二乡二个，均无家室，不耕田。第三乡一个，有家室，耕了一些田。共计道士六个，均分了田。第二乡之曾云章，是个道士，前年即参加革命，无家室，无田地，今年二月当兴赣万游击总指挥，"顶有计划，会办事，用兵不曾败过"，现编入二十二军。

（七）和尚：第四乡二个，各住一个庵子，收租吃饭。高兴圩人，革命后回高兴圩去了，在高兴圩分了田。

（八）戏客子：唱木脑壳戏的。第三乡一个，有家室，耕了田，现在二十军当兵。第四乡二个，有家室，耕了田，在村政府办事。以上三个均分了田。

（九）算命的：第一乡一个，本人无妻子，但有兄弟，去年即参加革命，今年二月起在乡政府当宣传科长。第二乡二个，一个是瞎子，均有家室，耕了田，本人算命，这回分了田。瞎子陈信波，"有名的算命先生，有个知事请他算命算灵了，给了他十块钱"，因为他是瞎子，分田多分一倍，分十四石谷。第三乡四个，均有家室，三个耕了田，一个没有，本人算命，其中三个都在政府办事。一个叫曾庆龙，去年二月加入革命，"顶会说话"，今年六月当区政府土地科长，当得好。他原有几石谷田租给他的叔父，没有妻子。一个叫丘大阳，今年二月加入革命，没有田也没有家室，现在第三乡政府当裁判，很忠实。一个叫丘伯成，有几石谷田，有妻子，今年二月参加革命，现在乡政府当宣传员。算命的共十七个。

以上九种游民，共九十人，一般都是欢迎革命，不但没有一个反革命的，并且有十个参加区乡政府的指导工作，一个当了游击队的指挥员，这是很可以注意的。

游民在革命中得了很多利益。

九种以外，本区没有别的游民。

四　现在土地分配状况

一　分　田　地

第一、分田单位：四乡均以村为单位分配。因乡境大，山岭多，乡为单位去分，隔远了，不好耕。农民宁愿在本村分田少一点，不愿离了本村迁往别村。田少山多的村，每人少分点田，多分点山，田多山少的村，每人多分点田，少分点山，“也差不多”。

第二、分田方法：“上头的命令”，是三天分完。实际上，一乡、三乡均七天分完，二乡、四乡均八天分完（这样的时间太短促了）。

一乡十五个村，二乡、四乡均七个村，三乡八个村。分田的开头，区政府派宣传员到各村开民众大会，先半日通信来，召集民众。男人都到，女人不到，十岁以下小孩子不到。宣传员当众讲说焚契分田的好处和办法。一个宣传员每天可以召集两个村的民众会。那时各村开的民众会，到会群众的感觉是：“讲是讲得好，不晓得章程稳得稳不得。”有的说：“字章（即契约）烧了，债不要还了。分田搭便（托福之意）红军好是好，恐怕靠不住。现在分田，恐怕还要还租。”在民众大会中，举出村政府主席一人，秘书一人，财政科长一人，土地科长一人，干事二人，组织科长一人，宣传科长一人，粮食科长一人，军事科长一人，交通一人。第一乡杨坊村政府，是今年阴历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开民众大会选举的。宣传员往别村去了，民众（全村男女老少百八十多人，本日到会六七十人）散去吃午饭。下午又来，村政府召集他们开会。村政府主席钟恩明（是个独立劳动者，无田，做厨子，作豆腐卖，别处做戏他做米果去卖），这天当大会的主席。议决事项如下：

1. 向富裕之家写款子，作村政府用费，财政科负责。
2. 全村谷子阻止出境，粮食科负责。
3. 集中全村武器，军事科负责。
4. 调查土地，举行分配，土地科负责。

二十六日起至二十九日，共四天，为调查土地时间。土地科长傅济庭（即这次到调查会的一人），率领土地干事钟恩生，钟恩仁（均贫农），会同四个组长（全村分为四组，每十家为一组），实行按家看田，某家某处有若干谷田，记上册子。四天调查完毕，知道共有若干谷田。把全村人口一除，得出每人应得田数。三月初一日再召集民众大会，当众逐一报告，某家有田若干，有人若干，全村共有田数，和每人应得田数。当有傅化龙（有二百三十石谷田，均自耕，十个人吃饭，欠债三百多元，请一个看牛工，有一个大水牛。他的田都是歹田，实只能收百四十多石，十个人吃，有一半多余，还债利并量退脚田（一部分）的租，要去四十多石，剩得三十石左右，是个略有多余的中农）、钟先惠（七十多石谷田，均自耕，三个人吃饭，过去有钱放债，去年起房子用掉了，每年请半年长工，每年吃谷之外有三十多石剩余，也是个中农。他有五兄弟，分了家，除他外，一个够食，三个很苦）二人，说调查不公平，报多了他们的田。在场数十个贫农、雇农、工人齐说傅、钟二人的话讲得不对，土地科的调查并没有错。在场尚有三家富农，都听众处置，不作一声。大家承认调查结果，当即把某家要“铲出”若干给

某家，某家要“铲进”若干从某家取得。要铲出的人家，铲出什么部分由他自己作主，因此他就把坏的部分交出去。这时因斗争尚不深入，得田的人得了坏田，已经是意外欢喜，并不要求好田。这一天的会，就是做的“抽多补少”的工作，分完了，村政府秘书把册子造出来，也不要张贴。从二月二十五日到三月初一日，七天工夫，把田分完。

分完了，“即刻过耕”，或“秋天过耕”，又成了贫农与富农的斗争。本区各乡二月底分田时，已经下种，尚未插秧，正在犁田时候，大多数都即刻过耕了。但亦有一些富农想要再看风色，希望靖卫团回来田分不成，他们就对贫农说：我已下肥了，犁田了，今年不要过耕，让我耕到收获时再过耕，收获了分四成给你。贫农有些接受富农的主张，以为坐得四成也是好事。有些雇农及工人亦实在无法马上接田来耕，因此全区共有约百分之十，用“分四成”办法，没有即刻过耕。

二 分 山 林

二月底三月初分了田，五月底才分山。

杨坊村是五月二十七日起始分山，上头的命令是这时候才到的（注意：上头命令的作用是怎样的大）。五月二十七日，乡政府派了一个宣传员刘大伦（知识分子，工作热烈，但八月十七日发觉他是ＡＢ团的秘书，区政府把他杀了，这一天杀了ＡＢ团十一人，象刘大伦这种人恐怕是杀错了）来本村，又开民众大会，宣传分山办法，新举出七个土地干事，决定分山。这天宣传员又报告了贫民借贷所一件事，议决照办。

分山比分田更困难，有大山，有小山，有柴火多，有柴火少，有大树的，有小树的，有无树的，因此难分，土地科长和七个土地干事，一道出发，踏看全村各山，定出个办法，不照山的面积分，照山的茶子树分，以一担“桃”（一担茶子，值钱两串，叫做一担桃）为标准，大树三十根为一担桃，中树六十根为一担桃，小树百二十根为一担桃。把全村山地算成桃数，然后按人口平均分配，插牌子为界。本村分四天才分清楚。土地科八个人有权决定分配，“不能由各人讲，倘由各人随便讲，那就扯不清”。

第三乡长窖村，土地科五个人（一个科长四个干事），村政府发下二元一毛伙食钱，分了三十多天才分清楚，“可见难分”。

山虽分了，树木只准砍树枝，不准砍树身，要砍树身须经政府批准。

三 分 池 塘

以村为单位，按照池塘大小，分组放鱼，大塘五家为一组放，小塘三家为一组放。一组对于一塘，各家同时同数放鱼，打鱼时候照数平分。本区池塘的水多是不靠他阴禾的，因此只有鱼的问题，没有水的问题。鱼塘之外，亦有少数山塘靠了塘水阴禾的。山塘放得鱼的，照上法分配。放不得鱼的，跟着田走，田归那个，塘归那个。

革命前放的鱼，归原放鱼人得，不分。今年冬天干塘，原主捉了鱼去，新主才好放鱼。

四 分 房 屋

依理，房屋以分为好。贫农十多个人一家只有两三间房子的，不少。一般说来，贫农百分之六十房子不够住，好房子都是富农占了。贫农纷纷说要分房子，政府就说：“上

头无公事”，贫农因此也不敢去住富农的房子。杨坊村开会时，贫农要求分房子，土地科长说：“房子多的应拿出一些给房子少的住”，但未作决议，富农不肯让，贫农也不敢住（可见“上头公事”之重要）。

分房子应该以村为单位，毗连的人家，房多的分与房少的。

本区只有地主、富农、奸商之因反动被杀或被驱逐的，他们的房子如未烧掉（烧掉是不对的），就有了贫农去住，但亦不曾正式的分与谁。未杀未跑的，即使有很多剩余房子，也不曾分。

被烧的反革命地主、富农的房子（游击队烧的），一乡一个，二乡二个，三乡五个，四乡四个，共有十二个。内中三个地主，九个富农。被烧的革命工农的房子（反革命烧的），一乡没有，二乡七个，三乡八个，四乡八个，共二十三个。内中农一个，贫农二十个，小商人一个，流氓一个。

五 公 田

二月分田，留了公田，各乡各村都留了。一乡杨坊村留了十多石谷，茶干村留了三十多石谷，二乡指阁村留了十二石谷，三乡长窖村因田少还有十六个人没有分到田，故不曾留，别的村都留了，四乡候径村留了百多石谷田，都是遭水患的。为什么要留公田？一是分余尾数不便分配，所以留了。譬如每人分七石，余十多石，拿来分，每人分一桶不够，不好分，就留下作公田，二是作政府用费，三是为了明年生儿子要分田。八月重分，因上头有公事要彻底分配，把公田也分了。

其实公田还是不留的好，第一有生的也有死的，生儿子不怕无田。第二，收土地税，政府有了钱用，不必靠公田作用费。并且照二月的例，留下来的都是坏田，无大用处。所以不如一概分了，农民多得利益的好。

六 分田数量

各村各村不同。如第一乡杨坊村，每人分五石六斗（二月分八石，实只能收五石六斗），茶干村每人分八石。第二乡指阁村每人分七石。第三乡长窖村，二月八月不同，二月间，本村分田数量有四种，有分七石的，有分六石半的，有分五石半的，有分四石一桶的，以姓为单位分，因为田多的姓不肯分出田来与田少的姓：到了八月，才以村为单位分，每人分六石。第四乡候径村，二月每人分八石半，八月重分，把坏田名出二石实出一石的只作一石算，外边又有人回来，每人只分七石半。

兴国每年只耕一道，照上述分田数量，老幼扯匀，勉强够食。添上种杂粮，供猪子，油盐布匹杂用也有了。

本区杂粮的大宗，就是番薯，平均占全部人口食粮的四成。分别来说，第一乡较少，因为土不起番薯，十成中只吃二成。第二乡和第三乡就大不相同，平均十成中要吃五成，多的吃到七成，一年到头都是饭里夹着番薯丝吃。第四乡平均吃番薯四成。

五 土 地 税

名曰“公益费”，八月初间（阴历）已经收了。分六石谷田的收百分之一（每人六

升），分七石的收百分之一·五（斗半），分八石的收百分之二·五（二斗），分九石的收百分之三·五（三斗一升半）。本区没有分九石的，故本区公益费的最高额是百分之二·五。第一乡杨坊村一百八十多人，每人分田八石（照二月分田的数目），照百分之二·五抽收，共收去三十六石四斗。茶干村三百九十七人，每人分田八石，共收去七十九石四斗。第三乡长窖村每人分田五石半，不收税（上了六石的才收税）。全区本年大概能收税一千石左右。

八月收税，多数还存在各村，一部分送到乡政府去了，没有送到区政府去的。八月收税时，县政府的公事，愿出谷子的出谷子，愿折钱的折钱，折钱以三十文折一斤谷子，当时市价只有二十文，故农民没有愿出钱的。

初收公益费时，约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赞成，办事人到他们家里，他们说："前头说抗租抗税，现又收起税来了。"收公益费时，上头的命令来得很紧，限三天将谷子交到乡政府去，乡政府召集了各村土地科长开了一个会，第一乡分为九个赤卫大队，每大队去了一个人，都是土地科长，议决要各村负责人开会，会完即收公益费，未曾开民众大会。收费时以大队为单位，如第八大队是杨坊、凌源、梨垇三村共合组织的，由大队长、土地科长，三个中队长，九个分队长，分往三个村，挨户征收(每个中队为一村)。到那一家量完了，称一称；九十斤为一石，由那一家派人送往乡政府。本大队共收公益费差不多四百石谷。第一乡茶干村先两天发信与各家，要他们送公益费到公仓去，到期各家纷纷挑了谷子送到公仓（即过去的义仓），由本乡的负责人（五个）领收，不到一天工夫就收齐了，一共收了七十多石谷子。事先说，那一家当天不把公益费送来时，五个负责人当天的伙食费就要那一家出，大家怕出这笔钱，所以很快的送去了。

六 苏 维 埃

一 区 政 府

区政府委员（二月至六月的）：

主席刘绍彪（二乡人，过去不耕田，学打手，略识字，做裁缝，后不做裁缝了，赌钱为业，前年参加革命，屋被靖卫团烧了，七月后换了主席，他当裁判）。

军事萧志春（二乡人，不耕田，贩鸡子走广东，赌钱，守祠堂，自己没房子，不大识字，前年参加革命。七月后当区政府主席）。

财政侯礼辛（二乡人，裁缝，识字，七月后当区工会委员长）。

组织刘绍明（二乡人，医生，不做别的职业，过去家境好，后来四兄弟分家，他做医生，欠了债，前年参加革命，屋被靖卫团烧了。七月后当财政）。

宣传邹利三（赣县人，富农，六兄弟，中学毕业，当宣传科长，七月后去赣县）。

王振仁（二乡人，绰号天上人，无业，赌钱吃饭，前年加入革命，房子被靖卫团烧了，七月后仍当宣传）。

方功署（十一区人，是个读书人，职业不明，屋被靖卫团烧了，七月后回十一区去了）。

萧志城（二乡人，赌钱为业，略识字，前年加入革命，受过靖卫团的打击，七月后

仍在区府，不知做何事）。

陈昉宝（二乡人，裁缝，兼赌钱，不识字，前年加入革命，八月以ＡＢ团嫌疑被押）。

裁判曾礼邦（二乡人，是个道士，无他业，家境苦，前年加入革命，后做兴赣万游击总指挥，现编入第二十二军）。

文化邹丽东（二乡人，过去有六百谷，读书读掉了，剩百多谷，欠三百多元债，是个破产的大地主，他是大学毕业，去年加入革命，七月改组仍当文化）。

秘书长谢应山（县城人，读书人，五十岁了，七月改组仍当秘书长）。

少队政治委员萧少文（二乡人，赌钱为业，略识字，前年参加革命，七月改组去赣西南）。

少队指导员徐昌函（一乡人，富农，本身是个"毕业生"，去年游击队写了他的款子，他就参加革命，八月以ＡＢ团嫌疑被押）。

黄贯（读书人，历史不明，七月改组后行动亦不明）。

陈衮同（二乡人，父亲当土棍，死了，本人是个中农，兼赌钱，不识字，前年参加革命，靖卫团把他的田充公，七月改组仍在区府）。

杨达成（二乡人，过去做裁缝，后来赌钱为业，前年加入革命，略识字，七月改组后在二乡政府当宣传）。

妇女刘超英（一乡人，劳动妇女，不识字，七月改组后去赣西南）。

以上十八个人，赌钱为业六人（其中两个原先是裁缝），裁缝兼赌钱一人，纯粹裁缝一人，医生一人，道士一人，破产大地主一人，富农二人，中农一人，不明家世的读书人三人，不明家世的劳动妇女一人。

以上十八个人中，以刘绍彪、萧志春、刘绍时、王振仁、谢应山、陈衮同、邹丽东、曾礼邦八个人最能话事，最有权。

区政府设在永丰圩。

二月到九月开过二十多次全区民众大会，全区代表大会开过两次（各村开民众大会选举代表）。全区民众大会六月前开得少，六月后斗争深入，开得很多。四月以后，女人及小孩都参加民众大会了。

二 乡 政 府

举第一乡乡政府为例：

主席谢金明（贫农兼挑脚，自己有极少的田）

财政钟国春（中农）

军事杨廷荣（贫农，自己有极少的田）

宣传谢忠楷（贫农，自己有田，但欠债）

谢忠梅（自己有田，本人耕田，兼上广东，是个中农）

谢华焕（富农，本人兴国县立学校毕业）

陈方波（贫农，耕别人田，本人算命）

秘书易永洪（父亲剃头。贫苦，本人读书）

裁判陈玉书（莲塘人，是个读了书的）

土地傅济庭（贫农）

以上十个人中，六个贫农，两个中农，一个富农，一个外边来的读书人。

乡开的民众大会比较区开的少得多，不上十次。四月以前妇女小孩都不参加，四月以后便参加了。

乡的代表大会开过六七次，每乡每次三四十人，每村一个至两个代表，接近乡政府之村有些非代表的人来参加，每回开三四点钟，到会代表讲话的尚多，主席临时推举。

三　村政府

二月到五月有村政府，分田时候实在需要村政府，田分完了，村政府可以不要了。并且立起来又没钱用——即使不要伙食，办公费多少要一点。革命深入之后，分了田，十家一组编了组，又有了赤卫大队，不要村政府也可以了。

四　政府人员的弊病

第一、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群众有人走到政府里去问他们的事情时，政府办事人欢喜呢，答他们一两句，不欢喜呢，理也不理，还要说他们“吵乱子”。

第二、是没收了反动派的东西，不发与贫民，拿了卖钱，向政府里头讲不起话的买不到手，有情面讲得起几句话的才买得到。并且既然出卖，就要比较有钱的人才能买到，雇农及极穷贫农当然无份。

第三、是调女子到政府办事。乡政府总有一个二个女子，区政府总有三个四个女子，女子办事是好的，但政府的取舍不对，生得不好看，会说话会办事的也不要，生得好看，不会说话不会办事的也要她。乡政府的人下村开会时，也是一样，漂亮的女子他就和她讲话，不漂亮的，话也不和她讲。

第四、这是最大的一项，就是强奸民意。政府委员由少数人定了就是，代表大会选举只是形式。有一次主席说赞成某人的举手，有些人不举手，主席就指不举手的说他是ＡＢ团，有一次主席对不举手的怒目诘问为什么不举手。再有，就是一定要共产党员才能在政府办事，不是共产党员，即使是群众领袖，也不能到政府办事（我向到会人说：这些坏事是土地革命初期的状况，原因之一是区政府成份不大好，将来都要改变的，这些坏事是不对的）。

七　农村军事化

一　赤卫队

第一乡九个大队，第二乡三个大队，第三乡四个大队，第四乡四个大队。编制法：八人至十五人为一分队，三分队为一中队，三中队为一大队，本区各乡通常是八九十个人一个大队。例如第一乡的第八大队，是由杨坊的第一中队，凌源的第二中队，梨垇的第三中队编成的，共有九十多人。

赤卫队年龄二十三岁以上，五十岁以下。

赤卫队都是男子。

初来，分为常备赤卫队，预备赤卫队两种；后来，合而为一，不分常备预备。

任务：是天天夜夜放哨，村村有哨，每村的总路口必定有个哨棚。普通时候，白天童团和少队放哨，章程上规定五个人一天，两个女童团，两个男童团，一个查哨的是少队。少队要是识字的，要看得清通行证，不论什么人通过，甲村过乙村都要通行证，夜间放哨则归赤卫队，普通四人一夜，二人一班，一班上半夜，一班下半夜。若环境紧张时（如七月七坊靖卫狗打到均村附近时），白天夜晚都归赤卫队放哨，并且人数特别加多，白天虽仍只四、五人，晚上便要十多人，甚至二十多人。

赤卫队每大队设大队长，要是本乡最努力而且多少懂得一点军事的人，政治委员一人，要本乡最努力而且看得通公文的。

赤卫队早先要下操，七月编了红军预备队，便不下操了。

赤卫队分男赤卫队，女赤卫队，例如第一乡杨坊、凌源、梨垇三村合组的第八大队，有男赤卫第八大队与女赤卫第八大队两种。女赤卫队年龄与男队相同，但人数较少，因为女子比男子少，又除去孕妇，除去乳母，普通每队便只有四十人（第二乡第三大队）、五十人（第一乡第八大队，第三乡第三大队）。也有少于四十人的,也有多于五十人的。女赤卫队平时不担负放哨。紧急时男赤卫队出发（出发战斗叫做“出发”）去了，女赤卫队便也担任放哨。女赤卫队也要下操，每月一次，每次两三点钟，队长政治委员都是女子。操时男赤卫队派人去教操。男赤卫队自六月把精壮分子编入红军预备队后，剩下都是老弱的，每队有只留十多人的，二十人的，三十人的不等，以后便不下操了。男赤卫队每乡有一个乡队长，一个乡政治委员，两人不常住乡政府，住在他们自己家里头，有事调他们去，他们就去。全乡下操时，他们也要到。各乡赤队共下过两次全乡操。

二　少年先锋队

凡有一个赤卫大队的地方，就有一个少队，不分男女，年龄十六至二十三岁。有大队长，政治委员。每大队分三个中队，每中队分三个分队。惟人数较赤队少，每队有二十人的（二乡指阁），三十人的（三乡长窖），五六十人的（一乡杨坊等三村）。二十人三十人的都叫做中队，五六十人的便叫做大队了。六月起，挑选勇敢分子编入红军预备队及区特务营。剩下的少队仍然要下操，一个月下两次。只有男赤队，自从把勇敢精壮分子编入红军预备队后，便不下操了。

少队自编入红军预备队及区特务营之后，剩下的没有几多人了，有的简直没有少队了（如一乡洋坊等三村，二乡指阁）。

三　童子团

不分男女，年龄八岁至十五岁。

有一个赤队及少队的地方，就有一个劳动童子团。每村一个团长，乡无团长，区有团长。

童团的工作：第一是放哨，第二是检查烟赌，第三是破除迷信打菩萨。童团查烟赌打菩萨很厉害，完全不讲人情，“真正公事公办”。开民众大会，他们也要去。他们的武器主要是木枪，也有几枝梭标杂在其中。

童团的团员都是在人民学校读书。人民学校是七月办起来的，第一乡五个，第二乡三个，第三乡七个，第四乡一个，共十六个，区政府规定每乡三个，出三个教员的伙食费，每天大洋一角，每月零用钱大洋二元，共计每月大洋五元。因第一乡地宽，准办五个。第三乡山多，三个不够，自己加办四个，共七个，但用费仍只十五元，平均每校分得两元零一点。人民学校学生少的二十多人，多的到百二十人，普通四十多人。如第一乡杨坊、凌源、梨坰三村合立的人民学校，八岁至十五岁的儿童有百二十多人，房子住不下，一个教员教不了，因此有许多人尚未读书，百二十人中只有六十人左右在读。本来三村想办三个人民学校的，因本村无教员，请外村的又无给养，故不能办三个。三乡竹兆安村的学校，学生只有二十一个人。

平民夜学校村村都有，每校有一教员，村中稍识文字者充之，不要给养，教员白天在家做自己的事情，夜间去贫民夜学上课。杨坊的傅济庭，长窖的钟得五，都是教员。学生多少不一。杨坊的有四十人。年龄不定，老的壮的少的都有。多数夜学有女子参加，占全额三分之一。也有无女子的，如一乡的茶干村，四乡的候径村都无女子参加平民夜学，童团每个星期下三操，都在人民学校指导之下，“操得很好”。

四 纠察队

工人组织纠察队，每乡一连，一个连长，一个政治委员。第二乡的纠察队有百零五个人。第一乡杨坊、凌源、梨坰、茶石（即茶干）四村共有一排，二十六个人。

五 红军预备队

从赤队、少队两个组织中挑选精壮勇敢分子组成的。每乡二连，全区八连，每连人数几十个到百多个。第一乡的二连，每连有百零几人。此次到新喻，第十区的第八连人都到了。七月编成预备队后，打七坊、打浪川、打赣州，及此次出发新喻，都归预备队负担。预备队出外，乡村放哨由赤队、少队、童团担负。预备队回来，又帮同放哨。全区八连人组织一团，有团长，团政治委员，平时没有营之设置。一乡是第一、二连，二乡是第三、四连，三乡是第五、六连，四乡是第七、八连。此次出发新喻编成三营，一、二、三连为第一营，四、五、六连为第二营，七、八连为第三营，有营长营政治委员。连上有挑夫四人，伙夫八人，传令兵一人到两人，勤务兵一人，号兵一人(不会吹号)，没有马。每连有两个宣传员，口讲，手写标语。营部无宣传员，无副官，无传令兵。团部有宣传员三人，副官一人，传令兵二人。三个营部跟团部住一起，共吃伙食。武器是梭标鸟枪。

六 区特务营

三个连，七月起编的，也是由赤队、少队挑选编成。选择赤队、少队中更年青勇敢的分子编入，比预备队好。有编制，有训练，但不经常集中，平时仍在家中做自己的工。每月集中下大操三次，时间是初二、十二、二十二。有事调集出发打仗。现在一、三两个连出发打浪川去了，二连在家未动。器械主要是鸟枪、土造来福枪、土造大炮，没有快枪，略有一点梭标。营部和区政府在一起，有营长，营政治委员。

七　红军独立团

兴国全县一共编过三个独立团，都送给红军了。也是由赤队，少队挑选出，成份与特务营一样好，都是青年，并且是志愿兵。

每团人数一千多。团营连都有长，有政治委员，在县城集中训练，听候调遣编入红军。一概徒手无武器。

中央给龙兄及前委诸同志的信

——关于暴动游击战争党群组织与政治形势及今后出路——

（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七日）

龙兄及前委诸同志：

去年年底，卢冬生同志来，得到你们的报告，当即□□□□□□答复，并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政治路线，目前革命的形式，以及游击战争□□□□□□们，信系由冬生同志带回去的，想现在已经（注：原件以下缺一行）

兹又得你们去年旧历十二月初七日信，得悉□□□□□□□□老及士兵忍饥耐寒的作了英勇的武装斗争，□□□□□□群众，并夺取了敌人许多武装，肃清一些□□□□□□□□□□□□□都是对的。

但根据你们这次的来信，中央尚有下列的指示：

（一）暴动问题。你们来信历举几次暴动的事实，但六次大会对于我们过去乱用“暴动”□□□□□□□□无动不暴的错误观点，已有一个纠正。□□□□□□革命斗争发展到了高峰的一种群众武装□□□□级夺取政权的直接行动。现在□□□□□□□□□□□没有一种直接革命的形势，故工农兵士贫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前乃成为宣传的口号。在农村斗争中□□□□□自然不能说没有从日常生活斗争发展到武装斗争，以致暴动推翻豪绅政权，建立农村苏维埃政权的可能和事实。海陆丰、琼崖、万安、黄安、醴陵等等，苏维埃虽然失败了，但土地革命在农村中的□□□□与深入，仍然使农民有由日常生活斗争走到武装暴动。□□需要，故农民暴动的直接行动，我们不但不应加以阻止，且应对于农民自发的暴动极力□□□指导。农民的武装斗争极力加以扩大，使群众对于推翻豪绅乡村统治，建立农村苏维埃的观念。日益明了与热望其实现。并更使这一行动能渐渐与城市工作配合起来，能得到城市的领导。这样的农民暴动才真正是群众创造的，才较易持久。而发动和影响更广大的群众来拥护，才能从群众的直接行动中，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才不致使政权是建立在枪杆上加增群众等待依靠武装的错误观念。

假使你们所领导的群众斗争，统治乡村的豪绅地主还没到恐慌动摇的时候，还有大批武装力量来镇压你们，群众斗争还没有转变到没收地主土地的要求，还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微小要求，甚至还没有做抗债抗租抗粮的行动，群众的发动亦不广大，则这种斗争，便是有了武装冲突仍然是一个游击战争的局面，还不是建立农民乡村政权的武装暴动，你们应分别认清。

（二）游击战争。在你们的建始与鹤峰两次战争经过看来，你们发展了群众，杀戮了豪绅，收缴了反动民团警察的枪枝，这些都是合符游击战争的原则的。不过游击战争

最重要的是要有组织性，要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过去各处的游击战争发生过□□□□不好的倾向，及今后尚易犯而应注意者，第一脱离群众，使群众完全不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是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第二毁灭城市及无目的的大烧大杀大抢的倾向；这种倾向是一种游民无产阶级的心理之反映。足以妨碍党在一般群众中，甚至工人群众中的影响的发展，对此在党内必应极力肃清这种不正确的观念。当然农民群众消灭地主豪绅削弱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党当积极去领导。党所反对的是□□□和总的任务不相关和不是革命真正利益□□□□散漫，缺乏组织，至于游击战争主要的任务，是实现农民的口号，削弱反动派的力量及建立红军，这些当然是你们能够了解，而□正在进行的。至关于没收土地问题，□□□□□切土地的口号，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点你们在工作中亦须注意。关于游击战争问题，上次信中已写给你们了许多，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关系你们重要，所以此次又重新提及。

（三）游击区域内党的组织与群众的组织问题，是我们游击队势力所达到的区域，自然必须发展党的组织，扩大群众的组织，推动并帮助群众的斗争，扩大我们的宣传。不过在这革命空气紧张的时候，很容易把一切组织公开而不保留一部分的秘密，及至游击队一走一切组织随之瓦解，甚至一切革命的群众，都要牺牲于清乡军的白色恐怖之下。这无异自己向敌人告密。过去有许多地方的游击战争都犯过这种错误，所以你们必须特别注意。无论游击□□□□□□□必须告知当地党部及当地的革命群众的组织，□□□□存秘密预备在红色势力被白色恐怖压迫□□□继续工作。

（四）游击队中党的组织问题，及训练问题。你们前委之一□□□组织一支部管理全军党的组织，只要工作上感觉方便□□□□不可以的。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一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人说，这个组织感觉很好，你们将来部队□□□党时，这个□□□可以备你们的参考，此外尚应注意者，虽然□红军中有组织□□□□□□保存组织上的秘密性。至于训练问题，党的训练是加紧军队纪律的□□□纪律也是帮助军队纪律无碍的执行。自然红军的军事训练，不能同军阀军队的方式□□□和机械的军事纪律在党员以身作则为影响下级到全体兵士的□□□。因为这样，党的训练应多带教育性，发展党员的自觉性，比较明了□□的同志，应在思想上能□□□□□□□□同志，使一般同志咸能注意自觉的遵守纪律。党训练同志、教育同志应用很浅近的理论，很容易明白的事实，提高他们的□□□□阶级意识，增进他们的革命情绪，使之不但自己严格地遵守军队纪律，还能成为士兵的模范。对于□□□□□□□□所云，杨是犯了不少的错误，你们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是对的，不过以后训练同志，应特别注意教育方法一点。

（五）目前政治局面及你们今后的出路问题。目前反动的政治局面，是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冲突，由酝酿而加紧而准备更大的破裂——军阀战争，在不久以前，他们曾召集一个编遣会议，谋得表面上暂时的虚伪和平，但是没有能解决其根本矛盾。编遣会议后，桂系仍然采取反攻的形式，武汉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湖南之鲁涤平赶走，并向江西进逼，因之迫得资产阶级也同样遣兵调将准备开火。但终因目前资产阶级及美帝国主义，还需要这个虚伪的和平局面，以扩大他的统治影响，而英帝国主义的桂系在军事上也还不能采很大的胜利，故现时的情势又更加缓和，因国民党三代会也开会，

关于这一个政治的详细情形，及我们应付的策略，中央有两个政治通告，兹另抄录寄上，此地不多说。在这个政局之下，虽然可与你们一个很好发展的机会，不过你们的实力还很微弱，同时湘西鄂西一带党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都太没有基础，此时欲图大大的发展亦尚困难，□□□们来信说，红军拟向下游发展，将来湘西之常德或鄂西□□□为目的地，这种计划还太于扩大而不切实。目前所应注意者，还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而是在乡村中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故你们此时的主要任务还是在游击区域之扩大，群众发动之广大，决不应超越主观的力量（主要的还是群众的力量，不应只看见武装力量），而立刻企图占领中心工商业的城市。

（六）发展的区域问题。鄂西湘西发展区域，究竟以何处为最好，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对湘西鄂西的实际情形尚不十分明了，不能具体的答复，不过在原则上说，游击战争发展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到了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不过这些条件很难俱备，你们可斟酌实际环境，取这些条件应多方面选择。

（七）关于派遣军事人才问题。你们军事人才缺乏，我们亦久想多派军事□□同志到你们那边来工作，不过因为交通的阻碍，而你们的驻防地又无一定，不好派向何方找，所以尚未派人来，以后有可能时，自然可以多派些人前来。

另抄附三十号及三十三号通告各一纸。

中　　央

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

（一九二九年旧历八月八日）

中央：

董朗同志于阴八月初到桑植接到中央六月十六的来信，敬悉一切，此间于八一纪念后曾送上万言的报告，系由向宜恒同志送交宜昌县委转上的，不卜中央已收到否？兹将月余以来工作报告于下：

1． 游击战争的经过和影响

自此报告发出后，湘西军事又形紧张，吴尚部开来常德，对我红军有一大布置，饬令湘西队伍和陈渠珍所部向桑植苏维埃区域取包围的形势，不过吴尚部开来湘西其任务不仅是要打击红军，对湘西队伍也要于以剿灭或收编，我们见到这点遂决定率红军向庸慈发展，以动摇敌人的战线，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争取湘西劳苦群众于党的周围，这一游击战争的经过和影响，是值得报告的。

一、西教乡的战——大庸熊相汇等共有枪三百支，是西教乡最大的土酋，握全乡政治的经济的特权，其本人是个最大的地主，与陈逆策勋和徐小桐等都有相当的结合，我们要向下游发展，若不将他们扑灭，可为桑植苏维埃之患，因此我们游击战争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扑灭熊族防以除后患。

除派二旅五团留于桑城外，大部红军均随云卿出发前方，阴七月初二由桑开动，初三与部接触，围攻敌寨主七日，大小十余战始将敌人击退，此次战争的经过有于下述：

A、敌人的布置——熊部在桥头飞塔坡、教子垭、坛子山、鸡爪岩、白马山等处，均筑有很坚固的寨子，尤以教子垭石寨为最难攻，在这个要寨地方，敌人均驻有团兵把守，以为抵御，所以敌人的兵力虽不很厚，战斗力虽不很强，但“强兵难打弱寨”，如没有飞机大炮，随使如何英勇的将士，都不容易把这样的寨子攻破的。

B、进击的情形——我军西路——一面由□□□云卿亲率大队由桥头向教子垭攻击前进，一由王炳南同志率二团由中湖飞塔坡前进，以作佯攻，初三日上午攻下桥头，同日围攻教子垭石寨，初四日拂晓，占领飞塔坡，即以全力攻取敌之主寨（教子垭），卒因石寨太坚防守太严未能攻下。

C、双方之悍战——我们初因不知西教乡有这样多的寨子，而且这样难攻，既至双方接触，又不便中途停战以损军威，遂下最大之决心，誓将敌寨攻下而后已。我因为占领了教字垭寨子对面的狮子岭，在地形上颇占优势，故用兵自如，既可以围敌寨复可以拒援兵，进占退守莫不顺利，同时得吴玉霖団（与云卿有旧好且系云卿旧部）庄××之

声援，使敌人更加胆寒，在围寨时，我军爬寨三次，均被石块枪弹击下不得入，敌之援队如熊海清陈策勋等亦死力救援数次，均被我军击溃，战争之烈确系红军成立以来所未有者。

D、敌人之逃走——围寨五日敌人粮尽援绝，恐慌异常，表示投降改编，但不愿缴枪，这自然我们不能同意，并饬各部严防敌人逃走，但事出意外，在初八日晚上，下大雨，举目不能见人，而我士兵因连日疲倦太甚，防范时有疏忽，致使敌人乘机潜逃，及至深夜攻寨时，寨内以无敌人踪迹了，真是可惜。

E、战争之影响——是役我军，牺牲官兵十八名，伤二十名，消耗子弹四千发，且未得敌人的枪弹，但在军事上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西教乡的寨子，从来没有人攻下过一次（吴玉霖吴□□等以全力攻寨数次都遭失败）。而我红军不过是一个刚满十二个月的婴儿，竟能克敌制胜，当然可使湘西一般队伍胆寒。

敌人的主寨既经攻破，其他小寨莫不迎刃而解，于是熊族各部遂被我军攻散了。为了补充子弹，恢复士兵疲劳，我们约在西教乡休息了一个星期。同时敌人又渐渐的集中起来，然而我们正要他们集中，才好一鼓击破，因为以我们的力量可以解除陈策勋熊抱琴等部。

二、慈利的游击——要使敌人大大的恐怖，要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要掀起湘西劳苦群众的革命情绪，只在大庸西教乡骚动一下是不够的，还要在九澧的重要区域——慈利——去作广大的游击战争，才能完成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我们红军休息的时候，陈熊各部均退据慈庸桑交界之处，（康三谷 池 峪 芳 花界一带）与慈利江垭团防徐小桐部均取联络（徐小桐和邢聋子两部只有枪八十余枝均驻江垭），我们若不先发制人，他们必为吴尚之前卫挺而来攻击我们。因此我们即于阴七月十九日分兵猛进，敌人闻风披靡，沿途均无战事，仅在江垭小有接触，徐熊邢陈遂即纷纷退却，而占重要位置的江商埠遂于阴历七月二十一入于红军之手了。

但是我们不是来割据江垭的，而是来骚动以骇退敌人的，当然我们不能久驻江垭，坐待敌人的包围，故红军只在江垭休息一天，于廿三日即进驻杉木桥，在这个时期中，一方面写信给周笃方（神兵），一方面写信给田少卿表示合作，共同奋斗，他们都有比较园满的答复，惜不愿在这风浪紧急的时候□□□□高树红旗致受敌人打击，虽然周田两部都是十二分对于土地革命毫无认识的，但他们俱为伪湖南省政府所不容，无论如何不致与红军为敌，如田少卿回信说，“若红军入石门愿让出防地”即可证明，惟当时退却了徐邢部尚未肃清，张晋武部盘据慈利县城，态度暗昧，距杉木桥仅五十里，吴尚部已抵桃源之盘塘桥，距慈利仅九十里，此外还有澧县李抱冰，石门之罗孝之，对我们的防堵，均十分严密，在这种情况之下，若红军深入敌境势必遭敌人的解（鄂西西万池游击的失败就是忽略了这一重要的战术），因此我们决定把红军开回桑植来，使敌人对我们用兵莫名其妙，而我们得以乘此时期加紧军事政治训练。总之，此间游击的加强，云卿以廿年施□队的经验，随机应变今后绝不致上敌人的大当。

三、游击期间留守的工作——在桑植县已有广大的群众起来拥护苏维埃政权，已有实行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之可能，当然我们对于留守桑植的工作要十分重视。

我们对于留卫的决定，是组织一留守委员会，以县委之李良耀，政府之汪毅夫，红军之谷海云三人负责，继因谷海云部与农民协会时有冲突，又调二团文南浦回防桑城，

把谷海云部之五团调到前方来，参加慈利的游击战争。从此桑植方面得以无障碍的惩治豪绅，进行没收地主的新谷等工作，虽然后方仅有长枪八九十枝，而革命的政权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仍在巩稳着。

惟有一点在红军到达慈境之后，桑方队伍，团防乘机骚动，尤以内四乡为最凶横，当时后方兵力单弱，保外四乡尚不够，自然无法顾及内四乡，长此下去，这一般队伍团防，势必逼近桑城，来危害革命的政权，故巩固桑植的政权，保障已得的胜利，也是红军围桑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游击战争中，我们虽未得着什么，而动摇了敌人的战线，使敌人暂时不敢打击我们，扩大了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宣言，吸收了一些农民分子加入红军，这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有重大的意义。

至于在游击战争期内的宣传工作，无不尽力去做，文字的有各种标语、各种布告及告湘西工农群众书、告湘西军人书等，口头的有各部的宣传队分途演讲——尤其是士兵委员会的宣传队较有成绩。惟在这次游击战争中，因军事发展太快，纪律多不森严，在西教乡及江垭两处，竟有骚扰平民的地方，这是大大的缺限，也是我们要加紧士兵训练的大教训。

2. 红军回桑后之党务及群众运动

关于桑植的党务和群众运动等，桑植临时县委已有很详细的报告，特为转上，恕不赘，现在有组织的工人已达千余，农民且近四万，这是很可乐观的事，但在群众运动的紧速发展中，有不少的错误是应很忠实的报告中央的。

这些错误是什么呢？第一是党的组织没有一个大的发展，虽说有个小小的组织然而质量上还差得很。以致本党在群众中不能起核心作用，不能使广大群众团结于党的周围，一般工农群众，只在军事势力影响之下，起来粉饰革命，全没有阶级的觉悟，这是一个极大的危险。第二是过去做农运和工运的同志过于幼稚和浪漫，没有工作的经验，把农协和工会弄成了个空洞的团防式的机关，并用以掩盖豪绅的家属，各特派员与执行委员均高高在上不深入群众，与下层群众脱离了密切关系甚至一味浪漫，拍卖了广大群众，违反了本党目前争取群众的重大任务，这是多么严重的错误。第三是一般同志不注意党的活动，仅仅机械的做他党外的工作，不留意党的组织上的发展，大家都好象有事不关己的样子，在这样好的环境之下，不去加紧党的活动，这是多大的缺限。第四各处的农协和工会都没有使群众认识清楚，简直把农协和工会都当着党部，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混淆不清，因之各处农协各工会的错误，多半影响于党，使广大的群众不但对于农协或工会没有正确的认识，使他们的革命情绪低落下去，并且对于本党增加了许多怀疑心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第五是对暴动的误解，以为捉了人家一只鸡，烧了一所房子，或没收了豪绅的财产，都是暴动，因为不了解暴动的真义，故在工作的策略上发生了绝大的错误，如第三区农协执委，富农为土豪，专去寻私报仇，任意捉人，各区没收地主的财产，只是几个执委和警兵去做，没有号召广大群众参加，而所得的财产亦没有给与农民。又如第二区农协执委事事敷衍，毫不彻底，都是不明白暴动意义所致。第六，工会中执委最大部分不是同志，他们的错误尤多，如不加紧工会的组织，只顾捉拿土豪

以谋得款等是。

关于以上所指的错误幸经前委一一考察出来，并由桑植县委拟定了新的工作计划，发下了最严重的通告，要求此间同志一致努力完成三大任务，纠正过去一切的错误，急速的发展党的组织，加紧群众运动。

我们对于这三大任务的努力，是用铁的纪律处分违反党的纪律的同志（如开除×区农协特派员李后初、田益生等的党籍），用教育的方式训练新的同志其一。分派县委委员及党的特派员下乡活动在农村中，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并限期成立各区区委或支部（如二区已有新同志二十人），此其二。决定陈计平为农运特派员计划一切，并加派较有经验之彭纬、郭天明、刘须吾、郭藩绪同志下乡工作，领导各区农运之发展，此其三。这样的去做，我们敢于自信，错误一定要少些，党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一定较有成绩，这是在旬日以来已经观察得到的。

现在说到前委本身和红军中的党务：

前委本身最大的缺点是组织不健全，和对全盘工作没有很好的计划，尤其红军中党的组织非常涣散，党在士兵群众中不能起核心作用，最是一个严重的危机。

关于此间党的组织，我们和董朗同志和鄂西派来之罗正品同志，曾有长时间之讨论。有的主张成立军党部，另设特派员管理地方党务；有的主张，如设了军党部，须另设暴动委员会，指挥暴动区域党的工作。这个意见，我们认为都是对的，但因工作人员的缺乏，如只建立几个机关，而没有人去指导，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因此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的组织，我们决定暂不取消，军党部暂不建立，而只设团委和特支，直属前委指挥。

前委原只有云卿（书记）良耀（组织）一鸣（宣传）叶平（秘书）毅夫，统一六人负责，因各人都负有党外工作，以致前委的组织，十分散漫，失了指导的作用，对于开会训练及整理纪律等工作，都没有经常的注意，这确是一个大缺点。但目前此间对于前委本身的组织，已有一个新的决议，除云卿等六人外，并决定以董朗同志参加前委，切实的加紧工作，我们的分工是：

（1）前委书记（云卿）

（2）组织兼秘书（良耀因经济委员会已取消，得以专力作党的工作）

（3）宣传科（叶平因还有些党外工作要做，无暇担任前委的秘书）

（4）兵士科（一鸣因系指挥部党代表与士兵接近的机会多）

（5）外如毅夫在苏维埃区域工作，统一负有军务，董朗亦办军事训练班，故均不能兼顾党务。

至红军党的组织，现仅一团团委（廖卓然负责）四团团委（谭甦负责）及特别支部（不属于团委之各部同志均编入特别支部，以叶平负责），经前委彻底洗刷以后，组织上较以前要健强多了。

关于党的，我们同罗正品同志谈得十分详细，最好中央巡视员到宜时找罗同志谈一次，即能得到此间一切情形，同时我们十二万分的希望中央多多给我们正确的指示。

3、红军的实力及其出路

自入桑后，红军的实力增加数倍，因我们尚在游击的时期中，其部队的编制，当然

带有拖队性，故名目繁多，难成建制，兹将各部的组织分述于下：

A、军部名义，仍未公开，仅在军部之下成立一特务营，以贺沛卿同志为营长，王湘泉刘书田为该营一二连长，连军部的马弁共有长枪一百十余枝。

B、第一路指挥部

（一）第一团团长贺桂如，该团第一营营长罗统一，第一二连长涂耀南、田子为，第二营营长廖卓然，第五六连连长田名贵、唐彬卿，第三营营长向白晨，第九十连连长周嘉鹏陈嘉柳。该营连长均系同志，经此次改编后，组织比较健强，共有长短枪三百七八十枝。

（二）第二团团长文南浦，党代表吴协中，该团第一三营营长李家炳、刘子清，共有长枪九十余枝。

（三）第四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谭甦，该团第一营营长陈栋川，第二营营长彭庆元，特务连连长范松之，先锋队队长沈祝三，该团军事工作人员亦均系同志，因尚欠军事训练故颇形泛散，其有长短枪八十余枝，其士兵群众多系神兵。

（四）第五团团长任琴普，党代表汪毅夫，第一二三营长为谷清轩、唐茂林、王连城，该团第一营系谷海云之基本部队，战斗力颇强，其二三营系入桑后收编的，组织十分复杂，谷旅之特务连，共有长短枪二百六十枝。

（五）补充团团长胡海云，有枪三十余枝，胡本人对云卿信仰很好，亦能作战。

（六）补充营营长王慎吾，系王东海之旧部，近与王炳南同志关系亦深，共有枪三十枝。

（七）独立营营长刘岸翘，原系大庸康老乡之团防，共有长枪五十余枝，红军向庸慈游击时，他曾参加战争，所以现在他虽未与红军汇合，他的帽子已经红了。

（八）此外尚有很多特动队的组织，如谷梅吾、吴辅臣、姚怡斋等，均有一部分群众，谷梅吾部并有长枪二十枝。

C、第二路指挥部

该部指挥覃奏章（即辅函）与云卿关系最深，近来对本党的信仰亦尚深切，他可以号召一部分队伍，现有枪一百枝，尚在继续发展中。

D、工农赤卫队

该队系由农民警卫队和工人赤卫队合编而成，共有群众约二百人，长枪二三十枝，因近来军事形势日趋严重，故将各区的武装集中起来。

合计以上各部共有武装群众（除长短枪外，每兵均荷有梭标）达四千人，声势之大，确能使湘西敌人发抖。

惟红军已有以下的缺点，可如下述：

（一）政治的、军事的训练均未加紧，这一方面是工作人员的缺乏，一方面是游击战争的影响，因红军军人缺乏政治军事教育，故纪律不严，敌友不分，有些行动不能完全照党的策略去做。

（二）军事工作的同志，不懂得客观的环境，往往发生无谓的冲突，致影响其工作不能深入群众，甚至离开了兵士群众。

（三）军队中下级同志与上级同志关系不密切，有时还发生许多隔阂，因而消极犹豫，甚至还要开小差，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四）军队中党的教育没有经常的注意，很多新同志还不知道党究竟是什么？

（五）官兵成分非常复杂，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很多，拖队的习气十分浓厚，差不多要做政治工作都十分困难。

以上这些缺点前委久已感觉着，为补救这些缺点，前委有以下的努力：

（一）在农工会执行委员会中，及红军军人中挑选学生一百二十名，开办军事政治训练班，定期三月毕业，适董朗同志来桑，训练班有了专人负责，故成绩尚好，现开学已有两星期。

（二）改造红军中党的组织，并加紧党内教育工作（已如上述）。

（三）设兵士科，很正确的指导士兵委员会工作（已如上述）。

（四）设法健强党代表办公厅的组织，提高党的威权。

（五）在军事有相当稳定时，军队组织还有一个很大的整顿，此间已同罗同志详谈，亦不赘述。

红军此次回桑，于党的组织，群众运动及同志错误之纠正，均有重大意义，从此努力下去，或不致有负中央之重托吧！

现在说到红军的出路了：

目前的环境，是很险恶的，湘西杂色队伍及吴尚部，从慈庸永鹤各路来包围我们，大有立即接触之势，因我们的声势很大，虽敌人的兵力数倍于我，而卒不敢冒然攻城，同时他们的内部裂痕很大，彼此多心，指挥既不统一，进击红军亦多非他所愿，（其士兵有些表示）在这种情况之下，虽大敌当前，我们是不会害怕的。

自然我们的战术，也同朱毛方面红军所指示的军事原则一样，我们对于此一重大的军事，决不冒险当视敌我力量，酌处或进或退，自当随机应变，请中央勿念！

正报告间又得各方侦探报称：

慈境之马河口境之空壳树东旺坪，大庸之沿溪坡，均发现大股敌人前锋，系湘西之杂色部队（徐小桐、邢聋子、陈策勋、朱发生等）跟进者为吴尚所部，同时，永顺亦有陈斗南顾家齐两团向桑方增兵，以作佯攻。我们为避开敌锋起见，决即抛弃桑城，藏兵于洪家关一带之高山，系探明敌部确实情形时，即择敌之一股而痛击之，如此虽不得全胜，亦不致受敌人的打击。

至红军目前的出路，须待这次战争解决之后始能决定，不过军事的原则是，胜利巩固桑植政权，并向慈庸发展，不胜则在内半，或鄂西方面游击，这是一定的。

董朗同志的介绍信，此地无法说出来，究竟中央对于董朗同志的工作分配曾有决定否？

中央所指示我们的一切，此间自当遵照执行，同时我们还希望中央急派工作同志上来，帮助我们实不胜馨香祷祝之至！

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　贺　龙

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

（一九三〇年五月）

一、绪　　言

鄂西的游击战争发动到现在，经过两年多的历史，其中因为不能正确的运用游击战争的策略，而遭了几次的挫折，甚至于严重之下犯了埋枪主义的错误，有一个时期的消沉，在这次大会以后，确定了游击战争的策略，又才重整旗鼓，不上一年创造沿长江一带四百里路之赤色区域，在三万赤色群众拥护之下，正式的成立红军第六军，最近接连攻下好几处的城市，建立了几县的苏维埃政权，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政纲，红军与政治影响的奏效大有一日千里之势，我们至少可以预言，鄂西由群众斗争中生长出来的红军，在不久的将来便要成为群众暴动主力之一，因此，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现状，有值得详细叙述的必要。

二、鄂西游击战争的历史

我们要明了鄂西红军生长的来历，必须要分几个时期来说明。

1.第一时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反动以后，湖南首先实行打暴徒的口号，澧州周资生同志所领导的农民自卫军拉到公安，与公安南帮农民（公安多湖南的农民）领导杨永祥合作，在打"棒老二"的口号之下，发动了公安的群众，做反苛捐杂税、反豪绅的运动，武装亦有相当的发展，割据了公安的六七两区，公安县城亦在赤色盛力之下，鲁涤平的第二军驻沙市，不敢向我们进攻。湘鄂战争结束以后，桂军到了湖北，才向公安进攻。当时的公安的游击队，决定拉到石首（但结果只拉到了四十九枝枪）与石首的武装（约二十枝枪）会合进攻周弦，未得胜利，而环境更加险恶（十八年历行清乡）及决定拉到监沔两县交界之洪湖。一九二八年三月，鄂西游击大队，到了洪湖以后，又与鄂中的游击队（驳壳枪三十枝）及华容的队伍（步枪十枝）集中进攻沔阳之峰口微得连枪二枝，步枪三十余枝，但峰口是处在代家场府场附近，所以几点钟后我们退出峰口时，敌人反攻的部队已住到了。这次我们没有损失，安全退到洪湖，游击队因为要冲破敌人的包围，乃决定拉到沔西，由扬函到沔西之拉船埠，路上就与团防打了三仗，当时潜江、沔阳、监利、江陵的团防都住在沔西，有联合包围的计划，如要打败敌人的包围，只有向外游击，而游击的方向，以由江陵出荆当远为适宜，可是当时党的负责同志，地方主义太深（当时沔阳属鄂中特委指挥），鄂中的同志不愿离开沔阳，石首公安的同志要求回家乡去革命，当时没

有办法解决，只好决定分为两起，一部留守沔阳，一部拖回石首。殊知留在沔阳之一部分，因死守拖船埠而失败，拖回石首的则因石首清乡厉害而又分为两起，一部留在石首把长枪埋在地下，一部出华容到监利洪湖连枪与马枪，编为特县大队，仍以周资生同志充大队长，专任个人恐怖的工作，鄂西游击战争至此时可算告一段落。

此外还有两件事值得说明，一、当阳民的暴动，一连三次均归失败，失败的原因，主要的是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始则勾结军事的领袖（川军秦汉三），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不知领导他们，去解决敌人的武装，反而下令退缩，勾结好了的军队（即秦汉三部）来赤色区域内部来清乡，以致失败，随后群众斗争情绪已经低落，而党又命令群众暴动，结果仍旧失败，而群众组织因之塌台，至今未能完全恢复。二、是巴东的暴动，已经占领了县城，夺取了政权，组织人民委员会，可是拿到政权两三个月之久，不坚决的执行土地政纲，豪绅地主的经济基础仍然保存，群众组织如农会工农完全没有，封建的神兵组织，日益扩大，以至后来军事失败。

在这一时期鄂西的一切军事发动，大部分党受了盲动主义的支配。同志们真是象发狂似的，口里天天喊暴动，其实并不知什么叫暴动，一般农民仇视街上人的心里非常浓厚，在每次军事行动之后，无目的的烧杀，简直是照理的文章，假使有人不主张烧杀，同志们便骂是机会主义者。因为这样干了半年之久，在群众中反给了不好的影响，加之反革命派的宣传作用，军事行动得不到群众中的拥护，与每次行动之后，党的组织塌台如公安、当阳、巴东、石首、江陵等县，在军事失败之处，组织几乎完全塌台。结果成为破坏组织的一个东西，大多数的同志都动摇起来，主张埋枪，主张停止游击战争。所以鄂西游击战争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到一九二九年三月，完全陷于停顿状态，在这停顿期中，同志们更觉到没有出路，群众组织不消说完全没有了，党的组织日益见缩小，甚至有好多县分与特委失了联络，特委又与省委失了联络有半年多之久。

2.第二时期（一九二九年二月到一九二九年七月）

六次大会的决议案到了鄂西以后，特委决定二月初召集扩大会议于江陵，在扩大会议中讨论问题以游击战争的行动问题为最热烈，结果决定江、石、监三县，为基本武装的地方，首先发动，共编为游击第一大队，以石首所埋的枪及特务队编为第一中队，以监利之枪编为第二中队。于三月初旬江、石、监三县，同时发动，十七天之内，两个中队打了二十一仗，虽然集中牺牲了不少的同志，尤以沙岗一战周资生同志阵亡损失极大，但是率能建立了三县的赤色政权，发动了广大的群众。第一中队由江陵拖到石首，发展更为迅速，于三月攻取了石首，就杀了贪官龚县长家属及国民党指导委员，此时合计步枪百六十余枝，连枪二十余枝，子弹亦非常充足，又在监狱里放出同志七十余人，士气为之一振。乃继续进攻藕池，因为侦探没有报告，遂与五十师谭道源部逆遇阮家铺子，敌人以两团之众，向我方层层包围，几乎全军复灭，所逃回的只有连枪步枪各十一枝，这是鄂西游击战争，第一次最大的损失。

藕池失败以后，军队与团防更加紧的向我进攻，乃将剩余的武装编为两个中队，在石首流动，如第一中队，在江陵流动的如第三中队，随由二四中队（在监沔流动的第二中队，此时已扩充为两个中队了）提来驳壳枪十余枝，又购买十余枝，一、三中队的战斗力量，又恢复了，继续与团防作战，缴得步枪不少！渐渐形成队伍的形势了。

沙岗是江陵赤色政权的中心，敌人非常注意，在端午节的前几天，敌人的军事布置

就是准备包围沙岗的形势，江陵的常练队（留如协同一部分军队驻扎郝穴，距沙岗四十余里）监利的常练队留如汪家桥（距沙岗十余里）。我方军事布置是集中一二三四队于青阳宫，因为交通关系，集中迟缓。敌人于端午节的上午进攻沙岗，街市的房子烧了十分之八，沙岗附近的村庄边都被烧了，第二天敌人又以全力进攻青阳宫值逼我军业已集中，遂大战于青阳宫附近，是时敌人阵亡约八十余人，我军阵亡亦四十余人，但我方阵亡的多系得力干部，此役虽然打了胜仗，而实力则损失不少。战事结束以后，开负责人会议，因为干部缺乏的原故，乃决议在洪湖设立教导队，并将步枪集中于洪湖训练编为第一大队，分一二三中队。而以连枪二十枝，游击石首，以连枪三十枝游击江陵，编为二大队，以江陵游击队为第四中队，石首游击队为第五中队，总部的直属队为特务队（以手机关十二枝，连枪二十枝，马枪十枝组织的）与教导队。

编制就绪之后，江陵环境更加险恶，四五中队均集中石首，适遇谭道源派一连人来清乡，当未至赤色区域中心地点，即被我四五中队迎头痛击，遂归其全部缴械，士兵与群众莫不高兴说：谭道源替我换了好枪，因为前次藕池损失的枪枝与这次所得的枪枝，差不多可以相抵，但此次所得的枪枝，一律为新出厂的汉阳枪。

3. 第三时期（一九二九年八月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在蒋桂战争结束以后，张发奎反蒋战争又已爆发，以前鄂西的军阀谭道源、彭彪、范石生等联合常练队一致的向革命势力进攻，因此江、石、监、沔各县的环境不算险恶，最险恶的就是过去对农民策略的错误（联合富农），以致富农常常有领导反水帮助敌人屠杀共产党员（他们称为制团鱼）。江陵的第四中队起来可与敌人，头一天攻徐，还得枪二十余枝，第二天进攻新欢，则为反水的农民告密，而致于失败，中队长李代龙同志阵亡，没有人主持，兵士将枪埋了，连枪埋至石首与第五中队集中，后因石首环境险恶，乃拖到华容化远两区游击（该地有工人），不惟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日渐发展，并且扩大了红色区域。十一月二十四日石首常练队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进攻赤区，用洋船载兵过江，将小河口的房子完全烧了，因此激动了兵士与群众，马上向他袭击，敌人仓卒之间退出洋船，吓得手忙脚乱，将船陷于泥潭中，至被全部缴械，计得步枪百余枝，连枪六枝，手机关三枝，自此以后，石首的常练队没有单独向我们进攻的能力了。

这时江陵的常练队，以为将江陵的共产党铲清了，毫无戒备，不意我们由石首调来的三十枝连枪，一夜功夫袭击熊家河、马家滨（长江北岸距沙市六十里）、观音寺（长江距沙市三十里）三处，共缴得枪三十枝，从江陵的豪绅又起恐慌，群众又渐渐的兴奋起来，渴望红军非常迫切。

洪湖方面我第一大队见环境险恶，起初决定向华容游击，队伍已经游击到二区，党的负责同志用激将法要他们打匹八月，因为得了胜利，又想苟安洪湖，于是又无理的回到洪湖，但不久四面的包围来了，此时又想用沔阳到潜江、江陵各县游击，与敌人大战于沙市，损失极大，更没有向外游击的可能了，又复退归洪湖，与敌人的张聊队相周旋，一直到军阀战争并起，敌军退去之后，才得重新整理，不久就与特委发生不密切的关系。

还有须要补述的两点，第一就是当监沔环境险恶的时候，新□的江防大队六十几个兵士自动的把官长完全杀了，拖归到洪湖参加红军，这对于我们的战斗力量，确实增加不少。

第二就是当江陵没有失败以前曾经接了一笔款到松枝宜购买枪（因军阀混战有一部分枪散在民间），枪枝购买到手而江陵军事失败，于是就不能运到江陵，留在宜都发动游击战争，因为负责人没有经验，特委又被中央取消了，没有上级去指导他们工作，他们曾经缴了团防的枪枝，不知建立农村政权与发动群众斗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没有得到群众的拥护，听说有清乡的风声，自己吓自己把步枪埋了，把连枪拖到江陵的西北区，又不敢发动群众只是躲在房子里，以致被常练队缴械，真是莫大的耻辱。

4. 第四时期（一九三〇年到现在）

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特委决定将下游各县游击队编为红军中央独立师（杨英同志向逸群说，鄂西可成立一师，师的的名号由你们自订），监沔的游击部队编为第一纵队，江右的游击部队编为第二纵队，并决定集中于江陵，同时又听说贺龙部队到达枝江单溪，乃令限一二纵队于十二月底集中江陵，又令第三纵队于十五日进攻郝穴，从南与贺龙呼应扩大政治影响。殊知第一纵队与省委发生关系，省委又指令他们向江阳汉川推进，他们（一纵队）竟机械的去执行省委的指示，写信来通知二纵队到洪湖集中，以便进攻武汉。二纵队因为省委指示他们向江陵进展，恢复江陵的组织，以打通江、监、石的赤色交通线，也就不到洪湖去集中（事实上不能由石首直接到监利），这样往返耽延了一个月，一点结果也没有，及至中央军部巡视员柳克明同志到了鄂西之后，才写信去坚决的要他们来江陵与二纵队会师，一直到了二月五号，两纵队才会师于监利汪家桥。在会师之先，第一纵队在城院头子口等处打了两仗，得枪四十余枝，第二纵队由石首出发，时即江陵熊家河的常练队一分队拖来（是党在里面的变），有枪二十余枝，又进攻普济观与沙岗缴得枪五十余枝。会师之后，将中央独立队编为第六军，县军长在汪家桥就职，并开军事会议，决定进攻龙湾司，乃即日移师新观召集群众大会，到万余人（二七纪念大会）。次日即向江陵之计，西区移动正值敌人来清乡，被先头部队击散，因隔河未缴得枪枝，次日拂晓我军冒雨前进，敌人不支向潜江退却，我军遂得占领龙湾司熊口老新口张舍河等处市镇，龙湾司、熊口、老新口都有当铺，二十洋以下无本取当，二十元以上的无利取当，于是一般贫苦群众，莫不称道红军之好，他们都说：我们做梦都想不到有这回事。红军到达龙湾司后，敌人兵士来司令部报告说，常练队的枪枝埋在距淋湾二十里地之龙湾指附近，要我们去取来，当即派一分队前去，果然得步枪二十五枝。次日又来兵士说他们有两枝连枪埋在某处要我们去取来，当又一徒手随往，果然见取来两枝连枪。第二纵队驻扎熊口两天，也同样的得了敌人的枪枝，可见敌人兵心的动摇。

在此必须顺便将红军对于敌人士兵及拖枪来的待遇说一下，以前我们打战，多半有农民参加，同时我们的兵士大多出身农民，他们恨常练队深入骨髓，捉到一个杀一个是没有话说的，可是这样一来常练队与我们打战，死也不肯缴枪，自后我们觉得这个方式不对，乃决定优待士兵的方法：一、自动拖枪来归的奖洋十元，如不愿事，酌量路途远近发给路费。二、在火线上俘虏来的，每人发洋五元，如不愿干事的只给洋三元。这样一来，敌人兵士非常动摇，江、公、石各县常练队有瓦解之势。

当红军进攻龙湾之先一日，我们又决定抽调一个中队进攻沙南区之观音寺，（因为要使沙市的军队首尾不能相顾）于二月九日拂晓进攻，虽遇帝国主义的兵舰停归江中，他们用机关枪扫射打红旗的群众，敌人本来被我们打败，此时见洋兵舰向我们扫射，竟至停止不退，当时我红军只牺牲一个兵士，而农民群众死在帝国主义炮舰之下的竟达三

十余人，乃决定退回赤色区域，敌人也不敢追击红军，即开回龙湾与大队会合。

二月十四日我第一二纵队集中于老新口，十五日拂晓进攻新沟咀，襄河南岸监利三大市镇之一，适敌人分两路向我进攻，敌约半小时即溃退，此役共得枪三十余枝，十七日下午五时由新沟咀出发，开驻于沔西之渔阳镇，根据各方报告情形，郝穴驻有军队二团，刘峙电令清乡，且已清了一次，江监交界之新观寺，由监利开来夏斗寅说，普济观常练队已回防，江陵县长传朴梅亲率队伍到龙湾司清乡，监利县城亦驻有军队，目前环境敌人有向我取包围的形势，此时敌人力量，仅潜江比较薄弱，同时第三大队尚在沔西即须集中，所以决定向潜江方面移动。二十日第一纵队之第三大队到渔阳镇集中，即召集全体官兵训话，并枪决副官班长各一名，因为他们两个强奸妇女有确实证据，又经全体官兵一致主张，所以非办不可。下午六时潜江县委（是农民同志）沔西区委均到，前委召集联席会议解决军事行动问题。据当地组织报告目前潜江情形，统治阶级非常动摇，县城反动武装仅三百余枝枪，所以决定进攻县城，以扩大政治影响，兹将前委二十六日关于进攻潜城军事计划的报告，抄一段："（1）拖船埠出发到黄中陀土耳边子分三路，右翼由郭扎院杨峰至三江口埋沙渡两处埋伏，堵截敌人，退走岳口及沔截港归路，南翼毛栅子向潜江之西南角进攻，（2）兵力之分配，右翼派第一纵队，由一二大队担任，由第一纵队纵队长王一鸣指挥，左翼命第二纵队之第一大队之与特务队担任，由第二纵队段玉林指挥，正面命第二纵队第二大队及第一纵队担任，由第二纵队长严育指挥，教导队及机关炮队的预备队全军行李停止当中陀之上耳子由第一纵队之特务队看押，（3）进攻时间我军全部于今日下午八时半出发至黄中陀之上耳边子分途，右翼至三江口排沙渡埋伏外，正面与左翼至目林约三里之地即行停止，待天明能看清人物时开始攻击，八时出发，因沿途遇雨，所以没有按照计划时间达到，二十日晨雾气非常浓厚，故未达到完全消灭之任务，战斗结果得步枪六十余枝，手枪三枝，马枪二枝，连枪三枝，子弹四千余发，拿副队长一名，著名劣绅甚多，公安局长，教育局长，提工局长等，路过群众大会的路线一律枪决。"

红军在潜江县休息了两天，仍然开回沔西，因得报告，沙市非常恐慌，乃决定先攻郝穴，因为郝穴是江陵比较大的市镇，而且空虚（只常练队四百余）遂于三月八日拂晓分三路进攻，结果缴得枪一百六十余枝（但敌人却已损失二百余枝，多半丢到大江里），俘虏八十余人，内有分队长三名，经过了群众路线，没收了几家反动的财产，枪决豪绅及反动派八名，现在红军乃开回沙岗休息。

红军到达沙岗以后，即由段德昌率领二纵队二大队全部到沙南区，（长江北岸郝穴上沙市下）准备进攻观音寺，十二日上午进攻观音寺，有沙南区赤色群众三十人参加，分四路进攻观音寺，该地常练队闻风溃退，因我埋伏部队看见敌人退走，不沉着的喊缴枪，反给一个猛烈的冲锋，结果敌人迫得无路可走，一部分冲走了，一部分被缴械，一部分投江了，此役得枪二十余枝，现敌人退至良卡（距沙市仅十五里）而沙市驻防军队不敢开出去，因为他没好多军队驻沙市，而又要维持市面秩序，所以只好让红军驻扎观音寺，而在那里大开其群众大会，沙市的豪绅资产阶级急得没有法子，只好一面打电到南京与武汉请求派兵，一面大骂军队无用。

三、第六军的编制

1． 军部的组织目前非常简单，只有参谋处与副官处再如传令兵而已，因为人的缺乏，没有政治的组织，政治工作由各纵队独立出干，不过一二纵队政治部经常开联席会议，所以一切的工作，都是一致的动作。

军部的直属部队，只有一大教导队．是训练作为下级干部的人材，目前是随营训练的性质。

2． 纵队司令部均有政治委员及政治部的组织，有参谋处，副官处，卫生处，经理处及经理委员会的组织。第一纵队司令部的直属部队有一机关枪队（水机关枪两挺）及特务队。第二纵队司令部，只有一个特务队。

3． 第一纵队共有四个大队，每大队有三中队，每中队有二分队，每分队有三班。第二纵队只有三大队，每大队只有两中队，但每个中队有三分队，这是因为缺乏中队长的关系，所以与第一中队稍有不同，第三纵队现在长阳游击，因是神兵改变的，故旧式武装颇多，而且极有战斗力量，因为交通不便，最近没有报告来，所以内部的编制不知道。此外，尚有一个游击大队在巴东游击，最近特军委才派人去改编，详细情形尚不知道。

四、第六军的军事训练

第六军完全是由农民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几乎没有时间做操场上的训练工作，所以一切军队中的繁文，第六军几乎没有，只是休息时间学习散兵装退子弹射击以及步兵哨尖兵等工作，有许多官长还不会喊口令，但第六军的官兵都长于冲锋追击，所以每次作战，都是冲锋取胜，同时因为每次作战后，都有批评会在兵士中间公开批评之后，然后由最高级指挥官做结论，这个方式实际帮助军事训练上不少，这是由斗争中实际工作中训练红军的办法。

但是我们仍感觉到有加紧军事训练的必要，所以最近办了一教导队，可是因人才缺乏，教导本身就不大健全，若要想办到好的结果，必要加紧教导队的工作，这是我们本身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看得到的一件困难事实。

这还是第一二纵队，比较上是有军事训练的，至于第三纵队，只有一个纵队司令是特委派去的，但是他没有一个帮手，那么如何能指挥三千多人的大部队？他内部的军事训练，我们可不言而愈。

五、第六军的党的组织

1． 以前的组织：第一纵队在未有前委会以前，由特委的指示，成立军特支，小河口一战后，负责人牺牲甚多，工作无形停顿，去年冬月仍成立军特支，洗刷同志甚多，最近同志有六十余人，成立三个支分部，二十个小组，在过办有组长训练班，因军事行部又停止，同志中的成份以自耕农雇农的多，雇农尤多。

第二纵队首先成立特支，自藕池失败后，工作无形中停顿，后又开会组织，结果非常糟糕，自李楷同志（政治委员）到部以后，重新登记，现在同志七十余人，成立三个支部九个小组，因军事行动未能常时开会，同志成分以雇农为多，这点是与第一纵队不同的。

2. 现在的组织，去年二月五日一二纵队会师以后，因过去前委会的不健全，由特委及中央的巡视员的指示，将前委改组，决定委员为七人，后补委员三人，委员的产生由最高长官孙德清（军长）同志，一二纵队司令段德昌、段玉林，一二纵队的兵士徐昌贤、张传贤，其余二人由特委指定五鹤及中央派来负军队中党务工作的一位同志担任，后补委员推定许光远、李子杨、王一鸣三人担任，第一次前委会议，决定以三人组织常委，以王一鸣为书记，孙德清为宣传，中央派来的任组织，在未到以前由许光远同志代理。

各纵队成立纵委，纵委以下为支部及小组。

3. 前委成立后的工作决议：

一、组织：（1）重新登记，（2）加紧训练，（3）各纵队设办组长训练班，（4）各级党部按期开会，日期由常委会决定通知，（5）注意同志的工作的分配，（6）按期缴纳党费，规定每月五十文，（7）发展组织，要注意成份，以雇农贫农手工业者为对象。

二、宣传：（1）内办红军通讯，（2）对外出小册子，如红军生活，宣传品在行军时发散，寄邮，或由特委分发各物。

但是现在已有一个月了，因为没有人专门负责，这些决议至今没有一样实现。

六、第六军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

我们天天说到没有军事人材，其实军事人材之缺乏，还可想出办法，万一没有可以从斗争中提拔，至于政治人材那真是想不出办法，因为一般党员政治水平线之低落，比较好的又要担任其他组织工作，又不是短少时间可以训练得出来的，因为如此，所以第六军的政治工作成了难问题，比如现在还没有成立军政部，不是不成立，而是没有人，现在表面上各纵队有政治工作，其实因为人缺乏，做得非常不充分，各中队现没有政治人员，仅靠一个政治部（不健全的）如何能够深入群众呢？兵委会的小组会议，是最好训练的机会，但是没有参加，所以也没有好多意义，充其量只能做到一点演讲式的政治训练，然而这还是一二纵队至于讲演式的政治训练也没有咧！

至于群众工作，红军到达的地方宣传还比较普通，布告传单标语，开群众大会，这些照例要办到的，并且也有宣传中的组织，所以到达的一个地方，兵士都打起红旗向群众宣传。

红军本来是要替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才能发动群众的斗争，我们过去也想这样干，但是无从着手，最近实行无本取当，这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这样也颇得群众欢迎。

有时也进行组织的工作，但因为调查工作做得不好，不能提出适当的口号，因此不能发动群众，群众不起来热烈的参加，这个组织是没有用的，比如红军到农清司，由群众产生的革命委员会，不上两天选的委员都跑光了。

虽然我们在主观上群众工作做得不充分，但是由客观上看来，红军的政治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在下游各县的群众几乎无有一处不是欢迎红军的，这是因为：一、统治阶级过去对民众完全是用严厉的白色恐怖来压迫，所谓常练队清乡真是无目的烧杀，而且实行奸淫，以致民众恨清乡队入骨，同时红军又纠正了无目的烧杀政策，所以群众欢迎红军。二、红军的游击区域扩大，而且向着中心城市发展，红军的行动，尽人皆知，以致反动派的宣传失了效力。三、红军达到一处，便实行没收反革命的财产分给贫民，并实行无本取当，所以群众常常跟着红军跑（红军攻下新沟嘴以后，该地贫民店员等随着红军走的有八百余人），照目前这些形势看来，第六军确成为红军的军队了。

七、第六军的纪律

前委没有成立之前，第六军的纪律与国民革命军一样，仍然是用肉刑为维持纪律的唯一方法。自前委成立以后，一切纪律由兵委会通过，然后执行，并且废止肉刑而代之以各种勤务，现在每条纪律差不多每个兵士都知道，第一不许吸鸦片及纸烟，第二不许赌博，第三不许贪污，各纵队均有巡查队的组织，是由兵士轮流充当，纪律的执行不属于兵委会而属各级长官及政治委员。

八、第六军的经济来源

首先已经说过，第六军是由群众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当党代替群众的时候，红军一切开支是由党支出，鄂西党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才由农协管理经济，最近红军扩大部份是由土豪劣绅负担，在赤区以内，并没实行统一累进税，而且土劣没有了，所以红军不向外发展，经济就没有办法。

因为官兵经济平等，经委会有兵士参加，而且帐目向兵委会报告的，所以有时候生活不好，兵士也没有怨言。在此要将兵士实际生活谈谈，每天每人只有一千四百文的伙食费，十天发一元零用费，服装草鞋等完全由公家负责不折不扣，而且民众团体常常有酒肉洋钱慰劳，所以他们不感觉十分痛苦。

九、第六军的缺点和优点

1. 缺点：一、调查工作不能独立，几乎完全依赖各地方的组织，二、政治训练不充分，三、军事技术不好，只凭一鼓作气的冲锋，四、党的组织薄弱，党员的成份不好，五、军部不健全，没有统一指挥的力量，六、地方观念很浓厚。

2. 优点：一、是由群众斗争中生长出来的，没有旧式军队中旧习惯，二、有阶级的党很能自动的与民众接近，三、能艰苦耐劳长于夜行军。

十、鄂西最近的游击计划

鄂西的主观力量，确已不少，第六军与贺龙合计有万余人，红军游击区域已达十七

县（江、石、监、沔、潜、华、当、长、五、巴及施鹤等县），公安已处赤色区域的包围之中，马上可以发动（石首赤卫队已达到公安区境），统治阶级力量——团防势力日见薄弱，下游各县团防，完全仍赖军队而图生存，上游如松、枝、宜、长、五、归、兴、巴各县团防则又无战斗力量，驻防军兵心亦动摇，这两部分的兵士生活极为痛苦，尤其各部为甚，此外有独立十四旅彭启彪，而围住宜昌，一团驻沙市，五十二师李范衍之一部分驻沙市本有一团但分一营，驻郝穴李虎城与郭汝栋部均有我们的组织，我已派人前往组织兵变，李郭可以有把握的，可以影响过来加以原来红军的力量会合起来，解决彭启彪、李范衍是不成问题的，那时鄂三十县均可割据，而且集中力量可以进攻武汉，根据以上的形势及我们的企图决定以下的具体计划。

1. 第六军大部分力量用石首进攻藕池与县城得手后，即向公安进展，公安全县无防军，只有团防约枪八百枝。

2. 第六军以一小部分游击沙南区进观音寺(现已实现)，沙南及沙市沿北岸一带由去年十月到现在，都是赤色政权由沙南过江(公安地界)与大部队进攻公安团防。

3. 通知贫(贺)龙会政(攻)荆沙(我们已派交通去了)。

4. 宜昌兵变发动后，即以主要力量向松、枝、宜进展过荆沙。

5. 江陵赤卫队应到沙南游击相机过江进攻公安。

6. 第六军教导队暂留江陵之沙岗训练。

7. 监利赤卫队应到该县三四区游击，保持江、监、石三县的交通路线。

8. 石首赤卫队应向公安方向进攻。

附说明：

(1)此计划只限于军事，至于怎样发动工农斗争与兵变的联系，在第五次常会已有讨论。

(2)占领宜沙以后，马上便要与帝国主义冲突，关于外交问题在第五次常会亦有讨论和决议。

(3)第五次常会有中央军部巡视员柳同志参加。

十一、扩大教导队的计划

红军目前最感困难的，就是干部问题，在目前便利环境之下，不能不注意军事的准备工作训练下级干部，便是鄂西党在准备武装暴动过程中，及党员军事化与武装训练群众的任务面前最主要的工作，所以特委第六次常委会决定扩大教导队的组织，其具体办法如下：

1. 改教导队为教导大队，设大队长大队副教育长政治部主任各一，军事政治教官各数人。

2. 教导大队的编制：大队下分四队，每队分三区队，每区队分三分队(或班)。

3. 队员以五百人为标准调入伍的规定：荆、钟、潜、天、京……五十人(每县十人)，常、华、安……六十人(每县二十人)，江、石、监……二百四十人(每县八十人)，公、当、松、枝、宜……五十人(每县十人)，沙市……十人。

4. 年龄二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江、石、监与南、华、安，限四月十号以前送

到，其他各地可陆续送来，但至迟不得超过五一以后。

5. 大队长李楷刘等约三人组织筹委会，以大队长为主席。

6. 地点——江陵。

十二、鄂西下游各县赤卫队的编制与实力

江、石、监，均有政权机关在苏维埃政府之下有军委会赤卫队直接受军委会指导，江、石、监三县，均成立赤卫大队，大队之下有中队，中队之下有分队。

江——有连枪十六枝，步枪六十余枝。石，有连枪二十余枝，步枪百余枝。监，有连枪二十余枝，步枪五十余枝。沔阳由省委直接指挥，没有报告来。潜江、荆门、钟祥共有步枪百余枝，各县赤卫队，必须有一指挥机关以便调谴特委认为有成立总队部之必要，但一时找不到相当的总队长。若如指挥便利是以易穷同志担任比较相当，但易穷负特别责任不便再兼总队长，所以决定各县赤卫队受特军委指挥，中央致各级党部公函本来说得有集中赤卫队游击队及一部分少先队编为红军，我们如何不集中各县的赤卫队呢？其理由1. 赤卫队是保护政权的武装力量，红军到外县游击，赤卫队是必要的。2. 赤卫队有时比红军还发展得快，因为部队不便去袭击，赤卫队强大起来便可编为红军，再留一小部分武装编为赤卫队去发展。

十三、我们的教训

1. 无论怎样恶劣环境之下，埋枪主义是最愚不过的办法，由经验中证明凡是主张埋枪的人，都是不了解游击战争的，因为他带有地方主义与保守观念而没有游击的决心。

2. 无目的烧杀，尤其是毁灭市镇，是最无意的一回事，若不切实纠正过来，便要防碍游击战争，因为群众就是根本讨厌这回事，当然得不到群众的拥护。

3. 农民运动发展到武装冲突的时候，就应设法转变与我们合作的封建势力的组织如红枪会土匪等，不然反动势力一来，这些封建团体便马上被土劣利用过去，做打击我们的工具，（巴县与神兵合作，当阳与土匪合作，因为不知转变，组织上了大当）。

4. 游击队的胜利常常可以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所以经常的胜利是必要的。

5. 实行土地革命，否则便使群众怀疑我们的行动了。

6. 红军应当时时刻刻准备进攻中心城市，才能扩大政治影响。

7. 对中小商人应当采取保护政策，才不致受敌人的经济的封锁。

十四、鄂西少先队的情形

鄂西的团是以党对立的，简直是倾向团的组织独立少先队亦要独立，监利沙少先队ＯＹ书记匡月亮指挥出去任意杀一无罪的农协员闹了莫大的纠纷，但结果省委代表要指定匡月亮，现在石首少先队非常跋绝（扈）过年禁止拜年，抢大家拜年的茶食，随后农人将狗粪放在点心里头，他们也抢去吃了，真是一塌糊涂，他们还要说，我们还算不利害，监利少先队还要杀人吃，鄂西少先队完全成了ＯＹ直接指挥的群众（真是只有赤色区

才有少先队的组织，非赤色区域连ＯＹ组织也没有，当然很少的参加红军所以江陵的赤卫队有三十岁以上的农民会员，而无二十三岁以下的少先队，又不能作战(因为没有军事训练)专做打菩萨打烟馆扯妇女的裹脚布等工作，以致惹一般民众的厌恶心理而模糊了阶级斗争的观念，以目前少先队的组织对红军不惟没有帮助，而且事实上防碍了军事发展。中央来信说，少先队编一部份到红军。我们不知道红军与少先队的关系怎样，请上级指示。

鄂西特委

鄂豫边军事问题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

（一）军事指挥问题：

1．鄂豫边革命委员须组织一军事委员会指挥鄂豫边整个的军事行动。

2．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是革命委员会常委之一。

3．军事委员会由七至九人组织之。

4．军事委员会对于革命委员会所管辖之各种武装组织，须负责指挥训练整理给养补充等责任。

（二）红军组织问题：

1．红军最高司令部政治部均受革命委员会指挥。

2．士兵委员会系造成红军内面的民主精神，帮助政治部训练士兵，督促士兵做宣传群众组织等工作，对于改良士兵生活、军队建设等问题，须经过高级政治部批准后才能发生效力。因为是建设机关，而非执行机关。

3．各级政治指导员对各级士兵委员会居于指导地位，不参加士兵委员会。其余红军内面官佐士兵一律参加士兵委员会，但士兵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官佐不得超过三分之一。

4．各级政治指导员须由革命委员会派遣各级军官，命令须由各级政治指导员付署才能发生效力。

5．高级政治指导员非同志不能充当。

6．高级党委应规定全军党的工作路线，在士兵群众中扩大政治影响，使非党籍士兵群众在党的政治口号之下行动。

7．红军编制采用三三制。除正式部队外，应有慰问队、通讯队、侦探队等临时组织。

8．红军游击到各地时其军事行动应由党委及该地党部开联席会议决定之，在地方党部和党委意见不同，又不能取决于高级党部时，则仍采用党委的意见。

（三）赤卫队组织问题：

1．组织系统为总队、大队、中队、分队。

2．赤卫队由县苏维埃或农民委员会内赤卫委员会指挥之。

3．赤卫队分常备队（脱离生产）、予备队（不脱离生产）两种。

（四）红军任务问题：

1．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的民众的各种斗争。

2．坚决实行土地革命。

3．夺取反动武装。

4．保障和扩大苏维埃区域。

（五）赤卫队的任务问题：

1．保障革命区域。

2．肃清反动残余。

3．帮助邻近区域民众斗争。

（六）红军与群众团体的关系问题：

1．红军对地方民众团体有帮助肃清一切反动势力的责任。

2．地方民众团体对红军有帮助给养侦探响导补充等责任。

3．红军游击队到没有群众组织的地方，政治部应负责组织之。在有群众组织的地方，应尽量帮助其发展，并健全其组织。

（七）红军与各县赤卫队的关系问题：

1．红军对各县赤卫队应帮助其军事和政治的训练。

2．赤卫队参加红军作战时须绝对受红军指挥。

3．赤卫队长应与红军发生密切关系，双方军事会议应互派代表参加。

（八）红军的整理与扩大问题：

A 整理问题：人材补充除请中央派遣军事工作人员外，须尽量寻找反动军队里面的失业革命军官。

B 扩大方面：

1．发展游击工作以扩大红军的组织。

2．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到白色军队中去，使白色军队哗变到红军中来，凡属哗变过来的白色军队必须交红军司令部改编，各县不得截留。

3．各地方党部和民众团体应尽量帮助红军的扩大。

（九）红军士兵教育问题：

A 政治方面：

1．加紧士兵对土地革命和阶级意识的养成和认识。

2．加紧士兵对群众组织的能力。

3．加强政治讨论。

4．组织士兵俱乐部和消费合作社。

5．加强士兵的识字运动。

B 军事方面：

1．养成严格的军纪。

2．加强游击战争的战术训练。

3．加强士兵军事技术。

4．加强连排班长的指挥能力。

（十）赤卫队整理教育和扩大问题：

A 整理：

重新改编。

B 教育：

1．加强政治与军事训练。

2．赤卫总队部应设立政治部专门担任教育工作。

3． 各队应组织队员委员会。

C 扩大：

1． 扩大预备队。

2． 苏维埃区域人民在四十岁以下十六岁以上者须尽量武装。

（十一）红军游击路线问题：红军目前游击的路线应向京汉路如黄同推进，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

（十二）红军游击战术问题：

1． 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2． 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3． 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4． 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5． 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6． 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

7． 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十三）经济问题：

1． 豪绅地主的商店不没收采用估价罚款的办法。

2． 攻下城市时对大的商店只估计他的资本罚款，绝对禁止大商人摊派。

3． 豪绅地主的房屋，依照估价办法不许焚毁。

4． 对中小商人和富农的经济，绝对不能妨害。

5． 由斗争中夺取经济。

6． 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个财政统一机关统一各县财政。

7． 革命委员会所属各部队各机关应实行预算决算。

（十四）红军对枪会土匪及各种反动武装组织的态度问题：

A 对土匪问题：

1． 不能随便收编，应使我们的政治影响扩大和深入到他们群众中去夺取其群众，使其群众反对其首领。如有投诚者须彻底改编。

2． 派同志到土匪中去夺取其群众改变其质量。

3． 对土匪领袖必要时只用拘留方法，不必枪决。

4． 绝对不准土匪随便扯红旗，应使其扯有革命意义的旗帜（如人民自卫军），做铲除豪绅地主等工作。

5． 尽量设法使土匪停止烧杀行为。

6． 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到土匪中去，使其坚决实行土地革命。

B 对枪会问题：

1． 扩大政治影响到枪会群众中去。

2． 捉大批枪的会群众做深入的宣传，到必要时可放一部分。

3． 捉红学领袖，勾结红学领袖，到必要时即消灭。

4． 拘留红学家属，可放一二人回去作分化工作。

5． 用小恩小惠及其他各种方法联络感情。

6． 打开白色乡村时必须做安慰工作。

7. 在白色乡村我们的政治影响到成熟时期，须酌客观情形即改变为赤色组织或灰色组织。

8. 绝对禁止烧杀行为。

C 对白色军队问题：

1. 哗变过来的白色军队应举行慰劳会联欢会等，以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改变收买的形式，并须抖散改编。

2. 凡俘虏来的军官必须交给俘虏来士兵群众裁判。

3. 凡同白色军队作战时必须准备宣传品发散或拖色宣传品之食物及消耗品及敌方士兵食用，或者在敌方向士兵群众作口头上宣传，绝对禁止谩骂。

4. 凡敌方投来的士兵如不愿在红军里内服务或给资遣散或留在苏维埃区域内分配土地耕种。

D 对民团问题：

1. 对民团团丁及其家属应与发生社会关系借以联络感情。

2. 对民团哗变过来的团丁要审慎处理。

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印

鄂豫边区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群众运动决议案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

（一）群众运动发展的概况

鄂豫边各县除陂同二县接近产业区域，略受工业经济影响，其余全属农业社会境内，城市都停滞在家庭手工业农村商业经济状态之下，近年以来农村经济的恐慌，苛捐杂税的增加，兵匪的骚扰，民团的屠杀，在足以引起群众要斗争的情绪，蒋桂蒋冯军阀战争环生以及国民党背叛革命的各种事实，渐渐把一般群众脑海中的国民党幻想冲破了，加之黄麻历年斗争的发展和红军的扩大种种影响，业已造成鄂豫边群众运动发展的坚固基础。

（二）群众运动过去的缺点和错误

一、无产阶级和党的领导作用太薄弱并且有些农村无产阶级还没取得领导权。鄂豫边各县过去的革命团体恐怕找不到一个产业工会，其余数量很少的农村无产阶级多半受封建社会的影响太深，也不能领导广大的农民斗争走上正确的道路，并且有的农村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领导权，我们的党本是这种斗争的最好领导者，但是生长在农村的党自然充满农民意识，减弱了领导作用，所以农民斗争的领导已经成了严重问题。

二、没有注意城市工作甚至毁灭城市。过去鄂豫边的城市工作非常落后，完全形成……结果不但成千成万的工人小贩失业，把一般中小商人送到地主营垒制成杀人放火的坏影响，而且造成了经济封锁，一切需要品无法购买，一切农产品无法输出，注意城市工作的决议案各县虽然规定了几次，终久没有切实执行。

三、发展不平衡，斗争不联系。各县群众运动的发展极不平衡，斗争区域多是一隅之地，而且是最偏僻的地方多没有斗争，又是各地单独进行没有联系，因此力量薄弱易于打击。

四、对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策略之错误。各地群众开始斗争而把城市小资产阶级们送到地主阶级的营垒。

五、无目的的烧杀。两年来各地实际烧了许多非豪绅地主的，在这种事实和影响当中一定脱离了不少的群众，增加了不少的内势力。

六、党包办群众组织。有些地方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始终没有分清，县委区委直接以党的名义去指挥农民委员会的事情，形成了党包办一切。

七、没有注意群众日常斗争的领导。各县领导群众斗争的号召不了解日常斗争是什么，更不知道剧烈斗争必须由日常斗争中建立起来方有基础，一开始就闹成武装斗争自然易于失败，这样失败后的群众不是消沉就是怨党。

八、忽视了妇女运动。各县同志对于妇女运动有两种观念：

1. 以为妇女没有什么大作用而且又要多费工夫去做。

2. 以为发生奸情事引起群众反感。这两种观念都是因噎废食的取消主义，削弱了不少的革命力量。

九、命令主义的遗毒。有许多斗争并不是鼓动群众执行，而是命令群众执行，实际上群众并没有负责，完全是党员的斗争。

十、征服政策。各县同志多半过了很久的游击生活，加以白色恐怖的反映，养成了一种"游击工作万能"的观念，甚至有些同志常说反动势力还是要盒子打，不是标语贴得到的，这完全是征服政策的表现。

十一、做群众运动的同志生活腐化。过去做群众运动的同志多半是穿好的吃好的，衣服的样式饮食的调装完全与群众不同，这些事实引起了群众不少的反感。

十二、宣传上专于夸大革命的武装。对于许多同志专于宣传红军赤卫队怎样多，怎样使群众依靠武装，不认识自己的力量，一迂到敌人围剿的时候红军不能应付，便惹起群众怨恨红军和党。

（三）城市工作

一、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策略。不可故意引起店员对店东的斗争。如迂店员对店东自发的斗争，仍应站在店员领导之下，同时在宣传上应以保护中小商人利益，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为中心口号，今后各县的党应极力防止乡村群众无原则的侵犯中小商人的利益。

二、各级党部应具决心的以一部分人力财力发展城市工作。过去事实的教训各级党部对于城市的工作重要应该有进一步的认识，大会在支配人力的当中应注意到鄂豫边的重要城市，大会闭幕以后，各级党部应将适当的人力财力支配到城市中去。

三、京汉路的路工运动。京汉路的路工运动在组织上军事上都征服是鄂豫边中心工作之一，今后应派同志去根据建立赤色工会，打入非赤色工会的路线去从事工作。

四、建立城市的工人组织。城市工作最要注意店员手工业码头工人的组织，这种民众组织不拘名义不拘数量只要在我们领导之下，建立的方法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适合秘密条件之下，鄂豫边同志可以易地工作。

五、城市工运必须与近郊的农运相联系。城内城外的工作必须有亲密的联系，适当的配合，能得到工农联合之效，斗争的容易得到胜利，在城市工作未发动的时候，应利用近郊的组织向城内推动。

六、领导并发动日常斗争就是领导零细的斗争。（如增加两个铜板的工资）也须尽力领导和发动，但须顾到胜利之前途，斗争的初期务须得到小的胜利，不宜受打击。

七、加紧反改良主义的宣传。针对蒋系改良派……的改良主义的宣传揭露其假面具．使工人群众脑海中脱离国民党的幻想。

八、对黄色工会的策略：打入其组织攻击其领袖夺取其群众极力促使其群众攻击其领袖，不可使群众攻击群众。

（四）农民运动

一、农运政策及农运方针

1． 使党的土地政纲深入到农民中去。过去许多同志都具有先有政权然后实行分配土地的观念，以致党的政纲还没有深入农民中去，今后应变更方式将土地政纲传运到广大的农民中去，使农民对于土地革命得到精确的认识，在没有建立苏维埃的地方可以用农民委员会的名义没收和分配土地。

2． 加紧农民日常斗争的领导并扩大其斗争范围。农民反苛捐杂税反派夫反高利反小稞反提高谷价……等斗争，党应竭力领导并扩大其斗争范围，初发动斗争的地方即应准备武装斗争不必发动武装斗争，尽量利用豪绅地主的矛盾不拘方式发动一切小的斗争，只有领导日常斗争才能建立党在群众中的信仰，但农民自发的武装斗争党亦应该领导。

3． 正确的运用党对富农的策略：

（1）在开始斗争的地方：

（一）宣传土地革命的对象是地主阶级，同时极力宣传豪绅地主对富农的压迫。

（二）对富农可酌量情形实行减租减息，但在宣传上仍是抗租债。

（三）对于富农剩余的粮食须限制价格和禁止出境。

（四）禁止对富农罚款勒捐。

（五）酌量情形可允许富农加入农民委员会但须禁止当选执委。

（六）严格监视过去掌握乡村政权和与豪绅地主有关系的富农，如稍反动事实发生即以断然手段处理之。

（2）斗争发展的地方（苏维埃区域）：

（一）分配富农剩余的土地。

（二）对于反动之富农与地主一样处治。

（三）同情革命的富农应有苏维埃的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

（3）注意农村无产阶级农民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在斗争开始以后农民委员会中使农村无产阶级得被选为执委，稍有斗争历史的农民委员会中应建立雇农部或另组织雇农工会。

（4）正确的运用联合中农的策略：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胜利的保障，这是六次大会所定的正确策略，今后应切实运用各种策略防止无原则的妨碍中农利益。

（5）武装农民。在斗争比较发展的地方即应武装农民，同时应认定目前尚非革命高潮是准备武装暴动的时期，不可造成武装就暴动的形式。

（6）发展游击战争。过去的经验很足以证明游击战争可以发展斗争和建立红军，今后各地仍应力图游击战争的发展，尤其是要游击战争的范围扩大，但在游击中极力纠正脱离群众及无目的烧杀等错误。

（7）农民委员会：

（一）每县各区农民委员会的组织要力求平衡。

（二）乡农民委员会的范围宜大，每区至多只可划为二十乡。

（三）白色区域中的农民委员会须绝对秘密，赤区的农民委员会力争公开。

（四）加强农民委员会的民主精神，禁止党员包办农会的一切。

（五）农民委员会中应吸收农妇并在农会中建立妇女部。

（六）提高会员的政治水平线。

（8）在白色区域中应利用各种灰色团体名义——如兄弟会、把子会、体育会……组织农会。

（9）武装组织：有自卫队的地方不组织少年先锋队，没有自卫队的地方可以组织少年先锋队。

（10）加强党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必须打破党员的农民意识。农村党的唯一缺点，就是农民意识。补救这种缺点的方法只有：

（一）参加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去。

（二）加强无产阶级的教育。

（11）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今后在蒋系改良派争夺鄂豫的政权进程当中，改良主义的影响在事实上有传播到鄂豫边的可能，各级党部应在宣传中斗争中揭破改良主义的欺骗。

二、枪会运动

1. 枪会运动之重要：光、罗、商各县几无区不有枪会即麻安陂云无一不受影响，就枪会的性质和过去枪会运动的经验来证明，假使忽视了枪会运动或是策略的错误就可影响到全部工作，甚至可以影响到当地党的生命上，各级党部应特别注意。

（12）枪会运动之具体方法：

（一）利用各种关系打入其组织夺取其群众。

（二）扩大政治影响到枪会中去。

（三）利用受我们影响的枪会打入其他组织。

（四）作战时捉大批枪会群众加以宣传放一部分，留一部分加以长期宣传并采取“取保”的方式。

（五）勾结其领袖借以分化其群众。

（六）有时拘留其领袖于必要时得杀戮之。

（七）拘留其家属放本人回去做破坏工作。

（八）挑拨其群众与领袖斗争，领袖与领袖冲突，绝对禁止群众与群众冲突。

（九）用小恩小惠联络其感情夺取其群众。

（十）利用在反动区域出来的群众做宣传工作，不可杀戮。

（十一）收买他处红学领袖到反动区域做宣传工作。

（十二）勾结红学群众到赤色区域来受政治影响。

（十三）打开红学乡村须用抚慰队抚慰红学的家属，绝对禁止烧杀并注意其组织。

（十四）对于群众的反动领袖不能即时杀戮，但终久必须杀戮，杀戮之前必须向群众宣布其罪状。

（十五）对枪会宣传只能反对其领袖不能反对其组织。

（十六）赤白对立的地方枪会只能用武装镇压和宣传，以不用武装解决为原则。

三、对其他反动组织的策略

1. 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在夏斗寅捣乱黄麻的时候各乡的铲共会联庄会纷纷成立，甚至几区的农民委员会变成了联庄会，事实上演出三种现象：

（1）虽革命的民众一加入铲共会联庄会就发生反动行为。

（2）铲共会联庄会与农民委员会成了对立形式相互烧杀。

（3）赤白交界的革命民众不加入铲共会……只有跑反，跑久了吃饭问题无法解决，这些现象同时发现，几乎黄麻党的生命葬送了。

2. 对付的政策：

（1）赤色区域的周围应建立党的组织和绝对秘密的群众组织。

（2）极力宣传反动组织中的群众是受威逼和欺骗，使革命群众之以仇敌视之。

（3）运用各种技术与反动组织中的革命分子通消息并使破坏敌人方面的毒辣政策。

（4）当统治阶级威逼革命民众建反动组织时，群众加入与否由群众自决，其有愿加入的必须授以秘密工作方法。

（5）可以派适当的同志打入反动组织内部，做破坏工作。

（6）无法打入的反动组织，可照枪会策略运用之。

（7）极力避免赤色区域与白色区域群众的械斗。

“附”对难民会的办法：

1. 在宣传方面，说难民会的群众是受压迫欺骗的群众，应容许其回家。

2. 由负责人利用各种关系切实担保其归家以后只能监视不能杀戮。

3. 留在赤色区域的白色区域的民众，放他回去做分化的工作。

4. 把赤白交界的地方变成灰色区域建立地下党。

5. 设法救济跑反生活困难的民众。

6. 家属在赤色区域中家主在难民会，可使其家属叫他回家并切实担保其生命财产。

7. 革命团体中有与难民会有社会关系的分子得由团体派他到难民会中去找与他有社会关系的人回来担保其生命。

8. 俘虏过来的难民会中人如系首领叫他写信传去分化其群众。如系群众给以好的宣传和影响然后释放。

（五）兵士运动

一、过去的缺点和错误

1. 兵变主义的观念：过去多数同志以为兵运的目的在造成兵士哗变，如果兵运没有兵变就没有效力。

2. 没有兵运组织和具体计划：过去的兵运工作仅仅贴几张标语而已，各级党部都

没有兵运组织和具体计划。

3．士兵宣传不深入：过去的宣传口号多半是同志空想出来的，并没有根据兵士的心里和生活上的要求。

4．忽视了兵运的教育：各级党部在讨论中在通告中很少提到兵运上去，以致许多同志不知兵运是什么，甚至几次兵士来接头被赤卫队打转去了。

二、兵运方针

1．扩大政治影响到士兵中去：党的兵运意义并不简单的造成兵变，唯一其目的是要把党的政治影响深入到兵士群众中去，使广大的兵士群众团结在党的政治口号周围，兵变否，完全由当地情形决定，不可造成机械的兵变。

2．各县委应有兵运委员会，应按期开会规定兵运计划督促下级党部执行。

3．宣传口号：过去的宣传口号有几点至明显的错误，就是攻击下级长官和高价买枪一类的口号，今后对兵运宣传口号除党部的兵士政纲而外要特别注意兵士部分的要求。

4．建立兵运机关：各驻军的地方建立接近兵士生意，如摆摊 开 馆 开 小店子……等，尽量与兵士联络感情，然后一步一步的把党的政治影响传播到兵士群众中去。

5．注意兵运技术：

（1）一切行动不可引起长官注意。

（2）兵士的组织须绝对秘密，与组织不可发生关系，每个单位组织人数要特别少。

（3）哗变要利用时机要特别迅速要有适宜的向导。

6．兵变的四个条件：

（1）当地工农革命斗争高涨起来反动派即用兵力去压迫时。

（2）与我们红军作战接触时。

（3）我们的工作被敌人察觉非兵变必被解决时。

（4）在敌人的混战兵士可以使他们两败俱伤而我们不可夺取武装时。

7．兵运是各同志日常工作之一，非少数人专门的事情，并要号召革命群众注意兵运工作。

8．注意兵士的日常斗争。

红七军前委通告（第二号）

——关于党的组织工作——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前红军所到区域，革命空气的紧张，群众工作的发展，已成为毫无疑义的事实。在这样客观环境之中，党能否加强对于红军之领导，并在工农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则与红军的前途及右江各县群众工作均有莫大的关系。因此，怎样使红军中及地方党部党的组织工作能健全起来，实为目前严重的问题。

在最近客观形势的发展，党的组织工作，将有相当进步。如发展党的组织，数量上的增长，干部同志对党的策略上讨论相当的发展，党开始在工人群众之中树立基础，党的组织系统的整顿等等，各方面都表现进步之现象。但是这些进步均甚微弱，照目前党的组织工作之一般薄弱及组织工作上许多的缺点，仍然是党部继续发展与巩固之一个非常大的阻碍。

兹确定目前组织工作大纲如下，各级党部以最大的努力来执行，以最大力量来注意党的组织问题：

（一）确定党组织系统：

1． 前委之下，各纵队设队委。

2． 纵队之下，各营设营委。

3． 每连队设一支部，军官与士兵同志混合组织。

4． 各营委及各支部由各直属队委指挥。教导队支部、训练所支部、政治部支部、军部支部及特务营营委直属前委指挥。

5． 地方党部与所在地军队中最高党部发生平行关系，但受前委之指挥。

（二）注意中心工作：

地方党部（特别是百色、平马、那坡）须加紧注意工人中党的织组工作。农村中须注意政治、经济中心之市镇圩场及交通要道的乡村中党的中心工作。而且要特别注意贫农及农村无产阶级。又在军队中须特别注意教导队、训练所及老兵队伍中组织之工作。

（三）创造干部分子：

1． 平马、百色、东兰即开办中坚同志训练班，在短期内施以基本理论之训练。

2． 指导机关须经常与中坚同志谈话，分配以工作，特别注意检查之。

3． 多提拔中坚同志入各种公开团体中，如苏维埃、工会、农会、兵委会……工作，并告以工作方法，在工作中训练之。

4． 多召集活动分子会，报告各种重要问题。

5．每礼拜召集常委、支部书记、干事联席会议。

（四）健全支部生活：

1．支部会议应多讨论本支部的实际问题，决议之后，即须分配工作，使每一个同志均担任一种工作（发行、交通、侦探，加入群众指导机关组织工会，组织农会，收党费、抄写……）。

2．支部人数多时分小组，小组会议多讨论党的基本理论问题。

3．按月交党费东毫一毫。

4．每二天同志向支部书记或组干作口头报告工作至少一次，各下级机关向上级机关作书面报告至少每周一次。

5．支部会议应经常有批评一项，每次开会由主席指定二三人为批评之对象。

（五）注意集体指导：

1．党内一切重要问题均应召集各级委员会讨论决定。

2．临时问题及日常细小问题可由书记解决，但解决后应向各委员（或干事）报告。

3．在指导机关中同志（如前委委员或队委、营委委员、支部干事）应经常的注意党的工作问题，不可一切问题推在书记身上。

（六）实行民主化：

1．党内一切问题如无极端秘密性者，均交各级指导机关及各支部讨论。

2．指导机关争执之问题可请上级决定，但尽可能召集党员大会解决。

3．实行民主化时仍须保持民主集权制之确立，须防止极端民主化之现象。

（七）严格执行纪律：

1．下级机关须服从上级机关的命令。

2．党的一切决定任何同志均须遵从，不能随便以个人意见而更动之。

3.，同志怠工或表现不好，经警告后仍不改，着即驱逐出党，有贪污、破坏党在群众中义信者，毫无疑义的开除出去，必要时可向群众宣布。

（八）注意秘密工作：

1．未经党允许之同志绝对不准自动公开出来。

2．党的一切内部文件、名单仍须绝对守秘密。

3．地方党部须要即刻建立合于斗争的秘密机关。

4．地方党部各级指导机关应有候补组织。

（九）发展组织：

1．最大限度的发展同志，特别注意在工人中发展。

2．发展新同志须行入党仪式，给以党的深刻影响。

3．注意在白色区域内发展党的组织。

（十）党与群众应有正确关系：

1．党绝不能命令群众或群众团体，如苏维埃、工会等。

2．党在群众指导机关中，如有三个同志，即须组织党团，暗中起领导作用。

（十一）健全地方党部：

1．指定一部分同志专负地方党部工作。

2．军队中党部应给地方党部以各种帮助。

3. 引进积极的农民分子参加地方党部指导机关。

（十二）发展共产青年团；

1. 军部中不必另有团的组织。

2. 地方党部应分一部分人力来建立团的工作。

3. 党应加紧对于团的指导。

前　委

土　地　革　命

——中国红军第七军政治部——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中国农民的痛苦

（1）政治的：

（一）军阀的残害　军阀割据地盘，在他势力所及的地方，就是军阀的私产，征收捐税的关卡，每个农村都有，一切日用的东西，都要收重税，结果是使农民要买的东西价钱贵了，农民卖东西不能赚钱，军阀们天天打来打去，每个农村都成了战场，筹饷，拉夫，强迫当兵，没收粮食，奸淫抢掳，杀人放火，把农村弄成饥荒死亡悲惨的世界！

（二）豪绅的压迫　豪绅是军阀地主用以压迫农民的走狗，他包办一切钱粮捐税从中剥削，占住反动政治机关（县公署，团务局，财政局等），搜括农民的金钱，利用反动的武装——民团，警察，保安队——抢劫农村，拘捕农民，他们随时都可以谄害农民，没收农民的财产，奸淫农民的妻子。

（2）经济的：

（一）帝国主义的侵略　外国资本家的火车轮船到了中国的腹地；洋货跟着到农村，农民的手艺不能做了！（如纺线和榨油的减少，）外国资本家的银行，设满各大都市．军阀，官僚，地主，买办们的金钱有保管的地方，他们就加紧剥削农民！外国资本家又放债到农村，和收买土地收买平易的货物，他——帝国主义又同军阀官僚勾结借钱，卖枪给他们打仗，争官，把一切矿产租税当给洋大人，我们农民要赔大批的冤枉债！

（二）地主无情的剥削　地主倚赖他的土地，用"收租"的方法剥削农民，通常租额是十分之五，或十分之六，就是天灾水患……的荒年，也不能丝毫短少！租缴不足就算做欠债，利上加利的剥削！租田要写租约，以财产作担保，农民无力还租债，地主便没收其财产，——有时还要加上老婆儿女！农民把田种肥了，地主就要加租，否则不准种田，农民还要时时送礼物给地主，为地主做劳役，农民是地主的奴隶。

（三）高利贷　农民要应付饥寒疾病的祸患缴租纳粮的困难，就要向乡村资本家（买办和富农等）借钱。借钱要立借约，出抵押，利息起码是三分，有些是五分，甚至十分！并且是利上加利的计算，农民的房屋财产老婆儿女每每要做还债的东西！借钱每每是谷价昂贵的时候，还债又是物价平易时，再加上高额的利息，在三五月后借一要还三了！

（四）苛捐杂税　在豪绅地主资本家——国民党军阀的"三民主义的世界"里苛捐杂税的剥削可以致农民的死命！什么护党捐，爱国捐，北伐捐，西征捐，什么附加捐，印花

税，百货税，营业税，房屋税，甚至有猪仔买卖捐，蔗条入口捐，摊位摆卖捐，走路捐，过路捐……无微不至，无奇不有，农民挨住冷饿，也要缴纳苛捐杂税，给国民党契弟们享福！

（五）中间人的剥削　中国有包佃制，地主不直接租田给农民，要由中间人来转租，地主与中间人互相利用。农民非负担中间人的剥削不可（地租特别加多）。

（3）雇农贫农特别痛苦　雇农卖他的劳动力给富农得的酬报分〔非〕常之少！他们要在饥寒交迫的苦况之下，替富农做奴隶——做洗烟具，提便壶等卑下的工作！贫农时时要向富农借贷，替富农做短工，受富农的剥削，他们不但生活痛苦而且有失业的危险！

二、广大的农民群众都迫切的需要土地革命

（1）农民革命普遍全国　农民受了破产与贫困和被残杀的痛苦，逼得他们起来干革命了！现在全中国无论那省那县那个农村都有农民革命的运动，——尤其是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四川，河南等省，特别的高涨，在这几省的农民，已大部份做到"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掌握政权"了！各地农民在反豪绅地主减租等的口号之下，都成千成万的发动起来，右江在两月内组织了二十几万农民，斗争的阶段已到了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红军有了七军！游击队有几百队！各地的农民斗争，都由抗租抗税进到武装冲突，游击战争，苏维埃区域的割据了！

（2）农民斗争的主要要求

（一）土地　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农民没有土地，或是土地不足，——这是农民一切痛苦的根源。农民斗争的第一个主要要求是要得土地——耕者有其田，这个要求在下层农民——雇农贫农尤为迫切。

（二）肃清封建势力　豪绅地主，买办和他们的代表军阀是依赖剥削农民为生存的，这些东西不消灭，农民不能解放，农业不能改善，农民斗争的第二个主要要求，是推倒豪绅地主阶级的权力——肃清封建势力。

三、土地革命的意义

（1）解放农民　推翻地主豪绅的封建统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可以免除地租，苛捐杂税，高利贷的剥剥，和一切封建的压迫，可以有能力改良耕种方法，发展农业，得到自由快活的生活！

（2）打倒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是封建势力；剥削的对象，是广大的农〔民〕群众。打倒封建势力，（消灭军阀买办）与解放农民，可给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

（3）土地革命是目前革命的主要内容　现在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与肃清封建势力，土地革命可以肃清封建势力和打倒帝国主义。

四、土地革命的力量

（1）农民成份的分析　农民不是整个的阶级，就经济的贫苦来分：有富农（除自己消费外，还有剩余资本剥削人的）、中农（自给自足的）、贫农（不能自给的）。就耕作形式来分：有自耕农（耕自己的田）、佃农（租田种的）、雇农（斗争农业工人）。

（2）贫农雇农和中农　贫农雇农是乡村无产阶级，他们对革命的需要非常迫切，在革命的〔过程〕中是坚决而彻底的，他们是土地革命的主力。中农（多半是自耕农）常有降落为贫农雇农的危险，他有保持土地和废除捐税的要求，他是可靠的土地革命的同盟者。

（3）富农　富农的利益，在农民与地主之间。富农虽然受豪绅的压迫，但有些是兼豪绅和半地主的，他有造成地主的希望，所以他对于革命的态度是动摇的，革命深入一层，他必定的要反革命。

（4）工人与土地革命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在资本家与地主，分划不清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统治工农的中国，推翻封建统治是工农一致的需要，土地革命成功，工人阶级可以增加工资，减少时间，改良待遇，政治自由，工人阶级一定以全力帮助土地革命的。

（5）士兵与土地革命　士兵是工农的化身，他为了破产失业而来当兵，老弱退伍仍要回到田间或工场，但地主资本家不打倒，士兵回家不能生活，必要土地革命成功，保障退伍士兵的生活——有田耕，有工做，有衣食——士兵才有出路，现在士兵受尽了军阀的压迫和欺骗；已觉悟起来与工农联合了，士兵也是土地革命中的主要势力。

五、土地革命的策略

（1）对富农的策略

（一）富农有地主的前途，在土地革命中，他是动摇不定的。在革命初期——反豪绅反苛捐杂税的时候，他是参加革命的；到革命深入——抗租抗债没收地主的时候他便反革命了。所以对富〔农〕的策略是：

（二）在斗争初期，要富农参加革命，但要和他争革命的领导权。

（三）到革命深入，富农反革命的时候，便以对地主的策略对待他。

（2）日常斗争

（一）在豪绅地主统治下的地方。要加紧日常的斗争——反豪绅减租抗税的斗争，发动广大的群众起来，由小的斗争转变到大的斗争——这是主要的策略。

（二）在苏维埃区域内也要作日常斗争——贫农雇农对富农要求增薪减时改良待遇的斗争。

（3）组织苏维埃政府

（一）推翻豪绅地主的政府，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引导农民群众参加政权，打倒豪绅地主，镇压一切反动派，处理土地分配等问题，保障农民的胜利。

（二）内地各县苏维埃要以雇农贫农为中心，组织的成份要以雇农贫农占多数，还要吸收手工业工人和士兵参加巩固雇农贫农的领导权。在工人较多的区应以工人为中心。

（4）创造红军和农民的武装训练

（一）土地革命斗争的区域，要尽量的成立游击队和红军，以斗争中勇敢的农民充当红军，改变红军的质量，扩大红军的组织。

（二）同时要实行农民群众武装的训练，土枪刀叉等都是农民的武器，农民都要武装起来，尽量设法受军事训练。

（5）斗争的深入与扩大同时并进

（一）斗争一定要深入，坚决的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彻底扫除乡村封建势力，巩固苏维埃政权。

（二）同时要努力向外发展，扩大斗争的区域。

（6）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

（一）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公有，分给农民耕种，不准买卖；

（二）凡要耕田的人，要向苏维埃领取使用证；

（三）年满十六岁能自力耕种的分给一份，每份若干亩，由各地斟酌情形规定，以土地的肥瘠，人口的多少为标准。其余的土地按照四岁以上的人口分配之；

（四）红军现役军官有家属者，他本身也可得一份，分得的土地，得雇人耕种；

（五）雇农愿意自己耕种的，要分给土地；

（六）增加雇农工钱，减少工作时间，并改良待遇；

（七）增加手工业工人的工钱，并改良待遇；

（八）分配土地由乡苏维埃执行，县苏维埃指导之；

（九）老弱残废孤寡无依无靠的，得由乡苏维埃维持其生活；

（十）土地使用人须向苏维埃缴纳一成至二成为行政之用；

（7）乡村的组织问题

（一）农会是群众的组织，苏维埃是政权的组织，苏维埃一成立，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农会即取消。

（二）农会和苏维埃的成分，都要以雇农贫农为中心，绝对禁止豪绅参加，富农绝对不与他居领导地位，农妇可加入农会。

（三）雇农有特殊的要求（加薪减时改良待遇等）可于农会之下组织雇农部。

（四）手工业工人要加入农会，同时要注意手工业工人的特殊要求。

（五）青年农民是革命的先锋，要组织少年先锋队归苏维埃或农会指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 第5册
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 编
页数=613
SS号=10273507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封面
目录
目录

红军第四军军党部布告（1929年）
土地法（1929年4月）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1929年6月）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1929年7月）
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陈毅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
给林彪的一封信（1930年1月5日）&毛泽东
土地法（1930年2月7日）
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
前委通告（第三号）（1930年3月18日）
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1930年6月）
富农问题（1930年6月）
苏维埃土地法（1930年6月）
兴国调查（1931年1月26日）&毛泽东
中央给龙兄及前委诸同志的信（1929年3月17日）
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旧历8月8日）
鄂西游击战争的经过及其现状（1930年5月）
鄂豫边军事问题决议案（1929年12月2日）
鄂豫边区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群众运动决议案（1929年12月2日）
红七军前委通告（第二号）（1929年12月20日）
土地革命（1929年12月21日）